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蒋介石传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作者简介

王俯民，山东省梁山县人，1936 年 12 月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现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民国史研究。曾与人合著《奥林匹克运动会史略》，编著了《民国军人志》。

《蒋介石传》系作者 8 个春秋的心血结晶，史料丰富，内容翔实，客观地反映了蒋介石的政治、军事生涯。此次经作者再次修订特出版，以飨读者。本书出版后，作者又陆续出版了《蒋介石详传》、《孙中山详传》两书。该两书亦得到各界支持与好评，不断增印。

民国三十四年（1945 年 6 月），经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介绍，蒋介石与美国援华执行人菜普汉握手（中间为司徒雷登）。

民国三十七年（1948 年）5 月 20 日，蒋介石总统和李宗仁副总统就职时合影。

蒋中正二十五岁像。

1924 年 6 月 16 日，孙中山先生主持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时留影。蒋正中（前排右二）被任命为校长。

国民十五年（1926 年）6 月，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时之戎装照。

蒋介石学生时代侍母王太夫人照。

民国十三年（1924 年）6 月 16 日，孙中山先生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的主席台上发表演说。（左二是蒋介石）

民国十二年（1923 年）6 月 17 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行营参谋长特任状。

抗战时期蒋介石与其子经国（左一）、纬国（右一）合影。

蒋介石夫妇与长子经国全家合影

蒋介石与夫人对弈。

民国三十二年（1943 年）10 月，蒋介石就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大元帅时戎装照。

1943 年 10 月 10 日蒋介石新任国民政府主席，图为蒋宣誓就职后与夫人合影。

民国三十四年（1945 年）9 月，重庆谈判时，蒋介石与手泽东合影。

民国三十四年（1945 年）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时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邱吉尔合影。

1945 年 9 月，蒋介石接受日本投降时留影。

1945 年 8 月 24 日，在重庆国民政府内，蒋介石签署联合国宪章。

民国三十四年（1945 年）9 月 10 月，中国陆军总部副参谋长冷欣，于重庆将中国战区日军投将书，呈递蒋介石察阅。

蒋介石传

前　言

我写《蒋传》，不是近来的事，而是自 1980 年就已开始准备资料，并试写了片段在一些刊物上发表。

此书旨在探索一段真实的历史，了解蒋介石的本来面目及其一生功过。

为此，我写《蒋传》的准则，是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不溢美，不丑化，如实地再现蒋和他所在的那个时代，保存一代信史，揭示前朝兴亡，以为后人之鉴。

西人云：历史乃生活之教师。我中华祖先之此类教诲，更不胜枚举，总括言之，乃以史为鉴。故历史之对于常人，对于为政者，均至为重要，犹之于生命与空气，鱼之与水，不可须臾而离。故而中国历代有详史，以备查考；更有司马光《资治通鉴》等史书，专资借鉴。

从万千乡村到座座城市，不管“草民”还是官宦，悠悠数千年长史，无人离开过历史的薰陶和濡染。历朝演义之作，乃民间“历史教科书”和“纲鉴”。最著名者为《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精忠说岳》等。

民众在读诵之中，得知丑与美，善与恶，爱国英雄和卖国奸贼的对立，以及各自的含义。这些英雄史实和人物，是他们思想行为的潜在原则和楷模，对社会有着巨大影响。

辛亥革命前夕，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成为中国青年革命的旗帜和精神支柱。这旗帜就是“民主与科学”。民权即民主；民生即科学。它不是如蒋所说，来自文、武、周公、孔子，也不是来自五经四书，而是来自对欧美民主与科学的消化和吸收，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洋为中用。三民主义是孙中山以中、西历史为鉴，而提炼出来的。

到“五·四”运动时期，则民主思想更加深化，陈独秀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于是“民主与科学”成了中国革命青年的旗帜。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口号，这也主要贯穿了民主与科学的思想。毛泽东在 1942 年于《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说：“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与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

1949 年毛泽东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提出“人民民主义”，仍然是提倡人民的民主，而反对对人民专政。这仍是以民主与科学为主要旗帜。

这种民主与科学思想，就是以中国清王朝、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的专制和愚民政策阻碍社会前进的反动统治的失败为教训，以欧美的民主、科学促进社会前进为经验，而提炼出来的。

蒋介石在大陆失败的总根源，就是因为他实行封建专制主义，实行新的愚民政策，反对民主与科学，开历史倒车。他抛弃了历史这面公正的镜子，最终在历史面前失败。蒋的一生也同样是一面明镜，它将在历史发展的路途上，检验众生。

是以，人人不能离开历史而生活；离开历史或忘掉历史，就如失掉罗盘的孤舟，大海茫茫，何去何从？

于此，谨对本所研究室领导、同事们的深切关怀与诚助，对经济日报出版社的热情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王俯民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再版前言

《蒋介石传》自出版后，不断收到各方面读者来信，其共同的评论是该书内容客观、公正、深刻、翔实；也有读者指正了具体错误之处；有些老人们更为之激动不已，广为推荐。均于此深致谢忱。

经过不断修改，经济日报出版社决定修订再版，以更好地满足读者需要，是一件令人高兴的好事，笔者特于此，亦深表谢意。

自该本《蒋传》出版后，我又陆续出版了《蒋介石详传》、《孙中山详传》二书，亦受到广大读者与专家们的热情支持与好评，我亦于此深表谢忱；并借此机会，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深致谢意。

史者师也，治史之目的，在于以史为鉴，以史为师，而不能以其为任意改造之工具。因此，治史之方法，在于再现客观存在的历史，这历史包括全面史实，而不是任意选取一方面史实，而抛弃另一方面史实，这就是唯物史观。否则，任意选取史实，或先有论点后找资料之方法，正是历史唯心主义，正是不顾客观史实的“随心所欲主义”，与历史唯物论相差十万八千里，不得冒充历史唯物主义。

对于历史人物，亦是如此。写人物传记者，必须摒弃一切主观色彩，如个人感情与好恶，完全站在公正、客观立场上，书写其一生之各个方面，正确、错误、功、罪、智、愚均应如实书之，不应抛弃任何一个方面。那种“为贤者讳”“的著作”，严格论之，决不是史著；有意溢美和丑化人物的著作，亦不是史著，因为这些著作都不尊重史实。

历史是为政者的老师，也是研究工作者和企业家的老师，凡制订大政方针，或进行科学研究时，都应首先请教历史，才知道这个领域中已经建立或出现之成果及其得失，然后制定最正确，或最佳方案。否则，有师在前，而不去请教，却主观盲目地杜撰。

“拓荒”，既可笑而又会造成社会财富的严重损失。是以史者师也，决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事实，而且是天大的事实。笔者虽愚，但认定此“史者师也”，为万年不易之真理，并本此治史，庶几不会有大失也。

王俯民

一九九六年二月六日

第一章　追随孙文

家乡和身世

蒋介石，乳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后改名中正，字介石，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人。1887 年 10 月 31 日（光绪十二年九月十五日）中午时分，出生于玉泰盐铺楼上。

溪口镇，依山环水，风景优美，地处剡溪流入锦溪之处，故谓之溪口，亦名锦溪村，在剡溪之北，南距奉化县城约 15 公里。

剡溪发源于四明山余脉横溪岭，凡有九曲而会于甬江，再东流入海，人称“剡溪九曲”。第一曲为“六诏”，相传为东晋王羲之隐居之处，晋元帝曾 6 次下诏征其入朝，王均不从，后人遂名之为六诏。第二曲为“跸驻”，相传五代十国时代，吴越王钱镠曾驻跸于此。第九曲为注入锦溪之处，即溪口。杜甫、李白对剡中风光也均甚称道。杜曰：“剡溪秀异”；李曰：“山中水石清妙”。四明山周围 800 华里，共有 280 座山峰，其中 70 峰雄居奉化。该镇北面为群山连绵，镇山之间有桑园、水田、樟木互相掩映。沿剡溪而下，经 40 公里即达于宁波海港。自宁彼乘船往上海，亦只一二天路程，故溪口与近代文明有较密切联系。自沿海到山地居民区，溪口亦是必经之地，行人往返，甚是繁盛。

溪口镇既风景优美，亦多名胜古迹，相传有溪口十景。武岭潭墩山是十景之一。山巅有文昌阁，建于清雍正九年。1924 年蒋介石回乡时，其兄蒋介卿又兴建“乐亭”于其上，由蒋为之命名，并撰有《乐亭记》一文，以记之。潭墩山东麓，有泉水流出，冬天不结冰，因名之为“武岭暖浪”。后蒋介石又于此建小洋楼一幢；蒋经国与其夫人蒋方良、长子爱伦曾在此居住。乐亭后为日机炸毁，洋房至今尚存。

雪窦山比武岭风光更胜一筹，人谓溪口名胜，首推雪窦。它是四明山在奉化 70 峰中最享盛名的一个小峰。山上有雪窦寺，寺距溪口镇约 11 公里，在溪口之西南，为浙东第一刹。北宋于此建有雪窦山亭。元朝石室英禅师于元统三年（1335 年）予以重修。明嘉靖年间，再次重修，题名曰：“息善亭”。此亭抗战期间亦为日机炸毁。抗战胜利后，由杜月签重新修复，改名为“入山亭”。自此而上，十里处又有“御碑亭”，由南宋理宗赵昀修建，并题有“应梦名山”四字，谓此山为仁宗梦中所见之山。山顶有雪窦资政禅寺。东晋时于此建“瀑布院”，至唐朝会昌元年（公元 841 年），将此院改建于山窝平坦处。咸通元年（公元 860 年），毁于战乱。

八年重修，改名为“瀑布观音禅院”。景福元年（公元 892 年），常通禅师自安徽宣城来此，将其扩建为“十方禅寺”。至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 999 年），始改名为“雪窦资政禅寺”相沿至今。后又经多次毁修。清初寺中往持石奇禅师又铸造大钟和修葺山门。至于民国，蒋介石为此寺题额“四明第一山”。蒋介石所崇拜的明朝王阳明，曾于此游历时题下诗句。其中有：“林间烟起知僧在，岩下云开见鸟飞”的佳句。

此外，雪窦山又有“千丈岩瀑布”、“飞雪亭”、“消烦台”、“妙高台”，“伏虎洞”、“狮子岩”、“三隐潭”等名景胜处。三隐潭因有上中下三个潭而得名。蒋介石最喜欢此处胜景，曾于 1920 年回乡时，写诗鸣志，诗曰：

“雪山名胜东南最，
不到三潭不见奇；
我与林泉盟在夙，
功成退隐莫迟迟。”[1]

溪口镇在宁波西南 39 公里处，到民国初约有六七十户人家，只有一条街，长约三华里，多为低屋浅房。还有几家小店铺，为盐店、酱油店、米行、面店、小饭馆、茶馆等。盐店为蒋家所开。蒋宅居小镇中心，过武岭门西行不远就是。蒋家大门面街，过街就是一条溪水，即剡溪。溪对岸是笔架山。蒋家房屋，仍为原来建筑；这是因为怕破坏风水，一直未扩建或改建。清末隶禽孝乡。1928 年改隶溪口乡。1935 年改称溪口镇。到解放前，全镇已有 900 余户。500 户姓蒋，分老三房、新三房两大支。蒋介石家属新三房。全镇东起武岭门，西至武岭公园，共 5 华里长，已是一个大镇了。

蒋氏的先世，据其族谱的记载，远祖为周公旦的第三子，伯龄，封于蒋国。蒋国封邑在今河南固始县。伯龄之子孙，西汉初年迁陕西长安之杜陵。西汉宣帝时，蒋满出任上党郡太守，后任淮南王相国。满子蒋万，曾任弘农太守。蒋万之子蒋翊，字元卿，于西汉末元帝、成帝时，任兖州刺史。东汉初，蒋翊三世孙蒋横为光武帝之大将军。其子山亭侯蒋澄，字少明，迁至江苏宜兴县境（阳羡）。蒋澄之八世孙蒋枢，为晋朝吴郡太守，字伯机。伯机再迁至浙江台州。伯机的二十世孙蒋显，为唐朝末年四明监盐官，又由台州迁居明州（浙江宁波）。子蒋光定居明州。孙蒋宗霸，于宁波东乡小盘山参禅，称摩诃居士，死后即葬于此，称摩诃太公坟。宋代蒋浚明、子蒋琉、蒋翊，均为朝官或县官。蒋浚明由明州迁奉化三嶙。元末，蒋壮杰由三嶙迁溪口。计算起来，蒋氏系蒋翊第六十代孙，蒋显的第二十九代孙，蒋仕杰的第十五代孙。

溪口蒋氏成员，自明末以来，均不为清朝当官，一直保有民族气节，与黄宗羲的反清斗争，可以说是互相辉映。蒋的新三房的始祖为蒋祁增，字怀盛，生有三子，名：斯生、斯水、斯千。斯千为蒋介石祖父，字玉表，系蒋祁增之第三子，始改旧业，以经商为主，经营“官盐专卖”盐铺，以及作酒和石灰等商业。盐铺店名为“玉泰盐铺”。店内还挂有“官盐”专卖的招牌。此后家道日益富裕。

蒋玉表与萧镇永兴盐行（亦为专卖）的孙昭水为同行，有世交关系，其子蒋肇聪原配徐氏死后，就娶孙昭水之女为续妻。孙玄木就是蒋介石（前母）娘舅，也是蒋在风麓学堂的教师。

溪口之东不远处，为任宋村，是蒋介石姐夫的家乡。任宋村之东，又有一镇为畸山下，蒋曾在此从竺景崧读书。溪口西南又有公棠市，在剡溪之南，是一个大市镇。

大凡大人物的祖上，如果是富庶之家，每一写及，便是乐善好施，周济贫穷，蒋的祖父也不例外，并信奉佛教。蒋说他能够研究佛家经典，并手抄佛经多种。他既信佛教，则乐善好施便自然能够做到，这对于蒋的祖父来说，或者不是夸大之词。蒋对他的祖父评价很高，说他“性慈善，待人以恕，而教子孙则严。衣布茹素，耽好内典（佛经）”。又说其祖父对于来往行旅，“施茶给饭以给之，凡六、七年”，“而博爱之旨趣，充然溢乎事境如此也”。

---

[1]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文录）（简称《思想言论总集》），第 294 页。

[1]1862 年，因为清军镇压太平军，奉化逢遭战乱，蒋祖父盐铺停业，家产亦近于毁灭。太平天国失败后，蒋父肇聪 22 岁，受父命重振家业，专开盐铺。几年后，很幸运，又把家业复兴起来。

蒋父是玉表的次子，小名明火，字肃庵，1842 年（道光二十二年）生。精明强干，善于言词。据乡里人说，凡事不吃亏，还要占三分便宜。亦为乡里排解纠纷。然一生未当官；镇上人给他送了一个绰号叫“埠头黄鳝”，意指其难对付。另有田地 30 亩。初娶徐氏，生一子周康，即介卿；生女瑞春，嫁宋运周为妻。徐死后再娶孙氏无所出，孙不久病故，又续娶王采玉，生蒋介石。

关于蒋母王采玉身世，自唐人《金陵春梦》问世后，便疑窦纷坛，难辨真假。其实蒋籍河南之说并无实据，实为捕风捉影之谈。

王采玉，原名彩玉，后改采玉，1864 年（同治三年）生，浙江省嵊县葛竹村人。幼读诗书，尤工于女红。王氏祖先，于明朝洪武年间自奉化连山迁居葛竹村。第一代祖为王爽。蒋母的祖父王毓庆，为第十六代子孙。王硫庆生有三子二女，长子为王有则，次子王有模，三子王有金，都是国学生，但都未得功名。王有则，字品斋，精通诗、礼，1820 年（嘉庆二十五年）生，1882 年（光绪八年）死。原配姚氏生三子一女。姚氏死后，王又续娶欢潭姚振昌之女，又生二子一女，即四子王贤矩；五子王贤裕；女采玉，为长姊。

王有则曾于皖南、浙西招集流亡人口开垦战乱中留下的荒地。

晚年回家乡葛竹村，独资捐修葛溪至奉化县城之大路，后家道很快中落，蒋母 19 岁时，大弟贤矩 15 岁即赌博成性，贤裕 11 岁，神经有病，全靠王采玉一双巧手做针线贴补家用。日子过得十分艰难。王先嫁曹家田竺姓为妻，但不几年，即丧夫守寡。23 岁时，由蒋父盐铺伙计、王采玉堂兄王贤东介绍，改嫁于蒋父为第二任填房，生活才较富裕起来。王采玉既善女红，亦受父教，颇通文字，能念诵《楞严经》、《金刚经》等经卷。王生有二子二女。长子由祖父起乳名曰瑞元，名周泰，即蒋介石，次子瑞青，名周传，夭折。长女瑞莲，1906 年嫁竺之珊为妻，次女瑞菊，夭折。王于蒋家勤俭持家，并经常辅助娘家老母和幼弟。

王采玉自 1895 年 7 月其夫死后，就带着二男二女孤门度日。

蒋父与徐、孙氏合葬于桃坑山。蒋母王氏曾再三叮嘱蒋介石，等她百年后，择地别葬，以示不为他人之下，此知蒋母性格倔强，对蒋不无影响。以后蒋奉命而行。蒋父死后第四年，蒋兄与其母分家另过。蒋兄锡侯（周康），字介卿，分得玉泰盐铺家产，又继承伯父蒋肇海家产，名为“夏房”。王氏与蒋介石等，则只分得王氏自身居住的一幢小楼“素居”，又名曰“丰镐房”。丰代表蒋介石，镐代表其弟瑞青，合称为“丰镐房”。据蒋介石后来回忆，他母亲“受到过很多委屈，饮泣吞声，无可申诉。”[1]甚至于田产被夺，还被诬告于公庭，倍受迫辱，而“乡里既元正论，戚族亦多旁观”。至蒋氏母子含愤茹痛，苦不堪言。王氏在此困境中挣扎，本人又刚强聪明，颇知文字，便于逆境中油然生出一种自强不息，力图振兴家声的坚强意志，自然也就把这种意志寄托在长子蒋介石身上。其弟又不久夭折，蒋更成为王氏的唯一希望。因此，对蒋竭尽全力进行教导，促其努力学习，刻苦自强，以做番事业。

---

[1] 蒋介石：《玉表公行状》。

[1] 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六全大会晚餐会演讲》（1945 年 5 月）。

蒋每次出门、回家，其母均要查看蒋所带的东西。外出时，必问到何处去。放学归来必查看蒋的课业，看学的如何。课余则教蒋体力劳动，如打扫院落、护理蚕事以及烧饭、劈柴、叠被等，均要担当。同时又教蒋社会应对礼节等。自己则迟睡早起，倾全力于家中。如蒋顽皮不听话或闯祸时，也要动手打他，甚至打得很频繁，蒋称之为“夏楚频施，不稍姑息”。[②]

少年时代

蒋介石 6 岁上学，学名蒋志清。秀才周能有，为蒋之第一位启蒙教师（另据毛思诚云：初从嵊县任介眉读书）。读书之前后，蒋甚是顽皮和好动，他自己后来也常提及幼年的淘气，他 3 岁时，竟好奇地用筷子插进自己的食管，以至于疼得晕过去。5 岁时，从结冰的缸中捞冰，倒栽缸中，等被人发现后，已奄奄待毙。上学以后顽梗益甚。蒋自己谓“及六岁就学，顽劣益甚”，[①]并经常挨母亲的捶打。7 岁时有一次随祖父到法华寺拜佛，从陡坡上向下急奔，被摔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更常在溪中玩水，雨后水涨，蒋也照样跳入水中，有好几次几乎被淹死。与同伴游戏时，也常做恶作剧吓人，有一次夜里，竟装扮成鬼把同伴吓倒在地。更多地是自充群儿之首，带兵打仗，并带头拚战，因之镇中儿童多畏惧他，常被人称为“瑞元无赖”。[②]他也一直盛气凌人。他母亲，正像蒋自己所说，对他严加管教，常常打他，有时甚至大加鞭挞，亦不见效，其母常为之悲泣，有一次被母亲关在房里痛打，他无奈之下，就钻进床底下不出来。恰有邻人来访，蒋即乘其母开门之机，从床下爬出，急奔而逃，蒋母追之不及，气得嚎陶大哭。稍长，每年元宵节，蒋也都带头领队“盘龙”，非常积极。有一次带队到岳丈岩头村“盘龙”。要岳丈村子摆酒席相待，但村人表示冷淡，岳丈家则认为他顽梗不规，甚不成器，很不高兴。

他有时也打抱不平，8 岁时，为正义感驱使，将一个欺负幼小儿童的蛮横同学打倒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老师闻讯斥责他，他也不声响，不申辩。后到 15 岁娶妻时，他拜堂后就将红缨帽扔到地上，奔向屋外与村童抢放爆竹，仍甚是无状，宾客亲朋，均相向而笑。总之，他是不服管教的。有人说：“他对生母的责打，视若寻常，依旧我行我素”，并且常对小伙伴们说，要做“没有人管的大官”。

但蒋也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动静相差极为悬殊。当他下课休息时，在教室里奔跑不停，并不断和同学开玩笑，如果心血来潮，就大搞恶作剧捉弄同学；而一旦开始用功，却又专心致志，不管环境多乱，多么吵闹，他照样埋头读书或奋笔疾书，丝毫不受影响。就是说眨眼之间，动静判若两人。另一个特点，就是能独立思考，例如曾有这样一个故事，私塾里面挂有一个匾额“冰清玉洁”，蒋对这四个字有自己的“创见”，他解为即使在乱哄哄的环境中，只要一心想求学问，就一定能够做到。此解虽不甚准确，但足见其好动脑子，有独立的意志。

这一年（1894 年），蒋仍在该镇读书，老师改为蒋谨藩，习读《大学》、

[②] 蒋介石：《先妣王太夫人事略》。

[①] 蒋介石：《先妣王太夫人事略》。

[②] 张明镐：《蒋介石在溪口》，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三辑，第 121 页。

《中庸》。1895 年 9 岁，[1]又改从任介眉读四子书，主要读《论语》、《孟子》。

1897 年再从学蒋谨藩，读《春秋左传》。就在这一年，蒋谨藩对学生介绍了美国大总统的事迹。蒋听到后，认为总统也是平民，其行动也和平民一样，甚为赞赏。这是蒋在 11 岁时萌动的最简单的民主主义思想。

1899 年，蒋 13 岁时，第一次离开家乡，到外婆家葛竹村的溯源堂，从姚宗元读《尚书》。姚氏为地方名人，学有根底，这个地方，是一个环境清幽之所，山上竹子颇多。蒋于此上学时，姚先生曾命蒋以竹为题，作一对联，蒋遂作了一首咏竹的小对，上联为："一望山多竹"，下联为"能生夏日寒"。姚对蒋深为称许，常对其诸娘舅说些夸奖的话，认为如教养得法，前程不可限量。同年，革命党人竺绍康骑马到学馆访问，蒋深赞竺氏气度，并爱其马，便牵马野外，百般戏弄，马怒吼，突咬蒋背，蒋倒地流血，极为狼狈。暑假回家，见母面未开言而大哭。从此，每外出求学，总哭泣辗转，不忍离去，其母送至一二十里外，蒋仍哽咽难舍。

第二年，又于榆林村表叔陈伯泉家中从毛凤美读《易经》。这年，蒋 14 岁，是毛或蒋自己根据《易经》的爻辞和象传，改名中正，字介石。[2]《易经》的豫卦六二爻刮为"介于石，不终日，贞吉。"彖传谓："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彖卦象传曰："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巽卦象传日："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此意是刚强适度，即谓中正。故以介石为字，以中正为名。其中意思，说法不一，大意是君子坚如石，能洞察几微，而先知事物之动向不待终日，又刚而有度。故象传解石为中正之象征。《白虎通，谏诤篇》，则解为坚刚者易折，易败，故不敢使刚坚之态持之终日，以免败折，故云"贞吉"。[1]蒋以后谈哲学，往往好以"知几"为口头禅，与此当有重要关系。

1901 年，蒋 15 岁，于崎山下村皇甫氏家馆中从竺景崧受业，主学《左传》，并开始作"策论"。也就在这一年与岩头村毛鼎和之女毛福梅结婚。岩头村离溪口 30 华里。毛家于本村开"祥丰杂货铺"，为小康之家。毛鼎和有二子一女，长子毛武宝，于宁波县城灵桥门开肉店；次子毛懋卿，后任蒋之机要秘书。毛福梅比蒋大四岁，1883 年生，与蒋结婚后，同居时间不多，因为蒋于第二年就到岩溪村从毛思诚受业温习《左传》，圈点《纲鉴》。就在这时，蒋表现得很狂气，毛思诚说他"狂态不可一世"。[2]每当打闹时，就"以讲舍为舞台，以同学为玩物"，[3]其盛气凌人之态，可想而知。同年夏，到奉化县城应童子试，看到清吏规定的苛虐场规和对考生的凶横之态，极为愤慨，便断然放弃应考，以示抗议。

到 1903 年，转入奉化县城的凤麓学堂，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学科设有英文、算学等新课目。但学校仍以经、史为主。当时竺麐祥主讲《礼记》，周凤祺主讲《周礼》，均为当地著名老师。该校虽设新课，而主要体制和讲课内容还是封建性的旧东西，老一套，与私塾无大差别，因而追求改革的同学

---

[1] 此处按虚岁计。1895 年减去 1887 为 8 岁加上生年为 9 岁。

[2] 《蒋介石思想研究集》（高明《蒋总统哲学思想与中华民族的道德》），台北版第 111～113 页。

[1]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中华书局，1984 年第一版，第 208 页。

[2]

[3]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以下简称《民国十五年》），上辑，第 16 页。

们很不满意，要求讲授更多的新知识。于是同学们便提出三项“改革教育方针”的要求。蒋则首先向校方提出改革意见。学校当局便给蒋加上“首谋捣乱”的罪名，决定开除其学籍，并要送官究办。同学们见此光景，大为义愤，便群起反对，向校方提出抗议。校方见势不妙，遂撤回开除蒋学籍的决定。从此，同学们给蒋送个绰号“红脸将军”。[1]这是蒋介石第一次于清末学堂领头闹学潮。

翌年（1904 年），蒋 17 岁，再转入宁波箭金学堂读书。从此开始，蒋对性理学、周、秦诸子学说发生了兴趣。这一年蒋妻毛福梅到宁波随蒋伴读半年。蒋于该校，深受顾清廉先生影响。他从顾处学得了两个方面的重要知识，影响及于终生。这就是性理学、周，秦诸子书和富国强兵思想。关于性理之学方面，主要是宋理学；此外还有《孙子兵法》、《曾文正公集》。这为蒋打下了国学的基础，对蒋一生之影响极大。他说：“吾国载籍之富，学术渊源之广远，略涉其涯矣，以及通晓读书法，窥见汉文门径，皆顾先生一手陶成之。”[2]同时顾又向青年宣讲孙中山革命事迹和鼓励同学们出国学军事。他说：“青年欲大成求新，当出国留学异邦。”[3]蒋受此教导，最后决定出国学军事，从而使蒋走上了革命的途程，这对蒋是决定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蒋听到顾先生讲述孙中山伦敦蒙难被救后，高兴得手舞足蹈，并“赞英国法律平等”，蒋在当时确实形成了“留学、研究军事、献身民族革命”的思想”。这种思想，主要是来自顾清廉。

1905 年初，蒋未满 18 岁，再转奉化龙津中学读书。毛福梅回溪口居住。这一年，村中甲首强迫蒋家交额外差粮，并传蒋到案，勒迫认交。蒋极为愤慨，非常憎恨土豪之横暴。蒋曾自述其革命之动机，实始于此时。这时期，蒋出国留学意愿，更日益强烈，在该校学习中，一直抱着学军事的决心。

当时，蒋的英文老师是董显光，他对蒋有不少回忆，并写有蒋传。按董的回忆，蒋在龙津中学时，每天起得很早，盥洗后就站在宿舍的阳台上约半个小时，紧闭双唇，交叉双臂。看得出是一种坚定与沉思的神态。据蒋的日记透露，他在校所思考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留学日本和学习军事。同时，蒋也最关心时事，他在阅览室里，总是最先抢到上海送来的报纸，如饥似渴地阅读。董说：“另外还有一件使我至今难忘的深刻印象，是他每天抢着上海送来的报纸的那种热切期待的表情。”[1]蒋此时非常用功，各科学习成绩均令老师们满意。他不愿参加同学们元聊的谈天，喜欢一个人沉思或读书，落落寡合，常被视为骄傲。也曾参加校际体育竞赛，取赛跑第三名。

这年 3 月，蒋剃去发辫。把辫子送到家乡后，引起乡人的纷纷指责，说他成了“革命党”，要杀头的。蒋则不顾这一切，决心东渡赴日，学习军事。母亲仍然支持他，并为他东渡日本准备费用。4 月，蒋登轮东渡。当时他东渡留学的指导思想，是富国强兵，振兴中华，搞民族革命。如他自己所说：

---

[1] 《蒋总统秘录》（以下简称《秘录》），1976 年台北版，二，第 33 页。

[2]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1936 年上海版，上辑，第 17 页。

[3]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香港版，上辑，第 17 页。

[1] 董显光：《董显光自传》，1984 年台北再版，第 33—34 页。此书为英文稿由曾 虚白译成中文。董显光，浙江省宁波人。1887 年 11 月 9 日生，与蒋介石同年。1905 年任蒋之英 文教师。先后于美国密苏里州巴克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半工半读。1929 年和蒋 氏搭上师生关系。后一直担任蒋的新闻、宣传工作。到台后，先后出使日美。1971 年 病逝美国。

“我在本县龙津中学肄业的当时，因为痛愤乡里土豪的横行，目击我们国家遭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尤其在那时看到日本以一个弱小的国家，能够发奋图强，战败帝俄，予我精神上以最大的刺激。所以我在龙津中学肄业不到半年，请求家母准许我到日本去学军事，来尽到我国民一分子的义务，促成我们国家的雪耻自强。”[②]

蒋到日本后，要求进入日本军校学军事。但当时日本规定，中国学生要入日本军校受训，必有清廷陆军部保送方可。而蒋根本不懂这一切，便贸然赴日，自然达不到目的。在无可奈何之下便进入了东京清华学校，学习日文，到冬季即返回家乡。在此几个月停留中，蒋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收获，那就是他认识了陈其美。[①]陈于同年到日本，先后学习警察和军事，很快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后由陈引荐，蒋开始认识了孙中山并成为孙中山所重视的一个青年革命党人。蒋由此而成长为黄埔军校校长，并登上国家元首地位。因此，蒋这次赴日虽学军不成，却因为结识陈其美而发生了人生道路的根本转折。

蒋回国后不久，时间进入了 1906 年。在这一年夏季，清朝陆军部设立于保定的通国陆军速成学堂，[②]向浙省招考学生 14 名，蒋也参加投考，因年龄不足 20 岁，待蒋抱病考试后，口试官却不录取他。蒋只得说明自己虚岁已足 20，体力也很好，能够报效国家，成为军人，终于说服考官，终得录取为炮兵科，仍用学名蒋志清。[③]蒋从奉化到保定，约 2000 华里，走了一个月时间。在这次长途跋涉中，他看到大半个中国的城市、乡村的贫困生活，这进一步激发了他富国强兵，振兴中华的意志。他选炮科，也可能是因为认为大炮打仗更有威力，受“船坚炮利”口号的影响。蒋进军校后，据说是唯一没有辫子的学生，被人纷纷议论，甚至有人怀疑他是“革命党”，因此倍受欺侮，遍遭白眼。但他却能于此逆境中，百般忍耐，虽肚子气得鼓鼓的，也装作毫不介意的样子。

他知道万一不忍，则会断送赴日留学的前程，对“小不忍则乱大谋”的格言，他当时是铭记不忘，信守不二。此后在对外关系中也大都如此。

蒋在学堂学习期间，一方面忍辱，同时也在日益滋长民族感情，遇到一定时机，就要爆发出来。有一次日本军医教官上卫生课，把一块泥土放到桌子上比喻中国，说这块泥土有 4 亿个微生物，就像中国的 4 亿人口一样。蒋一听这话，就马上离开座位，急步走上讲台，把那块泥土分成八块，送到日本教官面前大声说：“日本有五千万人，是否亦像五千万微生虫，寄生在这八分之一立方英寸泥土中？”该日本教官根本就想不到会有这事发生在课堂上，一时惊得目瞪口呆，不知所对。然后方大声叫嚷，说蒋是革命党。蒋则忿然回答说：“只问你比喻对不对，不要问这题外事”。[①]日本教官无言以对，就立即找到总办赵理泰[②]，要求严办蒋志清。赵理泰因知道错在教官，不在蒋介石，便只是申斥蒋一番了事，并未深究，反而对蒋表示同情。

[②] 蒋介石：《对从军学生训话》1944 年 1 月，见《先总统蒋公全集》（以下简称 《蒋公全集》）。

[①] 陈其美：浙江省吴兴县人，1877 年生，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为同盟会员，曾 任上海都督。1916 年被袁世凯暗杀。为陈果夫、陈立夫胞叔。

[②] 陆军速成学堂创立于 1903 年（光绪二十九年），由袁世凯奏准。见《军机处录副档》。

[③] 见《陆军部陆军学堂同学录》（手抄本，1936 年 3 月抄成）留学日本名单。

[①]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第一册，第 9 页。

[②] 赵理泰，字康候，安徽省合肥县人，任陆军部保定军官速成学堂总办。1912 年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

东渡留学

陆军部于 1906 年冬从学堂中选派留日学生，但规定只以日语班为限。蒋很想赴日，以了心愿，但却不合规定，便又越级向总办赵理泰呈上报告，说明自己已于日本学过日语，所以没有参加日文班，请求特准应考。然已到考试的前一天，仍未见到批复。至此，蒋已完全绝望，便躺在床上睡大觉，到了深夜，忽然有一个提着灯笼的人将他叫醒，说是赵总办派来的，告诉他总办已特准他参加考试。他惊喜万分，第二天，就和日文班同学一起，堂堂正正地进入考场，参加留学考试，并被录取了。同时被录取的还有张群[③]、杨杰、王柏龄、马晓军、陈星枢等。蒋来不及到故乡辞行，[①]于 1907 年初，就从保定赴日。赴日后先入振武学校。该校是 1903 年为清国留学生进入正式军校而设立的预备学校，三年毕业后，分赴日军联队见习一年，然后入日本士官学校等军校。这个学校是由清廷陆军部派良弼和日本政府参谋本部福岛安正中将、青木宣纯少将组成的“清国留日学生委员会”成立的，校址在东京都新泻区河田町二十一番地。当时福岛任清国陆军学生监理委员长，木村宣明任学生监，野村岩任舍监。振武学校之前，由日本私立中学成城学校担任中国留学生学陆军的预备任务。

蒋到日本后，与陈其美重逢，并由陈介绍，于同年加入同盟会，继入“丈夫团”。这个团由黄郛[②]所组织，“丈夫”二字，取意于《孟子》书中“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丈夫”。同时蒋和黄郛一同创办《武学》杂志，蒋并于其上发表军事文章。每周日即与浙江同盟会员如苏玄英、张恭、章梓等人谈驱逐鞑奴之事。

在振武学校学习时，校规很严，只有星期天才可以出校，他和张群等便租了一间只有星期天使用的房子过周日。他们很喜欢自己做饭吃。当时他们每月领 13 元伙食费，清政府发 10 元，学校发 3 元，每一顿早餐只花 4 分钱。那时日本人不知吃猪内脏，他们买下一头猪的全部内脏只花 8 角钱，生活很是宽裕。蒋在振武学校读书时，每年暑假告归探亲。据张群回忆，为了抗议《留学生规则》太严，他和张群两个人便写了“退学报告书”，跑到神田的中国料理店龙涛馆不出来，死守一个月左右，最后学校让步只给他们两人扣分处分，仍予恢复学业。蒋于此间，与张群最要好，张因受蒋影响，从步兵科转为炮兵科。张群每月约抽 3 块钱香烟，蒋则烟酒不沾，生活也很规律。他有时也游览和游泳于江之岛一带。

蒋这时最爱读的书是邹容的《革命军》，并经常带在身边阅读。

但他主要是从该书吸收了民族主义和反满思想，而未吸收民主主义思想。毛思诚说他早晚览诵，睡觉时还抱在怀中，不忍释手，在做梦时，好像和邹容说话，并“相将提戈，逐杀鞑奴”。又接着说“蒋醉心于民族主义如

[③] 张群，字岳军，四川省成都人，1889 年生，历任上海市长、四川省主席、行政院院长、总统府秘书长、西南军政长官。到台后，任“总统府资政”。是蒋介石的至交密友。

[①] 亦有云蒋自家乡赴日，并因筹川资而与母亲、妻子发生争吵，此系蒋 1906 年 入保定军校时的事，错加于他出国之行。此次系公费留学，根本不用他特到故乡再筹川资。

[②] 黄郛：字鹰白，浙江杭县百官镇人，1880 年生，同盟会员。历任沪军参谋长、北京政府外交总长、代国务总理、北平军分会外交职务等职。

此”。当时他给表兄单维则的照片上，曾写有一首诗，也体现出他的民族主义思想，诗曰：

“腾腾杀气满全球，
力不如人肯且休？
光我神州完我责，
东来志岂在封侯！”

在这首诗里，他一字未提民主和共和，只是“光复神州”。但此光复之志是单纯和进步的思想，是富国强兵的希求。他当时的确是一个热血的青年，毫无利禄的追求。

1910 年 6 月，孙中山自檀香山到达日本，停留两周，因为日本政府不许他住下，就转到新加坡。在日本期间的一大，孙中山由陈其美介绍，约见了蒋介石。孙中山对他的印象，没有详细记录，只有一个简单说明，认为“他一定会成为革命实行家”。[①]蒋自己则记得很清楚，他说：“我还牢牢记得，总理说：‘革命党的青年，应该不计名位，而要为革命任务牺牲、奋斗。美国建国英雄华盛顿，也并不是由他一个人的力量造成的，而是由千千万万无名的华盛顿共同奋斗，为他们的领袖华盛顿牺牲而造成的。我们革命者，不是要成为有名的华盛顿，而是要成为无名的华盛顿——无名英雄。’我听了这个训示以后，就立定了志愿，要实践这个训示，决不辜负总理对党员的期勉。”[①]这是 1963 年 11 月他在台湾的讲话，提到了华盛顿和无名华盛顿的问题。但他对华盛顿的理解，还仅仅是基于民族独立思想。至于民主主义思想，当时他还未有萌芽。

蒋于 1909 年 11 月 25 日毕业于振武学校后，12 月 5 日（24 岁），即到驻高田的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师团长长冈外史）野炮兵第十九联队（联队长飞松宽吾）入伍，当二等兵。以后升为“士官候补生”。振武学校第十一期 62 人全部分配于十二师团。分到十九联队者共 16 人，于 12 月 6 日，由须藤少尉带领人伍，接受体格检查，被编入三、四、五各中队。当时蒋身高 1.694 米，体重 59.2 公斤，充任二等兵。高田是一个村镇，隶新泻县，靠北海道很近，天气寒冷，每年冬天都是大雪纷飞，是日本国的豪雪地带，比中国北方的雪还要大。他们每天早晨五时以前起床，自己拿面盆到井旁取水洗脸。以后蒋又用雪擦身，或用冷水洗澡，从此之后，蒋的身体开始强健起来。因此，他曾肯定地说：“可以断言，好的身体，天生成的只有三分，其余七分全靠锻炼。”[②]以后蒋当政时，曾大力提倡冷水洗脸和吃冷饭。当时十九联队直接指导留学生的是上尉小山田三郎。

蒋在联队当兵时，据十三师团长长冈外史回忆，认为他并没有不平凡的表现。他说：“留学时代的蒋君，才能胆略，内蕴不露，说不出有出人头地的表现。”[③]在野炮兵队里，日课之一是照料军马，即擦洗和喂养军马。每日早晨洗脸之后就去擦军马，由官长带领先到马厩去把马的全身擦洗干净，然

[①] 《秘录》，二，第 62 页。

[①] 蒋介石：《我们复国的精神志节和建国的目标方略》1963 年 11 月，见《蒋公全集》，第三册，第二卷，2831 页。

[②] 蒋介石：《合作人员的革命责任》（1933 年 9 月 20 日），见《蒋公全集》，第一册，第二卷，第 793 页。

[③] 《秘录》，二，第 216 页。

后再牵马到厩外饮水和喂食。喂好马后，自己才能回营房吃饭。傍晚，再到马厩里擦一次马，然后吃晚饭。从这时起，蒋懂得了爱护马的道理。当时蒋对于扫院子等体力劳动，并不喜欢，总是鼓着眼睛，不高兴地干。

当时的伙食也很不好，据蒋后来回忆，日本军队当时每人每餐，只许吃一中碗米饭，每周还要吃几次麦饭。下饭菜为三片咸萝卜，有时是一块咸鱼。只有星期天，才能吃到一点豆腐、青菜和肉片。每一个人均如此定量，不分饭量大小。蒋起初吃不饱，饿得到军营俱乐部买饼干吃，但也只准买三片，又粗糙得很。以后慢慢习惯了，身体也适应了，他也就不觉得怎么饿了。星期天，他们常到三一洋食店买食油和面粉，自己做菜、做饭吃，和店主人渡边五郎很熟。他的长女还记得蒋介石不好说话，表情严肃，很有气质。

还说蒋曾画过一幅石兰，并提了落款，准备送给官长。这种军队定量生活，实在是很苦的。但蒋觉得定量有利于身体，并说日军身体很好，因此认为中国人爱生病是吃得太饱的缘故。后来还用此教育中国官兵，不要吃饱肚子，只要吃够就可以了。

日本军队当时不但吃得很不好，穿衣也很紧张。他们要求士兵，一套服装要穿三四年。外出的军服，一归队，联队长就催促换下来收存好，以免弄脏衣服。他们日本也很讲究“ 废物利用 ”，节制消费。甚至在小学教科书中，专门有一课叫“ 废物利用 ”。这是在 20 世纪初期，日本尚不敢提倡“ 高消费 ”，而主要是积累财富。蒋介石甚至认为这种“ 废物利用 ”之道，可以兴国。他说：“ 能够在‘ 废物利用 ’四个字上用功，我们就可以兴家立国 ”。[①]

在军事方面，蒋在高田体会最深的首先是“ 军队的基础是班长 ”这一原则。班长为职业军人，不退伍，军历较深。因为班长重要，所以日本人对班长一级的训练和业务，都不教外国学生，使留学生不明白他们的秘密所在。但对日军打骂士兵的横暴和野蛮，蒋则深感不然。他说：“ 我看到日本军队的下级干部用对奴隶牛马的方法来打骂士兵，当时就觉得这种军队能打仗吗？我们中国军队更应严禁官长打骂虐待士兵，遇事必须耐心教育劝导，使他们受到感化。 ”[①]但实际上他也深受日军影响，他本人就好动手打人，而国民党军队里官长打骂士兵更是常见之事。

其次是军队里要形成一个综合性结构，他看到日本军队里的活动，如剃头、看护、机修等，均由军队自己解决。即使军队中没有任何公务的士兵，也要业余学一种技艺，以便退伍后，自己找职业，不致失业。

再者对士兵的政治和历史、地理教育，他认为也极其重要。他认为士兵也必有一个中心信仰。日本士兵信仰天皇，也有历史、地理知识的教育，使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故作战勇敢。蒋说：“ 尤其是要他们对本国历史、地理的理解正确，使他们士兵人人能够增强其对国家的责任心。 ”[②]总之，一年的高田士兵生活对蒋影响极大，以后他经常引用他的这段生活体验，教育他的部下。

军营的卫生要求，对蒋也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军营寝室、讲堂要求室内四角和门背面都要整洁干净；甚至痰盂也有规定，除内外整洁外，盂内放水量不得超过容量的三分之一。查卫生长官带白手套，一进室门就往门横木和

[①] 蒋介石：《合作人员的革命责任》（1933 年 9 月），见《蒋公全集》，第一册，第 二卷，第 793 页。

[①] 蒋介石：《西安军事会议讲评》（1942 年 9 月），见《蒋公全集》第二册，第 1638 页。

[②] 蒋介石：《对从军学生的训话》（1944 年 1 月），见《蒋公全集》第二册，第二卷，第 1707 页。

角落里摸。蒋对此印象也很深，受影响也很大，他以后当政时，最讲究带白手套，并每到一处，四处都摸，看是否干净。

总括起来，蒋认为一国军队如果作到精强和富于战力，就要有三个要素：绝对服从命令；军队官兵要有中心信仰；军队为士兵最优良的职业学校。

参加革命

蒋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几度返国探亲。1910 年旧历三月十八日（4 月 27 日），毛氏为蒋生下一子，即蒋经国。1911 年武昌辛亥革命以后，蒋即和张群、陈星枢[①]等闻讯回国，于 10 月 30 日离日赴沪。当时正是他 25 岁生日前夕，在日本举行了一个告别酒会。告别时，他很激动，表示要干出一番事业来。当师团长为蒋等人送别时，蒋接到师团长长冈的一杯水时，一饮而尽，并说："阁下，我一定拼命地去干啊！"[②]到上海后，他未及休息，即和黄郛、陈泉卿等人，被派往杭州指挥光复之役。他当然也未回家省亲，只写一封诀别家书，决心殉身革命，劝母勿以儿为念，以及死后家事处置。其母又派人至杭州安慰他，并告之"死生一视于义，毋以家事为念"。此时他已改用蒋中正之名。蒋到杭州后，就和顾乃斌等人组织"先锋敢死团"，起草起义计划。

计划草定后，蒋即回沪向陈其美报告。并于 11 月 3 日，率领一个由百余名战士组成的"敢死团"回杭，于奉化试馆和仁和火腿店待命。当日夜，上海陈其美发动起义，宣告独立，推陈其美为都督。此役中，上海商人和市民也有人积极参加。4 日，蒋于杭州起义，临时司令部设于清泰车站。蒋率城南支队为八十二标前锋，由望江门进入城内，迅速攻克抚署。敢死团之女战士尹锐志、尹维俊身先士卒，攻入抚署。巡抚增锡跳后墙逃跑，当场被捉。自市北笕桥出发的北支队配合八十一标攻克军械局。天明时，攻击满军旗营，一直打到深夜，旗营方受招投降，义军立即推汤寿潜为都督，成立杭州军政府。7 日宣布杭州光复。上海、杭州光复，南京孤立，对全国迅速光复有重要促进作用，使清军顾此失彼，无法招架。蒋旋回上海，任陈其美沪军第五团团长。

1912 年 1 月 1 日，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改用阳历纪年。此后，蒋又到吴淞训练军队。其间，蒋常随陈其美到北里[①]，遂于法租界认识房侍姚怡诚[②]，后两人相好，蒋遂纳之为妾（1912 年冬，姚怡诚回奉化故里，与毛氏同住）。1 月 14 日，蒋又奉陈其美之命于广慈医院，主持刺杀了光复军司令陶成章。[③]旋因舆论大哗和孙中山发电追查凶犯而逃往日本避风。第五团长由张群继任。杀死陶成章的理由是陶反对陈其美，并要谋杀陈。当时上海都督悬赏 1000 元捉拿凶手，这当然捉拿不到，此事孙中山一直不知是蒋所为。

[①] 陈星枢：字联舟，河南省长葛县人，1885 年生，与蒋介石同期东渡日本留学 学军事。

[②] 藤田石太：《蒋介石评传》，第 44 页。

[①] 此处为玩乐之处。

[②] 姚怡诚：江苏吴县人，1881 年生。后陪毛夫人居住溪口，蒋纬国为其扶养。解放前夕，随蒋纬国逃台，母子同住一处。

[③] 陈布雷：《蒋介石先生年表》，传纪文学出版社，1978 年台北版，第 6 页。

蒋到日本后，创办《军声》杂志。其所撰发刊词纯为民族独立革命思想，或富国强兵思想，其言曰：“各国之殖民政策，以兵力为后盾，20 世纪以后，太平洋沿岸将成为各国驰骋逐角之场，祸在眉睫，我人必讲保国之道。”

“夫太平洋沿岸其为万国竞争之焦点者，独我中华土地耳。西人有言日：‘两平等之国，论公理，不论权力；两不平等之国，论权力，不论公理。’是则伸斯麦所倡之铁血主义，正我国人所当奉为良师者也。”

“我国此次之革命，名为对内，实为对外，对外问题最重要者，为军事。”[④]从这个发刊词中可以看出蒋当时只是富国强兵的民族独立思想，并无什么民主思想。

军声社设于日本东京代代木山谷一四三番地。国内上海棋盘街、北京琉璃厂、汉口花楼底等处设有发行机构，《民主报》并为其发了广告。他于该刊发表多篇文章：《征蒙作战刍议》文章中，主要对平定“外蒙独立”进行筹划，并有挥师蒙古的壮图。其中认为外交应为作战策略之根据，是其重要军事原则。此外又写有《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一文，主张征蒙抚藏。因为西藏内部不团结，易于征讨，蒙古则必须以强力征讨方可。同时声讨袁政府对外妥协，“何吾政策，……一忍再忍，甘为退守，丧权辱国莫此为甚！噫！岳家军全胜之威方震，十二道金牌之诏先下，思念及此，……又不觉为吾国前途痛哭也！”

《军政统一问题》一文中，他认为应当军民分治，反对各省督军兼管民政。因为督军兼管民政就等于成了中央的总统，也等于唐朝的藩镇，是亡国之政。故一国之军事，必须统一于中央，不许各省长官自统军政。否则“势必致各省独立，互相残杀”。统一之法，是“将全国军队，破除省界，分为数大管区”。大管区之下，又设军、师管区，直隶于中央政府。此为美国军制。《革命成功后军政之经营》一文，则广泛议论军事、政治和对日本政府的政策问题。

主张孤立日本，遏制其扩张势力。关于军事，有边防和内地的配备兵力筹划，以及军费预算占总国民经济的比例（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军队组成，应以陆军为主，海军为从；国家兵力数目，应以经济实力为据，如以国际水平规定官兵待遇，或以国际待遇减半发给，中国当时（1912 年至 1913 年）只能养 60 万军队，因此，必须裁军。《巴尔干战局影响于中国与列强之外交》主张竭力联合美国，并与英、德、意、奥各国相交往，而孤立俄国和日本。

综观以上军事论说，可见蒋介石的军事和治军思想体系已基本形成。战术、战略思想主要来自德国；军事组织和军队统帅，则主要吸收美国军制。此后，其军事思想更进一步完善。

1912 年年底蒋回到故乡。次年 6 月，蒋决心赴德留学，特往上海晋偈孙中山先生。时值孙中山倡导二次革命，正需人手，孙不同意蒋出国留学。经孙先生劝导，蒋打消赴德意图，遂于上海参加二次革命。

7 月 12 日，李烈钧反袁于江西湖口；15 日黄兴举兵于南京；次日，陈其美起义于上海，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18 日发表独立宣言。蒋建议陈首先进攻上海制造局，不同意张群首先夺取海军的建议，陈其美采纳蒋策，发兵进攻制造局。但制造局为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所严防，又收买海军总司令李鼎新，

[④] 《军声》杂志，1912 年 11 月 1 日《发刊词》。

任护卫任务，结果陈军自 22 日到 23 日的总攻击，因为海军支援郑汝成而失败。

28 日，蒋又秘密到龙华运动九十三团（原第五团）参加战斗，再与钮永建部南北合攻制造局，战斗极为激烈。直到次日，终因弹尽而撤退。同时郑汝成又胁迫闸北商民，如不迫陈其美撤走，即对商民开炮。商民与红十字会、租界外国人等，一齐向陈其美施加压力，逼陈再退吴淞、主山。湖州会馆的讨袁军，也被英军解除武装。到 8 月 13 日，讨袁军完全失败。

蒋又被迫第四次东渡日本，9 月 1 日到达长崎。对此，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松井庆四郎于 9 月 23 日将《有关亡命来日之中国人调查报告》交警视总监安乐兼道。报告中有孙文，黄兴、陈其美、蒋介石（并称蒋介石为陆军少将）。

到 9 月 12 日，四川熊克武反袁最后失败。10 月 15 日，北京总检察厅明令通缉孙中山、黄兴、陈其美、张继、李烈钧、柏文蔚等。11 月 4 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并撤销国会议员 430 余人。国会解体。袁于 1914 年 1 月 10 日解散国会。3 月 18 日，开“约法会议”，历经 40 天制成“新约法”。5 月 1 日，废除“旧约法”实行“新约法”。规定大总统有权招集解散立法院，并决定法律、预算等事项。大总统还可以终身任职。如此说来，袁就如同皇帝一样。

参加中华革命党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深感党人不听指挥和命令，行动不一致，导致革命失败。为此下决心组织中华革命党，为早日促成革命成功，他暂时不得不实行党魁独裁制，要党员绝对服从他。当然这只是权宜之计，并不是党的根本原则，并且入党宣誓中也明白写着实行“民权、民生”两目的，又说“创设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①]等，仍是以建立民主共和国为宗旨。因此，孙中山此举并不是封建性或会党式的消极性质。蒋介石认为是“以严密的纪律，组织中华革命党，坚决地贯彻国民革命的宗旨”。[②]所以他坚决地加入中华革命党。蒋是于同年自日本回国后在上海加入的。他的“入党誓约”为一〇二号。主盟人为张人杰（静江）。入党时间为 1913 年 10 月 29 日。签名为蒋志清。

蒋于上海入党后，不久又东渡日本。12 月，于东京和孙中山单独见面。这年蒋 27 岁。蒋对此引以为最大光荣，以后常常提到。

但当时他并没有熟读孙中山的著作，而是热衷于王阳明、曾国藩。

“尤喜读王阳明、曾文正、胡文忠三集，手未暂释。……军事学即以巴乐克战术为基础，而政治学则以王阳明与曾文正二集为根底也。”[③]曾国藩的自立自强思想对蒋影响极大。曾的中心思想是“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④]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蒋认为只有陈英士、朱执信诸人是真正的革命者，

[①] 见《中华革命党入党誓约》原稿。

[②]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1943 年 3 月），正中书局 1943 年 6 月版，第 43 页

[③]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第一册，第五编，第 11 页。

[④] 《筹办夷务始末》第二十五卷，第 1～2 页。

对于不服从孙中山的干部，蒋很看不惯，并决心报复，给点颜色看。

蒋参加中华革命党后，孙中山交给蒋的第一件任务，是于 1914 年初夏，到上海再发动一次起义。蒋本人兼第一路司令。这时海军中将郑汝成为松沪镇守使，继续防卫上海。蒋到上海后，总结二次革命失败教训，决定分三路进攻：一路由蒋本人统率，为 主力部队，担任攻击市区谭子湾、小沙渡、曹家渡、梵王渡一带的任务；第二路以陈荣廷统率，主攻上海警署；第三路司令为何元龙，主要破坏铁路、电信、并突袭长江南岸宝山、北岸海门，封锁海军活动，使其不能像上一次那样配合陆军作战。但因保密不周，事前泄露军机，5 月 13 日夜晚，捕去陈乔荫、王锦等人。小沙渡司令部也被查抄，行军草图、军队名单等全被搜去。陈乔荫、王锦殉难于西炮台。这次起义，未及发动即行夭折。6 月 15 日，袁世凯即以大总统名义下令通缉蒋和廖轰、陈荣廷、何元龙等人。蒋成为第一个通缉对象。通缉令指出：“ 此次谋乱，系蒋介石代表孙文主持一切，伪示地图及款项均由蒋介石受孙文伪令给付……。 ”[1]蒋在一个晚上逃到张人杰处，张不在家，便转往别处小坐一会后，再回张宅。但到张宅附近时，因见情形不对，立即走脱。据说此由叛徒王金发[2]告密所致。正在此时，陈其美（英士）从东京发来电报，要蒋立即东渡，再定大计。

蒋到日本后，于东京筑地参加了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7 月 8 日）。会上有 300 多人参加，孙中山就总理职。孙于会议中提出第三次革命问题，并要大家“ 等待时机，不可轻举妄动 ”。不久，蒋又奉孙中山之命，继陈其美赴东北培植革命根基，与戴季陶等到东北筹备革命之发动，或探索东北发动的可能性。同行者还有日本山田纯三郎（1900 年殉难惠州之役的山田良政之弟），于东北逗留约三四个月，因袁军防范极严，终不得志，加之蒋又生病，便“ 饮泪回东 ”。[3]

这次东北之行，蒋的行动受到日本关东军的照顾，并在日本人掩护下于满洲里、哈尔滨、长春等地住了三个月。在此期间，欧洲大战于 7 月 28 日爆发。蒋于 29 日即自东北上书孙中山，主张乘欧洲大战和日本与袁世凯矛盾尖锐之时，“ 乘势急进 ”。并建议今后宜将革命根据地转移于浙江，进而克复南京、上海、蒋离开东北前，曾在长春铁路饭店日本军人招待会上，向日本军人转达了孙中山的话：“ 日本人如果不将东北和台湾交还我们，并保证朝鲜独立，我们国民革命运动是不能停止的。 ”[1]这实际上是向日本表明，孙中山一定要进行国民革命运动。日本军人联队长听此后，大为不满，蒋介石说他“ 面红耳赤而去 ”，第二天日方就叫蒋离开东北。蒋返回日本后，即向孙中山如实报告，承认失败而归。

欧战爆发后，日本决定断然对德宣战，说是要铲除德国在亚洲的根据地，提高自己国际地位，实际上是想独占中国。因此英国不同意日本参战。后经日本保证只限于南中国海、北太平洋、胶州湾地区后，英国才于 8 月 14 日同意日本参战。袁政府怕卷入战争中去。8 月 6 日即向世界宣告中立，反对在

---

[1] 《政府公报》，第 743 号，6 月 15 日“ 大总统令 ”。

[2]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第一册，第五编，第 5 页。

[3] 蒋介石：《陈英士先生癸丑后之革命计划及事略》（1916 年 5 月 26 日）（一）。

[1] 蒋介石：《整军与建军》（1945 年 11 月），见《蒋公全集》第二册，第 1784 页。 此文中蒋称他到东北是在民国二年。实际应在民国三年。

中国领土上和租借地上作战。但日本对此决不会同意，袁政府也深知如此，便又于 8 月 7 日，由外交次长曹汝霖向日本驻华临时代办小幡西吉（公使山座园次郎于 5 月 28 日在北京死去）表示可以允许日本登陆山东，侵占青岛，但有一个交换条件，就是日本方面要将亡命日本的革命者驱逐出境。

19 日，日本政府新任驻华公使日置益便草拟 4 项交换条件和 6 项要求，于 8 月 25 日呈日本加藤高明外相。8 月 23 日，日本时德宣战。9 月 2 日，日军十八师团在山东登陆。

10 月 6 日侵占济南。11 月 11 日，以日置益六项要求为基础而扩大的“二十一条”，于日本内阁临时会议通过。

同年（1914 年）9 月 3 日，蒋自日返抵上海。8 日，日本政府则通知日本驻沪领事有吉明监视蒋。9 月 20 日，郑汝成将中华革命党党员范鸿仙刺死。11 月 23 日，杭州革命党人夏之麟之领导机关被破坏，又有 30 人被捕杀。此后不久，蒋复东渡日本。

1915 年 2 月，陈其美再回上海发动起义，仍未能如愿。8 月 1 日，陈亦返回日本。10 月中旬，陈奉孙中山命再回上海发动起义。同时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和檄文。不久蒋介石也奉陈命再到上海参加筹划起义具体事项。总机关设于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五号。蒋与丁景梁、薄子明共同在陈其美指挥下工作。

蒋首先和陈等决定诛锄郑汝成。正巧 11 月 10 日，日本大正天皇举行加冕典礼，上海镇守郑汝成当然要前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致贺，于是在这一天，在郑所可能经过之地沿途埋伏敢死士 10 多人，特别于必经之地外白渡桥，令王明山、王晓峰埋伏桥侧百余公尺处，每人配备一支手枪、两枚炸弹。上午 11 时，郑的汽车来到，郑车刚到桥头正巧出了毛病，车速减慢，眼线看清后大叫，就是这一部车。此时郑身着大礼服，坐在车内。王明山首先闯上前去连投两颗炸弹，将汽车炸坏，王晓峰则跳上车，对准郑的脑袋连发 10 枪，将郑头打得稀烂。两王也因未及时逃走而被捕。

郑死后，袁又派杨善德继任上海镇守使。杨比较暗弱，对革命党大有好处。蒋即奉命于 12 月初草拟作战计划，谓之《淞沪起义军事计划书》。计划要点为：一、首先夺取海军为据点，同时，夺取陆地炮台；二、最后夺取上海制造局。这个计划，是蒋接受二次革命时，因忽视海军而失败之教训制成的。此策划为陈其美采纳，决定 12 月 5 日下午 4 时举行起义。陈任总司令，杨虎任海军陆战队司令。蒋和陈亲自于陆上督战。但肇和舰发炮未几，即因制造局未及时还击，误以为制造局已经攻克，而停止发炮；而制造局起义人员，则因此误以为攻占肇和舰行动失败，未举事响应。攻占制造局战斗失败。进攻警察局、工程局的战斗，也很快相继失败。蒋参加了对警察局的进攻。据山田纯三郎回忆说，蒋于作战中沉着勇敢。[①]

起义失败后，蒋随陈仍回渔阳里五号。然后二人跳窗逃跑，同逃者还有邵元冲。12 月 6 日晨，瑞应、通济两舰官长因受袁贿赂，转向肇和舰开炮。杨虎不能抵挡，也败下阵来。陈可钧等人因负伤被俘殉难。这次失败，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认为，陈和蒋太鲁莽，所以失败了。

12 月 11 日，北京国民代表大会一致投票（1993 票）通过实行帝制。

12 日，袁即发表演说，接受推戴，决定称帝。19 日，建立“大典筹备处”，

[①] 《秘录》，四，第 200 页。

准备登基事务。决定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国旗为五色旗上加印红日一轮，表示五族拥帝之意。12 月 25 日，云南护国军发动起义。31 日，袁下令改中华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云南护国起义发生后，各省先后响应；四川陈宦、湖南汤芗铭等亲信人物也因迫于大势而先后宣布反袁独立。

1916 年 3 月 20 日，冯国璋，李纯、朱瑞、靳云鹏等人联名发电，劝袁取消帝制。一时间，众叛亲离，土崩瓦解。无奈之下，袁于 22 日下令取消帝制。4 月 14 日，蒋与杨虎领导进攻江阴要塞，并发表独立宣言。但蒋攻占要塞 5 天后，又因内部分裂而失败。这次失败，只剩下蒋和两个士兵，仅三人撤退下来。其余官兵都纷纷逃跑了。[②]蒋执政后经常讲他这一段光荣历史，宣讲当军人的就不能怕死。他的亲身经历对其以后带兵，无疑是有影响的。

孙中山于同年 5 月初自日归国。9 日再发表讨袁宣言，决心推翻袁世凯。袁世凯也对陈其美暗下毒手，买通叛徒张宗昌，主谋刺杀陈其美。张宗昌又以 13 万元赏金物色凶手，并买通革命叛徒李海秋，欺骗陈其美，说是：“鸿丰煤矿公司”要向日商中日实业公司代款，请陈介绍签订合同，合同成立后，可以出十分之四的款辅助革命。其实根本无此公司，是由许国霖、程子安假造出来的。陈因经费困难，无及细想，便同意了。5 月 18 日下午 2 时许，陈抱病从渔阳里寓所乘人力车到萨坡塞路 14 号总机关办公。这个总部是日人山田纯三郎祖赁的。一楼为客厅、食堂，二楼山田所住，三楼为总部。陈刚一上车，车夫就问是到萨坡赛路吗？陈其美顺口答是，但心中甚疑。到总部后又对吴忠信说及此事，吴亦认为奇怪，但全无疑及李海秋之事。不久，许国霖等三个中国人和两个日本人一同来到总部客厅。大家刚一入座，李海秋即告说忘带合同，起身出门去取。就在此时，闯入两个汉子，一个是张宗昌的营长对准陈其美连续射击，陈中弹倒地而亡。丁景梁等人亦负伤。混乱中凶手逃走。

陈死后，山田却将陈尸抛到门外，不愿受连累。蒋介石闻讯赶来，雇车载陈尸回法租界蒲石路新民里十三号自己寓所。陈身无分文，只留二十元于身后。

5 月 20 日，蒋为陈撰祭文于上海，自称为陈之义弟。祭文哀叹曰：“呜呼！自今以往，世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笃如公者矣。”

并立志“死者之业未成而生者成之”。继则倾诉世事和革命之艰辛：“世路崎岖，人心险阻，瞻前顾后，徒增寒心。”整个调子十分悲凉悽怆，低徊不已。至 1917 年 5 月，蒋奉陈灵柩归葬于浙江吴兴县太湖之滨。孙中山为题墓碑“陈英士先生之墓”。事后，许国霖判无期徒刑；李海秋因证据不足开释，却因另一暗杀事件被（北洋军阀）指控，处死。

同年（1916 年）6 月 6 日，袁世凯死。当月，蒋奉命前往山东，参加中华革命党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任居正总司令部之参谋长。孙中山原先所以选中此处组建东北军，是因为山东地近京城，欲从根本上倾覆袁世凯，直捣京师。此时东北军已占领山东东部地区。蒋奉命于 7 月 31 日上任，职中很是负责，并记有军中日记，记载他于职中每天忙于修改操法，整顿队伍，并到师、团视察和定备设施。如增设军医科，各师、团设军医等即是他的建议。他又认为“代理总司令命各队出操时，须先施五分钟柔软体操，以练筋

[②] 蒋介石：《革命军官必具的要素》（1933 年 8 月）见《蒋公全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 年版，第 755 页。

骨”[1]。

蒋因此锋芒显露，得罪了同僚，并为同僚所不容。而蒋又常盛气凌人，目中元人，则双方矛盾日益激化，因之于 8 月 12 日，又奉命北上迎居正，离开部队。此次共上任 13 天之久（这期间许崇智代居正为总司令）。旋自京归沪，一方面主持东南党务、军事，一方面于上海经营证券交易。他离开军队的原因，主要是他和同僚合不来，人家都对他有意见，并纷纷向孙中山告他的状。

平心而论，蒋这时扔是一个热血青年，实想做些工作，振兴军力，不管怎样，这种积极有为的治军态度，是应当肯定的。然而方法大简单，为人太傲气，不能为众所容，只靠一人之力总是不能成事的。对此有记载云：“性倔强躁而易怒，偶不惬意，辄暴跳如雷。处事则往往偏执一见，无他人置椽之地，故同僚……常表恶感。……众不能忍，群向孙先生告发，……不得已，乃悄然引去。”[2]

同年（1916 年）10 月 6 日，蒋纬国生。关于蒋纬国，有云：“为蒋与日本女人所生”。但据蒋介石厨师蒋小品说，蒋纬国为戴季陶所生。戴因怕夫人，不敢扶养，乃由姚怡诚扶养成人。后蒋又于其家谱中改纬为宋美龄所生，故蒋纬国所出是个谜团。但从蒋对纬国的亲热程度看，又似为其亲子。又观纬国青年时照片，多有与蒋相似处。但蒋纬国今已确认生父为戴季陶，其生母为日本女士。[3]

蒋在上海经营证券交易之事，甚是顺利，并发了大财：“不半载，迭获巨利，母子相加，竟达十数万元，严然富商矣。”自 1916 年 8 月以来，将近两年时间，蒋一直住在上海。这期间，以经营证券交易为主。当时他们合伙的人牌号叫“恒泰号”，资本有 3.5 万元，1000 元一股，共 35 股。股东总共 17 人。张静江本人 5 股，全家合起来共 13 股。因此，张之侄子秉三，为“恒泰号”经理。

蒋介石（蒋纬记）4 股；戴季陶（小恒记）2 股；陈果夫（陈明记）1 股。蒋之 4 股，是张静江代他交的，他本人则一无所有。他们还和日本某企业共同组织“协进社”，进行证券交易。这种交易活动，蒋一直干到 1922 年。

1919 年，蒋又和虞洽卿等合伙开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理事长为虞洽卿。理事 17 人，共分为 10 万股，向日商抵押 7 万股，对华商抵押 3 万股。到 1920 年年底，获得 270 万元。除日商押款和保存的 4 万股应缴钱外，仍余 32.5 万元，全部归戴季陶、张静江和蒋介石所得。又 4 万股股票因涨价至 120 元，共值 480 万元之全部股金，亦全为他们三人所获。蒋就这样凭空发了大财。到 1922 年，蒋离开证券交易所时，携 4 万元到广东任职。

在这期间，蒋开始认识戴笠。戴这时住在上海表弟家，睡地铺，在交易所当杂工，因系戴季陶的同姓受戴看重，蒋也因此另眼相看，对他比较客气，但并无深交。蒋也未想到以后戴会成为他的特工主将。

1917 年 7 月 14 日，段祺瑞复任后，拒绝恢复“约法”和国会；又有“西原借款”、“第二次善后借款。垫款”（日金 3000 万元）、“吉长铁路借款”（日金 650 万元）、“第一次军械借款”（日金 1700 万元）、“第二次军械

---

[1] 《参谋长日记》，见《秘录》五，第 17 页。

[2] 秦瘦鸥：《蒋介石先生全集·蒋介石先生传》，第 34 页。

[3] 蒋纬国自传行将出版，他对此会有所交代。

借款”（日金 2242 万元）等一系列巨额借款；并出卖吉长铁路与日本（袁世凯都未答应过）等等。孙中山便于 1917 年 7 月 17 日，率“应瑞”、“海琛”等舰，偕朱执信、章炳麟、陈炯明等人到达广东黄埔。

25 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开会，决议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

9 月 l 日，孙中山当选为大元帅（次日选陆、唐为元帅），反段护法。

这时蒋仍在上海从事股票交易。其间也联络江浙各地同志，仍未脱离革命组织。

南下护法

1917 年 9 月 20 日，蒋上呈《对北军作战计划》书，对北军分析极详。此次对北军作战计划分为两期：第一期至 11 月上旬，以中央军由两广攻长沙，肃清湖南；待左翼占领四川，东下湖北时，两军会师，合攻武昌。右翼与海军合攻闽、浙，继下淞沪；待中央军与左路军会克武昌后，会师南京。第二期 1918 年 3 月开始，中央军自津浦路，左路军自京汉线，右路军自海北进；左路军再派出一支部队由川北直人秦、晋，为主力军振声威，攻北京侧背，会师燕京，然后再发动总攻击。但其意见未被采用。

1918 年 3 月 12 日，蒋应孙中山电召，离沪赴粤。途中又写《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上呈孙中山。蒋认为，敌军将全力攻衡州。衡州失陷后，张敬尧攻桂林；曹锟攻韶关；张怀芝攻赣州，然后取惠州，再与其中路军合攻广州。为此，蒋以为当于衡州未失之时，令黔、川、滇军攻克荆、宜，扰敌之背；当张尚未攻赣州时，令南军力克漳、龙，使桂、粤、闽、浙连成一片，共抗敌军。否则粤省危殆。15 日，蒋就任粤军陈炯明总部作战科主任，拟定《第一、二两期作战计划》，并立即赴黄冈、潮安、三河坝、松口、蕉岑前线视察，这和他到山东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参谋长时一样，仍是积极有为，欲建立一支新军。他首先提出“先谋自立于不败之地，而后再谋制胜之方也”。[①]

广州护法政府因为唐继尧、陆荣廷有不同意见，并反对孙中山任大元帅，于同年（1918 年）5 月 4 日，通过改组军政府案，实行七总裁制，降孙中山为七总裁之一。26 日，蒋迎孙中山于三河坝，见孙中山形容憔悴，他伤心地流了眼泪。孙与蒋长谈至深夜方散。29 日，蒋到永定参与指挥作战，30 日克永定。6 月 25 日，孙中山自汕头经日本至沪。

孙中山回到上海后，一面著书，一面开始试探和苏联建立联系，并向列宁发出愿与苏联相联合的电报。[①]

本年 1 月，苏俄政府已表示对华友好和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运动，不久苏外长齐契林回电表示欢迎，并称孙中山为中国革命的导师。第二年（1919 年）7 月 25 日，苏俄发出《加拉罕宣言》（加拉罕任代外长），此宣言是对南、北两政府而发的，包括南方政府。声明苏联政府愿放弃帝俄时对清政府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愿帮助中国人民的解放运动。此件，1920 年 3 月 26 日北京政府才收到，4 月份各大报刊均予发表。这是第一次对华宣言。孙中

[①]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上辑，第 55 页。

[①] 原 28 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盛岳所著《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中引有此电文。此书系英文版，由美国堪萨斯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出版。

山从此开始和苏联建立了联系。1920 年 9 月 27 日，苏俄又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重申放弃帝俄对清政府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这个宣言，当时由北京政府边防处官员张斯麐（中将衔）于本年年底自莫斯科带回北京。此宣言对中国政府而发。此时孙中山已不参加南方政府。两宣言对中国人民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它使中国人民的眼睛转向了苏联和莫斯科。孙中山的联俄容共和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就是在此历史背景下形成的。

本年（1918 年）4 月初，李厚基率“闽浙援粤军”猛烈反攻，黄冈、饶平、泽相于 3 日至 13 日接连丢失。北京政府即于 6 月 20 日命曹锟任川、粤、湘、桂 4 省经略史，张怀芝为“援粤总司令”；吴佩孚为副司令，进攻广东。25 日，孙中山自日返沪。7 月 13 日发电陈炯明、蒋介石，令其冒险进攻，转败为胜，语云：“为兄今日计，惟有奋力前进，冒险求胜。”[①]7 月 5 日各总裁和岑春煊等相继就职（孙、唐未就）。

7 月 9 日，蒋介石拟定《第二期作战计划》，其大要如下：第一，以主力集中于右翼，先收复已失之地黄冈、饶平，以巩固潮汕。然后以主力自海道取闽省漳州，再与左翼会师闽江下游，为进占福州作准备。第二，左翼暂取守势，惟要派一支有力部队向龙岩挺进，进逼漳州、福州。因右翼部队第一支队司令李炳荣于 19 日失守大埔，该计划无法实行。30 日，蒋奉陈炯明之命指挥炮兵夺回狮子口，反攻大埔，激战三昼夜收复大埔。但因此役在总体上战败，蒋又与同僚不和，遂于次日辞职返沪，8 月 18 日抵上海。

于沪住 20 余日，又因孙中山和陈炯明、邓铿一再催其返任，蒋于 9 月 13 日，返抵广州。18 日到达福建漳州粤军陈炯明总司令部。26 日，升任第二支队司令官，梁鸿楷、丘耀西二统领归其指挥，共千余人，设司令部于长泰。10 月 20 日正式成立司令部。成立之日，蒋曾作文祭告曰：“战必胜，攻必克，统一中华，平定全亚……完成革命伟大之盛业，皆自神灵所赐也。”[②]

本年 9 月，苏俄政府迁都至莫斯科。11 月 19 日，蒋率部自长泰出发，直指福州。26 日抵达仙游，与许崇智会师，然后与许军分道。

28 日草拟《讨李厚基檄》，原稿供失。

12 月 2 日占领大樟溪上游的嵩口，自此，可直下樟溪 40 里而达永泰（福州门户）。3 日，蒋患病。5 日，占领邱演。6 日，又占领梧桐尾。7 日，攻界竹口。同日，接陈炯明停战令。但蒋深感就此停战，攻败垂成，决心攻克永泰后，再奉命停战。8 日，蒋占界竹口，孤军直逼永泰。此路为 50 里之深山穷谷，十分险要。同日下午，占领永泰。9 日上午，又孤军进击汰口。汰口距福州仅 60 华里。蒋拟继续攻击前进，进而占领葛岭。原来李厚基向陈炯明求和，为缓兵之计，图谋部署反击。陈竟答应，故下令停战。蒋不听陈命，仍令梁、丘二统领继续前进，以逼近福州。但梁、丘因已接到陈炯明的停战令，不再听蒋指挥。10 日停战。李厚基经准备之后，以 5000 余人于 15 日反击。当时蒋措手不及，梁、丘又争先逃走，汰口、永泰用继失陷。蒋被围于水泰城中，只身冲出围困，极为落魄。蒋于 16 日痛心地检讨此战失败原因为 6 条：（一）防线应设葛岭，不应设于汰口，因汰口距永泰大近，汰口一失，则永泰不保；（二）停战令发表，将士均无斗志。（三）蒋病重，不能前敌

[①] 《国父全集》（函电）第 562 页。

[②]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上辑，第 74 页。

视察，未多派侦探。（四）轻信停战条约。（五）士兵入城抢掠，见敌即溃。（六）梁鸿楷统领迷于酒色，不听指挥。总之认为孤军深人，切不可停顿，应乘胜前进；更不可对敌守信。[1]

这次战役中，蒋介石失去了过去 6 年日记和两部兵书。一部军书为《巴尔克战术》，这部书是德国一个普通文人所著，但被德国军人奉为宝典；一部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日本军人视为宝典。此二书蒋随身携带，经常阅读，并有圈点。他对《巴尔克战术》更是重视，看过 6 遍以上。[2]

这几年，蒋主要阅读了以下的书籍：《宋鉴》、《元鉴》、《明鉴》、《防海纪略》、《平浙纪略》、《定夷丛刊》、《太平天国外略》、《胡文忠公书牍》、《定夷丛刊》、《中国哲学史》、《天演论》、《地形学》、《蒲鲁美战略论》、《初级战术》、《西洋通史》、《拿破仑本纪》等。

同年冬，蒋纂修蒋氏宗谱；孙中山赠蒋母“广慈博物”匾额。蒋在前线，于 1919 年 2 月 12 日写了《废督裁兵议》，主张军队为国家之军队，全国设一个“军政检定会”监督军政，凡军事诸设施，须由该会认可以后，陆军部咨请国会表决，而后由陆军部执行。他说这可以使“人民有参与军政之权，而兵权不为武人所专擅”，[1]蒋此时很有些民主主义思想观点，也真心诚意地反对武人专权。但当他掌握军事大极后，就比北洋军阀还专权，这就是中国历史的悲剧。当时，他也只是以此为反对军阀专权的权宜之计。

蒋于 3 月 5 日又请假回上海。到上海后，多次向孙中山求教。

这时蒋母带病到上海看蒋，母子相见，分外亲切，蒋亲自侍奉汤药，不几天蒋又返回前线。蒋于返回福建前线前夕，向孙中山辞行，回寓后，在母亲面前盛赞孙中山是一位伟大的导师。27 日辞别母亲启程。临别时，他母亲向他提出两点要求：一、每年回家探望一次。二、“在军中用人最宜小心”。[2]蒋以后用人惟忠，或与此有一定关系。

同年（1919 年）5 月 4 日，北京学生集会天安门，火烧赵家楼，提出“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发起“五·四”运动。这时，蒋正在福建前线指挥作战，不久又奉母命接妻毛氏到鼓浪屿同住。

这期间，蒋因自己工作不顺利，正闹思想情绪，于 6 月 21 日向邓铿写信（邓担任陈炯明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其大意是表示自己愿闻己过，并说明了他的第二支队的内部困难情况。这困难是：一、“不能自选兵将，又不能如意整顿革新”。二、支队成立之初，“旧人难觅，人才缺乏，内部官佐半系狗尾续貂”。有此种种困难，仍不免有人求全责备，真是使蒋感到太过分了。他感慨道：“三代以下，无直道也”。希望邓对此能予理解。最后又向邓提出意见，希望他不可待人太严苛，不可疾恶过甚，泾渭太分，然后又搬出老子和子路的名言为据，希望邓能闻过则喜。他说：“老子以谄谀我者为贼；子路人告之以过则喜。我思古人，实获我心。

愿我辈互相警戒，互相勉励，则寡过之道，为善之机，肯在乎是……”[1]

此间，粤军和浙军士兵之间发生了冲突，蒋部下丘耀西统领被浙军士兵

---

[1] 蒋介石：《粤军第二支队进攻永泰情况始末》：毛思诚：《民国十五年》第二册第六编，第 63—65 页。

[2] 蒋介石：《对克劳塞维茨著作的感想》（1956 年 5 月）。

[1] 《秘录》，五，第 154～155 页。

[2]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第二册，第六编，第 72 页。

[1]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第一册，第六编，第 76 页。

殴打，浙军士兵死伤各一。蒋很生气，于 7 月 9 日又致信邓铿，倾吐郁闷，提出辞职。他说，他于本军供职已经一年，虽一再受人指责，也忍辱负重，不肯辞归：“自永泰退回，……卒至诽谤交作，雌黄沸腾”，“惟当时予天君泰然，神明自若，此心此志，可质鬼神，故乃忍辱负重，含羞抱耻，示其大度，以冀万一之补救，尚无辞退之决心也”。[②]

蒋能在军中忍耐一年，甚至在“诽谤交作”中也不辞职，并希望有所补救，应当说是比以前有所进步，但他最后还是辞职了，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感到，他再呆在军中也没有什么补救，无能为力了。

于是在当月（7 月）12 日，蒋上呈辞职书。上书后，他倒心境泰然了。在寄庐怡然自乐，并自语日：“幽境高蹈，啸歌自适。

夜间月白风清，衣襟俱爽，较之在军中有天堂地狱之分。”是日薄暮，往登郑成功古阅操台，仰暮其雄风不已；同时准备筹办游欧美旅费，欲于欧美留学三年，以增长学识。8 月 7 日，孙中山正式辞去军政府政务总裁职务。这自然使蒋心情沉重。9 月 5 日晚，蒋沿海滨散步，感国事而赋诗曰：

“明月当空，晚潮汹汹，国事混蒙，忧思忡忡，安得乘宗悫之长风，破万里浪以斩蛟龙。”[③]

这诗很有气魄，似仿曹操的《观苍海》。

随后，蒋携家眷离开鼓浪屿，满怀忧虑中赴沪。

10 月 3 日于上海叩见孙中山，表示了出国留学之意。孙中山则挚意挽留，不许其出国，并对他说：“为了重建革命政党，必须要有军事方面的助手，如果让你远游欧美、长期留学，对革命阵营来说，实在是很大的损失。”[①]

这年 10 月 10 日，孙中山又改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

蒋于 23 日在上海再次谒见孙中山。见后并对人说：“见中师垂爱与施教殷勤之状，不禁赧汗，盖恐难副所期也。”[②]25 日，蒋奉孙中山之命，携孙中山致日本友人的信件登轮赴日。探问犬塚病况。途中思念国事，不禁依栏长叹日：“身世浮沉，恍然若失，即使倾尽东海之水，也难洗我愁肠！”[③]

28 日蒋抵神户。次日晚抵东京。30 日上午，山田菊地原来看蒋介石。下午代表孙中山探问犬塚胜太郎病。31 日，赴横滨。

11 月 1 日，于山田纯三郎家午餐。然后访问萱野长智、头山满、秋山定浦、森福等人。对头山满特别佩服其安闲襟怀。3 日，继续访友，并吊丧和游览书肆。

11 月 5 日至 8 日，蒋参观了日比谷公园和上野菊花大展。据说，蒋最喜欢黄菊花。他在东京旅行时，还写了两篇文章于《星期评论》上投稿。该刊为戴季陶创办。蒋的两文为《世界各国政府对付俄国劳农政府的手段如何》和《打破外交的迷信问题》。11 月 11 日，到京都参观伏见桃山的明治陵和宇治川。这两个地方也有丛菊盛开之景。

11 月 19 日返上海，接到陈炯明派人送来请其回粤任原军职的信，蒋未

[②] 蒋介石：《致邓铿书》，见《蒋总裁致友人书》（许达年编）。

[③] 《思想言论总集》（文录）第 294 页。宗悫，字元幹，南朝宋人，官振武大将军。少时人问其志，答曰：“愿乘长风破万里波。”

[①] 《秘录》，五，第 157 页。

[②]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第二册，第六编，第 86 页。

[③]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第二册，第六编，第 87 页。

应从。21 日，蒋迁居于法租界贝勒路 369 号居住，和孙中山一同度过了 1920 年的新年。这期间他重读了《胡文忠公全集》、《曾文正公家书》、《春秋》、《陆象山全集》、《历代通鉴辑览》、《聪训斋语》、《政治学大纲》、《军事常识》、《日本军制学》、《俄国革命纪》、《经济学原论》、《国民经济学原论》、《新记》、《易卜生记》、《托尔斯泰人生观》、《欧洲地图》、《大演习战况地图》、《新潮》、《新青年》、《东方杂志》等书，并请孙中山给写了“静、敬、淡、一”条幅当成座右铭。1 月 27 日，蒋母带病到沪看蒋。蒋每天奉侍汤药，并陪伴榻旁，闲话家常，为母增乐。3 月 1 日，母病体似见好转，即送母返奉化故乡。

应陈炯明之催促和孙先生的劝说，蒋又于 3 月 13 日回福建漳州粤军司令部，并制订作战计划。旋因同僚不和和患神经痛，往鼓浪屿静养一时，又返上海。接着患伤寒，乃入上海筱崎医院，其母又扶病到沪。蒋病愈后再照顾母亲约 50 余天。母病好转后，蒋又于 7 月 8 日回闽供职，仍驻鼓浪屿。8 月 5 日又接电返沪。7 日谒见孙中山。孙中山令其于游俄、去蜀、赴粤三者任选一地。蒋经考虑后愿去四川。后经廖仲恺力劝，又改取赴粤。9 月 30 日启程，10 月 3 日到达广东，出任许崇智第二军前敌总指挥，具体制订作战计划。这时，许崇智、陈炯明已自漳州回师讨伐桂军近两个月之久。蒋于此时期，却往返于奉化与上海之间，未曾参战。29 日蒋助陈攻克广州。同日孙中山自上海对蒋写信嘉勉。同时也对他提出批评，说他太专横暴戾，如同君主：

“我所求者，惟期主义，政策与我一致，即我所谓服从我三十年来之共和主义。而岂若专制之君主，以言莫予违为得意耶？……兄性刚而疾俗过甚，故常龃龉难合。然为党员重大之责任，则勉强牺牲所见降格，以求所以为党，非为个人也。”[①]

孙中山于此信中对蒋的任性和负气不凡，稍不如意就拂袖而走，作了一个简单的分析和直截了当的批评，叫他不要像个专制君主，有言必依，不许违背；不要疾俗太甚，应有容人之量，更要为主义、为党而牺牲个人所见。语重心长，期望殷殷。并说明自己对部下所要求的，也只是在主义和政策上要服从他，并不是每一件事每一句话都要大家绝对服从。

蒋接信后，其盛气凌人的虚荣心，受到损伤，极为恼火。便以与副军长张国桢不和为理由，于 11 月 4 日向许崇智辞职。6 日回到上海，并留书陈炯明，大发牢骚。信曰：“凡人当上不信任，下不服从之际，同事者复相疑忌，相倾轧，是更足短志之气，而却公忠之步也。……此次奔命，实以执信之死，而激成同仇敌忾之志，并以粤局飘摇，引起我舍己从人，维持本党之责任，自以为竭愚尽忠，一秉至公，无丝毫自私自利之心，溶于其间也。”[①]到上海后，蒋马上又给陈炯明写信，再次指责陈在作战中不信任他，不用他的策划，因而他不能容忍，故而辞职。他说：“中正主张以右翼军出北江，左翼军出西江，中央军集中省城，以资镇慑。而此置肇庆要地于不顾，反以中央军派遣北江，名为掩护右翼回攻四会，而实则已不信任中正之处置矣。……如果信任中正，亦决不多此一举。”[②]

[①]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上辑，第 97 页。

[①]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下辑，第 100～101 页。

[②] 蒋介石：《致陈炯明书》，《蒋总裁致友人书》许达年编，第 10 页。

上北伐意见书

1920 年，苏联派维经斯基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同年秋，维经斯基又会见了孙中山。第二年（1921 年）12 月 23 日，孙中山在广西桂林接见了共产国际的东方局负责人马林。马林建议孙中山与苏俄、中国共产党结成密切联盟。孙中山对此表示考虑，并说明他所倡导之三民主义立场不能改变，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不适合共产主义。

1920 年 11 月 12 日，蒋于上海晋见孙中山，报告广东情形。翌日，许崇智因蒋辞职，含忿到沪，竭见孙中山。蒋闻讯躲开，于 14 日回到奉化故乡，游山玩水，自我消遣。23 日于雪窦寺写诗鸣志，大有退隐之想（见前），诗最后一句“功成身退莫迟迟”。

12 月 16 日，蒋移住于奉化县城。25 日戴季陶到奉化见蒋，激烈地批评蒋太任性使气，脾气太暴躁，一触即跳，并且不容蒋氏回言。蒋气得更是无可如何，与戴大吵一架。戴于奉化住一日后，仍回上海。蒋也伴戴到沪。

11 月 25 日，孙中山离沪赴粤。29 日通电恢复军政府。同时选定内政（孙自兼）、财政（唐绍仪）、交通（唐继尧）、陆军（陈炯明）、外交（伍廷芳）、司法（徐谦）、参谋部（李烈钧）各部部长。30 日，任谭延闿为湘军总司令。

这一年里，蒋介石除学俄语外，又读了如下一些书：《中国哲学史》、《世界大战史》、《军制学》、《经济学》、《杜威讲演集》等以及欧洲、欧战、我国西北各地地图。同时也读《唐·宋小诗》、《水浒传》、《儒林外史》借以消遣。继续阅读《通鉴辑览》；读到关于唐朝藩镇之乱时，廖仲恺特别给他进行了讲解，他认为讲得很好，使他更加明白清楚了。于是得一体会，认为读书不可无友。此间，蒋又抽时间给其长子经国亲定课程，请王欧声为家庭教师。其次子纬国，则派人送奉化县城培本幼稚园。

同年又给经国写两信，引用顾清廉的话，说经国“天资虽不甚高，然颇好诵读”，并为之“略慰”云云。又教经国听奶奶和母亲话，连走路、说话，“均要稳重，不可轻浮”；在学堂“要静心听讲，细心领会，务求明白”；并强调“总以烂熟为度”等等。蒋写一般信时往往很长，内容也前后重复；其在军事方面的上书，也常常如此。他的文风就是随想随写，写到何处是何处，可谓文思滔滔，而倒漾不绝。但在写家书方面，却从来简明扼要。[①]

蒋对自身的学习抓得很紧。每年都读不少书，也坚持学习英文和俄文，尤重英语。他所读的书中，以历史，尤以中国古代史为第一位；以军事为第二位，地图集之类为军事书的附属读物；经济为第三位；哲学为第四位；文学著作为第五位，主要是为调节神经。至于政治著作，他主要抱着《大学》、《中庸》和王阳明、曾国藩的书不放；民主主义的书是根本不读的。

第二年，蒋又回到家乡居住。于 1 月 10 日呈上《军事意见书》，共 10 条。

10 条意见的主要内容是以西北为第一根据地，以东北为目的地。此为其当时的北伐大纲。北伐路线则主要为三条：（一）四川派军一部出兵西北。而四川主力则东进湖北，再北上京汉线。（二）广东军平定东南后，再沿津浦线北上；再分兵一部，自海道北上秦皇岛。（三）如川军不能东出湖北时，

[①] 以上两信，见《蒋总裁致友人书》末附录。人世间社，1942 年浙东版，第 82 页。

则由湖南军队沿京汉线北上。[②]

1926 年 6 月，北伐先遣军湘军和桂军就是走的这一条路线。

只是当时蒋未想到李宗仁桂军和湘军同时北上，而且桂军成为北伐军的一支劲旅。

蒋之人生观

根据蒋自己的说法，他的人生观是在 1914 年读了《大学》一书后形成的。那时他 28 岁。他在《大学之道》下篇中说：“我也是直到 28 岁的时候，总理对我讲过大学之道，才知道这部书是一部最有价值的政治哲学。将其彻底研究后，我更体会到这部《大学》，亦是一部最有价值的军事哲学。后来冉不断研究，就觉得其中每一句话，都有深切的道理。于是我的人生观乃由此建立，亦可以说我的革命人生观，在 28 岁时就确定了。”[①]他读后之最大心得，乃是“先发制人”。他自己说：“后来（1923 年）我将研究的心得，作了一幅对联，请总理看，当时总理就替我写了这幅对联送给我，这就是‘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研几于心意初动之时。’”[②]“始生之处”，“初动之时”，均是说在事物和意向刚刚萌动时，就要研究和处理，这是其思想方法和处世哲学，也是斗争哲学。他称之为革命人生观。当时蒋尚不解康、梁的进步思想。因此，蒋对王阳明和曾国藩的书最为爱好，也最迷信，而对于西方民主主义的书，乃至康、梁的改良学说，均无兴趣；至于三民主义，他只不过以民族主义而待之，根本不知民权为何物。

所以他在日本读的书是王阳明和曾国藩等人的著作。毛思诚之《蒋表》1914 年条，曾记述蒋的思想根底。他说蒋的“军事学即以巴尔克战术为基础；政治学则以王阳明、曾文正二集为根底也。”[③]《秘录》于本年亦有类似记录：“这个时期所学的曾国藩的精神，其幼年母亲采玉的教导和在此学到的王阳明的精神，为其以后终生的精神食粮。”[④]《蒋表》还记载了他对王、曾的著作手不释卷，但却无一处说他读孙中山的书手不释卷。毛云：“尤喜读王阳明、曾文正、胡文忠三集，手未暂释。”[⑤]这是 1914 年和 1915 年的情况。这时，《大学》、《中庸》两书，还可能居其次。

蒋从此开始，在哲学上是王阳明的主观唯心论，在政治上是曾国藩的自强自立的洋务主义。他在行动上虽参加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实质上却只是追求富国强兵，为建立个人功业而奋斗。

他的主观唯心论和个人奋斗意志，首先初发于幼年的母教与其母子的孤苦奋斗环境。正如他自己所说：“欺凌胁迫，靡日而宁。……教以刻苦自立之道……吾母惟一乘自信之坚，以再造吾家为惟一之责任。又尝谓，艰困危厄，世所恒有，而自立自强，必当尽其在我。故家愈艰，而礼法不可不饬，门祚愈薄，而志气不可不坚。孤寡弱小之赖以自存，舍奋勉自立，刻苦自强，

[②]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第三册，第六编，第 48～51 页。

[①] 蒋介石：《大学之道》下篇，见《蒋总统集》，第一册，第 90 页。

[②] 蒋介石：《大学之道》下篇，见《蒋总统集》，第一册，第 90 页。

[③]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上辑，第 33～34 页。

[④] 《秘录》，四，第 93 页。

[⑤]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上辑，第 33～34 页。

更无他 道。”[1]

其次，奉化地区，自南宋以来，就出了很多理学之士：“奉化于赵宋时多理学之士，委员长自幼言学，即先审视而后文艺。以正心诚意修身为本，以立道据德依仁为行，……以礼仪廉耻为政。”[2]顾清廉就曾对蒋传授义理之学。

对王阳明心学著作的研读，使蒋以后成为一个主观唯心论者。

王阳明说：“格物者，格其心之物”。[3]蒋说：“要知道天下万事万物都由诚心所生，都靠诚心维系。如果一念不诚，则万物皆假。”[4]

这都是主观唯心论。诚即物，物即心，心即物，无心外之物。

在政治上，蒋主张自立自强，实行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以《学》、《庸》为其根本政治理想。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而修身之本，乃是“先正其心”；[5]欲“正其心”必格物致知，而达于“诚意”。“诚意”而后心正。“正心”与“诚意”则为修身之本。修身而后齐家治国以平天下。这是“自天子以致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6]这是《大学》的治国之道。而蒋则以此为准绳。他说：“《大学》第一章……不过两百多字，把做人做事以至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末一贯的道理，说得何等简切精到。我们军人的天职，即在治国平天下，要治国平天下，也就要从明德修身做起。所以大学之道不仅是人生和政治的基本哲学，也完全是军事的根本哲学。”[1]

这种封建政治原则加上其吸收外国先进科技的思想，就使蒋成为一个新时代的新洋务派。这时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很强烈的，但从 1928 年的济南“五·三”惨案，到 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日寇入侵中国东北后，他就把依靠内部团结，不依靠外国的（他不在其位时）民族思想，改变成为以“安内”为第一，“攘外”为第二的对外妥协论。这是自曾国藩以来的老洋务派的一大政治特点。即民族独立受到威胁时，先要“平定内乱”，然后对外作战。曾国藩就曾借洋枪队主力（以后也输入和制造洋枪）镇压太平天国。而且他们在实在无力外御时，也屈辱和妥协。例如：李鸿章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曾国藩也不例外，他认为清王朝当时势弱，必须对外妥协。自道光时外强入侵以后，失误就在于“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致外患渐深，不可收拾。……以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惟万不得已而设备，乃取善全和局，兵端决不可自我而开。”[2]蒋介石基于曾国藩的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洋务派思想，以后提出“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能和即和，惟在万不得已时，方设备抵抗，而又战端决不可自我而开。他虽努力争取民族独立与自强，但在抗战前，则一再容忍日帝侵逼而不抵抗，就是以“安内”和对外妥协为第一要务，可见其受洋务派思想影响之深。

---

[1] 蒋介石：《报国与思亲》，见《蒋中正言论集》（何介公辑），经纬书局，1937 年 5 月上海版，第一辑，第 1—2 页。

[2] 刘炳黎：《蒋介石先生思想研究集》，前途书局 1937 年南京版，第 3 页。

[3] 王阳明：《传习录·爱问知行合一》。

[4] 蒋介石：《做人与革命建国之大道》，1936 年，见《蒋中正言论集》第一辑，第 107 页。

[5]

[6] 《大学）第一章。

[1] 蒋介石：《陆大学生之责任与必要的修养》，见《蒋中正言论集》.第三辑，第 80 页。

[2] 曾国藩：《复陈津案各情片》，见《曾文正公全集》（八），奏稿卷二十九，第 4797—4798 页。

蒋自 1916 年以来，除读以上诸书以外，还按王阳明的心学之道进行静坐、默读。在他静坐时，默念如下内容的箴言：

“一、孟子养命章。二、曾文正主静箴。三、绵绵穆穆之条。

四、研几之条。五、一阳初动，万物资始之条。六、灵明无着之条。”[①]

然后又默祷 8 项：

“一、建成党国。二、救济民生。三、人心趋正。四、母亲寿康。五、英公无恙。六、二子成立。七、智、德日进。八、功业成就。”[②]

1918 年在晚间静坐时，默念如下内容：

“一、万象森然，冲漠无朕。二、去人欲，存天理。三、心体意动，致知格物。四、静坐收心之条。五、纷杂思虑之条”。[③]

从以上静坐默念和默祷内容看，蒋当时的思想，完全是来自王阳明心学和曾国藩的理学。曾氏是信奉程朱理学的人，但在“去人欲，存天理”上，又和王阳明完全一致。而蒋则是坚决“信仰”“去人欲，存天理”之说教的。以后的新生活运动中，在对军人训话中，无不大谈此“箴言”。而他自己，则权欲之强，无与伦比，稍不如意，就怫然作色，或拂袖而走，其欲之大，可想而知。另外蒋之早年一大特色就是坦率，他不屈从，不伪装，合则留，不合则去，任性而为不顾议论。但以后，他就慢慢失去这种坦率和天真的个性，而不惜运用一切方策和手段为自己建立功业了。

成功立业

陈炯明和许崇智将桂系军阀陆荣廷驱逐出广东后，孙中山任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并于 1920 年 11 月 25 日离沪回粤。

蒋介石则未和孙中山见面，就自沪回故乡溪口而去。

同年年底，戴季陶专到溪口见蒋，劝蒋马上回广州。但蒋执意不肯，气得戴季陶对他大发脾气，指责他太任性自为！蒋也不服气，与戴大吵起来。事后，蒋又自觉可笑，又在给胡汉民、廖仲恺的复信时，对戴表示了歉意。

同时又于此信中，蒋也毫不客气地向孙中山提出了自己对人员安排的意见和出讨广西的建议。他要求孙中山委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并由陈亲自率部出征，由孙中山亲自督师。如答应这些条件，他就一定到广州上任。1921 年 1 月 5 日，又致书戴季陶，专门向戴检讨，请其见谅。

戴于 1 月 14 日对蒋复信，恳挚地劝他以建功立业为重，切不可太义气用事。信文如下：“劝兄赴粤，虽属为公，亦有一半系为兄个人打算。……兄之自我之强，有不可挡者。然而杯酒失意，辄任性使气，不稍自忍。以此处世，深虞招祸，即不然，亦足碍事业之成功。”[①]

蒋得此信后，深受启发，于 1 月 20 日向戴回信，表示听从规劝。信云：“吾之取重于兄者，增我知识，长我学问，不客气，不敷衍，规劝督责，不稍假借。时时能导我于正，强我为善。此弟之所以须臾不能离兄者。……而兄之所以不能轻弃夫弟者，而终望弟有成业之一日乎？吾甚愿吾兄规劝不

---

①

②

③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上辑，第 73 页。

① 《蒋总裁致友人书》，第 21～22 页。

怠，……则中正或能变化气质，而渐进于道义，……本性亦未始不可易耳。赴粤决以援桂动员之日为期，未知吾兄能否同行？”[②]

由此可见，蒋对戴的这封信动了心，为了事业，他开始考虑改变一下暴戾和任性的性格。于是，1 月 27 日启程赴粤，2 月 7 日抵广州。但不到一周，又拂袖而别。原因是邓铿未出席省署会议。

他认为邓对他不友好，不尊敬。2 月 14 日蒋到香港，又给邓写信，说他不出席讨论他的军事计划，影响了粤军对计划的一致同意，并力劝邓迅速出兵平定广西，以巩固广东。

蒋回到溪口后，又于 3 月 5 日写《上总理书》，对孙中山将于不久出任非常大总统之事，有不同意见。他认为这是以总统府与北京政府对抗，重在外交。但革命要依靠内部团结，不应借重外交，因为外国人是不可靠的，他又说明只要自身巩固，则外人压迫也是不怕的。否则，内部不团结一致，外人反而不承认。他还详陈了过去依靠美、英而遭到失败和苏俄因内部团结而取得卫国战争胜利的历史，作为有力的证明。

最后他建议：“团结内部，放弃外交，以苏俄自强自立为师法，……则内部巩固，实力充足，有发展之余地。”

孙中山出任非常大总统，主要为广州海关的税收可以以政府名义接受，同时也可对抗北京政府，这并不意味着孙中山就是专靠或借重外交，而忽略依靠自身的力量与团结。孙中山是很能以宽厚胸怀团结内部的，只是这种仁爱之怀，无法阻止内部的分裂。

（1922 年 6 月 16 日，发生了陈炯明叛变。1923 年 2 月，孙中山再返广州时，就未建总统府，而先建大元帅府。这当与蒋的建议有关。）

蒋上书后，仍然呆在溪口家中，主要是读书和思考。这期间，他想了很多很多，最后终于下定决心养成伟人品格，“庶能显扬于世界”。要做大事业，自然对读书也抓得更紧了。他在家乡读了《通鉴辑览》、《礼记》、《诗经》、《统率学》等书。他认为，“欲使此心不紊乱，惟有依据程序做事，循课表读书而已”。

3 月 29 日，蒋又应孙中山电召到广州。不久，又因母病回家。4 月 10 日又自家返粤。这时蒋母已经病重，蒋心里不安，在 24 日夜里梦见雪满山原，一望无际，惊醒后，身犹寒栗不已。蒋自觉此非好兆，次日即又返乡。不久又回广州。

5 月 5 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职。当天任陈炯明为内政总 4 了长兼陆军总长、粤军总司令和省长之职，大权集于一身。孙中山对陈的这种身兼广东一切要职的任命，所遗后患无穷。

在这一天，蒋又回到家乡。此时，母病恶化。6 月 14 日（1921 年）上午 7 时 49 分蒋母病逝，享年 58 岁。蒋即按礼守制，写了《哭母文》、《先批王太夫人事略》，以寄哀思。

到 8 月 10 日，蒋奉孙中山电召，离家赴粤，谓之“夺情”。蒋到上海后，遇暴风雨，因怕母灵被冲，复又回家探望，见一切无事，再离家上路。9 月 13 日到达广州晋见孙中山。但因与陈炯明话不投机，旋于 25 日又返家乡。

陆荣廷于本年 9 月 30 日被逐出广西，避走越南。10 月 8 日，广州召开非常国会，通过北伐出师和统一中国议案。

[②] 《蒋总裁致友人书》，第 19～20 页。

12 月于广西桂林设大本营，以李烈钧为参谋长。下设滇军、赣军、黔军、粤军 4 个司令部。

11 月 9 日，蒋应召回到广州，和孙中山谈及葬母之事。三天后，蒋又回溪口，于 23 日葬母于白岩山鱼鳞岙中垄凸起处。据风水先生讲，这个穴位正在弥勒佛的肚脐眼上，不可装以重棺。蒋便将其母以普通坟茔安葬。墓西山峦起伏，墓东为长流的剡溪，山环水绕，景色清幽。

孙中山为蒋母墓亲书“蒋母之墓”和“壶范足式”。胡汉民为作墓志；汪精卫撰铭文由沈伊默书写。墓碑西侧有幅对联，为蒋介石所撰写，上联是：“祸及贤慈，当日梗顽悔已晚”；下联是：“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

葬母已毕，蒋于 12 月 12 日启程回桂林。22 日到广州，草拟北伐计划。至 1922 年 1 月 18 日，蒋抵桂林，出任大本营参军，兼许崇智第二军参谋长。次日于军事会议发表意见，建议从山西、湖北、东南、海上四路进军北京。军费每年 3 万元。

蒋自称好色是出于不得志。现在，他军务繁忙，身任重职，根本无失意之可言，但他仍于戎马倥偬中，在赴桂之前，和小于他 19 岁的陈洁如结成“良缘”。这时，陈洁如才 17 岁，蒋 36 岁。因为他并未与毛夫人离婚，所以人称陈为“第二夫人”，或“如夫人”，一语双关。蒋经国则称陈为“上海妈妈”。

陈洁如，原籍苏州，1906 年出生于上海。有中等文化水平，会说俄语，也有社交能力。蒋赴广州任黄埔军校校长后，一直随蒋陪住广州。陈对蒋经国甚是关怀，小蒋称她为“上海妈妈”。

1925 年，促成蒋经国赴苏留学。当蒋在 1927 年和宋美龄结婚，和毛夫人离婚后，陈便被打入冷宫，送往美国留学了事。陈固然怨恨蒋介石，所以在美国曾多次向挚友写信，骂蒋为“黑心贼”。

1932 年，陈才与蒋最后断绝关系。抗战时期，陈仍住上海，解放后出任上海市政协委员。1963 年移居香港。现已去世多年。

1922 年 2 月 3 日，大本营下达北伐命令。但陈炯明一心要保存个人势力盘踞广东，坚决反对北伐。为此，于 3 月 21 日派人刺杀坚持北伐、负责经费的邓铿（陈炯明的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使北伐经费无着，无法北伐。

这时，蒋建议将大本营移驻韶关，其目的是依靠广东资源和财政，同时震慑陈炯明。但孙中山为人宽厚，只是于 4 月 19 日速据梧州，切断陈与桂省陈军某部的联系，便率大军返回广东了事。

这时陈炯明已暗中和北京政府吴佩孚勾结，吴许以“两广巡阅使”之职。陈遂向孙中山辞职，准备叛变。4 月 20 日，孙中山免去陈的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长职，只留陆军部长一职。

蒋介石早就对陈炯明不信任，也提醒过孙中山，说陈不是共患难和可依靠的人。时至今日，陈叛迹益显，蒋已预见陈炯明必然叛变，大力建议孙中山先讨平陈炯明，再兴兵北伐。但孙中山未采纳蒋的意见。蒋很不高兴，又于 4 月 23 日赌气辞职。孙中山则一再挽留，语词恳切，说是蒋一去，自己就失去了得力助手，蒋为之深受感动，以致潸然流涕，于是又留下来。但孙中山仍不肯先讨伐陈炯明，蒋终于辞职返乡，于当夜离开广州。途中曾给陈炯明写信，劝他一定服从北伐大计。但陈叛心已定，劝也无用。

此时北方，奉、直第一次大战即将爆发。旋奉系失败，直系（曹锟、吴佩孚）开始扩张势力，独控北京政府。孙中山则在积极准备北伐。这是孙中

山用人最急之时，蒋这种任性的暴戾性格和个人意见第一的惟我独尊思想，给孙中山“晾了台”。

蒋介石拂袖而去后，孙中山于 5 月 6 日移大本营于韶关，全军誓师北伐，派许崇智、李烈钧、黄大伟三军进攻江西，同时，孙中山又派吴忠信北上联络张作霖、段祺瑞，合攻曹、吴。史称孙、段、张“三角联盟”。同时孙也对陈炯明指出，只要他不存异志，将来仍然倚重。

陈则阳奉阴违，于 5 月 3 日占领广州。孙中山处于危殆之中。

这时蒋介石则到浙江湖州拜访戴季陶，祭扫陈英士墓，并看视陈氏家属，悠然自得。回上海后，自言已有伟大至光明事业在心中闪耀。但他的伟大、光明的事业是什么呢？他未明言，也许是戴季陶给他启示了什么不可泄露的天机。

赴难广州

6 月 1 日，孙中山于广州杀机四伏之时，只身回到广州.对陈炯明仍以诚相待，欲说服陈炯明，使其不生异志。但陈拒不见当年给他军权和军队的孙中山。而洪兆麟，叶举则已调兵遣将，准备炮轰总统府。

蒋于湖州访戴时，心中仍挂念着广州之事，曾向许崇智写信，请他劝说孙中山速平陈炯明，然后北伐。否则乱生肘腋，难以对付，并说，但愿吾言不中。

孙中山北伐军于 6 月 13 日攻克赣州。同一日，陈炯明却下密令叛变。14 日，陈扣押廖仲恺于兵工厂。15 日，陈炯明部下叶举等通电要求孙中山下野。16 日凌晨 3 时。洪兆麟部炮轰孙中山总统府。孙中山脱险后，到永丰舰指挥反击陈逆军。宋庆龄于 25 日历尽艰辛返回上海。而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却严守中立，不敢抵抗。

孙中山于 18 日急电蒋纬国，转告蒋介石急来广州。蒋见电报后，于 25 日启程来粤。29 日即潜登永丰舰护卫孙中山。

蒋登舰后，孙中山命各舰移驻长州要塞后面新造村一带，以免被叛军封锁。7 月 8 日，各舰顺利通过原来浅水处海心冈，转守长州要塞。此时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孙祥夫投降陈炯明，引敌登陆，长州失陷，各舰又危在旦夕。蒋遂于 7 月 10 日商决孙中山率各舰冲过车歪炮台，驰往白鹅潭外国军舰停泊处，以避炮击。

正当永丰舰冲过车歪炮台时，永丰舰身中 6 弹，舰身震动，蒋急请孙中山入舱暂避，自己仍守在炮楼上。20 分钟后，安全通过车歪炮台，蒋才舒了一口气，并深为孙中山受惊而内疚。孙中山则喜形于色，对蒋多有嘉慰。在白鹅潭，蒋经常乘夜色朦胧时，上岸采购食品、菜蔬，这期间，孙中山曾劝蒋为主义而奋斗，为革命而自重，予以慰勉，但语中也有批评他动辄任性使气的意思。孙中山遂于此处等待北伐军回师讨陈，以解危难。

但是，北伐军回师靖难之战于 7 月 30 日在韶关败北。8 月 3 日，许崇智率第二军退往南雄，继入福建；李烈钧赣军、朱培德滇军、陈嘉祐湘军则退往广西。回师靖难已无可能。孙中山获此消息后，即于 8 月 9 日下午离粤赴沪。蒋陪孙中山自香港乘俄轮于 14 日抵上海，数千人到码头欢迎。

蒋在孙中山安顿好一切之后，于 23 日回浙，于宁波游普陀山、天福庵、登南天门，6 天后返回宁波城内。这几天因吃的不合适，蒋连日闹肚子、但

仍坚持写军事意见书，筹划方略，主张先平陈炯明叛军，定广东，进而统一西南。他还建议由李烈钧全权指挥，准备三个月，于 11 月开始作战。

对北方军阀，蒋主张惟吴佩孚不能联络，必使其投诚而后已。

其间，孙中山两次手谕召他到上海面谈，蒋均不从，只管自己于宁波各名胜游览。孙中山为此怅怅不乐。9 月 13 日，蒋介石于宁波城内开始写《孙大总统蒙难记》。记载 6 月 15 日至 8 月 15 日每天要事；到 10 月初写完全稿。10 月 4 日蒋到上海，但未见孙中山，又马上乘车赴无锡，游览太湖。在万顷堂，蒋举目四望，烟波浩森，水天苍茫中，不觉感从中来，遂为《蒙难记》写跋。跋的内容主要是谴责陈炯明，并警告陈“多行不义，必有自毙之一日”。然后游梅园，登惠泉山，再转苏州，访玄妙观。复经上海返宁波，于 10 月 7 日，始奉电召，于沪谒见孙中山，讨论时局，计划军事，又请孙中山为《蒙难记》写序。孙在序中称赞蒋忠诚侍从，筹策多中，并自我检讨无知人之明。

上书干政

广东被陈炯明占据后，孙中山令许崇智经营福建，暂为根据地。1922 年 10 月 12 日，许军攻克福州，驱逐北京政府的福建督军李厚基。孙中山任命许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仍任蒋为许崇智的参谋长。蒋即于 22 日赴闽上任。几天以后，蒋又因经费困难返沪，复回溪口家中。孙中山立即电令蒋马上回任，不得有误，蒋不得已，又硬着头皮于 12 月 18 日回闽复任。东路讨贼军旋于 12 月 19 日攻克泉州，平定福建。继而回师广州。

此时刘震寰桂军加入讨贼军，编组成西路讨贼军，于是东西两路夹攻陈炯明。1923 年 1 月 16 日，陈军败退，自肇庆退回广州。

在这同一天，蒋介石忽生雅兴，在福建前线往鼓山一游。他见石壁间新刻有“天地正气”4 字，便也顿生风雅之思，挥笔写下：“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对联；与同游者闲话时，指一亭后曰：于此盖房三间，隐居自由，可足平生之愿。继又于涌泉书“其介如石”4 字，吩咐僧人刻石于更衣亭西，作为纪念。一时间，这个征战沙场的青年将军，又成了山林泉水中的文人雅士了，真是好不开怀！

陈逆军因接连失败，于 1 月 16 日夜退出广州，奔逃惠州。各部讨陈军于当日晚进入广州城，发电迎孙中山回广州复任大元帅。1 月 20 日，孙中山任许为粤军总司令；任胡汉民为广东省长。蒋回上海后的当天，即将自己在福建鼓浪屿所撰的对联：“从容乎疆场之上；沉潜于仁义之中”、“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研几于心意初动之时”，请求孙中山为他书写。孙中山乘兴，又主动书写“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赠蒋，意在诫谕于蒋，还书写了陈其美（英士）赠蒋之对联：“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蒋以后将孙中山书赠的后两联，悬之座右，奉为座右铭。然而他在大陆统治时，却始终没有做到“天下为公”。

蒋于 1 月 26 日，又致书廖仲恺，主张先不建政权或不言主义，以便团结西南军阀唐继尧等，待条件成熟时再建政权。或言主义而不建政权，由唐继尧等去建政权；看来蒋于沈鸿英在 24 日叛变后，有向唐继尧妥协的念头。实际上，如果对唐妥协，就一切革命之事化为乌有了，因之孙中山对他的上书不予理会，也不批驳。这一天，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发表联合宣言，共 4 条。其主要精神是：

孙中山表明共产组织和苏维埃制度不适用于中国；越飞重申苏联仍放弃一切对华不平等条约；中东铁路应想一适当办法、合理解决；苏联决无意使外蒙独立意向。对此，两人均共同表示同意，并签名。

沈鸿英于 2 月 2 日，因东路讨贼军回粤，又拥护孙中山，请孙中山自沪赴穗。15 日孙赴粤。

18 日任蒋介石为大本营参谋长，并电命蒋速来广州。孙中山于 21 日到广州，任胡汉民为大本营总参议，徐绍桢为广东省省长。并重定各军防区。3 月 1 日，大本营重组完成，共设四部、二局、一库、二处。本年 2 月 3 日蒋任军委会委员。

此时蒋仍居家乡，或有时到上海一行，未遵令到广州。并又上书孙中山，主张先平潮、梅，暂弃广州。孙中山认为可以考虑。

令胡汉民、汪兆铭、邹鲁等到浙促蒋起行。蒋见众人纷至，更加自傲，又电请秘书长杨庶堪，让廖仲恺整理广东财政，杨接电后，很快复蒋，说孙中山正在研究，仍请他速来广州。3 月 30 日又电许崇智，请许军集结省城或北江，不可轻进惠州。

蒋虽在宁波或溪口，却书电往还，指挥着广州军政财一切，俨然是一个大本营代行机关。

光阴荏苒，不觉又到 4 月。蒋仍在家乡未动。4 月 7 日，他又电许崇智，又认为潮、惠一时难平，仍应以广州为根本。第二天又电杨庶堪，请孙中山任廖仲恺为广东省财政厅长和促许崇智集军广州，并以答应此二要求为赴广州必要条件。

蒋这种专断、固执，非己见不可的作风，令人难以容忍，但孙中山宽仁厚德，不予计较。

蒋终于在 4 月 20 日到达广州。4 日前，沈鸿英突然又叛，孙中山亲自督师，将沈击溃。5 月 7 日，孙中山任廖为广东省长；邹·鲁为财政厅长；叶恭绰为大本营财政部长，未理蒋的“安排”和要求。

赴苏考察

孙中山督师击溃沈鸿英后，继而进讨陈炯明。蒋随侍孙中山出入各战场。到 7 月 12 日，蒋又因不顺心而返乡。杨蓁代理其职。

孙中山命其于 8 月 5 日在上海会见苏联代表马林。并令其开始筹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准备赴苏访问，以考察苏联的党、政、军各方面的情况，了解苏联意图。由蒋任团长。8 月 16 日，蒋奉孙中山之命率代表团乘日船神九，自沪赴俄。代表团成员有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等。9 月 2 日到莫斯科。在苏联逗留三个多月， 访问了莫斯科、彼得格勒等苏联的党政军机关。当时列宁有病，未接见蒋介石。

蒋于 9 月 7 日和苏联政治局秘书罗素达克会面，听罗谈俄国革命史和建党情况约两个小时。蒋听后，将自己的感想记录下来，其内容主要是革命成功原因、缺点、突出的现象三个部分。成功原因是工人、农民拥护共产党和准许 150 个民族自治。缺点是工厂充公后无人管理；小工厂尽归国有，过于集中；利益分配困难。

比较突出的特点是儿童教育严格；工人都受军事教育；小工厂租给私人。同日，亦晤苏共东方局负责人维经斯基。

在苏联的日子里，蒋特别重视红军的组织工作，于 9 月 17 日参观了苏步兵一四四团，得知苏军团长负责指挥军事；党代表负责监督、行政事务、政治教育。这对蒋影响很大，他回国后，建立黄埔军校时，就采用了苏红军中的党代表制。此外又参观了有关军事技术学校。在他参观高级射击学校时，对苏联骑兵用的机关守枪，一射 35 发，十分欣赏，不禁想到自己国家武器落后，自愧弗如。

至 9 月 26 日，又参观苏联海军和彼得堡的皇宫。

10 月 13 日这一天，蒋于苏联外交部得见孙中山致托洛斯基·齐契林等人的信，信中多有对蒋的称赞和推重之语。蒋看后，感动得热泪盈眶。

对苏联的政治制度，蒋也进行了具体调查研究。他认为："苏联的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相同的。"[①]

接着，蒋于 11 月 25 日应邀参加第三国际的会议，见到季诺维也夫和东方局书记维经斯基（当时中译名为吴廷斯基、吴定康、吴廷康）等人。蒋在致答词时，特别强调了三民主义和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操纵的军阀；并希望第三国际多派人到中国了解实际情况。同日，中国国民党旅欧支部成立，王景岐为支部长，周恩来为总务科主任。

在苏访问期间，蒋与维经斯基见面最多，约 5 次。维经斯基劝蒋于西北建立根据地统一中国，不必再回广州帮助孙中山。蒋以回国请示孙中山为词婉拒之。他对季诺维也夫印象最坏，认为他外强中干，殊无振兴气象。对托洛斯基印象最好，认为他言行直爽；对他所提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道义、物质上的援助一事，更特别感兴趣。

在外蒙问题上，蒋留下较深的不快印象。蒋曾于 10 月下旬探寻孙中山大元帅府和苏联建交一事，但齐契林则认为外蒙"独立"问题不解决，无法建交。而对 1919 年和 1920 年废除对华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宣言，则避而不谈。蒋对此很受刺激，于 10 月 26 日即向齐契林写信反驳他的观点。蒋说："那天你说'蒙古人怕中国人'这句话，要知道蒙古人所怕的，是现在中国北京政府的军阀，决不是怕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如果苏联有诚意，就应该使蒙古人免除怕的状况。须知国民党所主张的民族主义，不是说各民族分立，乃是主张在民族精神上，做到互相亲爱的协作。你那天，叫我访问党部首领谈话，我很希望你先把我们这一段意思介绍到党部。"[①]

蒋介石坚持反对"外蒙独立"，但当时未曾料到，正是经他的手，签署了外蒙独立的条约。后来他曾为此深感疚愧，并自认有罪，是不可宽恕的。蒋签约的原因是怕进入东北的苏军扶助中共将他推翻，或扶助中共壮大力量将他的势力限制在长江以南，因而以"外蒙独立"来换取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但他不肯承认这点，便推说是已既成事实，无何不可。这当然不是理由，所以他不得不自认在此问题上负有罪责。

蒋介石对此次齐契林要"外蒙独立"的谈话，终生未忘，印象极深。从此，他对苏联再也不予信任，认为苏联有侵华野心，应当防范。

他在苏期间，还翻阅了《马克思学说》，对国家是一种镇压工具的思想颇有同感，认为其中也有至理存在。

[①] 《苏俄在中国》，第 28 页。 bb

[①]

11 月 29 日上午，蒋辞别越飞夫人，于下午 2 时启程回国。12 月 15 日回到上海。当天回宁波。孙中山希望他立即回广州汇报。而蒋却不遵孙中山之意，只将《游俄报告》寄上广州完事。 16 日又回到溪口老家，一个月后，才回广州。

黄埔上任

蒋回国后，在其报告书中，提了一些建议，归纳起来，主要是：

对苏联不可过于相信，苏有侵我边陲的企图；建立军校；撤换不称职高级官吏；在全国建立党的基层组织。

建军建党，他是直接从苏联学来的，但对苏联侵略意图，紧防不怠。孙中山对他的意见，认为可以面谈，要他快回广州。胡汉民、汪精卫等则一再致电函与他，促其尽速启程。廖仲恺则直接写信批评他，说他把国家大计视同儿戏。

蒋介石看了廖的批评信，却不觉伤感起来，认为谁都既不可信，也不可亲，天下之大，惟有孙中山和他的孩子们最可亲。他说：“ 世间唯一中师为可亲；此外则家中小孩子；余皆厌物也。 ”他虽对孙中山最为信任，却认为“ 天下事，惟有求诸已为足恃也 ”。

1924 年 1 月 16 日，蒋慢腾腾地回到广州。24 日，出任黄埔军校筹备委员长，王柏龄、邓演达、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宋荣昌为委员。2 月 21 日，筹备就绪，校址设在广州西南 40 华里处黄埔岛上。同日，蒋又离穗。

国民党第一届全会已于 1 月 30 日闭幕。此次一大全会，蒋未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这时，孙中山对他的反对联俄、容共的建议表示不能采纳，并且认为他对未来的中俄关系顾虑太过了。蒋一听此言，又突然离粤回乡，撒手不管了。廖仲恺急得甚至有自杀的想法；胡汉民当即给他写信，请他说明原因。蒋在上孙中山辞呈中回答说：“ 自维愚陋，不克胜任，请另选贤能。 ”孙中山批阅：“ 该委员长务需任劳任怨，勉为其难……所请辞职，碍难照准。 ”

到了 3 月 2 日，蒋干脆对孙中山把牌摊开，他抱怨孙中山不能对他专信不疑，不能言听计从，又抱怨孙中山当年不听他的话，致使有炮轰总统府之奇闻。最后坚决主张用人要有派系，要用老派系；对党，也要以自己的派系为依靠，言外之意是不能用中共方面的人，要用国民党老人。

他怕孙中山不听他的意见，又于 3 月 14 日给廖仲恺写信，劝廖切不可一意顺从孙中山：“ 吾辈不能因循苟且，专意顺从，亦不应使其固执己意，丧失同志人格，反为宵小所污辱，而致党自陷于不测深渊也。 ”[①]

他在信中明确提出反对联俄容共。他说：“ 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策成功者也。至于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 ”

总之，蒋介石游俄归来后，既吸取了苏联建党建军的经验，也立下了坚定的反苏反共信念。

[①] 《革命书简》，第 26～31 页。

但孙中山不管蒋如何反对，仍坚持了联俄容共政策，未理会蒋的反对。蒋怎么回广州呢？这不要紧，自有台阶可下。原来蒋离粤返乡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要求免去杨西岩的理财职务。这一要求被采纳了。而廖仲恺也复信，对他的“独立自主”之论，表示完全同意。于是蒋于 4 月 14 日启程返回广州。

这时，黄埔军校已经招人考生 3000 多人。

蒋于 4 月 21 日到广州。当日偈见孙中山。26 日到军校视事，5 月 3 日，正式被委任为黄埔军校校长（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他规定的军校课程有：人生观、革命史、军纪、军略、兵器、训练、卫生、典范令、士兵生活、军人要则、曾国藩治军语录。

他对学生的要求，是绝对服从和不怕死。他说：“军人的目的，也只有一个死字。”又说军人字典里没有难字，因而要军校学生们要以“杀身成仁”的精神，为主义而奋斗；又把不怕死精神称为“黄埔精神”。

6 月 16 日，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和夫人亲自参加。上午 9 时，孙中山发表讲话，提出“亲爱精诚”4 个字，作为校训。又手谕训词为：“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建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1927 年 4 月，蒋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时，又以此为国歌。蒋到台湾后，也未改变。同时又有军校校歌两个，此处引录第一个如下：

“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作奋斗的先锋。

“打条血路，领导被压迫的民众。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吾校精神，发扬吾校精神！”

反对“盲从”

1924 年 7 月 7 日，蒋兼任长州要塞司令，这是孙中山对他的信任，职位虽然不高，但蒋也已安下心来，进行军校工作。

为了把军校学生训练成忠于他的未来军官，他开始在思想上训练学生们的绝对服从意识，主要是以训话形式进行。

首先是讲解三民主义。他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同于西方民主主义政治学，而主要是从心理学、统计学、社会伦理学、哲学、逻辑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中提炼出来，又参考了其他科学，并根据中国的历史、法度、风俗习惯等最后形成的。

在讲三民主义的同时，又批判无政府主义，强调对三民主义要绝对信仰，绝对服从；凡是“怀疑三民主义或批评三民主义的人，就是叛党，那都是我们的敌人”。[①]

蒋介石的思想专制原则，从此己开始形成。孙中山从未说过准反对三民主义就是敌人，而是蒋介石提出来的。

同时，蒋曲解了孙中山的重大政策和思想。例如在革命目标上，孙中山是要首先打倒北洋军阀统一中国，而后废除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摆脱控制，成为独立自由的中国。而蒋则于 1924 年 9 月 25 日，对军校学生讲话时，提出革命目标“就是先要打倒帝国主义”。

[①]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第七册，第七编，第 34～36 页。

在军事训练上，也不执行孙中山的规定和对军队的编制，而实行自己的一套，树立个人的威信。对此，孙中山严厉地批评了他。中山先生说：

“今日开始练兵，犹不能行我所定编制，若谓练成之后，兵士长期都成了习惯，而后再行改制，则更难矣。此为我所定之制，则欲练成之后，仍可以应我方寸运用也。倘开练之时，已不能行我之制，则练成之后，我亦无心用之矣。”[①]又批评蒋：“本其日本士官、保定军官之一知半解，而全不知世界大势，不知未来之战阵为何物！……倘今日开始练兵之始，不行我制，待到练成时期，谓能听我之指挥，我决不信也。”[②]

蒋不仅以行动抵制孙中山的军事训练和编制计划，而且还为不执行孙中山的指示制造理论根据，在学生面前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主张。

他于本（1924）年 6 月 24 日对学生发表反对个人崇拜的讲话：

“我们革命是以主义为中心，跟着这个主义来革命，认识这个主义来革命的。决不是跟着一个人，或是认识一个人来革命的。如其跟着一个人，或是认识一个人来革命，那就不能叫做革命，那就叫盲从，那就叫做私党，那就叫做把他人当奴才、走狗了。”有一句值得特别注意：“中国人的思想习惯到如今，仍；日是几千年前皇帝奴隶的恶劣思想！”[③]

他这是对孙中山的威信而言的。他反对联俄、容共，而大家都随孙中山拥护联俄、容共，于是他先是给廖写信，要廖等不要顺从孙中山，要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继而又在青年学生面前，大讲反对个人崇拜。

当时孙中山要蒋按其手订章则训练，但蒋就是不执行，还指示王柏龄按照他自己定的章则办事，不许更动。

反对孙中山北伐大计

孙中山一直念念不忘北伐大计，忠心为国为民。1924 年 9 月 4 日，中央政治会议第七次会议决定北伐，并发表北伐宣言。5 日，大本营决定分二路进军江西、湖南；由胡汉民代行大元帅职权。

此次北伐，系实现粤奉浙（卢永祥）三角联盟，北伐曹、吴；同时借此扩充地盘，扩大革命根据地，减轻粤民负担。当时北方正值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之时，是一大良机。

但是，蒋坚决反对孙中山此次北伐，几乎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9 月 12 日，大本营设韶关。10 月 9 日，孙中山令蒋放弃广州，北上韶关，全力北伐，蒋不从命。

孙中山命他“将所有枪弹学生一齐来韶关，为北伐之孤注”。

他却要孙中山“早日回省”，并说这是“今日成败之最大关键”。以后几次电报往返，不管孙中山如何催命他迅速来韶，他就是一动不动，“稳如泰山”。孙中山心急如焚，毫无办法。

10 月 23 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曹锟，逐吴佩孚，直系大败。如果这时以黄埔学生军为核心，全力北上，加上樊钟秀建国豫军和赣、湘军、浙江卢永祥部则两湖可定，苏浙皖可复，再北上河南，与冯玉祥国民军会师，

[①] 《国父全集》，第三册，第 960～961 页。

[②] 《国父全集》，第三册，第 961 页。

[③] 《民国十五年》，下辑，第 286～287 页。

则可控制京津，威胁奉张，进而统一东北，再返戈南下，削平陈炯明、唐继尧，便可完成统一中国之大业。

但是蒋介石万事以个人为中心，其黄埔学生军，一兵未出，一枪未放，死守广州不动，其影响军心可谓大矣。使孙中山不能破釜沉舟，孤注一掷，致使各军因有后路可退，未能抵死一战，遂使北伐出军未几而终于失败。

1924 年 10 月 30 日，孙中山又回广州。蒋介石则始终未奉命而行。孙中山心里当然很不痛快，一直闷在心里，这对他的病体很不利，病势加重；加之孙中山北上，路途遥远，身体又特别劳累，于是一病卧床不起。

冯玉祥政变后，即电邀孙中山北上。旋北京政府也要求孙中山北上召开国民会议。孙中山于 11 月 10 日发表北上宣言。11 日，命新建军队改称党军，命蒋为党军军事秘书。13 日，孙中山北上。24 日自沪抵日本神户，停留 6 天，于神户高等女校讲演劝诫日本国民对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以予警惕和制止，并劝日本政府带头废除不平等条约。12 月 4 日返抵天津，驻张园，已开始发烧，肝区作痛。31 日抵北京。但段祺瑞拒绝召开国民会议，孙先生震怒，1925 年 1 月 20 日病情急剧恶化。26 日住进协和医院，确诊为肝癌末期。2 月 18 日，孙中山回铁狮子胡同行辕养病。归后病情无大变化。24 日孙中山胸胀，痰壅，不思饮食。26 日，医嘱准备后事。

2 月 22 日至 24 日之间，孙中山口授遗嘱大意，由汪精卫等写成。遗嘱共有两个：一个是国事遗嘱；一个是交代家事。致苏政府信，亦由孙中山口授大意，由陈友仁、孙科写成。3 月 11 日，孙中山在遗嘱上签字。12 日晨 9 时半，孙中山逝世。

孙中山临终时，目视宋庆龄，欲语无声。并没有提蒋介石和汪兆铭的名字，也未定接班人之事。只是病中谈及同事时，意由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三人负责，而蒋则负责军事，亦只是谈话中的意思，并无什么正式手续或文件。

孙中山死后，遗体予以防腐处理。先于协和医院进行耶稣教祈祷仪式，后抬入中央公园停灵吊唁。中央公园此后改名为中山公园。送殡者，沿途有 30 万人以上，由吴稚辉、戴季陶、汪精卫等多人抬灵柩至中央公园。

李石曾、汪精卫于 3 月 16 日选得西山碧云寺石塔暂厝灵柩，并派兵守卫，待南京奠都后，再归葬紫金山。

孙中山逝世后，蒋便对任何人也不再谈反对联俄容共之事，反而成为联俄容共的积极分子。

第一次东征与国民政府成立

孙中山北上后，陈炯明又卷土重来，进逼广州。代行大元帅、胡汉民任杨希闵为联军总司令，反击陈炯明叛军。这时蒋介石只是军委会委员和黄埔军校校长，兼长州要塞司令、粤军参谋长。蒋此时要求学生军和教导团参战，经孙中山允准，列入粤军右翼。蒋所以要参战，无非是既随讨陈宿愿，也可借此展露一下头角，又不失去黄埔根本。

蒋亲自率领 3500 子弟兵，于 1925 年 2 月 3 日上午 9 时自黄埔出发，参加第一次东征。蒋于这次东征前制定了《军队连坐法》，在东征中开始应用，初见成效。

于本月 4 日收复东莞、石龙后，心情甚是愉快，便在 10 日这天写了一首

七言诗。诗日：

“亲率三千子弟兵，鸱鸮未靖此东征。

艰难革命战孤奋，挥剑长空涕泪横。”

15 日，经过激烈巷战，蒋所部收复淡水，即向孙中山告捷。此次是蒋独立指挥的第一次大胜仗，俘敌 700 余人。但 3 月 12 日棉湖一役，教导团损失惨重，伤亡官兵 600 余人，约五分之一强，然终于转败为胜，20 日攻克兴宁等县城。

3 月 21 日下午，蒋得知孙中山逝世，率其教导团全军遥祭孙中山于前线阵地。孙中山死后，蒋介石把自己当成孙中山的忠诚门徒，自称为孙中山的弟子。3 月 30 日，蒋在兴宁城祭奠孙中山灵位，并写有挽联：“主义扬中外；精灵炳日月”。横额为“高明配天，博学配地。”同时又挽革命将士曰：“讨逆立功先我死；冲锋摧敌世尽惊。”横额为：“主义之花”、“革命结晶”、“死而荣”。

同时蒋发表演说，尊孙中山为国父。他说：“我们总理为中华民国国父”。尊孙中山为国父，是蒋于 1925 年 3 月 30 日在东征途 中兴宁城提出的。他在孙中山死后，尊之为国父，是一种尊上隆礼，是富于人情味的；广为民众所接受，至 1940 年 4 月 1 日成为定制。

4 月 13 日，成立党军第一旅，旅长何应钦。蒋任党军司令。复因杨希悯、刘震寰叛乱于广州，东征军于 6 月 8 日又回师讨伐杨、刘二部。6 月 12 日，蒋兼任广州卫戍司令，13 日平定杨、刘桂军。

讨平杨、刘后，工人罢工反帝的高潮席卷全国。6 月 23 日，英法葡帝国主义军队开枪射击中国罢工工人和学生，发生沙基惨案。

当场有军校学生 23 人死亡，170 人负伤工人等 60 人死亡。总计伤者 500 余人。广州革命政府对该三国立即提出抗议，但三国领事耍无赖，推卸责任。自 7 月开始，爆发省港大罢工，到第二年 12 月止，持续一年半之久，对香港断水，使香港成为死港、臭港，罢工领导者为廖仲恺。以英国最后屈服而告终。

蒋介石接到惨案发生电话时，立即变色流涕，深受刺激。他边哭边说：“帝国主义者，不以华人为生命，屠之如豕犬。国耻至此，我何以为生？乃即下船赴省，一路风凄日暗，举目皆无光色！”

广州政府于 8 月 4 日宣布立即和英国断交，禁止各国商船到香港停泊。并组织省港罢工委员会，领导和支持罢工运动，对英国进行了反击。

在反帝高潮中，广州中央政治会议于本年 6 月 14 日召开。召集人为胡汉民。会议决定成立国民政府。

7 月 1 日，选胡汉民，汪兆铭、张人杰等 16 人为国府委员；汪精卫任国府主席，五常委为汪和胡汉民、谭延闿、林森，许崇智。国民政府下设军事委员会，汪精卫任主席。蒋当时只是 8 个军委委员之一。国民政府正式成立。

8 月 26 日，公布国民革命军五个军的军长人选。国民革命军正式成立（见后）。

本年（1925 年）11 月 23 日，国民党中央委员林森、张继、居正、谢持等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西山会议，决议反共，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取消中共党人的国民党党籍等。参加此次会议之中央委员，史称西山会议派。

第二章　北伐与反共

第二次东征

1925 年春天的第一次东征，使广州政府得以巩固。7 月 1 日，国民政府成立。

国民政府成立后，首先面临的问题是陈炯明叛军的威胁。为巩固国民政府和北伐，必须再进行第二次东征。为此，自然必须进行经济、军事上的准备。

在此准备时期，蒋介石正是 39 岁，踌躇满志，但其地位并不太高，尚不是中央委员，只是军委委员、军校校长、长州要塞司令、广州卫戍司令各职。因此，他还必须继续奋斗，表现出自己的非凡才智和能力，作出突出成绩，以求上升；同时也寻机会，挤进中央委员会，并成为军队的最高统帅。

1925 年 7 月初，他写完了《军政意见书》。这是一篇很重要的军事著作。他在此著作中全面深入地论述了军事编制、经费、军火制造以及军校的增设和扩充问题。

他首先谈到军费问题。主张将广东每年收入 4000 万元的二分之一，作为军费。这是非常时期，军费比例自然大得惊人。

其次是军事编制。他认为广东省应组建 5.5 万人的军队，共分四个军区。第一军区为粤军，编组为 3 个军，约 3 万人；第二军区为湘军，编组为三个师，约 1.2 万人；第三军区为滇军，约 1 万人；第四军区主要为其党军，约 3000 人。共 5.5 万人。

他预计从 1926 年末到 1929 年初，可扩充军队为 8 万人至 10 万人。

军队的各单位编制，他也作了详细规定，有甲种师、乙种师和丙种师三种。甲种师是三团为一师，无旅级编制，以后北伐军多采用甲种师编制。

关于军备设施：包括船舰、兵工厂、军服厂、飞机场、航空学校等方面的筹划。

军事教育方面：他提出建立军官预备学校；改黄埔军校为高等军事学校；另设海军学校、军需军医学校；改良测量学校。

军训方面：则建议建立训练总监、各军军事教育委员会、检点委员会和各军师、旅团的政治部。

后勤供应方面：建议设置军需委员会、军需监督委员会、军费审计处。

以上这些军事机关，均直隶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关于改良士兵生活问题：他规定兵饷每月至少为 10 元，不能过低。

最后，他建议在广东训练农团学生军 10 万人的工作要于 1926 年底完成。

关于军费的分配额，他也作出了具体规划。5.5 万人的军队，每月 120——130 万元的军费。

对于北伐目标，也于此意见书中正式提出来。他认为应以湖南、江西或以两湖为第一阶段北伐目的地。并建议北代军至少要动员 7 万人。

以上是国民革命军建军的基本蓝图，随着蒋以后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务而逐步实现、完善和发展，建立起正规的军事力量。

因此这篇意见书，为蒋氏极重要的军事著作，这在他上升的 历程中，起到了奠基作用；这也是他为成功立业而奋斗的行动之与此同时，蒋设法尽量

在军校学生和军队中树立自己的革命形象。他经常对黄埔军校学生讲话，讲得很多。其中他主要灌输忠孝仁爱思想；同时也表达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他在 7 月 1 日国民政府成立的同一天给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讲沙基惨案的意义，谓此惨案在惨烈中，有一种光明在，烈士们死得其所，鼓励学生们为爱国而奋斗，而献身，蒋通过这些讲演树立自己的爱国主义形象。

他工作很卖力气，也很忙，很快就病倒了，并住进医院。7 月 7 日，他又于病院中向军委会上军事意见书 6 项，其主要内容是以中国的大西南和大西北为第二革命根据地。这是他通过沙基惨案的刺激而产生的想法，主要是对英帝国主义进行防备。他怕北伐开始后，英国从香港进攻广州，故而设想依靠第二根据地，与英方对峙。

但建立第二根据地之先，要于本年（1925 年）将两广连为一体，消灭陈炯明叛军，建立两广根据地（第一根据地）。然后，将云贵川湘 4 省置于国民政府统治下，经过三年准备，再与英帝国主义者决战。这在当时看来，或现在回想，都是荒唐的念头。这个想法改变了他早年要以打倒北洋军阀为第一目标的思想，而以反对帝国主义为革命或作战的第一目标，这是他在 1924 年 9 月 25 日对黄埔军校学生讲话时提出的。这与他反对孙中山在同年 9 月 12 日开始的北伐有关。他既要反对北伐就要用英帝国主义对广东的威胁做根据。

这固然还因陈炯明叛军未灭，而更重要的是他尚未抓到全部军权。等军权一到手，他仍是要北伐吴、孙及张作霖的。其第二根据的设想的秘密就在这里。但此第二根据，在抗战时期，完全用上。

在意见书中他又详谈了军事改革、财政统一、军队改编、筑路、统一广西等具体问题。

军事改革是要由军委会集军权于一身。财政方面是要各军财政交国民政府统理。总之，军政、军财均集权于中央，为他上台作详细筹划和积极准备。

由于他工作极为勤奋，以致积劳成疾，于写完意见书两天后，就鼻孔流血不止，晕倒在地，再次住进医院。住院后，又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于桂林建立“入伍生教练所”以备北伐之用的建议。11 日（7 月）又上书陆军部长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坚持将原先收编的陈炯明部逆军完全裁撤。21 日出院后又于军委会讲统一军队名称和打倒帝国主义问题。他建议各省军队的旧名称如粤军、湘军、滇军等尽皆废除，提出三个统一的军队名称：国民军、革命军、国民革命军。他以为国民革命军之名为最好。

根据蒋的建议，国民政府于 8 月下旬正式建立国民革命军。首先建立 5 个军，第一军军长蒋自兼；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继建第六军，军长为程潜；1926 年春夏之交，建立第七军、第八军，军长为李宗仁、唐生智。各军、师团营设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这是仿苏联军制建立的政治机构。初建时，连一级也设有党代表。

此国民革命军是蒋介石亲自筹划和建立起来的。

这时蒋既为黄埔军校校长，又为建军详加筹划，自然被政府倚为长城，并视为党军的创始人。其才干功劳均已开始放出异彩。

但顶头上司许崇智尚军权在握，不排除许，他就无法掌握全军，仅是一个军委会委员而已。为此，他也在寻找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同年（1925 年）8 月 20 日，上午 9 时 50 分，孙中山得

力助手廖仲恺先生在中央党部门口被反动派人物朱卓文（主持其事）、陈顺（杀人凶手）等刺杀。蒋以广州卫戍司令兼任特别委员会成员，专司廖案，立即在寓所召开特委会，决定捕人 名单。继而逮捕林直勉、梁士铎等嫌疑人物，处决张国桢。又因魏邦平、梁鸿楷也涉嫌廖案和私通陈炯明，通缉魏，扣押梁，继而将梁的军队解散。

9 月 20 日，蒋又以廖案涉嫌为由，将其顶头上司广东实力派陆军部长许崇智逼走。胡汉民也因其弟胡毅生素来反共，敌视廖仲恺，与廖案有牵连，被迫赴苏访问。

至此，开国元勋只余汪精卫一人位在其上。蒋就要登上政权的金字塔塔尖了。这是蒋的第一次军事“政变”。9 月 28 日，蒋任东征军总指挥，率第一军、第四军为主力军。另外还有建国豫军、建国赣军和程潜的攻鄂军等。

蒋在廖案前，曾遭两次谋杀暗算。第一次，是他自黄埔军校回城内办事处时，正巧自己的汽车坏了，就改坐侍从的汽车，先行开车进城。当他自己的车子修好后，侍从们便坐其车随后紧追。

该车有青天白日旗，刚驰到东坡楼附近时，当地驻军就向其开枪射击，车被打翻，两名卫士也被打死。而蒋介石却因自己的车坏而脱险。这样看来，好像是蒋有神佑天助，或“吉人天相”了。此次谋杀，系梁鸿楷旧部杨金龙所为。蒋回城后，立即将梁鸿楷找来，责成梁将杨扣押审判，并将杨旅调出城外。

后为保险起见，蒋就改驻在长州要塞司令部。不久蒋的如夫人陈洁如又来到广州，他又和廖仲恺一家移住广州东门外东山小洋房内，和廖家同走一个大门。一个多月后。蒋乘车到东城门口时，又遇到两个刺客。不过侍卫人员早两天已对此二人加以注意，见刺客抬手时，先行开枪，击中其一，遂当场将二刺客捕获。

据刺客供称，系蒋的老对头陈廉伯所派。陈洁如为蒋脱险，特别奖给卫士连连长宓熙银元 200 元，以示嘉勉。此后，蒋携其如夫人陈洁如又回要塞居住。

蒋任东征总指挥两天后，颁布《行军令》，详细规定军中的一切事宜。10 月 1 日上午和各军首长研讨军事计划。下午 4 时参加第一师誓师大会。晚上回到要塞司令部和夫人团聚。但此时他正为东征壮举感到重担千钧，顾不得和陈洁如亲热，即登上房顶，仰望碧空皓月，思绪万千，不禁喟然叹曰：“如此良夜，而佳兴索然；党国危难，惟吾一身当之，小子可不自勉。”这是蒋第一次独立指挥整个战役，尽管他当时心情很不轻松，但仍很自负；他虽口言自无佳兴，而其踌躇满志之态，却跃然而动，认为天下安危他已皆在其一身了。

为了使东征军军纪严明，出师告捷，他于 10 月 4 日又特别对东征军痛揭第一次东征时的种种弊端，以告诫广大东征官兵。主要弊端是：拉夫、贪污夫役工钱；打骂老役夫；擅人民房随意吃喝；下级军官有的怠情，有的嫖赌成性；官长虐待士兵；吃空额等等。

10 月 6 日，蒋下达总动员令。7 日晨 6 时起床，见朝霞满天，顿觉神志振奋。同时，忽又想到“国人萎靡不振，皆为可杀”，旋又自谓不免太过于忧虑了，应当自我戒慎方好！

蒋于当日电令陈炯明部叛军杨坤如自动退出惠州。杨不理。蒋于第二天即令何应钦督攻惠州，自己也奔赴前线。10 日到达博罗行营。途中蒋抓紧看

孙、吴兵书，当看到《虚实篇》时，不禁叹为观止，并认为孙子兵法，高于吴氏兵书。

到达博罗的第三天，蒋即偕何应钦到飞鹅岭视察阵地。午后到香祖园，当夜露宿于一古庙门外，大有“中天悬明月，将士惭不骄”之悲壮！

此次东征之战，分三路纵队，一齐出动。此时周恩来任总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副党代表、第一师党代表；蒋兼第一军长。

蒋的作战计划：采取中央突破策略，即先攻主力，再旁及两支。首先指向陈军主力惠州杨坤如部。惠州乃陈炯明老巢，三面环水，东侧枕山，易守难攻，城防险要，号称东江锁钥，自宋代以来，尚无人攻破此城。蒋用大炮配合敢死队 650 人进行强攻，每 个队员赏银 30 元，最先登城者，得头等奖 100 元。攻城战于 10 月 13 日晨 9 时开始，蒋于飞鹅岭亲自指挥。首先炮击城墙，然后自各门攻城。但各门均冲锋多次，未能奏效。团长刘尧宸阵亡于北门。

蒋见久攻无效，便于下午 2 时，将炮火全力集中，轰炸北门，炮火之后，即缘梯爬城。杨坤如欲登北城门督战，终因炮火密集，不能登城。至 14 日下午 4 时 30 分，第一军自北、西门攻入惠州。

杨率部自东门逃走，此战俘敌 4000 余名。惠州遂定。克惠州后，士兵每人赏银一元，猪肉四两。

刘尧宸团长被追认中将，并抚恤其家属银 5000 元。

这次攻城战甚为激烈，画家梁鼎铭数年后画成《惠州之战》，其复制本现存台湾。

蒋即日向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社会各届告捷。次日入惠州，绅商等出城迎接，蒋十分得意。

攻克惠州后，蒋于 17 日递交第一军长辞职呈。他说攻克惠州后，东征之事基本告成，为避免成为军阀，实握兵权，特去此军长实职，只任总指挥一职，以统一广东。这时他是在养晦，以表示他赤心为国，不存野心，从而赢得中央和国民政府以至苏联顾问们的信任，顺利升入中央领导班子，可谓“吃小亏占大便宜”。

国民政府于 10 月 19 日下令表扬蒋介石，谓其“忠勇激发，成此伟功”。同时奖何应钦、谭曙卿、陆瑞荣等。

在蒋介石率军东征的时候，其长子经国因受当时赴苏留学热潮的激荡，也决心赴苏留学。蒋不好明白阻挡，但也不表示支持，倒是陈洁如一心成全经国的志向，于 10 月 19 日送经国启程赴苏[①]，入中山大学学习。从此一别，至 1937 年蒋氏父子始得重逢。

攻克惠州后，蒋继续挥军阵前，扫荡残敌。24 日于埔心圩见八十老叟，神骨超逸，蒋油然而生敬意。此处山景奇绝，民风淳美，蒋为之赞赏不已，28 日，蒋到羊高圩时，不意谭师被敌军包围于华阳附近之塘湖地区，谭第三师纷纷溃退。

蒋立命第四团连长陈赓前去第三师传达命令，不许撤退。谭见今后，曾组织反击。蒋也赶到前线里圩指挥。但敌人林虎部一次侧击，谭师复又大溃，兵败如山倒，蒋也无法阻止。蒋见此状，急的要自杀，并大声说：“我必须在这里杀身成仁，我没有脸回去见江东父老！”陈赓此时急忙向前劝阻，并

[①] 蒋经国自广州回沪，于沪启程赴苏。

对他解释说：“你是总指挥，你的行为要对这次整个战事发生影响。这里毕竟一个师，而且还不是黄埔训练出来的部队。赶快离开这里吧！我们还可以把部队整一下，再打过来！”[1]经陈恳劝，蒋意转缓。正在这时，敌人已快冲到近前。陈赓背起蒋介石就跑，跑了几里路到了一条河边，赶快上船，遂脱险过河，回到羊高圩。

蒋到羊高圩后，重新组织第一、三、十一师进行反攻，击溃林虎部万余人。敌向梅林、安流溃逃。复又于河婆歼灭洪兆麟部 5000 人。东征军继而长驱直入，于 11 月 7 日平定东江。

此次战役称华阳战役，使蒋转危为安，又取得最后胜利。对此蒋介石非常重视，并动情自语日：“幸仗总理在天之灵，出奇制胜，转危为安。”回师后即令拆去惠州城墙，以除后患。

此役之后，蒋对陈赓特表感谢，还对陈甚表亲切之意，又送礼物，又调陈任侍从参谋，可以随便出入他的办公室，对陈“恩宠备至”。

此役之第三师溃败，给蒋留下深刻印象，他从中得出两个教训：一是作战兵力至少要达万人以上并集中使用；二是当敌人溃退时，切切注意其防线在什么地方，不可误中败敌突然反击之计。

从此以后，蒋之用兵均以重兵集中作战，后更用军团、集团军为一地区之大作战单位，以免被敌突袭时而无法互相策应。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又发展为大兵团作战。

蒋的总指挥部不久又移驻畸庐。蒋住一楼，周恩来往二楼，陈康也住二楼。有一天陈在蒋办公桌上发现了一本名册，看见每个共产党员的名字上都有一个红圈。在陈虚名字下则注：“此人是共产党员，不可让他带兵”。[1]陈第二大就托词看望母病请假回家。蒋遂问：“不是吧？你看了我的什么东西了吧？”随即委任陈为黄埔军校中校队长。陈于是被削去了小小的兵权。

可见，蒋之对中共的防范，从 1925 年 10 月、11 月间就已经秘密开始了。

战争刚刚结束，蒋在潮州的关岳庙读起泰戈尔这位印度大诗人的传记来，大有“乱中求静，武中习文”之概。同时，蒋也阅读列宁丛书第五种，关于赤卫军组织、牺牲价值，帝国主义破产等论述，他认为分析的很深刻、严谨。

蒋介石二次东征胜利后，威名大震，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等于 11 月 10 日，打电报给蒋祝捷，其对蒋之称赞，非同寻常，誉之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缔造者。电文云：“我兄建此伟功，成总理未竟之志，立广东统一之局，树国民革命之声威，凡属同志，莫不钦感。东征成功，省中大计，待诸商榷。……汪兆铭、谭延闿……”。[2]

此时，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就变成了关键人物，声望大增。

不过蒋介石这时，仍然不敢大意和轻率，仍是谨慎表现出谦虚和严于自责的品性。他曾对东征军此次出征中存在的问题，专上条陈与中央委员会和国民政府，陈清实情，谓东征军仍存在不齐整、擅入民房、任取食品、官兵脱节、官长打兵、官兵怠情等问题。

他既谦和谨慎，又言论左倾，亲苏、亲共、称颂第三国际，并学用马列

---

[1] 穆欣：《记陈赓将军》，1984 年版，第 20 页。

[1] 穆欣：《记陈赓将军》，1984 年版，第 22 页。

[2] 《国民政府公报》第 14 版，第 51 页。

主义词句和思路分析问题。这样，他既军功显赫，又得苏顾问鲍罗廷的好感，于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大门便为他敞开了。

跃升中央常委

在蒋氏东征告捷后，仍留在东江一段时间，在这一个多月中，他为黄埔第三期同学录写序言，大谈《大学》之道和忠孝仁爱的封建礼教，意欲青年军人成为封建礼教的奉行者，同时提出黄埔军校的中共党人活动应该公开化。

12 月 12 日，蒋又呈上《军事意见书》，提出废除军长一职，平时以师为最高单位；军需独立；军人不干预财权、民政、司法等。

这与他在东征前主张军需交由政府统一管理的理想完全背道而驰。原因很简单，前此未握全部军权，有顶头上司在，故愿其他军人交出财政而受制于政府；今则大权在握，又要军需独立，不受政府控制。

战后蒋极疲乏，往游韩山和湘子桥休息，下午读《泰戈尔传》。他认为，泰戈尔以无限与不朽为人生观基点，以爱与快乐为宇宙运动之意义，是值得欣赏的；与列宁的以权力与斗争为世界革命手段相比，他更重视前者的精神哲学。

正巧也在这一大，中国青年党党员常燕生发表的反苏文章，刊载于《晨报》副刊上。题目是《我反对苏俄的一个最大理由》。他主要是说列宁学说不同于马克思学说，因为马克思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是在高度发展了的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产生的，而不是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如俄国的社会中产生。因此，他说列宁主义不是马克思学说的嫡系。

常燕生认为苏联是专制主义政治，与孙中山的民治主义不同；　苏联是由少数领袖专权，“假共产之名，行专制之实”，[1]因此，非反对不可。

常燕生是一种民主主义自由思潮的代表。这种思想，在渴望民主、自由的知识界很有代表性，连蔡元培当时也反对共产主义，他在 1927 年 4 月，曾支持蒋介石组建南京政府。

这时的蒋介石，仍在汕头大声歌颂第三国际。并自称是革命左派，宣称能容纳共产党的，才是真正的国民党。并以此批判西山会议派。同时他在军校内则大讲《大学》之道，灌输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的封建道德。

蒋于 12 月 31 日回到广州，被授予一枚金质勋章，成为凯旋将军，众皆瞩目。

1926 年 1 月 1 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此次大会，以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党人占统治地位。大会主要是处分西山会议派反共分子和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

在这次大会上，蒋介石第一次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全体委员共 36 名，其中有中共党人 9 名；候补中委中有中共党人 6 名。

22 日，蒋又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之一，步人中央领导核心组织。下一步是挤掉常委谭平山、林祖涵，以及其他中共党人。

这一时期，蒋成了广州的政治新星和新闻人物，作了不少报告，喊了不少口号，尤其高喊联俄、容共、拥护第三国际的口号，“左”得热辣辣的，

---

[1] 《晨报》1925 年 11 月 12 日副刊。

令人信以为真。广州政界和苏联顾问们也真诚地为有蒋这样的左派而庆幸。殊不知，广州的国民政府正在接受一个大独裁者的控制。对此，斯大林当时也完全没有料想到。

蒋介石已经成了实权的铁腕人物，可以为自己打天下了，便对北伐有了新的解释。于是不再坚持“革命的第一目标为打倒帝国主义”，而改为北洋军阀。

1 月 4 日，蒋专门谈到打倒军阀，统一中国的问题。他认为，打倒军阀是先打倒帝国主义代理人，实质上仍是打倒帝国主义，因而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不承认有反封建的任务。从此，蒋开始向封建主义的立场作公开地转变。也可以说蒋心中潜藏的封建意识开始公开化。对蒋氏此论，中共有不同意见，曾与蒋发生争论。1928 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制造惨案时，他又害怕、妥协、退缩，连反帝也不敢坚持了。

这期间，他常讲军校是党的中心和党的基础，也是“全国的革命中心所在地”，而他蒋介石也就成了“中心的中心”。他在哪里，哪里就是全国革命的中心，这是在军校学生中树立他个人的威信，让学生们为跟随他而自豪，因而完全听从他的指挥。

从 1926 年 1 月到 3 月之间，蒋介石积极在暗中准备“三·二〇”小政变。他一会说自己心神不定“如不猛策，失败即在目前”，一会又对张静江说，莽莽前途，不知此生成败如何？又说“处境厄厄”，要“积极进行，冲破难关”。[①]看来都是话中有话，令人莫明其妙。他现在官运亨通，连升数级，位在中枢，军权独揽，苏顾问要搞掉他，何必给他中央常委之高位呢？他有什么可以如此忧虑和心情紧张呢？这太不合常情了。所以，他所言所想是在暗中准备“三·二〇”，心里有些紧张，感到成败难卜，不禁说出以上令人不解的隐语。最后终于决定“贯彻初衷”，已有成竹在胸了。

3 月 5 日，蒋读《革命心理》一书，认为“恐怖与憎恶二者，乃是暴动之动力”。这是在为他寻找制造事件的理论依据。

“廖案”中他赶走了许崇智和胡汉民，一举两得。下次要赶走汪精卫和限制苏联顾问，以便大权独揽，就不好再等机会到来，只能自己制造了。于是发动“三·二〇”政变，发动第二次不流血政变。

蒋于 3 月 19 日，命人口头命令中共党人李之龙将中山舰开往黄埔，而李开去后，蒋又否认曾向他下命令之事，说李要绑架他。

于是他说中共有野心，必须限制中共党人的权限，又谓汪精卫也参与此事。以此为借口，于次日逮捕李之龙等，包围苏联顾问寓听，解除苏联顾问 10 人聘约。4 月 16 日蒋由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联席会议推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于 4 月 20 日离开国民政府，由谭延闿代理主席。5 月汪赴法国居住。4 月 24 日，鲍罗廷返回广州，只好答应蒋的城下之盟。蒋便大权独揽，成为中枢第一人物。

5 月 15 日，召开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蒋任会议主席（5 月 28 日兼任中央组织部长，4 日又任国民政府委员）。17 日通过《整理党务案》8 条，主要是不许中共党人批评三民主义和孙中山；中共党人在国民党中名单交中央委员会主席保管；中央党部各部长不许中共党人担任；中共和第三国际对国民党内中共党人的训令，要先交国共联席会议通过；党员违反者，

[①]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十四，第 60 页。

要加以惩罚。

中共在斯大林指示下，接受了这 8 条意见。斯大林完全被蒋介石于“三·二〇”后仍高唱拥护第三国际的表演欺骗了。蒋说：“二年来本党联苏俄，容纳共产党，对革命势力之增厚，革命方法之进步，唤起民众及反对帝国主义之影响，实非浅鲜。由此观之，应认共产党为革命势力之一种，苏俄有助于中国革命。”[1]这是蒋介石和斯大林的第一次交手，蒋胜利了。这时蒋还离不开中共和第三国际的支援，所以不敢大闹，仍未和第三国际、中国共产党决裂。

7 月 6 日临时中央全会，蒋又提议本届中央执委会会议主席（蒋本人）不再由下次中央全会临时推举，要到下一届全国代表大会时，再行推举。蒋此次被推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主席，使中央从集体领导转向个人独裁。后来蒋看到元老们对此不服气，自己也觉没趣，就叫张静江代理主席一职，但自己仍不卸任。

对蒋的这些叱咤风云的表演，李宗仁在广西看得一清二楚，心里不免暗暗叫绝。他说：“汪氏既除，蒋氏表示左倾，……如此亦左亦右的手法，并非由于政治观点的改变，事实上，只是其个人的权术，以虚虚实实的姿态，排除异己，以达其个人独裁目的”。[1]

这就是蒋氏既高唱左倾，又限制中共和苏顾问权限的“三·二〇”政变的真意所在。李宗仁对蒋的分析如此精辟、透彻，也令人拍案叫绝。

准备北伐

蒋要独裁，另一步就是要制造思想和舆论上的根据。这时，他对《法国革命史》有了特别的兴趣。他在读后笔记中写道：“俄国革命的方法，非其新发明，十有八九皆取于法国。其经验实可宝贵。”同样，他也对《俄国革命史》大感兴趣，并仿效法、俄的集权制或权威领袖的独断。他认为：“俄国革命便因党的组织统一，指挥集中，有唯一的领袖指导，遂收大效。”[2]现在他上台了，就开始实行唯一的领袖和集中指挥了。不久前，孙中山在广州指挥一切时，蒋在 1924 年 6 月 24 日对军校学生大讲反对个人崇拜，批判中国皇帝。现在他又主张需要个人权威了，这时他已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军委会主席、中央执委会主席。

孙中山逝世一年之后，蒋介石终于夺得了党、军大权，于是开始考虑北伐大计。

1926 年 4 月 3 日，蒋正式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北伐建议，主张于同年 6、7 月间开始北伐。

他认为，乘张作霖和吴佩孚联合对冯玉祥国民军作战时，发兵北伐，是最好机会。否则，国民军失败，吴佩孚和孙传芳必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盘踞华中和华东；而英、日、法也必援助唐继尧，牵制两广。到这时，如再北伐，就困难了。这理由无疑是正确的。但若与 1924 年第二次直奉大战时相比较，孙传芳实力显然比 1924 年强大多了。然当时蒋念于个人私利，坚决拉北

---

[1]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香港版，下辑，第 636—637 页。

[1] 《李宗仁回忆录》，上，第 426 页。

[2]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香港版，下辑，第 672 页。

伐后腿。

蒋这次北伐的主要策略是：联合北方国民军；联络苏联；联络川、黔，以牵制滇、鄂；联合湘、赣，争取孙传芳中立；北伐第一目标为武汉。

在讨论北伐的会议上，蒋又规定信仰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要退出军队；中共党员必须忠于三民主义；中央执委会中，共产党人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对苏联顾问，则规定要辞去行政官职，只以顾问资格辅助中国革命。蒋对中共和苏顾问又作进一步限制，但口头上仍在拥护第三国际，感谢苏联援助。

李宗仁于 5 月 10 日赴广州游说北伐，蒋介石却不表示明确态度。他还对李宗仁说：“你初到广州，不知道广州的情形太复杂。……现在如何谈到北伐呢？”蒋的回答完全出于李宗仁意料之外。

后来经过深入了解，才知广州并元北伐准备，而此时李宗仁的军队已在湖南和叶开鑫部打得热火朝天了。因此，李仍到处鼓动立即出兵北伐。

当时苏联顾问对北伐既不赞成，也不公开反对，态度谨慎。陈独秀则表示北伐时机尚未成熟。其主要原因，是斯大林不愿蒋成功太快，也对北伐前途不放心。

当时，只有李济深对北伐最为积极。当 5 月 11 日召开军委会时，李宗仁以三大理由力陈兴师北伐大计：第一条理由也是乘直奉大战孙传芳未附吴佩孚之时，北伐最为有利；其次是两广统一余威可用，应助唐生智击败依附北军的叶开鑫，以保两广；第三是如果唐生智败北，两广危殆。最后，李呼吁克日兴师北伐！

李济深也慷慨陈词，强调今日北伐为千载一时，且已势成骑虎，不能坐视第七军单独作战。并提议由第四军先期北上。李济深最后大声疾呼：“第七军已浴血奋战，第四军也准备牺牲！希望其他各军袍泽，一致响应，共襄盛举！”（《李宗仁回忆录》上）李济深陈词之后，与会诸首要，元不为之动容，北伐大计一致通过。并于 6 月 2 日任唐生智为第八军军长和前敌总指挥。

军委会遂于 5 月 21 日发表时局宣言，决议北伐。

但蒋仍不主张立即北伐。经李宗仁一再催促，他甚至不耐烦起来。这时，蒋仍在观望。李宗仁和李济深自然多方揣测蒋的心理活动，他们最后认为蒋是在要北伐军总司令的头衔。于是向他表示，如北伐兴师，当推他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和北伐军总司令。

6 月 4 日二届临时中全会上，正式推蒋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授权蒋组建北伐军总司令部。次日由国民政府正式下委。此正中蒋氏下怀，北伐大计遂成定局。

蒋经过各种准备，于 7 月 1 日，下达北伐动员令：先定三湘，再克武汉，与国民军会师中原，统一中国。5 日，蒋又任中央党部军人部部长。次日又被推为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党军之职，至此均达极峰。7 月 7 日，制订《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共 18 条。其最重要的是北伐开始后，国民政府所属军事、财政各机关，均受总司令指挥，是集军权、财权于一身。

蒋部署就绪后，即于 7 月 9 日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李济深任蒋的总参谋长；白崇禧任副总参谋长；钮永建为总参议。同日举行誓师典礼，中央监委吴稚晖授军旗。国府代主席谭延闿授总司令印。

誓师大会誓词是：

“嗟我将士，尔肃尔听，国民痛苦，火热水深。土匪军阀，为虎作伥；帝国主义，以枭以张。本军兴师，救国救民。总理遗命，炳若日星。……复我平等，还我自由。嗟我将士，为民前锋，有进无退，为国效忠……。”

同时蒋又发通电、书告、宣言，表示自己是孙中山的接班人和信徒，为建立独立自主的中国和三民主义而奋斗。

北伐阵容，共 8 个军，以四、七、八、一军战斗力最强。

出师北伐

北伐誓师之前，蒋介石于 5 月 29 日命李宗仁第七军先期北伐，并支付 20 万元款项为军费。同时，李济深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也于 5 月下旬自广州出发，于 6 月 2 日到达湖南。

李宗仁广州游说成功后，于 6 月 18 日离穗返桂，19 日又乘专轮抵梧州，亲率 5 个旅北上三湘。

同天，北洋军阀吴佩孚部署四路大军云集湖南，誓与蒋介石北伐军决一雌雄。此四路军为：宋大沛第一路军，为正面战场；王都庆第二路军任右翼；唐福生第三路军任左翼；董政国第四路军为总预备队。

7 月初，国民革命第四军陈铭枢、张发奎两师抵湖南攸县；李宗仁第七军胡宗铎部发动攻势。唐生智第八军正在湘省作战。

到 7 月 14 日，蒋将全部军事部署开来，比吴佩孚晚了将近一个月。

他的初步部署是全力进攻湖南。李济深留广东，白崇禧随蒋参谋军事。其部署大略如下：第七、八军固守汨罗江南岸一线，掩护后续部队集中，并歼灭沉江残敌；第四军主力集中醴陵，监视江西孙传芳军，并占领浏阳；朱培德第三军，由衡阳向醴陵前进，策应第七、八、四军；谭延闿第二军（鲁涤平代）于茶陵监视江西，策应醴陵。而蒋之嫡系第一军一、二两师，却殿后于株洲，“策应”各军，程潜第六军于攸县待命。

第一军何应钦部，则仍在潮梅驻防，监视福建周荫人。

到 7 月 27 日，蒋才自广州东山启程北上。次子蒋纬国，还到车站送行，并且洒泪而别。途中蒋读了苏共建党历史资料，对苏共党史的兴趣大增，这时他已开始参考苏共的经验，来治理他的国民党。8 月 8 日，蒋于耒河舟中过夜。悠悠萧寺钟声，不时打破他的征尘之梦。第二天，蒋在船中草拟对吴佩孚作战宣言。次日早晨，经湘江抵达衡阳，沿途多有迎者，得知北伐甚得民心。

这时，北伐各军已连克湘省各城，继克长沙，全国各地军阀均为之震动，对蒋领导的北伐军，开始刮目相看。首先有贵州军阀彭汉章、王天培来归，任第九、十军军长。

至 8 月上旬，第四、七、八军沿汨罗江与吴佩孚北军相峙，战事处于停顿。第一期作战宣告结束。第一、三、六军也开抵湘赣边，准备投入战斗。

于此战事停顿时期，盛传中央准备对湖北采取守势，转攻江西。唐生智得知后，焦虑异常，即与李宗仁共同拟成意见书，送往衡阳呈蒋面阅。李、唐并于 9 日南下迎蒋。次日于衡阳匆匆见蒋一面，唐即回防。

李宗仁在广州说蒋北伐时，对蒋的印象颇为不佳，那时他对蒋的直感是：“严肃、劲气内敛和狠。”

这次又从白处得知蒋特别偏向其第一军，因而怨言四起。又知蒋治军凭

私情而不凭铁面无私的法纪，全不如他所说的那样大公元私。例如黄埔出身的中下级军官，因赌钱而发不下兵饱时，就向上级打报告，上级不解决时，就直接找蒋，按实况报告，蒋大骂一顿后，就写手谕，叫去军需处领饷不误。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蒋于 8 月 10 日夜，乘船偕李宗仁北上株洲，途中读《俄国革命史》，自言深感获益。11 日夜半抵达长沙。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苏联顾问加伦、战地政委会主任陈公博、前敌总指挥唐生智、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均已等候。

第二天晚上，蒋召开长沙军事会议，讨论第二期作战计划。

此时方本仁已加入国民革命军，暗受第十一军军长之职。孙传芳也已多次来电表示中立，但要蒋必须反共和铲除“过激党”。

冯玉祥则新败于南口，一时无力反攻中原。面临这种局势，北伐军必须采取远交近攻战略，方可统一中国。

蒋在会议上首先发言，他说，他在来湘省之前，有人主张弃鄂（湖北省）攻赣（江西省），以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并问有何意见？

李宗仁发表意见，他指出，应乘吴佩孚于南北两战场（北伐军和冯玉祥国民军之两战场）难于相顾之际，迅速北上击鄂，直取武汉。然后以大别山、桐柏山为屏障，扼守武胜关。北上可以进中原，直取幽燕；沿江东下，可三面包围孙传芳五省联军，底定东南，亦非难事。而孙传芳，因欲取吴佩孚、北伐军两败俱伤的渔人之利，现在必取中立，正可以各个击破。如先攻江西，则孙联吴，对北伐军极为不利。再者，如攻赣失利，新附各军亦必动摇，则大事去矣。

最后李宗仁下结论说，首先攻赣之策，实为兵家大忌。

经大家共同议论反复研讨后，蒋介石最后同意李宗仁意见，并采纳他的攻鄂良策。

遂部署第二、三、六军监视江西，于武汉攻克后，乘胜入赣。

主战场则以第七军攻击平江；以第八军之一部助攻；第八军主力和一、三军一部，会同进攻汨罗江北岸一线。

同日蒋复电孙传芳，请其归顺，并力言无论如何必须讨吴，而对于此外一切军人，均可联合，并许以五省总司令之职，以事羁靡。

进军武昌、南昌

长沙军事会议后，苏顾问加伦问李宗仁，打到武汉要多少天？李答以 20 天为期。加伦不信，认为要 40 天。两人打赌，赌注为白兰地。

14 日，第二期军事计划又有改动。以四、七、八军为中央军，由唐生智兼领；以二、三军及独立第一师为右翼，由朱培德兼领，集结醴、攸主线，监视江西；以九、十两军与贺龙师为左翼，由袁祖铭兼，速出荆、沙一线，肃清鄂西；以一、六两军为预备队，给中央军殿后。蒋处处保护其第一军，使其不受损伤。

同一天，蒋介石决定检阅第七、八军，以示关怀，并显威仪。检阅地点在长沙东门外大校场。第七军有 8000 人参加；第八军有 1.5 万人参加（两个师）。

这天天气晴朗，阳光普照，大校场上，旌旗鲜艳，更显得军容雄壮。蒋乘一匹高大枣红马，缓缓进入主帅位置，听取各单位报告受检阅人数，英姿

勃勃，威仪万千。

七、八两军排成横列，蒋介石由十余名将领分乘战马陪同，自右向左，按辔徐行；李宗仁居第二位随行；唐生智又紧随李宗仁马后，居第三位。先检阅第七军，顺利通过；到检阅第八军时，第八军别出心裁，忽然乐声大作，号兵又突然尖鸣，声音刺耳，蒋的枣红坐骑，受此一惊，长嘶一声，前蹄腾空，向大校场中心狂奔而去。蒋因不善骑马，瞬间跌下马来，但右脚仍然套在蹬上，整个身体拖在地下，极其危险。幸好即刻挣脱马蹬脱离危险。众将官纷纷下马将蒋扶起。蒋惊魂未定，气喘嘘嘘，一身全新军服沾满了泥污，帽丢靴落，狼狈不堪！但蒋仍坚持率众将官，徒步阅兵，一拐一跛地阅兵完毕。

最后蒋发表讲话，对两军训勉有嘉。并指出军队要服从革命领袖指挥，服从三民主义。服从上官就“是服从党和主义；上官是党和主义的代表”。同时提出 4 句口号：“不怕死，不要钱，爱国家，爱百姓。”

阅兵已毕，蒋介石主动和李宗仁结为金兰之好。李宗仁不敢接受兰谱，蒋硬将自己写的金兰谱塞进李的口袋。兰谱誓词是：“谊属同志，情切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誓词后面写蒋中正和“妻陈洁如”字样。几天后，李宗仁照葫芦画瓢，也给蒋写了一个兰谱。李宗仁所存蒋的兰谱，于 1929 年春，丢于上海。从此，“兄弟”二人就常常兵戎相见，直至抗战开始，才又暂时合作。

在进军开始前一日，蒋派蒋作宾到东北游说张作霖，张答应不助吴佩孚，保守中立。18 日，中央、右翼军一齐北上；唯左路军仍在观望。

中央军又分两路纵队，唐生智任总指挥。左纵队为唐之第八军；右纵队为四、七军，由李宗仁指挥，首先强渡汨罗江。

吴佩孚见长沙失守，感到北伐军确实厉害，于是决定倾巢南下，认真对付北伐军。但因南口大战尚未结束，其精锐之师一时难于到达湘鄂，便就近组织军队固守汨罗江，由陈嘉漠代理湘鄂督办统一指挥防守战。

19 日，北伐军发动攻击。李宗仁第七军首先涉江强渡，当日渡过汨罗江。

正当战斗激烈进行之时，蒋于 19 日上午游岳麓山，祭扫黄兴、蔡锷墓茔，又访万寿宫、万寿寺、岳麓书院，至晚 7 时，方归行营。于此战阵厮杀之际，蒋离开指挥所，雅游山林古寺，也足见蒋氏“大将风度”。

李宗仁第七军和第四军，渡过汨罗江后，直趋汀泗桥，一路追击溃兵。

蒋于 8 月 20 日，发表对外宣言，警告各国政府，切勿假不平等条约，妨害国民革命军作战和危害我国国民，否则惟有攘之、辟之；凡不妨碍国民革命军者，其生命财产予以保护。

吴佩孚见势不妙，率刘玉春、陈德邻、靳云鹗等数万精锐之师，自保定南下增援，25 日到达汉口，决定先死守汀泗桥。

此前，蒋于 23 日，召开了羊楼司军事会议，决定分 4 路攻取汀泗桥。25 日夜，第四军迫近汀泗桥，守敌为宋大沛、董政国残部，陈嘉谟率万余人增援。

该桥水深港阔，甚是险要。第四军激战数日，未能奏效。

26 日，江水暴涨，只有望桥兴叹了。敌人也因此麻痹大意，高枕无忧。于是陈铭枢第十二师三十六团团长黄琪翔，献计夜渡。因敌不备，夜渡成功，遂于拂晓自敌后发动突然攻击，敌兵不知所措，正在慌乱之际，叶挺独立团乘势发动正面攻击，前后夹击中，守敌夺路而逃。27 日上午 10 时，攻克汀

泗桥。此战双方死伤颇重，惨不忍睹。

吴佩孚无可奈何，只好退守贺胜桥，并亲自到贺胜桥督战。守该桥者为吴精锐之师。

攻桥前，蒋介石又在咸宁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决定由李宗仁指挥攻取贺胜桥，直捣武汉。攻坚战全由第七、四军担任，他的第一军处处殿后，予以保护。何应钦部仍在潮、梅未动。唐生智第八军为总预备队，惟以何键师自嘉鱼渡江，绕攻汉口，以拊敌背。

会后李宗仁即指挥第四军攻正面，为中路；第七军分为左、右两翼，在四军两侧，与第四军并肩前进。

30 日李下攻击令，并亲临前线督战。

此役甚为惨烈，吴佩孚为阻止官兵后退，以大刀队和机关枪督阵，见后退者，立即处死。吴佩孚手刃后退旅、团长数十人，悬头于电线杆示众，残绝人衰。因此，吴军抵抗极为顽强。四、七军拼死冲锋，分割包围敌人，各个击破。敌军不支，忍无可忍，反身向自己督战部队开枪射击，杀出一条血路，一哄而逃。李宗仁遂于当日攻克贺胜桥，继续追击残敌，于 31 日黄昏，兵临武昌城下。

这时，苏顾问加伦不得不在李宗仁面前认输，并相对放声大笑，庆贺胜利。自 8 月 19 日到 31 日，才 12 天就打到了武昌城下，比李的原估计 20 天，早到 8 天。

四、七军到达武昌城下后立即爬梯攻城，旋因伤亡太大而停止。

北伐湘鄂，李宗仁第七军和第四军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而蒋的嫡系部队，尚未出一兵一卒。蒋继而又于 9 月 1 日委李宗仁为武昌攻城总指挥，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为副总指挥。二次攻城未破。

同时蒋决定于 5 日以前对江西发动攻击，以免孙传芳在武昌攻城战时，自江西和长江侧击北伐军。9 月 3 日，蒋又于武昌城南召开攻城会议，严命于 48 小时内攻克武昌，并且说：“一定要攻下！”

各将领闻言，不禁面面相觑，未发一言，于是又开始第三次攻城。李宗仁这时对蒋开始不满，抱怨蒋遇事往往知其不可而为之，不顾现实，总喜欢蛮干。此时蒋调刘峙第二师接攻忠孝门，并立赏格，凡登上城垣者，长官赏大洋 200 元，士兵赏 100 元，最先登上者，赏 300 元。

同时命何应钦于潮、梅向福建攻扰。何应钦所部为第一军第三师和张贞新编独十四师。

5 日，李宗仁开始第三次攻城。正攻城间，蒋忽然邀李宗仁一道赴城廓视察。李见蒋于枪林弹雨中，态度从容镇定，颇有主帅风度，不禁又暗暗对蒋佩服起来。这时，蒋才感到攻城无望，立即下令停攻；吴佩孚也正在汉阳指挥作战。

同一天，武昌守军刘左龙附义国民革命军，被委为第十五军军长。刘反转炮口，轰击汉阳查家墩吴佩孚驻地。吴氏仓惶逃走。自河南增援之吴军，也被刘左龙军阻扼不能前进。9 月 6 日，北伐军占领汉阳。7 日，进占汉口，只余武昌孤城。攻克武昌，只是时间问题了。

进军江西，攻击孙传芳军，是第二阶段北伐的开始。

孙传芳军中有一位中国第一流军事战略家，叫蒋百里，正在为孙策划谋略。在北伐军强渡汨罗江时，蒋百里曾向孙传芳献计三策：上策是乘北伐军北上和吴佩孚交战之际，以重兵自江西向湖南进击，占领长沙，切断北伐军

归路，与吴佩孚合击北伐军；中策是待北伐军围攻武汉时，孙传芳可指挥海、陆大军溯江而上，解武汉之围，使吴军与北军相峙于武汉以南，然后待机而动；下策是固守江西，以逸待劳。

但孙传芳对此均不感兴趣，他想的是：待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再从北伐军手中夺过武汉，使五省联军成为七省联军。故眼看吴佩孚溃败，也不支援一兵一卒，正中蒋远交近攻之计。故 8 月 31 日北伐军兵临武昌时，孙传芳即令浙江省总司令卢香亭进驻江西，准备从北伐军手中接过武汉，控制两湖。

世界上的事情，总不能尽加人意，孙传芳的算盘珠拨错了，未等他西上武汉之时，蒋介石于 9 月 6 日部署三路攻赣计划：第一军第二师和二、三军为右翼，自赣南循赣江北上，由蒋亲自指挥，进攻南昌；第一军第一师和第六军，为中央军，由程潜指挥，自修水、武宁，直取德安，截断南浔铁路；第七军任左翼，沿长江南岸人赣，经阳新、武穴、瑞昌，直捣九江孙传芳总部。同时北向戒备长江。9 月 10 日发动总攻击。同一天，唐生智第八军沿京汉线北上，追击吴佩孚。吴自孝感逃到信阳，转依其旅长田维勤。

9 月 19 日程潜第六军第十九师因邓如琢部主动放弃南昌，仓促进驻南昌，但立足未稳，又被郑俊彦师回马一枪，赶出城外。

浙军卢香亭新娶小妾，神思不安，恨不能马上回浙才好，无心在赣作战。

蒋得老乡从内部报告卢军实情后，又组织反攻，以第三军反攻南昌；第六军等待合攻南昌；第七军攻九江孙总部。

1926 年 10 月 11 日，第二、三军和第一军第二师再攻南昌。12 日，蒋亲临南昌城南门指挥作战，但背水攻城，为兵家大忌。为此，白崇禧当时不同意围攻南昌，但蒋仍坚持攻城，不接受白之意见。白亦只得服从。结果冷不防，城内敌人敢死队突然冲出，黑夜中将攻城军第六团几乎全歼，攻城各军仓惶撤退。这时蒋急得紧紧抓住白手，不断问：“怎么办，怎么办？”白命全军沿赣江南撤，然后以浮桥退回赣江西岸。

此次惨败后，蒋暂停作战，对第二阶段第一期作战进行检讨。

于蒋南昌攻城失败同时，李宗仁第七军却于王家铺大获全胜。

蒋将这次失败，归之于没有无线电话机。他说如果有 10 架无线电话机，江西战役早就解决了，因而于 14 日电请方鼎英教育长（黄埔军校）和陈果夫，设法购买无线电话机 18 架。

又调铁军——第四军之陈铭枢第十二师和张发奎第十师来江西作战。他说，只有第十二、十师来江西，才能击破孙传芳逆军，否则，北伐就完全失败了。

同一天，在高安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叫做《肃清江西计划》，由李宗仁、白崇禧制定，为蒋采纳。计划内容三项：

首先是购置无线电话机，修筑临时飞机场；其次是补充兵员弹械；最后是指挥系列的安排。总指挥蒋中正，左翼指挥官李宗仁，右翼为朱培德。蒋之第一军第一、二师又是预备队。另有飞机三架备用。

李宗仁负责肃清赣北，截断南浔铁路；中央军自奉新向南得路进攻，占领乐化车站，然后和左翼军夹攻涂家埠车站：右翼军，自万寿宫经过南浔路之蚊桥，牛行西车站，再南下包围南昌。总方向是截断和占领南得铁路，然后围攻南昌。

11 月 2 日开始总攻。11 月 6 日，贺耀租独二师占领九江。8 日；朱培德第三军占领南昌。9 日，白崇禧率军追击残敌，俘敌 3 万余人，江西全境肃

清。下午 2 时，蒋入驻南昌，建立大本营。

此役共歼敌 6 万人，国民革命军牺牲约两万官兵。

蒋于战后将所俘孙传芳军队，编组成预备军团，准备很快使用。

准备反共

蒋建大本营于南昌后，重点是解决经济问题和为反苏反共做准备，以根本上与中共、苏联决裂。

现在他有两广、湘鄂和江西，已是五省霸主，又有自己的第一军和反共同路各军为实力依靠，便决心不再伪装，不再受“屈辱”。他说他已经忍受了三年。但他现在还不能马上就变，而是在暗中准备变。所以在公开讲话时，仍是老调重弹。

11 月 13 日，在宴请九江各将领时，他预计 1927 年 11 月可以打到北京。

同一天，张作霖也在天津召开军事会议。讨论联合对抗北伐军问题。张宗昌、褚玉璞、孙传芳代表参加（吴佩孚未参加）。

蒋在宴别中央专使古应芬时，又谈北伐胜利的原因，认为主要是唤起了民众和得到苏联的支持，但未提容共问题和中共党人对北伐的贡献。这是蒋改变政治策略的一个讯号。

在南昌期间，蒋除了讲话、接见、开会外，还制订了军事整顿和经济调查计划。

军事方面的整顿内容是建设更完备适用的军事机关、编制，加强考核、监督、德智体育以及科学技术的教育；提高供给、卫生水平等。

经济方面，提出在总部或政治部设立经济科，下设土地、农产、工业、矿务、交通、浚河、市政、金融、公产、盐务、粮食诸股，负责以上各种经济工作。

这时，他已开始试探日本方面的态度，准备和苏联脱离。遂于 1926 年 11 月 19 日，派戴季陶赴日一行。其访日内容，绝对保密，无文字记载。实际上是和日本裕仁天皇的党羽进行联系。

12 月下旬，裕仁的叔父东久弥宫因大正天皇病死，自欧洲归国，旋奉裕仁之命，来华执行裕仁的秘密外交任务，用化名常驻北京。

其主要使命，是使蒋介石的北伐能对日本有利。后经过多次密谈，蒋和天皇之间达成一个秘密协议，就是蒋首先从内部清除中共党人，然后天皇支持蒋统治长城以南的中国地区。而长城以北的中国领土、满洲和蒙古则由日本控制。并且等蒋的统治一旦确立后，要将西方企业家赶出上海，而由日本提供一切经济、技术援助。

这个密议，对蒋来说只是权宜之计，他并没打算实施，其目的，是不使日本干涉他的北伐。

与此同时，蒋又和江浙财阀联系。上海大企业家代表虞洽卿，专到江西见蒋，如果蒋反共，他们答应给予蒋介石以经济援助。蒋暗中答应。

为了对世界各国，对全国资本家和地主、乡绅们表明他的政治立场，他在接见《自由西报》记者时，就公开表明他革命的目的，只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废除治外法权和租界；收回海关权。对平均地权只字不提，更无民主二字。

蒋在外交、经济上为公开反共做积极准备；在政治组织上，蒋也加快了

步伐。他在南昌对来江西的黄埔第四期学员讲“同学会”性质时，就曾特别指出，同学会所以采用会长制而不用委员制，乃是要以会长为中心，无论什么事情，均要由会长即他蒋介石来做决定，并以他的精神为同学会的意志和团结中心。因此，他强调：“惟有拿会长的精神来做一个团结的中心……我们同学没有一个中心精神，怎么会团结起来呢？”[①]就连蒋任命的同学会秘书，谁若反对，即被认为是反对章程、反对同学会、反对蒋本人。

此时的蒋介石已开始着手组织法西斯性质的团体，“同学会”

即是其最早的法西斯组织的雏形，这是他建立个人独裁制的正式起步，其个人独裁的思想体系，至此已基本形成。

对政治权利的独裁，蒋也开始尝试。例如他在同年 11 月 12 日，就未经中央执委会和常委会讨论，擅自任命唐生智为湖北临时政治会议主席，朱培德为江西临委主席，然后电告中央备案。

在迁都问题上，蒋公开声言同意迁都武昌，并发表通电，提出以迁都武汉为宜；但又说他不能住在武汉，必须住在南昌。[②]而在实际与中央委员磋商时，又力主迁都南昌。他很想把首都握在自己手中，使中央完全听他的摆布。但南昌太偏僻，根本没有当作首都的条件，大家都不赞成。各委员们纷纷到武昌，将蒋孤立于南昌。11 月 26 日，中央议决迁都武汉。12 月 5 日，广州停止办公，各委员先后抵鄂。蒋没有达到目的，就是死赖着呆在南昌，不到武昌来。李宗仁说蒋又在“私心自用”了。

在党务方面，他也在为他的个人独裁和公开反共作准备。这主要是他公开宣言他就是党，党就是他，亦即“朕即国家”。他在 12 月 3 日的江西省党部讲话时，竟说出“现在我指挥下之国民革命军，只要我自己服从党，其余的均决无二心”。[③]这就是说：军人服从他，就是服从党，因为他是服从党的。言外之意是军队都听他的，政府也应听他的，也就是听党的，因为“他是服从党的”。同时特别强调党的“统一”问题，乍一听颇费解，不知所指为何。但一看他的有关言词，也就明白大半了。他特别要求中央诸公指导他“赶紧负起责任”，“切实进行党务，党没有不统一、革命没有不成功的”。原来张静江尚在代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之职，现在应由蒋亲自主持中执委会议了。如此做来党也就统一了，革命也就成功了。

中央执行委员会于 12 月 7 日在庐山召开会议，议决下一步计划。

开会前，12 月初，蒋迎接各代表到南昌，甚是热情。在 12 月 2 日对各委员讲北伐胜利原因时，对苏联和民众的支援完全未提，只说有三民主义和稳固的后方，以及中央党部对他的绝对信任。这最后一条才是他的本意。不言而喻，这是暗示中央对北伐根本未管，一切皆蒋氏本人决定和运筹的结果。这是蒋为脱离苏联和反对中共而进一步透露的讯息，也是进一步在作舆论和思想方面的准备。

在对待工人问题上，蒋也转向明显的冷淡和漠不关心。在委员们和苏顾问到庐山开会时，路过德安，就有很多衣衫褴褛的工人，拿着小旗子请愿，他们为阻挠孙传芳军队推进和破坏孙传芳军队的军火运送，已三个月未领工资。现在胜利了，又一个月未领到工资了。他们派代表见蒋介石，蒋却拒绝

[①]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一九、八，第 64～65 页。

[②] 毛思诚：《国民十五年》，一九、八，第 54～60 页；《时报》，1926 年 11 月 24 日。

[③]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十九，九，第 8～9 页。

补发，只答应给一个月的工资，并声言不能替孙传芳还债。但即使一个月的工资，蒋最后也未发给一文钱。蒋还解散原有的铁路工会组织，不予承认。

这时，蒋介石就在车厢里，听来好不自在，但一声也不吭，只得强忍着，而且还表现出一副尊严的神态和威仪。

反过来，蒋对富户、商人却答应偿还孙传芳的公债，并已开始一一照还，以德报怨。他们支持孙传芳打北伐军，蒋倒替他们还公债；而工人支持北伐军打孙传芳，蒋却连饭钱也不发，可见蒋的思想立场是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后来，他对日本军国主义，也“以德报怨”，其间似有较深的内在联系。

这次庐山会议形成两项决议：

第一项是消灭孙传芳，联络张作霖；第二项是工运从缓，农运加快。蒋仍主张以收买大地主土地方式解决土地问题。

这时张作霖终于 12 月初组织了安国军。孙传芳残部和张宗昌、褚玉璞军也均隶于安国军系列。张在准备对付北伐军。

在这次庐山会议期间，蒋对苏联访华代表达林说，他想到苏联中山大学任教授。达林在回忆此事时，挖苦他会耍手腕，令人发笑。散会后，委员们纷纷下山，他为笼络人心，对委员会的轿子安排都要过问，迎来送往总是满面笑容，彬彬有礼。

“此地以为别，孤蓬万里征”，大多数委员们就此和蒋介石分道扬镳了。

庐山会议后，在北京政府任职的黄郭来到南昌。黄一到南昌，武昌和九江的党报均纷纷抨击黄郛，说他是北京政府的走狗，不得混迹于革命阵营。蒋则说黄是他的朋友不许抨击。

12 月 13 日，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召开联席会议，在政府未完全迁移武昌时，联席会议执行党政最高职权。联席会主席为徐谦，委员有徐谦、宋庆龄、蒋作宾、柏文蔚、吴玉章、孙科、陈友仁、王法勤等；鲍罗廷为列席；叶楚仓为秘书长。

该会议开始批评蒋介石的独裁、专制，指出其权力已在中央委员会和党之上。

1927 年 3 月 10 日三中全会通过决议夺回蒋的军权：凡军委会决议要由中央执委会议决；总司令动员令要由军委会 7 人主席团讨论，通过后再交中央执委会批准。而且 7 人主席团中必有三人为非军职人员。该主席团又由中央执委会推选。总司令不得擅自决定一切和任意下令。

蒋介石对此坚决拒绝，说战时总司令必须独断，这是自己的责任。并说他愿意辞掉总司令职务，“如果我愿意做总司令，那末我就不是蒋中正。”

1927 年 1 月 11 日，蒋亲自到武昌参加联席会议。在会议期间，他和鲍罗廷开始了公开的斗争。他指责鲍罗廷破坏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鲍罗廷则警告蒋介石：谁镇压农、工运动，反对共产党，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打倒他的。蒋则反驳鲍氏，说他的话没有任何根据，又说苏联已不是三年前的苏联，已被世界上认为是赤色帝国主义者了。并且现在不是我们放弃孙总理的联俄政策，而是你来阻挠我们执行总理的联俄政策。[①]

其实蒋反苏反共之心早已有之，决不是由于鲍氏的“破坏”。

从此以后，蒋和鲍罗廷就公开决裂。1 月 27 日，蒋就公开提出驱逐鲍罗廷，强调以独立自主为原则，主张不受外界任何影响。当然，武汉政府决不

[①] 蒋介石：《庆祝国民政府莫都南京欢宴席上致词》，1927 年 4 月 18 日。

会理会蒋介石的唠叨，于是南昌和武汉间的斗争，进一步激烈化。

宁汉对立

蒋介石一面和武汉中央进行不妥协的暗中斗争，一面继续制定北伐计划。新的北伐计划于 1927 年 1 月 6 日制定完成，主要任务是底定苏浙，占领上海。

主要分三路进军：

东路军：由何应钦任总指挥，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挥，自福建指向杭州、上海。

中路军：由蒋本人任总指挥，辖程潜江右军（南岸）和李宗仁江左军（北岸）。江右军向皖南挺进，策应何应钦东路军作战。

江左军则牵制安庆之敌，指挥新起义的皖省军队，相机攻取寿州、合肥，使敌不敢向江南增援。

西路军：唐生智任总指挥，俟机由武胜关进取河南，主力控制京汉线南段。东向策应皖省作战，挺进豫东；西上监视鄂西残敌（于学忠等直系残部）于襄樊。

总预备队，由朱培德任总司令。

1 月 26 日，东路军开始进军，2 月 18 日，收复杭州。然后白北指上海；何西向镇江。

此时，张学良到徐州支援孙传芳；张宗昌亦抵南京，并于 2 月 27 日接防上海。

2 月下旬，蒋介石中路军相应东进。李宗仁江左军由于陈调元等纷纷起义，兵不血刃，进驻合肥，底定皖省，使上海北军归路西侧受到威胁。张宗昌上海守军毕庶澄，遂弃守北逃。周恩来于 3 月 21 日领导上海起义成功，组织上海市特别委员会，占领上海警察局。白崇德于同日进驻上海。3 月 22 日，何应钦占领镇江。

程潜第六军于 3 月 23 日占领南京，孙传芳残部逃走。

江、浙、皖、赣、闽、湘、鄂、两广、贵州，悉归国民革命军所有。

武汉中央于 1—2 月间考虑罢免蒋介石总司令职，拟由李宗仁出任总司令，由鲍罗廷出面和李谈。鲍对李说，不能再让蒋任总司令了，否则他要成为大独裁者，革命势必前功尽弃，我看李将军最堪接替蒋职。

李宗仁敦厚有余，一听此言，非常惶恐，便正色辞谢不敢，并一连说本人为国为民，不敢争位。同时他也由于暗中对苏联、中共不满，认为他一出任，国民党必然分裂，元人能领导中央党、政。

如此一来，则国民党便不是中共对手，会土崩瓦解。因此，他决心不干总司令，以求国民党之团结一致。

程潜第六军和第二军（鲁涤平代）于 3 月 24 日在南京举行入城式后，有些士兵出于民族义愤，攻击美、英、日等国领事馆。下午 3 时，美、英两国炮舰突然向南京军民开炮，炸死平民 15 人，重伤 9 人；军队官兵被炸死 24 人，炸伤 7 人，造成有名的南京惨案。而美国死 1 人；英国死 3 人；法国、意大利各死 1 名传教士，和中国死伤人数相差悬殊。

蒋介石于 3 月 31 日在南京总部招待日、美、英、法等国报社记者，发表专门谈话，说明总部负责调查，如果确系革命军所为，“当有相应办法”，

“但英美军舰开炮前，并无提出任何警告，当向南京外人当局提出抗议，要求赔偿损失”。但措词很不强硬。他第一次和帝国主义者交锋，就有些软弱无力。

这次日本人特别表示了沉默和克制，未随英、美开炮，其根本原因是为了使蒋介石的北伐进入有利于日本利益的轨道，怕蒋介石不执行密约，以至于元决心和苏联脱离关系。同时也怕未及收容好的日侨，因开炮而被害，因为日侨比英、美在南京的侨民要多得多。

蒋介石既已和武汉中央公开表示对立，又和鲍罗廷吵了一架，加之他早已在南昌为和苏联、中共分道扬镳而积极准备，便决心迅速脱下伪装，另立国民党中央和另建国民政府。

蒋于 3 月 26 日到上海，决心“清党”。但他对报界发表谈话时仍否认他与武汉中央的强烈冲突，并说各领袖间仍和衷共济，无大不合处，国民党也不会分裂。3 月 28 日李宗仁到上海，先见到白崇禧。这时白的总部已被工人群众包围，白很沮丧，表示要抑制上海工人运动。随后李又见蒋介石，蒋也面色沮丧，并且声音已经嘶哑。还口口声声说：“我不干了，我不干了！”李问其原因，他说何应钦要辞职，而且他已无法掌握第一军。这是因为黄埔学生对他反对武汉中央，反对鲍罗廷，又要“清党”的突然反向转变，不知所措，纷纷质问他。他不得不百般辩解，以至声音嘶哑。而且第一军第一师长薛岳和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均有左倾迹象；刘峙第二师内，也军心不稳。总之是军心混乱。这是因为蒋以前的左倾讲话对学生和军队的印象太深了。

这时，蒋又问李宗仁怎么办？李宗仁回答：“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蒋又沮丧地说：我的第一军靠不住了怎么“清党”？李宗仁则慨然答应以自己的第七军调驻南京附近，监视沪宁线上不稳部队。同时自告奋勇，为蒋整顿第一军。这时蒋对李、白二人，真是言听计从。毫无疑问，李宗仁对蒋的清党支持和援助，起了重大作用，如没有第七军，蒋的“清党”运动很难顺利进行。

那么，李宗仁为何要站在蒋的一边，进行“清党”运动呢？据李事后自己说，是因为武汉中央太过激了，使得原来反蒋独裁的民主思潮，一转而为反对武汉中央政府过激和反对中共的思潮了。

对此李宗仁说：“平心而论，党中央此种抑制军事独裁的议案，实未可厚非，当时蒋氏身兼中央各要职，培植私人势力，军事独裁趋势已极明显。……亟须抑制。不幸，……三中全会时，共产党人利用中央委员的反蒋情绪大肆活动，竟使已越轨过火的群众运动，变本加厉。……中共更企图利用国民党的分裂，……进而取而代之。……招致国民党全党的反感……于是蒋氏由反军事独裁运动下的逋逃者，一变而为领导反共的英雄人物了。”[①]

李宗仁这个分析，根深刻，如没有广大军人支持蒋反苏反共，他是无法单枪匹马发动反共政变的。而李宗仁的第七军既未听过蒋的极左宣传，又是李宗仁的子弟兵，对反苏反共完全不要转弯子，可以调来就用，这可以说是蒋发动反共政变的“及时雨”。

蒋之反共，不但有军人基础、还有上海财界的大力支持，没有钱，蒋同样什么事也干不成的。而张静江与上海财界的关系，又是蒋的天然经济靠山，使他可以得到上海财界的信赖与大力援助。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上，第 449～497 页。

上海财界支持蒋进行反共，首先借给他 200 万元。而宋子文以武汉中央政府财长身份在上海化缘多日，却毫无所得。最后答应借给他 300 万元，但仍交蒋介石使用，宋分文未见。宋只好从苏联远东银行借 50 万元接济武汉。这说明上海财界支持蒋介石，而不支持武汉政府。

汉口中央银行被武汉政府封存后，各地银行又拒绝和武汉政府来往，武汉政府无奈，只好由汉口中央银行大印钞票，结果通货膨胀，武汉经济终于无法支持，而一败涂地。

而以常燕生为代表的一般知识界，也自然害怕传说的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或独裁政治，害怕共产党（见前 1925 年）。

这些都是蒋介石反苏反共的社会基础。

蒋介石有了支持，遂于 3 月 29 日和国民党中央监委吴稚晖、蔡元培、张人杰、张继、古应芬、李宗仁等在上海莫利哀路孙中山住宅召开了中央监委预备会议。该会“检举”中共党人假借容共政策，在国民党内发展组织，有“篡夺”国民党之阴谋。当时立即议决咨请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全国，推行“清党”运动，正式文件为“护党救国运动”。

这是蒋介石在武汉中央 3 月 10 日三中全会后，作出的第一个反应，也是双方对阵的第一个回合。

29 日，蒋下令解散上海工人纠察队和取缔红色工会。

武汉中央也不示弱，便于 4 月 1 日，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33 人参加，缺席者 3 人）一致通过“蒋介石的行动是反革命，请予严惩”议案。并决议免除蒋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这些议案和决议，因系 36 名中委中之 33 名所表决，当然完全合法。

因此，从 4 月 1 日以后，蒋不再是原来国民政府和中央执委会所委任的总司令，已系另一个“总司令”。但蒋拒不交印，并说：“革命责任，不容推诿”。总之不辞职，再也不说他本来不想当总司令的话了。至此，武汉和蒋介石之间，已势必一战。

正是这一天，汪精卫自欧洲回国，抵达上海。吴稚晖、宋子文前去迎接。汪到上海后，对吴说，他本人也不赞成阶级革命和劳农专政，国民党和共产党也很难继续相安无事。但他又说必须尽力维持国共合作局面。他对蒋则说：“介石，这一回东南与武汉开战，如果你失败了，我们国民党必就此消灭，共产党必就此起来；如果你胜利了，国民党就要恢复到民国十三年以前的状况，……无论右派的军队，左派的党员，一定不会同你蒋介石合作，你在党里的生命怕要从此消灭。”[①]

4 月 2 日，上海中央监委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陈果夫兄弟、李煜瀛、李宗仁、黄绍纹等 8 人，也于当日在上海开会，由吴稚晖提出指控中共“亡党卖国”的报告，力主断然“清党”。他说：“将来中国果为共产党所盗窃，岂能逃苏俄直接之支配。”[②]上呈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蒋介石。

当时李济深、黄绍纮、白崇禧均先后发言，支持吴稚晖的报告，主张“清党”。李济深说：如果现在不清党，彭湃的农民运动会使“广东的局面……无法维持……”。[③]

[①] 《秘录》，六，第 141～142 页。

[②]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7 年 4 月 2 日条。

[③] 《李宗仁回忆录》，上，第 459～460 页。

当日，蒋即答复吴稚晖请求“清党”的报告，并决定照办，但仍需电呈中央执委会全体公议共同处分。武汉中执委会当然不会通过，但蒋就不管这一切而一意“清党”，并立即将不稳各师调离上海。

蒋于4月3日在欢迎汪归国的欢迎词中表示拥护汪领导党政军一切，军政、民政、财政、外交均听汪精卫指导。蒋还特别劝汪不要到武汉去。他对汪说：“你如果真正为本党，那就要到南京去，然后再请武汉一般中央执行委员过来。如果你到武汉去，你还是要作本党的罪人。”蒋是想利用汪精卫将武汉中央委员拉过来，使他的未来政府合法化。

但汪因为忌恨蒋的“三·二〇”政变，无论如何不肯与蒋合作，决心到武汉主持工作，然后慢慢排除中共势力，独握中枢再伺机与蒋决战。这是汪的心计，并未形诸于口、笔。以至于吴稚晖急得跪在汪面前，求汪留在南京。汪见吴跪，吓得赶紧避开，嘴里还不住他说：“稚老，你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会场非常紧张，而又令人啼笑皆非。汪始终不肯留在南京。

4月5日，正当汪与各中央监委开会时，报纸忽然登出《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该宣言表示国共两党合作到底，绝不受人离间、中伤。此宣言一出，与会人士大哗，吴稚晖尤其气愤，当面挖苦汪以党魁自居，无人认可，也元此资格，说得汪极为难堪！汪氏至此，惟有赴武汉一途，遂赴武汉，出任国民政府主席。

4月7日，武汉召开紧急会议，鲍罗廷主张先进驻南京，以南京为首都。但蒋介石已于4月9日抢先入驻南京。蒋又先了一步。同日，白崇禧任上海戒严司令；李济深、黄绍纮电粤、桂两省实行“清党”，屠杀共产党员。

与此同时，南京中共党组织则于4月10日召开南京市民肃清反动分子大会，决议将反动分子交人民审判。会后，到蒋的总部请愿。

这几天，蒋在读曾国藩著作，当他读到“谤怨沸腾，万口嘲讥”时，十分动情，大有古今同叹之慨。

蒋于11日，断然下令全国开始“清党”。12日上午，上海在白崇禧指挥下，开始解散工人纠察队，搜查工人俱乐部等，并逮捕和枪杀共产党员。至13日，数万工人为此进行抗议游行。当大队到达宝山路时，周凤岐第二十六军第二师，突然用机枪向游行队伍扫射，当场打死三四百人（亦云百余人），伤者无数。两广、浙、闽、苏、皖、湘、鄂等省也开始大量屠杀共产党员，不计其数。

蒋介石对杨虎、陈群说：“凡可以杀的，一律杀，宁可错杀，不可错放。”

这就是“四·一二”大屠杀。至此，蒋已完全和武汉中央决裂，走上公开反共道路。

武汉中央于14日向全世界发出通电，指出：“蒋介石的叛国行为已暴露元遗，吾人要求全党同志，组织联合阵线，进行对抗叛国者。”同日，南京国民党召开南京二届四中全会，不承认武汉中委会。

蒋既已和武汉中央决裂，就径直组建南京政府。4月17日，蒋召开中央政治会议，议决改国都为南京。18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并办公，声明“取消武汉中央党部和武汉国民政府”。选举胡汉民为南京国府主席。军委会和总政治部也相继成立。蒋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吴稚晖任总政治部主任，陈铭枢任副主任。

17日，武汉中央开除蒋的党籍，罢免其一切职务，并对蒋明令通缉。18

日，南京政府则通缉鲍罗廷和 197 名中共党人。

这时的南京政府，仍是不合法的，因为中央执行委员远不到三分之一的数目，实质上是个军人政府。

在南京政府成立大典上，蒋说中共是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如不将其消灭，就必将自取灭亡，受治于异族；并指责苏联为赤色帝国主义者；英美为白色帝国主义者。

蒋还专门为他的反共行为在《告民众书》里做了详细说明。从 8 个方面分析、表白，其主要理由是：中共没有遵行容共政策中接受三民主义的规定；要篡夺中国国民党党权；离间国民革命军；武汉中央军事学校分校对不附和他们的学生就关禁闭；宣传阶级斗争；把持饷源，不供给前线等等，等等，还有，中共反对他蒋介石，就是反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他用这些理由，说服了那些迷惑不解的年轻军人。

4 月 12 日，反共政变者蒋介石成为全国乃至世界赫赫有名的新闻人物。他立即赶赴上海西摩路拜见宋美龄，表示爱慕之意。此时的宋美龄也对蒋倾动芳心，此后，蒋经常赴宋宅与这位宋三小姐谈情说爱，惹得好事记者们也跟踪而至。

第一次下野

南京政府成立后，上海财团又给蒋 700 万元贷款。5 月 1 日，蒋下达继续北伐令。兵分三路：

第一路为何应钦，待第二路军在皖省北渡成功后，从镇汪渡江，沿大运河直趋鲁南。

第二路为蒋亲领，由白崇禧代行。5 月中旬自皖省渡过长江，于江北分三路进军。一路向东协助何应钦；一路向西，另一路向北，策应第三路军，扫荡皖北。

第三路为李宗仁，率部直指徐州。

当时，蒋介石曾派张群赴扬州见孙传芳，邀孙到南京会谈，提议如孙改挂青天白日旗，即请孙任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兼华北联军总司令；蒋兼华南联军总司令。但孙不识时务，拒绝了蒋的提议，其实孙无非想东山再起，谁料想，后竟于天津当寓公，死于仇人之手。

李宗仁于 6 月 2 日攻克徐州，继入鲁西南。第二路军 5 月 23 日占领扬州，孙传芳总部撤离。6 月中旬，三路军会师陇海线。

阎锡山于此时附义国民革命军，称北方革命军总司令。冯玉祥 5 月已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东进河南，进占洛阳。奉军 6 月 1 日渡河北撤。武汉政府军进驻郑州、开封，准备东征南京。19 日，蒋召开徐州会议，冯玉祥和蒋联合，结为金兰（7 月，滇川归附南京）。

蒋介石立即调李宗仁回南京，共商对策。李主张放弃徐州，全力回师；蒋则不肯，强令土天培固守徐州，再调第七军回师防守南京。结果张宗昌迅速反攻。徐州失守。白崇禧、何应钦各路军也退回苏北。

徐州一失，蒋立即决定组织反攻，并放言如不收复徐州，永远不回南京。结果蒋中了张宗昌和孙传芳的口袋伏兵计，大败而回。8 月 6 日，蒋介石狼狈回到南京。

在蒋介石三路北伐和占领徐州，深入鲁南与鲁西南时，武汉中央也发生

了导致国共决裂的马日叛变和“七·一五”事件。

武汉中央于本年4月，改容共为联共，由“国共联席会议”决定大政方针，开始实行土改，揪斗地主，并成立特别法庭，镇压敌对者。这激起了国民革命军中下级军官的强烈反感。因为他们家中多有被斗争者，长沙驻军团长许克祥于5月21日发动政变，逮捕和枪杀共产党人，摧毁中共机关70余处，史称“马日事变”。

汗精卫和唐生智当然袒护何键部下许克祥，认为农民运动太过份了，应当抑制。

印度人鲁易，第三国际代表，于6月1日给汪精卫看了第三国际密电内容，希望汪站在中共一边。

汪看罢密电中译本后，便立刻决定与中共决裂。这个密电的主要内容是没收地主土地；改造国民党中央机构增加工农领袖；武装5万工农军；裁判反共军官等。汪认为这违反了当初三大政策的规定和《孙越宣言》的精神，并喃喃咕咕地说：“斯大林的指示，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孙中山确实是反对实行苏维埃制于中国；平均地权也是采取收买地主余地分给农民，并由农民逐年交付地价的办法。

因此，汪精卫便于7月15日召开中央常务扩大会议，议决反共。16日宣布，并开始屠杀共产党人。声言：“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7月27日，鲍罗廷自汉口北上返国。

听到“七·一五”反共政变消息时，蒋正在亲率大军北上反攻徐州途中。他在28日日记中写道：

“武汉崩溃，鲍罗廷驱逐，党国基础转危为安。”可知斯大林这次帮了蒋的大忙。否则汪精卫怎么会以后又和蒋合作呢！

汪精卫武汉反共后，又于16日发出讨蒋通电，坚持蒋辞职后方可宁（南京）汉（武汉）合流。同日，唐生智也发出讨蒋通电，并出动军队，欲攻南京。

蒋于徐州惨败归来后，立即招李宗仁自芜湖来南京相见。蒋一见李宗仁就说这一仗没听他的话，吃了大亏，表示要辞职。当李挽留他时，他说武汉方面一定要我下野，“那我下野就是了”。

这是汪精卫逼蒋第一次下野，而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也乐于顺水推舟，希望蒋下野，让他们也“爱一爱国家”。这也是蒋汪斗争的第二个回合。

因此，蒋恨透了汪精卫。他说：“余以为对同志应退让，对敌人需坚持，而汪乃异其是，诚非人类也。”

8月11日，蒋又写日记表示要待机而动，以获最后胜利。南京中央执监委员会于8月12日召开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何应钦说：“蒋是自己要走的。他走了很好，从此我们也可以爱一爱这个国家。”可见何对他的专断独行也非常不满。白则说：“革命是大家的事，蒋走了很好，我们大家联合起来，做革命工作，少了他，我们一样可以做。”

这些话，蒋自然都一一详知，记在了心头。12日，蒋被迫辞职，13日，报上发表辞职宣言。

蒋8月12日下野后，又想起他心目中的恋人宋美龄。于是提笔向宋家三小姐写了一封情书，试探她是否仍然爱他，是否还答应婚事。信文摘引如下：

“……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恢绝。……所谓功业宛如幻梦。惟独对女士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弃之下野

武人，女士视之为如何耳？”得宋恩准后，蒋决定向她正式求婚。

蒋下台后，并不真想成为山野之人，而是仍紧紧抓住黄埔军官不放；同时，又通过陈氏兄弟（陈果夫、陈立夫），控制各地党政干部，为他复职作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准备。

与宋美龄结婚

蒋下台后，孙传芳即部署军事，反攻南京。白崇禧、李宗仁、何应钦则收军江南，防守长江，准备和孙传芳再次作战。

同时，南京派李宗仁为代表，到武汉政府洽谈和好统一之事。

但武汉无人，李复追至庐山见武汉政府诸首脑。此时武汉政府首脑正在开会。李宗仁到会后，见唐生智极为嚣张和狂妄，声言李宗仁无权过问武汉进军芜湖之事。李宗仁想起他在困难中的卑躬屈膝，对他现在的狂态十分憎恶，只好要求武汉再派人到南京会谈。

这次会议上，李宗仁看到唐生智并不听汪精卫的劝说，目中无汪。这是因为汪的亲信张发奎第四军已尾追“八·一”起义军南下，唐生智独拥重兵成了武汉老大，汪自然就无力控制武汉政府了。唐生智也要建立自己的一统江山。

李回南京后，主要考虑如何对付唐生智的问题，也不再把汪放在心上了。

从 8 月 25 日到 31 日，李、白、何击溃反攻江南的孙传芳军。

唐生智原想待李、白失败后再攻击孙传芳军，不料孙军完全败北，唐生智亦不敢贸然东下。

于是李宗仁再奔走宁汉合流。这次李宗仁击溃孙传芳反攻军后，自己也深感天下非己莫属。他认为汪是伪君子；蒋太独断，偏私；而胡汉民又太尖刻，均不足以领袖群伦。

最后，宁汉之间达成协议，9 月 15 日组织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不设主席，由 5 常委轮流任主席。汪仅为特委会委员，并不比别人高，而且还不如李、白身兼审查委员。汪到宁后，南京贴出了骂汪的标语。如果说李宗仁与此事无关，是谁也不会信的。这是桂系得势后要控制南京特委会，汪精卫当然在南京呆不下去，也不再支持特委会。结果，汪精卫、唐生智、胡汉民均反对南京特委会；蒋介石自然也不赞成，并通过陈氏兄弟之中央俱乐部，动员各地党政干部反对特委会，如此以来，李、白的南京特委会完全孤立，前途自是多荆了。

南京特委会于 10 月 19 日，决定讨伐唐生智，以去心头之患。

11 月 11 日，唐失败下野，逃往日本。特委会暂时维持局面，主持南京政府。这是桂系第一次掌权时期，但好景不长。

在这场你争我夺的权力战中，蒋在老家溪口观阵。9 月 22 日，对于他复起的局势已经形成，不必担忧了。蒋决定东游日本。

他到日本的目的有二：一是了解日本意图；二是追宋美龄。29 日抵日本长崎。

10 月 3 日即与宋子文乘车到神有马大旅社，拜访子文之母宋太夫人，向宋美龄求婚。蒋认识宋美龄，是在 1922 年孙中山大总统府。从那时起就决心向宋美龄求婚，但一直没有机会。这些年来，因戎马倥偬，只能向宋美龄写信。从此以后陈洁如不再是意中人。

蒋比孙中山幸运，由于他表示信奉基督教，很顺利地通过了太夫人的严关。蒋刚从太夫人房中出来就高兴得连声大喊老板娘，“成功了，成功了！婚约成功了！哦，对了，给你写字吧！来！来！

马上替我磨墨。”当天，蒋就把定婚戒指送上宋太夫人。

与美龄定婚后，就与她合影留念，到日本各名胜去旅游。然后去拜访孙中山生前的老朋友和他自己的师友。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拜访了在高田当兵时的长冈师团长和飞松联队长，并给长冈写了“不负师教”的条幅，表示尊重师道。

下面的主要任务，就是和天皇的“老大哥”们见面，肯定了1927年春天默契，传闻有密约。蒋还特别提出当他和中共作战时，日本如果中立，东北和长城以北的国土问题则好商量。此后，裕仁天皇又组织星期二俱乐部，专门从事同蒋介石的“合作”。

蒋又和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会谈，但会谈结果是失败的，他事后说，田中义一毫无诚意，一定要阻止中国革命。因为田中明确表态，要蒋介石不可打过长江。蒋因与天皇有默契，坚持打过长江，但对统一前途，实是忧心忡忡。

蒋最后的结论是：中日无合作之可能；日方妨碍北伐成功，阻止中国统一。因此，他认为此次日本之行是失败了。

11月10日下午1时，蒋回到上海。宋太夫人和宋美龄已于前一月回国，正于上海筹办婚事。11月26日于报纸上刊载启事，声明与姚抬诚、陈洁如均无婚约；与毛氏离婚，今后断绝一切关系。

12月1日下午3时，蒋介石和宋美龄先于宋宅举行基督教婚仪，由牧师余日章主持。观礼者只有上海少数近亲。然后又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中国式结婚典礼。证婚人为蔡元培；介绍人为谭延闿、王正廷。这时，蒋41岁，宋美龄已31岁（她出生于1897年3月5日，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三日）。

蒋以能和宋美龄结婚，视为平生最得意之事，这从他结婚感言中，一望可知。他说：

“余今日得与最敬爱之宋美龄女士结婚，实为余一生以来最快慰之一日。”又云“余确信，今日与宋女士结婚以后，余之革命工作必有进步。余能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即自今日始也。”

接着他又大讲人生哲学：“余平生研究人生哲学和社会问题，深信人生元美满之婚姻，则做人一切皆无意义。社会无安定之家庭，则民族根本无进步。……家庭为社会之基础，欲改造中国之社会，应先改造中国之家庭。”

的确，蒋介石在前半生的个人生活中比一般名人的艳事稍多，他当时也很得意。但那些女性非名门望族，更无宋美龄之素养、文化和美貌与风仪。蒋介石一介武夫而得娶宋氏小姐为妻，的确是一门攀高的亲事。宋美龄即使不嫁蒋介石，也是全国第一；而嫁蒋氏之后，并未增色添光，实是一种下嫁。故而蒋介石得娶宋美龄后，真是受宠若惊，高兴之极，难免说出一些过头话或失态之语。

蒋在浙江莫干山的湖光山色中渡过了新婚蜜月。

复职北伐

蒋婚后第三天，就从莫干山赶回上海，在蒋的新居拉都路311号参加中国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把宋美龄放在一边。但宋知其夫在为国操

劳，并无怨言。

这次会议 10 日结束。最后，一致赞同蒋介石复职。汪精卫也投了赞成票。该会议还决定于四中全会召开时，取消南京特委会。

上海财界，认准了蒋介石。不支持李宗仁，不贷款给南京特委会，因而南京特委会难以维持下去。

冯玉祥因为并不被特委会所重视，也不支持李、白等人，也要求蒋介石复职。

12 月 1 日，冯玉祥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身份要求蒋介石复职。

12 月 9 日何应钦也通电要求蒋介石复职。13 日，蔡元培发表谈话，欢迎蒋介石复职。

17 日汪精卫出国，辞去武汉国府主席之职。26 日，上海各界举行“促请蒋中正复职大会”；新任第四军军长缪培南也通电拥蒋复职。

28 日，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宣告结束。它只存在了百余日。

蒋于 1928 年 1 月 7 日正式复职。2 月 2 日，中国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召开，组织新的政府。谭延闿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任军委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又担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蒋再次大权独揽。同时设广州、武汉、开封、太原 4 个政治分会，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分任主席。

这一次蒋、李斗争中，李宗仁仅执政三个多月就一败涂地。看来李决不是蒋的对手。这主要是李氏胸怀比蒋还小，不能广揽人才和广纳各派势力。

蒋上台后，第一个任务就是继续北伐。2 月 13 日，重编各军为 4 个集团军：第一集团军蒋自领；第二集团军仍由冯玉祥任总司令；第三集团军由阎锡山任总司令；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为李宗仁，近 100 万人。

4 月 7 日，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蒋下达总动员令，开始作战，第一集团军沿津浦线北上；第二集团军沿京汉线北上；第三集团军于山西出发自正太路向东北进军，直指北京；第四集团军之第十二路军（李品仙），由白崇禧率领，也沿京汉线北上，参加北伐和津东滦河之战，歼灭张宗昌、褚玉璞残部。

5 月 1 日，第一集团军贺耀祖第三军团进驻济南。日军在首相田中义一导演下，5 月 3 日制造济南惨案，用割鼻、挖眼、削耳等残无人道之兽行，残杀我国外交人员蔡公时等 16 人，骇人听闻；被屠杀军民 4704 人，死伤平民共 11062 人，奸污妇女也不可胜数。

张作霖、张学良为济南惨案愤慨万分，愿与蒋和谈，以共同对日，但蒋介石拒绝了。

蒋之勇于内战而怯于外争的方针，自 1928 年济南“五·三”

惨案就已形成了。从此，蒋便以建立自己王朝为压倒一切的核心任务。对内对外，均以此为转移。国土、民命、主权，均在其次。

6 月 6 日至 8 日，北伐军占领京津。阎锡山任京津卫戍总司令。6 月 21 日，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五四次会议改北京为北平，与天津同为特别市。蒋偕李宗仁于 7 月 3 日同到北平。[①]

1928 年北伐时，蒋已和宋美龄一同行军，两人形影不离。每到下榻，宋美龄首先注意的工作是把窗户、桌椅、墙壁等擦得一干二净，房舍之内要窗

[①] 冯玉祥于 7 月 5 日抵北平。

明几净，一尘不染，宋才安心住下。从此以后，宋经常和蒋一同出没于战阵，也成为蒋的最好助手。蒋得宋美龄为内助，的确是最幸运之事。蒋在婚姻生活上，无疑是个幸运者。

7 月 6 日，蒋和李、冯、阎在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祭告典礼。蒋见孙中山灵柩，不觉大恸，遂抚棺痛哭，并连这几年“所受的委屈”也尽情哭出。祭后，蒋住含青舍，不忍离去。并告诉宋美龄说，及闻哀乐，见总理遗容，悲怀难抑，泪满襟怀，想起三年来所“受冤屈怨谤”无人可告，更不知于灵前从何诉起，又泪如雨下。蒋介石哭灵，也是人之常情。蒋对孙中山委以重任确实怀感激之情。

哭灵已罢，就开始处理东北张学良改挂青天白日旗和军队编遣问题。为此，蒋、李、冯、阎于北平西山碧云寺召开了善后会议，将决议拟成草稿，交二届五中全会讨论。

7 月 25 日，蒋离开北平返回南京。同日，美国首先签订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新约。

南京训政

1928 年 8 月 8 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该会常委会议上推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为行政院长。根据孙中山五权宪法，议决实行五院制。在中央常务一七二次会议上，又通过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

《组织法》规定国府主席为国务会议主席，该会议议决法律、法令、命令之公布与否，立法院只提出法案，无最后决定权。国府主席又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国府主席权力极大，甚至有立法之权。这一规定显然违背了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本意。

《训政纲领》主要规定：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行使国民大会职权，平常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并训练国民，为实行宪政作准备。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由国民政府执行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监督国民政府。

蒋于 10 月 10 日就任国府主席之职，在南京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就职典礼。同日发表文告，提出保持固有道德，吸收最新文化之政纲。

蒋完成北伐后，首先签订各国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新约。

11 月 3 日，美国最早承认国民政府。此后是德国、挪威、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等国承认国民政府和中国关税自主权。12 月，英、法也相继承认了国民政府和中国关税自主权。

12 月 7 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海关新税则》，各国一致接受。惟独日本，既不接受新税则，也不承认国民政府和中国关税自主权。

蒋曾于本年 7 月 19 日令政府出面通告日本，废止 1896 年之《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和 1903 年之《中国通商行船续约》。而日本田中政府则要蒋承认旧约有效，才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否则，不予承认。

11 月后，又要蒋承认段祺瑞的“西原借款”，才肯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蒋对此断然拒绝，不承认用来镇压革命和挥霍浪费的“西原借款”。但最后蒋还是拿出 500 万元偿还给日本。

直到田中义一下台后，日本才于 1929 年 6 月 3 日和 1930 年 5 月，分别

承认了国民政府和中国关税自主权。

1928 年 12 月 29 日，张学良经过和日本的激烈斗争，毅然改挂青天白日旗，归附国民政府。名义上中国归于统一，张学良出任国府委员和东北边防司令长官。

国民政府于 1928 年 7 月 9 日颁布裁兵令。7 月中旬，蒋于北平拟成《裁兵意见书》。据蒋估计，当时全国军队约为 150 万人以上。实际上，当时全国所有军队总数约为 260 余万人。[①]

蒋的意见来自上海财团。当时上海财团认为可以负担陆军 50 万人军费，每年军费为 1.8 亿元。加上空军、海军、要塞、兵工厂和军事学校，月费为 600 万元，一年为 7200 万元，共 2.5 亿元左右。

军队改为以师为最高单位。每师三旅，每旅三团，每团三营，每营四连。全国分 12 个军区，每一军区四五万人。

1929 年 1 月 1 日，国军编遣委员会成立。又设立编遣区，负责各地区编遣事宜。规定全国陆军不得超过 65 个师，总兵额又扩大为 80 万人。此外有各省保安部队，以每省 3000—6000 千人为限。

全国编遣分三期进行。

1928 年 7 月 1 日开始第一期编遣。至 1929 年 7 月完成全部编遣任务。

上海财团为减少开支而裁军；蒋为削藩集权而裁军，以加强个人军权，实行绝对的中央集权制。因此，编遣中颇欠公平，蒋的嫡系不遵守编遣原则，编制庞大。因此，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便不服气。北伐完成后，李宗仁出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冯玉祥任军政部长，阎锡山任蒙藏委员长，三人兵权被夺走。他并且公开讲话，说他要效法日本削藩政策，使大权集于中央。对此种集权制做法，冯、阎、李等颇为反感，联合起来反对蒋的独裁和裁军，于是发生裁兵之战。从 1929 年打到 1930 年，双方损失巨大。

1929 年 3 月 19 日，桂系李宗仁部夏威等首先通电讨蒋，蒋桂战争爆发。蒋惯于远交近攻和收买手法。战争开始，蒋便以许愿方式，骗得冯玉祥宣言讨桂；又收买桂军李明瑞等师长，迅速击溃桂军。后来蒋以冯未参战为名，不践前约（让给武汉、山东地盘），冯闻息大怒，立即宣布不就行政院之职，并大军西撤，准备和蒋对抗，以据西北。但正在这时，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受蒋介石重金收买，通电叛冯拥蒋。冯闻讯大哭不止。

23 日蒋对冯玉祥下讨伐令，并通缉冯氏。蒋怕阎、冯联合，又赶快委任阎为西北边防司令长官，取代冯玉祥。阎见官眼开，急欲收编冯军，遂将访晋的冯玉祥扣押五台县。

9 月 19 日，张发奎于广东再树反蒋旗帜，通电讨蒋。电文之妙，犹如骆宾王讨武曌檄文，传颂一时。张反蒋后，冯玉祥部下宋哲元等也于 10 月 10 日通电讨蒋。蒋、冯之战爆发，冯军节节胜利。28 日，蒋派何应钦将阎为陆海空军副司令委任状亲自送到太原。阎于 11 月初接受任职，更加支持蒋介石，并准备攻击冯军。

蒋亲自赴郾城、白沙等地督师作战。冯军因对阎晋不放心，有后顾之忧，作战连连失利。11 月 17 日，冯军退走洛阳。20 日退入陕州。冯军失败。蒋克洛阳。

此时，广西李宗仁又在冯军失败时，发兵向梧州进击；张发奎向广东东

[①] 《革命文献》，第二十四辑，第 24～25 页。

江进击。蒋又于 11 月 29 日自汉口回南京，主持两广战事。

但出蒋之意外者，唐生智突然于 12 月 3 日在河南通电反蒋。

8 日，石友三也于浦口反蒋。韩见唐、石反蒋后亦有脱蒋之意，于是蒋又通电讨伐唐、石、韩三人。一时战乱如麻，不可开交。

此时神州大地，反蒋介石者此起彼伏，使蒋难以招架。但蒋收买了阎锡山，于 1930 年 2 月初将唐军打败；石友三也转投阎。

韩复榘见事不妙，再转向拥蒋。在广东，蒋则以何应钦为行营主任，指挥粤军于 1930 年 1 月下旬将张发奎、李宗仁之张桂联军逐广东。蒋利用远交近攻和收买之术，将各路对手各个击破。

蒋获胜后，趾高气扬，立即召开中常会，开除汪精卫党籍，并下令通缉。

17 日通电告捷，说是凡是反对他的人，都被他打败了，或者扑灭在际。这与其对日本制造济南惨案时之妥协、软弱态度，恰成鲜明对照。

如果阎锡山、冯玉祥、唐生智、李宗仁开始就联合反蒋，则蒋必败无疑。蒋抓住他们的弱点，尤其对冯、阎，则略施小计，就将二人利用了。而且蒋有上海财团支持，可以用金钱、地位收买对手的部下。所以冯、阎、李和汪派张发奎，均不是蒋的对手。

此后，蒋更是威风不可一世，大权独揽，惟我独尊。并开始组织暗杀团，暗杀政敌。

1930 年暗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王乐平和党员潘行健、康瑞斋。处决中山大学反蒋学生 42 人。其恐怖政治正式开场。

蒋之对外则无条件地给德、英、法、日、瑞典、挪威等国以最惠国待遇。签署对日不追究“五·三”惨案责任的和约，承认段祺瑞之“西原借款”等等。

由此可见，蒋介石从 1928 年“五·三”惨案开始，到 1930 年止，已由原来单纯反苏反共的民族主义者，变成为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封建主义的大独裁者，变成为一个新军阀。

接着，蒋发表《告全国军人书》。其中特别指出，“历观叛逆军之末路，即可知反抗党国，以破坏和平统一之政策者，未有不趋于覆灭。”

阎锡山读以上电文后，才悟到蒋定要一一平伏“不服从者”，下面轮到的就是他了。因为张学良远在关外，是蒋远交的对象。对此，阎又于 2 月 10 日致电蒋介石，特别向蒋指出，“为今之计，礼让为国，舍此莫由”，并劝蒋和他一同辞职。蒋见阎不示弱，加之两广“未平”，冯军仍在，更怕阎与张学良联合对抗他的中央政府，便电复阎氏，只要阎不和汪精卫（两广）交好，愿让位与阎。并赠阎银洋 1200 万元。

同时又派顾维钧到东北劝张学良助他攻阎，许以平、津之地。阎收蒋之大洋后，又声明拥护中央，但未提拥蒋之事。蒋见此电，非常忿怒，又电东北顾维钧，提高价码，如果张学良肯和他蒋氏合作攻阎，“则北方归张；南方归蒋。所有阎之公私权利，均由张接受”。

蒋认为舍武力之外无法可以达到和平统一的目的。[1] 阎则致电反驳，“治国之道，重在止戈，不再戡乱。”第三方面军，石友三为第四方面军；孙殿英为第五方面军。

蒋介石于 4 月 5 日正式下达讨伐令，中原大战开始。

---

[1]

以平汉、陇海线为主战场，由冯军任主攻；阎军则于津浦线任主攻，直指徐州，再与冯军一起合攻南京。

5 月 11 日，蒋下总攻击令，置重点于陇海线上。但蒋初战失败，于归德朱集车站险些被俘。6 月 15 日，冯玉祥于陇海线展开全面反攻，追击蒋军。蒋军全线动摇。正在此时，蒋急调平汉线何成浚第三军团发动进攻，又于许昌用飞机炸死樊钟秀。冯玉祥突然受阻，又怕中蒋埋伏，立即放弃追击，向西退却。蒋得以重新部署战事于鲁西南各县。

李宗仁桂军，6 月 5 日占长沙，8 日克岳州，直向武汉进军。

蒋急命何成浚南返。又调粤军攻李宗仁桂军背后。而冯却不令张维玺部追击何成浚第三军团。结果平汉、陇海线呈相峙状态。9 日，桂军退返广西。冯军孤立。在津浦线上，6 月 25 日晋军克济南，27 日继围曲阜。

这时蒋将重点转向津浦线，组织反攻，以贺耀祖为总指挥。贺于 8 月 6 日攻占泰安。

阎听说十九路军自津浦北上后，非常惊慌，即请冯玉祥率二、三方面军全力自陇海线东下，攻击徐州，以“围魏救赵”。但冯玉祥却一直不肯发兵，待汪精卫说情后，冯才答应发动总攻击，但已是 8 月初，晋军已败北于津浦线了。

对柳河、民权等重要地区，冯、阎却用反复无常的石友三部防守；而冯玉祥也未能把宋哲元的援军用于民权、柳河地区。即使如此，8 月 6 日冯下总攻击今后，蒋也心慌意乱，急忙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准备撤退到安徽蒙城地区；陇海正面也向后撤退。

这时杨杰和蒋的陆军署署长曹浩森，则劝蒋不要撤退。杨认为战争中撤退，容易影响军心；曹曾为冯玉祥当过参谋长，深知冯用兵求稳，从不冒险深入，因而力主不撤退；陈调元则自告奋勇，向石友三部反攻。蒋遂令陈反攻。陈军击败石友三部，蒋之战局又转危为安。陇海线战事又呈对峙状态。

津捕线十九路军与韩复渠等部，于 8 月 15 日攻克济南，晋军退回河北，大势已去！

蒋介石这时又大力拉张学良站到他的方面。8 月 21 日，委张为陆海空军副司令，仅次于蒋。但张仍未敢贸然行动，至 9 月 4 日，张氏才准许胡若愚就任蒋所委的青岛市市长，决心助蒋。13 日，蒋赠张学良赈款 20 万元。18 日，张学良发表拥蒋通电，调兵入关，直指阎军背后。

9 月 24 日，阎发电声明退兵，并揭露蒋曾在陇海线战场和后方非军事区投放毒瓦斯。

蒋经过一度紧张作战，于 10 月 25 日偕宋美龄回到奉化老家。

次日回到溪口，游雪窦寺，并与宋在小桥上合影，浴神林泉，暂息征尘。27 日又参加奉化县府为他举行的欢迎盛会。在盛会上，他发表了提倡节俭和决心走自己路的讲话。他说，选定了自己的路以后，就不要理会别人瞧得起或瞧不起，要坚定地走下去。

10 月 27 日，冯、阎军均退回河北和山西境内。阎、冯于太原声明，自 11 月 5 日起，取消陆、海、空军司令部。11 月 14 日通电下野。11 月 30 日，阎离晋抵天津；冯五祥则息影山西汾水之滨。

这次战役，双方死亡约在 8 万人以上，共伤约 30 万人。

蒋方军费月开支为 3000 万元；冯、阎方月开支为 1000 万元，共计 2.1 亿元。加上其他各项费用 7000 万元，共计 2.8 亿余元。

如加上财产损失 7300 万元、总计为 3．58 亿元。

围攻红军

蒋于 1930 年 10 月打败冯、阎和李宗仁桂军后，便把视线转入各主要红军地区。

同年 12 月，蒋开始对江西苏区进行第一次“围剿”。蒋一开始很轻视红军，他在柳河车站对自赣援豫的谭道源（第五十师师长）说：“你马上开回江西去。江西之匪羽翼未成，算是地方事件，请你帮助泳安（鲁涤平字）负责肃清。”[1]蒋当时只把江西红军当成地方事件，并未放在心上。

1930 年 12 月 19 日，蒋发动了对江西红军的第一次围攻。

从 1930 年 12 月到 1934 年 10 月，蒋对中央苏区发动了 5 次“围剿”。前后共用兵力约 170 余万人。前 4 次蒋均遭惨败，这是蒋介石所未曾料到的。其原因是红军采用了避短扬长的游击战和运动战。

第五次“围剿”，从 1933 年 10 月到 1934 年 10 月。这一次“围剿”蒋介石胜利了。但这胜利，不是蒋的“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取得的；也不是庐山军训团开办的结果。而是第三国际，是斯大林心血来潮，令中央红军打阵地战，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使敌人进人红区，结果，红军被蒋以碉堡合围战术围在核心。如不突围，就会全军覆没。

斯大林为什么令中国的中央红军打阵地战？这是个历史之谜！

因为斯大林在军事上并不是外行，何以出此下策？！

这次“围剿”中，因福建发生陈铭枢等反蒋革命，故蒋十分惧怕十九路军与红军联合，便决定迅速予以镇压。1934 年 1 月，十九路军失败。

镇压十九路军时蒋偕宋美龄，亲自赶赴福建督战，住在建瓯。

1934 年元旦，蒋赠美龄一只用腊梅装饰的花篮，颇得美龄欣赏，并称蒋同样具有诗人气质。

“九·一八事变”

蒋介石北伐成功，并未将东北拱手交给日本天皇。张学良少壮爱国，也不肯受日本人摆布，终于在 1928 年 12 月 29 日，归服国民政府。东北易帜后，日本要求实施密约。蒋遂请日本方面携密约前来谈判。1929 年 10 月，日使带密件来华谈判，蒋命人在列车上将其灌醉，并偷出密约毁掉，日方代表回国后自杀，而日本天皇亦有口难言。土肥原贤二少将和松井石根中将，曾在“九·一八”事变后，对李宗仁谈到蒋“大无信义”，当李问及详情时，二人又守口如瓶。此传闻之事，查无实据，姑妄存之。

日本天皇和军方操纵实权者，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决定以武力先将中国东三省抢到手中。

天皇裕仁于 1931 年 5 月，开始秘密部署军事行动。首先在延吉市租地一块，建造兵营。这时中国国内正值广州国民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抗衡时期。广州要蒋辞职，蒋则不承认广州政府。日军又于 7 月 25 日在沈阳秘密架起两门大炮。8 月 3 日，裕仁召开关东军师团长会议，说明满洲作战问题。此后，

---

[1] 李家白：《反共第一次“围剿”的源头之役》，见《文史资料选辑》，四十五， 第 76 页。

裕仁又接见各司令官，暗示政府已经批准；天皇和政府均不直接出面，而由少壮军人出面。9 月 7 日，日军守备队第三大队向沈阳附近集中。8 日，日军在沈西建炮台三座。同时，日军纷纷进入兵营，准备作战，并派大批密探，四处刺探军情。

此时蒋介石因有默契在先，并不作军事准备。9 月 14 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到长春检阅第三旅团和第四联队时，大放撅词，声称要为保卫日侨而战。15 日，本庄繁又赴四平街、公主岭、范家屯等地兵营进行阅兵视察。

在同一天，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少将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拍了第一封电报，电文称他将于 9 月 18 日晚 7 时 5 分到达沈阳，与本庄会面，这实际上是让本庄于建川到达前已经胜利完成对沈阳的突袭，然后迎接建川的暗号。接着，日本外务省的中国科科长又拟好另一封电报，发给板垣征四郎，告诉他，建川系阻止“沈阳事变而到沈阳的”。俄国科科长乔本，则干脆发第三个给石原的私人电报，明告关东军要于建川到达沈阳前行动：“事机已露，请在建川到达前行动”。但是在旅顺关东军总部的板垣、石原两人对电报的真意一时还猜不透，而本庄又正在奉天视察，两人急得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板垣的理解是立即占领奉天（沈阳）；石原则认为时间太仓促，不可轻动，应等待东京的进一步指示。最后决定于建川到达沈阳前几小时行动。9 月 16 日，正当板垣、石原在伤脑筋时，本庄自奉天返旅顺，到达辽阳站，在那里阳闲院宫元帅的密友铃木老将军见面。当晚，板垣自旅顺匆匆赶到了阳。铃木和本庄决定 9 月 18 日晚行动。并由铃木指明，由板垣替本庄，本庄替建川，建川替闲院官层层分担责任，共同掩盖天皇这个总后台；而具体指挥者，则是板垣征四郎这个关东军总部的参谋。

但板垣仍不放心。他又于 9 月 18 日下午 5 时 18 分，在本溪站上了建川来沈阳的列车，在车上同建川面谈。在面谈中建川告诉他，要等他“好好地睡一宵再谈这些吧”！板垣这才放下心来，决定立即发动对沈阳的突然攻击。攻击前夕，板垣又向本庄司令官打了长途电话，最后定准。可见板垣并无胆量自作主张。

攻击前需要制造借口，于是板垣命日军假扮中国士兵，[1]于 9 月 18 日晚 10 时 30 分，将沈阳至文官屯铁路炸毁，当作进攻借口。但是 10 时 10 分，日军第二师团已分三路由南满路向沈阳发起进攻。10 时半，日军炮轰沈阳的中国飞机场和北大营。11 时，日军攻进沈阳市中心。

19 日清晨 6 时半，日军侵占沈阳全城。然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贴出布告，说明侵占沈阳的原因是“中国军人炸毁南满铁路”和“袭击日军守备队”。这完全是无中生有，颠倒黑白。当时的日本《盛京时报》则于 19 日将开始进攻时间改为晚 11 时，以掩人耳目。同日，蒋介石自京赴赣，督师“剿共”。

至 11 月中旬，日军侵占全部东三省。11 月 12 日，中国国民党召开四全大会。20 日，议决请蒋介石北上抗日。

蒋介石则对此一贯采取既不戒备，也不抵抗的政策，此前 7 月 12 日电张学良谓“此非抵抗之时”。次日，于右任也电张学良，谓“中央以平定内乱为第一，东北同志宜加体会”。7 月 23 日，蒋向全国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电》，正式提出：“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8 月 22 日，则更说

---

[1] 亦云由石原莞尔指使。

出：“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为奴隶，亦不可得。”[1]这种意思的公开讲话，在1932年围攻红军时，经常谈到。他说亡于外国尚可有复兴之一日，亡于共产党，就死无葬身之地，因为中共在“摧毁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华民族文化消灭了，便永远无复兴的一天。[2]到9月12日，已临近9月18日，蒋又邀张学良到石家庄火车上见面，进行元第三人在场的密谈，再次叮咛张学良一定不要抵抗，而求助于“国联”。16日，又致电张学良，要他“切勿吾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这种坚决不抵抗的内幕，或是先前的默契在起作用，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先安内而后攘外”，宁可亡于外国，不可亡于中共的政策。他对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的武力，也是先安内，并未先对帝国主义者争回国权。他的这种政策，实是曾国藩的老洋务派的治国政策，引起全国人民反对。本年12月，平津等地学生代表到南京请愿，蒋亲自接见学生代表，表示一定抗日。

蒋在1932年6月22日对豫鄂皖湘赣军政干部的一次讲话中，就叫大家学习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精神，从而消灭中共和红军。

从这时起，蒋介石与孙中山在政治立场上已经完全背道而驰了。[1]孙中山为民主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统治和地主土地制度。而蒋介石，则公开自认为曾国藩的门徒，成为半殖民地的封建统治者和地主集团的代表。蒋就是据此来处理“九·一八”和以后的“华北事变”的。

“九·一八”后，中国政府在9月21日向“国联”提出控诉，并提出派中立国部队进驻东北。日本则坚决反对，要求“国联”派调查团来东北调查，以拖延时间。12月10日，“国联”派李顿组织调查团来到东北调查。12月11日，若椒内阁辞职，犬养毅组阁。

1932年8月30日，李顿提出了400余页的《报告书》，谴责日本为侵略者。9月15日，日本竟宣布承认伪满洲国。1933年2月17日，“国联”接受李顿报告书，谴责日本侵华。并将此谴责向全世界广播了10个小时。24日，“国联”以42票比零，通过决议，不承认伪满洲国。[2]

“九·一八”后，日本天皇为转移“国联”视线和胁迫各国承认伪满，又于1932年1月发动对上海的侵略。于是爆发“一·二八”上海抗战。

第二次下野

蒋于1930年10月打败冯玉祥、阎锡山后，就飘飘然起来。着手准备召开国民会议，制定“新约法”，要当大总统。当时的政界要人吴稚晖、陈立夫、刘健群等，均表示支持。

惟胡汉民带头表示异议，反对召开国民会议和制定“新约法”，主张仍然实行训政。并于《中央日报》发表文章，得到大多数政界人物响应。于是胡的提议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被通过。蒋介石迫于大势，只得附和。但蒋已决意召开国民会议制定“新约法”，当总统，便想用武力囚禁胡汉民。这在

---

[1] 荣孟源：《蒋家王朝》，第51～52页。

[2] 《蒋中正言论集》，第四辑，第32页。

[1] 《蒋中正言论集》，第五辑，第13～14页。

[2] 日本已宣布退出国联。

以前，他是不敢这样对待孙中山的同事和民国元老的。

蒋之所以决定囚禁胡汉民，还有其他原因，主要就是胡经常批评蒋介石专断独裁，包揽一切。有一次就当着陈立夫的面批评蒋。类似之事不少。蒋到 1931 年 2 月，就对胡汉民“忍无可忍”了，决心逮捕囚禁胡汉民。

要囚禁胡汉民，不能派兵闯入胡家，这太有碍观瞻，于是蒋便写一请柬，请胡于 2 月 28 日下午 8 时到他的住处赴家宴。胡如约前来，一进蒋的家门便被蒋扣起来。其间胡逼着蒋介石来见，蒋无奈，拖延了两三个小时后，终于出来见胡，被胡汉民严词斥责一番。蒋辩论不过，仍强词夺理，说是决不冤枉胡氏，并拍着胸脯说，“如果冤枉了胡先生，就不姓蒋”。然后，躬身告退，对胡道安。

蒋走后，胡一夜未眠，写好了因病辞职的声明，第二天，蒋按胡择定的地方，将胡送往汤山囚禁。

胡被囚后，两广便掀起轩然大波。4 月 30 日，广东省籍中央监委通电弹劾蒋介石。5 月 3 日，陈济棠等拥护弹劾。25 日，有 20 人联名通电，要蒋于 48 小时内辞职。27 日，广州组织国民政府，发表讨蒋宣言，要求恢复胡汉民自由，并组建一、四集团军，准备讨蒋。蒋也准备应战。一时战云密布，气氛紧张。

蒋仍召开国民会议，但只是通过了训政临时约法，未敢制定“新约法”。这是因为两广有军事实力，蒋尚不敢太狂！

正当宁穗双方战云密布之际，日寇于 9 月 18 日发动了侵华战争，突然攻占了沈阳城。

于是国人均纷纷要求宁穗双方和解，息争对外，陈铭枢、张继、蔡元培更仆仆风尘，奔走于宁、穗双方，促进议和。

10 月 13 日，蒋被迫释放胡汉民。胡于当日下午于中山陵向蒋辞行。

14 日早晨，蒋到车站为胡送行。蒋对胡汉民说：“过去的一切，我都错了，请胡先生原谅。以后遇事还得请胡先生原谅。”

胡最后给蒋指出，蒋的最大错误，是为个人权力而不是为国为民。同日，胡又发表一篇宣言，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和抨击：

“顾今日中国政治之现象，一绝对军阀统治之现象也。枪之所在，即权之所寄。政令所由，不在政府，而在于军事委员长。……国计之决，不在于党部，而在于庐山、南昌之会议。……掌兵者威权愈大，言莫予违，由专制而任意杀人。……统一何为之？将统一于军阀,以成其帝皇万世之业耶？……盖惟军阀统治倒，斯内政可以求改造。”[①]

蒋介石在广东省中央执监委员们的强大压力下，于 12 月 15 日辞去国民政府主席、三军总司令、兼行政院长之职（蒋于 1930 年 9 月谭延闿死后兼此职）。

林森于 1931 年 12 月 28 日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任行政院院长，陈铭枢任副院长。蒋仍保留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职。

1932 年 1 月 28 日，孙科、陈铭枢辞职，汪精卫接任行政院长。此后蒋、汪又开始短暂的合作，这是蒋拉汪反对孙科的粤系势力，包括李宗仁在内。

1932 年 3 月 6 日，军事委员会恢复，蒋仕委员长，18 日就职并兼任参谋总长，拟以陈布雷任军委会秘书长。但因多种原因未能如愿，由李仲公代行。

[①] 见《三民主义月刊》第二卷，第六期。

蒋接受杨永泰建议，成立了最初的军委侍从室，规模很小，主要是几个秘书、副官、参谋人员。

1934 年 5 月，陈布雷第三次到南昌，从此后就一直侍从蒋的身边，成为蒋的文胆和左右手。

1936 年 1 月，蒋介石委派陈布雷、钱大钧改组侍从室。钱任第一处主任；陈任第二处主任。第一处设三个组，负责军事、安全、后勤；第二处也是 3 个组，负责党务。情报、人事、文书之事。以侍二组（一处）、侍四组（二处）为侍从室核心。

1940 年，增设侍从室第三处，设七、八、九 3 个组，专门管理全国军事机关干部人事档案和全国荐任干部人员名册。中统情报送侍二处第四组，军统情报送侍一处第二组处理。其他·情报由戴送侍二处陈布雷会同侍二组研究处理。

1938 年侍从室于武汉将一切特工情报统归侍六组综理，由唐纵任组长。1940 年，侍从室又成立机要组，专理蒋介石的来往电报。1945 年侍从室结束。

特务政治

蒋为镇压人民抗日运动和人民的反抗、不满，于 1932 年 4 月 1 日设立“复兴社”特务机构，蒋自任社长。下设常务干事书记、常务监察，负责日常工作。其下又设组织处、宣传处、训练处、特务处。特务处处长为戴笠。主要吸收对象为黄埔学生。同日，成立军事调查统计局（军统）作为公开机构。

该社社章和誓言规定，社长蒋介石决定一切，社员对社长绝对服从，凡违反誓言者，要受极刑。这是典型的法西斯特务组织。

在成立复兴社之前，蒋曾于 1929 年 1 月成立过“励志社”。社长为蒋介石，社址在南京黄埔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内（即原黄埔军校）。蒋原想把励志社办成特务机关，但因人马不备，便放弃了这个想法，使励志社成为内廷供奉的机构，不伦不类，主要是供宋美龄使用，也为蒋接待外国重要军政人员。

复兴社直接秉承蒋的旨意，进行暗杀、绑架和盯梢等等，对付那些反对蒋介石的人。有了如此打手队，哪里还有人身、言论自由可言。戴笠任特务处长，很快成为蒋的特务总管，在蒋一人之下，而实属万人之上，谁都怕他三分。此“复兴社”具体执行“先安内后攘外”及“安内必先剿匪”的政策。康泽说：这个“复兴社”，“是十分的法西斯鬼魂到中国蒋介石腹中脱胎的产儿”。沈醉说，“戴笠是蒋介石佩在身边的一把犀利的匕首；也是最善于窥伺主子意图，最博得蒋介石欢心的一条忠实、凶恶的走狗。”

特务组织和特务，是对付反抗者和民主党派、中共党人的。这是巩固蒋氏独裁统治的一种恐怖手段；另外还有一种精神手段，就是“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是宣传和推行礼义廉耻的运动。1934 年 2 月 19 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提出，得到了宋美龄大力协助，其目的是从精神上“教化”全国人民“去人欲，存天理”，规规矩矩地生活。

工作，服从他蒋氏王朝的统治，“非礼勿动；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行。”

关于以礼义廉耻挽救人心的观点，是蒋在 1932 年 4 月 19 日对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生讲话时，正式提出来的，他说：“现在除了亲爱精诚之外，还应

该加上礼义廉耻四个字。大家不要以为这是陈腐的思想，……到今天……我们非拿礼义廉耻加上，不能够挽救堕落的民德和人心。……不能够确定我们革命的基础。”

1934 年 5 月至 6 月，蒋又提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把八德做为三民主义的政治基础。

9 月，又提出“诚”字，作为个人工作生活根本原则，从而贯彻礼义廉耻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1935 年 5 月 19 日，蒋对昆明学生讲话时，又提出三民主义就是礼义廉耻：“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也就是我近来极力提倡的礼义廉耻四维。”[①]

关于“新生活”运动，蒋是采用“大学”里的“明德亲民”的“亲民”二字而成。亲民，可解为新民。实质上，这个运动是复辟封建礼教的运动，也是提倡忠臣孝子的帝制教育运动。

他在 1934 年 9 月 11 日，在庐山军训团讲话时，就明白他说总统和皇帝，名义虽不同，而实质则一：“无论专制国家、民主国家，乃至于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有一个元首或领袖，在帝制国家里，称为皇帝与天子，民主国家，便称为大总统与主席，名义虽不同，而其为代表国家的首领则一。所以《大学》里的天子，我们可以广义解作国家元首。”亦即用对待“天子”的大学之道，对待他。

关于“新生活运动”中的卫生项目，无疑是可取和应当肯定的；关于节约、朴素的提倡更是极重要的。

推行“新生活运动”的指导思想是蒋的主观唯心论思想。他认为“天下万事万物，都由诚心所生”，而且“心物一体”；“良知是我们大家所固有的，故不必再另外去探求知”；[②]“一切事物不能离开心意。”这就是说，事物离不开心意，有心意方有事物，事物由心所生。从而便可以推导出意志决定论。国家大政既决定于人的意志，“改造”人心的方法，就是恢复礼义廉耻，并造成一个恢复礼义廉耻的运动，即新生活运动。

“华北事变”

蒋虽辞职，但军事实权和政治实权仍然在握。1931 年 12 月 15 日，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后，即飞赴杭州会晤蒋介石，请示机宜。16 日，汪精卫又晤蒋，表示愿与其合作，汪遂于 1932 年 1 月 28 日出任行政院长，孙科辞职。“一，二八”上海抗战开始时，他通过张静江，抵制十九路军抗战。上海市政府一再妥协，表示答应日方一切要求。而日寇舰队司令官盐泽在 28 日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十九路军在上午 11 时 25 分退出闸北，让日军“进驻”。但 11 时 10 分，日军即向闸北天通庵车站十九路军翁照垣部和上海宪兵第六团开枪射击。

上海“一·二八”抗战终于爆发。次日，军委会恢复。2 月 1 日，蒋与冯玉祥等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对日作战计划。3 日，蒋至临时首都洛阳。

[①] 《蒋中正言论集》，第一辑，第 74 页。

[②] 蒋介石《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

战争开始后，十九路军孤军苦战。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国民政府抗战。蒋介石也曾通电表示抗战决心。随后，张治中因党内有人批评中央军要看着十九路军打光，所以按兵不动，便于 2 月初蒋自洛阳到浦口时，去见蒋介石，提议中央军应参加上海抗战。如无人去，自愿前往。蒋答道：“很好。”随即派张治中率第五军参加上海保卫战。2 月 15 日，第五军归十九路军蒋光鼐指挥。2 月 16 日，接防由江湾至吴淞一线阵地。同一大，国民政府与军委会通电，准备长期抗战。

“一·二八”抗战至 3 月 2 日结束，战斗极为激烈，我方将士拼死抗击，致使日寇三易主帅。但因蒋介石以后不再派军增援十九路军，十九路军无可奈何，只得将浏河防军（第五军一部）调出增援，致使浏河防线薄弱，日军于 3 月 1 日攻陷浏河，从后面抄袭十九路军。十九路军被迫退出第一道防线，待援。

蒋介石于 3 月 18 日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又兼参谋本部参谋总长，再次总揽军政大权，主持抗战之事，表示“进退去留，惟党国之命是从”。5 月 5 日，蒋接受上海停战协定，上海成为不设防城市。上海抗战后，日本军人奉天皇授意将日内阁犬养毅刺死。原因是犬养毅反对拨发巨款军费和在上海战争中一直与蒋和谈。

1931 年 11 月，日本政府将傅仪自天津接到长春。1932 年 3 月 9 日成立伪满洲国。9 月 15 日，日本政府与天皇批准承认满洲国。

这时，天皇的少壮军人们主张立即侵占我国热河省，并派铃木中佐到北平和蒋介石的前外长黄郛见面。铃木对黄说，裕仁天皇对蒋已忍无可忍，表示要进攻热河省。黄则表示，蒋考虑到政治和舆论，只有应战之外，别无他途。铃木威胁说，日军很快可以占领热河。黄强调，如果日本侵占热河，蒋为面子问题，必须采取不愿采取的全面抗战。铃木又说，日军不怕全面抗战，但希望蒋继续进攻红军，并撤掉张学良。蒋如办到，日本则不进攻长城以南。黄将此意转达蒋介石后，蒋默然不语。

但荒木陆相却不顾一切，1933 年 3 月 3 日，攻陷热河，张学良于 3 月 12 日引咎辞职，蒋介石进驻保定指挥抗战。本月中旬蒋调其嫡系第十七军开赴长城，参加长城抗战。但战争延续到 5 月 15 日，蒋之十七军失败。密云、通州等平津以北、以东地区失陷；敌军飞机于平津上空盘旋。国际社会也均无强硬表示，只希望双方停战言和。

至此，蒋又屈服，于 5 月 24 日致电何应钦，“事已至此，委屈求全，原非得已。中正自当负责。”但希望协议不要形诸文字。

同时仍要守城，徐图转机。又特别指示：东北、热河和华北，均不能割让。

日本的和谈条件是国军退出平北、平东各县；日本飞机随时侦察中国军队撤退情况。而谈判地点，却在密云县日军司令部。对此，何均硬着头皮一一答应了。

25 日何派徐祖诒赴密云。但徐回来后，日军又改第三条为双方派全权代表到唐山开“停战会议”。

后改在塘沽。蒋介石直接命熊斌前往。经多次谈判，于 5 月 31 日达成协议，由熊斌和冈村宁次签字。主要内容是长城以南，延庆、芦台一线以北、以东地区，为治安区，中国军队必须退出；治安区由中国警察留守。

26 日，冯玉祥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通电全国，誓师抗日。继 而反对《塘

沽协定》；并要求停止“剿共”，共同抗日。蒋介石对此坚决拒绝，并调兵围攻冯玉祥抗日同盟军。8 月 14 日，冯玉祥被迫解散同盟军后，赴泰山闲游。

1933 年 10 月 20 日，日本政府接受天皇意旨，决定全力南侵，采用边打边谈的策略，以“征服中国”。

故塘沽协定后，日本政府仍不满足，日本天皇也不再信守刚刚许给蒋介石不进攻长城的诺言，继续策划华北独立。1934 年 12 月 7 日，裕仁批准内阁夺取华北计划，要把南京对华北的影响削弱到最低限度。于是制造种种事端；迫河北省府迁于保定；并进一步提出中央军退出平津地区；河北省党部、宪兵三团、军分会政训处等，也要撤走。

1935 年 1 月，蒋迫于日寇侵逼无已，便命陈布雷以徐树挣之子徐道邻的名字写一篇劝戒裕仁天皇的文章《敌乎？友乎？》。此笔名一语双关，既嫁祸于徐，又可作为慢慢道说邻国之事的意思，并用以自掩。此文发表于《外交评论》第三卷第五号。文章的中心思想是要日本明白惟中日两国友善相处才是东亚之福，以便共同反共。至于伪满等事，可暂置不论。此文一发，举国愤慨，但对日本的裕仁天皇和日本政府，却毫无作用。蒋白白地丢了一个求和的面子和自尊心，有损于国格。

1935 年 6 月 4 日，日本又要求罢免河北省长于学忠，于之五十一军他调。同时对蒋介石进行威逼：华北问题不过枝节问题，关键是蒋“是否真正与日亲善，抑阳作亲善，暗仍准备抗日”。这是要蒋介石放弃抗战，投降日本，日本竟想以威胁手段迫蒋投降，也过于异想天开。此时蒋介石只是“先安内”，而后对日抗战，故而一再妥协；绝无投降日本之意。

1935 年 6 月 6 日，日本大皇最后批准了关东军和天津驻屯军随时准备作战的战斗命令。6 月 9 日，日方派代表威胁，要中国取消河北省一切党部；五十一军和中央第二十五师他调；禁止排日行为。限午前答复。日方代表酒井临走时，还对北平何应钦说，“中央军调离河北，系日本军部决议，万难更改。”这是在向何转达日本军部命令。

蒋对此种盛气凌人和以宗主国态度临下的凶相，完全屈服，于 6 月 10 日答应了所有条件。日方代表高桥对此似表满意。但第二天，高桥再到北平居仁堂见何应钦时，又增加了三条：主要是任命省、市职员时，希望容纳日方意见，要以日本人无意见的人物任职。还要立一份《觉书》，由高桥武官和何应钦并列署名。何闻之勃然大怒，斥责日本人实在欺中国太甚！立即命朱式勤将《觉书》退还高桥。并说，以前各点，均“自动实行”，无须以觉书表示。同时上报蒋介石，蒋来电同意何之处理。

7 月 6 日，何应钦致信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表示承诺日方所提各种要求。这就是“何梅协议”。

在“何梅协议”之前，察省主席秦德纯和日本天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于 6 月 27 日签订了《秦土协定》。此协定也经蒋介石核示同意。

这个协定共 6 条，主要是宋哲元二十九军全部撤往河北省；承认日本建立“蒙古国”的工作；察省聘日本人为军事、政治顾问；对日本在该省的军事设施予以协助办理。

在《秦土协定》签订后，《何梅协议》也已答应履行手续时，天皇裕仁非常高兴，禁不住在蒋作宾大使呈递国书时，表示“对不住，对蒋、汪二公苦心表示敬佩。”此话轻薄中含有讥讽，但蒋听到转达后，却受宠若惊，认为此乃道歉，并深为不能制止非法军人而感愧，遂特写日记以志之。殊不知，

此时的裕仁已经决定对华开战。

“何梅协议”后，日本天皇即决定于 1937 年 7 月对华开战。事实上，不管蒋如何妥协，只要不投降，就达不到裕仁要求，因此战端必开。但蒋此时仍对日本天皇大抱幻想，并不断回味裕仁的“对不住”与“敬佩”之类的鬼话。

此后，在裕仁导演下，日本政府又继续向华北自治目标迫进。而蒋介石则出于对裕仁的幻想，主动提出了三原则，令驻日大使蒋作宾向日本政府面交。

这个三原则是：要日本废除在华一切不平等条约，包括领事裁判权，租借地、租界在内；双方为维护真正友谊，不得妨害对方统一和治安，不得对对方施之以诽谤和诬蔑，中日邦交应当正常化，一切问题应以和平手段解决，凡外交机关以外分子的行动、压迫手段，应立即停止。

日本方面于本年（1935 年）10 月 7 日回答中国，也提出三原则（外相广田弘毅转达）：中国必须放弃以夷制夷政策；中日“满”三国保持圆满关系，并把和“满洲国”接近之华北纳入满洲国的势力范围；中日共同防赤，于中国北部边境共同对苏协防。

这个三原则，是日外相与陆相、海相商定的，对国内保密。

蒋知道此三原则时，仍在四川峨嵋山主持军训团。正为军训团讲心理建设问题和发表《经济建设运动之要义及实施》文章。得知三原则后，即电告汪精卫（行政院长）表示只要华北停止军事行动，事事均可商量。10 月 21 日，蒋作宾向日政府转达中国的回答。其主要意思是：中国元以夷制夷政策或意思，尤无排日意思；中国虽不与“满洲国”交往，但承认现状，保证关内外一切畅通无阻；只要日本遵行中国所提三原则，对中国北部边境防赤问题，可以协商有效办法。

这一切，当然都是秘密进行的，外界毫无所知。

1935 年 11 月 4 日，蒋进行市制改革，政府宣布白银国有化和不许使用银市，而代之以法币。

币制改革的起因，是美国 1934 年实行“购银法案”，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这个改革由英国提供 1000 万英镑为准备金，法币与英镑的比率为 1 元等于 1 先令 2 便士半。中国法币比伦敦汇率贬值 40%。这样便遏止住了中国白银外流。

日本一开始就坚决反对中国市制改革，他们认为货币统一加强了中国政治、经济的更加集中和统一，可以加强中国国势，故而坚决反对，并诬蔑市制改革为“暴举”。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甚至要求日本军部采取断然措施。

11 月 12 日，中国国民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国民政府决定抗战，蒋介石提出抗日最后关头；蒋并订党员守则 12 项：

“忠勇为爱国之本。孝顺为齐家之本。仁爱为接物之本。信义为立业之本。和平为处世之本。礼节为治事之本。服从为负责之本。勤俭为服务之本。整洁为强身之本。助人为快乐之本。学问为济世之本。有恒为成功之本。”

这 12 项，是建设性的重要原则，对社会稳定与发展，起积极作用。

11 月 24 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次日，日本又在天津制造种种事端。同时对宋哲元施加压力，要求实行“华北自治”。11 月 30 日，宋哲元致电蒋介石，表示华北可以考虑自治问题。12 月 7 日，因上月南京中央

会议间突然发生汪精卫被刺事件。[1]蒋兼任行政院长，蒋又被推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主席为胡汉民）、中央政治委员会副主席，从此，蒋在党内地位又开始上升。

针对宋哲元电告，蒋于 12 月 12 日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就华北问题提出建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建议，但要该委员会绝对避免自治与独立状态。

18 日，冀察政务委员会于北平成立。委员 17 人，委员长为宋哲元。其中有 7 个亲日派委员。政委会不是伪满，也不是自治，因而日本不满意。

1936 年 2 月 26 日，日本军人发生政变，杀死藏相、内大臣和陆军教育总监。

29 日，叛乱平定，冈田内阁辞职，外相广田于 3 月 9 日组阁。于是日政府又增派 6000 余人侵驻天津；派 3000 人登陆秦皇岛。同时策划华北脱离南京。文武并进，侵华步伐加快。

1936 年 9 月 23 日，日本政府又向中国政府提出 7 项要求，主要是要蒋承认华北五省自治（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中央只保持名义上的宗主权；中国政府聘用日本顾问；对日本货物采取优惠待遇；修改反日教科书；“中日经济提携”；共同防共等等。

蒋对此坚决予以拒绝，并要求废止上海和塘沽等三协定；取消伪冀东政府；取缔走私等。日本大使川越茂亦断然予以拒绝，谓中国不得提出以上条件。蒋为之震怒，于 9 月 24 日日记中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并同时也已认识到，日寇必然对我开战。他说：“察倭素性之横暴，决不能避免战争。”

蒋已经开始感觉到对日终不免一战，但仍是顾虑重重，决心难下。蒋于 10 月 8 日，又应川越茂之请求，和川越茂谈判。

西安事变

蒋介石一边对日本天皇求和，步步于华北退让；一边又对同是炎黄子孙的中央红军，进行全力围攻，百折不挠，这是典型的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曾国藩老洋务派国策。

中央红军于 1934 年 10 月 16 日突围，开始了举世瞩目的万里长征。蒋于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2 月，对中央红军和二，四方面军，以及到达陕北后的红军进行了追击、堵截和围攻，共用军队 35 万人左右。中央红军则从 10 万人减少到 7000 人左右。加上各方面军和徐海东红二十五军、陕北刘志丹部红十五军团，1936 年陕北红军总共 3.5 万人左右。

1935 年，红军北上途中，第三国际草拟发表了中共“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自遵义会议（1935 年 1 月）后，中共就开始向蒋介石转达信息，希望团结抗日，表示红军可以接受改编。第一次由罩振转达蒋介石；第二次由胡宗南转达；第三次，中央红军已到陕北，由邵力子转达。毛泽东甚至表示如能团结抗日，自己可以出国考察。但蒋介石均不答应，一定要消灭红军。

1935 年 9 月 1 日，周恩来通过陈立夫，再次对蒋提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要求。蒋仍未答应。可见蒋是一定要消灭中共。而当时中共也未想到联

---

[1] 此案实系反蒋派要刺杀蒋而未成，才转而杀汪。当时不知为什么原因，蒋在 照像时未出外合照，躲过这场刺杀。案发时，张学良当场将凶手捉住。

蒋抗日的可能。

自 1935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2 月，蒋介石又对陕甘宁红军进行了三次围攻。在第三次围攻中，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1936 年广东发生“六·一”事变，广西李宗仁联合陈济棠，共同反蒋，但由于蒋以重金收买陈的部下黄光锐，黄叛陈投蒋，率飞机 49 架归附南京，两广失败。蒋于是全力“剿共”。

张学良在 1935 年 9 月间，仍然相信蒋介石的“先安内而后攘外”政策，对他的部下和士兵大讲完成“剿共”任务后，再北上抗日。但同年 11 月下旬，张学良的牛元锋一〇九师于直罗店被红军全部歼灭，牛被击毙。此事对正在南京开会的张氏刺激很大。而蒋又不允他重建番号，使其消灭一个师，就少一个师，更促使张学良开始怀疑蒋的“先安内”政策。他认为蒋的“安内”中也包含着要借“剿共”而消灭或削弱他东北军的意思。于是他开始想到拥蒋联共抗日问题。

自从驻扎到陕西后，张学良的机要秘书苗剑秋，积极主张联共抗日，对他不断施加影响。还有应德田，作为张学良的亲信人物，也积极主张联共抗日。这些影响，对张学良开始发生作用。

张自南京开完会后，又到上海一行，见到老友杜重远，杜又对张宣讲抗日救国为第一要务的道理，张也受到影响。

张学良自上海回陕西后，在甘泉战役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也已于 10 月被放回东北军。因高是张的爱将，张学良于洛川接见了高福源，看了高交上的中共信件。张看信后，决定和中共代表见面，并立即写了回信，与中共相约在洛川会见。

1936 年 2 月 25 日，中共代表李克农到达洛川。张学良于 3 月 3 日到洛川见李克农。此次会谈中，主要解决了双方立即秘密停战，和东北军对红军的弹药被服的援助，以及西安至肤施（延安）的公路安全问题。但在统一战线中，张学良坚持包括蒋介石；李克农则认为不可。张坚持已见，并表示要亲自见周恩来。

4 月 9 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清凉山下桥儿沟天主教堂，举行了会谈。张学良首先说明他拥护蒋介石实行法西斯主义是错误的；但他拥护三民主义的抗日统一战线，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他认为统一战线应当包括蒋介石。周恩来则用 1935 年以来，中共屡次争取蒋介石停战言和，共同抗日，均被拒绝的事实，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争取到蒋介石当然很好，但是蒋介石是难以争取的：“蒋介石目下正像满清的西太后一样：‘宁给外人，不给家奴’……共产党在过去也不是不愿意争取这个集团的力量参加抗日，是考虑到可能性不大。只有用群众的力量粉碎这个反动集团，对抗日救国才有利。”[①]

张学良则坚持认为，蒋对日本也很仇恨，因为日本总给他难堪。蒋所以要先消灭共产党，然后再抗战，是因为共产党的口号总是要打倒他，他不放心。

张的后半段话也不准确,因为中共自 1935 年 1 月后就一再表示要与他和好，而是蒋氏坚决不干。“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周恩来的这个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①]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 年北京版，第 56 页。

周恩来听张说完后，对中共的反蒋口号问题，表示可以考虑改变，进行让步。但又说，让步也不要忘记斗争。两人遂达成协议。

此后，东北军和红军关系进一步密切起来，还经常互相交流情况。

周、张会谈后，中共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5 月 5 日（1936 年），中共又向南京呼吁国共合作抗日。蒋自然又是坚决拒绝。6 月、张学良创办王曲军官训练团。9 月，又成立抗日同志会，张学良为会长，开始私下批驳蒋介石的“先安内而后攘外”政策。

同时成立学兵队，其中有许多中共党员。

张学良劝蒋抗日的决心，此时已坚不可摧，等待时机一到，张就努力实践自己的主张。

同年 10 月 22 日，蒋到西安后，先游华山，两天后才向张宣布计划。张乘此机会恳切劝蒋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并说这是东北军绝大多数将士的一致要求。杨虎城也从旁帮腔，说就目前实际情况，难于再继续“剿共”。

蒋听后，怒气冲冲，当场斥责张、杨动摇军心，并声言自己前去解决士气问题。蒋于 10 月 26 日到王曲军训团讲话，欲说服军官服从他的意态。他所讲的，又是礼义廉耻，忠孝节义的一套，这些话，对流亡关内的军官们简直是无法接受，至于他对中共的指责、攻击，大家当然也是声声难于人耳，毫无作用。事后苗剑秋就对蒋的讲话进行了批驳。但这事被特务知道了，报告了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晏要张学良交出苗。张则口言毙苗，却暗中将苗放走。苗到日本躲避了三个月。

西安蒋、张争论后，蒋即于 29 日返洛阳过生日。南京 10 月 31 日举行蒋的 50 寿辰典礼，蒋于当天发表《报国与思亲》讲话，以孤臣孽子自任，大力宣传“励精知耻，刻苦自强”；并再次强调以“八德”为立国精神，号召国人“以孤寡再造衰宗之志，戮力报国”。生日过后，蒋再飞太原见阎锡山，令阎协助“剿共”。

月 19 日，蒋又飞抵济南见韩复榘。23 日，蒋命上海警察局逮捕七君子，镇压抗日运动。

这时，蒋介石对张学良的认识还很肤浅，只是认为张对“剿共”不坚决，做事不知分段落，并说“可叹”！但万未想到张学良会逮捕他。

这时期，西北军也受东北军影响，对红军转人休战状态。

“针对这种情况，蒋决心亲自驻在西安，以便将“剿共”进行到底。

11 月 28 日（1936 年），蒋又到绥远见傅作义，安抚之后叫他也协助“剿共”。

自 10 月下旬蒋、张西安见面后，张学良便开始在人事上进行更动，准备兵谏。他调孙铭九任特务团长；调进步军官任师长。

12 月 2 日，张再到洛阳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对此当然仍无法听进。蒋也听到特务们对西安情况的报告，知道东北军和红军间的停战、互助、友好情况。但蒋一直过于自信，他认为东北军出于痛心国难，有些过激越轨行为，有情可原，他深信如果由他“剀切诰谕，亦必能统一军心，使知国家利害之所在”。怀着这种自信心，蒋于 12 月 4 日由洛阳飞抵西安，驻西安东郊临渲县骊山下华清池。

与此同时，蒋将其嫡系部队开进潼关；大批战斗机也降落西安机场；蒋之军政大员陈诚。蒋鼎文、万耀煌等，也均齐集西安。蒋以万耀煌二十五军控制咸阳；胡宗南第一军，则监视东北军和西北军；又从两广调中央军北上，

向陕西推进。蒋的本意是威逼张、杨进攻红军，如张、杨不从，则迫令离陕，予以监视。

张、杨对此阵势则认为蒋氏意在围歼东北、西北军。这时蒋对张、杨明言相告，如不“剿共”，就调杨虎城十七路军到安徽；调东北军到福建，将陕西让给中央军。

这对张、杨是一个极其严峻的问题。调走，也将被分割、缴械；“剿共”则军心不稳，也是凶多吉少；如能争取抗战，则既有收复故土之望，亦可保持本军存在。想到此处张学良便调东北军各军军长到西安，会商对策。双方均调兵遣将，气氛异常紧张。

到 12 月 7 日，张学良对蒋又进行了最后一次谏净，词语沉痛恳切，态度激昂慷慨。他向蒋指出，惟有领导全国团结抗日，才是唯一正道；并声明，自己有为蒋领导抗日而牺牲一切的决心。

但蒋介石哪里听得进去，便冷笑道：“不要再讲了！我听不下去！”至此唯一道路，就是逼蒋抗日。这就是“兵谏”。这一天，张学良开始考虑兵谏的问题。

到 12 月 9 日，西安学生举行了“一二·九”运动周年纪念，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并向华清池行进，向蒋直接请愿。

蒋得知此事后，立即命令在华清他的张学良：“学生如不听话，可以用武力制止。”这个命令，可以理解作血腥镇压爱国学生的杀机，对张的震动极大。他不得不迎头赶向前来的学生们沉痛陈词，阻止学生到华清池。但学生们万没想到这位蒋委员长，竟下了杀戮的死命令，不听张的劝阻。最后急得张学良，不得不对学生们慨陈决心：“请你们相信我张学良。我和你们是一样的心情，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更迫切。你们的意见，我一定给你们转达到。你们请回去，我保证一星期之内，达到你们的要求。”学生们这才返回。

第二天（12 月 10 日），张学良对其心腹幕僚表示了兵谏的想法。他说：“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他坚持错误到底，非强制不能扭转。”并明确说要把蒋“抓起来！逼他抗日”。当时有人提醒他，即使蒋答应抗日，以后也不利啊！张则说只要抗日，就有办法，不必想那么多。其实，现在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至于个人后果，张尚未料到是终身监禁，杨也未料到定遭杀身之祸。

杨虎城这时已同意张学良的兵谏决定。

为实行兵谏，张学良把亲信旅长唐君尧于 11 日自平凉调人西安，令其率孙铭九特务团具体执行华清池扣蒋任务。当晚，唐到家里对妻子撒了一个大谎，说师长今晚打牌输急了，不许任何人回家，要打一夜的牌，叫家里放心。

杨虎城则负责城内任务和扣押各大员。张的卫队在灞桥接应。11 日晚 11 时，张学良于金家巷一号楼会客室宣布兵谏计划，并以杨虎城的新城大楼为兵谏总指挥部。12 日凌晨 2 时，开始兵谏行动。5 时半蒋正穿睡衣作床上运动，闻枪声后，便想由后门逃走，因后门锁着，只好翻墙而过，正好坠人墙外深坑中，摔坏腰椎，疼痛难行，便由蒋孝镇背着，迅速向东，爬山而上，经半小时登上顶峰。当确知为东北军的行动时，蒋便下山回华清池。行至山腰处，不料又陷入一个洞穴，穴可容身，蒋就势躺下，暂定惊魂。

当队伍找到蒋孝镇时，始知蒋在此山腰处，孙铭九便派人搜寻。当找到这个洞时，有个士兵要向洞中开枪，班长陈思孝马上制止。此时蒋怕开枪，

乃高声说：“我就是蒋委员长。”还说：“如你们把我当俘虏，可把我枪杀，但不得稍加侮辱。”陈即大声报告孙铭九“蒋委员长在这儿啊！”

这时蒋穿一件古铜色绸袍和白色睡裤，脸色苍白冻得索索发抖，从山洞里钻出来。孙对蒋执礼甚恭，请其下山。一会儿唐君尧来到，特向蒋敬礼，说明兵谏目的，劝蒋不必难过，到西安商谈抗日大计。蒋问：“你是谁？”唐立即回答。蒋一面听，一面沉思，由唐挽扶着，自华清池墙外下山（怕蒋看见卫兵尸体），到华清池大门口，唐即陪蒋上车返回西安，送蒋到新城大楼。一路上唐向蒋不断解释兵谏目的。蒋则静默不语。

蒋的随员：蒋鼎文、朱绍良、陈诚、陈调元、蒋作宾、卫立煌、陈继承、万耀煌也被扣于西安招待所。钱大均也自华清池押送西京招待所。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被处决；邵元冲因于城内住处跳墙逃跑被当场打死；刚到西安的蒋百里，也被一起扣起来。

事变以后，张、杨立即以“八大”主张通电全国并向中共中央电告兵谏之事。

八大主张的主要内容是：停止内战，改组南京政府，一致抗日；释放政治犯和七君子；保障集会、结社、言论自由；实行孙中山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

蒋住入新城大楼后，拒绝与张学良谈话，态度倔犟，甚至于捂着耳朵不听张说话。张则说此举为抗日救国不应拒绝交谈，就是敌人，也有谈判余地啊。蒋则生气地说，“敌人尚有何话可说，我决不向叛逆屈服。”

张学良听见蒋骂他为叛逆，非常恼火，就说他的主张代表人民的意见，“今发动此举，当交人民公断。”如果国民赞同我的主张，就证明我代表了人民公意，那么就“请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如舆论不赞同，则我应认错，请委员长再来收拾。”总之，张要蒋认真考虑，不必生气和性急。

蒋听张要交“人民公断”，更为忿怒，立即严斥张学良：你要民众赞同你，那是妄想！你叛逆也能“称革命乎”？接着又进一步要张学良反省，并说“今日以后，茫茫大地，何处是尔容身之所？

尔真生无立足之处，死无葬之地矣！”

张学良更年轻气盛，一听此言，顿然变色：“你还如此倔犟！”

蒋马上反问张学良：什么叫倔犟？你小子知道什么！我代表四万万人民的品格和中华民族的正气；正气怎么叫倔犟呢。你如有勇气，就立时将我枪毙好了！

张听此言后，略加思考即对蒋说，你真的没有考虑余地？那我就走了。蒋则紧接着说：走你的罢！

这场争吵暂时结束。

12 月 12 日这一天，杨虎城的部下孙蔚如曾向杨建议逮捕张学良，释放蒋介石。但杨虎城极重信义，坚决不背叛张学良，对孙的建议予以婉拒。这天晚上，杨虎城的参谋长李兴中又接到一封匿名信，说是有人要营救蒋介石。张知道后，便决定请蒋移驻高桂滋公馆，脱离开西北军。但蒋介石却以为真的要枪毙他了，抵死不搬，并用被蒙上头，对刘多荃、孙铭九等说：“我是兼行政院长，……这是公家的地方，让我死在这里吧！我绝不到别的地方去！”

14 日端纳见蒋，说明详情，又呈上宋美龄的信后，蒋始心中有底，同意搬家。

宋的信，主要是暗示蒋同意团结抗日，以早离险境为要。蒋从中知道张

学良、杨虎城确无相害之意！便放下心来，但并未悟美龄真意。

西安事变后，苏联站在反对张学良、杨虎城的立场，骂张学良为叛逆，《真理报》说张投机，假借反日为名，促成中国分裂。

《消息报》说张学良破坏反日力量的团结。奇怪的是苏联和日本裕仁完全站在了同一立场。日本政府说什么国民政府如果在抗日容共方面与张学良妥协，日本坚决反对！

蒋当时并未抗战，而是正在积极“剿共”，苏联对此，不是不知，何言扣蒋则破坏抗日团结呢？如从而逼蒋抗日，不是更有利吗？如果不是此后团结抗日，红军在陕北的力量将处于危险之中。

何应钦闻蒋被扣后，于 16 日发兵进攻陕西，[1]同时派飞机轰炸西安。这时端纳已由西安返南京，宋美龄又请端纳返回西安，劝蒋下手令给何应钦，停止轰炸西安三天。蒋写了手令，由蒋鼎文送往南京。18 日晨停止轰炸。

中共中央得知蒋被捉后，从情感上实有杀蒋之心，但考虑到斯大林 14 日电告联蒋抗日意见和国内现实情况，于次日派周恩来到西安帮助张学良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一直拥蒋抗日，当然不同意杀蒋；西北军和东北军之激烈分子则多主张杀蒋。杨虎城虽也同意了放蒋原则，但心中始终疑虑重重！放蒋原则于 12 月 18 日正式确定下来。

宋子文和端纳于 20 日到达西安后，张学良即向宋子文正式表明：只要蒋答应八大主张，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共三方一致同意放蒋回南京。

宋子文见蒋，交上宋美龄的第二封信，信中言道：“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蒋看罢信文，不觉潸然泪下，甚是伤感。接着蒋就装模作样地写遗书给宋美龄和蒋经国，托宋子文代交。

当谈到八大主张时，蒋仍坚决拒绝，并要南京进兵陕西，救他出险。宋子文无奈又于 21 日返回南京搬兵。蒋与宋告别时，告诉宋，如五日内进军西安，他的生命尚有希望，并叫宋美龄切不要来西安（反语，真意是要宋美龄来）。

次日，宋美龄兄妹、端纳和戴笠等一同来到西安。蒋看见宋美龄，就哭将起来！又说今天看圣经时有“将令女子护卫男子”的语句，你今天真的就来了！

宋美龄当面告诉蒋，以先脱身回南京为第一要务，回南京后，再言其他。蒋这才领悟了宋美龄第一封信的天机，于是答应以口头允诺方式，实行张、杨八大主张的精神。最后又将八条归结为六条，内容和八大主张大致相同，惟增加了肃清亲日派，允许共产党公开活动等条款，作为谈判基础。

宋子文兄妹代表蒋介石进行了谈判，对谈判条件大体都予以通过，其中有改编红军以及东北军、西北军、红军的军饷数目规定。红军军饱每月为 50 万元。

最后归纳为六项和五项两文件。由蒋口头应允。五条件中有对参与西安享变人员“一概不究”字样；还有红军改编，由张学良负责的规定。张因此更大胆放心地送蒋回南京。

24 日达成协议。同日周恩来见蒋介石。周第一句话是：“蒋先生，十年不见了。”蒋则十分尴尬，表示停止内战。

25 日下午 4 时，张学良送蒋回南京。26 日中午 12 时到达南京。

---

[1] 此经中央政治会议议决，推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下令讨伐张学良。

蒋一到南京，除了停止“剿共”，联合抗日等条件未推翻外，对“概不追究”一条完全推翻。马上扣押张学良，继而将张审判，先判十年徒刑，蒋再请求赦免，交军委会监禁终生。对杨虎城，也先予免职、后则监禁，最后于 1949 年 9 月刺杀，连妻儿也未放过，观此，知蒋氏仍在私心自用。

1937 年 1 月，蒋介石停止“剿共”，并开始谈判国共合作和红军改编问题。1 月 31 日，蒋指示红军每月军费为二三十万元。番号仍旧。2 月 8 日，蒋又指出，如要统一军队，中共不能再宣传共产主义，而要共同实现三民主义。对西安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又特别指示，仍以《孙越宣言》为根据，强调中国不适于实现共产主义，而应实现三民主义。中共表示如政府坚持原谈判条件，则中共停止武装暴动；改苏维埃为中华民国政府特区；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中央领导；停止没收地主土地。

但 2 月 21 日，南京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又通过《根绝赤祸案》，其内容重点为：根绝赤化宣传；根绝阶级斗争。同时坚持红军向中央输诚，而不是统一改编。

蒋对中共的态度，根本上仍未改变，只是策略变化。他在 2 月 5 日的日记中就说：“对内避免内战。然一有内乱，则不放弃勘乱安内之责任。”3 月 6 日，蒋又对日使川越茂说：“我国对共产党政策并未有何变更。此点可于前次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案证明之。”

基于此种思想，蒋是坚持禁止中共宣传共产主义的，并制定多种“限制异党活动”的文件，更对中共发动多次武装进攻。故 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再次发动内战，实为必然。

因此，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只是将“先安内而后攘外”改为暂停“安内”之策。

但蒋的抗战决心，则是在 1937 年“七·七”事变后，才最后坚定下来。

以后，蒋介石对这个策略的转变，深感遗憾，他认为西安事变是一大挫折。他说：“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一大顿挫。

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两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几全毁于一旦。”[①]

战前建设

蒋于战前，以所发行公债 19 种作为建设资金，完成了交通、通讯等方面若干建设。

铁路：一为修建新路；二为旧路整修。自 1935 年开工修路，先后修通粤汉路南段；浙赣路接通粤汉和沪杭路；陇海路延长至宝鸡；陇海台赵支线与津浦台枣支线接通；山西修筑同蒲路和榆次至太谷铁路段；江苏修筑苏州至嘉兴铁路段，接通了京沪和沪杭两线；安徽省修建淮南铁路；浦口轮渡 1933 年 9 月完成。

公路：1931 年 11 月开始督修全国各处公路，连通了苏浙赣皖鄂湘豫 7 省。

水运：战前全国轮船为 1294 艘。1935 年底增至 3959 艘。

航空：上海、南京、汉口最早设机场。1928 年 7 月开京沪航段。1929

[①] 见《苏俄在中国》一书。

年 5 月 1 日成立中国航空公司。中美共营滇沪、京平、汉广三航线。美方提供飞行技术人员，中方给报酬，提供设备。1931 年成立欧亚航空公司，与德国合办。中国经营沪川、沪平、沪粤线：欧亚经营沪兰、平粤、兰包线。中航又代营渝昆、广河（广州至河内）二线。欧亚航空公司又代营滇陕线。中航 17 架飞机；欧亚 7 架，其中 4 架又系租用飞机。

通讯：开始统一邮资；增设邮局；开辟邮路；举办小包邮件；试办存证信函；代购书刊；设邮政储金汇业局；办储金所，储户有 24 万人，扩充汇总业务；创办邮政代办所汇票；开办航空汇票，电报汇票；创办简易人寿保险。1935 年下半年，已有一万户参加保险。

增设有线电报、无线电报、市区电话、长途电话等。到 1935 年设有电报所、局 1346 所。1936 年全国无线电台有 58 处，电机 129 座。国际上，则有中美电台、中法电台、中英电台、国际支台。

无线电广播电台方面，1928 年在南京设立中央台。

电力：1927 年以前全国发电 772000 度。1935 年增至 1568737 度。全国电业 456 家。中外合资者，只占 10 家。民营 423 家。公营 23 家。但中外合资二家发电量却占全电量之 47%。

水利：当时由全国经济委员会兼领水利，设有导淮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广东治河委员会、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华北水利委员会，分管全国各处水利事业。

农业：1929 年开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以县为基层推广单位，并成立农校、建立农业银行、农业仓库，实行垦荒、灌溉。实际效果如何呢？就中央农业实验所发表的数字看，也有一定增长：1931 年，稻产量为 86158.5 万担，到 1935 年，则为 96079.3 万担。略有增长。小麦，1931 年为 29577.9 万担，到 1935 年，则为 422605.2 万担，增长较多。但此数字很不精确。

工业：现代工厂数目，各种统计均不一致。大体上，抗战前我国工业很微弱，总厂数约在 3000 家至 4000 家之间。工人约六七十万人。

其制造业产值自 1931 年至 1936 年间，也略有增加。1931 年总产值为 785724.4 万元。至 1936 年又上升为 1009116.6 万元。而其中现代工厂产值却远比手工业产值为小。

1931 年工厂产值为 211784 ·9 万元；手工业则为 579339.5 万元。到 1936 年工厂产值为 271998.2 万元；手工业产值为 737118.4 万元。工厂产值也有增加。

教育：1927 年 10 月，成立中华民国大学院。国民政府公布《大学区组织条例》，划分若干大学区，各大学区设大学一所，但只实行一年（仿法国）就停止了。

1928 年 11 月，又恢复原来体制。1929 年又公布《大学组织法》。1931 年公布《专科学校规程》，改专门学校为专科学校。大学分国立、省立、市立、私立 4 种。大学分文、理、法、教、农、工、商、医各学院。三学院以上者称大学，否则称学院。一般大学为 4 年制。大学中附设研究院和专修科。大学有校长、院长、系主任。教师分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 4 级。

高校 1928 年有 49 所。1937 年增为 67 所。专科学校由 24 所增为 77 所。师范学院有 15 所。

到 1947 年，全国高校共 130 所。

第三章　对日抗战

“七·七事变”

经过 1939 年以来的《塘沽协定》、《何梅协议》、《秦士协定》，北平、天津地区，已成为日寇的势力范围。自山海关到丰台，铁路沿线均有日军驻扎；平东通县，已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纯系日本傀儡；平北是热河、察北驻有日、伪重兵；西北面为李守信、王英伪军；只有卢沟桥仍为中国军队宋哲元部把守。如果日军再侵占卢沟桥，则北平尽人日寇之手。

日本方面，在天皇裕仁操纵下，表面声称采取“不扩大方针”，而实则步步紧逼。先订《塘沽协定》侵占平北、平东；再订《何梅协议》控制平津。至此仍不罢休，又制造借口，进攻卢沟桥、于是爆发“七·七事变”。

1937 年 7 月 7 日，侵驻丰台日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于夜间在卢沟桥北举行军事演习。借口一士兵擅自离队便解未归，诬称该士兵失踪，藏在宛平城内、要进城搜描。中国驻军占星文部奉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之命，坚守宛平，拒绝日军入内，双方开始频频交涉。但日军肆意挑起事端，毫无诚意，于 8 日晨 4 时 50 分，对卢沟桥发动全面进攻，打响了攻城第一枪。仅 8 日一大内，日军就攻城三次，均未得逞，“七·七”卢沟桥抗战从此开始。

卢沟桥日寇侵华事件发生时，蒋介石正在庐山，7 月 8 日得到北平市长秦德纯的报告。接报后，蒋对是否立即进行全面抗日，仍未下定决心。他于当天日记中写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又言：“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当时，连天皇裕仁葫芦里装的什么药，蒋还未搞清楚，又如何谈下定抗日决心，难怪他在日记中自问自疑。但他也感到应准备在日方扩大事态时，与之抗争，不可麻痹大意。所以立即电告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需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这大蒋介石经过一晚的考虑和思想斗争后，于次日（9 日）下定了准备进行全面抗战的决心，并立即召何应钦自四川返回南京，着手编组部队，准备应战。同时又电令宋哲元严阵以诗：“守上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相应付。至谈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惯伎，务须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①]又派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北上河北保定、石家庄地区，准备同日军作战。

除此之外，蒋又于 10 日采取三项紧急措施：

（一）编组战斗部队，第一线为 100 个师；预备军为 80 个师，7 月底前，组建好大本营和各集团军、军团等。

（二）将供 6 个月用的弹药屯置长江以北三分之二，以南三分之一。如果兵工厂一旦被摧毁，则从法国、比利时购买军火，经香港、越南运回国内。

（三）准备后备兵员 100 万人，军马 50 万头和 6 个月的军粮。

日军方面，则于此时急向宋哲元进行要挟，宋军妥协。派张自忠和日方代表松井太郎谈判。于 11 日下午达成屈辱和约：同意向日方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宛平城和龙王庄不驻中国军队；彻底取缔抗日团体等。

此约未呈蒋氏核准，只是宋哲元主动对日妥协。故蒋对此屈辱和约不予

[①] 《秘录》，十一，第 12 页。

批准，并命外交部长王宠惠以备忘录形式，通知日本驻华使馆：“任何谅解，未经中央核准者，无效。”[1]

日本政府则于同一天，在东京举行五相会议，由近卫首相主持，外相、陆相、海相、大藏相出席。会议中决定以日本本上三个师团、朝鲜一个师团、“满洲”两个旅团为进一步发动侵华战争之援军。当日傍晚，日本政府又玩弄贼喊捉贼伎俩，说他们并无侵略意图，而是中国军队抗日，导致事件发生：“此次事件，完全出于支那方面计划性的武力抗日行为”。在中国领土上，先行开枪挑衅，却不许中国军队在自己领土上进行抵抗。如果中国军队反对其挑衅和侵略，以武力抵抗，就是中国‘挑’起事端，于是日本政府‘因此，……下重大决心，……对支那出兵”。这就是日本天皇和军国主义分子的逻辑。

第二天（7 月 12 日），日本政府任香月清司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同时制定了侵华作战计划。事态发展到此，蒋已感到必须急谋对策。他于当日日记写道：“战事势必扩大，不能不亟谋应付之方”。蒋介石这时已经完全认识到，日本必无满足之时，又于 13 日对宋哲元发电告诫，表示准备抗战决心。”日本外务省亦声明：“今后军人对军人交涉”，不关外交当局之事，同日，蒋电令宋哲元本不扩大方针，就地抵抗。并指出“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2]

自 7 日至 13 日，蒋介石已经下定抗战决心。

但宋哲元并不理会蒋的告诫和准备抗日的决心，仍是抱着局部解决的幻想。当香月清司到中国后，于 14 日派参谋向宋哲元提出了 7 项苛刻的、完全控制华北的条件，最主要的是撤退中国军队，撤走中央机关，取缔“排日”活动。而宋居然派张自忠于 19 日签署了该协定及其 7 项条款，并报请中央批准。

蒋介石当然不予批准，自 16 日开始，多次电示宋哲元切勿对日军抱有任何幻想。

18 日的电文如下：

“倭寇不重信义，一切条约皆不足为凭。上海‘一·二八’之战，本于开战之前已签和约，乃于签字后 8 小时仍向我沪军进攻。此为实际之经验，特供参考，勿受其欺。”[1]

蒋介石的抗战决心就此迅速坚定起来，其根本原因是日本侵略者要灭亡全中国，而不仅仅是东三省和华北，如果再不抗战，就要亡国；南京就要成为东北和华北；蒋家王朝就要倒台或当日本的傀儡。对此，蒋无论从个人或民族观念考虑，均无法接受。就蒋本人来说，他从来不愿受人管束，况且他现在已为一国至尊，要他对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称臣纳贡，他如何能接受呢？！加之他对中华民族古老文化和丰富渊深典籍的顶礼膜拜与坚深信仰，使其更具有东方文化中心的优越感；在蒋看来，泱泱文化古国，焉能臣服倭寇！他曾对斯诺说：“我国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留给我们的历史上的责任。”

因此，蒋介石在 17 日于庐山谈话时，再次表示了准备坚决抗日的决心。他说：

---

[1] 《秘录》，十一，第 15 页。

[2] 《秘录》，十一，第 19 页；《总集》，三十六卷，别录。

[1] 《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第二卷，第 1064 页。

“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讲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之条件。全国民众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

“和平已非轻易可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日本）军队无限制地出入于我们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

“我们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

“今日的北平如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

“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

最后他表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些话是蒋的肺腑之言，也是他最为关注之他的统治和国家存亡的根本大计。在国家存亡危急之秋，他经过多年的徘徊和委屈求全的痛苦后，在最后关头，毅然抗战，决不投降，则于民族大义上，尚是凛凛一躯。

促使其下定最后抗战决心的原因，还有对西方反对德国和日本法西斯力量的寄望。他认为美国和英国等，都会参加对德国和日本的战争，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蒋虽已表示准备抗战决心，但终因他思考问题的轴心是自身统治的利害得失，还抱有说服日本和平解决争端的幻想，对于全面抗战的实行，仍有些惧怕心理。于是在 17 日谈话中，蒋仍呼吁日本能给予和平解决的希望。

“卢沟桥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和平解决。”

当然，他的和平解决，并不是宋哲元丧失领土、主权，把平津让给日本人的和平，而是不失去中国主权领土的和平。如果连这点也达不到，那即是“最后关头”的到来。所以他一面准备坚决抗战，一面仍不放弃哪怕是最后一秒钟的和平呼吁。在 17 日的谈话中，又提出 4 条最低交涉条件。主要是：

“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上之完整。

“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有任何的约束。”

接着蒋又指出：“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的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到‘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蒋最后表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如果日本政府不考虑以上四项要求，他就只有抗战一途。

但对于抗战，他仍是唱的低调。他说：“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

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方法。……”[1]

17 日，日本政府却向中国外交部送交一份照会，公然指责中国政府在自己的国土上调兵遣将，形成对日本的挑衅。[2]不惟如此，进而更要中央政府“对于华北地方当局解决条件之实行，勿予妨碍”。严然以宗主国自居。

事已至此，蒋无法再抱任何幻想，遂命将此照会由外交部驳回。同时，日本驻华武官喜多诚一到军政部见何应钦，又对何公然进行威逼，说什么中国派军进驻保定、石家庄，日本政府不能漠视；如果中国军队不从这些地区撤走，必然引起中日全面军事冲突。并说此乃日本政府对中国表示的最后友谊，并非威胁。

对于日方的无耻要求，何应钦立即予以驳回，他说：“中国军队之移动，全系出于自卫。……事态扩大与否，在日方，不在中国。”[1]日本武官扬言：“日本对此非常时局，已有重大决议”，不打自招地道出其侵华野心。

7 月 19 日蒋介石再次于日记中表示了抗战的决心：“书告既发，只有一意应战。不再作回旋之余想矣。”至此，蒋最后下定了进行全面抗战的决心。

主意既定，蒋遂于当日对周恩来、博古、林伯渠表示正式承认陕甘宁边区，与中共共同抗战。

第二大，即 7 月 20 日，蒋介石立即自庐山回到南京，召集军政人员开会，商讨对策。

日本驻华使馆参赞也于同一天到中国外交部找王宠惠外长，反复要求南京中央政府承认华北的一切协定和立即停止“反日”行动以及中止中央军北上。王外长对此予以拒绝。

但宋哲元却对中央表示动摇，有意不经中央批准，于 19 日擅自承认 7 项条件，并主动撤除北平城防。

蒋见此情况，于 7 月 22 日电宋哲元，对其拆除北平防御工事，予以批评，指示其“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勿为所算”。同时要将对日协议经过迅速报告。

接着蒋又派参谋次长熊斌到北平。宋哲元也借故看部下，取得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月的同意，由天津到北平见熊。宋见熊后，已得知蒋介石的抗战决心，但他仍未认真考虑抗战问题。

这时，日政府一方面公开宣称不扩大事态，一方面调遣 8 个师团，约 16 万人由山海关侵入华北。至 26 日零时，日军突然对宋哲元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刘振三旅开火。刘部被迫应战，至上午 10 时，刘部撤退，廊房失守。日军又进一步提出完全占领北平的蛮横无理要求。

时局至此，已危机四伏，而宋哲元却仍无认真备战，更未对日军出击，甚至连作梦也未想到日军马上就要全面进攻北平；因此还在准备限期撤军。

日寇驻丰台军队一部，又于 26 日傍晚，伪称使馆人员，骗闯广安门，被二十九军刘汝珍团击退。

这一天，蒋在日记中记下自己的感想。他认为，廊房、广安门之战，证明日军要消灭宋哲元第二十九军，战争已不可免，和平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希望，已完全没有了。这时，蒋才最后放弃了和平幻想。

---

[1] 《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卷，第二册。第 1064 页。

[2] 《秘录》，十一，第 25 页。

[1] 《秘录》.十一，第 25 页。

当二十九军还未准备好应战姿态时，日军就于 27 日午前，突然进攻通州中国守军，晨 5 时，在 18 架飞机配合下，以骑兵突袭团河中国驻军。二十九军该地驻军牺牲千余官兵。当日午后，日军又袭击高丽营、昌平、汤山、沙河等地。至 28 日拂晓，香月清司率日军铃木混成旅团、河边旅团和机械化旅团，自北苑、西苑、南苑一齐对北平城发起总攻击。二十九军措手不及，损失惨重，伤亡 5000 余人。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于南苑壮烈殉国。

宋哲元立即于同日午后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奉蒋命放弃北平，退守保定；留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主任、北平市长之职。30 日，宋又放弃天津。

蒋介石于 29 日就放弃平津的计划，向记者发表谈话，说明平津之役不过是战争的开端，不是结局，号召全国以一致决心，共赴国难。31 日，又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在此书中，他谴责日本人逼他订立城下之盟，他元有选择，必须奋起抗战！最后他号召大家：“只有齐心努力杀贼，有进尤退，来驱逐万恶倭寇，复兴我们的民族。”这时，蒋介石对日本天皇和政府，己恨之人骨。

全面抗战开始

“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陆相杉山元上奏天皇时，声言三个月内征服中国，狂妄不可一世。但蒋介石并不相信此狂言，于 1937 年 7 月 31 日开始部署全面抗战军事，急速调军作战和编组全国军队，8 月 2 日成立大本营（10 月初又取消）。

蒋首先命平地泉之汤恩伯第十三军，移驻张家口。继令该军八十九师于居庸关南下南口，向北平推进，孙连仲二十六师向北平西南窦店挺进，然后由南转北。8 月 11 日，空军完成对日作战准备。

日本侵驻上海的海军，也同时在上海制造事端，进行挑衅，要求中国从上海撤出保安部队。上海市长俞鸿钧奉蒋命予以拒绝。8 月 11 日，蒋调张治中率八十七、八十八师进驻上海近郊，准备对日作战。12 日，中常会通过成立最高国防会议。

这时蒋于华北的部署乃是虚张声势，而在上海的部署，则是要与日寇进行一次决战。蒋所以选在此处决战，是因为日本军队如果沿平汉线南下占领武汉，控制中国的中枢地区，则留在东南沿海地区的中国主力军，只有背海作战，使东南人力和物力尽落日军之手，这对中国极为不利。为此，便以精锐之师对上海日军主力猛攻，诱使裕仁将其主力或精华投入上海地区，使日军形成沿长江西上仰攻态势，而中国则从容撤退军队和搬迁资财，以空间换时间，进行持久作战，打破日军速决战的侵华计划，等待国际局势的有利变化。同时也有以上海战事危及各国租界，从而促进英、美等国加速干涉的意思。

裕仁果然按蒋氏计划行事，将主力军投入上海，而使华北战事处于次要地位。

日军于 8 月 13 日上午 9 时 15 分，开始进攻横滨路、宝兴路 地段；下午 4 时许，再进攻八字桥、通天庵、宝山地区，“八·一三”抗战全面爆发。

8 月 14 日国防最高会议议决：对日暂不宣战，只声明自卫；政府亦不迁

移。同日，蒋委冯玉祥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负责上海作战；阎锡山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负责山西阻敌南下作战。同时将冯、阎二人副委员长一职撤销，以集军权于一身。至 8 月 20 日，蒋又兼第一战区长官；被推力陆海空军大无帅。9 月 11 日改任冯为第六战区长官，统辖其旧部。

同时，蒋又命空军对日本海军陆战队发起突然攻击，炸沉日海军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下午 5 时，中国空军第四大队长高志航率本队 27 架飞机，击落日本飞机 6 架，其余日机向东方海上逃走，有 13 架失去联络。而中国空军一架未损。对此蒋氏极为高兴。他于 15 日的日记中写道：“倭寇空军技术之劣，……于此可以寒其胆矣。”

蒋一边指挥抗战，一边制定军事计划和编组军队，8 月 2 日正式成立大本营（10 月初又取消大本营，恢复军委会制）。

大本营之组织系统是：大无帅下设参谋总长程潜和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大本营以持久战为基本战略，设军令、政略、财政、经济、宣传、训练 6 部。下设 5 个战区。第一战区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由蒋本人兼任；第二战区为阎锡山；第三战区蒋兼；第四战区为何应钦。另有 4 个预备军长官司令部和海。空军总司令部。海军总司令为陈绍宽。空军总司令又为蒋兼任。

战前双方兵力大体如下：

国兵力：因经济落后，训练和装备均远不如日本。当时我国总兵力约为 200 余万人。总计步兵师 182 个，46 个独立旅；9 个骑兵师，炮兵四个旅，20 个独立团，以及化、工、通讯、防空等兵团。总计有 180 万人；并无预备役和后备役。

新编制之步兵师全师官兵为 10923 人。步骑枪 3800 余支，轻重机枪 328 挺，各式火炮、迫击炮 46 门，掷弹筒 243 具。

海军新舰艇 66 艘，最大吨位为 3000 吨。空军有各式飞机 600 架，可以参战者仅 305 架。

军队来源，虽于 1936 年规定实行征兵制，但抗战以来，仍实行征募并用制，而募兵则居较多数量。

日军兵力：现役 38 万人，预备役 73 万人，后备役 87.9 万人，加上第一、第二补充兵役，总共兵员为 448.1 万人，常备师团 17 个，每一师团官兵 2.2 万人，其中马匹 5800 匹、步骑枪 9500 支、轻重机枪 600 余挺、各式火炮 108 门、战车 24 辆。[①]

海军仅次于英、美，居世界第三位。飞机 2700 架。

“可以说敌我双方兵力相差悬殊。”

于是大本营发布《国军作战指导方案》，以持久战为主旨。第一期作战计划，自 1937 年 8 月 20 日至 10 月下旬为止。主战场明定为第一战区，侧背为第二战区，第一战区吸引敌人主力，使第二、三战区作战从容进展。第一战区北对平汉线，为二、三战区之中间地区，主要在冀南豫北地区。第二战区在山西；第三战区在淞沪浙江沿海地区。[②]以后续增六、七、八、九、十战区。

实际上，主战场在淞沪第三战区，而不在第一战区。此乃疑兵之计，以诱使日军自上海地区入侵。

[①] 据张其昀《抗日战史》、《白崇禧回忆录》。

[②]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二），1987 年南京版，第 1～4 页。

一切部署完毕后，蒋于 8 月 21 日下令对上海日军发动总攻击。22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明令将陕北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旋又改编为第十八集团军。9 月 12 日江南红军改编为新四军。

淞沪抗战自 8 月 13 日至 11 月 11 日，历经 3 个月苦战，中国军队撤出上海。日军投入总兵力为 20 万人，共 10 个师团左右，并投入大炮 300 余门，战车 200 余辆，飞机 200 余架，中国军队投入约 70 万人，共 50 个师兵力。

这次战役中，日本政府一边猛打，一边又于 11 月 2 日向蒋提出和谈条件，蒋于 11 月 5 日予以拒绝，表示如欲和谈，必须恢复战前状态，否则国民政府会被舆论浪潮淹没，蒋仍决心抗战到底。在上海战役进行中，他曾多次亲自和白崇禧，李宗仁等冒炮火到前线督战。也曾赴苏州视察，并遇到日机轰炸。

这次战役中，蒋本应及早撤军，退保第二道防线（苏嘉线）。但蒋刚愎自用，不接受李宗仁、白崇禧意见，硬要支撑下去，还声称要于上海抗战三年！待到战线崩溃时，才于 11 月 9 日下令仓促撤军，造成重大损失，连苏嘉防线也来不及防守，又继续溃败，其溃军之状惨不忍睹。日军逼近南京。此次上海抗战，军事虽遭惨败，但确实将日军主力自北方引来上海地区。在此重大战略上，蒋的计划无疑已开始实现。

10 月中旬，绥远失陷。11 月 9 日，山西太原陷落。在山西战役中，国军损失惨重，以致于郝梦龄、刘家骐等重要将领先后殉国。因战局连连失利，自 10 月 30 日蒋开始迁都重庆。[①]

至 11 月上旬，平汉线和津浦线黄河以北已尽为日寇所占，刘峙因战败失职被蒋免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之职。

11 月中旬，蒋在南京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参加者有李宗仁、白崇禧、唐生智、何应钦、徐永昌等人。

蒋问李宗仁：“敌人很快就要进攻南京了，德邻兄对南京守城有什么意见？”[②]

李回答说：“我不主张死守南京。我的理由是：在战术上说南京是个绝地，敌人可以三面合围，而北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

以新受挫折的部队来坐困孤城，实难望久守。……而敌人则夺标在望，士气正盛，南京必被攻破。与其如此，倒不如我们自己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而我们将大军撤往长江西岸，一面可以阻止敌人向津浦线北进；同时可以拒止敌人的西上，让他徒得南京，对战争大局无关宏旨。”

蒋又问白崇禧，白说很同意李的主张，应主动放弃南京。

李，白意见看来，也不无道理，这样可以避免疲兵连战和仓促撤军的损失。但是只可惜他们不解蒋引敌主力于长江下游的方略。如果南京弃守，怕日寇看出破绽，而将魔爪缩回去，那就大计难成了。因而蒋不同意李、白意见。他说，南京为国府所在地，又是国父陵寝所在地，断不能不战而退，应当死守。其实，蒋早已决定放弃南京，不过为进一步将日军主力吸引到南京和长江下游地区，而故意表明决心死守南京，此为疑兵之计。故此次死守南京，只是做样子而已。接着蒋又问何、徐二人，二人均同意蒋的意见。蒋又问德国顾问，德顾问也主张放弃南京，不应做无谓牺牲。蒋又问唐生智，唐

[①] 蒋介石于 10 月 29 日作《迁都重庆与抗战前途》报告。国防最高会议于 11 月 16 日决定迁都重庆，11 月 20 日，国民政府明令迁都重庆。

[②]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 697 页。

则忽然起立，大声疾呼地说：

“现在敌人已迫近首都。首都是国父陵寝所在地，值此大敌当前，南京如不牺牲一二员大将，我们不特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更对不起我们的最高统帅。本人主张死守南京，和敌人拚到底！”唐的一席大话，正是大敌当前的严重时刻，很有大义凛然的气势。李宗仁当时感到唐大有张睢阳嚼齿流血之概，很不以为然。

蒋介石听罢唐言，大喜过望，立即委任唐为南京城防司令。唐更慨然受命，誓与南京共存亡。

李宗仁便若有讽刺地翘起大姆指，对唐说：“孟潇，你真了不起啊！”唐则反唇相讥：“德公，战事演变至此，我们还不肯干一下，也太对不起国家了！”

第二天，李宗仁赴徐州，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唐生智则赶修南京城防。

蒋以嫡系俞济时七十四师、王敬久七十一军。孙元良七十二军、宋希嫌七十八军和徐源泉第二军团、邓龙光第八十二师等部守城，其中，以其嫡系为主力。

日寇于 11 月 17 日成立大本营，由天皇统率。12 月 7 日对南京全线合围，以陆海空军同时猛攻。蒋氏于同日早晨 5 时 45 分即离开南京赴赣。8 日到达观桥别墅，不禁慨然曰：“风景依然，时势大变矣。”至 11 日晚，才命唐生智撤退，而紫金山雨花台已经陷落。

但唐未向城外军队下达撤退令，故城外部队不知撤退之事，一直苦战，12 日，中华门、光华门相继失陷。13 日，唐始仓促下令全军突围。因撤退太晚，原撤退计划未能实现，各军争相渡江，溺死者不计其数。

日军侵占南京后，在第六师团长谷寿夫指挥下，对南京军民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被屠杀者有 30 余万中华儿女。有的女性，被轮奸 37 次之多，然后再将其杀戮以取乐。可谓日军虽禽兽而不如。不仅如此，日本兽兵还展开杀人竞赛，有人一天杀 100 多我骨肉同胞。对此，我子子孙孙，当永志不忘。

重光癸在《昭和之动乱》中也自供说：“攻人南京的中岛师团，在南京的暴行，轰动了国际视听，使日本声誉一落千丈。”大阪《朝日新闻》记者则说：“日军官兵纪律之坏，无以复加，遇到妇女不问老幼，任意奸淫，强奸之后，加以惨杀，逢到壮丁，更是一律残杀，种种残酷行为，全无人道。”而亲王朝香宫则以此向日本天皇报捷。

当时侨居南京的外国人，曾组织“国际委员会”向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提出 12 次抗议，但谷寿夫均置之不理。战后 1947 年 4 月 26 日，战犯谷寿夫枪决于南京雨花台。[1]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被判为甲级战犯，于 1948 年 11 月 12 日判绞刑，12 月 23 日执行。

南京于 13 日失陷后，蒋于次日自江西到达武昌。17 日发表了《告全国国民书》，指出中国抗战中心，在农村和民心中。他说：

“……中国持久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非公里）之土地以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

[1] 1947 年 3 月 10 日，判处死刑。

致敌于死命。……最后胜利必属于我。”

美、英作壁上观

国际上对中国抗战，仍采取壁上观的立场。蒋介石虽向美、英大使和政府一再呼吁斡旋，希望“国联”制裁日本，并指出日本侵略行为是对世界和平的挑战。但美、英各国却只说同情话，并不采取任何行动，听任日军在中国大打出手，屠杀中国人民。而英、比、法三国竟怕触怒日本，先后于9月取消了卖给中国飞机、军火的协定。

当8月26日，上海酣战之时，英使许阁森在往上海途中被日机炸伤，日方只是简单道歉赔偿。蒋介石曾希望此事件引起英日冲突，看到如此处理，不禁为之寒心。9月4日，日机又炸坏英商船二艘，甚至炮击“瓢虫号”军舰，也仍是由日方道歉赔款了事。

蒋介石忍无可忍，在4日接见美联社记者时，再次向国际社会呼吁，他说：“我国抗战，非仅为中国本身之存亡而战，亦为维护世界之和平而战。制止日本之侵略行为，乃为九国公约（非战公约）签字国及国联会员国之责任。”

宋美龄也于9月12日在南京对美国发表广播讲话。她更对国际社会的不管不问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她说：

“世界上的人们，忽略了当前正在中国逐渐扩张的灾祸实况。

列强曾订立巴黎非战公约，防遏战争；并且设有国联。用这双重 的保障来制止侵略国家向弱国作元望的侵凌。奇怪的是，今竟荡然不存。更奇怪的是，积年累月，逐渐形成的战时国际法，……

原是节制战时行为，保护非战斗人员的，竟也和这些条约一同化为灰烬。所以我们今天重复回到了弱肉强食的野蛮时代。”[①]

但宋的这种谴责毫无作用。两天以后，美国政府却声明美国应用中立法，不过问日寇的侵华战争。中国政府立即对美国提出抗议。蒋并于24日在南京以行政院长身份，召开记者招待会，要求美国改变国策。他对记者讲话如下：

“中国此次抗战，不仅攸关中国本身之存亡，且亦为九国公约联盟伸张正义。因此九国公约签字国联合会员国，均应遵守其义务，对于中国之奋斗加以援助。尤其美国为华盛顿会议之召集者，而九国公约及国联盟约之订立，悉属美国之力，故其责任尤为重大。”[②]

但美国等国仍不理睬。

就在这一天，保定失守。记者有人问蒋抗战时日要多久的问题。蒋回答没有估计时间，但指出，不论抗战多久，“中国已有无限制抵抗之能力”，且中国也不怕日本之封锁。

12月12日，日军将美国炮舰“奔尼号”于南京上游30里处击沉，美国也不动肝火，由日本道歉、赔款约200万美金了事。

到12月25日，蒋以桐油为担保，才借得美国2500万美元。

此外未从西方得到任何援助。英国只卖给中国少数飞机，却不供武器，甚至给中国装备的一批客机，英国政府也怕惹恼日本，不许从香港飞出。后

[①] 《秘录》，十一，第77页。

[②] 《秘录》，十一，第79页。

经一再交涉，才允许将所买飞机购回 3 架，而且装备成救护机并保证不用于战斗。

当时，美、英对日本是十分惧怕，惟恐惹恼日本，殃及自身，一再怂恿日本对华侵略的武力深入。

这时，只有斯大林，蒋介石所最不喜欢的“独裁者”，对蒋介石表示支持。他甚至特别对当时的中国驻苏大使杨杰说：“请转告蒋委员长，如果想在战争继续进行时，消灭人民对政府所表现的不忠行为，他必须枪杀至 450 万人；否则，我想恐怕他终于无力使此次抗战达到胜利的结束。”[①]

1937 年 8 月 20 日，苏联和中国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并立即派飞机志愿队于南京。武汉对日作战。至 9 月 4 日止，苏联运往中国的战斗机共 72 架、轰炸机 54 架、侦察机 12 架。此外还运来大炮、战车、弹药等军火。11 月 1 日，又和蒋的国民政府签订了 5000 万美元的借款协定。

1938 年、1939 年又两次签订信用借款，共 2 亿美金。

显然，斯大林考虑到中国被日寇灭亡后，自己国家直接受到威胁，使其夹在日、德之间，难以招架，故必援蒋抗日。

欧美等国之所以一味对日妥协，不愿与日本直接对立，一方面为保障其在远东的商业利益，另一方面也希望借日本威胁苏联，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在远东的发展。

由于对国联和英美的过于信赖，使蒋一直抱有幻想。对此，端纳曾说：“中国方面，则因为对条约与国际法的信念，与对国联势力及美国等信誉之依赖过深，卒为重大的牺牲。”[②]

此时，中国国际处境非常严重，除苏联之外，均对蒋冷眼旁观或闭门谢客，但蒋介石在危难孤立境地之中，表现出自己坚强的个性和坚定的态度。他于 1937 年 12 月底又一次发表抗日文告曰：

“不问目前的时局如何改变，我们必不屈服。我们必须勇往前进。屈服的结果便是惨祸。不问国际局势如何转变，我们自己必尽最大努力，而不轻易表示失望。我们不要依赖他人。我受命于党国，自然绝不放弃此项主张。”[①]

虽然如此，蒋介石仍难以完全放弃“和谈”的幻想。他仍不忘“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方针。

于是蒋又于12月2日在武汉临时首都接见了陶德曼，仍希望和平解决“争端”，并在 1937 年 11 月 5 日的表态中，后退了一步。以华北行政主权不得改变及就地停战的条件，答应原宋哲元接受的 7 条为谈判基础。当时，中国的求和派已有所抬头，汪精卫即为代表人物，认为“一连失败之下，非求和不可”。于是，陶德曼于 12 月 7 日把蒋的意思转告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但日本政府因为连战获胜，直逼南京城下，便得意忘形、趾高气扬，竟然宣称以上 7 条能否仍作谈判基础，又成疑问了。

12 月 14 日，日本政府在北平成立汉奸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当天，日本内阁于大本营召开联席会议，提出对华新的和谈提案，主要是要求蒋答应放弃抗战；承认伪满；设立非武装区；赔款等四条件。

[①] 《秘录》，十一，第 77 页。

[②] 董显光：《蒋总统传》，台北版，二，第 286～287 页。

[①] 董显光：《蒋总统传》，台北版，第 255 页。

蒋接此案后，认为条件太苛刻，决无接受余地，于是坚决予以拒绝。同时反而为此苛刻条款而感到心静了，因为它使求和派再无话可说。蒋决意继续坚持抗战，遂于 12 月 27 日召开国防最高会议，重表抗战决心，并记之于日记：

“今日除投降外无和平；除抗战外无生存。”

次日，召集汪精卫、孔祥熙、张群等在武汉寓所开会，议决今后对日本所提条件一概不理。

又于 29 日对于右任谈话，说日本所提的 4 条，“等于灭亡与征服，我国自无考虑余地。并应坚决表明，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②]

1938 年 1 月 1 日元旦团拜，蒋发表坚决抗战的谈话，他对大家说：“抱定坚忍不拔之志，以打破日寇威胁利诱之政略。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虽目前国际形势变化元望，我们务须一本原定方针，忍痛奋斗到底。凡事若不半途而废，则到最后，必能有志竟成，故不患国际形势不发生变化，而患我国无持久抗战决心。”[①]

又自谓：“吾今于此战事紧张，天崩地坼之时，从容谋处，细心计划，亦自信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中华民国必可由自身而复兴也。”[②]

当天蒋记下日记以表自强之志，记云：“国际正各自扩张军备，而一面则竟言和平。当此之时，我人对于外交，断不宜作依赖任何一国之幻想，务必力图自存自立。”[③]

到此，蒋的抗战决心再次坚定起来。

1938 年 1 月，蒋提出“寓军于政，寓将于学，寓兵于民，如此，必能持久战”的建军方针。

日寇速决战失败

日本政府见蒋介石如此强硬，便于 1938 年 1 月 9 日，由驻华大使川越茂在上海发表不承认国民政府的谈话。又通过陶德曼寻问中国态度，说明如不答应日方条件，日本可能会对中国宣战，并消灭国民政府，而承认北平汉奸政权。至 12 日，日本外务次官要陶德曼促中国于 15 日前答复四条件，否则，日本政府将“自由行动”。中国外长王宠惠于 15 日下午 4 时许答称中国政府对四条件内容不甚清楚，希望知道这些内容。日政府得此答复后，认为是中国政府最后拒绝，于 15 日结束谈判，改变逼蒋投降策略，开始对中国展开大规模侵略战争。

蒋介石已作好准备。于当天的日记中记下了如下的感想：“此一星期中，敌人以宣战、否认国民政府与继续军事行动等威胁逼迫，无所不至，可云极矣！以余视之，不值一笑。无论其出于何种举动，皆不能动摇我抗战之决心及最后胜利之信心。

“彼求和不得，进退维谷之丑态，日益毕露矣，盍不早日觉悟；明言撤

[②] 同前《蒋总统传》，二，第 285 页。

[①] 同前《蒋总统传》，二，第 285 页。

[②]

[③] 《秘录》，十一，第 100 页。

兵之为得也。“日本无政治家，无领袖，其国之危，亦可惜哉！”[1]

蒋此时心境很清明，意志极坚决，连天皇也不放在眼中。蒋的评语是完全正确的，他已预见到日本失败的结局必然到来。至于其抗战决心，则益加坚定。

1 月 16 日，日本政府正式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亦即近卫内阁第一次声明。

蒋遂将日本声明昭告世界，命外交部发布强硬声明，回答日本政府。声明强烈谴责了日本的侵略丑行。1 月 18 日声明云：

“日本不顾一切，调遣大批陆海空军，攻击中国领土，屠杀中国人民，中国迫不得已起而自卫，抵抗侵略，抵抗暴力。数月以来，中国未有一兵一卒侵入日本领土之内。……

“中国和平之愿望，虽始终未变，……然中国政府于任何情形之下，必竭全力以维持中国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办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绝非中国所能忍受。同时，任何在日军占领区域内，如有任何非法组织攒窃政权者，不论对内对外，当然绝对无效。”[2]

蒋遂于 1 月 20 日（1938 年）召回驻日大使许世英。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也于 28 日返日，中日两国完全断交。此次断交，当然是日本政府首先关门。当时近卫内阁和军方均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仍可以武力迅速征服之。这当然只是日本军侵略者一厢情愿。

不惟如此，日政府更进一步于 1 月 24 日向全世界宣布蛮不讲理的 4 项声明：

“一，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日本均不与国民政府交涉。二，日本为阻止外国军事援华，仍可对华宣战。三，日本对华之新政权，居于监护人之地位。四，绝对不容许第三者出面调解。”[1]

日本第一阶段的速决战战略完全失败了。几个星期的任务，5 个月时间尚未完成。至 1938 年 1 月，对华共派用了 26 个师团，打破了原来使用 15 个师团的计划。

此时蒋介石对未来的战争，也已有了一个基本的估计，认为日本不会有更大的军事增援，对持久战充满了信心，于 2 月 6 日发表讲话，指出日寇侵华必败，对全世界再表抗战决心。

蒋于同年（1938 年）2 月 1 日，又委周恩来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2 月 6 日政治部成立。毛泽东也表示“对领导抗日的国民政府绝对拥护”[2]国共合作也进一步发展了。当然蒋也从未忘掉“防范共产党及其军队，不许中共在国统区合法存在与发展”。

台儿庄大捷

日寇自 1937 年 11 月以来，攻陷了上海、太原、济南、杭州、南京以后，便从北、东、南三面向中国腹地进犯。南京方面有日军 14 个师团，华北有

---

[1] 《秘录》，十一，第 105～106 页。

[2] 《中央日报》1938 年 1 月 19 日。

[1] 《秘录》，十一，第 108 页。

[2] 《秘录》，十一，第 127 页。

10 个师团，山西 1 个师团，共 34 万人。1938 年 2 月 18 日，日寇将“华中方面军”和“上海派遣军”合编为“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为畑俊六大将。

自南京失陷后，蒋立即部署徐州防卫战，并暂驻武昌，指挥作战，以阻滞日军前进，为武汉防卫部署争取时间。

1937 年 12 月 24 日韩复榘放弃济南。日寇矶谷廉介第十师团于 27 日侵占济南。31 日又侵占泰安。

1938 年 1 月 5 日，继占充州、济宁。其赖谷支队改向邹县进犯。由于韩复榘未报告李宗仁，放弃济南，擅自撤向鲁西南，避免对日军作战，使津浦路门户洞开，徐州告急。1938 年 1 月，板垣师团侵占青岛，进逼临沂；2 月，日寇第十三师团攻陷蚌埠。至 3 月，又陷我广德，沿津浦线北犯。

徐州形势危殆，会战迫在眉睫。

蒋介石在此紧急关头，于 1938 年 1 月 11 日在河南省开封举行高级军事会议，有师长以上军人 80 余人参加。蒋先训话，鼓励部下奋勇作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然后话锋一转，指出有人不听命令，擅自放弃阵地，但未指韩复榘之名。韩却站起来，质问南京失守谁负其责？蒋答言自有人负责。继由李宗仁和程潜报告战况。然后蒋宣布散会。在散会时，由刘峙宣布，要韩稍留，随即将韩复榘逮捕，当日押到汉口。

当日下午，蒋又在小型会议上宣布要对韩复榘严办！程潜、白崇禧、李宗仁均对韩素无好感，表示没有异议。冯玉祥因为韩于 1929 年叛投蒋介石（见前章）伤透了心，也不予讲情。加之韩与刘湘密谋据守四川、汉中地区，自成一系，就更是死罪难免。1 月 24 日。蒋下令将韩处决，以肃军纪。

在这次军事会议上，蒋决定实行战区军政合一制，各战区长官均兼本省政府主席。李宗仁因有不同意见，未兼任省主席。

3 月 5 日，李宗仁获悉日军放弃南北夹击，直接打通津浦路计划，欲由鲁南和济宁合攻徐州。

蒋介石和李宗仁即对矶谷、板垣师团进行围攻部署：以韩德勤第二十四集团军于高邮、宝应地区阻止由扬州北犯之敌，掩护运河交通路线；李品仙第十一集团军、廖磊第二十一集团军、于学忠五十一军防备淮河沿线敌人；汤恩伯二十军团驻归德、亳县地区，作为后备：徐州以北为邓锡侯第二十二集团军，守滕县，阻矶谷师团南犯。五十九军驻滕县以南，庞炳勋驻防临沂，阻止板垣师团南进与矶谷会师。

当时统帅部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持久防守；另一种主张打运动战，各个击破冒进之敌。蒋介石采纳了后一种意见，并令第一厅长刘斐赴第五战区李宗仁长官部，协助李指挥作战。

这时，板垣师团被阻于临沂；南方第十三师团被阻于淮河地区，无法策应徐州。矶谷廉介便孤军深入，欲取“头功”。蒋和李宗仁便对准矶谷师团，部署围歼态势。

6 日，李宗仁又以张自忠五十九军增援临沂庞炳勋部，力阻日军板垣师团前进。

至 18 日，张自忠和庞炳勋两部将板垣师团击破，迫其退回莒县，使板垣师团不得与矶谷师团会师台儿庄。

矶谷师团于 3 月 9 日沿津浦线冒进南侵，16 日兵临滕县；另一部进犯枣庄，与汤恩伯增援部队八十五军遭遇。

同时蒋又命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增援第五战区。李宗仁深知西北军善于坚

守，遂命孙军于台儿庄防守正面之敌。3 月 20 日，滕县失守，师长王铭章殉国。23 日，日军赖谷支队进攻台儿庄，被歼 3000 余人。27 日，矶谷师团合力猛攻台儿庄，于庄寨中展开肉搏战，战斗甚为惨烈。这时，李宗仁严命汤恩伯军自枣庄地区南下击敌侧背。至 4 月 4 日午夜，汤军团才到达台儿庄北面。台儿庄已三分之二为敌所据。

李宗仁以为汤军早于 4 日中午到达，便强命孙连仲于当日夜半组织敢死队数百人冲入敌阵，向敌砍杀。敌因始料不及，仓惶应战，溃不成军，孙又夺回台儿庄四分之三土地，是为一大奇迹。

此时，汤军团尚未参战。4 月 5 日黎明，汤军才攻敌之背。战至 4 月 6 日晚，矶谷师团两万余人被歼，摧毁坦克车 30 余辆。[①]

这是我国抗战以来最大的胜仗，也是日寇第一次大惨败。

战役结束后，日军欲于徐州进行大会战，打通津浦线，亦借以报复。蒋和李宗仁均主张于徐州打阵地战，后仍采纳刘斐意见，以运动战各个击破敌人。但日军已迅速从四面向徐州合围，即使打运动战也不可能了。60 万人的军队，便只好于 5 月 15 日突围撤退。5 月下旬，李宗仁部退至阜阳。待 5 月 19 日日军进入徐州时，徐州已成空城。此次不战而弃徐州，保存了几十万大军实力，虽未能重创敌人，亦是上策。

武汉防卫战

徐州失陷后，敌可沿陇海路西犯，与华北日军会师，包围武汉。蒋介石便仓促决定于河南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阻徐州之敌西犯。6 月 9 日，用两门大炮将花园口轰开，一时洪水肆虐，黄河两岸，顿成千里泽国，数十万贫民百姓流离失所。对此，蒋不敢承担责任，便宣传是日军飞机所为，并于 6 月 16 日电示程潜，将此事安在日寇头上。但实际上，此次人为的水灾，并未在战略上奏效。4 个月后，武汉即告失陷。故花园决口，虽迟滞了日寇进程，终为蒋的一大错误和罪责。黄河决口后，日寇损失亦重。

徐州弃守前，蒋即开始研究武汉防卫计划。此次防卫计划口号是“确保武汉”，如确保无望时，则再向重庆退却，以重点防御阻滞敌人攻势。9 月 16 日，《武汉会战计划》定稿。

蒋给第九战区的任务，先是策应武汉核心作战，然后再协助第五战区歼敌于湖北沼泽地区。第五战区任务为阻徐州之敌西进，确保长江北岸要点，屏障武汉。武汉卫戍部队 3 个师防守武汉。武汉防卫战是一个阵地战和守备战中寓有运动战的军事部署，比以前上海、南京保卫战有了进步，但实际上，未能主动出击敌后，或各个击破敌人。

6 月 15 日，日本天皇决定于秋初侵占汉口。6 月下旬，日寇侵占九江后，即沿长江两岸西攻武汉。10 月中旬，日寇逼近武汉，形成对武汉三面包围态势。

10 月 21 日，广州失守。

蒋眼见武汉难守，为保存实力，于 10 月 25 日放弃汉口，26、27 日放弃汉阳。武昌。此前，蒋偕夫人宋美龄自武汉飞往湖南衡阳之北的南岳，因飞

[①] 亦谓 4 月 7 日台儿庄大捷。关于歼灭日军人数，一般估计偏低，谓万余人，此处从李宗仁之说（见《李宗仁回忆录》下，第 734 页）。

机迷失方向，又转回汉口。次日晨再换乘飞机，始抵南岳。撤退前，蒋令将武汉战备设施破坏，以免资敌。

此次会战中，中国军队有 60 余万人参加。敌方损失 10 万人以上，我方损失约 14 万人。苏联援华空军也参加了战斗，库里森科大队长阵亡。

中国第一期抗战结束。

武汉撤守，反映了蒋战略思想的变化，蒋介石从大拚消耗转向有意保存实力。主动放弃了武汉，不像上海。南京那样仓促。他在 10 月 26 日日记中写道：

“观察敌势，在直线溯江而上，仅占要塞、据点，而不作野战，以期先占武汉，为惟一目的。余对防守武汉，决不作无谓牺牲，必须保持相当兵力，待机应用，以做最后胜利之基础。”

武汉弃守后，蒋于 10 月 31 日发表《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军民书》，重点说明他的战略思想是迟滞敌人，以空间换时间，运输东南物资至西北、西南，以建设后方根据地，支持全线抗战。他说：

“……保卫武汉之军事，其主要意义原在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输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北、西南之建设。……

“……吾同胞应知此次兵力之转换，不仅为我国积极进取，转守为攻之转机，且为彻底抗战，转败为胜之枢纽。”

胡适随即将此《书告》有关持久战部分译成英文交罗斯福看。罗斯福看后，于 12 月 15 日批准“桐油借款”2500 万美元。

蒋介石的持久战，是以西南、西北为根据地。这是他在北伐之前就已经确立的西南、西北根据地理论之体现。他现在决定据西南、西北而长久作战，以待国际局势的有利变化。

武汉弃守后，蒋又多了一项焦土抗战政策，即破坏长沙。

11 月 12 日，蒋令侍从室主任林蔚打电话给省主席张治中，要张火烧长沙，冯玉祥对此极不赞成，他问蒋，反攻时，我们自己住什么地方？蒋回答：“这也是很要紧的”，表示同意冯的意见。但长沙仍然被火焚烧。因事后民众反应强烈，蒋又找了未按规定执行者酆悌等为替罪羊于 11 月 20 日枪毙了事。

日寇并未进一步侵战长沙，徒使长沙市民蒙受重大损失，省城化为一片焦土。

蒋于 20 日自长沙返南岳统帅部。25 日召开南岳军事会议，对第一期作战进行了总结，也提出了未来的作战计划，即第二期抗战设想。

他认为第一期抗战虽然丧失了很多土地，战役上失败了，但战略上则是胜利和成功的，做到了陷敌于不能自拔的地步。对第二期抗战，他提出转守为攻的设想，他说：

“第二期抗战就是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候。”

他的这一估计太乐观了，事实上直到 1945 年初他都未能进行反攻。

德、意拉拢蒋介石

1937 年 12 月蒋退到武汉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意大利驻华大使齐亚诺一再找麦朝枢提出由他们调停中日共同结盟，以对付苏联和英、美。麦

氏曾向蒋介石请示过，蒋表示可以商量。经过 3 个月秘密磋商，德意日三方达成一致意见：中国承认伪满，并参加德意日三国轴心协约，日本在中国无条件撤兵。蒋介石说：

“这条件太好了，如果日本在中国无条件撤兵，关于承认伪满洲国的文件，我绝对可以签署。参加轴心同盟，这也合乎我的理想。我现在请你担任外交部长，迅速进行中日议和谈判。希望早日成功！”[①]

蒋对苏联、中共，不过是不得已而联合之，如果日本无条件撤兵，并与他结成联盟的话。他更欣赏德意法西斯制度。战前他就派人到德、意去考察法西斯制度，又请有德、意教官、顾问等。

因而他一听这个条件，就欣然以出卖东三省而不辞。

但是，蒋虽对此极为情愿，而日方的板垣征四郎却坚决反对与蒋对话，坚决不承认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致使此项谈判中途流产。蒋介石只有选择坚决抗战一途。其实，日本决不满足于“满洲”的夺取，而是要征服整个中国，现在日本已经侵占上海、南京、徐州、济南、华北、山西大部，怎么会完全撤兵呢？！

由于板垣陆相的仇蒋情绪和天皇的野心，蒋的抗日决心再进一步坚定。日本天皇于 1938 年 6 月，又以字垣外相试探诱蒋投降，同时，以陆相威逼蒋，欲使屈服于“军威”之下而不得不投降。但蒋也有一定之规，他虽不惜出卖东三省和内蒙，但始终坚持日军必须无条件撤出中国，恢复战前状态。至于日本军力，蒋更心中有数，他认为日本速决战略失败，又急欲灭亡中国，便想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也属一厢情愿。但如继续再战，日本也会苦于经济、军力不足分配。因此，蒋也不怕战场对阵。他于 7 月 5 日日记中写道：

“板垣态度忽变强硬，明白反对字垣与我求和及由第三国调停之外交方针；但其实，仍外强中干，试探我是否为其威逼而屈服耳。”

基于此种分析，蒋又认为有对日和谈希望，故于 8 月 13 日又派乔辅三到香港见日方代表中村丰。不料 8 月 30 日板垣陆相忽然发表《对华政策》谈话，表示坚决推开蒋介石，另组中国的伪中央政府，甚至还欢迎蒋氏参加。9 月 29 日，日本字垣外相辞职，字垣和谈终结。

汪精卫叛国

字垣外相辞职后，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转而拉汪精卫投降。汪通过高宗武与日本直接联系。高与当时蒋介石的侍从室副主任周佛海也有密切联系。高未告知蒋介石。高于 1938 年 6 月 23 日秘密赴日，见到日本近卫首相和板垣陆相，高表示如蒋不接受议和，汪精卫一定接受。高回国后，即于 7 月 21 日将在日本的会谈记录呈汉口的蒋介石。7 月 25 日，蒋介石、汪精卫一同听高报告。汪当时很不自然。

汪氏和谈的另一代表是梅思平。梅于 1938 年 4 月于香港和日本参谋本部中国科科长今井武夫密谈。10 月 22 日，梅回重庆，对汪说，日本希望汪脱离重庆，另组政府，谈判议和之事。于是汪便和周佛海、陈公博，陶希圣密议投降之事。陈壁君在此中起了重要作用。25 日武汉失守，汪等决定投降日

[①] 麦朝枢：《关于蒋介石和汪精卫进行降日活动的见闻》，见《文史资料选辑》第 二十二辑，第 53～55 页。

寇，并立即决定脱离重庆。

汪欲于 11 月 2 日起身，自香港转往日本。第二天，日本首相近卫立即发表声明，又表示愿与国民政府和谈，但仍排除蒋介石。

这是明显地诱惑国民政府的投降派并向汪精卫招手。蒋介石于 12 日发表《揭露敌国阴谋，阐明抗战国策》讲话，表示坚决抗战到底，决不屈服。

汪精卫于 11 月 19 日、20 日，派高、梅二人于上海虹口新公园会见日方代表影佐等，草成《日华协议记录》等三个文件，主要有三条：

（一）缔结日华防共协定，（二）承认伪满。（三）经济提携方面，日本有优先权。同时还规定日本于两年内撤兵。会谈中还议定汪于 12 月 5 日自重庆逃出。日本天皇于 11 月 30 日在御前会议中认可。至 12 月 2 日，汪向日方表示同意三条件。又通知日方，汪拟于 12 月 10 日离重庆，并要求日本更换驻香港领事。日方立即以田尻爱义代替中村丰。日期定好，蒋介石却于 12 月 7 日回重庆。汪不得不延期离开。汪延期出走，日方却以为是受了汪的欺骗，近卫首相大为惊恐。

蒋回重庆后，与汪精卫、王宠惠、孔祥熙等开会时，再次申明抗战决心。他对孔祥熙说：“不论国际形势如何，我国必须作自力更生，独立奋斗的准备。”又接着对孔说：“只我政府不与倭（日本）言和，则倭无法亡我。”蒋的抗日态度，可见是坚定不移。

汪当时只说抗战中，敌我双方均有困难。12 月 16 日，汪单独见蒋一次，是在暗中告别，并未谈及议和之事。蒋于 18 日到西安主持一次军事会议。汪便趁机以到成都军校讲演为辞，乘飞机离开重庆。但在成都上空转一周后，即转飞昆明。此时汪妻陈璧君已于两周前离开重庆。汪本与龙云密议好共同投日，但汪到昆明后，龙云改了主意，称病不见，劝汪回重庆，但也未对汪加以羁押。汪即匆忙于 19 日晚离滇赴越南。20 日抵达河内。

近卫得知，又于 22 日发表第三次声明，但这次近卫只字未提两年内从中国撤军之事。

汪逃走，蒋仍蒙在鼓里，事后蒋得知龙云未扣留汪精卫，也没深究龙云的过失，因为龙有实力在，奈何不得。蒋于 12 月 24 日及时对英、美等国声明：汪无权代表任何人谈判；中国不但不讲和，而且正在准备更大规模的抵抗。

26 日，蒋驳斥近卫声明，指出其“东亚新秩序”论。旨在灭亡中国。但只字不提汪事。第二天，蒋即劝汪回重庆。汪置之不理，于 29 日竟通电同意近卫三原则，且对原议撤兵之事不加计较。

1939 年元旦到了。蒋在团拜时问冯玉祥等对汪怎么办？冯说：

我们大家把汪弄成副总裁，是我们瞎了眼，“我们应该向国民认罪”！蒋却说：“无论汪怎么不对，我们应当宽待他，……饶恕他。”

大家对此极为不满，七嘴八舌，有的在骂，有的还说蒋和汪唱双簧！团拜会上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这时，有的中央委员，不无讽刺地说：“我们再出门，一个人要带一把扇子，见了人民的时候，我们就把扇子往脸上一遮，免得人民吐我们的脸。”蒋介石则装没听见，不慌不忙地走出会场。[①]

1939 年 1 月 4 日，近卫倒台。汪一度想到欧洲去，蒋即将护照赶快送到，力劝汪赴欧游历，然后再回重庆。但由于日本平沼新内阁仍坚持拉汪，汪终

[①] 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1949 年上海版，第 101 页。

于又到上海，继续为日效力。汪 5 月 6 日乘日船到沪，31 日赴日本访问。

国民政府于 6 月 8 日通缉汪精卫。

汪于 7 月在南京建立伪政权。9 月 12 日，日本设“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 ”于南京。西尾造大将为总司令官，板垣征四郎任参谋总长，控制汪精卫。这时汪不再坚持中国主权独立，于 9 月 30 日签订卖国条约，即《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

高宗武、陶希圣见汪卖国，又逃回重庆，把纲要交蒋过目。蒋看后极为气愤，痛骂“ 汪逆可恶 ”！1940 年 3 月 29 日，汪正式建立伪“ 国民政府 ”，并请林森早日回南京，林发表声明，不承认汪伪政权，并于 30 日明令通缉陈公博等 77 人。

以后，日本又诱蒋介石屈服，使其与南京合并，蒋予以拒绝。

蒋对未来国际形势的估计

1939 年 1 月，日本天皇决定开始南进，先侵占我国海南岛。2 月 10 日，海南岛陷落。日寇占海南岛后，“ 大东亚共荣圈 ”方案正式启步。第二天，蒋于接见中外记者时指出，海南岛之失，为太平洋上的“ 九 · 一八 ”，是向民主世界开战，并特别强调日寇侵占海南岛，即是进攻太平洋的发端。首先切断英、美海军之间的联系，控制菲律宾。下一步，日本将侵占关岛，再切断美国与菲律宾的联系，然后发动太平洋战争。

这种估计和分析完全符合后来形势的变化。美、英各国，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2 月 8 日，美国就已与中国签订了“ 桐油借款合同 ”。3 月，美国禁止对日信用贷款，禁止对日输出飞机零件，同时通过了太平洋设防案。3 月 15 日，英国签约借给中国 50 万英镑，并为中国买卡车，自滇缅公路运输物资。

7 月 26 日，美国又废除《美日通商航海条约》（1911 年签订），使日本军需物资来源被切断。蒋对此倍感鼓舞，认为以后中国军事、经济状况将会有所好转。

这时，日军第二十三师团正在诺门坎因侵犯苏境而大战。8 月 20 日苏军反攻，将日军师团几乎全歼。23 日，苏联和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诺门坎的失败对日天皇打击极大，被迫于 9 月 16 日和苏联签订了《诺门坎协定》。平沼内阁也因此倒台。8 月 30 日，阿部信行内阁上台。

1939 年 9 月 1 日，德国进攻波兰。蒋介石于 9 月 2 日表示决心参加英美民主阵营，对日本作战到底；9 月 10 日在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上发表《欧战发生后我国抗战的三大任务》演说。该演说指出：日本不参与欧战就是决心独霸东亚；日本现已疲惫不堪；今后日本对华将加紧政治和经济攻势。9 月 18 日，蒋电令驻美大使胡适大力促进美国进一步坚定反日立场，以壮英法之胆。

日本阿部内阁上台后，又和美国罗斯福总统缓和关系。罗斯福则表示日本如侵犯美国权益，就立即对日禁运，并痛斥日本的“ 东亚新秩序 ”。蒋氏为此，表示对罗斯福有重大寄望，认为罗斯福是改造、奠定世界和平基础的伙伴。10 月 29 日（1939 年），蒋在南岳的军事会议训词中指出，自欧战爆发后，东西方的战争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只有世界的问题解决后，中国的问题才能解决。今后的任务，是决不和谈，力争抗战最后胜利。

美国在德国进攻波兰后，开始实施防卫太平洋的“彩虹计划”。日本为了南进开辟太平洋战场，想更快地解决“中国战场”。

于是打算侵占香港、越南、缅甸，从四面包围中国，逼蒋投降。此时英国正在对德苦战，无力东顾，正是日本侵占南亚的大好时机。

在此背景下，日本于 1940 年 1 月 16 日，又组成海军大将米内光政内阁，积极“南进”，致力解决“中国战场”。

1940 年 1 月 26 日，美国对日实行禁运。3 月，美国又借款 2000 万美元给中国政府。但英国却屈服于日本压力，于 7 月 14 日表示考虑封锁滇缅公路。对此蒋极为愤怒，他公开谴责和警告英国：如果英国封锁公路，必将扩大远东战祸，自食其果。

日本米内光内阁，又因不热心于德意日三国轴心联盟，于 7 月 16 日辞职，由近卫第二次组阁（7 月 22 日）。东条英机出任陆相，外相为松冈洋右。此三人上台后，更积极推行“南进”政策和“大东亚新秩序”。7 月 26 日，决定了《基本国策纲要》。第二天又议定了《世界形势的变化及时局处理纲要》。中心目标是对中国大西南发动强大攻势，以加紧逼蒋屈服，开辟太平洋战场，“解决南方问题”，蒋认为近卫等在说大话，什么“大东亚共荣圈”，决难实行，不过加速其崩溃而已。

1939 年至 1941 年的战况

武汉会战后，中国进入第二期抗战。

日寇江南军队（主要是冈村宁次之第十一军）向蒲圻、通山、修水一线推进，沿粤汉铁路，直指长沙，似欲打通粤汉铁路。江北日军主力，则进犯郑州、洛阳地区，似要打通黄河两岸，以稳定山西。

江西日军，向南昌运动。日寇海军协同陆军进攻沿海岛屿。

蒋于 1939 年 2 月部署江南敌后突击战，以打破江南日寇进攻计划。

正在这时，冈村第十一军发动了进攻南昌战役。3 月 12 日，蒋又发布《抗日总动员纲领》及其实施办法。3 月 22 日，战地党政委员会成立，蒋任主任，李济深副之。27 日，南昌陷落。至 4 月上旬，蒋部署 4 月攻势，并直接指挥各战区各军、师作战。

1939 年 4 月 21 日至 5 月 9 日，蒋进行了南昌反攻战，由第九战区薛岳指挥。双方损失惨重。国军陈安宝军长、刘西卿师长殉国。

5 月上旬，日军又空袭重庆、华南、华北。5 月 3 日，对重庆进行大空袭。一连两天，炸死炸伤者达 8000 以上。蒋对此极为震怒，他说：“残忍暴行，岂能胁制”我们中华民族！

日寇为尽快解决“中国问题”，便于侵占武汉、南昌后，进一步夺取湘南粮仓，达到以战养战目的。同时也企图打开桂、黔门户，进窥大西南，直逼重庆。于是自 1939 年 9 月 18 日开始，至 10 月上旬进行了长沙会战。敌人以 6 万兵力四路合攻长沙，蒋指示九战区以诱敌深入和分别包围战术击溃日军，敌第十一军突围而逃。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

1939 年 11 月发生桂南会战，至第二年 11 月下旬结束，为时一年左右。

这次会战，系日寇为切断我国和越南海上的联系，以封锁我大后方而发动的。日寇动员陆海空军 10 余万人，由“华南派遣军”司令官安藤利吉指挥，自东京湾开始攻击，向我桂南（广西省南部）突袭。

我方，蒋介石派桂南行营主任白崇禧为总指挥，以张发奎第四战区军队和蒋嫡系徐庭瑶第三十八集团军之二、五、六、九十九、三十六军为主力，与敌作战。蒋采取消耗敌人策略，最后诱敌深入，于邕江地区围歼之。

此次会战包括宾阳、灵山、龙州之役。我军经过反复激战收复昆仑关、宾阳等地，重创日军，获昆仑关大捷，击毙日军旅团长中村正雄。这次战役中，日寇未达到预期目的。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初露锋芒。

蒋介石对此次胜利甚为振奋，于 1940 年 2 月 22 日在柳州召开军事会议，对日军的长处和短处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日军长处有 4 点：快、硬、锐、密（保密性强）；短处也有 4 点：小，短（战力不持久）、浅（不能深入内地）、虚（兵力不足）。

根据此四长四短，蒋定出制胜之法：以大部队对小部队；以长时间作战对敌短时间作战；以纵深配备，对付敌人近攻；以全面出击，袭击敌人后方。

对敌长处，则以稳、慢制敌之速；以坚韧制敌之硬；以纵深伏兵，制敌之锥形战术；以有效之谍报，制敌之保密。

此后，在此作战方针指导下，于 1940 年 5 月 1 日至 6 月中旬，发动了对日军进犯江汉平原的枣宜会战。此役歼敌 1.5 万余人，缴获战马 200 匹、汽车百余辆。炮十余门、战车十余辆。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在 5 月 16 日于宜城县壮烈殉国。6 月 14 日我军放弃宜昌，17 日枣阳失陷。以后两军相峙于襄河以东地区。

1940 年 6 月 17 日，法国投降德国。9 月 27 日，德意日三国轴心同盟成立。10 月 13 日，德国又致函斯大林，要求苏联加入德意日三国轴心同盟，但苏德交涉破裂。12 月 18 日，希特勒便下令全军为进攻苏联而备战。

此间，10 月 12 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表示坚决反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决不妥协。

英国首相邱吉尔也于 10 月 18 日再度打开滇缅公路，援助中国。

形势至此，中、美、英和苏联共同对德意日的营垒已经逐渐形成。但蒋介石这时却于 10 月 31 日表示不急于参加美、英阵线，而是采取单独对日的政策。他认为：参加英、美阵线，而我国又不能与英、美取得联系，几乎完全陷于孤立，反遭苏联忌恨，甚或苏联与日本联合侵华；若等待美日开战，苏联则可能加入英美战线，中国可以再相机参加。此时独与倭寇抗争，对英、美、德、意均取中立政策，以便进退自如，是为上策。

当时，日本既已加入德、意、日三国同盟，中日之战与欧战息息相关。且法国战败，英国又自顾不暇，而美、苏两国也仍未有所行动。加入英美阵线之事自不必着急，而英、美主动拉蒋人盟的局面指日可待。因此，蒋决定稳坐钓鱼台，等待罗斯福和邱吉尔上门。

对未来战局，他认为日军主要任务是南下太平洋，对中国不会有更大威胁；美国和日本必然发生海战，因为日本野心勃勃，决不会放过美国在太平洋的势力。日美海战结束之后便是中国开始反攻之时。

罗斯福于 11 月 6 日（1940 年）第三次当选总统后，蒋便喜不自胜，按捺不住了，11 月 9 日上午，蒋接见美国记者时，提出了建立中美英三国合作方案。从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9 日，仅仅 10 天，蒋介石就改弦更张，申请加盟英美，提出了合作三原则和四个互助项目。

三原则内容是：维护中国主权。领土、行政的完整；反对“大东亚新秩序”；中国独立自由为远东和平新秩序。

四个互助项目为：（一）英美两国共同或分别借款给中国，总数目为 2—3 亿美金，（二）以贷款方式供给中国战斗机 500—1000 架，以及其他武器。（三）由英、美派遣军事、经济、交通代表团来华，组织远东合作机关。（四）英、美任何一国与日本开战时，中国全国空军场所联军均可使用。

12 月 1 日，美国国会通过 1 亿美元借款给中国。蒋高兴地表示，“抗战以来，国际助力以此最大。”但又过于乐观地认为，“美国参战时期近矣！”美国总统罗斯福又于 12 月 29 日，发表了著名的炉边谈话，他向全世界声明，“美国将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

这对中国尤其是蒋介石的确是一极大鼓舞。

这时日本海军主张撤退侵华海军，解决“南进”和“大东亚新秩序”问题后，“中国问题”自然解决，陆军则坚决反对自中国撤军，最后是陆军的意见占了上风。

日寇自 1940 年 6 月侵占宜昌后，深感宜昌突出防线，又于 11 月 24 日发动新的攻势，即鄂中会战。蒋命冯治安、孙震等集团军将进攻之敌三个师团全部击溃，伤敌 7 万余人，毙敌千余。这时日本天皇和内阁以及军人们非常沮丧。11 月 30 日，日本承认汪伪政权。

1941 年 1 月下旬至 2 月上旬，日寇调动 7 个半师团，十五六万人，由正阳、信阳北犯，欲打开平汉线，再转而西上潼关，发动豫南会战。自 1 月 20 日开始，蒋命五战区以 26 个步兵师，分段围歼敌军，至 2 月 7 日，战役结束。敌我双方均损失惨重。

3 月上旬，日军又向鄂西进攻。至 13 日，战斗结束，恢复原态势，歼敌四五千人。

3 月 15 日至 4 月 2 日，进行江西上高会战，日寇以两个师团兵力自安义、万寿宫向奉新进攻。蒋命九战区罗卓英集团军重创敌寇，逼近南昌，使敌不能西攻长沙。

5 月 7 日，发生晋南会战，日寇以两个师团的兵力在空军掩护下，自沁阳、博爱向孟县、济源进犯。另以 4 个师团向董封镇、阜落镇、张店镇各地进犯。蒋命第二战区对敌应战，至 5 月 27 日结束。师长王竣、副师长梁希贤、第三军军长唐淮源殉国。我各部突围而出，损失惨重。

1941 年 7—8 月间，日美之间又进行谈判。日本为争取对美谈判的份量和对美国施加压力，也为支持德国对苏联作战和获取湖滨秋粮，对长沙发动了第二次进攻。

蒋以九战区担负主战场作战；六战区于湖北策应九战区；五战区派军向花园、孝感挺进威胁武汉敌人，并以一部向信阳进攻，同时鄂北对日寇进行游击，也策应九战区作战。

此次战役歼日军 3 万余人，俘虏百余人；缴获步枪千余支、战马 800 匹、装甲车 8 辆、步炮 9 门、山炮 6 门。日军又一次遭到重创。此役使美国在谈判中处于主动，同时也提高了中国军队和蒋介石本人的威信，以及中国在世界战争中的地位。

日本要急于“解决中国问题”，而军力不够，蒋又坚决不妥协，诚所谓欲速不达，欲罢不能。

日寇既不能从中国泥沼拔腿，又要乘英败法亡之际夺取中国沿海地区，作为对英、美作战、独霸东南亚的根据地，于是只能走上对英美和中国两面作战的自绝之路。为此日寇又发动浙、闽沿海诸战役。

1941 年 4 月中旬，发动浙东战役，至 5 月初结束。敌人未能占领沿海各县城，只能沿海游窜，往来无定。

福建方面，1941 年 4 月 19 日在海。空军配合下，敌第十八师团一部协助陆战队在福建沿海地区登陆，一度攻占福州等地。8 月 25 日，蒋命三战区反攻。9 月初，又收复福州等地。

在华北，主要是二战区和中共八路军（即第十八集团军）在对日作战。冈村宁次于 1941 年改任“华北派遣军”司令官，上任后，一方面修筑碉堡，一方面进行多次扫荡。第十八集团军于 1940 年 8 月 20 日至 12 月上、中旬[①]，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由彭德怀直接指挥，毙伤日军两万余人，摧毁敌据点 2900 余座。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

太平洋战争

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上，不管美国和苏联，都是左右摇摆的。

1941 年 3 月，日本为其南进解除后顾之忧，派松冈洋右到莫斯科见斯大林，要求签订日苏接近条约，但斯大林因尚不知道德国侵苏意图，便拒绝和日本签约。德国也反对日苏接近，怕苏联解除东顾之忧。

美国也于 4 月 9 日和日本签订了《美日谅解案》。这个《谅解案》是美国为拖延对日开战，争取时间，而牺牲中国的交易。其中规定了重庆与汪伪南京政府合并和承认伪满的内容。第一稿中还有中国政府不答应，就停止美援的字样。

与此同时，斯大林得知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情报后，便突然转变态度，于 4 月 13 日在莫斯科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期限 5 年，其中还有苏联尊重伪满领土、主权完整等条文。

以上两条约，均以出卖中国主权和领土来求得对日本中立。松冈于订立苏日条约后，对美国的态度强硬起来，要美国承认汪伪政权和对南太平洋的资源开发权，美拒不接受。日美关系又紧张起来。

中共针对美日谅解案，于 5 月 25 日发表声明，反对“谅解案”，称此为远东的慕尼黑会议。蒋介石对此出卖中国的条约也表示反对。5 月 30 日，美国则将《谅解案》中出卖中国主权地方的内容删去，加上了中日和平，以日本从中国撤军为前提。对此，日本天皇和近卫等人不禁为之目瞪口呆，同时罗斯福又发表第二次炉边谈话，重申援助英国和中国抗战，以免英国对德妥协，影响到中国对日妥协，则美国便独木难撑了。接着美国又于 6 月 1 日，宣布战后放弃一切在华特权，并与中方换文成约。蒋喜出望外，他认为这是日方外交的一大失败。

德国于 1941 年 6 月 22 日向苏联发动了突然进攻。为此，美总统罗斯福对蒋的情报机关大为钦佩，蒋则得意之色溢于言表。他说罗斯福对他“将益见尊重与信赖矣”。

日本外相听到此消息时，正在东京陪汪精卫观看歌舞，便慌忙回宫报告天皇，主张配合德军进攻苏联。但日首相近卫则以德国失信为由，主张退出三国轴心，仍坚持“南进”。于是“南进”

[①] 此役实为三个阶段：自 8 月 20 日至 10 月上旬，为进击中的第一、二阶段，自 10 月上旬至 12 月上、中旬，为反扫荡阶段。

和北进之争又趋激烈。7 月 2 日，天皇于御前会议订一折衷方案：“首先南进，相机北进”。

这个方案的内容，主要是对蒋进一步施加压力，促蒋屈服；在准备好对英、美作战的同时，也准备对苏在必要时使用武力。

美国则派兵进驻冰岛，援助苏联，对抗德国。美更怕希特勒称霸世界，尤怕德国胜利，日本更加猖狂，危及美国自身，6 月 9 日，美国援助蒋 P—40 型飞机 100 架。7 月 12 日，美国又批准“向中国提供飞机短期计划”，在此计划中有自中国起飞以燃烧弹轰炸日本本土的内容。提议者是以后“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将军。

这些援华抗日协定也加速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进程。

7 月 16 日，日本近卫内阁总辞职。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中认为中国苦战 4 年已脱离危险，但外交内政将更困难。18 日，近卫再组新阁，松冈外相辞职（松冈为北进派），国策重点进一步转为“南进”，决定侵战越南。蒋于此时声明中国抗战国策不变，并全力以赴，加速日寇瓦解。又对罗斯福点明日本“南进”进攻太平洋阴谋，美国于 25 日宣布冻结日本在美国资产。英国、印度、缅甸、加拿大、纽芬兰也宣布废除对日通商条约。日本顿时孤立。蒋介石认为由于他对罗斯福的影响才促成此种共同反日局势。这种局势就是日本“北进攻俄，南进胁美之计划，皆完全粉碎”。[①]

从此以后，美国成立远东陆军司令部，以麦克阿瑟为总司令。

同时于重庆召开中美英三国军事合作会议。继于 8 月 25 日对日全面禁运石油；派援华军事代表团来华，并运来一批大炮、机枪等武器。

8 月 9 日，日本天皇针对太平洋局势的新变化和美、蒋迅速接近，放弃“北进”计划，全力南侵，决心与美、英一战。

英、美两国则于 8 月 14 日发表《联合宣言》，又称《大西洋宪章》，共 8 条。其主要精神是尊重人民选择本国政体之权利和战后和平状态之保证，以后成为战后重建世界秩序准则。

继而罗斯福、邱吉尔先后发表警告和谴责日本的讲话，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不许侵略东南亚。蒋认为这两人讲话，势必制止日寇侵略狂焰，但事与愿违，结果并非如此。

这时美国应日本之请，于 9 月 3 日又开始谈判。蒋认为谈判仍不可能成功，但万一成功，甚至美国出卖中国，中国也决心抗战到底，再等日寇对美英开战时间的到来。他对美日必战，是坚信不移的。

日本近卫首相对美谈判失败后，陆相东条英机坚决反对再与美国谈和，决心对美作战，10 月 16 日近卫辞职。18 日东条英机组成了军人内阁。

蒋认为东条上台，势必对美、英开战，造成世界战争，从而加速各国联合和日本的溃败。

东条上台后，于 11 月 2 日制定了对美、英决战的《帝国国策随行纲要》，决定于 12 月上旬对美开战。但在开战前，仍安排了希望美国妥协的谈判呼吁程序，并决定于 12 月 1 日之前协议成功，否则即开战端。美国对出卖中国的条件，临战前又答应考虑。

甚至想签 3 个或 6 个月协议。一时华盛顿盛传美日已达成妥协。22 日，美、日达成三项妥协条件，主要是有限恢复美，日通商；中日问题本着平等

[①] 见蒋介石 1941 年 7 月 31 日日记。

公正原则解决；日军自越南有限撤军。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将此协议立即电告蒋介石。

蒋介石接到胡适大使报告，立即电令胡适向美国国务卿赫尔说明他的意思，制止美日妥协。蒋说：“如果……日军撤退时间没有根本解决以前，而美国对日经济封锁政策无论有任何一点的放松或改变，则中国抗战必立见崩溃。以后即使美国对华有任何援助，皆属虚妄。中国亦不能再望及友邦之援助。从此国际信义与人类道义、皆不可复问矣。”同时让美国千万不可再对日本存有任何幻想。

但美国不听蒋介石的劝告，胡适又立即电告蒋介石。蒋又求救于英国首相邱吉尔，请他出面反对美国对日妥协。邱吉尔便如蒋请，致电罗斯福，坚决反对他对日妥协。罗斯福因英国反对，遂放弃对日妥协方案。蒋这才松了一口气，不断感谢上帝的保佑。邱吉尔本来对蒋素无好感，但他怕美日妥协后，日本转而对东南亚加速侵略，危及英国远东利益，而最后英国也不能避免一战，故而极力反对美日妥协。

东条英机于 11 月 30 日宣言要对美英开战。12 月 6 日，罗斯福深恐开战，又电致日大使要求继续谈判。但该电文被日本军部故意压下，不交天皇（天皇早已决定对美实行此次突袭，此种不交手法，不过演戏而已）。待开战后一小时后才交。可见罗斯福对日本开战是多么地惧怕，他的应战决心多么难下。

12 月 8 日，[1]日寇偷袭珍珠港前 80 分钟，罗斯福已获破译日方偷袭密电，立即电令夏威夷陆、海军严防，但此令发生迟误，直到日本偷袭后，才拍到夏威夷，珍珠港已成一片火海。美国对日宣战。

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抗战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即由孤立走向和美、英联盟时期。

12 月 8 日凌晨 4 时许，蒋在重庆郊外黄山乡居处接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告急电话，立即返城。继而又接到日机轰炸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消息，遂于当天上午 8 时，召开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对日本和德、意宣战。并提出三原则通知美、英等国。三原则是：成立太平洋同盟和联军总司令部，推举总司令，由美国领导；要求英、美、苏与中国一同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胜利前，联盟各国不许对日单独媾和。

蒋的确在当时国际关系中十分活跃，也有不少正确的国际形势分析。在关键时刻，能提出意见，发挥一定作用，他也很为自己独立不倚的精神自豪。平心而论，罗斯福在日本武力面前的表现很是徘徊瞻顾，优柔寡断，难下应战决心，如无中国战场拖住日本一百几十万大军，罗斯福恐怕对日本武力挑衅更不敢应战，太平洋战争当早就爆发了。美国或许难以保卫太平洋的防区。因而中国战场对远东反法西斯战争实有决定性的影响。当然如无美国在太平洋上对付日军，中国战场也难以很快获胜。

因此，中国抗日战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重大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当时，蒋对今后中国抗日前途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

---

[1] 按日本文献应为 12 月 8 日。

他认为：中国经 4 年苦战，打破了日本的大陆政策。日本天皇在此时刻，决定选择南侵，发动太平洋战争，以求补救，不惜孤注一掷，正中中国下怀。在这种情况下，美、英必须首先解决远东问题。而日本这一南侵行动，实是饮鸩止渴的自杀政策，无异加速日本失败。

12 月 11 日，美国对德。意宣战。同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邱吉尔，提议建立反轴心国联合军事会议，并向罗斯福提出 4 项建议，主要是中、美、英。苏、荷 5 国军事联合会议的召开问题。

罗斯福立即电复同意。会议定于 12 月 23 日在重庆召开，结果苏联、荷兰未参加。只有中、美、英三国参加，论讨了共同作战计划。1942 年 1 月 3 日，蒋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但中缅战区却无中国人参加。

这时，日本大本营为配合太平洋战争，压迫蒋氏屈服，决定打通京广线，向长沙地区攻击，以摧毁九战区军事实力，便在 1941 年 12 月 19 日发动第三次长沙会战，至 1942 年 1 月 15 日结束。此役蒋采取诱敌深入，于带形地区予以围歼战术。共歼敌 56944 人，获敌枪炮马匹千余数。

对于此役，美记者福尔门氏在湖北视察后作如下报道：“ 中国第三度的长沙大捷，证明了一个原则，那就是中国军队的配备若能与日军相等，他们即可很轻易地击败日军。”[1]这次战役，大大提高了中国军队和蒋介石的威信，为美、英等国更加重视。

此役后，美国答应借给中国 5 亿美元，用于复兴国运。

本年（1942 年）4 月 18 日，美国飞机 25 架自航空母舰起飞，轰炸了日本本土之东京造船所、名古屋飞机制造场，坦克工厂、钢铁、炼油厂，给日本以极大震动。美飞机回来后，低飞我国浙东衢州机场，均安全着路，日本为解除美国飞机威胁和摧毁中国主力军，又发动了浙赣会战，欲占领衢州等要地。

浙赣会战自 1942 年 5 月 14 日开始，至 8 月下旬结束，又恢复原 5 月态势，使敌未能达到作战目的。对于浙赣战役，蒋仍取诱敌深入，分别击破战术。

此次战役，中国官兵和民众被屠杀者达 25 万人。

蒋介石和史迪威

蒋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后，美国任史迪威为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官，兼中国战区参谋长，要他保卫滇缅公路和撮合中国各派力量于一起。史氏则要求有对美、英、中军队的指挥全权。马歇尔答应尽可能支持他。

史迪威（1883～1946），比蒋介石大 4 岁，美国西点军校毕业，是职业军人。1920 年到 1923 年间，曾来北京学习华语。后于美国天津驻屯军任职。1942 年 1 月，任中国战区美国陆军司令官和蒋介石的参谋长。

1943 年任东南亚司令部副总司令。

史迪威到中国后，蒋答应予以军事指挥权。同时，向美国要求 10 亿美元贷款。2 月 12 日，罗斯福签署 5 亿美元贷款。蒋在经济上，得到不小补助。

蒋为拉印度抗战，曾于本年（1942 年）2 月 4 日出访印度，至 21 日返国，但未达成协议，反而和邱吉尔在印度独立问题上又存了芥蒂。于是蒋对美国

---

[1] 曹聚仁《中国抗战画史》，第 329 页。

更为靠近。

蒋于访印归来时，飞抵缅甸腊戍视察军情。自腊戍起飞返国时，突遭日寇 18 架飞机尾追，情形十分紧张，大家系好降落伞后，均甚慌张，唯蒋系好伞后，犹自看书。脱险后，人皆称道蒋之镇定自若。

日本以泰国、越南为根据地，先后侵占了马来西亚、新加坡，为急于征取中国，又进一步侵占缅甸，以截断滇缅公路，扭断中国的国际供应线。1942 年 1 月 20 日，饭田祥二郎之第十五军侵入缅甸。

英国英缅军总司令胡顿于 1 月 23 日向中国致电求援。2 月 16 日仰光告急。蒋派缅甸远征军第一路军于 3 月 12 日人缅。杜聿明以副司令长官代理司令长官率部作战。名义上蒋允史迪威全权指挥此次人缅作战，但史无实权，指挥不动，杜事事要请示蒋介石。因此，史迪威开始对蒋不满，在作战中不与杜合作，甚至不叫美国援华飞机参战，而一心掩护英军撤退，置中国军队于不顾。因此，中国人缅军 3 月至 5 月，接连失败，最后为保护英军撤退，竟被日寇截断归路，10 万之师，在仓促撤退中，死伤过半，损失极为惨重。蒋对史丢下中国军队独逃印度很不满意，从此，蒋和史迪威结下芥蒂，双方隔阂一步步加深。

史迪威从印度回重庆后，向蒋介石提交备忘录，提议建立一支中国新军。蒋介石则不予理会。罗斯福当然不能为史而得罪一国之主的蒋介石，所以也不支持建立“新军”。史迪威就只好焦急地等待着蒋的回音。

蒋对邱吉尔也因其在 5 月 10 日谈话时，只称道苏联和美国的抗战，而未称道中国军队和中国援缅战争，非常生气；蒋为缅战的确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邱氏连句感谢的话也没有，未免过分，蒋于是抱怨邱吉尔“以怨报德，徒有势利，而无信义”。

日本占领缅甸后，中国供给更加困难，必须用飞机越过驼峰高空向中国运输，非常困难。而日军则侵占了东南亚广大地区包括关岛重地。

蒋于 5 月对战局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日兵占地愈广，愈分散，必然失败愈快。而且从精神到物质，盟国均优于三轴心国。因而仍对抗战充满信心。

6 月初至中旬，美国于中途岛袭击日本海军，击沉日军四艘航空母舰。美军从此开始反攻，蒋认为日寇的失败，已经为期不远了，对抗战前途益为乐观。

蒋仍对史迪威耿耿于怀，6 月 26 日，召见史氏，宋美龄任口译。蒋不客气地要史迪威对缅战引咎自责，并告诉他，他的职责只是一个参谋长，应全心全意地根据“租借法案”，为中国争取更多的美援，不要花费精力于中国军事方面。同时，蒋还威胁说，如果美国不更积极地援华，他就和日本单独媾和。三天后，蒋又给史迪威写信，提出三点要求：“（一）调美军三个师来华协助作战。

（二）在华建立一支五百架飞机组成的空军，由陈纳德指挥。

（三）美国每月从驼峰向中国运送五千吨物资。美国政府答应了蒋的要求。

这种要求，实际上并不过分。蒋坚持抗战，人力、物力之消耗很大，中国政府地处西南地区，实是非常困难，美国为什么不可以给予更多、更大援助呢？蒋氏深知中国战场的关键地位，故敢于张口要物要人。但蒋要了美援之后，实际并未全用之于抗战。

而是着重加强自己军队装备，保存实力，准备对付中共。故美驻华大使

高斯和史迪威则坚决反对美国政府答应蒋的要求。史便给史汀生写信，说蒋要美援非为抗战，全为加强自己地位。他还说蒋介石“不曾有过朋友，只有奴才”。

与此同时，史迪威又于7月对蒋强调，战胜日本的关键，不在装备和技术，而在军事改组。蒋见史氏力争改组他的军队，当然已无法再与史相处，并且认为他这是在干涉内政。于是要美国召回史迪威。美国当时未予答应。

自蒋要求召回史迪威后，蒋史关系更为恶化，史称蒋为“小人”，称宋美龄为“白雪”。

罗斯福经慎重考虑后，仍决定支持蒋介石，将来用以抵制中共和苏联，现在用来拖住日军一百几十万大军，决不能因史而影响这一切。蒋为取得罗斯福的支持，特派宋美龄于本年（1942年）11月18日拜访罗斯福，表示感谢和诚挚的私人友谊，同时也争取更多的美国人支持中国抗战。当时罗斯福对宋以隆重礼仪相待。而宋的国会演说，更轰动全美。罗斯福也发表文章，称赞宋氏是中国人民的代表，受美国的尊敬和重视。美国更出版《中国的第一夫人》小册子，颂扬宋美龄。于是蒋介石的形象，在美国人心目中更升高了。

这主要是蒋介石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职，对日寇一百几十万人的苦战。这种战争对美国和太平洋战争的关系，美国人均十分的清楚。

英国人也知道中国战场对他们的意义，所以英皇和皇后，也邀请宋美龄访英。一时间，宋美龄和蒋介石成为世界瞩目的风云人物。

宋在美国和罗斯福进行了会谈。主要内容是：“（一）琉球群岛、东北、台湾将来应归还中国。（二）关于香港，其主权应属于中国，但似可划为自由港。（三）朝鲜之独立，可由中美两国共同担保。”

次年（1943年）6月24日，宋向罗斯福辞行，罗表示了5点意见。主要是美国同意派两个师赴缅作战；大连、旅顺、台湾，由中美海军共同使用。

本年（1942年）7月，盛世才归顺国民政府，新疆统一于蒋的领导之下。蒋对此极为高兴，于8月20日派夫人前往宣慰，29日抵达，宋氏此次宣慰饱经风险。

史迪威对蒋日益不满，他竟不顾罗斯福对蒋的大力支持，想建立一个以陈诚为主的政权。

美总统于本年浙赣会战后，特派威尔基绕道新疆来华，向蒋表示愿废除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10月9日，英、美国一同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通告送交国民政府。蒋见此通知，兴奋异常，其10日日记曰：“……接获美、英自动放弃治外法权之通告。此为总理 革命以来，毕生奋斗最大之目的，而今竟得由我亲手达成，心中快慰，实为平生惟一之幸事。”同一天，蒋又于国庆大典上宣布这一消息。他说：“我国百年来所受各国不平等条约束缚，至此己可根本解除。国父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遗嘱，亦完全实现。我全国同胞，自今日起，应格外奋勉，自强自立。”

也在10月10日这一天，美国费城独立厅的自由之钟，敲响了31下，为将成为独立自由的中华民国政府，遥致祝贺！

但英国以不归还九龙签约为条件，蒋则拒不接受。因之新约在1943年元旦未能签署。美国则偏袒英国。

在此期间，汪伪政权于1943年1月9日对美。英宣战。并于同一日，宣

告日本废除了对华不平等条约。蒋见此情况，深为不快，认为晚于汪伪宣布废约大事，实在为之减色。遂于 11 日，保留收回九龙、香港权力，签署美、英新约，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个日子，在中国近代史上当然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史迪威于 1943 年 2 月 9 日，终于向马歇尔拍发了要求排除蒋介石的电稿。罗斯福则对马歇尔告诫说，蒋是四万万人民的领袖，不能像对待苏丹酋长那样对待蒋介石，而且也找不到可以代替蒋氏的有力人物。因而史迪威政变计划流产。

蒋介石对此当然不会不知，便对史迪威进行反击，他特意抬高陈纳德，而压低史迪威的作用，以夷制夷，此之谓也。3 月 3 日（1943 年），蒋成立第十四航空队，以陈纳德为队长，并晋升陈为空军少将。陈的助手，艾尔索普（罗斯福的远房表亲）于同月给罗斯福的顾问霍普金斯写了一封长达 21 页的信，大力攻击史迪威。他说史轻视蒋介石，他的军事改革，只会招来国民党人反对罗斯福。为了更好地对日作战和今后与蒋合作，必须招回史迪威。

同时，又劝罗斯福为使蒋介石于战后对付中共和抵制苏联，必须保存蒋介石的实力。

与此针锋相对，史迪威的助手戴维斯则在华盛顿发起“揭露中国真实情况运动”，批评蒋政权腐败不堪！

但罗斯福只听艾尔索普的意见，对史迪威日益没有好感，史迪威的意见，罗斯福一点也听不进去了。5 月华盛顿三方会议上，罗斯福完全支持陈纳德，拨给 500 架飞机（5 月 22 日，第三国际宣布解散）。

5 月 25 日，罗斯福将缅甸作战计划通知蒋介石，但未告知详细计划。蒋派商震向史迪威索取会议记录和海军兵力表，但史先是不给海军兵力表，后经商震再次索取，史才全部交出。对此蒋极为震怒，坚决要求撤换史迪威。

同年（1943 年）7 月，白宫顾问柯恩访华时，蒋就向柯恩直接表明态度，他批评史迪威在华动辄行使总统之权，叫他不知如何对待，并说明他请美国派联军参谋长，是为了获取美援，但对此，史迪威根本不关心。他最后表示，至于美国应否调回史迪威，则是美国政府之事。

柯恩回国后，建议罗斯福调回史迪威。但因马歇尔反对而未成。

10 月 16 日，东南亚联军总司令蒙巴顿偕美国索摩维尔中将访问重庆时，蒋氏夫妇在和蒙巴顿合影后，蒋乘机对索摩维尔谈史迪威之事。他说一年半以来，史迪威使他难以容忍，对此不能精诚合作，深为遗憾。第二天，蒋对索摩维尔明确表态，决心辞退史迪威。当晚蒋又召见史氏，史则立即承认错误，并声明今后绝对服从领导。蒋又取消赶走史迪威之意，复加信用。

18 日，蒋乃告知索摩维尔，他已原谅史迪威，不再计较前嫌。就此，蒋、史之争告一段落。

蒋介石的政治、经济思想

蒋介石于 1943 年春，写成《中国之命运》一书。主要是由别人撰写他的意思，又由他修改和审阅。这一年，中国废除了不平等条约，蒋极为高兴，就写了这本书，谈自己的政治思想，说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重大意义等。

这本书共 8 章，近 20 万字。主要内容是他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变化的认识以及满人人主中原后，对中国民族意识的摧残与中国的迅速衰

弱以及受不平等条约奴役的历史过程。分析了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不利影响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重大意义。书中还介绍了民国和北伐历史以及他反共的原因、中国革命的根本哲学问题、中国革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

综合起来，大体如下：

中国固有的德性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中国的立国之纲，是礼义廉耻四维。中国的历代兴亡，均以此四维八德之显隐为关键。四维八德发扬光大，则国兴，否则，国便衰微，因而要大力提倡四维八德。

清朝的衰败招致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失去独立和自由，中国民主革命的目的就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去掉对外依赖心理，而重点则要落实在民生主义上。但民国成立后，由于政治腐败，西方科学也无法真正吸收和为我所用，以致于以泥沙代火药。

因而又发生国民革命。国民革命是以三民主义为指导，为灵魂。

情、理、法为三民主义之民族、民生、民权三原则。情为民族感情；理为经济平等，即合理；法为以法制限制民权，不得侵犯他人自由。

他把中国革命哲学解释为力行哲学，即广大民众于不知之时先力行，于行中求知，跟着先知者盲从地“力行”，这是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和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思想的发挥和演绎。

最后他谈中国革命与世界形势问的关系，仍是用中国传统文化和固有的政治哲学（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四维八德）加西方科技，为建国、民生服务。他说：“中国固有的民族精神与国民德性，自有其优秀和特长之处。而中国固有的政治哲学，尤为国民固有的精神所荟萃”。[①]

在经济建设方面，他于 1935 年 10 月 14 日发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及其实施纲要》。在这篇文章里，蒋的经济建设理论基本形成。主要内容是：

增加生产，解决人民需求；广开就业机会，以减少失业人数；增加输出产品，保持贸易平衡；保障投资安全，鼓励生产活动；解除工农业发展的外在障碍，解除阻碍生产发展的心理障碍；破除迷信、愚昧、保守、懒惰等习惯；捐税产业税的合理制订；解除工农发展的内在障碍——改善经营方法；解决工农业发展流通障碍——发展交通运输。

1943 年 3 月 1 日，蒋又于重庆发表小册子《中国经济学说》。

书中首先批评西方经济学是以我为出发点的个体经济学，其重点是物与物的关系；又批评共产主义只重无产阶级，而不重其他社会阶层，不重视全体社会的利益。总之，以上两种经济学均有缺陷，不理想，不能解决社会问题。而最正确的经济学是什么呢？他认为是孟子的“仁民爱物”，既重物，亦重民，即重社会全体所有的人民。他的经济思想的中心是：经济以养民为本位；以计划为必要；民生与国防合一。

国民经济中，不准有私人独占资本，也不主张国家控制一切。

国民经济是国营和民营相辅相成的综合体。

该书的第二部分是经济建设的最高理想，他认为是未来的大同世界。

第三部分，理论设想和实践规划。

关于经济的总体内容是：生产：农、工、矿三种门类；流通：贸易、交通、金融；分配：社会、财政两大方面。生产、流通、分配三者之间，又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①] 《中国之命运》，第 203 页。

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计划，他在当时设想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为统一建设时期，1928 年至 1937 年。这一时期的基本任务是振兴实业，改革财政和健全金融制度。本时期偿还北洋政府债款 2.7 亿美元。金融方面，则于 1933 年改两为元，建立银本位制，1935 年又改实行法市制度，同年设中国农民银行，专门调查农村金融。

到 1936 年，棉花、小麦接近自给，并减少了大米进口，交通方面，完成 7 省公路网；修筑了浙赣、粤汉两铁路；南京建立了中央广播电台。

第二个时期是 1937 年至 1945 年，为抗战建国时期。主要是在大西南和大西北进行建设。在抗战中，他提出三分军事、七分经济。其建设中心是军事和国防，兼及改善人民生活。

具体措施是力求政府财政收支平衡，人民负担平均化；稳定粮价；沿海工业迁内地；以物产出口换外汇。因交通不便，建立驿运制度。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建立联合总处，稳定市制，发展对外贸易，打破敌伪封锁。

至于第三个时期的规划，及其《经济建设方针》（1945 年 10 月 10 日发表）和《确立战后我国之经济事业制度》，主要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以谋国民生计之均足”。但均成为一纸空文。

史迪威咄咄逼蒋

1943 年 8 月 1 日林森逝世。蒋即征求吴稚晖的意见，看谁继任主席合适，并表示自己不愿当主席。吴以为蒋是真心辞让，便同意蒋的意见，主张在蒋之外另选主席。程潜还提议在元老中提出主席人选，结果受到二陈 CC 系的攻击，并提议只有蒋介石可以出任主席。最后还是蒋出任主席，并兼行政院院长和军委会委员长，一身三职，全权独揽。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 8 月的魁北克会议上，提议战后应以中美苏英四国为中心设立国际和平机构。邱吉尔表示同意。9 月，美国国务卿赫尔向苏外长莫洛托夫提出中美苏英四强宣言建议。但莫洛托夫不同意，不承认中国为四强之一。

10 月 19 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讨论欧洲战后问题。会中赫尔又一次提出四强宣言建议，苏外长仍不同意，赫尔离庸而去，苏外长表示妥协，同意了四强宣言建议。

30 日，《四强宣言》通过。中方由驻苏大使傅秉常与三国外长共同签署，主要是由四强共同维护世界战后和平。

接着，罗斯福为召集开罗会议，邀请邱吉尔、斯大林、蒋介石参加。斯大林因对蒋有宿怨，不愿和蒋同席、拒绝参加，邱吉尔同意参加。蒋介石于 11 月 12 日接到赫尔送来的邀请，也决定参加。结果为商讨战后问题，罗斯福不得不再于德黑兰召开美英苏三国会议。蒋介石对斯大林的先不承认中国为四强之一，后则又坚决不与蒋一起开会，终生都耿耿于怀。这无疑是对蒋介石的一种难以容忍的歧视。

蒋于 11 月 18 日上午 11 时自重庆起飞，21 日上午 7 时许到达开罗。蒋赴开罗前想了很多，并拟好了中国提案草稿，其中未提九龙和香港、西藏问题。对于日本赔款之事，蒋决定自己不提，先听英、美的意见。并要在罗、邱面前表示自己的淡泊和无求于人，给罗、邱留下良好的印象。此时蒋的心

情是有些紧张的。蒋的随行人员中有夫人宋美龄和史迪威等 10 余人。

23 日上午开会。会上蒋提出反攻缅甸需要英国出动海军助战。如果缅甸收复，则华南、华中皆可收复。但邱吉尔不同意。

当日晚上，罗斯福又和蒋单独会谈，主要讨论了中国领土的归还问题。并一致同意东三省。台湾。澎湖列岛战后归还中国；琉球由中美共管；日本天皇制是否维持应由日本人民自决，以及朝鲜的独立等问题。

在这次谈话中，罗斯福还表示对斯大林未敢深信的意思，以释去蒋对未来德黑兰会议的疑虑。同时罗斯福也对蒋以重兵监视陕甘宁边区表示不能理解。并希望蒋建立一个国共合作与统一的联合政府。

邱吉尔于 24 日设晚宴招待蒋，但始终未告诉蒋海军出发地点。这是因为邱吉尔早与罗斯福达成协议，英国先以海军收复新加坡，置缅甸于不顾，敌对蒋保密。蒋对邱吉尔的印象好坏参半，认为他老成持重，是深谋远虑的现代政治家；但他也深感邱吉尔对于中国的利益及生死存亡，是不屑一顾的。第二天，邱吉尔又偕蒙已顿、外相艾登拜访蒋，寒喧而已。

《开罗宣言》于 11 月 26 日定稿，但必须在德黑兰会议上，经斯大林同意才能公布。然德黑兰会议并未征求蒋的意见，就删改了开罗宣言。甚至罗斯福与斯大林议决苏联出兵东北，可以得到东北铁路和港口的特权等内容都未征求蒋的意见。

12 月 3 日，《开罗宣言》发表。其中归还台湾、东三省和承认中国为四强之一等内容使蒋十分高兴。[①]而获利最多的是斯大林，他在德黑兰会议中争取到英、美于 1944 年 5 月、日开辟第二战场的决定。美国以太平洋战场为核心，后在太平洋收复的岛屿上设飞机场，继续轰炸日本本土。所以开罗、德黑兰会议后，中国战略地位下降。美国也拒绝了给蒋 10 亿美元的贷款；英国则将中英联合反攻缅甸计划一笔勾销，将重点转向欧洲，连兵员物资也一起转走。

在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对蒋的对中共作法，表示不好理解。

并劝蒋与中共建立联合政府，蒋却以苏联不插手东北为条件。罗斯福因此对蒋改变了看法，认为蒋很固执和狭隘，更没有民主政治家的胸怀，要想靠蒋在中国实行民主和开明政治是无望的。

罗斯福在开罗和史迪威有了共同语言，并和史进行了轻松愉快的谈话。

12 月 6 日的一次谈话中，罗斯福甚至表示了要推翻蒋介石的意思。并说，“我们应当寻找另外的人或一群人继续下去”。[①]并且又单独告诉史迪威说：“如果你无法与蒋相处，又不能把他撤换，那就一劳永逸地把他干掉算了。你明白我指的是什么，选派一个对你言听计从的人去执行吧！”[②]史回重庆后，就将此密计告诉美军 Y 军司令部的多恩。多恩甚至制定了蒋乘飞机赴印度时的飞机事故计划。具体办法是当乘客被迫跳伞时，蒋和夫人的伞是失灵的坏伞。但多恩认为罗斯福并未最后授权史迪威执行这个计划，所以此设计方案未予实行。

1944 年 1 月初，美国正式拒绝了蒋要求的 10 亿美元借款。蒋则不令他的新军进入缅甸，坐观史迪威率领美军作战。马歇尔则奉罗斯福之命，致电

[①] 见蒋介石 1943 年 12 月 31 日日记。

[①] 戴斯：1943 年 12 月 6 日日记和备忘录；瞿同祖译《史迪威资料》（中译本）， 第 70 页。

[②] 多恩：《史迪威从缅甸出走》，第 75～79 页。

蒋介石，表示如蒋不令其新军人缅，就停止一切美援，蒋被迫妥协，协助扭转缅北战局。

日本天皇于 1944 年 3 月发动“一号作战”（豫湘桂战役）以来，蒋的军队连连溃败。日军迅速侵战河南、湖北和湖南大部，打通了北京至长沙的铁路线。

蒋的这种大溃败，给罗斯福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已深深地认识到中国军队必须改组，蒋本人指挥无方。便于 7 月 6 日毫不客气地致电蒋介石，要蒋交出指挥权，把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让史“指挥全部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包括共产军在内”。同时指出，只依靠空军是不行的。这是贬低陈纳德的作用。

蒋于此败北之际，不好硬顶罗斯福，但也决不会交出全军指挥权，便不声不响的拖延下去，只说让他多多考虑一下，还要求罗斯福派一特使来华协调工作。罗斯福同意了。9 月 6 日赫尔利被派抵华，经和蒋讨论多次，达成一致意见：史迪威职务改称中华民国陆、空军前敌总司令指挥作战。中共军也表示接受史迪威的指挥。但史担心他不能真正指挥，便要求以陈诚、白崇禧充任军政部长和参谋总长。8 月 23 日，罗斯福又电蒋，促其交出中国军队指挥权。

蒋只口头答应交指挥权给史迪威，却仍要调缅甸远征军回国，意在等待美国击败日军于缅甸。罗斯福此时（9 月中旬）正在魁北克开八方会议，和邱吉尔吵得不可开交，接电后，便立即（9 月 18 日）致电蒋介石，如不马上交出中国军队指挥权给史迪威，美国就立即停止美援。罗斯福此时，真是咄咄逼蒋，不稍放松。此电文由史迪威收到，史志得意满，不亦乐乎。

他自称这个电报是辣椒粉，十分得意，并在当大的日记里对蒋破口大骂，说这一下击中了蒋的太阳穴。还写了打油诗以泄其愤，大失厚道。

这天，蒋正在重庆郊外黄山别墅与宋子文、何应钦、白崇禧等要人开会。史迪威便乘车急奔黄山。当时赫尔利在场，听说史来，便迎在走廊阻止史氏向蒋面交罗斯福电文。但史迪威坚持面交，毫不考虑赫尔利的劝阻。

蒋闻此，气得脸色苍白，只低沉他说了声“我明白了”，就马上散会。蒋人格感极强，怎么受史迪威如此羞辱呢？一看电文，便顿然改色，立即决定辞退史迪威。9 月 24 日，蒋交赫尔利一份备忘录，正式提出不要史迪威的决定，最主要的理由，是他指挥不了史迪威。同时寄信罗斯福，表明任何此外的美国军人均可出任中国陆军总司令（要听最高统帅蒋的指挥）和中国战区参谋长，就只有史迪威绝对不可。

蒋介石如此反掌一击，却将史迪威打下马来。赫尔利完全支持蒋的意见，并于信上附言同意蒋的决定，还特别说明蒋的意见是不可更改的。

随后蒋又召见赫尔利，特交给赫尔利备忘录一份，说明中国主权与尊严和个人人格不能损伤和侮辱。国家与个人均不能在接受强制命令下合作。“否则，任何牺牲均所不恤！”[①]

物极必反，在蒋的强硬态度下，罗斯福终于决定召回史迪威。

10 月 1 日，赫尔利将此消息转告史迪威。史勃然大怒，又骂罗斯福为“老软脚蟹”，说罗斯福给了他致命一刀。

但罗并不是一下子将史调回美国，又和蒋商量，欲留史指挥缅甸作战军

[①] 《秘录》，十三，第 158 页。

队。蒋仍坚决不答应，力主将史召回美国。赫尔利也向罗斯福写信，说明如果支持史，就将失去蒋介石，甚至失去了中国，仍坚持将史召回。10 月 18 日，史迪威最后被决定召回美国。21 日史离华返美。二年以后，史患癌症逝世。

史迪威之事，事关中国主权，蒋始终坚持，无疑是正确的。

接替史迪威的是魏德迈，他的性格谦和，循规蹈矩，和蒋自然合得来。魏以蒋的参谋总长兼中国战区司令，尊重蒋的意旨。因之蒋对他甚是称道，说他直谅勤敏，办事积极，胸无成府。蒋个性很强，只有随和谦恭之人才能与之合作下去。而且魏德迈并答应给蒋武装 36 个步兵师，至 1945 年 6 月，基本武装完毕。这使蒋很高兴！

1944 年 12 月 25 日，蒋又成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以何应钦为总司令，辖四个方面军。这是将中国军队指挥权，通过何应钦，牢牢地抓在手中，使魏架空，上有他，下有何，中国军队指挥权，仍稳操在蒋氏手中。

1943～1945 年各战役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军经 1942 年 6 月中途岛和 8 月所罗门群岛之战，抑制了日军的猛烈攻势。

日本政府认为，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大东亚圣战 ”又从太平洋返回中国大陆，大东亚战争的最后阶段，仍为中国战场的角逐。因之自 1942 年 5 月的浙赣会战开始，日本就以摧毁中国各地野战军实力和确保侵占区，掠夺资源，破坏我供应线为目的，在各地区发动进攻。

1942 年 12 月，日寇向我大别山以南地区发动进攻。此时改任尻田第十一军军长，指挥进攻部队。但琢田等 9 人乘飞机过太湖上空时，被我军击落，全机人员悉数毙命，此役至 1943 年 1 月上旬结束。敌伤亡万余人。

日寇为肃清沔阳。监利地区我游击根据地，于 1943 年 2 月上旬至 6 月 7 日，以 5 个师团、30 架飞机兵力，发动鄂西会战，结果未能如愿。

同年 4 月 18 日，在鄂西会战期间，日军山本五十六于南太平洋战死。6 月，日本海军退人“ 绝对国防圈 ”，失去太平洋上的制海、制空权，从此转胜为败。

为打通中印公路，中美联合发动了缅北作战，史迪威任总指挥，郑洞国为副总指挥。战役从 1943 年 10 月开始，至 1945 年 1 月下旬，收复了缅北，打通了中印公路，该公路命名为“ 史迪威公路 ”。

在缅北作战时，在华日军为策应缅北日军，重振太平洋战场士气，发动了常德会战。11 月 2 日，敌以 5 个师团（约 10 余万人）的兵力开始进攻，至 12 月底结束，常德失而复得。日军失败。

此次战役，中美空军共出动飞机 280 架，予敌空军以沉重打击。

1943 年 11 月起，美国飞机不断轰炸日本本土，日本天皇极为恐慌，决定对我国大西南发动全线进攻，以摧毁我西南地区各机场；同时打通京广线，连接印度支那。此次战役，叫做“ 1 号作战 ”。

1 号作战共分三大战役：河南会战，湖南会战、广西会战，又称豫湘桂会战。日寇投入兵力 50 余万人，规模之大是空前的。东条称之为“ 玉碎作战 ”，台湾方面称之为“ 破罐作战 ”，总之是孤注一掷。这对蒋介石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蒋投入兵力约 160 余万人左右。

河南会战，于 1944 年 3 月 10 日正式开始，至 5 月下旬结束，敌打通了京汉铁路。

湖南会战，自 1944 年 5 月 27 日开始，至 8 月 8 日结束。敌打通了粤汉铁路武汉至衡阳段。

自 8 月至 12 月，日寇继续进行桂柳会战，遂占领了广西，打通了中国和越南的交通线。

从 1944 年 3 月至 12 月 5 日，日军横冲直撞，孤注一掷地疯狂进攻，把中国各战区军队接连击败，中国军队虽经不少殊死搏战，但终抵挡不住日军的冲击，八九个月中又失去中国富庶的内地精华之域。蒋的军队退守到大西南地区，处于危殆之中。

12 月 2 日，日寇侵人贵州独山，重庆震动。魏德迈建议蒋迁都昆明，蒋则表示坚决不离开重庆一步。魏表示愿与蒋同守重庆，蒋为此深为感动。

国军连连失败，究其原因，主要是各军作战不力，配合不好。

如张德能在第四次守长沙时，不听战区命令，擅自改动守城方案，致使长沙唱了空城计。

衡阳会战时，各增援军未能拚死深入重围接应，惟恐被歼，故使衡阳孤城终于失陷。这是最主要的致命伤。蒋历来以保存嫡系实力为念，其各级军官，也怕打硬仗，见硬仗多是回避，或撤退。

杂牌军除原西北军有战斗力外，其余各部，尤怕被歼。这是军队私有化的必然恶果。

另外，胡宗南在西北的精锐之师，不从敌之背后夹击南侵日军，而用之于防范中共陕甘宁边区，也是 1944 年大溃败的重大原因之一。

蒋介石对豫湘桂战役的主要战略战术，是逐次消耗敌人，然后将敌人引到长沙、衡阳地区适当地带予以歼灭。这种部署未错，问题是未能如愿实行。

因此蒋介石自己也承认此次大溃败很惨。他说：“桂林既陷，军事受挫已达极点乎？”于是他下决心要改革军事和政治，“并速求实行为要”。[①] 足见蒋事先绝未料到衡阳、广西之惨败。

12 月上旬，日军竟深入贵州省，但孤军深入之敌旋即撤走。

与此相反，美国在太平洋上则取得一系列胜利，到 7 月，占领塞班岛，从此，美空军天天轰炸日本本土。

20 日东条内阁辞职，22 日由小矶国昭组阁。8 月 25 日美军消灭日寇海军主力于菲律宾东南海域。

历史进入 1945 年，由于军事上的一连串失败，蒋介石的心情十分沉重，美、英又向苏联交好，对他更加冷落，尤其罗斯福对他的扩大美援要求予以拒绝，更令他忧虑，只有魏德迈武装他 36 个步兵师的许诺给他不小的安慰。

小矶首相为寻找轰炸日本东京的中国机场，自 1945 年 1 月至 3 月，发动了湘粤赣战役和豫西。鄂北战役，日军均未达到目的，战后又恢复原态势。

湖南会战后日军并未打通衡阳至广州段铁路，1945 年 1 月中旬，日军开始对粤汉路南段，由南北两端同时夹击，共约 10 万人兵力，先后侵占我遂川、赣州机场。至 1 月 28 日，敌攻陷曲江，终于打通了京广路全线。

与此同时，日军于本月下旬，占据了广东全部沿海海岸线，以防美军登陆。

[①] 见蒋介石 1944 年 11 月 12 日日记。

同年（1945 年）4 月 30 日希特勒自杀。5 月 8 日德国投降，9 日见报。这一天，成为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胜利纪念日。

日本内阁见势不妙，主张投降。而冈村宁次却要率领“中国派遣军”12 个军，百余万人，准备确保中国伪满，放弃日本本土，全力进攻重庆、西安，消灭中国抗日根据地。但日本大本营不同意冈村的计划，并令冈村的总参谋长松井制止之。但冈村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竟不理睬大本营的意见，径直命令园部和三郎之第六方面军执行进攻四川计划：湘西会战。

他此次作战的目的是侵占四川，制止中国军队总反攻，并促使中国政府崩溃。冈村以第二十军进攻湘西，蒋以王耀武第四方面军迎击，节节抵抗，4 月 27 日，击溃日寇第二十军。总计歼敌约近 5 万人。这是抗战最后关头的最大一次战役。

自 4 月 27 日，中国军队第二、三方面军乘胜反攻，进行桂柳反攻战，先后收复柳州、桂林，至 8 月中旬结束。

雅尔塔会议

1945 年 1 月至 2 月，波兰、匈牙利、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相继光复。美、英、苏三国于 2 月上旬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雅尔塔召开三国首脑会议。

2 月 4 日，雅尔塔会议举行。对此会议，蒋甚为忧虑。2 月 11 日，会议发布联合声明（对于中国问题，却未予刊载）。蒋则猜测，他们三国是否会背着他出卖中国？但他尚不敢肯定，只是疑问。甚至还认为美国决不会和英、苏一个鼻孔出气，还存有一些希望，于是就耐心等待罗斯福对他实告一切。

但令人失望的是，罗斯福并未告诉他有关牺牲中国的密约部分。到 3 月 1 日，罗斯福在国会报告时，还公然撒谎，说什么雅尔塔会议是讨论欧洲问题，与太平洋地区无关。关于密约之事，甚至连副总统杜鲁门都不知道。

最先获此密约内容的是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魏道明。他于 3 月 15 日密电报告重庆。蒋得此密约内容，愤怒已极。他说：“阅此，但有痛愤与自反而已。”

蒋一气之下，萌生了与日本单独媾和念头，遂有缪斌的东京之行。缪斌到日本后，首先访问皇族东久弥宫。缪对东久弥宫说，重庆不愿看到日本完全被摧毁，因为日本是中国的堤防，如果现在缔结和平，我们仍可以阻止苏联出兵。因此蒋愿与日本单独媾和，以联日反共拒苏，但日本必须取消南京政府和归还东北。尽管日本小矶首相愿意进行和谈，终因日本天皇和陆相杉山元、外相重光葵坚决反对，谈判未能进行。小矶首相遂于 4 月 5 日辞职，继由铃木贯太郎组阁。

5 月间，蒋又通过何柱国派吴树滋再与日本政府联系和谈之事。条件是日本从全中国撤军（包括东北在内）；和谈成功后，中国不妨害日本在中国以外战场的行动。但因为时已晚，日本海军已经垮台，日本陆军撤走，也必被美、苏围攻，而且日本仍不愿撤军，故日本政府未予答复，此事不了了之。

赫尔利于雅尔塔会议后，在 2 月底返美述职（已出任驻华大使），看到了雅尔塔会议密件。赫看后，大吃一惊，便将密约抄录下来，附上自己的意见，请罗斯福过目。他问罗是否否认了自己原来信守的二战以来的一切宣言（主要是《开罗宣言》）和原则，并且是否否认了总统自己 3 月 1 日的国会演说？

罗斯福被逼之下，不得不向赫尔利承认自己错了，并派赫尔利到伦敦和

莫斯科进行补救活动。这是罗斯福玩两面手法，他一方面向赫尔利认错，一方面又于 4 月 11 日致电邱吉尔，认为签订密约没有任何不妥之处。结果邱吉尔和斯大林均不予理睬。但罗的内心深处，并不平静。3 月 1 日当他在国演会说时，就是软瘫在椅子上，坐着讲，而且言语吞吞吐吐，似是而非，足见其内心的矛盾状态。

4 月 12 日，罗斯福就患脑溢血溘然而逝。他当然是背负着欺骗中国人民的沉重包袱死去的。

雅尔塔密约的有关中国部分，主要是承认外蒙独立；大连开为国际商港，苏联有优惠权利；苏联租借旅顺为海军基地；中东、南满铁路由中苏共管。美国以出卖中国权益换取苏联出兵东北，以节省其兵力损失。这就是罗斯福的和平观念和原则。

关于欧洲部分，美英承认东欧为苏联势力范围。朝鲜和印度支那部分则先行托管，而后独立。

这实际上是在划分战后势力范围。

这个密约当然是罗斯福对《开罗宣言》的背叛。而杜鲁门上台后，依然维持密约原则，未做变动。

可见，当时的中国仍未有独立可言。蒋介石自己也完全承认这一点。他说：“中国之独立统一，自由民主政治之建立，而烦友邦劳心，且劳其征求英、俄同意，殊为我国耻辱。国不自主，人不自强，宇宙之大，其尚有我民族生存之地那？能不戒惧乎哉！”[①]

如无 1944 年的中国战场大溃败，蒋的国际威信，或许不至于受到如此损害，而被关在三强雅尔塔会议门外。但这只能怨蒋自己既抗战，又不忘未来大打内战，置胡宗南之重兵而不用，遭 1944 年之惨败而受辱于英美苏三巨头。

《荒漠甘泉》

1944 年中一连串的失败，不但使蒋意识到要改革军、政，而且在他的思想性格上，也打上了烙印，使他在孤臣孽子的心境上，更进一步寻求新的精神支柱，以度过难关。本来中国历史上孤臣孽子的奋斗史迹和思想资料极其丰富，尽可以够用。但在这次重大的挫折中，他也感到不足以应付了。于是他在 1944 年 7 月，又找到一本宣传基督教的书，叫《荒漠甘泉》，用心阅读，后来一直到台湾，每日必读此书。

《荒漠甘泉》是一部哲理性的书，鼓励人在逆境中奋斗不息，勇往直前。一篇篇地排列开来的道理或哲理文字，行文和格式，很像《论语》。

蒋的哲学思想，主要是王阳明的“心物一体”论。在此思想指导下，蒋以《荒漠甘泉》来修养自己的灵性，尽量提高人的价值、人的能动性，从而战胜重重难关，百折而不回。

他在《存心忍耐，奔……》的一篇批注中，有一段话说：“在袭击之下，继续工作，心中负着重压，仍不停前奔，灵里深感痛苦，仍然勉力尽职，这才是基督的忍耐。”[①]

[①] 见蒋介石 1945 年 4 月 25 日日记。

[①] 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第 5 页。

的确，蒋有着非凡的毅力和“没有一件东西可以伤害我”的坚强自信心。蒋在任何困难中，好像不曾丧失过自信心！如到台湾后，也一直未失掉过“反攻大陆”的信心，就是一个实例。

在 1945 年 1 月 3 日的批注中，蒋又提到此书对他的影响。他说：

“去年下半年，饱经艰危，而能坚韧不拔，安然度过者，实得力于此书不少。”[②]

蒋介石不但从《荒漠甘泉》中汲取精神力量，还在 1965 年，将此书传给蒋经国，并让他把自己在该书中的批注全部抄录下来。

日寇无条件投降

1945 年 4 月，铃木组阁后，就因日本海军已经全部被歼，极愿早日停战议和。但是陆相阿南则因为尚有 160 余万军队在中国各地，坚决反对议和，铃木也不得不顽抗到底。

7 月 16 日，美英苏三国于德国柏林郊外波茨但召开会议，决定日本无条件投降，这次又不邀请蒋介石参加会议，这是对蒋的歧视，也是并未真正承认中国为四强之一，当然也是对参加抗日战争的中国人民的歧视。参加会议的三国首脑，美国总统杜鲁门，英国首相邱吉尔，后是艾德礼参加；苏联仍是斯大林。

波茨但公告拟好后，通知蒋介石，经蒋同意，于 7 月 26 日以中、美、英三国签字发表，斯大林未签字。8 月 8 日，苏联对日宣战后，才予补签。

公告内容主要是：命令日本无条件投降；实施《开罗宣言》，促进日本民主化；日本不得有军火工业；在日本的占领军待新政府成立后就撤出日本。

但日本拒不投降，声称要“决心战至最悲惨的结局”。7 月 30 日，又想通过苏联争取“有条件的和平”。这当然是无望的。

在波茨坦会议进行期间，杜鲁门于 7 月 21 日得知国内的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消息，就问马歇尔是否还需要苏联的帮助？但马歇尔对原子弹威力仍心中无数，因而未和苏联决裂。但也已经认为既有原子弹，就不必过于依靠苏联了。

亚洲所受的威胁，主要是来自苏联的扩张，为此，美国告诫中国在中苏谈判时要态度强硬。此外，杜鲁门还派哈里曼到苏联劝说斯大林放弃东北特权，但斯大林不予理会。

因此，美国赶快于 8 月 6 日晨 8 时，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迫日投降。但日本并不理会。斯大林见此情况，岂敢怠慢，便于 8 月 8 日急忙对日宣战，立即出兵东北，美国见第一颗原子弹未生效，于 8 月 9 日 11 时 30 分又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这次日本天皇害怕了，立即召集御前会议，各相和军方首脑，主张自主撤军，战犯由日本政府自己审判；在日本不得实行军事占领等。当时东乡外相就说这种条件是不会被接受的。第二天早晨，天皇又召集第二次御前会议，由日本天皇裁决，决定无条件投降，但要求保留天皇制度，并立即将此决定报告盟国。当天晚上，日本天皇即向全日本国人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和无条件投降。

中美英苏四国立即答复，接受日本无条件投降；并部署一切。

[②] 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第 9 页。

但日本军人则仍坚持作困兽之斗，不愿接受元条件投降。

14 日上午，铃木奏请裕仁大皇再开御前会议。日皇最后不顾军人反对，再次决定无条件投降，于当日下午 1 时对全国发布无条件投降诏敕。

同时向盟国最后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 月 15 日，中国政府接到日皇无条件投降电文，故以 8 月 15 日为日本无条件投降时间。

于同一天，《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蒋介石仍不得不在苏联出兵东北的情况下，被迫接受雅尔塔会议决议。蒋所以接受这些条件，是因为苏军正在东北，成为既成事实，只得妥协，以求东北的稳定和不被破坏。对于外蒙，他不承认也无用，而且会刺激苏联。他认为虽然如此，在承认外蒙独立方面仍是有罪责的；不过他当时认为，以后外蒙总有一天会自动归来。

接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电文后，蒋介石于重庆发表《抗战胜利对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广播演说》。演说中充满了“不念旧恶”、“与人为善”、“以德报怨”的恕道。这种恕道成为蒋处理日本投降和有关事情的基本精神，而忽略了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战犯严惩的一面。

对外敌和侵略，总是手软，与人为善；而对本国人民或不同政见者，则严厉镇压，不予稍怠，是自清朝以来当局者极其突出的劣根性。这是半殖民地之封建统治者以天下为私物的政治特征。

蒋于当天电命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按指示原则投降，并派何应钦代自己接受投降。蒋对冈村指示六原则主要内容是：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派代表到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命令；军事行动停止后，日军一切装备暂不许动，保持现有态势，静听命令；飞机船舰停放现地；长江船舰集中宜昌、沙市；不许破坏任何设备、物资；接到该指示后，要迅速答复。

冈村接蒋电令后，于 17 日答复。冈村直接向蒋拍电，说明立即遵命派代表赴玉山，要求派员接见。电报最后署名为“驻华日军”字样，充分表明冈村并未认罪。

但因玉山机场被雨冲坏，又改在湖南芷江。蒋又电令冈村派代表到芷江机场降落。

蒋于 18 日，明令何应钦承蒋之命办理在中国战区受降事宜。

其中特别指出的是，受降者，应为政府所指定的部队，如有擅自受降者，下令惩办之。日军也不得任意向非指定的部队投降或让防，否则，以武力制裁之。

冈村乞降代表今井武夫等 8 人于 21 日飞降芷江机场。何应钦派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为代表召晤；并授予第一号备忘录，指示日军投降事项。令其于 23 日返回南京。备忘录主要内容为：何应钦以中国陆军总司令身份，命冈村遵命，按其规定行事；任命冈村负责指挥越南北纬 16 度以北广大地区内之日军对中国投降；具体规定五项，大体和蒋的指示相同；另外说明由副参谋长冷欣代表何应钦本人到南京设前进指挥所，命冈村按冷欣要求照办一切；关于冈村向何签署投降书仪式另定。

9 月 2 日，日本政府投降代表重光癸、梅津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正式签署向盟军投降书。美国麦克阿瑟主持签字仪式。中国政府受降代表徐永昌也出席了受降仪式。

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决定于 9 月 9 日举行。

9 月 9 日上午 9 时，何应钦代表蒋介石，在南京主持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经 20 分钟完成。日军投降书共 9 条，由冈村和何应钦签署。

9 月 1 日，成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10 月 5 日，台湾设立前进指挥所。17 日，第七十军于基隆登陆，收复台北。10 月 25 日，陈仪主持受降仪式，日本前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总司令安藤利吉签署投降书。台湾正式归还中国。

9 月下旬，冈村宁次向冷欣提出一项建议，即让百余万日军仍留在中国，作为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共军队的力量。冷欣立即转告何应钦，何又转呈蒋介石。而蒋竟表示同意，认为可以采纳。[1]后因美国杜鲁门坚决反对，蒋才作罢。

抗战时期的日常工作和生活

蒋在抗战期间，生活比较紧张。每天早晨 5 时起床，做早操。

早操毕后批阅重要电报和军政等重要计划、报告。6 时半，进早餐。

然后接见来客。这些客人，大部分是高级参谋人员，或因紧急事情应召而来的人。10 时以后，主持各种会议，处理常务事务。

午后 1 时半进午餐。午餐后午休。下午 3 时，接见宾客或出席会议，讨论军事计划、政事，以及改革方案等。此外每天要看一些重要的报刊，有空闲时还练习书法。

下午 6 时后，蒋即携夫人乘车出巡，或者悠闲散步。当他乘车通过街市时，随时察看市民、士兵、警察的精神状态。如见市容不洁，街道。城市需要改进处，或警察精神涣散等缺点时，就马上召见当地市长，进行批评。

晚 7 时半进晚餐。晚餐时，常常召请高级官员和政府行政官员共同进餐。在这时，他就边吃边讨论当前的各项问题。晚饭后，继续批阅公文、电报、或审阅各种有关书籍。

晚 11 时就寝。

在重庆每逢空袭时，蒋和夫人一同钻防空洞。有时，轰炸之后，他让侍卫人员站在一边，自己在废墟前，来回徘徊很长时间。

夫人宋美龄热心于慈善事业，常于轰炸后，奔走救济孤儿或难民。

抗战以来，蒋身体瘦削，看上去很显老，但他的体质很好。在这方面，宋美龄对他的关心照顾起了主要作用。蒋身高一米七左右，并不魁梧，抗战以来又越加细瘦了，但体形结实挺拔，具有果决、刚毅的军人气质。

他的个人办事机构，是侍从室。特从室从 1932 年于南昌行营时创办，编制归行营，这是杨永泰的建议。侍从室主任为晏道刚。

1935 年 10 月，撤销南昌行营。

1936 年 1 月，正式将恃从室改组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成立两个处。侍一处主任为钱大钧，二处主任为陈布雷，侍一处为三个组，任总务、参谋、警卫。侍二处两个组，即第四、五组。四组主管政治、党务，五组是侍从秘书组。另设侍卫长，第一任侍卫长为钱大钧，直接指挥第三组。第三组又由警卫股、特务股和警卫大队组成，警卫大队有三个步兵连，一个骑兵连、一个机炮连组成。大队长为楼秉国。警卫大队又选出一个连的士兵编成卫士队驻守蒋的官邸，是其亲兵。蒋单独出发时，如不长期驻于某地，只带几个警卫随行。

1938 年又增编第六组，主管情报业务。唐纵任组长。属一、二处双重领

---

[1] 此系冷欣亲口对庞敬塘所言。

导。抗战期间，又成立机要组，由毛庆祥兼任组长，其成员必须最为可靠，专门处理蒋介石的来往电报，1938 年第五组又主管高级干部的储备、考核、挑选、任用。1939 年经陈果夫建议，又成立恃从室第三处，专管人事调查、登记、考核、业务，由陈任主任。第三处又成立七、八、九三个组，分理业务。

蒋的恃从室，实际是蒋的“军机处”，操纵军政实权。蒋通过侍从室指挥中央各机构和地方机构。

1945 年 11 月底，由于美国政府的压力，蒋将侍从室三个处全部撤销，以示政治改革。

抗战中中国的损失

整个抗战包括 22 次大会战，重要战斗 1117 次，小战斗 38931 次。我伤亡官兵 3215600 余人，阵亡 1328500 余人，失踪 130126 人，非战斗人员伤亡 842 万人以上，总计中国人民之死伤者在 21204974 人以上，流离失所者为：亿以上（东北、台湾尚不在内）[①]。

日军伤亡约为 2418528 人。

中国财产损失：以 1937 年的美元币值计算，共损失 313.30136 亿美元。当时日本每年收人为 7.7 亿多美元，如果日本对此负赔偿责任需要近半个世纪才能还清。[②]

1951 年，美英等 48 国；日金山关于对日和约会议中，讨论有关日本赔款问题时，蒋介石未要求日本赔偿侵略造成的损失。但亦未明文放弃赔款要求。当时主要是出于对苏联的堤防，欲使日本迅速恢复，以抵制苏联。

197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建交时，也未要求赔款。

[①] 最近，大陆又有新的统计：死伤为三千万人。此从旧的统计数字。

[②] 以上数字，参考南京国民政府军令部、史政局档案和何应钦著《八年抗战之经过》、《八年抗战台湾光复》两书。此损失数字系直接财产损失，不包括间接财产损失与生命损失。如加上军费和全国公私财产及其他有关损失，则总计为（当时）559·62244000 美元。但仍不包括生命损失（见明报 1994 年 8 月号统计）。

第四章　发动会面内战

誓雪“新耻”

抗日战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新的不平等条款和被迫承认外蒙独立，以及波茨坦会议被拒之门外，都给抗战胜利后春风得意的蒋介石投下了不快的阴影。最关键的是“国耻”虽雪，但共产党也在抗战中日见壮大，尤其令蒋寝食难安，耿耿于怀，并引以为“新耻”。

关于“新耻”，蒋在 1945 年 9 月 2 日的日记中写道：“但旧耻虽雪，而新耻重重，不知此耻何日可以复雪矣！今后之雪耻，乃雪新耻也。特志之。”继而又在 9 月 9 日日记中感慨道：“呜呼！抗战虽胜，而革命并未成功；第三国际政策未败，共匪未清，则革命不能曰成也。勉乎哉。”“党国之危机，九·一八以来，未有甚于今日者也。”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热望和平建国，恢复元气，振兴中华，而蒋为逞专制统一中国的一己之私，不惜于抗战废墟上，再燃内战之火，民心之向背由此不言而自明。为了增强内战实力，蒋在抗战胜利之初即大量收编伪军。

收编伪军

抗战时期，全部伪军有汪伪政府伪军和伪满、伪蒙、伪华北自治委员会等四大系统。

汪伪军大约有 7 个集团军：第一集团军，由伪苏浙皖绥靖主任兼海军部长任道援兼任总司令，有 7 个师和一个旅。为汪之最大集团军。

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为张岚锋，约有 5 个师，为冯玉祥旧部·驻河南省商丘地区。

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为孙良诚，兵力为 5 个师，亦为冯玉祥旧部，先驻豫东地区，后驻苏北地区。

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为吴化文，亦冯玉祥旧部，系韩复榘部下手枪旅长。1944 年投降，兵力为 5 个师，驻蚌埠地区。

第五集团军，总司令为庞炳勋，约有之个师和一些直属部队·驻开封、新乡地区，亦冯玉祥旧部。

第六集团军，总司令为郝鹏举，实有 3 个师，驻陇海线东段徐海地区；原为冯玉祥旧部，后投胡宗南。

第七集团军，总司令为孙殿英，兵力号称 5 个师，驻新乡地区；亦曾隶属冯玉祥西北军。

另有伪十二军（项致庄）、十一军（荣子恒、富双英）、广州绥靖部队（主任陈耀祖，系陈壁君之兄）5 个师、武汉绥靖部队（主任叶蓬两个师）、警卫师（三个）。海、空军几近于零。共 15 个军 52 个师，28.2 万余人。

伪蒙军：原有 9 个师，1945 年 9 月后，只余李守信一部，分驻陶林和大同，约 3 个师。

伪华北自治委员会军，有齐曼元统率之 13 个集团。每个集团等于一个旅，分驻北平、保定、南口、石家庄等地。共 5·5 万余人。伪满军共有 11 个军管区和 5 个特种部队，数字不详。

据冈村宁次报告，合计伪军 35 万余人，枪 21 万余支。但据何应钦陆军

总部统计，伪军共 24 个军、64 个师、又 13 个旅，及其他大小单位 134 个，共计 683569 人，枪为 357254 支。比冈村所报多出 30 余万人。但各地实际收编数则与冈村所报相近，所以冈村所报比较真实。

蒋介石对这些伪军，全部收编。1945 年 8 月 10 日.蒋即对所有伪军下令：“日本政府于 10 日晚 8 时，已向中、美、英、苏四国声明投降，我沦陷区各地下军及各地伪军，应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各伪军尤应乘机赎罪，努力自新，非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移动驻地；并不得受非经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仰各凛遵为要。……”[①]

既然命其驻守原地，就是否收编问题，蒋召集何应钦、白崇禧和陈诚进行了讨论。其中何、白均主张收编；陈诚则坚决反对收编。双方争论不休，至为激烈。陈认为：“如把伪军编成正式部队，不仅妨害国军的整编，且混淆了国军的血液，千万不能办。”

何、白则认为：“我们既要伪军坚守阵地，防拒共军，又要解散他们，这怎么行得通，势必激成变乱，万一出了乱子，谁负责？”平时，陈诚和何、白争论，蒋介石多是袒陈而薄白、何，荐这次却完全同意何应钦、白崇禧之意见，赞成收编伪军，以为进攻中共，大打内战之用。

但公开收编伪军，舆论上总是不好，蒋便以半隐密。半公开方式进行。下达的收编正式文电是蒋之径电和政务哿电，其中明言由陆军部“统筹办理”。又以有、谋两电规定处理伪军原则。规定“解散或缩小组织”。这两原则均是假话，而实际既不解散也不缩小，而是收编。

随后军委会致电陆军部，令其对伪军进行缩编。原文如下：“……军事委员会议规定，各地自新军及游杂部队，以缩编为原则，交由陆军总部及各绥署。战区负责，按照实际情形，与国军改编之同时缩编完竣……”。何应钦怕留下痕迹，决定陆军总部不直接向伪军发文，而由各绥署、战区转令伪军遵办。陈诚也令军政部不给收编伪军军师番号，一个军，就给纵队名义；一个师给总队名义；并于纵队、总队之前冠以暂编二字。同时陈诚又命人事机关把伪军收编的纵队、总队军官案卷不与国军军官人事案卷放在一起，另存一处，以示区别。但内战开始后，这些纵队、总队便很快收编成正式“国军”了。

具体负责收编工作的是北平行辕、东北行辕。第二战区、郑州绥靖公署，徐州绥靖公署，共 5 个单位。至 1946 年 4 月，除郝鹏举 3 个师投降解放军和孙良诚 3 个师在盐城被解放军歼灭，李守信 3 个师解除武装外，全部伪军收编完毕。

任道援第一集团军交给了戴笠。汪之 3 个警卫师被编并到蒋之嫡系军七十四军。

北平行营：暂编第一路，辖两个纵队。司令为门致中。暂编独立第二总队（李守信）、暂编独立第四团（宋万里）、暂编独立第三总队（侯如塘）、暂编独立第十四总队（王英）。

徐州绥署：暂编第七纵队，司令吴化文；暂编第五纵队，司令孙良诚；暂编独立第五纵队，司令秦汉清；暂编独立第六总队（王占林）、暂编独立第一团（张逸舟）、暂编独立第十二总队（王继祥）、暂编独立第三团（陶景奎）。

[①] 《文史资料选辑》，三十六。

东北行辕：东北暂编保安第一总队（王景南、王铁蠢）、东北暂编保安第二总队（刘德溥）、东北暂编保安第三总队（王家善）。1946 年 10 月以后，杜幸明又于东北收编许多伪保安团，不在此内。

第二战区：暂编独立第八总队（赵端）、暂编独立第九总队（杨诚）、暂编独立第十总队（荆宜）。

郑州绥署：暂编第四纵队，司令为张岚峰；暂编独立第一总队（关振亚）。

以上大约总计为 6 个纵队（军）、27 个总队（师）、73 个团。

人数为 238996 人；枪支 124472 支。[①]

国共谈判

关于国共谈判问题，为什么要由美国人来处理，国内外炎黄子孙均有疑问。《解放日报》在 1946 年 11 月 8 日，发表了一位南洋侨胞来信的述评，其中特别转述了这个疑问：“中国的内政问题，怕自己不能解决吗？为什么要请美国人来处理？”

1944 年 8 月，帕特里克·赫尔利以罗斯福总统特使身份来华。这位前胡佛总统之陆军部长，来华前先经莫斯科，得苏联不支持中共而支持蒋介石的允诺后，9 月 6 日到达重庆。按罗斯福的意志，着手全力支持蒋介石。罗斯福促使斯大林不支持中共的办法，是答应苏联对旅顺。大连港口和长春铁路的特殊权益，因为罗斯福知道，斯大林有民族利己主义，并不愿意中国成为共产主义大国，与苏联“争雄”，只要使斯大林有东北特权在手，就可以达成目的。[②]并且斯大林一直支持王明左倾主义者，而毛泽东等执政后，就清算了王明路线，故中共中央和斯大林是有分歧的。因此，斯大林对延安并没有什么援助。相反在抗战初期主要是援助蒋介石。这是历史事实。

同年，最早到达延安的美国人是一批新闻记者。他们首先冲破蒋对延安的封锁，和中共接触。蒋怕得罪记者们于己不利，便于 3 月批准放行。7 月中旬至 10 月间，代表美国苦干个报刊的六七名记者先后到了延安。报道最有力量的记者是哈里森·福尔曼、冈瑟·斯但、布鲁克斯、阿特金森、白修德等人。他们的共同结论是中共在延安为中心的辖区，是受民众拥护的，也是抗日的，并止进行游击战争。对此，国民党人大为慌乱，蒋立即关闭了这一度稍开的新闻窗口，再也不许外国记者访问延安了。

同年夏，罗斯福因蒋的对日战事一再败北，加之开罗会议上罗又对蒋介石有所不满，于是试图将国共双方结合于一个联合政府中，遂于 6 月由亨利·华莱士来重庆正式告诉蒋介石允许美国派一个代表团到延安会见中共领导人。华莱士说，一个代表团可以减少美国完全依靠国民党的程度。他并且认为中共或者可以把中国变成美国的一个有生命力的盟友。为此，华莱士认为华盛顿应迅速援助中国任何一个真心抗日并愿与美国合作的集团。

由于罗斯福的压力，蒋只得同意派一个小型美国代表团到延安。这个代表团经常在十几人到二十几人之间变动。此外还有使馆政治官员，战略情报局特工人员等。团长为鲍瑞德。这时中共已经完全独立行事，“苏派”已经

[①] 主要参考《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六辑：《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收编伪军经过》（刘措宜）之承办回忆录文章。

[②] 原见丹尼尔·耶金：《遭到破坏的和平》。转引《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 179 页。

不起作用。这个代表团中有中共的好朋友谢伟思。他在延安可以和任何人交谈，上至毛泽东，下至一个普通党员。据谢的了解，延安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表达同一的思想：“希望在击败日本和建设新中国的斗争中和美国合作。”[1]当然也愿和蒋介石合作，但必须是分享政权的合作。

同年 8 月 23 日，毛泽东亲自对谢伟思说：日本的战败，将使国民党重新走上内战的道路；并断然指出国民党是一个分裂成许多派系，勾心斗角，乱七八糟的组织，这些派系都是反共反民主的。能否制止内战，要看美国能否约束国民党。毛泽东同时表示国共和解的主要条件，是召开各党派参加的临时国民大会，从而改组政府，制定新宪法和法律。他希望美国不要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他说：“蒋是顽固的，可是他基本上是个匪徒。必须懂得这个事实，才好跟他打交道。我们根据经验，不得不认识到这一点。……在他的威胁和恐吓面前，你们决不应当让步。不要让他认为你们害怕了，这样他就会得寸进尺，榨取更多的好处。”[1]他要美国吩咐蒋介石做他应该做的事。同时毛泽东对谢伟思表示，中共并不指望俄国人帮助。也不希望苏联反对美国在建设性和民主性的方针下的在华利益。他说：“美国不必担心我们不肯合作。我们一定合作，我们必须得到美国的帮助。所以我们共产党人认为十分重要的是，要了解你们美国人在想些什么，有什么打算，我们不能贸然反对你们——不能贸然和你们发生冲突。”[2]谢伟思认为毛夸大了中共和美国的长期目标的一致性，但他认为毛泽东愿与美国合作“是真诚的”。[3]因为毛和苏联归来的王明等无法合作，深愿和美国友好。

但罗斯福，只是要了解中共情况，促成国共两派联合，并没有打算单方面或直接援助中共。罗要依靠蒋抵制苏联的政策一直未变，而不打算依靠中共抵制苏联。这是问题的关键。

但谢伟思则已看清中共和农民的关系深厚，以及中共未来的强大力量。他认为美国援助中共，可以“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政策和目标，而这对美国人来说，是有长期的重大关系的。”[4]谢伟思所以如此强调援助中共，是因为对国民政府的腐败失去信心．而中共则深得民心。

但此前，美国战略情报局已开始和中共军人讨论双方互相援助的问题。8 月 31 日，蒋召见高斯大使，抱怨美国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支持中共党人。高斯则希望蒋应从中吸取教训。9 月 25 日，朱德宣称，赞成以美国指挥官指挥全部中共军队。朱并提醒谢伟思要注意戴笠和美国驻海军小组正在策划破坏美国驻延安代表团（迪克西使团）的工作。[1]谢伟思报道以上消息的同时，仍坚持呼吁美国在政治、军事上援助延安，并认为这种援助可以制止中国内战。同时也可以防止中共倒向俄国。他希望一个新中国的政府由中共掌握实权，并获得相应的援助。

毛泽东也对鲍瑞德上校谈了以上相同的观点，劝美国从其自身利益出发，不应尽力维持蒋介石一家，这样会助长内战。而国民党在内战中，多半

---

[1] 《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 183 页。

[1]

[2] 谢伟思的第十五篇报道，1944 年 8 月 27 日。见《美亚文件》第一卷，第 786 ～797 页。

[3] 《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 185 页。

[4] 谢伟思的第十六篇报道，1944 年 8 月 29 日。见《美亚文件》第一卷。

[1] 谢伟思的第三十二篇报道，1944 年 9 月 25 日。见《美亚文件》第一卷，第 899～904 页。

要失败的，而这当然也是美国人的失败。同年（1944 年）10 月 23 日，中共代表林伯渠。董必武于重庆会见了赫尔利，要求赫帮助中国建一个真正的政治联盟作为中国联合政府。同时成立由中共参加的“联合最高指挥部”，统一指挥全国军队。美援应当国共平均分配。但赫尔利对此根本不予考虑。他仍然要将中共置于蒋的控制之下，对此，蒋介石愿意推迟内战，但条件是中共交出独立的武装力量。这等于解除中共武装，中共当然不会答应。

同时，戴维斯也认为美国应当支持中共，他也是想将中共拉人美国势力范围，而不被苏联拉走。他说：“毛泽东曾向谢伟思强调指出，他要美国帮助将来的共产主义中国实现工业化。”[②]他认为中共愿与美国合作，十分真诚；又认为中共是个灵活而可靠的政治派别，准备在许多方面与美国合作。他还认为，援助中共，是在东亚保持对美国友好的均势问题。而且中国内战也是不可避免的，而胜利者几乎必是中共。如果美国一心支持蒋介石，将迫使中共倾向苏联，而苏联就会控制中国，因此戴维斯强烈要求赫尔利访问延安。

1944 年 11 月 7 日，赫终于乘飞机到延安访问。周恩来前来迎接，随后毛泽东也到了机场。赫尔利下飞机时，忽然心血来潮，突然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厮杀呐喊声。因此，后来毛泽东说赫尔利是个“小丑”。

11 月 8 日，赫和毛泽东、周恩来会谈；罗斯福第四次当选为总统。赫声称蒋介石愿意派一个美国代表团到延安，调解双方和促进民主，但要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而毛泽东则提出任何团结统一建议，必然包括由中共真正分享军事、政治权力和美援。为此赫尔利又心生一计，提出五点建议，主要是建立一个联合的国民政府，并由此政府平均分配美援；联合政府将坚持类似美国宪法的原则。

对此种建议的慷慨性，毛泽东感到吃惊，便马上追问此建议来自何处？赫不得不答称来自他自己。但他说，他相信蒋介石是会接受的。于是由毛和赫尔利双方签字。赫以此要求毛派代表到重庆谈判。不久，周恩来到重庆和国民党谈判。戴维斯则断定谈判绝不会成功，他知道蒋不会同意。戴又一次要求美国支持中共，并宣称，支持中共即是“使我们自己同中国最团结、最进步、最强大的势力站在一起。”[①]

延安谈判之后，中共对赫尔利也不放心，就又托美国财政部代表欧文·弗里德曼带一封信。欧文回国后转交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这封信由周恩来写成，内容主要是对国民党不改革政治感到失望，希望美国直接援助延安，并邀摩根索访问延安。

赫尔利自延安返回重庆后，知道蒋介石和宋子文对五点建议十分恼火。同时知道罗斯福已正式任命他为驻华大使。

11 月 21 日，蒋对五点建议的答复是三点建议，其中心内容，是中共交出军队，就给予政治代表权，仍是老调不变。而赫尔利和魏德迈又说这三点建议有积极因素，完全支持蒋介石。周恩来不为所动，便终止了谈判。

12 月 8 日返延安。鲍瑞德奉命陪周同行。

毛泽东对此极为愤慨，他指责美国为什·么又提五点建议，又同意蒋的三点建议，并说延安不是傻瓜，也不是篮子，要靠人施舍。如果不能联合，中共就建立另一个中国政府，又对鲍瑞德说，如果美国不援助，还可以转向

[②] 戴维斯：《靠尾巴支撑身体的龙》，第 342～351 页。

[①] 戴维斯为赫尔利写的备忘录，1944 年 11 月 15 日。

英国和苏联嘛！但毛泽东仍建议和美国进行军事合作，甚至军队也可以接受美国节制[①]，同时毛泽东表示要公布五点建议，让大家看一下被蒋拒绝的赫一毛五点建议内容。鲍瑞德于 12 月 9 日带着毛泽东的口信回重庆告知赫尔利后，赫尔利非常窘迫，他大叫：“妈呀！……他哄骗了我！”但毛并没有公布五点建议，只是威胁一下赫尔利。而赫尔利却从此转向，不顾一切地、完全地支持蒋介石，而不支持中共。美国决策人也只考虑他们与蒋合作，共同支持蒋介石，而削弱中共势力。美国人这种政策从 1944 年 12 月一直坚持到 1947 年。

中共也不再理论蒋的三点建议，转向一心和美国军人进行军事合作的方面。在这方面鲍瑞德和罗伯特·麦克鲁尔、罗伊克罗姆、威利斯·伯德等一心想在军事上支持中共。

1944 年 12 月 15 日，鲍瑞德和伯德飞到延安，两人各带一个与中共军事合作的方案，鲍的方案是美国派遣四五千名美国突击队员到中共地区。伯德则和中共讨论了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方案，向 2.5 万名中共官员提供军援；并建立联合情报网。这使中共有了新的希望，他们告诉伯德：“华北人民把美国看作他们最好的朋友，把魏德迈将军当作总司令看待，如果他们决定向他们下命令，他们是会服从的。”[②]

此次戴维斯也同行到延安。因此，中共再一次拒绝赫尔利提出的重庆谈判，但答应暂不公布五点建议。

当 12 月 17 日戴维斯返重庆后，赫尔利认为戴帮助拆他的台，命令戴笠即赴莫斯科美国驻华使馆工作。戴给史迪威写了一封信，批评赫尔利根本忽视中共的巨大力量。

12 月 27 日，鲍瑞德带着补充的应急计划再回延安时，中共更增加了战胜赫尔利的信心，次日便由周恩来向赫尔利发了一封强硬的信，指出除非撤消对延安的封锁，释放政治犯，停止镇压持不同政见者，接受五点建议，中共才能和国民党重新谈判，否则，决不与重庆谈判。

1945 年 1 月 9 日，中共交给迪克西使团代理罗伊·克罗姆少校一封信，请他通过军事渠道转给罗斯福，希望派出一个非官方小组到美国对美国平民、官员讲述中国的复杂内部问题。如果罗斯福同意，毛泽东、周恩来打算赴美访问，以冲出蒋介石和赫尔利的封锁，直接和罗斯福、美国人民建立关系。

以上这些活动，没有告知赫尔利，消息传开后，就引起了一个巨大的风波。魏德迈知道了迪克西使团和美国战略情报局自行其事，12 月 29 日宣称要控制战略情报局的一切秘密活动和情报。

因此，一切军事合作问题，均未能实现。美国驻华海军小组，则添油加醋地告诉赫尔利，使团和战略情报局在秘密地搞对中共军援计划，使赫尔利在总统面前威信扫地。赫尔利认为这是“中共——美国阴谋”，矛头对着蒋介石和赫尔利，于是赶快于 1 月 14 日向罗斯福发电报，提醒罗斯福，在中国有一个破坏总统政策的阴谋，有一些不忠诚的美国人已在促使毛泽东。周恩来相信可以拒绝与国民党合作，谋求直接得到华盛顿的承认和支援。赫建议罗斯福拒绝会见中共代表，并设法在雅尔塔会议上，赢得苏联对蒋介石的支

[①] 鲍瑞德致魏德迈函，1944 年 12 月 10 日。

[②] 威利斯·伯德上校致麦克鲁尔文电，1945 年 1 月 24 日。

持，从而把中共强迫到谈判桌上来。但赫要罗对他的这些话保密。罗斯福同意赫尔利意见，并对“中共——美国阴谋”十分恼火。接着罗斯福清洗了所有他认为“不忠诚”的美国人，将鲍瑞德、麦克鲁尔等调离职位。1月中旬，新的使团团长换成了莫里斯·帕德斯上校。他带着赫尔利的信件到延安上任。信中说，中共只有对蒋介石妥协并为蒋接受后，才能得到美援和支持。为此，中共必须再次回到重庆的谈判桌上。这一次斗争中共未实现原设想。

1945年1月22日，毛泽东传话给赫尔利，周思来将前往重庆谈判。1月23日，朱德经由美军官艾芬士上尉，向魏德迈申请2000万美元贷款，用作对日作战经费。赫尔利得知后，立即予以阻止。

赫尔利于2月17日，给国务卿斯退丁纽斯电报说：“我坚定地认为，……批准朱德将军获得租借物资和财政援助的要求，都将破坏美国的既定政策。这个政策是防止国民政府崩溃，支持蒋介石为政府委员长和军队统帅。”[①]

此后魏德迈指示部属们，没有蒋介石的同意，军援不得拨发给任何部队和政党。赫尔利也对他的大使馆人员进行训话，不得与中共有任何“勾搭”。

其实谈判只是蒋、赫二人要中共自愿交出军队、地盘，只给个无实权的空头的政治职位，如果中共不愿自动交出，蒋就以武力消灭中共军队，手法不同，目的则一。谈判时，周恩来坚决以五点建议为基础组织联合政府。但蒋则坚持要中共交出军队，然后给几个无权的政治职位。谈判于是破裂。3月1日谈判结束。

11日，蒋又声言召开“国民大会”。中共则要求召开由各党派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与此同时，赫尔利则进一步表示支持蒋介石。蒋也恭维赫尔利拯救了整个亚洲。赫尔利则说：“等到对日战争结束，你那些装备精良的师团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战胜共军了。”[②]

很显然，罗斯福是要中共俯首听命于蒋介石，无军队、大地盘，实质上等于瓦解；或者，支持蒋介石消灭中共。而他则从外部促使苏联不支持中共，以促成以上两种中的任何一种结局。赫尔利则从内部帮助蒋介石，压服或消灭中共，从而以蒋介石政权对抗苏联。[①]

当然，罗斯福和赫尔利的这一赌注，以后是完全输光了。

当时雅尔塔会议，既牺牲了蒋氏坚持的主权，更牺牲了中共。

斯大林当时只是要东北特权，而置中共于不顾，并欣然同意蒋之中国政府留在美国阵营中。斯大林还表示，即使中国出现联合政府，也最好由蒋介石统治。[②]

雅尔塔会议结束后，赫尔利和魏德迈回华盛顿述职。蒋介石请赫尔利转告罗斯福两点：一，国民党决心召开国民大会。二，苏联现不会承认中共或接济中共，请罗斯福放心地支持他的政权。这意思是，要罗斯福不必顾忌苏联，而一心支持他消灭中共军队。

此时美国驻华使馆人员联名于2月28日，给国务卿发了一份电报，指责赫尔利损害了中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任何机会。并特别申明，避免中国内战的唯一希望，在于美国和中共的合作，并迫使蒋和中共分享权力。其中爱德华

[①] 《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1945年第七卷，远东中国，1969年版第220页。

[②] 赫尔利和蒋介石谈话备忘录，1945年2月16日。

[①] 《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208～209页。

[②] 罗斯福—斯大林谈话记录，1945年2月8日。

曾给财长摩根索和怀特的信中特别指出中国的前途“不应让赫尔利这种成事不足败享有余的家伙去决定”。[③]

美国战略情报局在华军官小组也对多诺万将军说，赫尔利破坏了中国争取和平的几乎任何机会；并把美国和国民党完全联在一起了。此时，中共也仍然想争取和美国当局对话，要求派代表参加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参加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和美国政府中的同情者继续接触。并要求美总统罗斯福让周恩来参加代表团。但罗斯福却又接受赫尔利意见，拒绝了中共的这个要求，虽促使蒋介石允许中共派代表参加，但却不允许周参加代表团，而是挑选了不请英语的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参加联合国大会。这是蒋和美国罗斯福耍的一个花招，中共只得忍受。同年 3 月，蒋介石重申中共必须交出军队，否则不予合法地位。

这时，毛泽东特别对谢伟思指出，赫尔利在干涉中国内政。3 月 4 日赫尔利回到美国，到国务院述职，看到美驻华使馆人员的控告信后，他大声吼叫，骂谢伟思为婊子养的；并逢人便讲这些使馆人员对他和总统都不忠诚，决定将他们撤职。同年 4 月 1 日，因谢伟思应召返国，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为谢举行盛大欢送会。在会上，毛向谢表示：不管中共是否得到美国一枪一弹，都将抗击日本和帮助美国军队；抗战胜利后，美国人应避免与中共发生冲突；美国人必须了解，中共不会承认蒋介石的“国民大会”。如果蒋一意孤行，中共将在解放区成立自己的民族统一阵线。4 月 4 日谢离延安，5 月 5 日，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二陈（陈果失、陈立夫）派系代表，联名提出“修改党章草案”，要求把党的总裁定为终身制，说领袖被选，殊非尊重之道。但是未被通过。邹鲁首先反对，他说：“总裁终身制，即等于君主专制”。孙科则说“现在是什么时代，是民主时代。

因此党章也要反映民主的精神”。还有不少人都反对总裁终身制。

这次蒋氏丢尽了面子，便在大会发言中发牢骚：“我的二三百万精锐的军队，力量足以消灭中共军队。我们的法市有十万万美金作准备，财政物价都不成问题。我所担心的倒是这个党！我和汪精卫不同！汪在武汉时只想当主席，而我则愿意当总裁。当总裁的任务，一为打日本，一为消灭中共！如此任务完成后我仍当总裁，则我不是人！”又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①]

在会上戴季陶又竟然指出：“总裁交众议，大家应无保留地通过。”当场代表们就大哗起来，提出反问：“既交众议，何不能讨论？”。结果该议案还是修改通过。5 月 19 日，蒋欢宴各代表，但到会代表不足三分之一。蒋气得竟然说出“要清查不到者的名单，予以相当处罚”。在这次大会上，蒋处境相当难堪，语无伦次，把肺腑之言都挤出来了！因而甚至他的黄埔弟子们也不得不难为情他说：“我们真想不到，领袖讲话如此缺少分寸。”

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反共问题。其公开决议为：团结御侮，实施宪政，还政于民；对内则有《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主要反对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反对抗战两线论和中共具体纲领、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等，要肃军、肃政。蒋介石在政治报告中指出，对中共，“在某一定情况下，我们必须消灭之”。

[③] 爱德华致怀特函，1945 年 2 月 25 日，见《摩根索日记》第二卷，第 1419～1420 页。

[①] 《蒋家王朝》，第 243 页。

民主和抗日问题，大会也展开了争论。国民党中进步人士提出《加强民主设施促成国家统一案》，反对内战。并要求在国民大会召开前，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同时散发《国民党民主同志联合会向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建议书》，主张实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加强抗日力量，严惩贪官污吏。王昆仑质问大会为什么不讨论抗日问题？方先觉投敌为什么又成了民族英雄？盛世才为何不惩办？当时甚至有人大呼要把盛世才拖出去枪决！蒋为此亲自大声斥责王昆仑，说王是中共代表。对盛、方均予称赞。他说盛世才把新疆归还中央，又带回 50 万两黄金，功在党国。对蒋的一系列失态表现，李宗仁、白崇禧均极不满，表示他们和 30 位代表愿作王昆仑后盾。陈诚也觉得蒋的话太过火。冯玉祥、孙科等，当然也对蒋表示不满，有人写信给蒋介石，说“假如不改变作风，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这恐是最后一次了”。蒋见此情景，只得承认自己说话失态，请大家不要在意！同时由张治中、黄少谷出面，将王昆仑请回大会，表示蒋的歉意。毫无疑问，这是蒋向王昆仑道歉。

六届大会规定，国民党党员要“誓以至诚，服从总裁命令”。

6 月 6 日，美国联邦调查局以“间谍罪”逮捕了美亚杂志主编任杰菲等 6 人。谢伟思亦在 6 人之中。从此开始，局势急转直下，形成单方面支持蒋介石的美国政潮，谁也不再敢反对赫尔利的意见了。所谓间谍罪，主要罪证是将国民党的中国陆军序列变更表和空军改组表于美亚杂志社中搜出。蒋介石对此极为高兴，他于 6 月 8 日日记中写道：“此六人逮捕以后，美国对华政策乃可渐次明朗，其阻碍亦可逐渐扫除乎？而其对俄政策之坚强，亦可于此窥见矣。”

这时，美国驻华海军小组负责人梅乐斯和魏德迈、赫尔利三人均认为：“只要向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提供数量较小的援助，共产党在中国的叛乱就可以镇压下去。”[①]美国国务院，则从此完全信赖赫尔利等在华三巨头。此后国会更完全站到支持蒋介石，反对中共的一边。谢伟思等倾向于中共的低级军官，也已被调开，无法参与此事。以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为代表的美国人，均大声疾呼地声称蒋介石己完全依靠美国，美国必须支持蒋介石，“不让任何一个外国利用中国四亿人民为其侵略计划服务，”[②]

罗斯福就更加坚定地、一心地支持蒋介石政权了。4 月 2 日，赫尔利在华盛顿的记者招待会上，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声言中共从未要求美国给予军事援助，或者政治上的承认。然后又说蒋介石并无拒绝中共参加联合政府，一切都是中共不好，说中共是分裂主义者，像北洋军阀等派系一样。虽然《新华日报》对赫尔利谬论进行了批驳，但已无法影响美国国会和美国公众舆论。

4 月中旬，罗斯福去世。4 月 24 日，赫尔利返回中国，在重庆曾家岩，蒋氏接见了赫尔利并听取其关于莫斯科方面的报告。该报告说明斯大林要蒋在政治上对中共让步，以求得军令的统一，即使在军事上，吃掉中共军队，斯大林仍然不援助中共，而支持蒋介石的统治。斯大林甚至怀疑中共是否有能力治理中国。斯大林还说国民政府某些官员虽然贪污腐化，但蒋仍是“大公无私的”，“是一个爱国者”。赫尔利并对杜鲁门报告说：“斯大林无条件地同意美国对华政策。”[①]

[①] 魏德迈致陆军部函，1945 年 3 月 9 日。

[②] 杜勒斯致亨利·卢斯函，1945 年 1 月 29 日。

[①] 赫尔利和斯大林会谈备忘录（赫尔利写），1945 年 4 月 17 日，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七卷，第

中共对美国政府，此时更失去希望；而苏联也不予以支持。4 月 23 日中共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6 月 11 日，毛泽东在七大会议上发表《愚公移山》讲话，正式和美国政府决裂，表明决不允许美国政府扶蒋反共。他说：“昨大有两个美国人要回美国去，我对他们讲了，美国政府要破坏我们，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同时指出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目的是“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这时，在日寇投降前夕，国共内战已经表现出不可避免的趋势。

与此同时，美国财长摩根索，也从原来反对支持国民党转向支持国民党，不再把国民党领导人看作无赖，反而认为国民党领导人是一些爱国者了。于是立即同意把中国的黄金储备，运回中国，并运来中国 4000 辆卡车、4500 万码棉布。

但是，美国政府不相信苏联永远不支持中共，怕中共和苏联终于相结合而反美。这是全部问题的关键。

1945 年 7 月，原“迪克西使团”正式改名为延安观察小组。其成员均被美国政府警告，连礼物也不许送给中共党人。而美国海军小组，在 1942 年以来，就在秘密训练一支反共游击队，帮助蒋氏准备内战。

1943 年 4 月 15 日，成立中美合作所，梅乐斯和戴笠正式合作；到 1945 年 8 月，已训练了 10 个游击队训练营。队员约万余人。共 2500—3000 名美国人在中美合作所工作。并训练了 500 多名特务，以最新科技予以武装。

日本投降后，梅乐斯进一步指使在“游击队”中工作的美国人参加抢占接收区、港口。尽管魏德迈怕美国人卷人中国内战，下令禁止这种行动，梅乐斯却拒不执行，仍秘密地大干。这种行动使梅乐斯受到蒋介石的称赞，说他勤劳、正直，富于献身精神，作出了出色的成就。但魏德迈因梅乐斯不服从命令，最后将他调离中国。蒋介石对此很不高兴，1946 年 3 月 17 日戴笠摔死，梅乐斯便再无缘重返中国了。

苏联此时仍然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8 月 8 日苏军出兵东北，苏方并未通知中共；以后的中苏条约之签订，也未通知中共。苏联显然并未打算支持中国共产党。中共此时，处境甚为艰难。当然希望合理、平等的联合，不愿内战，但也不怕内战，并做好了应变准备。8 月 13 日，毛泽东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报告，指出蒋介石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

并指出蒋要下山摘桃子了。8 月 15 日，杜鲁门发布了一号通令，其中有蒋介石为唯一享有在中国受降权利的人。根据此令，中共便无权受降。这当然是中共所不能容忍和遵守的。毛泽东等立即发表讲话，谴责美国政府，并宣布参加受降，决定以武力反抗美国强权与干涉。而美国于 8 月中旬日寇投降时，也批准了美国以海、空军运输国民党军往华北、东北等战略地区以及由美国战斗师直接担任任务等计划，深怕中共军队接收这些地区和城市，这是明显的为内战做准备。

8 月 24 日《中苏友好条约》在延安公布。中共已知斯大林决心支持蒋介石。8 月 25 日，中共处死参与戴笠特务活动的美国人陆军上尉约翰·伯奇。同日，发表目前时局宣言，主要要求承认解放区和中共军队受降权利。

338～340 页。

8 月下旬，斯大林又致电延安，敦促中共继续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8 月 27 日，中共决定派毛泽东前往重庆谈判。但中共决不会放弃自己的武装和根据地，否则中共就元异自寻死路，达到蒋介石用战争没有达到的目的。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也绝不是斯大林电报的结果。因为战后和平，是全国人民大众的愿望。中共明知和谈无望，也必须以诚相待，以顺民意。蒋介石为把内战责任推给中国共产党，便于 8 月 14 日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谓：

“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却驾。”20 日又电曰：“特电再邀，务请惠诺。”22 日毛泽东复电云，为团结大计，特派周恩来同志赴渝商谈。23 日蒋再电毛泽东，务请亲临。

8 月 27 日，中共最后决定派毛泽东前往重庆谈判。

28 日，毛泽东飞抵重庆。周恩来、王若飞同行；张治中、赫尔利陪同。

同日正午，蒋与各院院长开会，讨论谈判问题，已经决定对军事不稍迁就，对政治司”以宽容的对策。这一天他的日记如下：

“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统一，不稍迁就。”29 日，蒋氏决定三项方针：

“一，不得于现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29 日日记）9 月 13 日，双方谈判开始。国民政府方面有张群（川省主席）、王世杰（外交部长）、张治中（军委会政治部长）、邵力子（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等 4 人。中共方面为周恩来、王若飞。10 月 10 日谈判结束。其间蒋约毛泽东面谈数次。第一次为 9 月 12 日，谈约半小时，在此次面谈中，毛泽东提出缩编本军为 28 个师。

17 日蒋邀毛和赫尔利见面照相，并谈话。10 月 9 日毛泽东访蒋；与蒋话别。两人约谈一小时。此次谈话，蒋再次重申要中共放弃军队和地盘观念，只在政治、经济上竞争。并说：“此为共党今后唯一之出路。”（10 月 9 日日记）10 月 10 日，蒋又访毛于桂园，表示送行，谈 10 分钟蒋即辞出。同日晚 9 时 40 分，蒋又见毛泽东，谈半小时。这天晚上，毛泽东提出延缓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1 日晨，蒋约毛泽东早餐，谈话中特别指出对解放区问题，不能再事迁就。他说：“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决不能再有迁就，否则不成其为国家。”（10 月 11 日日记）这是于签订纪要后，蒋再次要毛放弃军队和地盘。同篇日记中，蒋曰：“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再次表示了消灭中共的决心。

会谈末期，蒋为争取内战部署时间，作了些让步，不再坚持中共交出军队，而是缩编中共军队为 20 个师，中共则坚持 20—24 个师。10 月 10 日，签订会谈纪要，又叫“双十协定”，共 12 条：

一、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一致认为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避免内战，彻底实行三民主义。

二、关于政治民主化：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事。

三、关于国民大会问题：中共认为应重新选举。国民党认为只增加新代表就可以了。留待政协召开后解决。

四、关于人民自由问题：要保障人民自由（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

五、承认一切党派的合法地位。

六、关于特务机关问题：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特务机关）禁止拘捕和处罚人民。

七、原则上释放政治犯，又国民党主张先要中共开人名单。

八、关于地方自治问题：积极推动地方自治，实行自下而上之普选。

九、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中共坚持缩编为 24 个师；国民党坚持缩编为 20 个师。中共人员参加军委会，并建立三人小组整编部队。

十、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中共坚持维持现状，等政协会议召开后，监督各解放区实行民选省政府。国民党认为应由中央委任省政府。

十一、关于奸伪问题：中共提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政府认为应当按法办事，解散伪军宜慎重。

十二、关于受降问题：中共提出重划受降区，参加受降工作。

政府认为中共接受中央军政统一命令后，再考虑参加受降。[①]

蒋介石和毛泽东

蒋介石和毛泽东虽然都是出身于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但两人的道路殊不相同。1924 年春，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毛曾担任中国国民党候补中委，地位比蒋还高。但他们在广州见面不多，没有什么记载。蒋当时对毛的印象也不深，说他在会上发言不多，好谈农民问题。毛当时坚决支持北伐，和蒋的想法在这点上是一致的。但他是想于北伐中发动农民运动，而蒋则是要消灭北方军阀，统一中国。而毛的农民运动，又直接刺激了地主家庭出身的北伐军官们，使他们更坚决地反对农民运动。蒋就是依靠这些军官，同时在江浙财团支持下，发动了“四·一二”反共政变，开始了白色恐怖。而此种恐怖，又逼使毛组织农民暴动，走上了井冈山。

自 1930 年 12 月以后，蒋的“洋”军事学就和毛的“土”军事学——孙子兵法以及我国各朝的战略战术之精华开始了激烈的斗争。

1936 年 12 月 12 日，蒋介石于西安被囚，毛泽东得悉此消息后，甚为兴奋，有心借此机会杀蒋抗日。但 14 日，斯大林致电中共中央指示释放蒋介石，当时“毛气得满脸通红”，[②]最后出于抗日大局还是同意放蒋。可见蒋、毛之间裂痕之深，殊非一般，但不是一般的私人恩怨。

抗战刚刚胜利，蒋又“誓雪新耻”，决心于最短时期内消灭中共势力，打倒毛泽东。中共一日不灭，他一日不安。毛泽东则针锋相对，“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凭其在抗战中发展的百万大军实力，也早已准备好与蒋决战。

蒋与毛的再次相见，是在 1945 年 8 月 28 日。这一天，毛泽东应蒋氏之邀，来重庆谈判。当晚 8 时半，毛与周恩来、王若飞共赴蒋介石举办的欢迎晚宴。宴会上，蒋、毛二人相互致词并举杯互祝健康，气氛甚为愉快。这次会见，蒋身着笔挺军服，胸前挂满勋章，而毛则着一身极为朴素的制服，并无任何装饰品，只有脚下一双新皮鞋较为醒目。因此，有人说蒋为普鲁士式风度，而毛则为波西米亚式。两人均有信心要战胜对方，但蒋的信心似乎更

[①] 《解放日报》社论：《两个声明》，见《解放日报》1946 年 11 月 11 日。

[②] 《秘录》十，第 172 页；张国焘：《我的回忆》，三，第 1241 页。

大一些，宴毕，毛等留宿山洞林园。次日，蒋又会见毛泽东，进行了暂短晤谈。9 月 2 日，蒋再次与毛进行单独会谈，[1]内容主要是蒋于 8 月 29 日提出的三项方针：

“一、不得于现政府法统之外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批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统一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2]此三项方针的核心，就是解决军令、政令之“统一问题”，亦即中共必须绝对服从蒋氏的一切命令和领导。

4 日下午，蒋在军委会又与毛泽东单独会谈，主要内容为军队缩编数目和国民大会召开等问题。5 日晚 8 时，蒋介石夫妇举行茶会宴请苏联彼得罗夫大使，邀毛泽东作陪。

17 日，蒋又邀毛泽东与美国大使赫尔利共进午餐。美国《生活》杂志特为摄制三人合影。

10 月 9 日，毛泽东又应邀与蒋介石夫妇共进午餐，两人约谈一小时，蒋再次重申，中共应放弃军队和地盘观念，只在政治、经济上互相竞争。并说“此为共产党今后唯一出路”。[1]毛当即予以回绝。10 日下午 4 时，蒋又亲赴曾家岩张治中寓所访见毛泽东，相谈 10 分钟后，相偕赴国府，出席招待外宾的鸡尾酒会。当晚，毛又应邀赴蒋之山洞官邸，与蒋畅谈，会谈中，毛泽东曾提出应当延缓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蒋则表示反对。之后，蒋与毛共同观赏中国古装戏。其间，毛的汽车曾受枪击，而毛仍聚精会神地看戏并在话别宴会上举杯“为蒋介石先生长寿，干杯。”宴后下榻该官邸。

11 日清晨，蒋邀毛共进早餐，同时再次对毛指出，中共必须放弃解放区。他说：“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决不再事迁就，否则不成其为国家。……”[2]对此，毛泽东则针锋相对，加以拒绝。为此，蒋曾于日记中写道：“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3]当日上午 9 时 45 分，毛泽东偕王若飞飞返延安，张治中专程陪送，结束了历时一个半月的重庆之行。

此次重庆会谈，毛泽东留给蒋介石最深印象的是二人谈话时，毛从不抽烟，蒋曾对陈布雷说：“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手执一缕，绵绵不断，……，但他知道我不抽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竟绝不抽一支。对其决心和精神不可轻视啊！”[4]

本来，蒋介石想以重庆谈判为借口，企图推内战责任于毛泽东，未曾想毛决不认输，竟决然来到重庆，蒋不免有些尴尬。其实二人内心中都在算计如何制服对方，在蒋看来“天下不能有两个太阳”，而毛则认为两个太阳应由老百姓选留一个。因此，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发展了百余万军队，早已作好与蒋决战的准备，重庆谈判不过是一场智斗，目的在于揭露蒋介石内战阴谋。而蒋也于谈判之后，迅速调集力量，部署内故。

1946 年，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停，正是国共双方边打边谈的复杂时期。毛泽东对马氏调停超然处之，根本不抱任何幻想。因此，在一次向马歇尔祝酒

---

[1] 《新华日报》，1945 年 9 月 5 日。

[2] 觅蒋介石 1945 年 8 月 29 日日记。

[1]

[2]

[3] 见蒋介石 1945 年 10 月 9 日日记。

[4] 王泰栋《陈布雷外史》1987 年北京版，第 15 页。

时，曾挖苦说：“让我们为中美两国、国共两党持久的合作干杯！”而马歇尔不解其真意，在离开延安机场时，竟问毛何时再与蒋氏见面？毛则高声回答：“一旦蒋请我，我随时都会去。”同年秋季，蒋、毛正式开战。此后，毛泽东以土地改革，组建了庞大的人民解放军，并充分调动了解放区农民对战争的全力支援。而蒋因失去了广大农民，在进攻解放区时，时时处于盲目状态和被动挨打局面。在战略上，由于蒋采取了洋军事学的阵地战，并固执于一城一地的得失，结果把自己孤立在一个个大城市地区，使战线愈拉愈长，力量越来越分散，终于为毛泽东所采取的运动战各个击破，最后被赶出了整个大陆。

1949 年 1 月，蒋介石见形势日益严峻，遂决心再以和谈重整旗鼓。而毛泽东深知其用心，并不给蒋以任何喘息之机。当谈判不成时，马上于 4 月 20 日夜发动渡江作战，一鼓作气，攻下江南。

蒋被迫转而据守西南。毛泽东则再挥戈西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放了大西南。1949 年 12 月 10 日，蒋介石败走台湾。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

1946 年，蒋介石一边和谈，一边打内战，同时于 3 月 1 日召开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会上通过了党务、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边疆等各方面决议案。

决议案中最重要者，为党务、政、经和外交方面。

关于党务方面：主要是加强蒋介石独裁性以及党部的支配作用。其中规定：“中央重要决策，应先经中常会商讨决定后呈总裁核定。”而总裁对重大问题之指示，先交中常会研议、实施。但“各级党部之重要事项”，则不由各党部负责人核定，而是“应经各该执行委员会之决议”。上级党部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有重大决策时，应先征询下级党部意见。这在文字上很有些民主气息。但“遇有紧急措施未及征询时，一经决定，即应通知各级党部，以达全体党员”。

党对于政府的作用，是由党决定政府的人选，最后由党的总裁蒋介石决定政府的人选：

“一，国民政府委员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之。

二、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副院长，由总裁提经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后，呈总裁核定后，提请政府任命之。”

此外，在党和民众运动部分，也居然标出了“国民党的政策与行动，应充分代表民众，尤其是工农的利益，反映民众的要求，解决民众的问题，以增强民众对党的信仰。”而实际上则完全相反。

人民称国民党为“刮民党”。

关于政治方面，首先进行了检讨。全文如下：

“一、多年以来，官僚主义早已构成政治上最大弊害，而以敷衍塞责假公济私为尤甚。结果所至，官吏不知责任为何物，对于主义、政策不知尊重。此种弊害，在胜利以后，尤完全暴露，复员时期各种工作多元准备，而一部分接收人员败坏法纪，丧失民心，均为平素漠视主义，不知尊重国家制度之结果，此大会深表痛心，望政府力求改正。

“二、公教人员和军警待遇不合理，为多年来效率低下纪纲废弛之一大

原因，六全大会对此已有郑重决定，而政府仍漫不注意今后必须切实解决。

“三、机构之庞大繁复与法令之分歧抵触，以致权责不清，减低效能，亟应调整，分别存废。

“四、人事与政策之不相配合为政治上畸形现象，政务官与事务官几无区别，政务官不知其应该执行之政策，事务官之进退，未能悉按条例，以致责任观念薄弱，陷政府于无能。

“五、地方自治为训政中心工作，历次大会均郑重决议，而若干年来，政府未能切实执行以致今日宪政实施在即之时，地方自治仍无基础。”

其次是改进办法：

以国民政府为决定国务之最高机关，过去所有国防最高委员会之设计局。考核委员会及各专门委员会应予以裁并。

行政院各部会署，应依其职掌为合理调整与划分，务使名实相符，权责分明。并裁汰冗员。

现役军人不宜兼任民政职务，所有涉及军事供应问题，军事机关通过民政机关办理。

提高警察素质及待遇，树立健全警察制度。

树立健全的人事制度：

“政务官必对其政策负责，政策失败或执行不力，必须课以责任。根绝任用私人恶习，并实行定期调动，以资历练。……”

关于人事革新共有7条：

“（一）凡因附逆及贪污而受制裁或逃脱法纲者，均永不得任用。

（二）凡任职元成绩者应予更换。

（三）统计接收人员贪污案件，将案件最多之主官立即免职。

（四）用人不可偏重历史关系情感关系，一以才能为准。

（五）政务官须以对于政策有认识与执行能力者为标准。

（六）切实实行考试制度，并改革考试内容，或举行特别考试以为登用之标准。

（七）一人一职，非确有必要不得兼职。”

关于外交方面：决议接受日方赔款，内容如下：

“我国抗战最久，损害最重，日本对盟国之赔偿，我国自应享有优越的比额，与优先受偿之权利。政府应按照此项原则，提出整个赔偿方案。对于盟国行将设立之赔偿机构，更应获得有力之参加，以求我赔偿要求之实现。”

关于经济方面：

粮食问题：这个问题，又分为治本与治标两个方面，治本：宽筹经费建设农业；在城乡军事驻地建立平常仓、积壳仓，军粮仓；军粮以采购和“征实”相结合，但要累进征收；整理地籍，调整科则，改善租佃关系。

治标：收复区采购军粮。军粮以实额发给，日俘日侨提前遣送回国，减低其粮仓配额等。军粮采购，以议价方式进行。军队副食由军队采购，不得责令地方供应。

“各地粮荒严重者，应由善后救济总署，从国内外运粮救济。”

“要求联合国增加救济粮食数量，并助我国在南洋各地购运米粮，及在美、加各地购买小麦面粉……”

“粮食增产与节约消费必同时并重。同时注重农时，并由中国银行贷款扶助农民，以增加农产。”

“战时粮食管制法，仍应继续实施。”

关于交通问题（略）。

关于财政金融方面：决议首先指出，财政经济问题为当前最迫切而严重之问题。交通阻滞，物资不足，预算失平，法币贬值，游资作祟，物价飞腾，官贪民病，社会不安。此一问题若元合理之改革，可能招致经济破产，造成全国之纷乱。最后归结为“政府之希望在和平安定”。

其安定物价方法，则主要是：

增加财政收入，减少纸币发行。增加收入办法为：以外汇、产业、国际剩余经济力平衡国库收支；征收土地累进税；土地涨价归公；强制富户买公债；增加奢侈品税收。

生产部门，量出为入，不急之务，完全停止。

在人口集中地区妥筹供应，计划分配，使投机者难以得逞。同时发展生产事业，使游资进人生产之中。

保护民族工业，发展国营事业，以增加生产。

统一货币，取消各种重叠关卡；整饬官僚资本，避免垄断。

解决交通问题和中共地区之煤矿供应问题。

建立金融体系，合理划分业务。

财政要中央、地方平衡发展。

预先计划一二年后之健全财政方案。

改善军警公教人员待遇：调整生活指数；子女免费入学；各机关均平等待遇；合并机构，转人力于地方生产部门；军队整编，妥善安置退役人员。

严责备主官和职员完全按章办事。因为“唯是一切善良美意之在人，不得其人，终成画饼”，对于人事问题提请注意下列各点：

执行人员必“公忠体国”。

严禁执行不经商议之决议。

明确责任，赏罚严明。

这些决议或方案均由于政治腐败而成为一纸空文。

抗战胜利后之“绥靖”措施

抗战胜利后，蒋为配合他的即将开始的全面内战，进行了各种军事部署，绥靖措施即其重要的一项。

1946 年 5 月 31 日，撤消军委会、军政部、中国陆军司令部，成立国防部，结束军委会与行政院并立并凌驾其上的局面。国防部属隶于行政院。国家元首，即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战时得为海、陆、空军大元帅。

国防部设部长一人，第一任为白崇禧，下设次长三人，第一任次长为林蔚，刘士毅、秦德纯。参谋总长为陈诚，第一任三次长为郭忏、刘斐、方天，分掌六厅、八局、三处。参谋总长受国防部长指导，又直隶行政院、国民政府主席。下辖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和联勤部。国防部还设有科学顾问委员会，从事国防科学研究指导工作。

同年 6 月后，蒋又整编军队，拟将全国陆军缩编为 108 个整编师。将三师九团制缩编为二旅六团制。军缩编为师，师缩编为旅，旅缩编为团。

地方军事机构，1928 年完成北伐后，设有国民政府主席或军委会委员长行营、行辕，绥靖公署以及绥靖区，以代替北洋军阀时代之巡阅使署等制，

这是蒋介石为集中兵权，避免军阀拥兵自重而建置的。抗战前，有南昌行营、武汉行营、云南行营、川康绥靖公署、冀察绥靖公署和湘鄂川黔边区绥靖公署。抗战期间，冀察划分战区，川湘黔鄂边区由湘鄂川黔总司令部取代。其余广大地区先后划分为 12 个战区、一个苏鲁战区和 4 个方面军。重庆设卫戍总司令部。绥靖公署设主任一个和副主任若干人；战区设司令长官一人，副长官一人或二人。参谋长一人。总司令部设总司令一人和副总司令一人或二人。统管本区之军事和政治（卫戍总司令部除外）。

1945 年设汉中行营，下辖两个战区。

抗战胜利后，广设委员长行营，东北设立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又设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公署，司令长官为杜聿明。北平行营，主任为李宗仁；南方设广州行营，行营主任为张发奎。行营之下，亦设绥靖公署或绥靖区。

1946 年 9 月行营改为行辕，形同虚设，同时由军委会撤消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战区（留一、二、十一、十二等 4 个战区），设立徐州、郑州、衢州、川康、湘鄂川黔边区绥靖公署。并由军委会制定《绥靖方案》。第三方面军驻上海地区，并设上海指挥所主任。第二方面军驻广东。绥靖公署之下设若干绥靖区，绥靖区设司令官一人和副司令官一二人。当时，行营、战区、绥署、方面军和保安公署并存。

1946 年全国又设六个补给区，计有上海第一补给区、武汉第二补给区、广州第三补给区、重庆第四补给区、北平第五补给区、西安第七补给区。第六补给区暂缺。各补给区直隶后方联合勤务部，各设司令一人，副司令一二人。以上各种地方军事机构均是为全国大打内战而设立的。

战区、绥靖公署下设绥靖区，1946 年 10 月 16 日，制订《绥靖施政钢领》。其中有组织条例、各军事制度和“治安”措施。目的是控制本地人民活动，全力用于对付中共，以便大打内战。以军事“清剿”为主，政治“清剿”为辅，综合进行。

蒋介石的“绥靖”地区的措施，非常详细而繁杂，又专门成立“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1946 月 10 月 21 日成立），专司绥靖区的诸工作，并订立了绥靖区《绥靖法规》，以贯彻其“绥靖”方针。

边谈边打

蒋介石利用和谈，向东北、华北、上海等地空、海运输其精兵数百万；同时印发“剿匪”材料，计有《剿匪文献》、《剿匪战术》、《剿匪手本》等。8 月 29 日，何应钦印发给一、二、五、十一、十二战区《剿匪手本》。另外带有《剿匪歌诀》等。

1945 年 8 月 15 日，即日寇正式宣布投降第二天，国民党军第六十二师进攻解放区东流、贵池。8 月 19 日至 9 月 7 日，国民党第九十、十六、四十军向晋南解放区进攻。9 月 15 日，国民党第十五、五十五军向豫西发动进攻。9 月中旬，华南国民党第一五四师、一五三师进攻广东东江地区。9 月 17 日，蒋介石向阎锡山发“剿匪手本”两册。此书于 10 月 8 日因送手本飞机失事，于焦作地区被中共获取。有蒋介石签发手迹：“吉县第二战区阎长官勋鉴：‘此附发剿匪手本两册，请查收。中正申’”。“剿匪手本”64 开，共 84 页，两万字。封面为蒋委员长编，扉页内有蒋中正制。9 月下旬，新四军浙东纵队为避免内战，向北撤退，途中渡过钱塘江时，受国民党军第七十军、

七十九师围攻。9 月 28 日，国民党第八十八军进攻周港地区；一二七师进攻南厂地区。李正先于 9 月 30 日命其第十六军官兵：“阴雨与空闲期间，官长须研究‘剿匪手本’”；“士兵须熟读‘剿匪歌诀’歌”。[1]10 月 11 日，傅作义部攻占中共重要城市张家口，继占通辽等地。10 月上旬，国民党三个军进攻豫东解放区；四十七军进攻太康；八十五军进攻原武县城。

10 月 13 日，蒋介石密令：“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2]并命三、六战区、第十战区向浙西、浙东、长江南岸、皖南、淮北新四军进攻，23 日，何应钦命第四十八军进攻北撤新四军一部。据第十战区统计，1945 年 10 月份“战绩”，进攻新四军共“八十余次，毙伤匪八千余，俘一七七人。……击毁匪船五只，获食盐两万斤”。[3]

10 月 17 日新华社统计，自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军夺走中共城市 31 座。

10 月 23 日，李品仙公开武装日本军两个旅团向苏北解放区进攻。这像张宗昌利用白俄军进攻北伐军一样。自双十协定至 10 月 30 日晚，蒋介石已命 80 万军队向解放区进攻。

10 月 26 日，叶剑英发表抗议书，抗议美国驻华军队干涉中国内政。

毛泽东返延安后，周恩来仍留重庆，与张群继续会谈。10 月 31 日·蒋提出中共军队退出铁路线 10 公里以外，铁路由警察担任护卫，从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项。

11 月 3 日，中共方面提出要国民党军退出解放区。对从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中共表示同意。

共同议决参加代表人选 38 人。国民政府代表 8 人；中共代表 7 人；青年党代表 5 人；民主同盟代表 9 人；无党派民主人士 9 人。未几，蒋派杜幸明率蒋军精锐五十二军、十三军等于 11 月中旬进犯山海关，出兵东北，大规模内战爆发，政协会议因此推延。

原来美国认为中共会依照斯大林指令，放弃军队，但实际上，中共坚持不让，这使赫尔利、魏德迈怀疑斯大林与中共一定有什么秘密协议，否则中共不会如此强硬[1]。于是赫尔利和魏德迈认为在中国的内战，将是“帝国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会战。蒋介石当然乐于美国人有这种错觉。美国《纽约日报》便谴责中共同苏联勾结，煽动内战。中共《新华日报》也针锋相对，谴责美国支持中国反动派，指出他们应对中国的一切灾难负责。

美国政府此后开始进一步对蒋介石以租借法案名义进行大量军援。

1945 年 8 月 15 日以后，对蒋之军援达 8 亿多美元，而一半以上是 10 月 15 日以前交付国民政府的。

9 月，魏德迈批准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华北烟台登陆，直接接收日军占领区，从而阻止中共军队进驻。9 月底，中共代表通知美国，说明烟台地区已元日军，如果美军登陆，就认为是敌对行动，一定抵抗。9 月 30 日，美陆战队改在天津登陆。这时此地日军正与中共军队作战。同时青岛也有美陆战队登陆。在天津，曾在冲绳与日军血战，征衣未脱的美军，这时却帮助日军把守津港。在秦皇岛，当中共军队与日、伪军作战方酣时，美军却帮助日伪军。

---

[1] 《解放日报》1945 年 11 月 4 日。

[2] 《蒋家王朝》，第 256 页。

[3] 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二十五，0795）。

[1] 魏德迈致马歇尔函，1945 年 9 月 8 日赫尔利致贝尔纳斯，1945 年 9 月 2 日。

此后，中共军队便与美军发生了断断续续的武装冲突。10 月，中共军队在青岛也受到美军的攻击。[②]

到同年 11 月初，整个华北到处可见如下现象：

“高大的美军陆战队和铁路沿线的矮小的日本兵在孤零零的车站上一起站岗。……从外表看来这些日本人是满腔热情地承担他们的警戒任务的……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就会减少被遣返日本的机会。”[③]

一个美国士兵给美参议员汤姆·康纳利写信，诉说他们在替蒋介石对付中国共产党：

“在前来青岛的路上，上边告诉我们是来协助解除这个地区的军武装的。但在我们到达之前，中国军队已经牢牢地控制了这里的局势，甚至已经开始重新武装一些日本军队，以加强防范中共的武装力量。……我们在这里，是要保护蒋军的利益，以防可能爆发的共产党起义。我们在这里的一切目的，在于直接间接地使共产党受到压抑。”[①]延安《解放日报》主编博古，因此亲自告诫美国驻延小组那顿上校：美国军队如此含有敌意，中共和美国的大规模冲突将不可避免。耶顿为此专门报告魏德迈（11 月 1 日）。

如果苏联援助中共，总会有些迹象表露，而这种迹象却一点也没有，美国人宣言中共与苏联有“勾结”也许是一种策略。如果苏联真与中共以援助，与蒋介石相抗衡，蒋介石反而不敢贸然发动内战，美国也会背后援助而不敢直接出面，以免与苏联发生直接冲突。恰恰相反，美国和蒋介石均知道苏联未援助中共，所以才敢肆元忌惮地对中共发动进攻，但也不敢对中共进行大规模的作战，怕引起苏联的担心和直接出兵干预。因此，美国人谓中共与苏联有“勾结”，只不过是想以快速手段消灭中共的藉口，以免中国将来变成共产主义国家，对美不利。因为以后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四分五裂，美国人当时是想不到的。所以赫尔利到 9 月底，已认为对中国的最大威胁来自美国颠覆分子、欧洲帝国主义分子和中共的联合。而不再认为苏联对中国有威胁。[②]从此，赫尔利和杜鲁门总统日益疏远，直到辞职。

此后,魏德迈于 11 月 8 日在上海对记者公开声言要派 5.3 万名美国陆战队帮助国民党在华北执行任务。12 日，美国新任陆军部长罗伯特·帕特森又发表同样性质的声明。

中共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要美军于圣诞节前撤出中国。并谴责美国政府公然干涉中国内政。但美国政府却硬合着眼不予承认。11 月下旬，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和迪安·艾奇逊已认识到蒋介石面临的威胁不是苏联，因为斯大林并未支援中共，而是中共的军事实力。蒋如不可能击败中共武力，则主张逼蒋与中共成立亲美的联合政府。如蒋不同意，就用停止美援逼迫他。这比扩大内战后，由美国介人而引起苏联出兵要稳妥得多。

不久，杜鲁门、贝尔纳斯和马歇尔经过几次讨论，终于确定了在中国成立联合政府的政策。在这个政府中，中共必须居于从属地位，防止苏联插手。苏联这时，也应蒋介石之请，延期撤军，等待国民党接收，实际上也在助蒋占领地区。

[②] 《华北美国海军陆战队·1945—1949》，第 23 页。

[③] 《中国战区史料》第二卷，第十三章，第 13～14 页。

[①] 小萨姆·麦凯中士致康纳利函，1945 年 11 月 5 日转引《美国十字军在中国》 第 273 页（中译本）。

[②] 詹姆斯·福雷斯特尔日记，1945 年 9 月 28 日。转引《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 275 页。

12 月 1 日，云南昆明发生云南省省党部指使下的“一二·一”昆明惨案。此系国民党省当局对昆明云南大学，联大反对内战、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游行示威的爱国师生进行屠杀，云大教员于再和联大学生鲁连、潘琰等被杀害，伤者达百余人。

12 月 15 日，斯大林邀蒋经同访莫斯科。

25 日，蒋经国赴莫斯科，斯大林对小蒋说明，苏联愿意帮助中国在东北建立重工业，供给中国工业品；但特别指出，“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苏联对美国陆战队在中国登陆，正式提出了反对意见，这对美国总统杜鲁门当然有所影响。杜便更加坚定地确立了不出兵中国而促使中国建立联合政府的对华政策。此前。

马歇尔作为杜鲁门的特使，于 12 月 23 日到达重庆（赫尔利于同年 9 月返美，11 月 27 日辞职），开始执行美国对华政策。同年 12 月 15 日杜鲁门对华政策发表，希望停止内战，呼吁实现民主、和平的统一。以后更授权马歇尔可对其他领导人直率表明，如果国民党继续进行军事冲突，就停止一切军事和经济援助（这是官样文章，给人看的）。

12 月 23 日，马歇尔飞抵重庆，当飞机降落时。

国民党警察竟开始驱逐中共代表。由于美国人出面干涉才罢手。

起初，中共对马歇尔寄予一线希望，向他诚恳地表明、只要不让中共交出军队和根据地，重蹈 1927～1937 年的复辙，中共愿意和平解决，参加联合政府，并对美国的独立精神、民主政治进行了称赞。蒋介石则对马歇尔既殷勤而又谨慎。他既答应与马氏合作，又坚持要中共交出军队和地盘，只让中共在政府机关中充当可有可无的角色，决不让中共分享权力和据有军事、政治实力。

这决定了马氏调停的失败。而美国政府，也并未真正停止对蒋的援助，这更使马氏调停必然失败。

12 月 27 日，国共双方在马歇尔主持下再度和谈。同日，成立“三人小组”，又叫“马歇尔三人委员会”。在谈判前，马氏首先提出 4 项方案：

“一、一切敌对行动之安排立即停止。

“二、中国内部及东北境内所肩军队立即停止调动，但为收复东北主权，政府军向东北调动不在此限。又为补给行政及维持治安之需要，而且纯属地方部队之调动，亦不在此限。

“三、停止在各交通线的破坏、妨害活动，并完全拆除在陆路交通线上的障碍。

“四、目前所有部队均留驻原地。”

这 4 项方案显然偏向于蒋介石，承认国民党军继续进入东北和察绥地区的合法性。中共难以同意。

三人小组由马歇尔和周恩来。张群组成，又对 4 项方案举行六次会议，于 1946 年 1 月 10 日正式发布“一切战斗立即停止，军队调动一律停止”的命令，两军于 13 日午夜 12 时停战。13 日，于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为执行停战机关，美国代表为罗伯森上校；国民党政府代表为郑介民中将；中共代表为叶剑英。所有有关训令、命令，由三人同意后，以中华民国政府主席名义，经军 调处发布之。蒋和毛也分别下达停战令。

1 月 10 日，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蒋介石为了更多地抢占地盘，便下令他的军队于 13 日午夜零时以前，迅

速出动，在全国各地抢占地区（有时超过零时，也说成是零时以前干的）。据新华社统计，蒋之五十二军于 10 日抢占凌源；13 日抢占平泉、进攻承德和赤峰；九十四军 12 日侵夺丰润县城；九十二军于 13、14 日进犯古北口。此外，在归绥地区，12 日侵占陶林和林格尔，13 日进犯卓资、凉城；在晋北，12 日、14 日侵占浑源县和进攻丰镇；在晋南，13 日抢占了浮山县，14 日攻击蒙城；苏北，11 日至 14 日进犯高邮、泰县、如皋、来安等县；在鲁南和苏北、兖州、枣庄、徐州之敌向解放区发动攻击；在豫南 11 日至 14 日，有 6 个军进犯光山、随县地区；在豫北，14 日进犯豫北解放区。

之所以如此，是蒋介石于 1 月 7 日就下达命令：“我军应于停战令未下前，占领有利地区。已下令前进某地而尚未到达者，应催促星夜前进。……行动希秘密迅速，勿资共方借口。”[①]

中共方面，对此当然要针锋相对，进行反击。

东三省，是 1946 年 3 月 27 日才接受《东北停战协议》。但 4 月 1 日，蒋介石又借对东北行使主权，继续发兵东北，进攻东北民主联军。5 月间，杜聿明指挥所部侵占了四平街、长春、永吉等众多大中城市。至 6 月底派进东北精锐之师约 8 个军和十几个机械团，军调处下属 36 个执行小组，除广州小组完成了把粤境中共军队调往烟台外，其他小组都未能正常活动。如徐州、济南、新乡、晏城小组中共代表竟被拘押；青岛小组中共代表被殴打；承德小组中共代表被炸死 4 人。但蒋却在日记中说中共军队首先向他的地区进攻。

1 月 31 日，政协会议通过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五项提案。这五项提案内容如下：

“一、国民政府委员名额增加为四十人。经国民政府选任，其中半数由国民党人充任；其余半数由其他党派及社会贤达充任。其分配另行商定。国民政府委员会为国民政府之最高国务机关。

“二、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国民代表大会定额由现任的一千二百名增加到二千零五十名。宪法之通过，须出席代表四分之三的同意。

“三、和平建国纲领之要点为：遵奉三民主义为建国之最高指导原则，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建立统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国。

“四、军队属于国家，任何党派及个人，不得利用军队为政争之工具。

“五、组织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起草立法，司法、监察、考试。行政分立的‘五权宪法’。”

但各党派的国府委员数目的分配，未能达成协议，蒋欲将各党派委员压在 14 名以下，从而使各党派绝对控制于国民党之下。

对此中共不能同意，要求中共与民盟之名额共为 14 名，仅次于国民党，据有三分之一以上名额，从而具有否决权，以制约国民党一党专政。对此，蒋介石绝对不予让步。

五案通过后，蒋发表讲话，表示完全拥护，并说此“乃是有全国性”，要全国各党各派“共同遵行”。他在闭幕词中说：“关于和平建国和促进宪政的各种方案，我敢代表政府先行声明，当分别遵照实行。今后中正无论在朝在野，均必本着公民应尽的责任，忠实的坚决遵守本会一切决议。”但是

[①] 《蒋家王朝》第 262 页。

蒋氏表面上拥护民主、自由、和平联合。三民主义，而背地里却指使特工人员对民主进步人士进行恐吓、绑架、暗杀等血腥勾当。2 月 10 日，特务们在重庆校场口殴打参加庆祝政协大会成功的大会各届人士，打伤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等 60 余人；并逮捕许多到会工人。12 日，蒋到长春视察。同时在全国各大城市均发生特务破坏开会事件。同月 20 日，北平竟有特务们组织的反共示威，沿途高喊打倒共产党，取消解放区等口号。并叫嚷“民主联军不容存在”等等，并捣毁《新华日报》、《民主报》社，打伤工作人员。其他各大城市，以后也连续发生类似反民主反和平事件。

2 月 25 日，三人小组又通过整军方案，共两项：

“一、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国陆海空军最高统帅。最高统帅有任免所属军官之权，但在整编军队过程中，撤免中共军队之高级军官，应由派在政府中之中共代表所提名之军官替补。

“二、陆军之编制，在一年之后，全国军队编为一百零八个师，其中共军占十八个师；一年半之后，缩编为六十个师，其中共军占十个师。”

军队配置（一年后）东北 6 个军，中央军五，中共军一，每军辖三师；华北方面 11 个军，中央军七，中共军四；华东方面 10 个军，中央军九，中共军一；其他地区，西北 5 个军，华南 4 个军，均为中央军。

对此种整军方案，蒋介石意在应付马歇尔和中共，实则口是心非，毫无诚意。他对马歇尔就深有疑虑，认为他在帮中共的忙。

受中共蒙骗。蒋在 2 月 28 日反省录中写道：“马歇尔对余之认识虽渐增加，然其受共党之麻醉日甚。美国民族之易受人欺诳，甚老练如马氏者尚且如此，其他更可知矣。不禁为世界前途忧也。”

同篇中他又认为给中共统编其所属部队为 18 个师，是他最大的损失。他说：“与中共商定统编其所属部队为十八个师之方案，业已签字。此为政府最大之损失。”可见蒋是多么不情愿，只是因为马氏的影响才被迫签字的。

三人小组自 2 月 28 日起，赴北平、张家口、延安、汉口地区视察共 6 天。3 月 11 日，马氏应召返美述职。4 月 24 日，改由徐永昌任三人小组国府代表。

3 月，蒋在二中全会上开始对 5 项方案进行修改，并提出“不应以种种问题束缚领袖”。对原来整编方案也不冉承认，要扩大其整编的军队数目为 347 万。4 月 1 日，对政治协商会议也不予承认。他说：“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如政治协商会议果真成为这样一个性质的会议，我的政府是决不承认的。”时隔两个月，他就推翻了自己“忠实的坚决遵守”的诺言。至 5 月 20 日，国民党军队从停战以来，共向关内各解放区进犯达 3630 余次之多。所使用兵力为 258 万余人。强占县城 26 座。自然，中共军队在各地也对中央军进行了反击。

马歇尔回国期间，中共军队已迅速接收了东北中、北部主要城市，苏联表现出对中共的一定援助。形势对蒋不利。

自苏联（于 8 月 8 日）出兵东北，至 8 月 14 日日寇投降，时间很短。国民政府遂任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蒋经国为外交特派员。10 月熊和蒋经国到长春就任。杜聿明于 10 月下旬以东北保安司令身份，到达长春。11 月中旬督师进攻山海关，此时中共军队已进驻东北，建立东北民主联军。蒋经国于 12 月 25 日应斯大林之邀赴苏访问，以蒋介石私人代表身份和斯大林会谈。斯大林对蒋经国说：

“你们中国人要明白——美国人想要利用中国作为满足他的利益的工具，他必要的时候，是会牺牲你们的！苏联愿意把本国的生产机器、汽车以及中国所没有的东西供给中国；同时也希望中国能把自己生产的矿物、农产品供给苏联；苏联又可以帮助中国在东北建立重工业，并发展新疆的经济。但是，我再三声明，也是我最大的一个要求：你们决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

同一个时候，莫斯科外长会议上莫洛托夫向贝尔纳斯提出共同宣布美国自华北、苏联自东北的撤军日期。美国人拒绝这个提议，认为当时规定日期太早。苏联当然也不撤军。苏联本来约定 在日寇投降后三星期后开始撤军，至迟不得超过三个月。但因美国陆战队于 9 月下旬在青岛、天津登陆，而延缓其撤军日期，至 12 月仍未撤军。后经中苏双方协议，延至 1946 年 2 月 1 日撤军。

1946 年元月 22 日，宋美龄赴东北宣慰。蒋和美国对苏联迟迟不撤军甚为忧虑，蒋于元月 19 日日记中表现了这种忧虑心情：“本周心神慢郁。既受政协会中共党及其外围之压迫，复受俄军之威胁，而其在东北延不撤兵，最足使人焦虑也。”（蒋先怕苏军不撤，后又曾因军队开不到，而要求苏联迟至 3 月中旬撤走）同时苏联声言，“美国如自中国撤退，苏联也撤退”。此时美国向世界公布了雅尔塔密约。此约一刊，中国哗然，愤怒的中国民众掀起了抗议的热潮，纷纷要求苏联自东北撤兵。

苏联在东北把日本 14 年间建设的超过百亿美元工、矿设施，完全掠为己有，说这是他们的战利品。这当然是蒋介石先主动放东北，以后又无能力反攻东北所导致的。而苏联即利用这个机会，夺走了日本人掠夺中国人民的财物。总之治国者无力，必招外侮。1945 年 11 月 24 日，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向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琉表明日本所建立东北工、矿设备作为战利品归苏联所有，其余 154 种企业，应由中苏共管。

12 月 7 日，更严厉地表示“除非此一经济合作问题获得解决；否则苏联自东北撤军日期将不能预测。”1946 年 2 月 1 日，马林诺夫斯基再度表示坚持中苏经济合作，并不许第三国参加。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则对苏联把日本在东北的企业作为战利品表示反对，他说：“苏联以东北企业为其战利品，实为逾越国际公法范围以外。”1946 年 2 月 9 日，美国又照会中国：

“（一）东北工业由中苏共管，乃违反门户开放的原则。

（二）日本在国外的财产，应由盟国组织日本赔偿委员会作最后分配之决定。”英国也有同样表示，与美国同一步调。2 月 16 日，贝尔纳斯又发表声明：“并无承认苏联运走东北工业设备的协定”。这些不能不令人想到清末列强瓜分中国和各占势力范围的历史情景。

3 月 27 日，苏联向中国正式提出《中国经济合作建议草案》，坚持共同经营东北工业。蒋之外交部长王世杰终于拒绝。但东北工、矿企业，终于被苏联掠走 70～80%。3 月间，到沈阳、长春访问的美国记者被苏军赶走。这件事，引起美国和英国的强烈反应。蒋介石说：“邱吉尔在美演说，主张美、英同盟，强调英语民族间合作之力量，准备对俄作战，几使人有第三次大战其将来临之感矣”（3 月 9 日反省录）。

在美国陆战队进驻中国大陆后，苏联知美国也欲独占中国，便一方面延缓撤军，一方面把缴获的武器送给中共，并允许中共军队进驻东北，组成东

北民主联军，予中共一定的援助。四平街的苏军无疑是在蒋之军队未到之前即已撤走，使中共军队收复四平街。苏联既给予中共一定方便，又不明显。意在东北建立中共政权，与美国对抗。又如长春，当国民党军队业已派驻一师兵力，苏军突然于 4 月 14 日撤走，旋被中共军队三万余人攻人长春，收复长春市，蒋之军队退出。对此，蒋介石认为斯大林欲于东北建立中共政权，分割东北。他说：“共军攻陷长春，阻碍国军接收东北主权，破坏停战协定，此已明目张胆，发动叛乱。且俄国亦公然派飞机接济共军，并以哈尔滨至长春之铁路供共军运输南下。——是俄国已决心在北满制造共产党伪政权，割裂我东北矣。”（4 月 20 日反省录）同年（1946 年）4 月 17 日，蒋介石密令徐永昌，对“剿匪战术应特别注重主动与机动。其战斗之对象，不重在攻占城市与据点，要以杀伤其人马，收缴其武器为目的。各进剿部队应严整纪律，不准驻扎城区。以上各点，希……特予注意研拟编人为要。中正三十五年四月十七日。”[①]4 月 17 日，马歇尔返华，直接飞抵北平，听了军调处报告后，于 19 日至重庆。蒋要求美国进一步支持他，改变己往“消极政策”。

29 日马歇尔支持蒋要回长春，此时蒋对马氏积极游说，劝美国积极支持他尽快占领东北，不要重蹈“九·一八”对日妥协旧辙，他说：“当时美英对日能稍用压力，表示积极行动，则日本当不至如此猖撅，战祸自可消除矣。今日俄、共在东北之形势，亦复如是。此时共产党既非空言所能制止，惟有准备实力，积极行动……协助我政府并示其决心，则俄、共皆将慑服。否则美国在东亚领导之声望决难维持，而第三次大战亦必以此为起因矣”。

（4 月 29 日日记）蒋欲占东北之决心是很大的，以后蒋把东三省的战事归咎于马歇尔，实是推诿与人。

1946 年 5 月 5 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蒋、宋美龄同日于孙中山陵前举行还都典礼。5 月 6 日，斯大林命苏驻华武官罗申请蒋经国转达欢迎蒋介石访莫斯科邀请。蒋怕美国疑忌，婉拒访苏。此后并不问苏、美态度，一心进攻东北，消灭中共军队。5 月 19 日，蒋军占领四平街。

23 日蒋夫妇至沈附，当天蒋军又占领长春；继占吉林、农安。旋接苏联照会：6 月 3 日，苏军已完全退出东北。

美国仍未改变实现中国和平和联合政府的政策，马歇尔仍然力主双方停战，蒋迫于美国的压力，不停战即终止美援，也被迫同意。自 6 月 7 日正午开始，为期 15 天之全面停战。是为第二次停战令。6 月 20 日，周恩来发表声明，反对马歇尔之“最后决定权”。

6 月 14 日，美国众议院外委会通过《军事援华方案》；同月，美政府批准《美蒋秘密军事协定》。

在这个期间，蒋介石并未遵守停战令。而是要中共军队撤出陇海路以南、胶济全线、东北大部、承德以南诸地区，以及山东、山西两省中 6 月 7 日后从伪军处接收的地区。并警告说如不服从，就诉诸武力。中共当然不会受蒋的胁迫。

内战爆发

[①]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四辑，第十二册，9668—5～9668—6页。《蒋介石手令机密（甲）九四00 号》。

1946 年 6 月 26 日，蒋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7 月 12 日，蒋派徐州绥署第一、三绥区兵力 50 万人向苏皖解放区进攻。内战于是全面爆发。毛泽东以运动战和聚歼战反击之。

8 月 10 日，杜鲁门致蒋电，表示蒋如不停止内战，美国将重新考虑对华政策，8 月 14 日，蒋再次公开表示要军队“国家化”。并要中共退出五大地区。18 日，美国停止对蒋支援军火，迫蒋坚持和谈。蒋对此极为不满，在 7 月下日日记中写道：“美国始终坚持其不用武力之主张，而置我国存亡于不顾，至可痛惜也！”

8 月 19 日，蒋介石将修改后的“剿匪手令本”正式签发。

蒋在 8 月 30 日日记中又写道：“美国务院对我以现款购买军火事，竟拒绝发给出口证，此乃马歇尔对我更进一步之压力；可知美国对华政策已因马歇尔之调解不成，更趋恶化。果尔，则马歇尔纵容共党，其将不仅有害于我国，而适足以自害美国矣。”实际上美国这些禁运把戏不过是给人看的。美援已把蒋介石军队部署好，并接连占领中共地区，禁不禁运，又有何妨！蒋写日记无非对美国不能帮忙帮到底，发几句牢骚而已。

8 月 29 日，蒋攻占承德；9 月 14 日、15 日，周恩来马歇尔备忘录提出：“不能不认为仅仅美国政府对国民党政府军火与物资的援助，即已大有助于政府当局之进行内战。”同时，周对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算了一个总账，共为 52 亿余美元。9 月 30 日，周恩来致蒋介石、马歇尔备忘录中谴责蒋之国民政府：“自 6 月休战谈判中断以来，政府即进一步不顾一切约束，撕毁停战协定，在关内大举进攻。在此三月中，政府军队已进占解放区许多城市，摧毁许多地方的民选政权，狂轰解放区，伤害无数居民的生命财产，更提出无理的五项要求，强要中共军队及民选的地方政权退出若干地区，……政府不惜以进攻中共解放军的政治军事中心之一的张家口，来迫使国共关系至最后破裂的境地。”

10 月 9 日，周恩来又致马歇尔备忘录：（一）要求中共与民盟总数为 14 票，以制约国民党一党专政。不能以民主人士充第 14 票。（二）中共国大代表名单只给改组后的政府，不给国民党一党政府。（三）应共同规定国共双方军队驻地，不应只规定中共一方军队驻地。而蒋介石则要中共签 13 票和交上中共之国大名单才停止进攻张家口。中共亦坚决拒绝。

10 月 11 日，蒋攻占中共河北首府张家口；此后继占赤峰、多伦、沽源等城。

10 月底攻占通化、安东。

同日，蒋决定于 11 月 12 日单独召开“国民大会”。10 月 16 日，蒋发表八项建议，主张按两军现地协商驻地的分配。

17 日，毛泽东发表《时局声明》，历述中共诚意，并呼吁再次会谈，主张恢复 1946 年 1 月 13 日以前国共双方军事位置，实现政治协商会议决议。

18 日，蒋召开南京秘密军事会议，宣布“五个月内打垮共军”。白崇禧提出仍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原则；次日，陈诚在北平军事会议上宣布“三个月，至多五个月可以完成以军事解决问题”。同日蒋又假意宣布：自 11 月 11 日中午起全面停止战斗。

至此，蒋因对解放区屡次进攻，已损失 35 个旅，为其统治中国以来最大军事损失。

11 月 15 日，蒋单独召开国民大会。

中共与民盟拒不参加国大，反对国民党一党包办的、不代表民意的伪国民大会。12 月 26 日，陈诚在国大代表招待会上对外宣布“一年内消灭中共”。同时，蒋介石要外交部声明中国政府要求美军留驻中国大陆。30 日，蒋发出第 70 号密令，部署了 1947 年上半年度的进兵计划，为“打通陇海、津浦、同浦、平汉与中东铁路诸线，肃清冀鲁晋陕等地境内股匪”。

1946 年 12 月底，蒋调动了 218 个旅进攻解放区（占其全部兵力的 90%），侵占解放区土地 17.4 万多平方公里，侵占城市 165 座。

马歇尔眼看内战全面爆发而不可遏止，宣告“调停”失败，于 1947 年 1 月 8 日返美。29 日美国宣布退出“军调处”。马歇尔临走，发表了袒护蒋介石的所谓公正声明。

国民大会

国民大会代表是 1936 年 5 月 5 日《五五宪草》制定后，随即“选出”的。原决定于当年 11 月 12 日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后经五届三中会议议决，又改在 1937 年 11 月 12 日召开。不久因抗战爆发，暂停制宪，后六中全会又议决于 1940 年 11 月 12 日召开国民大会。后又推至战后召开。

《五五宪草》是继 1912 年们临时约法》，1913 年《天坛宪草》，1914 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24 年《中华民国宪法》、1931 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之后的第六部宪法。1944 年，蒋曾数次谈到召开国大日期。

1945 年元旦，蒋又一次宣布抗战胜利后，即行召开国民大会。3 月 1 日，蒋又宣布于 1945 年 11 月 12 日召开。中共和全国人民均一致反对蒋氏单独召开国民大会。国共“双十”协定中，中共提出了应延期召开国民大会和修改国民大会选举法及《五五宪草》等三项主张。但蒋介石不同意，坚持不予修改。

1946 年 1 月，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国民大会案和宪法案。决定本年 5 月 5 日重开国民大会，修正《五五宪草》。但鉴于条件不成熟和蒋拒绝修改宪草，中共不同意过早召开国民大会。经过蒋之一系列军事进攻的暂时胜利，蒋介石便于 11 月 8 日宣布于 11 月 12 日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并制定宪法。后又改为 15 日召开。

12 月 25 日国大闭幕。原规定本次大会代表为 2050 名，而实到 1485 人。本宪法规定每县、市和同等地区各选代表 1 名；人口至 50 万者，每增 50 万人，增选代表 1 名。县、市同等区域则以法律定之。

在这个大会上，蒋介石于 11 月 28 日发表了宪草演说。他的中心意思是，五权宪法是要蒋来行使，他说：“我相信，假如我自己来行使五权宪法，我一定能以国父之心为心，……但是……我个人本来没有统治的欲望和兴趣，……所以必须将国家的责任交托于全国同胞。”但“目前大多数同胞还没有这种能力和习惯”，故仍须“以治权保护政权，培育政权，养成人民行使政权的能力和习惯”。说来说去，宪法虽然产生，但因民智低下，仍不能实行宪政。当然仍要实行“训政”和“治政”。

对此，中共《解放日报》发表社论驳斥蒋介石演说，指出其目的仍是继续训政。新华社记者说：“国大的召集完全由国民党一党所包办。”《评蒋介石“宪草”演说》一文则指出“民主不能由独裁者制造”。

周恩来于 11 月 16 日发表书面谈话，指出这个国大是“把独裁‘合法’

化，把内战‘合法’化，把分裂‘合法’化，把出卖国家与人民利益‘合法’化。”最后说：“我们中国共产党愿同中国人民及一切真正为和平民主而努力的党派，为真和平真民主奋斗到底！”[1]蒋介石以停战令为烟雾，一方面召开国大，一方面向解放区发动了 9 次大规模进攻：

对平汉路北段发动攻势，为刘伯承部痛击，被歼者万余人；对苏北、涟水、沭阳发动进攻，为粟裕部痛击受挫；自 1946 年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9 日，粟裕获 11 次胜利，共歼蒋之军队约 9 万人；其进攻临沂，亦被击回台枣线，损失重大；进攻龙口、烟台，受到重大损失；二十五师进攻东北通化，被歼；进攻平汉路段易县地区，亦被击退；对平绥线蔚县和对濮阳进攻，得逞；12 月上旬李默庵部进攻盐城。

在这一阶段战斗中，蒋氏作战“不尽如人意”，到 12 月 6 日止，被歼蒋军 39 个整编旅。蒋之战局开始由主动转向被动，[1]锐气被挫。而中共军队，则得出了一个“有用的经验之一，就是大踏步转移的运动战……另一个经验就是以攻为守”。

1946 年 12 月 25 日国民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并定于 1947 年 12 月 25 日实施。

该宪法仍然是以西方民主国家的宪法为蓝本，但不是三权分立。国民大会可以罢免总统、副总统；修改宪法；复决立法院所提之宪法修正案。国民大会代表和总统任期 6 年。总统可以连任一次。

总统权限：总统由国民大会全体代表选举产生，为国家元首，对外代表中华民国，统率全国海陆空军。总统公布法律、命令，需经行政院长副署。总统根据立法院议决行使缔结条约，宣战和媾和之权，宣布戒严，并行使大赦、特赦、减刑和复决权。总统依法任免文、武官员，授与荣典。特殊情况时，总统可以经行政院会议议决，发布紧急命令、法令，作必要之处置。但一个月后，需经立法院追认。如立法院不同意时，该法令、命令，立即失效。

总统就职时，要向全国人民宣誓，表示：“余必遵守宪法，尽忠职务，增进人民福利，保卫国家，无负国民付托。如违誓言，愿受国家严厉之制裁。”

总统之特权是：（一）提名行政院长人选，经立法院同意后，由总统任命。（二）行政院向立法院负责，但当立法院对重要决策不同意时，得以议决请行政院改变之，但行政院对立法院之决议，“得经总统之核可”，才可以由立法院复议，否则，行政院便无可奈何。（三）“司法院院长、副院长各一人，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任命之”。“司法院解释宪法，并有统一解释法律并命令之权”。“司法院设大法官若干人”掌握宪法和法律、命令之解释，亦“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任命之”。（四）“考试院设院长、经监察院同意任命之”[1]（五）监察院院长。副院长由监委互选。但监察院之审计长，得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由总统任命之。

审计长，负责审计行政院之决算。

从以上规定不难看出总统间接掌握了宪法、法律、命令的解释权，以及三院提名权，否决行政院要求复议权。几乎完全不受宪法约束。这实质上是总统独裁制的宪法。因为总统既可以解释法律。宪法，则立法院、国民大会、

---

[1] 《东北日报》，1946 年 11 月 17 日。

[1] 《解放日报》社论：《战局已开始转变》，1946 年 12 月 6 日。 26

[1] 《中华民国宪法史料》1947 年第一版，第 159 页。

监察院均无实质性作用。但总统任命，必经立法院或监察院通过。

内战公开化

1946 年 12 月 30 日蒋下了一份密令。这时谈判和“调停”已经破裂，马歇尔于次年 1 月 17 日回国。该密令是在修改后的《剿匪手令本》发出（1946 年 8 月 19 日）后 4 个多月发出的。此密令共 5 条，对前一阶段作战进行了总结：

首先，“各部队与部队间，各指挥官与指挥官，联络仍不确实，合作亦未密切，今后对于联络及协同作战更应特别注意。”他特别指出，对于友军危急，“应全力救援，切不可观望不前，贻误战机。”

其次，对于解放军经常派部队袭击蒋军各级司令部和专门射击指挥官之战术，蒋再次予以申诫。严令各师、旅长指挥位置与各级指挥部所在地，一定要保守机密与机动，于此条中，他对其嫡系部队在各地之惨败，极为伤心，他说：“而以一人一时之疏失，以致整个战局受莫大之影响，言念及此，不仅悲痛难忘，而且后悔无及，能不深为之警惕耶！”

第三，“各部队应对剿匪训练（1933 年）中之六项基本战术即一搜索、二联络、三侦探、四答戒、五掩护、六射击，作为剿匪战术之基本课目，尤须各连排、班等下级干部人员”对此均有深切认识，注意灵活运用，以防不意之袭击，而免受元谓损失。

第四，凡我军收复据点，“于占领后三小时内构筑防守工事”，务必不再被解放军攻克击毁。此虽经蒋三令五申，元奈其军官并不照此实行，以至于鲁西诸战役中蒋军据点多被攻克，其师旅长因之被当场击毙。

最后，蒋认为：“各部队对于通讯、交通、运输、车辆等重要工具，尤其联合勤务机构及其部队未能妥加保管，……致使军队行动迟缓，贻误时机，莫此为甚。”因之，令其高级将领亲自督察，经常检点。

“以上各项均系一年以来历次战役中所获得的主要教训，各将领务须切实反省，遵照改进，勿蹈复辙。”

蒋在总结以上所谓教训后，就对其部下指示了 1947 年上半年的作战计划：

“应打通陇海、津浦、平汉与中东铁路诸线，肃清冀、鲁、晋、陕等地境内股匪，以恢复全国往来交通线”。同时命令各战区、绥靖区，对解放军的情报工作应予加强研究；必须军事与政治相结合。在“恢复区”（解放区被其进占者）蒋介石特别强调说：“对于处理土地纠纷，尤应注重实行……减租法规，务使耕者有其地。

此为我军与共匪政治斗争之基本问题，务希我将领切实厉行，切毋忽视。”

解放军于 1947 年 2 月 2 日收复亳县时，缴获了蒋的这份密令，并在《解放日报》上全文照发。于是蒋对解放军的进攻完全公开化。

1946 年战况

自 1946 年 1 月 13 日停战令生效后，蒋介石违反停战协定，继续派大军进攻解放区，至 6 月下旬，则全面大举进攻解放区。自 1 月 13 日至 10 月止，

蒋军进攻共计 4625 次。其主要战役如下：

广东地区：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部之五十四军、六十三军、六十四军共 10 万人，于 1 月 13 日至 2 月 25 日进攻东江纵队和大鹏半岛等解放区。第四十六军和三个保安团，共 3 万余人，于 1 月 10 日开始，进攻儋县、白沙。

中原地区：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孙震部之六十六军、七十二军、十五军、四十一军，自 1 月 14 日至 6 月 10 日，占领河南息县、光山县、草店、杨家河地区。6 月，绥靖公署主任由刘峙担任。6 月 26 日至 7 月下旬，刘峙部十五军、四十一军、四十七军、六十六军、七十二军、七十五军、第十军，包围李先念部，李部突围后，又予追击。

苏皖地区：汤恩伯部第七军、八十八军、四十八军，自 4 月 19 日至 6 月中旬，进攻皖北、皖中及来远地区重镇 20 余个。薛岳部于 7 月 13 日至 9 月，以第五军、二十一军、四十九军、六十五军、二十五军、四十七军、七军、五十八军、九十九军、一百军、九十八军，共 30 万人，大举进攻苏皖解放区，先后攻占如皋、萧县、旷昭、淮阴等 16 座县城，并至 10 月仍继续进攻东台、沭阳地区。

晋冀鲁豫地区：赵承绶和日本军人兀泉馨部，10 个师和第十四旅团、以及伪军，于 2 月 4 日至 3 月底，进攻山西东观、沁县及上党地区。5 月中旬至 8 月初旬，刘峙部等五十五军、六十八军，伪军张岚峰部，进攻豫东解放区，攻占尹庄集等 30 余集镇。胡宗南部第一军、二十七军、三十军、六十一军十几万人，从 5 月 17 日至 9 月，攻占汾河以南 180 余个村镇，约 2700 平方公里和茅津口、闻喜、水头、侯马、绛县、冀城浮山、越城、洪洞、灵石诸城。8 月初，解放军包围大同，防备阎锡山大同之军南援。

刘峙、顾祝同部第十八、六十八、八十八、五十五、五、十、四十一、四十七、四十、八十五各军和伪军吴化文部，共 30 万人，自安阳至徐州一线，大举进攻冀、鲁、豫、苏地区，进占丰、沛等 14 座县城及河南焦作地区。至 10 月份仍在菏泽、矩野、定陶地进行激战。

鲁东地区：王耀武部第八、十二、五十四、七十二、九十六军，共 12 万人，自 6 月 23 日至 8 月 10 日，攻占益都、章邱、淄川、博山等 10 余县城及重镇 40 余个。冯治安部第五十九、七十六、九十六军，共 5 万余人，自 7 月 29 日至 9 月中旬，攻占涧头、韩庄、台儿庄、枣庄、峄县等城镇。

晋绥地区：傅作义部第三十五军、三军、骑一军、伪蒙军、伪晋军，于 1 月 11 日至 1 月 14 日攻占陶林，和林、丰镇、高阳、集宁、浑源、左云。旋为中共军收复浑、集、左三城。5 月 15 日至 6 月 28 日，赵世玲、孙楚部第七十、七十一师、暂三十六、四十、四十九师、日军一部 800 人，共 3 万余人，进攻晋中地区及汾阳以西、以北地区。攻占北格、开栅、孝义、冀村、罗城等 30 余重镇。傅作义部第三十五军、三军，于 9 月 5 日至 10 月上旬，攻占卓资山、集宁、凉城、兴和、尚义、张家口（10 月 11 日）、宣化。

晋察冀地区：杜聿明、牟庭芳部第十三、五十二、九十四军各一部，于 1 月 11 日至 2 月 16 日，攻占丰润，玉田、建平、建昌、天义等城镇。李文部第十六、九十二、九十四军各一部，于 5 月 15 日至 31 日，攻占安次、钱各庄等地和 600 平方公里地区。

5 月 5 日又攻胜芳镇，被击退。侯镜如第九十二军和美军 300 余人，自 7 月 29 日至 8 月 5 日，攻占安平、燕郊等镇。郑洞国、孙连仲部，第十三、五十二、九十三、十六、九十二、九十四、六十二军共 20 万余人，自 8 月 22

日至 10 月中旬，连续攻占宁城、承德、滦平、隆化、赵县、容城、冀东各县、延庆、怀来等 17 座城市。

东北地区：杜聿明第十三、五十二、新一、新六、七十一等军，共 30 万人，自 1 月 13 日至 10 月上旬，连续攻占营口、法库等 29 座县城和康平、柳河、金川、新宝等城。[①]

总之，停战令中，蒋并未停战，而是连续攻占各地区，各县城。自本年 6 月底开始，将主战场放在山东、苏北地区，进行大规模进攻。

自 1946 年 7 月至 1947 年 6 月，蒋介石处于战略进攻阶段。他以全部正规军 248 个整编旅（师）、200 万人的 80%投入战斗，约为 193 个整编旅（师）、160 万人，向各解放区全面进攻。

前 4 个月，共作战 80 余次，解放军歼蒋之军队约为 29.8 万余人。蒋军初战锋锐被挫。蒋所获胜之处，仅仅是占领解放区的城市约 105 座，而第一线兵力则由 72 个整编旅增加到 117 个整编旅（此后，便一直处于下降势态中）。此时蒋之进攻战在关内达到最高峰。

10 月以后，蒋命所部军队，继续进攻苏北、山东、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解放区。而重点在苏北和山东。并调集 29 个整编旅企图于徐州东南与华东解放军进行会战。

12 月 13 日至 19 日，蒋之整编九十六师、二十六师、五十七师各一部被华东解放军于苏北宿迁以北地区歼灭。九十六师师长戴子奇被击毙。这是解放军第一次歼灭蒋军一个整编师的战例，此次蒋军被歼约为 2.4 万余人，打破了蒋于徐州东南进行会战的计划。

此后华东解放军便突破蒋之苏北包围圈，向鲁南撤退和作战略转移。

1946 年 8 月，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延安谈话，针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局势，第一次发表“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

同年 10 月 19 日，陈诚（自同年 6 月 1 日任总长后，实际负责指挥对中共作战）以参谋总长身份，到北平召开军事会议，参加者有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十一战区长官和保定绥靖主任孙连仲、张家口绥靖主任傅作义和集团军总司令李文及行营高级将领等。

会议中陈诚首先宣读蒋介石手令，云：召开国大，鼓舞士气，于三个星期内打通平汉路。李宗仁认为无法于三周内打通，陈诚不敢上陈此见，请李宗仁出面，李即上陈己见。不久蒋复电同意，暂缓执行。蒋之部下李文等，便如释重负，对李宗仁深表感谢，并说对蒋之命令，“我们谁敢说半个不字”。

[①] 《群众》周刊，第十三卷第二期：《国民党军违反停战协定进攻解放区主要事实》。

第五章　大厦将倾

全面进攻

蒋介石在 1947 年 1 月至 7 月的战略部署，是全面进攻的战略：东北要打通中东铁路；华北、华中、华东则要打通津浦、平汉、陇海诸线。并声言，于一年半载内，消灭中共。继之蒋于 2 月巡视徐州，郑州、济南。

其主要战场置于华东地区苏北、山东，欲占领华东后，再占据河北等省，使华东、华北连成一片，恢复津浦、平汉诸线，进而完全占领东北。

华东解放军在 1947 年 1 月 2 日至 20 日，于枣庄、峄县地区，消灭蒋军整编二十六、五十一师和一部快速纵队，共 5 万余人，两师长马励式、周毓英被俘。蒋遭此打击，极为气恼，集中 23 个整编师，共 31 万余人，自徐州至海州段，徐州至济南段和胶济线二面围攻鲁南，由陈诚亲临徐州指挥，声言鲁南决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华东解放军则首先歼灭郝鹏举第四十二集团军，活捉郝鹏举。

蒋误认为华东解放军于临沂固守决战，即命其各部继续向临沂推进，企图吸引华东解放军；再命北路李仙洲集团三个军沿淄博线，向鲁中插入。华东解放军（陈毅）便决然放弃临沂，挥戈北上，集中优势兵力，于 2 月 23 日，将李仙洲围歼于莱芜地区。歼敌整编四十六师、七十三军，十二军一个师，共 7 个整编旅，6 万余人。生俘其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等高级军官数人。

蒋对此惨败非常不安，遂飞赴济南，亲自指示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部署济南防务，惟恐失掉济南。并对王说：“济南在军事、政治、地理上都重要，如发生问题，你要负责。”[①]这时，蒋把他不计一城一地得失，而以消灭中共军事力量和缴获武器为目的之战略原则，完全忘掉了。令王死守济南城。

1 月 25 日至 2 月 9 日[②]，中原解放军为配合华东解放军于鲁南作战，向豫东、皖北蒋军出击，于亳县、杞县、睢县、宁陵地区连续作战，歼敌整编七十五师第十六旅和 4 个保安团，共 9000 余人。破坏了陇海线民权、商丘段，使援敌不能前进。

晋绥和太岳部队于 1946 年 11 月 20 日发起晋西南战役，阻胡宗南部渡河人晋。先后攻克中阳、隰县、蒲县、大宁等城。歼蒋军整编三十师之六十七旅和阎晋军第六十一军等部，共 2.21 万人。使吕梁和晋西南解放区连成一片。

晋察冀边区，华北解放军向平汉线保定以南出击，连克定县、望都、新乐三城，控制保定以南、石家庄以北之平汉线百余公里地段，中断了蒋之南北交通。蒋军被歼者为 9600 余人。

东北地区，杜聿明欲行先南后北计划，进一步歼灭东北解放军，东北解放军则于 1947 年 1 月 5 日至 3 月 10 日间，举行三下江南（松花江）之役，于松南和吉林、长春以北地区，歼杜部七十一军之八十八师和新一军、新六军各一部，共 1.5 万余人。2 月 5 日至 4 月 3 日间，东北解放军在辽东临江、

[①] 王耀武：《济南战役的回忆》，见《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八辑，第 2 页。

[②] 亦云 1 月 24 日至 2 月 4 日间。

通化地区又进行了四保临江战役，歼杜部之十三军第八十九师、五十二军、六十军各一部，共 19800 余人，粉碎了杜聿明先南后北之作战计划。

经过 1946 年 11 月至 1947 年 2～3 月间的各战场的激战（共 80 余次），蒋军被歼达 414900 余人。中共则放弃 87 座城市，同时又解放 87 座城市。加上 1946 年 7 月以来（共经 8 个月作战）蒋军被歼者共达 71 万人。至 1947 年 2 月，蒋军放在第一线的攻击兵力已从原来 117 个旅，减少为 65 个旅。而用于战争中的全部总兵力，则自 193 个旅增长为 219 个旅。这说明守城固定兵力大增，战局转为被动。

宋子文于 1947 年 3 月 1 日，辞去行政院长一职，蒋介石又兼任该职。国民党于 3 月 15 日召开六届三中全会，以实施训政为口实，公布对中共之“讨伐令”。同日，蒋为分开晋冀鲁豫解放区，使黄河改归山东故道，以当几十万大军使用。

重点进攻的失败

1947 年 3 月，蒋因兵力损失严重，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命顾祝同指挥汤恩伯、欧震、王敬久 3 个兵团和王耀武、冯治安两个绥靖区，共 60 个旅，45 万人，向山东解放区重点进攻。

胡宗南指挥 15 个旅，约 14 万人，加上宁夏、青海、榆林各地方军队，共 34 个旅，23 万人，向陕甘宁边区重点进攻。其他战场则转为守势。

△山东战场

1947 年 4 月 19 日至 29 日，是该战场之第一期会战。蒋介石采用老虎捕食办法，向中共猛扑过来。

蒋介石于 4 月 6 日命汤恩伯、王敬久、欧震 3 个兵团，13 个整编师，共 25.5 万余人，沿临沂至泰安线北上（4 月 18 日，国民政府改组，蒋介石连任国民政府主席，张群任行政院长，孙科任立法院长）。

三兵团于 4 月 19 日北上新泰、蒙阴地区，欲将华东解放军围歼于沂蒙山区。华东解放军由司令员陈毅，指挥三、四、六、七、九快速纵队和鲁中军区直属等部队，共约 16 万人，先以一部于正面节节阻击，主力则分向敌阵线之两翼顶端反击。4 月 26 日，一举攻克泰安，歼敌整编七十二师，共 2．4 万余人。继插入敌人后方，于 4 月 29 日，收复津浦路以西之宁阳。同时，以主力攻击临沂、蒙阴公路线敌后，歼敌整编八十三师一部。

此次战斗结束后，据国民党资料记录：解放军伤亡为万余人，蒋第一兵团、第一纵队伤 1370 余人，伤亡官员 127 名，解放军战绩纪录为歼敌一个半团，相差不多。

此后，蒋又欲消灭华东解放军于胶东地区，遂于 1947 年 5 月 11 日，命第一兵团复由临沂、泰安一线，分三路北上，欲压迫华东解放军退向胶东地区而围歼之。鲁中第二期会战开始。

华东解放军乃集中全部主力，于 5 月 14 日黄昏选择汤恩伯第一兵团最突出于蒙阴以东之整编七十四师，进行猛烈围攻。16 日拂晓占领半山腰，并获得敌人粮弹十分之九。至午间，张灵甫仅余孟良崮、芦山、620 高地三点。16 日下午 4 时，七十四师师部仅余一孟良崮山顶。双方相距数 10 公尺，复

经激烈格斗，下午 6 时许，七十四师全部被歼。师长张灵甫自杀，副师长、旅长被击毙。

此役，解放军歼敌共 3.2 万余人，战果辉煌。解放军伤亡 1.2 万人。

整编七十四师，为蒋五大主力之一，其余四大主力为第五军、整编第十一师（均在山东）、新一军、新六军（均在东北）。故当七十四师被围时，蒋介石亲自过问，屡次强令其他各部队，如整编第四十八、第七军一七二师、第二十五军和李天霞整编第八十三师增援，均被解放军阻击而不能前进。尤其李天霞之八十三师，更不听蒋介石命令，不派军到沂水西岸支援张灵甫。张临死前向蒋介石控告了李见死不救的罪状。张死后，蒋大张旗鼓地宣传张灵甫，召开追悼大会，将一艘美援炮舰改为“灵甫号”。同时将李天霞押解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由军法处审判，但李天霞钱多，花几十根金条后，被宣告无罪。半年后，又任第七十三军军长。

经此教训后，蒋又令顾祝同以 32 个旅、24 万人，于 6 月 24 日，发动鲁中第三期会战。

6 月 25 日，蒋介石通过国民政府最高法院检查署下达“平字第一九〇六号训令”，“通缉”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

第三期会战，自 6 月 24 日至 8 月初。华东解放军（陈毅）第一、二、三、四，五、六、八、九、十、十四纵队和暂骑师等部，共 18 万人。蒋之徐州司令部军为一、二、三兵团和原来两个绥靖区。这次蒋采取齐头并进之密集平推战术，以免突出部位被吃掉。

以 18 个旅于莱（芜）、蒙（阴）线齐头并进，15 天前进不足百里。

解放军则分兵两路，自其间隙中猛插敌后，连克费城、枣庄，威胁徐州；再克泰安、大汶口、津浦路各地，孤立济南，蒋之三兵团扑空而回，战役结束。但华东解放军此次会战中亦损失 4 万余人。

△陕西和其他各地战场

1947 年 2 月 28 日，蒋介石偕空军副司令王叔铭飞抵西安，部署重点进攻陕北和延安军事战略，批准了胡宗南的作战计划。

3 月 12 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召开洛川军事会议，宣布军事计划。13 日，胡分两路向延安进攻：左兵团刘勘，由洛川，经牛武镇、清泉镇，向延安推进。总预备队为第七十六整编师两个旅；右兵团为董钊第一军，由宜川经南泥湾、金盆湾向延安推进。

19 日，胡宗南部进驻延安。蒋亦曾密到延安视察，颇为得意。

此时毛泽东早已和周恩来远走陕北山区，等待时机，歼灭进犯之敌。这时陕北解放军，约为 2.5 万人左右，无力硬拼，便采取伏击战策略，逐次消耗、歼灭敌人。经蟠龙、羊马河等战役，击破胡宗南进攻计划。

东北：自 1947 年春四保临江战役后，解放军又发动 5 月攻势。歼敌 8.3 万余人，克城 40 余座，蒋之军队，开始被分割包围于大城市地区。7 月 1 日战役结束。8 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离职赴沪。

晋察冀地区：自 1947 年 4 月 8 日至 5 月 8 日，又歼蒋军 3.5 万人。第三、三十三军各一部）。晋察冀解放军第二、三、四纵队切断了正大路，控制正太线 180 余里，使石家庄与太原中断联系，鲁冀、鲁豫解放区和晋察冀解放区连成一片。石家庄完全孤立。

6 月 12 日，晋察冀解放军又向津浦线攻击。至 15 日，歼蒋军 9500 余人，解放青县、沧县，控制津浦线团河至陈官屯段 74 公里铁路线。6 月 25～28 日，解放军又出击平汉线保定以北之线，蒋之第十六、九十四军各一部约 7200 余人被歼，使蒋无法将河北军队增援东北和晋冀鲁豫战场。

晋西南：自 4 月 5 日至 5 月上旬，胡宗南部和阎锡山部被歼 1.7 万余人，丧失 22 座县城，中共控制同蒲路赵曲镇至风陵渡 200 余公里段，将晋西南胡宗南残部压人运城、安邑、夏县几个孤立据点，解放了晋西南广大地区。

晋冀鲁豫地区：自 1947 年 3 月 23 日至 5 月 1 日，刘、邓中原解放军，攻击豫北蒋介石之第二快速纵队、暂编第三纵队等部，解放封丘、延津、原武、汤阴等 9 座县城和广大农村，并控制丰乐以南平汉线百余公里。蒋之该部军队退守新乡、郑州、开封、菏泽几个孤立点，不敢出战。

至此，各解放区和各战场之蒋军，均被挤入大中城市。蒋欲围歼解放军，却因失败退入孤城，重点进攻终告失败。

经过一年的作战，蒋军被歼者，正规军 78 万人，非正规军 30 余万人，共 112 万人。解放军约伤亡 30 余万人。

1946 年 7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为 120 余万人，蒋之军队为 430 万人。一年后（1947 年 6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增长为 195 万人，正规军百余万人。而蒋介石之军队则减少到 373 万人，其正规军降为 150 万人。

从 7 月至 9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展开全面反攻，由内线作战转向外线作战。这时中共仍采取以集中优势兵力，不失时机地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但对于敌占城市，则有三种方法：守备薄弱者，坚决夺取之；中等程度守备者，相机夺取之；守备强固者，等条件成熟后夺取之。也就是先打分散、孤立之敌，蒋经国这时对战局也极为关注，他建议组织“实验绥靖区”，组织“勘乱建国义勇队”，荷枪实弹守卫村庄，断绝中共军队兵员和粮食供给。

这时蒋之后方军队愈加减少。后方 13 个省中，仅有部队 21 个旅。而湘、桂、黔、闽、浙，则几乎没有正规军。后方空虚殊甚，几乎没有第二线部队。蒋之后方人民因深受通货膨胀之苦，民变迭起；中共游击队则迅速发展起来；民主党派和学生、知识分子及广大人民又掀起反内战、反饥饿运动。

同时，蒋介石的兵役制也无法实行，又改为抓兵制，乡民则用钱买兵，有的青年人甚至刺瞎眼睛，或自残肢体逃避当兵。修造碉堡被征用的民工要自带粮食，也不给工线。民怨沸腾。

尤其是征粮，更是竭泽而渔；大官僚们又把征粮卖掉，换成美元存入国外，民脂民膏尽入私人腰包，民无衣食，军无储备。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中共解放区经过一年多土地改革，则人民生活改善，广大农民青年踊跃参军，积极作战，上下一体，士气旺盛。因此，解放军战则必胜。

刘邓大军南下

刘伯承、邓小平之晋冀鲁豫解放军 10 余个纵队，于 1947 年 6 月 30 日，自鲁西南抢渡黄河，南下大别山，转入外线作战。从这一天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转向战略反攻。

蒋介石于 7 月 4 日急忙主持国务会议，通过实施《全国总动员案》，同时说明，为“拯救”人民，巩固国家统一，消灭中共，按期实行宪政，必须

全国总动员。5 日，发布“ 剿共勘乱令 ”。

7 月 28 日，数万俄、蒙联军侵犯新疆塔山地区。蒋命郭歧五十五师 7000 余众协同乌斯满 3000 保安骑兵，奋力抗击，血战 15 昼夜，郭歧负重伤，所部全体阵亡。乌斯满率骑兵，采取诱敌深入战术，歼俄、蒙联军 2000 余众，俄、蒙联军仓惶撤逃。

刘、邓大军原在河南。于 1947 年 3 月 23 日向豫北进攻，连克延津、阳武、濮阳、封丘数城后，4 月 17 日，于浚县歼敌第一纵队，活捉司令李守正等。继歼汤阴孙殿英纵队，克浚县、滑县、淇县等城，在安阳休整两个月。6 月下旬，渡黄河北上，进驻鲁西南阳谷、寿张、范县、濮县。6 月 30 日夜，又突然南渡黄河，转下豫皖直指大别山区。

刘、邓大军渡过黄河后，蒋介石还以为刘、邓是于黄河北岸“ 立足不定，被迫流窜 ”，不予理会，仍重点进攻山东。刘邓大军便乘机向菏泽、郓城、金乡、钜野、定陶、曹县等地之敌发动进攻。于 7 月一个月中，歼蒋之整编五十五、三十二、六十六、七十、六十三各师，共 9 个半旅，5.6 万余人。俘获六十六师师长宋瑞珂，七十师师长陈颐鼎和五十五师副师长理亚明等。这次战役中，蒋曾于 7 月 5 日，给整编六十六师师长宋瑞珂打电报曰：“ ……

吾信上帝，必佑吾弟完成任务。 ”宋接电报极为反感，深感他对部下不负责任[①]。

从此，黄河南北解放区连成一片。

7 月 11 日，美国又派魏德迈将军率访华使团来中国，22 日抵南京，协助蒋介石挽救危局。并决定美国在华军事顾问团参加蒋介石国防部各项工作，直接指挥蒋军作战。又另派大批顾问、专家，监视蒋之国民政府各部门工作。8 月 24 日，魏德迈离华返美。

9 月 19 日提出访华报告，建议五大国监护满洲（东北），或者由联合国托管。对于蒋介石，他仍主张继续扩大军事和经济援助，同时考虑寻找新领袖。杜鲁门采纳了增加美援建议。

从此，美国进一步涉足中国内战。

刘邓大军于 1947 年 8 月 11 日跨过陇海线后，经过激战冲过黄泛区、颍河、沙河、淇河。汝河、淮河等一道道防线，于 8 月 27 日，到达大别山，开辟新解放区。至 9 月底，歼各县国民党保安团队和正规军一部，共 8800 余人。

10 月 9 日至 27 日，歼敌 22600 余人。建立了金家寨、潜山、太湖、朱屋庙、望江、宿松、黄梅、广济、浠水等 33 民主县政权，于武汉至南京之间，插进一把钢刀，把陕北和山东蒋军，拦腰砍断。

刘伯承比喻山东为蒋军之头，陕北为蒋军之足，而刘、邓大军进据中原后，则把敌人拦腰砍断。邓小平则比喻山东和陕北为哑铃的两个铁锤，中原地区为铃把，此举正好把铃把砍断，使敌首尾不能相顾。[②]

陈赓、谢富治兵团（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于 8 月 23 日也由山西省南部渡过黄河，挺进豫西，与刘、邓大军相呼应，对陇海线蒋军展开攻击。

10 月 13 日，歼武庭麟等师若干旅，共 3.1 万人，割断蒋军潼关至洛阳间的联系。至 11 月下旬，歼整编十五师残部，活捉师长武庭麟，建立豫西 10 余个县解放区，孤立洛阳，威胁潼关。

[①] 宋瑞珂：《鲁西南羊山集战役蒋军被歼记》，见《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八辑，第 37 页。

[②] 《解放战争回忆录》，第 135 页。

华东野战军自 9 月 7 日至 9 日于菏泽沙土集歼蒋军整编五十七师两个旅，共 9500 余人。9 月至 11 月歼敌数万人，打断徐州至兰封路段，恢复并发展了豫皖苏解放区，孤立了开封和郑州之敌。

10 月，李先念部解放军亦进入大别山区。

1947 年 11 月 7 日，蒋以虞电命令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所，派白崇禧部长坐镇九江，进行统一指挥五省辖区作战，并指导豫皖赣湘鄂五省省政府和该省之保安部队。其任务是“彻底勘平津浦路以西，长江以北，平汉路以东，淮河以南大别山区匪乱，巩固治安”。[①]

同时派江防舰队协助作战，封锁长江。主要力量是第五绥区和第八绥区部队和张涂第三兵团、张镇首都卫戍司令部、直辖部队等，约 20 余万人。刘、邓大军此时为一、二、三、六、十、十二等 6 个纵队，共 20 个旅、9.1 万余人，兵力相差悬殊。

11 月 27 日开始作战。刘、邓歼敌 4.1 万余人。

12 月中下旬，刘、邓命主力一部越过平汉线，突围西进，开辟桐柏、江汉两解放区。

同时，陈毅、粟裕大军和陈、谢兵团联合进攻，出击陇海线民权至砀山段，平汉线新郑至确山段。12 月一个月中，歼敌 4.5 万余人。迫使白崇禧分兵北援。

12 月底，刘邓和陈粟、陈谢兵团共三大力量，会师于平汉线遂平、西平地区，然后攻击许昌、漯河蒋军补给站。从此以后，鄂豫皖解放区和豫皖苏、豫西两个解放区连成一片。而此三大力量便于中原地区成为鼎足，割断南京和西北、鄂北、华北蒋军的联系，威胁南京和武汉。蒋的此次围攻又失败了。

这三大力量自 9 月至 12 月共歼蒋军 19.5 万余人，解放 100 座县城，创立了江淮河汉解放区。将蒋之南京至武汉地区的头和腹部之间砍断。此次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为解放军进行全面反攻打胜了前锋战。

中共其他各战场的反攻

由于陈谢兵团自 8 月 23 日于晋南渡河南下，胡宗南深怕潼关失守，便急令刘勘二十九军南撤。9 月，西北解放军在彭德怀指挥下追歼刘部，于 10 月、11 月间，共歼敌万余人。

华东解放军许世友、谭震林兵团（胶东地区）也于陈、粟主力部队自沂蒙山区转攻苏皖之敌时，展开反攻，自 9 月至 12 月底，收复胶东莱阳、平度、掖县、棲霞、黄县、蓬莱、牟平、高密、胶县等城，共歼敌 6 万余人。

华东解放军苏北兵团，从 8 月至 12 月歼敌 24700 余人，收复苏北解放区。

晋察冀野战军，于 9 月积极展开攻势。于 9 月之日至 23 日，歼敌 5000 余人。

10 月 10 日至 26 日，该野战军向保定南北夹击。蒋命罗历戎第三军增援保定。罗军于清风店地区被歼，加上其他部队，此次共歼敌 17200 余人。第三军军长罗历戎被俘。华北解放军旋于 11 月 6 日至 12 日一举攻克石家庄，首开攻坚战纪录，全歼第三军之第三十二师和其他部队共 24200 余人，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

[①] 《汇编》，第四辑，第二十册，第 9667—2 页。

12 月 27 日至 28 日，晋察冀解放军太岳部和西北解放军一部，攻克运城，肃清晋南之敌。歼敌 13000 余人。

东北解放军，于 9 月 15 日至 n 月 3 日开始了大规模的秋季攻势。歼敌 69700 余人，收复城市 15 座。蒋介石的东北精锐之师，至此已完全孤处于锦州、营口、沈阳、四平、吉林、长春等各大、中城市地区，互不相连。

蒋介石的整个部署已经完全被分割得支离破碎，成为片片孤岛。西北胡宗南，除和四川相联外，已和中原、华北、东北完全分割开；阎锡山则被围在山西中、北部；东北和华北之间也因山海关至锦州各段中断而被分开。华北傅作义部则孤守平、津市区。徐州至平津间，仅余济南等孤城。徐州至南京间交通也在受威胁之中。

自 1947 年 7 月至 12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内外线配合作战，共歼蒋介石之军队 75 万余人，迫蒋改用分区防御方针。

1948 年 1 月，蒋将作战地区分为 20 个绥区，每个绥区辖 3～ 5 个旅兵力，约 3～5 万人，绥区设司令官，掌握绥区军、政大权，实行“ 组训民众 ”制度，以扩大地方武装和补充兵力之不足。将兵力集中于战略要点和交通线上；并特别要加强中原地区兵力，阻止解放军向南发展，将孤立的城市兵力撤出，集中兵力于更为重要的大点或主线上，蒋称之为“ 总体战 ”。

这时蒋介石已由重点进攻转变为重点防御了。两军相争中，蒋已成为劣势一方。

李宗仁竞选副总统

国民党和青年党等召集的国民大会，不顾中共和民盟的反对，于 1946 年 11 月 15 日开幕，并制定了“ 宪法 ”。翌年 1 月 1 日，蒋又宣布尽快选举总统、副总统，“ 还政于民 ”。

继之，蒋发动了对中共的全面内战。到 1947 年 7 月，蒋的各战场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中国人民解放军则转向外线作战的全面反攻阶段。此时。美国眼看蒋要输掉这场战争，便急派特使魏德迈，于 7 月 22 日抵南京。

魏经调查后，对蒋介石失去信心，认为蒋的政府贪污无能，麻木不仁，如要使中国复兴，必待富有感召力的领袖出现。8 月初，魏又到北平和李宗仁会见，征求李对复兴中国的意见。李认为美国首先应当帮助稳定物价，军援放在其次。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则于 9 月 8 日向美国国务院表示，应以李宗仁取代蒋介石为宜。在这个情况下，美国总统杜鲁门，支持李宗仁于 1948 年竞选副总统。

这时，国内军事对蒋很不利，广大人民、知识分子也对蒋不满，反蒋的情绪日益增长。对此蒋不能不考虑安抚的问题。

美国的不信任和对他独裁、腐败政治的批评，则对他有更大震慑力量。于此内外交困的滔滔巨浪中，蒋氏的国民政府之舟，大有翻船之险，他于是在 1947 年 12 月 25 日宣布于 1948 年 3 月 29 日召开国民大会，正式行宪，选举正、副总统，“ 还政于民 ”。

李宗仁则想在美国支持下，竞选副总统，以实现他的民主改革，他认为他上台后，会一呼百应，全国改观，以挽救国民党的危局。

而桂系的其他人物，白崇禧，黄旭初，乃至其低一级的桂系人物，对此并不乐观。所以大家都反对他参加竞选。但李却以为有美国支持，可以战胜

蒋介石，所以一心要参加竞选。

当时任国防部长的白崇禧和任广西省主席的黄旭初，一致反对他参加竞选，他们怕困李竞选，造成蒋、桂（桂系）之间的严重磨擦，他们夹在当中不好处，白更怕丢掉自己的部长职务，便怂恿李竞选监察院长，避开与蒋的正面冲突。李宗仁则坚持竞选副总统，并充满信心。

李宗仁向蒋介石公开表示希望“本党党员自由竞选”，并向蒋介石和美大使司徒雷登表示了参加竞选的心愿。但蒋介石对李宗仁参加竞选一事，直至 1948 年 3 月上旬也无什么表示。而李则以为是蒋默认了。李便在北平召开记者招待会，发表竞选副总统正式谈话。在南京成立了竞选事务委员会，由邱昌渭主持。当时，中外对李参加竞选基本上抱乐观态度。胡适也致信李宗仁，表示祝贺。

此外参加竞选的还有程潜、于右任、莫德惠。

李宗仁于 3 月 22 日离平赴沪，到机场迎接的不下数千人，表示了人们对李的支持。李到上海后，下榻励志社。第二天举行盛大记者招待会。李对新闻界的踊跃报道很是得意，以为是个好兆头。晚上 11 时，李乘车赴南京。次日，国大代表等访问李宗仁者，更是络绎不绝。

但蒋介石并不同意李宗仁参加竞选，只是暂时不吭声。至 25 日李宗仁见蒋介石时，蒋仍未表示不同意见。李以为蒋己同意，便又去访问孙科。孙表示无意参加。

临近选举时，蒋介石忽然露出了庐山真面目，他先开中央执委会临时会议，想用元老们劝阻李宗仁放弃参加竞选，以免总裁和副总裁发生磨擦。但李宗仁坚决不接受，执意参加竞选。蒋无可奈何，便于 4 月 3 日，单独召见李宗仁，要李放弃竞选。李则据理力争，并对蒋说，你已经表示可以自由竞选，现在木已成舟，就很难从命了。

蒋介石则说：“你还是自动放弃的好，你必须放弃！”

李沉默片刻后回答：“委员长，这事很难办呀！”

蒋说：“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

这一句话使李宗仁很恼火，立即反驳道：“这倒很难说！”蒋紧跟一句：“你一定选不到。”李宗仁也不示弱，也接上一句：“你看吧！我可能选得到！”

这一下气得蒋介石半天没说话。李见此情况，便进一步对蒋说明他是天时、地利、人和都有，纵使蒋不支持他，他也会当选的。这时，蒋忍不住“霍”地站起来就走开了，口中还连说：“你一定选不到，你一定选不到！”李宗仁也站起来说：“委员长，我一定选得到！”蒋气得在室内团团转，一个劲儿地吐气。蒋李舌战，不欢而散。

蒋介石迫李宗仁退出竞选的事，不久就传了出来，国大代

中多有不平者。有一次蒋介石参加国民大会时，代表们对他很不尊敬，一片乱嘈嘈的声音，蒋便叫大家“肃静”，代表们不但不听，还反唇相讥，使蒋甚是难堪。会后蒋召集黄埔系重要干部会议，在会上他声言李宗仁参加竞选，就如一把匕首插入他的心脏，要大家效忠他。

蒋于 4 月 4 日召开中常会全会，讨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问题。蒋介石在会上首先发言，主张副总统应由党外人士提名候选人，目的是阻止李宗仁参加竞选。他又说自己不愿当总统，宁愿当行政院长。他说完话就走了。人们于是议论纷纷，甚至有人主张由胡适来当总统。会上讨论结果，仍一致推

蒋为总统候选人。当时陈布雷即打电话将此决议告诉蒋介石。蒋仍表态坚持不当总统。

次日上午 9 时，继续开会于丁家桥中央党部。会上两种不同意见相持不下。张群说：蒋并不是不想当总统，而是根据宪法，是一位虚位的元首，所以他不愿当这个有职无权的总统。如果能想一个办法，赋予他紧急处置权力，他是会当总统的。于是会议又推张群、陈立夫、陈布雷三人前往劝驾，说明如蒋愿当总统，可以往宪法上另订条款，赋予他必要的权力。

蒋听后马上同意当总统候选人了。这样看来，“还政于民”不过是蒋的骗人空话而已。同日下午 4 时，张群即向中常会宣布蒋已同意的消息。中常会即通过总统紧急处置权的议案，4 月 18 日，通过了《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6 日的会议上，又通过了本届总统、副总统不由党提名的决议。蒋对此不由党提名，很不乐意，在总理纪念周上竟大骂不受党约束的人。

蒋为打败李宗仁，又拉孙科参加竞选，并全力支持，造成浩大声势。

蒋介石于 4 月 19 日，以 2430 票当选为总统。废票 35 张。居正陪选，得票 269 张。其中也有人于蒋的名字上打×，甚至有人干脆写孙中山。

副总统投票，于 4 月 23 日进行。第一次投票，李宗仁以 754 票领选；孙科以 559 票居第二位；第三为程潜；第四为于右任；第五为莫德惠；第六为徐傅霖。

这次因无人到达法定票数，24 日再行第二次选举。李宗仁票数增至 1163 票，孙科才 945 票。竞选至此，已达高潮。

孙科的支持者，在后台的支持下，竟动用了党部、同学会、政府机关、宪兵、警察、中统、军统等一切团体部门的力量，对国大代表实行威逼利诱手段，甚至三更半夜，还到“代表”家中“访问”，向其说明蒋介石的意思，从蒋意者有官有钱；违背蒋意者，就自毁前途。国大代表们不堪其迫，怨声载道，议论纷纷！

李宗仁对此情况，深感愤慨！便于 24 日召集自己的助选团开会讨论对策。大家均认为蒋如此做法，“迹近下流”，实不可忍，李宗仁主张不去管它，反正当选有把握了。但黄绍竑却不以为然，他说事情恐不那么简单，这样闹下去，或者会出血案，李如退出，孙科、程潜为表示清白，也必宣布退出，则蒋的闹剧便会失败。

第二天，李宗仁便以此次选举不民主，幕后压力太大为理由，声明退出竞选。李一宣布，舆论大哗，支持李宗仁的国大代表，无不义愤填膺；尤其是东北代表更宣称，孙科即使当选，也无面目见人。

孙科也于 26 日宣布退出竞选；程潜也接着宣布退出。这样一来，蒋的幕后操纵和破坏完全失败。

蒋不得已，又软了下来，于 25 日召开中常会，派人劝各候选人恢复竞选。但毫无效果。蒋便又找来白崇禧，请他劝说李宗仁恢复竞选。他对白说：北伐和抗战全赖“你和德邻的帮助而到最后胜利。今天这个局面，仍需要你们两位支持。希望你劝促德邻重新参加竞选，我一定全力支持他。”白回来后说蒋的态度是可信的，应当恢复竞选。李沉吟了一下，终于答应了。但黄绍竑心中有数，只望着天花板笑而不语。蒋既已表示退让，李宗仁又同意恢复竞选。于是 28 日，国大继续投票。第三次投票，李宗仁以 1156 票压倒了孙科的 1040 票，程潜为 515 票。

程因票数太少，退出竞选。最后是李宗仁和孙科较量。这时，李宗仁因

被视为革新派代表，凡对蒋不满的人，均而支持李。

29 日举行第四次投票，李宗仁得 1438 票，孙科为 1295 票。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

在此次投票时，蒋介石在官邸屏息静听电台广播，并且用收音机随时听取会场报告。当收音机中传出李宗仁当选声音时，蒋竟于盛怒之下，将收音机踢翻，气喘如牛，拿起手杖和披风命令备车。蒋上车后一言不发，当司机问往哪里开时，仍不作声。司机知他烦闷时爱去中山陵，便向中山陵开去。刚到陵园门口，蒋又高叫“掉转头！掉转头！”司机又将车开回官邸。蒋刚下车又上了车，再令开车出去，侍卫见此情景，又加派车辆随行。车刚进入陵园，蒋又令司机开往汤山去。

当时李宗仁对此毫无所知，竟于 26 日带着夫人郭德洁，去黄埔路蒋的官邸拜见蒋氏，表示谢意！结果李宗仁夫妇在会客室等了半个小时，蒋氏夫妇才姗姗而来，自然各自表情都十分的不自然，李遂寒喧数语告辞。

国民代表大会于 5 月 1 日闭幕时，蒋又发表演说：“今后政府一切措施，必须遵守宪法，而求达民有、民治、民享之最大目的。”

又说这是“继往开来，在历史上实划时代之创举”。

5 月 8 日召开实行宪政后的第一次立法委员会议，讨论行政院长的人选问题。中午，蒋也于自己的官邸召集 CC、政学和黄埔等系的中常委、立法委员骨干分子陈立夫、张道藩、谷正鼎、赖琏、吴铁城、王启江、刘健群、黄宇人、倪文亚、白瑜等，举行午餐会。就行政院人选问题，蒋不禁又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应就张群和何应钦两人之中选择一人担任。但黄宇人却问蒋：“何以不提胡适之？”蒋则面色一沉说“书生不能办事”。而赖琏却说：

“我赞成何敬之（何应钦字）先生。”这又不合蒋的本意！于是又说何应钦要负责军事。这就是说，蒋介石要张群任行政院长。并要立委们在此人选问题上受党的约束，即依他的意旨行事。随后，蒋宣布说：“赞成张岳军（张群字）同志的请起立！”在坐的人照例都站了起来。

同时，蒋又提孙科任立法院院长，陈立夫任副院长。大家对孙科一致同意，但对陈立夫，黄宇人（黄埔系）、王启江（朱家骅系）和汤如炎则坚决反对。蒋对黄宇人不听话尤其震怒，正欲发作，宋美龄赶紧扯开了话题。

同时，李宗仁也组织活动，组织一部分反对陈立夫的立法委员，于新街口一家银行的二楼上开午餐会，相约选傅斯年为立法院副院长，与陈立夫抗衡，美国合众社记者也在场旁听，从此以后，每隔一两天就举行一次，费用由李宗仁手下的邱昌渭支付。有一次邱欠了款，等送回欠款要欠单时，欠单却被送到蒋介石手上，蒋、李斗争进一步激烈起来。

5 月 17 日，举行第一届立法院第一次会议，孙科、陈立夫当选为正、副院长，在这一斗争中，李宗仁失败，立法院由蒋的亲信人物掌握。

总统、副总统就职时间，选在 5 月 20 日。这一天南京各机关学校一律放假，通衢大道上，张灯结彩，爆竹喧天；总统府尤其是灯火辉煌。整个南京，似乎已经忘了各个战场的溃败和军事形势的“逆转”，悠悠的丧钟，似乎一点也未听到。

举行就职大典时，蒋介石穿一身长袍马褂，而李宗仁却穿一身军服，很不相当，李顿时深感不快，但一想到他事前就穿着问题请示过蒋介石，蒋却先叫他穿西服，后又叫他穿日常军服的事，颇为愤怒，索性昂首挺胸，不以为意了。他心里却在想，这明明是蒋介石以一国之尊的元首在有意捉弄他，

与其说叫他难堪，毋宁是使蒋自己难堪！他希望史家勿忘此笔。但李宗仁也太愚鲁和忠厚了，穿什么衣服，照自己理解的去穿就是，何必事事要请示蒋呢？！这也足见李还不能摆脱蒋的影响。

第二天，蒋为使张群出任行政院院长，又召集国民党籍立法委员们在丁家桥中央党部开谈话会。会上蒋提出由张群出任行政院院长，要大家在立法院表决时投票赞成。蒋说完却先行离去，由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主持开会。

CC 派立委一致提议当即用假投票方式先行投票表决，供蒋参考，意在反对张群组阁。投票结果，何应钦得票最多。张群见事不妙，当晚离开南京到上海散心去了。但何应钦也不敢当行政院长。蒋的意见，CC 派不买账，其他立委也不买账，蒋自然恼恨 CC 和陈氏兄弟，蒋陈矛盾，从此开始加深了。

蒋碰了壁，无可奈何之下，又提名翁文灏组阁，由立法院通过。翁干了 6 个月，于 11 月 26 日辞职。12 月 20 日又由孙科组阁。

此后，经蒋介石点头认可，国民党籍立委们又成立了“ 革新俱乐部 ”和“ 新政俱乐部 ”两大俱乐部。还有“ 民主自由社 ”、“ 一 · 四座谈会 ”，亦属“ 新政俱乐部 ”一派。

此后，蒋对桂系和李宗仁进行了报复。首先免去白崇禧的国防部长，由何应钦继任。结果白的夫人马佩璋非常生气。一天，马夫人板着面孔对程思远说：“ 思远，你同邱毅吾（邱昌渭）做了一桩好事，把德公选为副总统，而把我们健生拉下台了。 ”5 月 31 日，正式委任何为国防部长。白崇禧被任命为华中“ 剿总 ”总司令，派驻武汉。蒋的手法是将李、白两人必须分开，不使合住一地。白任国防部长时，其实有职无权，连黄埔路蒋之官邸的汇报会议，也不能参加，备受蒋的冷遇，心里十分的不痛快，为此常发牢骚。

此次蒋放逐他，他便乘机提出守江必守淮的建议，欲设“ 剿总 ”于蚌埠，以保卫南京。蒋当然不会同意，并说徐州将成立另一个“ 剿总 ”，令白改驻武汉，只指挥江北上游部队。白则认为中原地区不应成两个战区，否则，在危机时不能首尾相顾，难以守住江淮地区。但蒋完全不纳白的意见，6 月 6 日就明令发表白的任命。白一气之下跑到上海，不接受任命。

不几天，蒋就派吴忠信到上海劝白接受新的任命，白不为所动，又叫黄绍竑再到上海促驾。黄说白太不明白了。他说白在南京不过是笼中之鸟，毫无权力，不如乘此机会在武汉固结实力，将广西军队抓在手中，静观大势，然后迫蒋下台，让李宗仁上台，再开创新的局面，岂不一举数利吗？白一听有理，遂动身回南京接受任命。6 月 28 日在汉口建立华中“ 剿总 ”，将守江必守淮论暂时放弃，开始经营华中。这时，桂系迫蒋下台的军事形势开始形成，只待时机到来。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于何应钦任国防部长后，曾要求蒋介石在作战部署上，让何应钦与美国军事顾问团巴大维密切合作，意欲使巴大维和何应钦有实际指挥权。蒋口头上照例答应，但并不兑现，一切实际指挥权全归参谋总长顾祝同。司徒雷登见自己受了骗，赶快于 8 月 22 日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这个情况，说明巴大维在执行任务中遇到最严重的困难。杜鲁门对蒋更加反感，把蒋换下台的想法也更加坚定。至 10 月 23 日，即锦州、长春解放以后数日，司徒雷登向马歇尔国务卿提出五项建议。其中第二项，就是建议让蒋介石退休，让位于李宗仁。但马歇尔没有同意，司徒雷登却悄悄地开始了促进和谈和逼蒋下台的活动了。

在司徒雷登向美国报告的前一日，何应钦因感到辽沈战役将要结束，淮

海地区会战将很快到来，便召开军事会议，有参谋总长顾祝同、次长刘斐、萧毅肃、第三厅厅长郭汝瑰等参加。会中研究了白崇禧的守江必守淮的计划，议决由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徐州两个“剿总”，集中兵力，保卫南京。

计划决定后，由郭汝瑰于 23 日到北平送蒋介石核定。蒋介石说就叫白指挥吧！第二天，何即将此决议电告白崇禧。廖耀湘兵团被歼后，蒋于 10 月 30 日飞回南京，白于当日下午也自汉口飞抵南京参加何应钦召开的中原作战会议。当时白已答应统一指挥两“剿总”。但第二天再开会时，白却突然变卦，坚决不接受了。

白崇禧为什么在一夜之间，有如此大的变化呢？原因是他认为淮海决战的前途不乐观，统一指挥难以取胜。再者，他此时已不愿再为蒋效命，因为老蒋总不信任他，常给小鞋穿；如欲倒蒋，正在此时，不如在武汉静观天下大势为妙。

结果，蒋又命杜幸明再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指挥淮海大战。

淮海战役于 11 月 6 日全面开始。至 11 月 22 日，黄伯韬兵团被全歼。蒋令白崇禧派兵增援，白不肯。后来顾祝同亲自去要，白才放宋希濂兵团的二十军、二十八军。当再调第二军时，白坚决不肯，蒋、白二人在电话上吵起来。

李宗仁自当副总统后，便辞去北平行辕主任一职，长驻南京，但和行辕主任一样清闲，凡军国大事的会议，蒋均不请李参加，乃至招待国际友人宴会，也不被邀请。李在京沪地区游山玩水，倒也清闲自在，但如要返回广西桂林故里，蒋却不允许。李宗仁胞兄死后，李向蒋总统请假回广西吊丧，蒋不准假，却笑着说：“嫂夫人很能干，让嫂夫人去料里好了。”李不得不慨叹，虽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却连奔丧之权利都没有，这种副总统，真不啻囚犯。至于他的民主改革宏愿，则只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三大战役

在广大民众的积极支持和援助下，经过 1946 年至 1947 年秋的各战场激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内线作战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1947 年 7 月至 9 月，解放军由内线作战转向外线作战，将战场引 向了国民党统治地区，进入了全面反攻阶段。

1947 年下半年，蒋的军队在各地区被逼人狭小的大、中城市地区，或战略要地，成了片片孤岛。

根据这种情况，1948 年春，蒋介石由全面防御转变为分区防御，于全国设立 20 个绥靖区。主要防御重点是战略要地和主要交通线。对此部署，蒋称之为“总体战”。

基于这个防御体系的特点，蒋已经把主力由分散转到集中，而且重点集中到战略要地和主要交通线。最后的国共决战，势必是在这些战略要地。

这种决战，对蒋氏已极为不利。因为他将主力收缩到几个地区和大城市后，处在广大乡村和人民的包围之中。首先粮草供应就大成问题。军队无食，何以为战？所以蒋的重点防御已是失败的序曲了。如果他能“早悟机缘”，而不打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则战争局面当又是不同。但蒋介石素来是视地如命，不肯主动放弃一城一地，虽然理论上他也主张不计一城一地得失，而重在杀伤敌人，但他认为自己力量强于对手时，就对大战略要地恋恋

不舍，不肯主动放弃，故而因小利而失大算之处，不胜枚举。

而中共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则与此相反，从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而放眼于整个战局和全国范围内实力的增长上，即在这个方面，毛泽东当时也远高于蒋介石。

战争至此，蒋已将棋局摆在几个点上等待决战。中共欲打败蒋氏，也就要考虑进行攻坚的三大战役了。

△辽沈战役

中共决定先于军事形势最有利，蒋军最早被包围在战略要地的东北，打辽沈战役。

辽沈战役自 1948 年 9 月开始。中共中央决定先打锦州。

蒋介石于同年 8 月初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采纳杜聿明建立“ 机动兵团 ”建议，于战略要地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决战，以扭转战局。蒋并将此重任交杜聿明具体实施。此时蒋想放弃东北，撤军华北。但至此时，蒋虽欲放弃东北，已不可能，已经走不脱了。故卫立煌坚持蒋派援军进驻东北，接应沈阳，再北上接出长春郑洞国部，然后再派军援锦，保持东北与华北的通路。但蒋不采纳卫的意见，于 10 月 2 日命卫撤出沈阳，援救锦州，并派顾祝同到沈阳监督卫执行援锦计划。但卫始终不愿执行，未能及时派出援军，更拒绝放弃沈阳。至于此时，蒋已指挥不动卫立煌了。

如果卫及早听蒋命放弃沈阳，无疑会增加辽西的军力，对东北解放军解放锦州是很不利的。在这个问题上，蒋比卫又高明一些。

毛泽东于 10 月 3 日（1948 年）电令东北解放军急攻锦州，并全歼援锦之敌。蒋派卫立煌援锦未能奏效，只有葫芦岛的东北兵团 9 个师，奉命及时出发援助锦州。10 日，东北兵团与解放军第四纵队在塔山地区遭遇。战斗十分激烈，东北兵团未能越过塔山地区。15 日晚，锦州解放。同日，蒋氏夫妇飞抵沈阳。

锦州解放的当天，蒋急命徐州“ 剿总 ”副总司令杜聿明飞赴东北视察。

16 日，蒋自沈阳飞回北平，电令卫立煌反攻锦州，卫不从。17 日，长春曾泽生率部起义。

18 日，郑洞国投诚，长春解放。同日上午，蒋自北平匆匆飞抵沈阳，力主自葫芦岛和辽西两面夹攻锦州，以便把东北的军队撤回关内。但卫立煌、杜聿明和“ 剿总 ”参谋长赵家骧均不同意蒋的这一策略。蒋此时已失去往日的威风，不得不令他们再研究研究看，即日又回北平。当日下午 2 时，蒋又电召卫、杜、赵到北平开会，傅作义（华北“ 剿总 ”总司令）也应召出席。

会议中，蒋介石和卫立煌意见仍然不能一致，并互不相让。蒋氏坚持放弃沈阳，“ 收复 ”锦州；卫则力主固守沈阳，以免军队出城后被全歼。蒋急得没办法，就问傅作义有何意见？傅则不置可否。此时蒋气得面红耳赤，不禁拍桌叫嚷起来，痛骂黄埔学生无用。杜聿明见此情景，便赶快献策附和蒋的意见。他说：如欲放弃东北，即应从营口撤军；或者以营口为后方，仍留一部守沈阳，而调主力军急攻锦州，如攻锦顺利，即可进而“ 收复 ”锦州；如攻锦州失败，即可再转自营口撤出东北的军队，也不算迟。

这个意见的后半部分是综合了蒋、卫意见而成的一个折衷方案。蒋采纳了后面的方案，而卫也无话可说，于是决定由杜执行。

19 日，明令改任杜聿明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协助卫指挥作战。这时，辽沈战役已完成第一个阶段。

第二阶段，是辽西歼灭战。自 1948 年 10 月 22 日至 28 日。

杜接任后，次日（20 日）返抵沈阳。下午 6 时传达口头命令。

令廖耀湘美械兵团，向大虎山、黑山前进，急攻锦州；命第五十二军守卫沈阳；五十二军夺营口。21 日，杜赴葫芦岛。23 日，杜指挥葫芦岛军队向塔山前进，欲两面夹攻锦州，一举而下。

但廖 22 日在进攻途中于大虎山、黑山遇到顽强阻击，经 4 日激战不能越过解放军第十纵队防线，迫不得已撤军营口时，则大虎山以南至营口路线已被解放军第八纵队切断，欲撤往营口已不可能。解放军第五、六纵队，又从新立屯南下，关上了廖兵团退回沈阳的大门。廖兵团奉命突围，回撤沈阳。这时葫芦岛的蒋军“东北兵团”，也受阻于塔山地区。26 日晨，廖兵团已被东北解放军分割包围于大虎山以东地区，欲逃而不能。解放军第一、二、三纵队会同第十纵队、第六纵队，自黑山正面向大虎山以东地区进击；第七、八纵队于长岗子、六间房地区堵截。

27 日，杜聿明急飞沈阳见卫立煌，两人急得团团转，束手无策，对撤军和死守沈阳，均已失去信心。

28 日晨，廖兵团 12 个美械师被全歼，廖也被活捉。当日中午，杜自沈阳飞抵葫芦岛。

30 日，杜奉蒋命再飞沈阳，但到沈阳上空时，沈阳飞机场已被解放军占领，杜又飞回北平。在机场上遇见身披黑斗蓬的蒋介石，正上飞机离平返宁，神情十分沮丧。杜于此时立刻请准蒋氏撤走营口部队后，即返葫芦岛。

11 月 2 日，卫立煌乘飞机逃离沈阳。同日沈阳解放。10 日，锦西、葫芦岛解放。辽沈战役全部结束。全歼蒋之军队 47 万余人（精锐 30 余万人），解放东北全境。

沈阳解放后，蒋氏感到华东也难于防守立足。因为济南泰安于同年 9 月早已解放，只余徐州北面门户，自感危险，遂于 11 月 3 日，决定放弃徐州，退守淮河南岸。何应钦等也均持此议。蒋便立即派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当日飞葫芦岛，向杜出示蒋的亲笔信和《徐蚌会战计划》，促杜受命，指挥“徐蚌战役”。杜虽同意此方案，但怕立即上任要负丢失徐州之责，便推说等葫芦岛撤军完毕后，再赴任所。10 日杜飞抵北平。在北平家中深感前途渺茫，不胜悲痛。但又自觉别无出路可寻，仍决心效忠蒋介石，受命指挥“徐州会战”。

辽沈战役前，杜曾受命力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总司令刘峙），负责指挥主动进攻华东和中原野战军，以及“收复”济南、泰安的战役。旋因锦州告急，杜调职东北而罢。这是杜第二次赴任徐州，但情况已与以前大不相同了。此时，蒋之军队已由 400 余万减为 290 万左右，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增加为 300 万人，数量上已略高于蒋之军队。而且解放军的攻坚战也得到锻炼，有很大提高。武器装备，也因蒋这位“运输大队长”的美械装备而大大加`强。士兵士气更高。

△淮海战役

辽沈战役后，中共中央又准备发动淮海战役。9 月 25 日，毛泽东开始部

署军事行动。

这时，蒋军在淮海地区有 5 个兵团，3 个绥靖区，约 80 万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华东野战军 16 个纵队、中原野战军 7 个纵队以及华中、中原军区地方部队，共约 60 余万人。

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是歼敌于淮河以北，不让蒋介石将军队撤走。而蒋于 11 月初，则想在东北失陷后，撤军淮南。为了麻痹蒋介石，毛泽东令中原野战军于河南南部采取佯攻，引黄维、张涂兵团西向；又以中原野战军一部和华东野战军于徐州以西地区佯为作战姿态。而其他各部也行动缓慢，不像进攻徐州的样子，使蒋不明意图。同时又以一部占领宿县，于蒙城地区部署堵截黄维兵团北上。

这一切，真的迷惑了蒋介石，使他误以为毛泽东并不想马上围攻徐州，又于 11 月 4 日改了主意（一天之后）。他又打算固守徐州。他原本怕于徐州重演项羽霸王别虞姬悲剧；至此，他决定北守徐州，南依蚌埠。令邱清泉、李弥，黄伯韬、李延年兵团向徐州集结，固守徐州；令孙元良兵团守宿县（徐州之南），刘汝明守蚌埠。欲于徐蚌铁路两侧围歼华东、中原两野战军，以扭转战局。

杜聿明于 9 日晚飞抵南京受命。但第二天，黄伯韬兵团已被围困。

10 日午后蒋于黄埔路主持召开国防部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蒋因黄兵团被围，又改变了策略，决定于徐州地区与解放军决战。

他公开说的是救黄兵团，实则是吸引解放军于此决战。同时立即调黄维兵团（白崇禧华中剿总序列）和刘汝明兵团北上援徐，又调孙元良兵团入驻徐州；命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东向增援黄伯韬兵团，欲围歼围困黄兵团的华东野战军。但是邱、李两兵团不愿援助杂牌军黄伯韬，不派主力增援，不执行蒋的命令。结果在解放军 5 个纵队顽强阻击下，难以前进。到 11 月 22 日，华东野战军全歼黄兵团 7.8 万余人，黄伯韬自杀。第一阶段战役结束。

11 月 23 日，蒋介石急召杜聿明到南京开会。蒋此时又改变了主意，他又决定仍采取于徐蚌铁路两侧与华东、中原解放军决战方案。令黄维、刘汝明迅速北上，令社聿明率三个兵团南下，实现“三路会师”计划。

但是，杜聿明率军南攻时，步步维艰；黄维、刘汝明、李延年兵团北上，也寸步难进。黄维兵团 11 月 24 日被困于南平集、双堆集。至 28 日，杜聿明见无法打通徐蚌铁路，又飞南京见蒋介石，报告情况。蒋这才又决定放弃徐州，退守淮南。但为时已晚。

29 日，杜聿明于徐州召开军事会议，宣布撤离徐州。他并且胸有成竹地说，此时撤离徐州是最好机会，因为华东解放军刚围歼黄兵团，绝无力继续作战，乘机撤军，一定成功。当天，黄维兵团被中原解放军压缩到 10 华里方圆地区内，行将被歼。

11 月 30 日，杜聿明率部自徐州南撤。

12 月 4 日即被困于永城东北孟集、李石林、王伯楼、陈官庄一带，无法前进。杜聿明率部挣扎，终于无法突围。7 日，孙元良兵团突围被歼，孙只身逃走。15 日，黄维兵团被歼于双堆集地区。刘汝明和李延年兵团得知黄维兵团被歼，调头南逃，一天跑了百余里地，免于被歼。

歼灭黄维兵团后，中原解放军继续解放了淮阳、淮安、灵壁等城，使杜聿明两个兵团完全孤立于永城东北地区一小块土地上。

至此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完成。杜聿明部已成为瓮中之物。

面对危急的形势，杜向蒋介石献上三策：上策，集中西安、武汉兵力与解放军决战于淮海地区；中策，固守阵地，等待和谈成功；下策，是突围脱险。蒋介石欲采纳上策，但白崇禧坐镇武汉不予援救，并愿杜部早亡；胡宗南则远在西安，自顾不暇，且又远隔千山万水，也拒绝调兵东援。至于和谈，因为蒋本无和谈诚意，对李宗仁多方掣肘，加之白崇禧欲划江而治，也反对真正和谈，以和谈过关，也绝无希望。突围脱险，当然也是无法成功。

这时，蒋介石对淮海地区又束手无策了。蒋曾劝杜离开战场去休养，但杜为效忠蒋介石，誓不中途走开，坚决战斗到底。

蒋氏此时所能做的，只有动员所有飞机空投物资于杜部被围地区，约一天 120 架次，但仍不解决问题。杜部官兵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甚至有吃死人肉的惨事发生。伤病员更哭声恸野。每天都有蒋军士兵潜入解放军阵地就食，其官兵已无心再战。杜部被歼，只是时间问题了。

蒋介石现在正处于被桂系和美国逼其下台的艰难时刻，他在尽一切力量支援杜部，望其突围成功，但也只此空投一法，别无他途。如果杜部被歼，他更是必须下台无疑。

自 12 月 17 日起，华东和中原解放军司令部曾向杜聿明两次写信，促杜投降。杜因当时决心效忠蒋介石，拒不投降。次年 1 月 5 日，淮海前线总指挥部又发敦促杜聿明投降书。至 10 日上午 10 时，全歼杜部两个兵团。邱清泉战死，杜聿明被生俘。

淮海战役共歼蒋军 22 个军，55.5 万余人。蒋之精锐部队，经辽沈、淮海两役，基本丢光。蒋氏的失败从此定局。

1 月 21 日，蒋即辞去总统职务，同日，又悄然离开南京回抵杭州。此后蒋思考的重点，已转向牵制李宗仁执行副总统职务等问题，而最重要的重点，则是准备向台湾撤退和以上海黄金白银美钞经营台湾之事。

△平津战役

辽沈战役后，中共中央怕傅作义 50 余万军队南逃或西窜，立即命令东北解放军于 11 月 23 日，向关内急行军，拖住平绥线傅作义主力军和天津的陈长捷部，以便全歼平津之敌。于是东北解放军分三路齐头并进，开入关内。右路军攻平绥线，切断傅军西逃之路；中路军指向天津、北平之间，切断平津联系；左路军目标是唐山地区，于海上堵死平津蒋军南逃之路。

傅作义为请求蒋介石指示，于 11 月 3 日，即沈阳解放的第二天就飞南京见蒋，并要求支援。但蒋未单独接见傅作义，因为正忙于淮海战役的部署，顾不得北平和天津的事了。只派国防部长何应钦和参谋长孙连仲见傅，转达他的意思：（一）傅华北全军运往连云港，抢救徐州稳定中原；（二）撤军绥远，以甘肃为后盾，保卫西北；（三）放弃察、绥、热地区，集全军于平津塘狭长地带，在必要时南撤，以保实力；（四）维持现状，将被各个击破，为最下策。

傅未单独见蒋，于 6 日失望而归，又见中央已顾不得华北，亦无一定成案，情绪甚是低落。蒋此时不见傅作义，实为失策之至，也足见其用人在前，不用人在后的性格。当时美国虽口头答应援傅 1.6 亿美元，以抵制中共势力的扩展，但实则只给了 1600 万美元，于事无补。

在这种暗淡情景中，傅的意志也日渐消沉，不得不自打主意，自寻出路。遂决定了三策，供进一步研究。这三策是：（一）津全军转移山西，通过晋南和胡宗南联成一体。绥远一部则退往宁夏、甘肃，免于孤立。（二）放弃平、保（保定）热、察，全军济集天津、塘沽地区，与东北、华北解放军决战。败则南逃，参加淮海大战；胜则恢复原地区。（三）率本部退往察、绥；所部中央军由李文统率待命。

经过反复考虑后，傅决定采取第二策，与解放军决战于天津地区。

但同时，傅又于 11 月 17 日，通过北平地下党组织和中共中央联系，并向毛泽东发电，表示讲和意图，以救国救民，保卫北平古都。然而傅氏也未及时得到中共方面的回音，不得要领。于此蒋冷淡他，中共又无回音的孤立境地，傅只得仍然继续部署军队，准备和华北、东北解放军决一死战。

但在调动军队时，发生了临时的部署改变问题。即华北解放军杨成武、李天焕部突然直趋张家口和归绥地区，威胁傅的第十一兵团（孙兰峰）和郭景云三十五军（傅起家部队）。傅这时正召开察南军事会议，便决定实行察南会战，欲歼华北解放军于察南地区，但结果未能如愿，并耽误了撤军天津的时间。这时已进入 12 月初，东北解放军已经入关。至 12 月 8 日，傅部三十五军方开始东撤，又因郭贪运大批军用物资而迟行半日。这时，东北解放军已将三十五军东撤之路堵死。郭景云率部激战数日，不能冲出重围，被迫退入新保安，等待援救。傅作义获悉后，即命安春山一〇四军自怀来往援，袁朴率第十六军于青龙桥前往接应。但安军旋又被包围于康庄地区，不能前进；袁军则因受阻而东逃。安军为保实力，冒险自狭谷撤退，正中伏兵之计被全歼。安只身逃回北平，傅的援救计划完全失败。

但中共对傅部的第三十五军，则围而不打；对张家口也围而不攻，意在拖住傅军，使他不能下决心从海上南逃，因为他舍不得三十五军和第十一兵团等嫡系部队。在傅等待和犹豫的时间里，东北、华北解放军则迅速将平津合围。12 月 13 日，完成对平津塘地区的完全包围态势。

22 日，华北解放军解放新保安，全歼敌第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自杀。24 日解放张家口，歼孙兰峰第十一兵团，孙率 3000 人逃往绥远。至此，傅之王牌军只余三十五军的一个师，困守北平。

淮海地区，杜聿明也只余两个兵团，被困于陈官庄地区，即将被歼。傅已感到走投无路，只得于本月 24 日前后，再次派人与解放军前线总部联系。

1949 年 1 月 10 日，又派其挚友邓宝珊出城联系。

15 日，天津解放，陈长捷被俘。17 日侯镜如率第八十七军于海上逃走。几天之内，傅作义只余一座北平孤城了。当天，邓陪解放军代表苏静入城。傅派代表崔载之与苏谈判，议定《北平和平解放实施办法》，共 14 条。21 日，傅作义向其全军宣告和平协议。22 日，刊 13 条于报端。

23 日协议生效。

22 日，傅作义命全军出城接受整编。3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之东北和华北野战军一部举行入城式。北平和平解放。

至此，蒋之长江以北军队，除西北胡宗南部以外，已全部被歼，只余江南半壁河山。蒋介石也因军事上之惨败，而被迫下台。

继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又席卷江南，蒋介石于 1949 年 12 月 10 日逃往台湾。

对党政军方面施策的检讨

1947 年 3 月 15 日，国民党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这次大会的中心内容，是“结束训政，促进宪政”和公开向中国共产党宣战。

并发布了三中全会宣言和现阶段的任务、方针。

宣言共 5 项。主要是向中共正式宣战，把打内战合法化。

现阶段任务共分 4 项。主要是对过去进行检讨，指出过去研究理论不够，缺乏思想和政治领导，因而政府无所作为。还特别提到过去征收党员知识分子太多，而知识分子看重个人自由，不如下层好统治。当高官者，又与我党疏远，“甚或转而利用党，压迫党”。未达目的者，“亦多忙于做官找事，甚或由失望而怨望，发生反党行为。党不仅与人民不发生好多关系，且与党员亦不发生好多关系。一切孤立，一切空虚，党派成了有名无实”。

对这种情况，强调必须进行改革，主要是从思想教育和研究革命理论着手。文云：“要实行主义必须研究主义和宣传主义，故应展开思想运动以革新思想，领导思想。”其主要内容是：发扬三民主义，研究三民主义，就是深研民主政治。总之，从党的教育入手，加强党的纪律，可以淘汰一些不合格的党员；但对于以严厉的刑罚处罚不法党员的决议则未能提出。

除了以上教育运动之外，还决定“必须肃清官僚主义，发扬革命作风，厉行民主作风。从前重集权而轻民主；重人治而轻法治，重党部而轻党员之畸形风气，应彻底改正。一切重大决策，一切重大用人，应该信任制度。”同时，“注意党内舆论，积极团结党员，凡未经会议通过者，不能视为党的主张。……同时应减少文字工作，纸上空谈，简化手续及程序，力求切合实际情形，从事实际活动，注意实际效果。”

改革最重要的是加强“党的领导”，具体说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政务官及民意机关代表者，如系选举产生，应先从党取得候选人地位；如系派充，应有党推定。政务官的重大用人，必须取得党的同意，不遵从者，党应予以适当之惩处，如公开批评等。……党对于民意机关，尤须通过党团“将党的政策化为民意机关的决议，交由政府施行”。

“凡选举产生之政务官及民意机关代表，不能依其职务执行本党政策或发表与政策相反之言论时，党应予纪律以上的制裁，情节重大者，发起罢免运动，不应姑息”。[①]至于从事社会事业的党员，党亦有加以管理的必要，对于纪律必须彻底执行。

将来宪政时期，党要在县级选举单位进行竞选，“党要获得政权，实行主义，必须竞选获胜，此为宪政时期的大事”。党应充实县党部的人力、物力，使之成为健全战斗整体。

此外还要加强宣传工作，随时确定宣传政策、新闻政策、文化政策。“采取领导方式，造成舆论运动。”内容方面，“应鼓吹建设，指导建设，反对破坏与分裂，展开统一建国运动，代表工农利益，为民喉舌。”[②]因此要选拔有经验、对主义有研究者担当宣传工作。

这几条明确表达了以党主宰各级政府和各级民意机关，国民党的意志是最重要的。

---

①

② 《汇编》，第四辑，第三册，第 10599——9、10 页。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于各地开始反攻的战局下，1947 年 9 月 9 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开幕。

在这个会上，蒋介石宣读了开幕词，主要讲改造国民党的重要性和对中共力量应当正视，不应再闭着眼睛看不起中共，“武断他说他们没有力量，并不可怕”。在其国民党改造问题上，他认为，必须痛下决心改革党务。他说：“抗战胜利以后，……不但国家元气未复，建设未成，反而人民失去信心，以为本党对一切都无办法。……本来处在很好的环境，具有很好的条件，一到我们的手里，就毫无办法，这真是最耻辱、最可痛心的问题。各位中央和地方服务同志，必须趁着这次开会的机会，反省检讨，研究改进的办法，看今后能否改革进步，把握起死回生的时机”。他说：

“如果仍如过去一样因循苟且，腐败堕落，甘于暴弃，那即使没有敌人，我们也要遭遇天然的淘汰，无法生存于这个世界。这是我们每个党员人人都要检讨研究的问题”。[①]

蒋介石并非没有看到自己党的严重问题和党政官员的腐败堕落，他承认自己的党失去人民的信任，对一切都毫无办法，很想振作起来，改造党，提高党政官员的“觉悟”、政治品格等。因此他多次谈党的改革问题。但他找不到真正对症的方法，因为他不放弃个人独裁和专制，不还政于民。其改造国民党的真实目的，也是内心的目的，只是为他和他的集团的统治地位，对此，他说的极为明白：“如果再不觉悟，再不改正”，致使党不幸败亡，“那末个人的权力、地位还能存在吗？”[②]

因此，他想使党员们打破个人权力地位的观念，一切精神和力量都集中于党的改造，“使党真正能起死回生”，是不可能的。

对于中共，蒋氏强调要调查研究，不能再一味地总认为他们“买空卖空和毫无力量”。蒋认为中共愈来愈壮大，中共整个的力量“已增加了好几倍，他们斗争的方法和技术也有长足的进步”。[③]

而反观他自己的力量，他认为无论组织训练、宣传或调查，不但没有进步，反而有了退步。蒋进而又认为中共的力量和技术足以消灭他蒋家的党和天下。他说：“单就他们斗争的方法和技术而论，他们实在已经成功，他们的力量实足以消灭本党。……因此，我们今天如果还是蒙着眼睛不看他们真实的内容，而武断地说他们没有力量，并不可怕，以为打倒他们是很容易的事，实在是最大的错误。”[①]

但他又认为中共“是用原始时代最野蛮的精神而配合着现代最进步的科学方法的组织和纪律”，来向他蒋家的党和军队进行斗争的。而他自己的党的精神则“是不革命的，消极的，毫无斗争性的。所用的方法又是不科学的，无效率的，散漫、松懈，无以复加”。

他的党和政府大厦支柱已空，已经倾倒在即了。任何决心，也是无济于事的。蒋此时已无回天之力，只有失败一途。

蒋号召其党员们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他的国民党员自执政以来，从不交党费，现在蒋也学着中共，要其党员缴费，党的经费，今后自给自足。再

---

①

②

③ 《汇编》，第四辑，第三册，第 10576—2、3 页。

① 《汇编》，第四辑，第三册，第 10576—2、3 页。

者是要党部办事人员研究法令。他承认中国共产党的纪律严明。他说：“共产党就完全与此相反，他们下级党部奉到上级命令，一定要遵照执行，尤其对于他们中央的宣言、决议、政纲、政策，基层党部接到之后，一定要召集所有的党员举行小组会议，切实研讨，并分配任务，分工合作，共同完成。所以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言论、行动，莫不受其党的指挥和领导，而与其政策相符合。共产党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整个战斗体，原因就是在此。”因此，要求他的党员们为消灭中共而一定要养成研究和遵守法令的习惯。

话锋一转，他居然说道：“五年一定可以使我们中国走上现代国家的道路，一洗今天的耻辱。”

他还要“澄清吏治，根绝贪污”。蒋承认“现在我们中国的政治，最为外人所诟病的，就是我们政府的贪污和无能”。

1945 年 8 月，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官员在接收中，大搞贪污活动，霸公产为己有。例如：北平敌伪房产为 1.4 万余所，加上各县伪房产近 2 万所，但接收大员却只上报接收 380 余所，余者尽为官员私有。南满铁路在沈阳之房产为 1200 栋，却只上报两栋。

又蒋之九十四军军长牟庭芳在天津私吞敌伪物资 2000 万元。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私吞 1000 余栋房舍，八九百辆汽车，万余条黄金，还有珠宝等。上海市长钱大钧则私卖敌伪物资 42 亿元。

蒋介石却说：“钱大钧贪污成性，不足道也。”他视贪污如儿戏，不加究办，甚至一笑了之。

这些贪污财富均进入私人腰包，存入外国银行。

1946 年 7 月，蒋介石为整顿接收中的贪污行为，特组织了“接收处理敌伪物资清查团”，共分 7 区 18 个组，分赴各地。上海市揭发信达 400 余封，平津地区达 1300 余封。清查两个月，即查出不少贪污案件，9 月份揭发出一批共贪污法币 50 亿元，耕地千余亩，乳牛千余头的贪污案。9 月 30 日，《解放日报》又公布一批贪污案共为 430 亿元（法币）。为此，蒋又怕丢人现眼，便叫清查团不要发表告发案件，以免影响政府官员的威信。所以大贪污案均不见报。又例如钱大钧案，最后改成为“蒋主席批准的”不了了之。

此外，比较大的案子有 1946 年 4 月间湖北省主席王东原包庇贪污、失职案，1947 年 1 月的盛世才贪污案，1947 年 4 月李品仙贪污盗坟案等。对于这些案子，蒋介石均不许深究，只是“申诫”完事。结果贪污之风盛行，政治已不堪收拾。

恶性通货膨胀

抗战胜利后，民贫国困，本应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然而蒋却火上加油，点燃了更大的内战之火，对中国经济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其于中华民族，难辞其咎。

蒋的内战耗费，军费一项，就占全年总开支的 80%。1947 年，蒋之国民政府全年收入为 17 亿元，而军费开支高达 100 亿元左右。此外 83 亿元赤字，全“靠印刷机来弥补”。通货焉能不恶性膨胀！

1945 年 10 月，有两个印票厂，共印票 2600 万张，值法币 560 亿元，已超过重庆时期 7 倍的印钞量。

1945 年底则印行钞票 10.3 万亿元，为抗战前 737 倍。

1946 年上半年之前 5 个月内战经费 85%靠印刷机来供给。7、8 两个月，每月印钞票 1 亿元；9 月份印钞票 2 亿元；12 月份上海印钞厂每日印钞 230 余亿元。蒋因国内印钞和供应不上，又到美、英两国去印。到 1946 年 11 月 19 日。运到上海之钞票已有万箱以上。到 1947 年，上海已有 5 家大印钞厂。日夜不停地印，每分钟印出 1600 万元。到 1948 年 8 月，法币发行量已达 1200 万亿元。

因此，物价飞涨，无法控制。

1945 年 7 月，上海大米每斤法币 12 元；小米每斤 6 元；玉米面每斤 3 元。

1946 年 1 月 21 日，大米升为每斤 184 元；面粉 196 元；小米 60 元；玉米面 60 元。2 月 22 日，大米又涨至 480 元。到 11 月份，公教人员薪金补贴尚不到抗战前的 1000 倍，而生活指数已达战前的 20 万倍；物价上涨为 390 万倍。如此状况，国家再也无法维持了。

又如，法币 100 元，1937 年可买两头牛；到 1938 年只买一头牛；1941 年只买一头猪；1943 年就只买一只鸡；到 1945 年，只能买一条鱼；1946 年只买一个鸡蛋；至 1947 年只可买三分之一盒的火柴了。

曹聚仁教授说：抗战胜利初期，教授收入约等于战前十分之一，合 15 块银元，至 1948 年，只合银元五六元，不到抗战前女工工资的一半。

美元与法币比率为一元美钞等于 300 元法币，到 1946 年 12 月已变成一美元等于 5700 元法币。

就这样，政府不动声色，就把人民手中的财产夺走了。人民焉能度日？又焉能不怨恨蒋氏和他的王朝。

在美国顾问杨格献策于蒋介石后，蒋命行政院于 1946 年 3 月决定实行开放外汇市场，规定外汇牌价。同时由中央银行公布黄金买卖办法，以库存黄金向上海抛售。从此以后，直到 1947 年 2 月停售黄金之间，上海黄金市场日益上涨。

10 月份以后，上升得更多。蒋决定抛售黄金，是为了以黄金收法币，维持军费开支，并等待 20 亿美元贷款为后盾。

蒋对宋子文说：“因为时局紧张，前方百万大军的饷给重要，职是不准辞，办法由你想，黄金能用到哪一天，用完再说。”[①]

当抗战胜利后，国库存 500 多万两黄金，7 亿美元外汇，此外还有美国据 1942 年援华协定偿还的军费一部分。[②]如果不打内战，蒋之财政尚可以逐渐好转，80%左右的赤字亦可以逐年减少。

但内战一打，蒋的经济便走向崩溃。

为此只好抛售黄金。

1946 年 1 月至 3 月份，黄金价格每条最高价格为 1940 千元；最低价格为 1795 千元。到 12 月，则最高价为 3715 千元；最低价格为 2758 千元。

1947 年 2 月初，黄金告罄（尽），而 20 亿美元仍无音讯，中央银行只得停止抛售黄金。但在停售之前一个月中，黄金价格更飞速上涨。1 月 4 日，最高价格为 4584 千元，最低为 3954 千元。

到 2 月 13 日，黄金每条最高价格为 780 万元，最低为 670 万元。

[①] 《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六辑，第 199 页（此系亲历者何汉文亲耳听宋子文 口述）。

[②] 《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五辑，第 1～5 页。

2 月 15 日，中行正式公告停止抛售黄金。停售以后，黄金便转为黑市买卖。

在抛售黄金期间，国民党的党政军要员，宋、孔等大财团，便大肆抢购黄金，工商部门的 CC 分子，江浙财阀们也大量抢购黄金。他们除了拿出自己的钞票外，还嫌不足，又到 4 个银行贷款，仅在 1946 年 12 月初，四行总联络处就放出了 560 亿元“生产贷款”。因此黄金价格陡涨，美元价格也大涨，物价更因黄金、美钞大涨价而飞涨，对物价上涨起了煽风点火作用。在此黄金售中，这些官僚资本家，抢购了大量黄金存入国外，大发横财，而中小企业也因争购黄金，而停止了生产。

蒋之国民政府，在物价继续飞涨中又心生一计，于 1947 年 2 月 16 日公布《紧急措施方案》，规定黄金和外币不得在国内流通，都市实行配给制。根据此方案，又规定了《取缔黄金投机买卖办法》10 条。其中心的一条，是“禁止人民携带黄金”，此外，就是禁止以黄金代替通货，把黄金价格又定在抛售黄金以前的低价格。

凡违反规定的，把黄金一律充公。为此，上海又成立经济监察团，团长由宣铁吾（上海警备司令）担任。该团以检查为名，对持有黄金、美钞商民进行掠夺，并鼓励“告密”，又以“违法”之名，将商民购得之黄金，美钞尽行没收。仅 10 天中，就没收黄金 20 多万两、美钞 120 多万元。参加这种掠夺的人，有宋子文系和参政会、立法院、监察院以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部分人。这是又一次对广大人民的残酷掠夺，迹近劫盗。

在此次抛售黄金中，发生了詹连生、林风苞、杨仁安等百万黄金贪污案。詹判 12 年徒刑；林、杨判七年徒刑。但马上又以“保外就医”而逍遥法外了。案子到此为止，上海监察团再追问宋子文，宋就指出抛售和停售黄金，均由蒋介石决定。他说：“主席是国家元首，所以由他决定行事，现在责任落在宋某身上，我反正是奉命行事，我的能力不行，已经向主席提出辞职，一切听上面决定处理。”[①]中央监察院为在舆论面前交账，遂向宋子文提出弹劾。蒋当然对他进行庇护无疑。

蒋介石也当然不会公开承认他干预过此事，但他批示“并无其事”后，又说：“事到如今，有何办法？”[①]

于是准宋子文辞职，令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

宋子文于抛售黄金时期,侵吞了中央银行 10 亿美元外汇和几十亿美元剩余军用物资。[②]因此中央监察院又第二次调查宋案，并第二次弹劾宋子文。但因蒋介石的极力庇护，这第二次弹劾又石沉大海，杳无消息。宋子文仍然当其广东省政府主席。

蒋打内战的开支，使蒋入不敷出，巨额赤字，已是沉重负担，加上贵族官僚贪污，大量金银转入私库，则财政赤字更大，而完全依靠美元，又不可能。因此，通货膨胀，经济日益恶化。蒋介石也因此而失去国统区人民的拥护。

金圆券危机

[①] 《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六辑，第 200～202 页。

[①] 《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六辑，第 200～202 页。

[②] 此数字没有把握，仅于此存之，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六辑，第 202 页。

1948 年 8 月 19 日，蒋介石为平抑物价，以总统身份颁布《财政紧急处分令》，实行金圆券币制。令曰：“这个方案，是王云五财长提出的。”

“限期收兑人民所有之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

“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

“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收支。”（本令由蒋中正、翁文灏、王云五签发）同时规定金圆券发行办法。其中规定金圆券每元含纯金量为 0.22217 公分。由中央银行发行。有壹元、伍元、拾元、伍十元、壹佰元 5 种。另发辅币壹分、伍分、壹角、贰角、伍角 5 种，以铜、镍、银分别铸造。亦由中央银行发行。

金圆券一元合法币 300 万元，东北流通券以 30 万元合金圆券一元。自本年 11 月 20 日以前无限制兑换。兑换期间，法币和东北流通券，按以上比率流通使用。8 月 19 日起，公私记账，均以金圆券为单位。

此次发行金圆券以 40%之黄金、白银和外汇，另有有价证券和国有事业资产为“十足准备”或“根据”。发行量为 20 亿元，按月发行，当金、银、外汇等不足时，不得继续发行。

黄金按纯含量，每市两兑给金圆券 20 元；白银，按其纯含量每市两兑给金圆券三元；银币，每元兑给金圆券二元；美钞每元兑给金圆券 4 元；其他各国货币照中央银行外汇率兑给金圆券。规定于 8 月 30 日（后改为 31 日）前开始收兑。

关于人民外汇登记法，是依照国家总动员法第三条第九款规定，指定外汇资产为国家总动员物资之一。这是对平民外汇的掠夺。[①]

自颁布《紧急处分令》以后，蒋介石每天晚上和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通长途电话（上海）一次，询问收兑情况，蒋在上海收兑黄金约 110 多万两；美钞 3400 多万元以及大量港币、银元、白银等。

如为稳定物价，此种方法未尝不能奏效。但是蒋的国库空虚，内战耗损浩大，赤字有增无减。而囤积居奇之风又不能抑制，金圆券只得又走法币老路，通货继续恶性膨胀。

国库收支情况如下：

1944 年：岁入 2350 余亿元，支出 12589 亿元，军费占 65.68%；中央政务支出占 14.88%；建设事业占 14.1%……

1945 年度，岁入为 2430 余亿元；岁出为 12590 亿余元。赤字为 10000 余亿元，百分比为 81%。

1946 年收入为 19791 亿余元；岁出为 55672 亿元，赤字为 43000 余亿元，百分比为 75%。

1947 年：岁入为 130000 亿余元；岁出为 400000 亿余元，赤字为 270000 亿余元，百分比为 78%。

1948 年预算为岁入 570000 余亿元；岁出为 950000 余亿元。

赤字为 370000 余亿元，百分比为 38%强。但是这只是预算。只要内战一天不停，赤字的绝对值就会迅速增加。

[①] 以上各条令，见国民政府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之《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及 有关法令汇编》，见国民政府立法档案，十，33。《汇编》，第四辑，第二十二册，第 11358—1—9页。

另外，赤字比例可能通过加强搜刮人民血汗有所减少，但是赤字绝对量则从 10000 余亿元，增加到 370000～400000 余亿元。

由于金圆券不能回兑或回笼，又以国库金、银、美钞为准备和保证，与社会生产和实物脱离，致使金圆券与金、银之牌价，上升为市两五六千元到 9000 元以上。这一切都仍须借印金圆券的机器解决。加上官僚、奸商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物价仍继续飞涨。

《中央日报》1949 年 1 月 19 日社论对此特别予以说明，论云："'八·一九'到现在不过 5 个月，社会经济与人民生活遭受极大幅度之波动，好像隔了一个时代。5 个月以前，以法币论值的日用品，如上熟米每市石 1800 万元，合金圆券 6 元，岚炭每挑 240 万元，合金圆券 8 角。现在呢？上熟米每石 400 金元；岚炭每挑 80 金元。差不多涨了 70 倍到 100 倍。其他百货价格变动的幅度更大得惊人。"[①]

由于物价猛涨，连总统府的卫兵，也活不下去了。一个卫兵的月薪，还不够买一双草鞋。因此有人说，蒋失败于军事的，不过十分之一，而失败于经济的则为十分之九。[②]

由于金圆券无法抑制物价上涨风潮，于 1948 年 11 月，又颁布了《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汇处理办法》。又准许人民汇兑黄金和白银、美钞，并开放金、银外币限价。至 1949 年 1 月 17 日停止收兑黄金、白银、美钞前，黄金每两已上升到金圆券 6000～9000 元。因此，蒋介石的货币改革完全失败。对此，美国《华盛顿邮报》有比较直接的评论：

"由于内战关系，军队的人数日增，任何方式的市制改革，在此时提出，都将注定失败的命运。"

继而又分析说："当浩大军费与日俱增时期，岁入无法增加，只靠金、银、美钞为保证的金圆券，不过再进一步将人民手中的金、银、美钞储备夺走，以增政府的金、银、美钞储备，而社会生产量和实物并不增加，甚而因战争而大大减少，纸币大增，而实物日减，当然物价只能日益飞涨，而不会停止。故不管如何改革币制，只能是欲无中生有。"上海出版的《经济周报》也专门在其社论中说明此点。文云："不知是故意还是无知，政府的经济措施，却始终认为：无中可以生有，对人民始终没有放弃玩弄那一套无中生有的把戏。"[①]

《中央日报》1949 年 1 月 19 日社论则认为币制改革失败，在于纸币印行太多和"不应该以政府所有金、银和外汇为保证，除法令国信以外，更不需要任何保证。"这种观点丝毫不提内战耗费和社会生产的凋敝，实为避重就轻。

蒋经国打虎败阵

在实行币制改革的同时（实行金圆券），蒋介石派其子蒋经国赴上海任经济特派员，并负责平抑物价。实际上是全权在握。蒋经国也真想铁面无私，大干一番，为蒋介石固守江山。为此，他组建了"戡建大队"，在中央银行

[①] 《中央日报》，1949 年 1 月 19 日社论：《由经济恐慌怀念国父遗教》。

[②] 《孔祥熙传》，第 69 页。

[①] 程准：《币制改革纵横谈》，见 1948 年 12 月《经济周刊》。

内设置办公室，开始“打老虎”。

其口号是“只打老虎，不打苍蝇”。同时，又组织了“上海青年服务总队”。

蒋经国的中心任务是管制物价，规定所有货物的价格必须停留在“八·一九”之前的市价水平上。也叫“八·一九防线”。为此，严厉打击投机市场，搜查库房、检查市场和水陆空交通枢纽。

自8月23日至27日，小蒋指挥上海市6个军警单位全部出动。并下令，对违犯物价管制规定者，吊销执照，没收货物，对负责人予以法办。

蒋经国到上海后，即向青年军人联谊会发表讲话。他说：“在工作的推进中，有不少的敌人在那里恐吓我们，放言继续检查仓库惩办奸商，将会有有市无货，工厂停工的现象。不错，假使站在保持表面繁荣的立场来看，那是将要使人民失望的。但是，如果站在革命的立场来看，这并不足为惧，没有香烟、绒线、毛衣、绸缎，甚至猪肉，是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相信，为了压倒奸商的力量，为了要安定全市人民生活，上海的市面，是绝不为华丽衣着，而放弃了打击奸商的勇气。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能安定的。”[①]

同时，他又特别指出奸商和贪官污吏相勾结。因之警告官员们，对贪官污吏将要严办。他说：“上海许多商人……。拥有本店制造的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骗；一是勾结贪官污吏。做官的人如与商人勾结，政府将要加倍惩办，戚再玉已经枪毙了。听说不久的将来，还有类似的人，也要得到同样的命运：这就是对身为官吏的人的警告……。共匪和奸商是革命的两大敌人，要同样的打，一起的打。”[②]

《紧急处分令》下达的第10天，蒋经国于上海成立了一个“人民服务站”，其任务是接受揭发和告密。9月10日，蒋经国赣南旧部王升发表《告上海青年书》。同时选拔13300余青年人，分成20个大队，专门从事推动群众参加监督和揭发不法事件。

蒋经国处理的第一个案件是陶明启案。陶任财政部秘书，利用职权，泄露国家经济机密，串通商人抛售永纱股票，进行投机。

破案后，陶被捕服刑。第二个案件是上海警务部科长张××和警备部第六嵇察大队长。此二人，因勒索被处决。第三个案件是王春哲，因囤积居奇被处死。因此人狱的，包括巨商大贾共64名。

经过此三大案件，蒋经国在上海声名大振，成为铁面无私的传奇人物，外国记者则称之为“中国的经济沙皇”。

与此同时，蒋经国还特别强调重视人民的力量。他说：“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将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

经过一个月的雷厉风行的整顿，上海市人民已对蒋经国有了信任感。因此，自“八·一九”以来一个月中，中央银行于上海收兑的黄金、白银和外币，已约值3.73亿美元。其中黄金为12.56万余两，美钞3200余万元。

但是，接着麻烦就来了。上海一地虽暂时物价稳定，而全国物价依然上升。因此，流入上海的物资势必因价低而大大减少。上海便出现了物资缺乏

---

①

② 蒋经国：《青年军人联谊会讲演词》（1949年9月12日）。

的紧张局面。市面供应萧条，上海的生产，也因原料缺乏而萎缩。尤其在外地高价买原料，于上海低价出售产品，迫使生产停工、关闭。

另外，金圆券原本是贮藏的财富，突然变换成加入流通的纸币，更加速了市场物价上涨过程。很多商人还利用金圆券进行囤积居奇。有的携款逃往外地。

例如，上海商人便把上海市民（700 余万）的生活必需品囤积起来不出卖。物价虽平，却真的有市无货了。

为此，蒋经国又实行限期登记存货。自 9 月 30 日起，动员 5600 余人，组成 1628 个小组分头在上海警察局长俞叔平指挥下，实行物资总检查，凡登记不实者，一律查封。

但商人们采取各种手段来抵制登记检查。其中，蒋经国也查出一起囤积大案，即扬子公司囤积案。扬子公司是孔样熙的大儿子孔令侃所主持，宋美龄又于其中有股份。该公司囤积货物，被蒋经国查出后，蒋经国坚持要按律处理。但 9 月底，宋美龄得知后，便要蒋介石到沪。蒋到沪后，由宋美龄一手挡架，说蒋疲劳，需休息一夜才能谈事，使蒋经国、宣铁吾、俞鸿钧等无法与蒋谈扬子公司囤积案，就各自打道回府了。经过一夜的宋美龄攻势，蒋介石也败下阵来，便决心不许蒋经国干预此案，完全按宋美龄决策行事。

10 月 2 日，蒋介石对其长公子蒋经国就摊了牌，明确表示不许过问这个案子。他说：“人人都有亲戚，叫亲戚大丢脸的事情，请你们各位想一想，谁又能够真正铁面无私呢！我看，这个案子打消了吧。”[①]囤积居奇既不能惩办和制止，限价也就难以继续实行下去。

蒋经国听蒋此番表态，完全成了一个垂头丧气的惨败者，对特大老虎不敢打了。于是其威信一落千丈。

同时，财政部又于 10 月初宣布对卷烟、薰烟草、锡箔、洋啤酒、国产酒、烟叶、烟丝 7 种货品增加税额 71 倍，结果立即激起抢购风潮和涨价洪波。

还有的厂商，他们因缺料停产，便雇佣无业游民和流氓到上海市面抢购物品，压迫政府放弃限价政策。

因以上种种原因，自 10 月 3 日，上海开始抢购物资。以后抢购之风日益严重，真如排山倒海一般。而黑市也日益猖獗。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的限价政策完全破产。

10 月 31 日决定取消限价。

11 月 1 日正式公布取消限价。限价政策彻底失败。

蒋经国是坚决反对放弃限价的。他在 10 月 24 日的日记里写道：

“十月份最后一星期，恐怕亦将成为限价政策实施的最末一周。问题不在于限价不限价，而表示政府无能，怕困难和没有决心。处在政府放弃限价政策的时候，我的主张，既与此相违背，则本应辞职。”

限价政策的取消，标志着蒋介石币制改革和紧急措施的完全破产。物价的继续恶性膨胀，引起了广大城市人民的失望和愤怒。

10 月 25 日，北大等高校教授发表停教宣言。宣言中说：“政府对我们的生活如此忽视，我们不能不决定自即日起，忍痛停教三天，进行借贷来维持家人目前的生活。”广大人民对蒋氏的金圆券更失去信心。

经济改革彻底失败；翁文灏内阁倒台；王云五财长去职；蒋经国也于 11

[①] 周一志：《上海金圆券之一幕》，见《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一辑，第 211 页。

月 6 日悄然离开上海，到杭州和老婆团聚去了。

对此，曹聚仁在《蒋经国论》中写道：“新赣南所造成的政治声誉，这一下输光了。有的人提起了经国，就说他是政治骗子；有人原谅他，说这都是杨贵妃不好，害了他。蒋先生的政治生命也就日薄西山了。”[①]

1949 年 5 月以后，人民已拒绝使用金圆券，国民政府财政完全崩溃。

农村经济破产

蒋介石不但在财政、金融及工业方面已经崩溃，农村经济同样面临着破产的危机。

1945 年 10 月 16 日，国民政府颁布《自耕农扶植办法草案》。

规定政府以一定地价征收农地，发放给佃农、雇农，使其按地价分期付款。款项先由政府贷给，征收地为垦荒地、个人所有逾额地、不在地主出租之土地。然后，以一定地价征收之，以一定地价分配给雇、佃农等无地有力者自耕。

1945 年 10 月 23 日，国民政府颁布“二五减祖”令，即减原交租额之 25%。

1946 年 4 月 29 日，国民政府颁布《修正土地法草案》。

其主要内容为：

扶植自耕农。

照价收买私有土地。

规定地价。地价量应以能保护自耕地为标准，由各省、市自行拟定。

关于土地所有权，分国有地、私有地两种。但私有地之矿产不得为私有。海岸一定限度内之土地和天然湖泊、公用水道及其沿岸之一定限度内之土地不得私有；公共道路、矿泉地、瀑布、公共天然水源，名胜古迹及其他依法禁止之土地，不得私有。

以下土地不得转移负担和租给外国人：农田、林地、牧地，渔地、盐地、矿地、要塞、军备区、边境地区。

但是以上这些土地改革政策，均因农民负担太重，而先后破产，无法实行。

仅“二五减租”就不能实现。对此，有关调查资料曾予以专门说明：“地主方面，认为政府所征收之田赋过重，尚有随赋带借及征收地方公粮之负担，所收田租已难应付，倘再减租，除有少数富有之地主表示拥护外，其余中小地主而尤其他生业者，多表示反对”。[①]

“地主不予照减，或借故撤佃，连几亩赖以生存之耕地，也将无法保持。减租变成无田可耕。生活实堪可虑。纵政府有命令减租，而地主有钱有势，其不照减，政府当亦无办法，且政府人员多居地主阶级，谁肯抛弃其利益。”

对此，政府制定了解决办法：

一、由中央制定租佃契约，以法律和地方政府强制推行。

二。组织各省租佃委员会，督寻执行。

[①] 曹聚仁：《蒋经国论》，香港创垦出版社，1953 年 11 月版，第 76～77 页。

[①] 国民政府农林部关于浙赣鄂三省租佃制度及推行二五减租情形的调查报告，见《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二，1097），《汇编》，第四辑，第三十七册，第 9740—35 页。

三、组织中央督导团，“分赴各省巡回督察，考核，并协助各省切实推行及解决一切有关之困难问题。

关于扶植自耕农的方案，也同样无法实施。尽管 1948 年蒋于福建尤岩县试行扶植自耕农政策，但没有全国性意义，而又日失地千里，军粮一再借征，自耕农又何能幸存。加之物价飞涨，国库空虚，政府亦有何财力征收土地。故蒋之土地政策，虽系实行“耕者有其田”之方案，亦根本无条件和能力实行。

1946 年后，农民田赋增加极快，1946 年征收 5900 万担； 1947 年增收到 1.17 亿万担。一年中增田赋一倍。而到城镇上去卖米的老百姓，又要交“进出口（市镇关口）税”。据《大刚报》记载：

“老百姓从乡里挑一两斗米到镇市上去卖，也要进口税；要买点布下乡回家做衣服，也要出口税。”又据《四川经济月刊》载，四川有名目的捐税共为 240 种；其他如公债、代金、保长津贴等苛杂尚不在内。

又如河南省，1947 年 3 月，驻军 110 万人，而蒋只给 38 万人的粮食，其余全由农民负担。所需粮食约占河南粮食产量的 60～80%。

因此，广大农民纷纷破产，土地荒芜。据 1946 年 8 月 11 日《益世报》载，河南荒地达 30%；湖南荒地为 40%；广东荒地为 40%。1946 年国统区农业生产较抗战前减少约 8%至 12%，1947 年比 1946 年又减产 33%到 40%。而军粮日增，蒋之占领区又日益缩小，故农民负担更普遍加重。如果军粮以 500 万人计，全年所需军粮为 4000 万石；而实征和借征之粮，1947 年度，仅为 1800 余万石，相差甚远。[①]只得增加借征田赋额。

1948 年就改原“征一借半”为“征一借一”，且不发款券，不给利息，5 年偿还。这无形中又对其统治区农民加征田赋一倍以上。加上乡官舞弊，又何止增征一倍呢？

物价飞涨，农民受害尤重。据《中央日报》1946 年 4 月 20 日社论《米价与农村》云：“有些人还认为米价上涨，纵加重市民负担，但对农村却不无裨益。……其实这种理由在目前已失时效。因为今天已经是春耕季节，广大农民早已没有余粮。他们的粮食，远在年关或春节时，已被迫出售了。如果米价再涨，贫农势必再以高价买进维持生活的粮食。农民已经被高物价、高利贷及繁重的地方捐税压得透不过气来了。如果再加以米价上涨的袭击，其所受到的痛苦，恐怕更甚于市民”。

因此，福州、海州、厦门、黄岩、临川、曲江、新浦各城市和江西、浙江、江苏、广西各省，均发生抢米风潮。

1947 年，则于杭州、无锡、芜湖、宣城、合肥、吴县、衙县、成都、上海、南京继续发生抢米风潮。

又“鄂省粮荒极为严重。……即平均每六人中有一个在受饥饿威胁中”。荒地已有 130 余万英亩。至于湘南灾区，更是“野草充饥，人亡屋空”的荒凉惨况。1946 年 5 月 12 日，陈之迈在联合国报告“中国饥民己增至三千万人”。实际数目，在国统区之饥民远远超过此数。1946 年 10 月份，蒋介石统治区的饥民已达 1 亿。

同年 3、4、5 月份，衡阳即饿死灾民 9 万人。6 月份，湘省饿死 300 万

[①] 苏联《新时代》杂志：《中国的经济崩溃》（阿瓦林），1948 年，第十五期，《汇编》，第四辑，第三十二册，第 5868—1页。

人；江苏省灾民 3000 万人处于饥饿中。河南省 5 月份饥民达 800 万人。

12 月，河南、广东饥民 2000 万人。

1947 年“无家可归者约两千二百万人”。[1]总之，蒋之农业经济基础已不存在。广大农村已是“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惨状。

工商业衰退和工人失业

工商业在抗战胜利后并未复苏，反而进一步陷入危机之中。

危机状况与原因是：捐税繁多和重叠。1946 年 4 月，国民政府修订印花税，每千元贴印花税三元，“元异于营业税外一律重纳印花税三元”；又课税重叠，“货物自运销与批发，转售与门市零售商，再售于消费者，辗转五六手，以一货每经一手而课以一税，重叠课征不下五六次之多”；又营业税不分整卖、零卖，负荷，这“既不公允，对于工商业产销双方影响亦极巨”。因此，“物价无由平抑，工商业日就凋敝。”

高利贷利息暴涨：“战前一百元之贷值，以月息一分计算，需息一元。今物价较之战前平均普遍涨起约五千倍。则战前一百元之贷值，今则需五十万元。市息按月估以一角八分，计应解利息九万元。如市息按月二角四分，则需息十二万元（实际黑市高利甚有高至三四角者），是物价之涨为五千倍，而利息之暴涨竟达五六万倍以上。虽然骇人听闻，却为铁一般现实。”[2]

因之“各地工商业因不能胜高利之重负而倒歇者所见皆是”。

外货倾销：上海的汽水业，就因美货可口可乐进口，而大受打击：“各汽水厂商，均为国人资本，在上海设厂制造各种汽水、果汁等饮料，历史悠久，又出品力求改进，然近年为美国可口可乐挟其雄厚资金，运输可口可乐原料进口，由屈氏汽水厂代为装瓶，大量倾销国内各地，以致本国出口汽水销路大受打击，各厂被迫几濒停工，发发可危。”因而要求“限制奢侈饮料进口，以节外汇而维国本”。[1]

原料价格猛抬：上海杭丝绢生产因原料配给价格提高，而大部分停产：“中信局……斤斤于黑市为藉口，狂提配价，拖延时日，使生产中辍，岂仅危害民族工业，亦刺激物价，倡导涨风，且转瞬中日贸易开放，日本出口物资中列有丝织品 2600 万码。此庞大数字，占吾国丝织厂半年余产量。虽未得许可不能进口，但中信局不以成本配售，使国绸成本增加，无异奖励日绸走私。抑更有进者，顷据印度电告，印度政府近向日本交换的人造丝 1.5 万箱，交丝织厂织绸，抵制外绸运销。以彼帮此举反照中信局提高配价，尤令工业界人士不寒而栗。……鉴于人造丝配价问题拖延之结果，已有大部分厂停止工作，或处半停顿状态。岂仅丝织工业因此毁灭，十余万职工亦生计顿绝。”

政府管制：棉纱业，由于管制政策，亦日益调敝。上海市的情形就是如此：“乃半年以来，其（全国花纱布管理委员会）工作之所表现者，匪特代纺织统购统销举棋不定，治丝益纷，且复阻塞外销，削弱国际市场，所谓管制也者，既失计划，又鲜能力，与该会当初之所预期者相差日远；而国营纺建公司督导无方，酿成独占企业与民争利之恶果，尤失管制经济之要义。复

---

[1] 《蒋家王朝》，第 308 页。

[2] 《汇编》，第四辑，第三十二册，第 10484 页。

[1] 《中央汽水厂等呈》，见《汇编》第四辑，第三十二册，第 104184 页。

制工业处此双重压迫之下，日就颓废”。

因此，特别管制政策不但不予方便，反而形成“内则原料取给维艰，外则成品输出受扼。”使棉纱复制业“痛遭扼抑”。1947 年，棉纺织业三分之二的企业停工。

同时，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操纵物价，阳为平价，却暗中制造黑市，不公开报价，以抬高棉纱市价，而“受配工厂别无纱源。”

只得任其宰割。血本有限，崩溃日迫。

类似以上种种原因，其他行业也纷纷倒闭。如重庆面粉厂有一半倒闭。广东省也是“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工商在危困凋零之候”。其他如饮食业、制造业，亦无不如此。

又 1947 年国民政府转新华社抄件，说明上海、重庆、昆明、广州等地工厂倒闭者达 1600 余家。此抄件从多方面说明工商业调敝情况如下：

上海战后，国货业产量仅占战前四分之一，尤其棉纱及丝织业在高利贷商捐税及日货打击下，更奄奄一息。在麦克阿瑟助长下，日本丝织品 23.5 万码已首次运华，由美商务公司出口。继之喧嚷日本棉纱数十万吨，运销南洋，在上海、香港码头，已日见日本棉纱踪迹。

四川省各工矿业，则更为凋零。抗战中迁川之工厂 400 余家，仅存 100 余家，而且照常生产者又仅占一半。

广州较大工人一仅存一家。有 460 工人，官营士敏土厂和卷烟业，原有工厂 57 个，工人 8000 人，现仅存 19 家，每厂工人无上百人。饮料业中，广东实业公司之啤酒、汽水厂，为全市之冠，亦告倒闭。

福州工商业遭宴席捐、救火捐、渔民营业捐等 23 种苛捐杂税之剥削稽征之外，又有层层关卡。因欠纳税而被封闭者即有 12 家。

茶园荒芜，达十分之八。福州唯有一建华火柴厂，也因美货排斥而倒闭。日出 10 万吨纸的福建造纸厂也告停工。

原料出口工业也日益衰退，如重庆土特产品羊皮、生漆、白腊、丝巾、桐油、青麻、牛皮、木油、漆腊等货内销甚少，因又不能空运出口和长江受阻，大量滞销待出而不能。

自 1946 年 11 月 17 日，国民政府公布《修正进口贸易暂行办法》后，中国原料输出和工业大受打击，“几陷停滞”。对此，有张焕章者建议建立进出口联营制度，组织《中国进出口联营公司》，呈文蒋介石。他说：

“溯自修正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施行以来，因结汇（购买外汇证）损失，几陷停顿；输入因配额限制，日形萎缩。影响所及，农业产品因国内成本超过国际市场之价格，而无法出口，工业生产因进口原料不敷所需而停工减产。社会经济日趋调敝，国计民生危如垒卵。挽救之图，在扩大输出贸易，以争取外汇，并增加输入原料，促进生产建设。”

1947 年钢铁工业生产较战前低 50%。煤炭工业，也大量减产，如抚顺煤厂日伪时期日产量为 2.5 万吨，为日寇大量掠夺而去，蒋介石收复后，才日产 3000 吨。整个东北，华北、年产煤才 50 万吨，以致用煤不足。

由于工商业严重危机和相继停产、倒闭，工人也大量失业。据 1946 年 11 月报载，北平、南京、上海三大城市失业工人达 260 万人，同年 12 月，上海失业工人达 135 万之多。[1]其他各大中城市也有大量失业工人。

---

[1] 以上见荣孟源《蒋家王朝》，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304 页。

据 1945 年 10 月 15 日工人请愿团之呈文云，失业情况大致如下：“抗战甫告胜利，经济危机即随之而来，首蒙其害者，则为我数百万之劳工。产业工人或因工厂关闭而大批失业；或受紧缩措施陆续被裁；或因减少产量，降低待遇。职业工人如木作、泥水作、蔑作等亦遭经济影响，无形中陷于失业状态。此种趋势现仍继续发展中。”[②]此后失业者急剧增加。

至此，蒋政府在经济上已陷于绝境。

工农和学生运动

工人罢工运动，因工人失业而迅速发展。重庆、上海、西安、天津、蚌埠、开滦等地先后发生罢工、怠工约千余起。

农民因为粮荒和苛捐杂税，而进行反抗者全国各省均有发生，尤以四川、陕西、浙江、广东民变最多。四川一省就有 130 个县发生“民变”。总计全国约有百万人左右参加“民变”，反对蒋政权。

全国学生也纷纷游行示威，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要民主，此起彼伏，波及全国。同时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反对美国士兵侮辱中国女学生的运动，又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相结合，学运怒潮更加汹涌澎湃，震撼了蒋的统治，成为倾覆蒋家王朝的一个重要力量。

1945 年的“一二·一”昆明惨案，得到全国各校的响应。

1946 年 12 月 30 日北平发生反美军暴行学潮。1947 年全国各校纷纷响应北平学潮。同年 5 月，南京发生“五·二〇”惨案，继之全国各校亦纷起响应。同年 6 月，重庆发生“六·一”反内战、反饥饿运动。接着全国各校学生纷纷响应。与此同时，爆发了全国性的反美国扶植日本的学潮，一直持续到 1948 年。同年（1948 年）北平发生“七·五”惨案，全国学生亦纷纷响应。

1948 年的学运，与反蒋、反美斗争紧密结合，像滚滚洪涛，冲击着即将倾倒的蒋氏王朝。

[②] 《国民政府档案》（二，8827），《汇编》，第四辑，第五十册，第 11562 页。

第六章　兵败逃台

第三次下野

1949 年 1 月上旬，蒋介石在淮海战役又遭惨败，50 余万精锐之师完全被歼；其嫡系的少壮名将杜聿明也被生俘。这一结果决定了蒋介石的下台。

在这之前，美国政府早已有换掉蒋的意思。

1947 年夏，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来华“调查”一个月。在他离华前夕，蒋介石于 8 月 24 日在南京黄埔路官邸设茶会欢送，魏即在茶会上宣读了一篇访华声明。这篇声明代表了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想法。声明特别强调了南京政府的政治腐败和官员们“麻木不仁”、“贪污无能”；其中一句使蒋介石深感难堪：“中国的复兴，有待于富有感召力的领袖”。这已经在明显地暗示，蒋介石已经没有感召力了，应当另择新的“领袖”，来“复兴”中国。

9 月 8 日，美国务卿马歇尔把魏德迈的访华报告转交给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征询司徒雷登的意见。司徒即密电回答马歇尔：“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被目为过去的人物。……李宗仁的资望日高。”此时，司徒雷登已在建议以李宗仁取代蒋介石了。

蒋闻知美国白宫在策划换马，非常恼怒，但又无可奈何，便转而希望美国杜威当选为新总统，以取代杜鲁门，并为杜威竞选资助款项，妄图依靠杜威的支持，仍坐他那南京宝座。但是命有不济，1948 年 11 月，杜威落选，杜鲁门又蝉联总统，继续当政。

蒋的希望破灭了，不得不强打精神，于 11 月 9 日给杜鲁门写信，要求杜只发一个坚决支持国民政府的宣言，以“维持军队的士气与人民的信心，因而加强中国政府的地位，以从事于正在北方与华中展开的大战”。但是就连这个只是精神上的支持，杜鲁门也不答应，竟于三大后写信予以拒绝了。

这时，蒋介石既败局已定，又失去杜鲁门的支持，自然心慌意乱，知其宝座已经倾覆在即，深感大祸将临，于是脾气也更大了，致使他的侍卫人员，无不战战兢兢，惟恐祸事临头。

蒋的“文胆”陈布雷因提不同意见，也受蒋训斥，更感到前途暗淡，自己又是蒋的心腹刀笔，没有出路，便于 11 月 13 日自杀身亡。这一天晚上，蒋介石深受刺激，难以入眠，在房里踱来踱去，既在悼念陈布雷，也在为自己的前途苦思良策。终于，他想出一个妙策，激动得把水杯都推在了地上。他紧紧盯住了宋美龄，坚定地对宋说：“你到美国去一趟”，“去向他们陈情”。

当宋接受任务后，即于 11 月 24 日打电话给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表示她要到美国访问。但马歇尔却要她以私人资格访问，这又是一瓢冷水。28 日，宋美龄启程飞美。12 月 3 日晤见马歇尔。

10 日又见杜鲁门总统。她向美国提出了一个援华计划：（一）美国发表支持南京政府和反共宣言。（二）派遣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赴华主持反共战争和供应工作。（三）核准对华军援三年计划，每年提供 10 亿美元。[1]但对她的如意算盘，不管是总统杜鲁门，还是国务卿马歇尔，均未予理睬。美方认为：“现在局势恶化之程度，除实际调用美国军队外，任何大量之军事援

---

[1] 《蒋总统外传》，第 16～17 页。

助，均于事无补。”宋美龄不甘心空走一趟，于是便暂住美国，作长期努力。蒋看到大势已去，终于认识到干不下去了，就决定下野。

下野之前，他自然要如此这般地部署一番。

12 月 4 日晚，他在得知宋美龄在美国的不妙情况后，就召见亲信吴忠信，要他担任总统府秘书长，由他“辅助”李宗仁当总统，并说，“观察最近内外形势，我干不下去了。我走开后，势必由李德邻来维持。你就帮德邻上轿吧！等他上了轿，去留由你自己决定。”

12 月 16 日，蒋介石派张群、张治中、吴忠信到傅厚岗李宗仁住处与李商洽下野之事。经过两次会谈，蒋提出如下方案：

（一）蒋总统便于政策的转变，主动下野。

（二）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宣布和平主张。

（三）和谈由行政院主持。

（四）和谈的准备：

甲组织举国一致的内阁，其人选另行研究。

乙运用外交，特别加强对美、英、苏的关系，以期有利于和平的实现。

丙主动争取不满政府与主张和平政治团体及民主人士，共同为致力和平而努力。[①]

对于这个方案，白崇禧不赞成，他在武汉用电话告诉李宗仁的秘书长说，蒋必须辞职，“由李德邻正式就任总统，不能用代理名义。如果名不正，那就什么事都办不了。”并一再说明，对此要坚持到底。

12 月 20 日，孙科的新内阁组成。吴铁城任行政院副院长，做孙科的副手。24 日，白崇禧未和李宗仁商量，就发通电致张群、张治中转蒋介石，提出和中共和谈建议，呼吁和平。

李宗仁也随即宣布五项和平主张：（一）蒋总统下野。（二）释放政治犯。（三）言论集会自由。（四）两军各自撤退三十里。

（五）划上海为自由市，政府撤军，由各党派人士组织联合政府。

在上海进行和谈。同时，蒋又收到程潜要求蒋下野的通电。这下把蒋气得不住地哼哼，并用手指了一指世界地图上的北美洲地区，说事情的根源“是在那一边”！在身边的张群、吴忠信都一言不发。

对白崇禧等人的电报，他认为是在逼他下台辞职，他感到他处在内外夹攻中，形势很是不妙，便于 28 日电召阎锡山、胡宗南、卢汉到南京。

12 月 30 日，白崇禧又发电呼吁和谈。河南省主席张轸也通电主和。蒋介石见此情状，怒火中烧！他忿怒他说白崇禧：“这个狗头军师，使湘鄂豫三省勾结一气，要我好看！好！就看他们的！”

一边说，一边转来转去，在场的张群、吴忠信和阎锡山面面相觑，不敢吭气。

次日晚，蒋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等要人 40 余人便餐。饭后，蒋以低沉的语调冷冷坞说：“现在局势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在元旦发表。现在请岳军朗读一遍，征求大家意见。”

这篇文告，出自“江西才子”陈方的手笔。文告读罢，蒋问李宗仁有何意见？李答到并无不同意见。但蒋的拥护者谷正纲、张道藩等，均反对发表

[①] 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第 20 页。

这个文告，认为蒋下野对士气不利。谷为此还嚎陶大哭起来，其他人如萧同兹、范予遂则表示文告可发，蒋可下野。于此争论之时，蒋借机会大发雷霆，“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共产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1]然后，蒋又侧过头来对李宗仁说：“就当前局势来说，我当然不能再干下去了。但是我走之前，必须有所交代，否则你就不容易接受。”接着又要李转告白崇禧，“不要再发什么通电了，以免动摇人心！”李宗仁则微微一笑，说道：“总统英断，我无有不从之理，一切望赐教！”蒋又嘱咐张群，关于他下野的一句话必须列入文告，说罢就愤然离去。在蒋看来，要他下野简直就是离经叛道。

1949 年 1 月 1 日，元旦文告发表。文告的中心内容是：和谈是可以的，但国民党政府的一切体制和制度都不能变，至于蒋个人的进退，“一惟民国的公意是从”，仍不想下野，而是忖诸国民公决。

蒋介石发此文告，是为和谈定调子，是请国民们对蒋的被迫下野表示意见，希望国民支持他不下野。但蒋经国却在自己的日记里说是蒋为自己下野暗示军民作心理上的准备。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认为蒋是在“收回两周前决定之辞职”。

但到 1 月 4 日，蒋又亲自在李宗仁住处傅厚岗请李上台。他对李说：“我看我退休，由你顶起这个局面，和共产党讲和。”李推辞说：“你尚且不能讲和，那我更不行了。”李未敢轻易答应，当然也是常理。第二天，蒋又派张群、吴忠信前来劝李继任总统，让蒋“退休”。李仍以局面难当，不肯接受。以后蒋硬逼着李“不干也得干”。并且说共产党绝不同他讲和，李出来，“最低限度可以变一变”。李又说，他出来，共产党一定叫他无条件投降。又谈几次，蒋一直说是由李继任总统。

这几天，蒋真是度日如年。1 月 5 日，他召见吴忠信到官邸，向吴口述发给白崇禧的电报。电报大意是表示同意和支持白的和谈倡议，电报稿刚念完，张群又进来报告中共的反应，带来了新华社的评论稿和毛泽东的文章。评论题目是《战犯求和》，气得蒋一屁股坐下来；随后又叫念毛的文章。当张群念到“蒋介石希望从白崇禧手里夺回和平攻势的发明权，并在其新的商标下继续其旧的统治……”时，蒋长叹一声，就摆摆手说：“算了罢，别念了！”

蒋一面劝李继任总统，一面又期望他的嫡系、心腹或广大党员们大力挽留他，以便对国内、对美国人表明：不是他蒋介石不愿引退，而是部下、国民、党内“同志们”不让他下台；他也好度过这一难关，向美国人表示他仍是众望所归的领袖，国人仍然支持他。所以他表面辞让，引退，甚至表示“退休”，但内心并不是果真如此。

李宗仁也想上台，但也不能浅薄地马上答应，而是表面上极力辞让，一再推辞。但在实质性问题上，两者则互不相让，步步紧逼。

1 月 7 日，蒋介石知道杜聿明部于淮海地区已大半被歼，更泄了气，决定自动下野。他在这一大记下了如下日记，表示想要下野：

“杜幸明部今晨己大半被匪消灭，闻尚有 3 万人自陈官庄西南突围，未知能否安全脱险，忧念无己。我前之所以不能为他人强逼下野者，为此杜部

[1] 王泰栋：《魂断武岭》，第 8 页。

待援，我责未尽耳。”[①]

遂于次日下午召集孙科、张群、张治中等会商运用外交促进和谈局面，授意孙科令吴铁城外长照会美、苏、英、法 4 国，请其运用外交，施加影响。但美国因希望蒋早日下台，予以婉拒；苏、英、法也仿效美国态度。蒋又碰了一鼻子灰。

于是蒋又于 8 日派张群飞汉口见白崇禧，向白说明自己的两点意见：“（一）我如果‘引退’，对于和平，究竟有无确实把握；（二）如果我引退，必须由我主动，而不接受任何方面的压力。”

在他真正要下野时，他首先想到的是黄金和台湾。10 日，派蒋经国到上海，把金圆券换得的黄金、白银和外汇（3.7 亿多美元），密运台湾，仅留 20 万两黄金给汤恩伯作为军费支用。这就把李宗仁上台后的经费完全攫取一空，使李宗仁无法维持其局面。

接着把海空军实力中心移往台湾，大大减弱了李宗仁的江防力量，使李宗仁在军事上迅速垮台。同时又把军火也运到台湾。这一手很厉害，是对李宗仁的致命一击，可谓釜底抽薪。

就在这一天，杜聿明被俘，杜部被全歼。淮海决战，以蒋介石失败而结束。蒋介石早已经准备放弃大陆，退保台湾，建立一个清一色的小朝廷，拆李宗仁的台；并借刀杀人，希望李、白实力被消灭，他仍然当小朝廷的皇帝。否则，李、白统治江南，他老蒋也无法立足台湾。所以李宗仁说蒋介石下台是借刀杀人。当然，蒋仍尽力争取不下台，即使下台，也不放弃实权，以达到消灭李宗仁实力的目的。美国驻华代表团团长巴大维对蒋的迁台计划，曾提出异议。本年 1 月 5 日（1949 年）司徒雷登专门派傅泾波见李宗仁询问，李却毫无所知。

与此同时，蒋命经国和俞济时回溪口部署回乡居住和作幕后指挥技术准备。共装了 7 座电台，供蒋指挥一切，实际上是总统府的小搬迁。白崇禧也以重金包陈纳德的一架专机送黄绍竑到香港找李济深出面和中共联系和谈之事。但李济深已于上年 12 月 25 日应毛泽东之邀到东北解放区去了。黄不禁大失所望，只得通过民革驻港负责人与中共驻港负责人联系，把白崇禧的意图转告中共方面：（一）蒋介石下野后，一致对蒋，以防其再起。（二）由李宗仁负责和中共进行全面和平谈判。

同时，白崇禧又于 13 日截回自汉口运往广州的中央银行的银元。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则于 14 日发表对时局的声明，提出了 8 项条件：

“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受南京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针对这 8 项主张，蒋介石于次日召集张群、张治中、吴铁城等，商讨对策，暂决定不马上表态。第二天，蒋又召见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和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德懋，命他们把存入美国的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以免和谈成功后交给联合政府。这是一种大贪污和盗窃行为，史笔绝不能含糊其辞。

李宗仁见蒋尚无表示下野之意，即于 17 日派特使飞汉口，通知白，准备共同发起一次呼吁和平的运动，迫蒋下台。

[①] 蒋经国：《负重致远》，第 127 页。

至 19 日，蒋介石于黄埔路官邪召开“御前会议”，有政府各要员参加，主要是孙科、张群、吴忠信、吴铁城、陈立夫等。议决由行政院发表声明，愿双方先无条件停火，然后再派代表协商。会上蒋冷冷他说：“毛泽东对时局的声明大家想必都看到了。他提出在八项条件下的和平谈判，这些条件太苛刻了，我是决定下野了。现在有两个方案请大家研究，一个是请李德邻出来谈判，谈妥了我再下野，另一个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来主持。”[1]但这不是真心话。

蒋氏在询问大家的意见，寄望大家大力挽留他，但结果使蒋大为失望，大家面面相觑，半晌无言。吴铁城首先打破了这种沉闷的场面：“此事关系重大，是否召开中央常委会讨论一下？”这更使蒋失望，他按捺不住怒火，便愤然他说：“不必！什么中常会！我如今不是被共产党打到，而是被国民党打倒的！”这才是他的心里话。这时陈立夫眼泪汪汪地叫了一声总统，正想说什么，蒋介石立刻不耐烦地猛然起立，连声说：“好极了！好极了！我决心采取第二条办法，下野文告怎样措辞，请大家研究。主要意思是：我既不能贯彻勘乱的主张，又何必再为和平之障碍。”遂决定于 21 日 下野。

白崇禧则于 20 日至 21 日凌晨，在武汉加紧磋商对策，并在电话中叮咛李宗仁要当继任总统，而不能当“代总统”。白与大家连夜磋商后，总结为三条意见：（一）李宗仁必须当继任总统，而不能当代总统；（二）必须改组孙科内阁，另组张治中和谈内阁；（三）请何应钦出来任陆海空军总司令。

这三条意见写好后，由邱昌渭和程思远带回南京汇报。

蒋介石毕竟处处高李宗仁一着。当蒋决定下野后，不仅把黄金白银运往台湾，而且进行人事调整，他于 18 日把京沪警备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任命由汤恩伯任总司令。19 日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兼警备司令，其子蒋经国任台省省党部主任委员；薛岳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将京沪杭武装力量全部握在己手，四川省也为蒋之心腹所把持。这就使李宗仁在蒋的势力范围中当总统，一事难成。

蒋于 1 月 20 日晚见李宗仁，再说明下野之意。次日上午 10 时，蒋又召集要员于官邸开会。会上蒋以低沉的语调说出引退和由李宗仁上台之事后，好几个人竟痛哭流涕。蒋于此悲痛气氛中，掏出早已拟好的引退文告，叫李宗仁签字。李在一片抽泣声中，也顾不得看文稿，就签了字。

同一日，蒋介石曾召见浙省主席陈仪，问陈对他引退的意见。

陈仪向蒋微微一躬后，就说蒋的引退是“激流勇退，适当其时”。

这本是陈不经意的一句顺水推舟的客套话，而蒋听后，则脸色突然大变，缄口不语。陈因此话种下了杀身祸因[1]。

下午 4 时 10 分，蒋飞离南京，到杭州后住在笕桥机场。陈仪赶快请蒋到楼外楼吃饭，为他接风。陈诚、蒋经国、俞济时、汤恩伯也陪同在座。但蒋不赏光，滴酒未沾，大家不欢而散。

蒋离南京后，张群于下午才将文告交给李看。这时李才看到文告中并无退休和由李继任总统语句。李很生气，坚持修改文告，将代总统改为继任总统，态度坚决。张群便只好又打电话给笕桥的蒋介石。蒋则满口答应，说修

---

[1] 王泰栋：《魂断武岭》，第 12 页。

[1] 汤恩伯告密陈仪通共，蒋经国告陈仪指“青救团”为上匪，则终于促成陈仪被杀。

改到李满意为止。李就把修改稿交出，由中央社发表。但发表的仍是原稿，李看到后就把秘书长吴忠信叫来质问。吴说他只能听蒋的，要发表后再告诉他李宗仁。

李宗仁这才知道又被蒋介石愚弄了。吴忠信就是这样当了国府秘书长，“帮助”李宗仁上台的。

l 月 22 日，李宗仁上台，并发表文告。其中有“决本和平建国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蒋任国民党总裁，并未真正下野。

而且李宗仁的政策措施，也依照惯例，必须经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中常委）审议后，方可付诸实施。蒋仍有权干预国政，并仍于溪口指挥其“中央军”。这支“中央军”仍比白崇禧所控制的军队多；且南京又在汤恩伯的控制之下，李宗仁更难于控制南京政府。李就在此艰难坎坷中开始了和中共的和谈。

蒋介石于杭州宽桥机场住一夜后，于次晨乘机返乡。这时宋美龄还在美国“哭秦廷”未返，他更感凄凉和孤单。蒋的座机于宁波市郊栋社机场降落后，陪送和迎接的人很多，轿车队浩浩荡荡，直奔溪口而来。到溪口后，武岭学校的学生列队欢迎。蒋介石因心绪不佳，连手也没有抬一下，就过去了。

蒋在溪口的警卫工作由蒋经国编组的侍卫总队和国防部绥靖总队担任。原来俞济时要安排八十八军担任，只因军长是程潜的干女婿段沄，蒋未批准，并训斥俞济时：“你不知道他是程潜的干女婿吗？哼！程潜可靠吗？嗯？”

蒋到溪口后，仍在指挥军事和有关方面的事务。

1949 年 1 月 25 日，蒋召见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高级将领到溪口开小型军事会议。会上蒋划江西湖口以东归汤恩伯防守；湖口以西归白崇禧防守；他估计白的人马还有 75 个师，45 万人。

关于作战计划，他指示各高级将领们：“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京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淤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守淞沪，与台湾遥相呼应。必要时，我们以优势海空军从台湾支援淤沪，然后待机反攻。”[①]

这是蒋的最初战略设想，因为江西湖口以西由白崇禧控制，他无能为力。就幻想保住淞沪地区，为台湾的桥头堡，再转而反攻大陆。至于南京，因为李宗仁上了台，他决心放弃，并令汤恩伯将江宁要塞的大炮秘密拆运上海，把主力部队放在镇江以东。然后问汤听懂了没有？汤大声回答：“懂了！卑职一定遵命，不成功便成仁！”

为此，李宗仁说蒋破坏了江防计划，非常气愤。会上蒋又继续说：“共产党员要我的命，可是桂系的人既要我的命，又要我的钞票。”对此，谁也不敢表态。为了鼓励士气，蒋又说麦克阿瑟表示，只要我们争取支持一年时间，他们一定会全力支援我们。一年后国际形势必将发生重大变化，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打起来。他现在一心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可谓残酷，只要对他卷土重来有利，不惜全世界卷人战祸。

当年（1949 年）春节，不用说，蒋的心情不怎么好！最使他开心的事，是他对蒋氏宗谱的修订深为满意。此次修谱，蒋把结发妻毛福梅写成其母的义女，是他的义姐；把蒋纬国改在宋美龄名下，为宋所出。尤其是查明他的祖先蒋浚明为北宋光禄大夫一事，竟使他有了下台以来的第一次笑容。

[①] 王泰栋《魂断武岭》，第 46～47 页。

这期间，蒋又紧催汤恩伯电令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赶快将南京五大厂拆迁台湾。这 5 个大厂是电照厂、有线电厂、高压电瓷厂、无线电厂、马鞍山机器厂。孙越崎一再拖延，并找李宗仁帮忙，蒋未达到目的。蒋为此哀叹说：“孙越崎误国。他不迁厂，又骗了我一大笔拆迁费。唉！资源不走，资源留在大陆上了……唉！”

李宗仁和谈

李上台后，蒋介石诸事不与其合作，并处处给他制造麻烦，蒋李之间的斗争更加激化。李宗仁于此困境中开始了对中共的和谈。

1949 年 1 月 22 日，李电邀李济深、章伯钧、张东苏等共同策划和平运动。与此同时，又命行政院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为和谈代表，等候和中共商定地点后，进行和谈。又派邵力子到上海访见宋庆龄、章士钊、颜惠庆、黄炎培、罗隆基、张澜等人，请求为和谈有所促进。

看到李宗仁的活动后，中共于 23 日发表声明：（一）与南京政府谈判，并非承认南京政府，乃因其尚控制若干军队；（二）谈判地点，俟北平解放后在北平举行；（三）反对彭昭贤为南京政府代表；（四）战犯必须惩治，李宗仁亦不能免。

李宗仁见此情况，又立即于次日表明“和谈诚意”，特命行政院实行 7 项措施：

（一）将各地“剿匪总司令部”改为“军政长官公署”；（二）取消全国戒严令，接近前线地区，待停火后取消；（三）裁撤“戡乱建国总队”；（四）释放政治犯；（五）启封一切在勘乱期被封之报馆、杂志；（六）撤销特种刑事法庭，废止特刑条例；（七）通令停止特务活动，对人民不能非法逮捕。

但行政院并未完全照办。

27 日，李宗仁又致电毛泽东，声明他同意在 8 项条件基础上谈判，请中共迅速指派和谈代表。这个电报李未与孙科商量，也未经中常会和中政会讨论，蒋得知后立即打电话和孙科联系，要孙抵制李宗仁，迁院广州。孙科唯蒋命是从，便于 28、29 日和内阁要员离南京到上海，并议决于 2 月 4 日将行政院迁往广州。蒋也决定将中央常务会议移往广州举行，以便进一步控制行政院。这种迁院决议，孙科连李宗仁代总统也不告诉，实在是根本不把李代总统放在眼里。蒋不仅策动孙科行政院，还策动立法委员前往广州。凡赴广州者，每人送船票一张，美金百元，并且给港市 300 元的特别津贴。但留沪多数立委，仍愿到南京支持李宗仁。蒋“引退”后，把李宗仁的南京政府搞得四分五裂，难以工作。

中共又要求李宗仁与美国断交和帮助消灭蒋军势力，但李不答应。

中共则于 2 月 5 日发表广播声明，不承认李宗仁南京政府。对此，正中蒋介石下怀，他非常高兴，于当天日记写道：“共匪于今日广播明白表示‘不承认’李宗仁所代表之南京政府。未知李宗仁、邵力子、张治中等人当作何感想也。彼等■颜至此，尚计其革命历史与人格乎？”[①]

为了进行试探，李宗仁想办法派出了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

[①] 蒋介石 1949 年 2 月 5 日《一周反省录》。

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于 2 月 13 日离沪赴北平。14 日下午 2 时许抵达（北平己于 1949 年 1 月 22 日和平解放），叶剑英代表王拓和北平副市长徐冰到机场迎接，下榻六国饭店。此次议定了南北通航、通邮问题。

继而，代表团应邀与傅作义、邓宝珊同行，于 2 月 22 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石家庄见毛泽东、周恩来。经过多次会谈，中共表示 3 月 25 日左右确定双方会谈地点和共方代表人选。毛泽东又写一信托四老人转交李宗仁。24 日代表团返北平，27 日返南京，南京各大员于右任等到机场迎接。

与此同时，李宗仁在张发奎、薛岳、黄绍竑、黄旭初、于右任、童冠贤（立法院长）、白崇禧等支持下，迫孙科自广州迁回南京。2 月 20 日，李宗仁亲自到广州催请孙科回南京。6 天以后，孙又回南京办公。在回南京之前，李宗仁于广州参加了中央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孙科提出联邦制和隔江分治的政府形式。李宗仁和白崇禧均想隔江分治，形成南北朝局面，孙和李、白在这方面是基本一致的，这一着蒋介石失败了，孙科和李宗仁暂时站在了一起。

蒋介石一面引退一面照；日行使职权，最突出的事例，就是于本月 27 日，蒋命汤恩伯将陈仪拘押，让七十五军军长周碞接替陈职。李宗仁身为代总统，事前却毫无所知，待知此事，李非常愤怒，要严办汤恩伯。但经孙科、何应钦指点此系出于蒋意，不可与蒋闹翻，李宗仁也就泄了气，挺挺脖子将这口恶气又咽了下去。

在此和谈试探过程中，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李宗仁、居正、于右任、邵力子、张治中等，深感蒋于幕后操纵，对和谈很不利，李不便展开工作，于是张治中 2 月 20 日自兰州到南京后，就劝司徒雷登施加影响，劝蒋介石出国，但司徒绝不介入，反劝张自己去向蒋说。

张治中便只好以个人名义和屈武于 3 月 3 日上午 10 时飞抵奉化劝蒋。关于劝蒋出国的事，因消息泄露，报纸上业已刊出。蒋一见张、屈二人，便没好气他说：“你们的来意，是要劝我出国的吧？”说完，就拿起桌上的报纸一扬，淡淡地一笑说：“你看，报上登出来了！”张治中不觉一怔，蒋哼了一下，接着忿忿然他说：

“他们逼我下野尚可！逼我亡命，这是不行的！我如今是个普通国民，到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①]

蒋的这几句话，是先发制人，竟把张治中的嘴巴给封住了。张只好对蒋谈一些和谈方面的事。蒋遂缓和下来，就对张说：“当然啦！李德邻现在负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德邻的成败也是我的成败。文白，你可以告诉德邻，我一定竭力支持他！我愿意终老家乡，绝不再度执政。”继之蒋对张指出：“要备战求和”，不能划江而治。

蒋介石一直闷气在胸，不吐不快，便乘张治中来访之机，又恼怒地指责李宗仁，“一方面通过傅径波、司徒雷登向美国要军火，想用来武装自己的桂系军队；另方面又派人拉拢苏联武官罗申”，企图联美、联苏、联共压他老蒋，取而代之。随后又说，他决不再出山了，叫李宗仁放心。

此外又说了些和谈人选问题，蒋就把话止住，遂邀张治中等叩拜蒋母坟墓，游览雪窦寺。在游览中，张治中又委婉地向蒋提出出国之事，他对蒋说：“总裁，我看您到国外去休养一段时间，对您的身体会有好处的。”

[①] 王泰栋：《魂断武岭》，第 96 页。

蒋不禁大声地喊起来：“又来了，为什么老要劝我出国呢？”张治中紧跟一句话：“大家都是为了您好，您为党国太辛苦了……”

蒋则进而坚定而忿忿他说：“文白，我一定不出国，我不想亡命！

我可以不做总统，做个老百姓总可以吧？”张治中见此情况，只好连声说“是”，不敢再说下去了。张于溪口住了 8 天，毫无结果，失望而回。

就在张治中回到南京第三天（3 月 12 日），李宗仁把新政府成员名单交给立法院批准，投票结果是 209 票对 30 票通过何应钦内阁：21 日，新阁成立：

行政院长：何应钦

副院长：贾景德

政务委员：张群、莫德惠、张治中、朱家骅

秘书长：黄少谷

内政部长：李汉魂

外交部长：傅秉常（由叶公超代理）

国防部长：何应钦兼（先由徐永昌留任）

总参谋长：顾祝同（附属于国防部）

经济部长：孙越崎

交通部长：端木杰

教育部长：杭立武

司法行政部长：张知本

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白云梯

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戴愧生

主计处主计长：龙松舟

新政府中何、顾都是蒋的人，仍是唯蒋之命是听。这仍是蒋介石的政府。李宗仁筹建新政府后，第一个任务就是指派一个和谈代表团；其次是：政治改革；释放政治犯；制止通货膨胀；加强长江防务等。关于和谈问题，李宗仁于新政府成立后，即授权行政院组织正式的和谈代表团。谈判原则是：

（一）平等基础上的和谈，不接受不体面条件。（二）不同意建立以共产党为统治的联合政府；在两党控制区之间，划一条临时分界线。（三）不能接受中共八项条件，只同意在两方政府共存条件下，讨论八项条件。代表团成员为：张治中、黄绍竑、邵力子、章士钊、李蒸等，团长为张治中，以后李宗仁又加上了刘斐。

在南京组织和谈代表团时期，蒋又于 3 月 23 日召见华中“剿总”副司令宋希濂，同行见蒋的还有关麟征。到溪口后，宋、关两人先随蒋对蒋母坟行了三鞠躬礼，蒋在一旁还礼，并说谢谢你们，然后用早点。这次谈话中，他要宋，关二人不要听信别人对他的诬蔑。同时深有感慨地回忆了北伐时的征战之勇，并检讨说：

“抗战胜利后，很多部队完全丧失了斗志，尤其许多中上级军官更甚。他们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原因。”[①]

对此，蒋叮嘱要从官员教育上人手，叫宋、关带兵时首先“恢复国民革命军的传统精神”，而不是以严刑惩办贪官和读职之官。

[①] 王泰栋：《魂断武岭》，第 115 页。

3 月 26 日，中共的和谈代表团组成，团长周思来，成员有林祖涵、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

拟定 4 月 1 日于北平开始谈判。

李宗仁组织了谈判指导委员会，监督对中共的谈判。委员有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张群、吴铁城、孙科、吴忠信、朱家骅、徐永昌、董显光。4 月 6 日，李将这个委员会名单交广州中央常委会正式批准。

此后李宗仁又召见苏美英法 4 国大使，希望他们给予道义上的声援，施加影响，促进和谈。但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故意不看李宗仁，和其他三国大使说话，请他们表示意见。其他各国又均回避回答李的话。李宗仁碰了壁。这是因为李宗仁有名尤实，政府仍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又只是个代总统，指挥不动，自难于更张一切。另外，李宗仁又因蒋介石运走中央银行的黄金自银和美钞，而手元分文，美国也拒绝援助。司徒雷登则坦率地对李宗仁说，总统先生，你有其名无其实，政府实权全未更动，不管美国运来多少金银，还不是和以前一样，完全浪费，李万般无奈之下又请顾维钧在美国与其政府交涉。但顾仍听蒋介石的，对李宗仁不过是口头敷衍，虚与委蛇。弄得李宗仁这个傀儡代总统，真是一筹莫展。

但对蒋的这种死不放权的作法，元老于佑任、居正均痛心疾首，非常反感；蒋的老心腹人物何应钦、张治中、邵力子也看不顺眼，但没有办法。何应钦则是从内心反对蒋的专断和至今仍背后操纵一切的行为，但又不敢表示出来，仍事事要请示蒋介石，惟恐蒋会怪罪于他。

3 月 29 日，张治中以代表团团长身份，又到溪口见蒋介石，请示机宜，并汇报南京政府李宗仁的腹案稿。这个腹案稿内容，反对惩办战犯。关于宪法、官僚资本、土地改革、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停战，均可商谈。这次又是由屈武陪同张治中前来见蒋。屈和小蒋是同学，可以说上话。这次屈武问张，向蒋汇报有必要么？张治中说：“这样大的事，必须由总裁点头才行。

他虽退居溪口，但力量还在他手中，如果没有得到他的同意，即使应下协议，也没有用。”又说他与李宗仁说好了，李同意他到此一行。

此番到了溪口，张看到气氛有些神秘和紧张，与以前大不相同。蒋看完腹案后笑道：“嗯！没有什么意见。文白，你这次担当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哪！”张治中答是。然后照例拜叩蒋母坟茔。蒋边走边对张治中表示他是“愿意和平的呀！”

张治中立即问蒋，这句话可否在报上发表？蒋却滑头他说由张斟酌！自己不明确表态。次日，张离溪口返回南京。在蒋经国陪张到览桥机场分手时，蒋经国却恶狠狠地对屈武说：“文白先生太天真了！现在还讲和平，将来是没有好结果的，我看他会死无葬身之地的！”[1]回南京后，屈武才将小蒋的话告诉张治中，张治中非常生气，说：“这像什么话！”

4 月 1 日，南京代表团由张治中率领，乘中国航空公司天王号专机离宁赴平。张治中在飞机扶梯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最后说：“希望能够得到成功。”在张听到蒋氏父子的谈话和暗示后，赴北平前夕，已作好了秘密迁走家眷的安排；邵力子也作了同样的安排。

当天下午 3 时，张等飞抵北平，由中共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等迎接。刘

---

[1] 王泰栋：《魂断武岭》，第 126～127 页。

亚楼也参加了迎接。中共安排张等住进六国饭店。中共中央副主席。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于当晚设宴招待张治中和各位代表。

中共方面表示，无论和战，均要过江；李宗仁则坚持解放军不渡江，欲存半壁江山，徐图后计。4 月 5 日，李济深（民革）的代表朱蕴山、李民欣和刘子衡到南京。他们一下飞机就避见新闻记者，被报界称为“神秘客”。他们是特来正式告诉李宗仁，不论战与和解放军都要过长江。这使李宗仁划江而治的美梦完全破灭。

于 7 日晚，李又致电毛泽东，表示战犯可以由他一人担当，他人可以不究。果能如此，则一切可以本孙中山之遗教，与各党派共同建设新中国。对此，中共表示可以商量。

但是，如果蒋介石仍然于背后操纵，则一切和议也难以成功；战争也难以停止，李宗仁遂转向重点处理和蒋介石的关系。

为此，李宗仁请居正、阎锡山于 4 月 12 日赴溪口送给蒋介石一封信。信的中心意思是要蒋介石不要再背后操纵和制造混乱了，否则，他就决心辞职，但阎和居正一无所获，于 14 日返回南京。

17 日，蒋便让张群传话，要李宗仁、白崇禧到杭州会晤。李宗仁未予理会。

此前 4 月 13 日，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国共双方第一次正式会议，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提出了《国内和平协定》，共 8 条 24 款。南京代表提出修改意见 40 余处。其中半数已被采纳，并且同意不提战犯之事，但对于“就地停战”和“划江而治”，中共断然拒绝。4 月 15 日，中共代表团提出最后修正案，并说明，南京代表团愿否签字，需在 4 月 20 日以前表明态度。对此蒋介石未曾料到，他认为中共需准备半年才能渡江，他仍可以从容加强京沪杭防御和延长在上海的时间。

南京代表黄绍竑等立即于 16 日飞返南京报告，并劝李签字。

当时，白崇禧认为蒋仍可以和他共同坚守长江，对守江很有信心，如果中共不接受划江分治议案，他就决心不接受议和。李宗仁当然受制于掌握兵权的白崇禧，遂与白持有同样主张。当黄等把《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带回南京后，李也拒不签字，并派人把《协定》送到溪口给蒋介石过目。

黄绍竑对此非常恼火，他认为中共已同意白崇禧部队留在武汉，也可以开驻两广，并于一年内不在两广内实行土改，是很宽大的；李宗仁也可以作联合政府副主席。但是，李、白要的是划江而治，故坚决不签字。

这一步棋，李、白完全走错了。蒋介石有台湾为退路，他可以不要和平；而李、白并无退路，如不和中共相处，共同建国，势必在蒋介石的冷眼旁观下，完全失败，致茫茫大地无立足之处。结果正是如此。李宗仁对此错算一步而悔恨终生，白崇禧虽号称智多而实无远见，又一次受了蒋介石的愚弄。

李宗仁为了拖延时间，又于 19 日召开了和谈指导委员会，于下午作出决议，电请中共延长和谈时间。中共断然拒绝。张治中于 20 日的长途电话中请黄绍竑转告李宗仁，中共决定于 20 日夜进军江南。黄即于当晚飞赴香港，未返。20 日午夜，中国人民解放军分三路渡江作战。21 日，毛泽东、朱德下达渡江进军令。[①]

与此同时，张治中于 4 月中旬又专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劝蒋介石不要

[①] 《人民日报》1949 年 4 月 22 日版。

幻想重振旗鼓，为了不使国内长期混乱下去，应当暂时出国，以免负混乱之责。信中又颇多对中共赞扬之语。蒋见此信，不禁拍案大怒，竟骂张治中“丧权辱国”。这时，蒋才得知张的家眷去向不明，气得“嘿嘿”一笑，就咬牙切齿地叫小蒋通知毛人凤：“把于佑任监视起来，接到台湾去！莫让屈武把他弄走了！”[②]

蒋此时很忙，他令毛人凤再次准备暗杀李宗仁。具体办法是当李宗仁乘飞机擅自飞出南京时，就用战斗机将其击落。

继之蒋又向毛人凤部署任务4条：“第一，先要协助汤、陈（良，上海市）两位抢运物资；第二，要控制上海的轮船、帆船、大小木船；第三，集中沪、杭一带交警部队，以六个总队加入战斗序列，保卫上海，归汤恩伯指挥，以两个总队担任护运物资工作；第四，监视上海资本家，勿让他们私自将物资隐藏下来……”[①]

这种部署，可说井井有条，他紧紧抓住钱财，一丝也不放松，李宗仁眼看着蒋氏为所为欲，无可奈何。

但上海资本家并不傻，他们已于1948年12月间，大部分逃往香港。毛人凤赶紧回答说，连“杜月笙这几天也动身去香港……”。蒋又问在上海抓了多少人了？毛人凤报告说：“大概有三千人。”蒋又命令说：“凡有嫌疑的人一律逮捕。对张澜、罗隆基他们也要严格监视。必要时一律处决。”但毛人风则建议，杀了他们民主人士反落口实，不如不杀的好！蒋又点头说，有道理，以后再说。毛森已于上海共杀了1300人。连张澜、罗隆基二人要不是毛人凤赶快向上海警察局长毛森打电话，也被杀害了。

谈判破裂了，解放军的百万大军于4月20日晚分三路强渡长江。4月22日，蒋介石邀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到杭州会谈。会谈之前，蒋和白达成谅解，就是蒋、李只能有一人负责全局，要么蒋复职；要么蒋把一切军、财、人事权完全交给李宗仁。参加会谈的还有王世杰、吴忠信等。

一见面，蒋就问李宗仁对和谈还有什么打算？李说准备再派人去谈一次。蒋立即说：“不用了！不必再谈了。过去共产党因为在军事上没有部署好，所以才同意和谈。现在他们已经渡江，再没有谈判的余地了。”李随即提出去职心意。蒋仍然要李继续支撑，但提出成立一个“非常委员会”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决策机构。由蒋任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今后一切大政方针，先由非常委员会决定，再交政府执行。当时大家均附和蒋的提议，李宗仁不好表示反对。李宗仁此次会谈完全失败。午饭后，白崇禧返回武汉。

蒋和李继续会谈，共议定二条：（一）在政治上，宣布和谈破裂，政府今后唯有继续作战，党内不许再倡和谈。（二）在军事上，由行政院长何应钦兼国防部长，统一陆海空军的指挥权力。参谋总长直接向国防部长负责。[①]

这第二条，是在拉拢何应钦，孤立李宗仁。同时决定总统府和行政院迁往广州办公。这次会谈中蒋曾拉李宗仁到一间房子里单独对李说：“不论你要怎样做，我总归支持你！”[②]李碍于情面，见蒋如此真诚，竟没有提出一个具体要求，就被蒋哄过去了。

[②] 王泰栋，《魂断武岭》，第140～141页。

[①] 王泰栋：《魂断武岭》，第140～141页。

[①] 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第78～79页。

[②]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967页。

李宗仁返南京后，章士钊、邵力子来电劝李宗仁径飞北平脱离蒋介石。但李未接受，并将电文掷在地上，以表决心。李宗仁认为蒋要借此“非常委员会”走上前台，便决心不接受蒋的提议，决定不飞广州，改飞桂林。23 日，李宗仁乘追云号飞机在故宫机场起飞，自然许多要员包括汤恩伯也来送行。飞约一时，李宗仁突然命驾驶员改变航程，飞往桂林。中午达到桂林，李即住进文明路一三〇号私宅。

在飞机上，李曾和李汉魂、邱昌渭等商量，一定要和蒋分清界限，似乎决心很大。

李到桂林后，在广西的立法委员和省府委员等一致发表文电。

请李宗仁补签《国内和平协定》，实现和平。李仍拒不答应。接着李又派程思远到汉口请白崇禧。白则骂李宗仁“庸而好自用”，误了很多事，说李宗仁是扶不起来的人。经程等苦劝，白崇禧才答应飞桂林晤李。后因飞机不能在雨中降落桂林，便改降广州。白住人东山六横路妻弟马仲学家。白之夫人马佩璋也正在这里：夫妇不期而遇，自是惊喜交集。

饭后，邱昌渭来马家和程思远谈访问美国驻华代办路易士·克拉克的情况，他说美国对蒋介石已失去信心；但对李宗仁，也因为李未能掌握实权和有所作为，而不可能提供援助。这表明美国对李宗仁也失去了信心。李宗仁此时的出路，只有靠拢中国共产党。

第二天，白崇禧和李宗仁通电话，劝李到广州主持工作，并说打算请居正、吴忠信见蒋，要蒋将存款、存械和政权统统交出来，让李主政。李则说这是没有希望的，不必多此一举。

5 月 1 日，程思远于天河机场接张发奎时，得知广州薛岳因和陈诚关系密切，虽不同意蒋介石重新出山，但也不能公开表示反对；余汉谋也为人持重，不能公开反蒋。因此，依靠广州当局反蒋，已不可能。白崇禧和阎锡山、居正等，于 5 月 2 日到桂林促李宗仁到广州主持政府工作仍与蒋介石合作。

李宗仁没有主见，又动摇了。于是又决定到广州一试。

李宗仁到桂林的第二天，即 4 月 24 日，南京已经解放，太原也于同日被收复。这时蒋氏父子已感面临绝境边缘，心情极为沉重，家园虽好，不可久居，蒋经国先送妻儿于本日下午飞台。次日上午，蒋氏拜别母坟，然后走上凤凰山，对故乡作最后一次眺望，自是往事不堪回首，深感“大好河山，几至无立锥之地”，“深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但蒋氏父子此时仍立志“誓必重回故土”。当然，他们父子两代均未能实践誓言，先后死于台岛，并至死不愿与中共和解。下午 3 时，父子二人拜别祖堂后，便背着乡亲们，悄然乘车离开溪口，至方门后，下车步行至象山港，登太康号军舰，直驶上海；从此再未返回溪口故乡。

在途中，蒋经国给其父读了关于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致李宗仁的通电。

当念到他们因中共坚留，决暂留北平，以待再行和谈时，蒋又哼了一声，“是他们自己愿意留下来的吧！”“什么中共坚决挽留！”蒋经国又继续念下去，其中有“上海孤悬，岂可久守”之句，蒋又自言自语说：“上海只要再守半个月，能把所有物资抢运出来就行了。”

蒋经国再往下念去，其中有对中共的赞语：

“同人等默察近来国共成败得失之原因，其主因在政治上而非在军事，盖中共积其二十余年之丰富经验，深得为民服务之道，而其严格之批评与自

我批评作风，又保证其上下一致，贯彻其主张与政策，因而获得人民之合作与拥护。同人等与各方面接触，目击耳闻，知中共对于维护国家独立，尊重人民生活自由，贯彻其城市政策，扶植民族工商业，确为有目共睹之事实，且亦符合国父革命之理，决非吾党过去政策与作风所可企及。”

读至此，蒋介石又气愤起来，恼火他说：“宣传！宣传！纯是替中共宣传。”蒋经国于是以目光征询其父意见，是否还要读下去？

蒋介石仍表示要再听听。

蒋经国又继续读道：

“自和平协定公布，党内多诋为条件太刻，类似迫降，致有‘宁可战亡，不可败降’之愤语。然平心而论，八条因为德公所承诺之商谈基础，二十四款只系实施八条之详细规定。如第一条战犯名单，完全不提，即为重大让步之例，并经口头约定，正式签署协定时，尚可酌加文字上之修正。同人之愚，以为革命大业，天下为公，已既不能，当让能者！今日之事，倘政府昧于人心与大势，仍继续作决无前途之战争，则惟有仅存之残局至于毁灭，增益其对民族历史所犯之罪愆。倘能平心静气，发挥高度理智，不因少数人意气权位之私，置大多数人民生死祸福于不顾，则一转念间，祥和立现。例如近日上海之战，外围据点尽失，尚期凭四困之地，死守到底，则将毁灭 600 万人民之城市，此岂仁者之所为，亦岂大势所许可。”蒋听到此处，霍地站起来，要战报看。

26 日下午 1 时，蒋到达黄埔江复兴岛。

27 日，发表文告，声明他“拥护李代总统暨何院长领导作战，奋斗到底”。后蒋一度移住上海市金神父路励志社。

在这个声明里，他特别把反共战争改说成为民族解放战争，欲以此煽起民族情绪，继续顽抗。他说：“我们当前的情势固然是险恶的……但是我们认清了今日剿匪作战是反侵略主义的民族战争，是反集权主义的民主战争；同时，也是为了每一个国民，每一个家庭自由生活方式之社会战争和保障我们悠久历史、文化和仁爱的伦理道德的文化战争。……这一反侵略战争如果失败，国家的独立自由地位，人民的自由生活方式，都必归于毁死，我们的前途，只有普遍的贫穷，冷酷的饥饿和世界战争。”[①]蒋于此处先后接见徐永昌、顾祝同、周至柔、桂永清、郭忏、汤恩伯、毛人凤、陈大庆，石觉、谷正纲、陈良等要员。他仍公开声称要死守上海 6 个月，以安定人心。

李宗仁在白、阎、居正、李文范访桂期间，写好一个和居正、阎锡山、李文范的谈话记录，向蒋介石摊牌。记录内容共 6 条：

（一）关于人事，由代总统行政院负责，蒋不得过问。

（二）移存台湾的金银、外币，应由政府运回大陆，以应军政开支，移存台湾的美援军火，应由政府运回大陆。分发各部队使用。

（三）各级政府依宪法行事，向总统及行政院长负责。

（四）所有军队，一律听从国防部指挥调遣。

（五）党中央的决策，只能作为建议，不能强制执行，

（六）拟请蒋先生出国考察，并设法争取外援。

白对此完全同意。但适于此时，蒋自上海拨给白崇禧三万两黄金，最后一万两由华中“剿总”补给司令许高阳夫人黄纫秋本人带回武汉。因此，白

[①] 《大公报》（上海），Iq49 年 4 月 28 日，第一版。

崇禧又转而支持蒋介石，并私劝李宗仁请蒋复职，李宗仁当场拒绝。两人从此开始存有芥蒂。

这个谈话记录，于 5 月 4 日送到了上海，蒋见到后，自然又是十分气恼。针对李宗仁的 6 条，他作如下赌气答复，一切推开，与己无关：

“一、总统职权既由李氏行使，则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依据宪法有自由调整之权，任何人不能违反。

“二、前在职时，为使国家财富免于共党之劫持，曾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转移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一切出纳收支依常规进行。财政部及中央银行部册俱在，尽可嵇考；任何人亦不能无理干涉，妄支分文。

“三、美援军械之储存及分配，为国防部之职责。引退之后，无权过问，部册罗列，亦可查核。至于枪械由台运回，此乃政府之权限，应由政府自行处理。

“四、国家军队由国防部指挥调遣，凡违反命令者，应由国法之惩处，皆为当然之事。

“五、至于非常委员会之设立，为 4 月 22 日杭州会谈所决定。

当时李代总统曾经参与，且共同商讨大纲，迄未表示反对之意。今李既欲打消原议，彼自可请中常会复议。惟民主政治为党的政治，党员对党负有遵守之责任；党对党员之政治主张，有约束之权利。

此乃政党政治之常轨，与训政时期以党御政者，自不可混为一谈。”[①]

关于出国之事，蒋更是官话连篇，他说：“若谓中不复职即应出国，殊有重加商榷之必要。中许身革命四十余年，只要中国尚有一片自由土，不信中竟无立足之地。”接下去，他又说自己只尽责任，并无干涉政治和越份行为：“中自引退以来，政治责任已告解除，而对革命责任仍自觉其无可逃避；故德邻兄凡有垂询，无不竭诚上答，但决不敢有任何逾越分际干涉政治之行动。”

“今日国难益急，而德邻兄对中隔膜至此，诚非始所料及。而过去之协助政府者，已被认为牵制政府，故中惟有遁世远引，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问闻。”[①]

蒋强词夺理说得头头是道，把一切不是又推给了李宗仁，最后表示不再过问一切，算是对李宗仁的答复。但这个答复显然无法兑现。这个答复 5 月 5 日送广州。次日，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临时会议，推阎锡山、朱家骅、陈济棠三个携带蒋的答复赴桂林，促李宗仁起驾到粤。

蒋介石转移台北

李宗仁见到蒋介石的 6 条答复后，明知不能兑现，但迫于白崇禧等人的压力也只好到广州上任一试。白也知道蒋介石虽说了大堆官话，仍是随时想利用李宗仁的困境重新登台。

5 月 8 日，李宗仁偕阎、朱、陈三人和随员等，仍乘追云号飞赴广州，于上午 11 时抵达。因何应钦尚未准备好行馆，李只得暂住广州市府迎宾馆，并发表一篇反共讲话。21 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声明不再言和。

[①] 《李宗仁先生晚年》，第 90 页。

[①] 《李宗仁先生晚年》，第 90 页。

白帮助蒋把李宗仁又携持到广州，以受蒋之摆布，无法脱身，继续为蒋效命。更为蒋介石撤注台湾准备了充分时间。对此章士钊和邵力子深为惋惜。

李宗仁在桂林住了两周。此间解放军自解放南京后，前锋已人闽境。自5月5日至10日，解放军于浙西歼灭蒋介石军队第四、二十、二十八、四十四、五十一、六十六、六十八、一〇六各军和第四十六军一七四师、张雪中第九编练区第十二、七十二、七十四、八十五军全部；歼第九十六军大部、八十八军两个师；歼第十八、二十一、五十四、九十九军的一部。汤恩伯早已于南京解放后，收缩防线于上海。这样，解放军就将蒋介石和白崇禧的军队分割开来。5月15日，武汉解放。20日，西安被攻克。中共中央遂决定先克上海再消灭白崇禧部；最后围攻川、滇、藏。

蒋这次来上海，接见了杜月笙，并对经国1948年扣押他儿子杜维屏一事表示歉意。

5月3日，杭州解放。5月7日晨6时，蒋乘江静轮离开上海。

蒋在当日日记中表示不管前途怎样艰难，他也要“不屈不挠地奋斗下去”。他说：“旧的创痕还未愈，新的创痕又深了。”还说，“我眼看到中华民族的危亡，怎能不挥泪前进？前进的一条路谁都知道是困难的，但是不必害怕，……我们今天要前进！莫退，莫退，前进！”[①]蒋经国则说他父亲正在漫漫长夜中“鼓着最大的勇气，乘风破浪，向一线光明的前途迈进”。其实连蒋介石自己也心中无底。12日到达舟山。这一天，蒋于海天孤岛上，眼望大陆，又开始反省他过去的江山得失之处。他此时深感到他过去的部下和文武官员们，多是空言不实，麻木不仁，徇情任私，官僚作风，致使他的蒋氏王朝，一朝瓦解。因而他想到要训练大批新干部，并使新干部“深入社会各阶层，组织基层群众，严格执行纪纲，提高组织尊严”。

此时他更特别想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大问题，就是因为他自己无力监督各级官员人等，而想到“要以群众力量来维护党纪；且保护每一个党员都应服从革命的领导，执行革命的纲领。铲除空言不实，因循敷衍，徇情任私，麻木不仁等官僚作风，而代之以实事求是，精益求精，急公尚义，严正不苟，是非分明，赏罚公允的新作风”。[②]

蒋介石的这个思想萌芽，极其重要，这是他从王朝倾覆的切肤之感和惨痛教训中得来的认识。

基于新的认识，他制订了一个未来治理台湾地区的政治纲领草稿，内容如下：

“以定海、普陀、厦门和台湾为训练干部之地区；建设则以台湾为着手之起点。实行训练干部，编组民众，计口授粮，积极开垦，在社会上不许有一个元业游民。实行‘二·五’减租，保障佃户；施行利得税、遗产税，筹办社会保险，推进劳动福利，推广合作事业；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以民生主义社会建设及其政策实施为要务。更拟推行土地债券，士兵与工人的保险制度。”[①]这是蒋和蒋经国以后治台的基本新政纲。

5月15日，解放军全面攻击上海，势在必得。蒋命蒋经国飞上海见汤恩伯。次日上午10时余，蒋经国又飞回定海，向蒋介石汇报战况。当日蒋介石

[①] 蒋经国：《负重致远》，第187页。

[②] 蒋经国：《负重致远》，第183页。

[①]

到金塘岛拜如果法师塑像。

17 日下午 1 时，自定海机场起飞，下午 4 时 50 分到马公岛，驻马公城外宾馆。蒋于此游览胜景寺庙，同时，接见来访大员。25 日至 27 日，上海全部解放。汤恩伯奉蒋命撤军福建，而不增援华中和广东。

26 日蒋自马公飞抵台湾冈山，再转高雄寿山。于此拟定防台计划，以舟山、马祖、金门澎湖一线为前哨，也为“反攻复国”之桥梁；确定今后以台湾防务为第一，同时考虑成立“非常委员会”（类似孙中山的非常大总统府）和人选问题。蒋于寿山居住时，自然仍是寝食不安，连夜多梦，压力很大，心绪也仍然低沉得很。有一天中午，他和谷正纲、张道藩到小菜场饭摊上去吃饭，散心，倒吃得津津有味。6 月 6 日，蒋面示蒋经国：“共党是绝不会成功的，但我们本身能否成功，要看我们自己的做法。”[②]

至 6 月 14 日，陈诚奉蒋命宣布台湾市制改革。这些天，正在风传联合国将接管台湾的消息。这使蒋极为头疼。这是杜鲁门想叫他茫茫大地，无立身之处。蒋表示：“此一问题最足顾虑。”但他说：“余必死守台湾，确保领土，……决不能交归盟国；如彼愿助我力量共同防卫，则不拒绝。”

蒋在忧虑中终于 20 日接到驻日使团来电，报告“盟总对于台湾军事颇为顾虑，并有将台湾交由盟国或联合国暂管之拟议。”蒋于忧心忡忡中回电指示 4 点：（一）共管不合开罗会议原则和中国民心。（二）美国不应承认中共政权。（三）中国政府决心与中共持久作战，中国政府决不会成为流亡政府。（四）向麦克阿瑟元帅提出两个主张：甲，美决不可承认中共，并防止他国承认。乙，美国政府应以积极态度，协助国民党反共和确保台湾。

第二天下午，蒋离高雄，5 时 20 分抵桃园，再转大溪。大溪的风景很像蒋的家乡溪口，蒋即居住于此。

24 日上午 9 时，蒋携经国再离大溪，10 时到台北，迁居草山，成立总裁办公室。草山地处台北之北，约 13 公里，风景清幽。蒋改草山为阳明山，表示他对王阳明的尊崇终生不改。同时开始研究毛泽东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 年 12 月发表）和统一战略思想问题。

此后，草山就成了真正的总统府，大陆尚未解放的各省大员纷纷来此报告和请示。

李宗仁到广州后，就落人了蒋的圈套。李、白共守桂林的局势被打破了。这一次，白崇禧又帮了蒋的大忙，代价是 3 万两黄金。白见钱眼开，忘了根本大计，最后只得寄居台湾。

李一到广州，即于 5 月 16 日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通令全国，凡有再言和平者，以叛逆论处。李宗仁又死心塌地上了蒋介石的破船。

同时，李仍幻想美国给予支援，便召甘介侯来广州，命他赴美向杜鲁门求援。甘于 5 月 19 日赴美。甘到美国后，对杜鲁门说：

“蒋正以胡班兵团和刘安琪兵团保卫广州国民政府，请求美国援助。”杜鲁门正好得到胡、刘两兵团，一个准备撤金门，一个撤往海南岛，再撤台澎地区的消息，知广州根本不在蒋的保卫圈。因而对甘说：“我是密苏里州人，我们密苏里州人最讲实际的。”一句话，说得甘面红耳赤，无言而退。

李宗仁又让何应钦从台运来一些黄金白银应急，何已知蒋根本不再理会李宗仁了，什么也休想要到，无法完成。李又让何应钦的行政院召集西南各

[②] 蒋经国：《负重致远》，第 187 页。

省军、政首要到广州开会，要粮，要钱，想采取征借一半全归中央的办法，解决困难。何氏在会上说明借征之事时，四川、贵州两省提出异议，不同意。白崇禧建议发“粮券”购买民间余粮，但座上无一人赞同。下午继续开会，徐堪发言说，台湾有那么多外汇（4 亿美元），为何不拿来发行新币？会议上七嘴八舌，无果而散；另外，宋希濂以蒋嫡系自居在长途电话中，不承认何之院长兼国防部长职务，使何难堪，何应钦干不下去了，于 5 月 20 日提出辞呈。

20 日，两广要人白崇禧、李汉魂、邓龙光、黄镇球、黄旭初等和陈诚在东山梅花村陈济棠私宅开会，曾一致主张及早经营海南岛，作为广州根据地。但未能实行，也行不通，因为李不像蒋，有大量黄金、白银、美钞，而是一个分文没有的光杆代总统。

5 月 30 日，李宗仁提居正为行政院长，中常会立即通过。但立法院却以一票之差，不够半数未能通过。其原因，各说不一。李宗仁认为韦永成、张岳灵两立委未能参会，否则，就可以过半数通过；蒋介石认为李宗仁在招待立法委员时，讲了居正可以对悍将的错话，得罪了立法委员。实际上，这一票之差，证明是李宗仁至此已不能得到立法院的支持了，为什么？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进步一些的立委认为李宗仁自己又无实力，而又拒不签署《国内和平协定》，和蒋一样成了坚决反对和谈的顽固派，对李有怨气的人数大大增加。例如李拒签字后，就有立委范予遂、武和轩、李世军等 55 人发表声明脱离国民党政府。

李宗仁无奈，又于 6 月 1 日下午提议阎锡山为行政院院长。6 月 2 日，立法院通过。对此，蒋介石甚是高兴。当日即计划与阎锡山再商一切政要。还考虑了“非常委员会”人选问题。

阎锡山上任后，照样要到台湾晋见这位曾声明飘然远引，不干政事的蒋总裁，由他决定行政院人选。阎自台岛回广州后，李宗仁于 6 月 10 日发布新政府名单：特任朱家骅为行政院副院长；李汉魂蝉联内政部长；阎锡山兼国防部长（此时阎已无一兵一卒，只能当蒋的傀儡）；叶公超代外交部长；徐堪为财政部长；刘航琛为经济部长，其他仍旧。其新人中，只有朱、李、刘三人为李宗仁所提；其余新人选，均是蒋介石衣袋中人。

13 日，阎阁就职。

刘斐于 6 月 13 日（1949 年）从香港到达广州看望李宗仁、白崇禧，欲劝李、白起义，投靠人民。李宗仁听到此处后，并未答言，待刘斐辞出后，李宗仁问白崇禧：“怎么样？你手中有枪杆子哩！”白沉吟不语，过了片刻，才说：“将来如有必要，去台湾怎样？”李宗仁听到这句话，勃然变色，急不择词地脱口而出说：“王八蛋才去台湾！”李宗仁和白崇禧之间，也已貌合神离。白是始终和蒋介石有矛盾，而又离不开蒋，常在蒋、李之间摇动，而最后还是投靠了蒋。蒋 3 万两黄金就把白拉过去了。但蒋对白也只是利用，处处防他得到便宜，并且必欲消灭其军事实力而后快。

白不愿起义，李宗仁也就得继续支撑，和蒋介石周旋。

6 月 16 日，阎锡山访李宗仁于迎宾馆，拿出一份电报稿，请李同签，内容是请蒋介石来广州主持大计，李宗仁竟然稀里糊涂地签了“照发”二字。蒋介石立即回电，表示“于短期处理琐事完毕，决定行期，另电奉告。”这无异于李宗仁已经表示辞职。蒋从此以后，就积极准备走向前台。6 月 20 日，广州国民党中央于广东“绥靖”公署二楼会议厅召开中常会。顾祝同首先报

告上海撤守以后的军事形势。接着，参谋次长萧毅肃发言，指出胡宗南于 5 月 20 日退出西安后，转进四川；宋希濂兵团也自华中入川。因此保卫华南部队，只有白崇禧三个军。

等萧说完后，吴铁城马上发言，指出这种军事部署，并无保卫华南或广东决心。他又指出，上海撤守后，不移军广东，而撤到福建沿海；刘安琪自青岛撤军海南岛，而不调驻粤北，这是为什么？又指出国防部只准备守沿海岛屿，根本就没有保卫华南计划。他最后问：“我愿意知道，国防部这样部署兵力，究竟是谁的主意？”

吴的这一席话，使阎锡山和顾祝同不禁面面相觑，不吭一声。

马超俊又接着发言，他也同意吴的意见。会场空气顿然紧张起来。

后来顾祝同不得不说：“所有部队调动和兵力部署，以及有关构筑防御工事，都是由总裁亲自决定的。”[①]这样一摊牌，大家就默无一言了。

可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中，具有绝对的最高权力，谁也取代不了他。他的秘诀是什么呢？那就是军队紧抓于手中不放，财资金银不离左右；特工人员，控制军政。

蒋的此一部署，显然是置桂系李、白军于孤立境地，借中共之手将其消灭，而欲力争保留川滇地区，为台湾的外援和反攻大陆之桥头堡。

战局进展到 6 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后己先后解放南京、上海、杭州、南昌、九江、武汉等 120 余座城市。华北亦宣告解放。5 月 20 日攻克西北地区重地西安。山东青岛亦告解放。至 1949 年 6 月底，共歼蒋军已 305 万人。解放国土 60.7 万平方公里，特别市、省会、县城 482 座。蒋控制的只为川滇黔桂粤各省和西藏、新疆地区。

6 月 24 日以后，李宗仁的广州政府为大力解决经济问题，已在美国定铸了 3000 万银元，但需 7 月 12 日才能起运。重庆、成都设造币厂，需半个月或一个月后才能开工。最后成立由吴铁城、陈立夫、徐堪组成三人财政小组，专门解决财政问题。7 月 3 日，行政院公布币制改革，发行银圆券。

6 月 29 日，白崇禧于长沙召开座谈会，有大员李品仙、夏威、张涂、李汉魂、邱昌渭、程思远、黄旭初、韦贽唐、黄绍竑等参加，由张桓记录。白说，国民党的组织和威信给蒋介石搞坏了，我们要保持华南这个局面，光靠军队还不行，必须“重建”国民党，以维系人心。7 月 1 日，又请程潜、陈明仁和参加座谈会的各大员共同召开会议。会上白提出“重整”国民党，实行三民主义的动议，又说大家都是发起人。白还把“中国国民党重整同志会”的章程，叫张桓读了一遍，并征求大家意见。但没有人说话，一片沉默凝重的空气，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后来只有程潜没精打采地说：“愿意在白长官的指导下，为实行三民主义而奋斗到底。”于是散会，显然，白在幻想自己当华中之王，并要以整顿国民党为己任。这样一来，白又不愿蒋返回广州妨碍他了。次日，白召开小型会议，有李品仙、黄旭初、夏威、李汉魂、程思远、邱昌渭参加，主要是研究蒋介石来广州的问题。邱昌渭向白报告了 6 月 16 日阎氏请蒋回广州主持大计的事。白立即表示蒋来广州会削弱李宗仁的地位，不如请李宗仁去台湾为好。白既指责蒋介石搞坏了国民党，又不尊重李宗仁，让李移樽就教，大有提高自己地位贬压李的意思。

7 月 3 日，李品仙等来到广州，下午 4 时李仁宗邀李品仙、李汉魂、程

[①] 《李宗仁先生晚年》，第 100 页。

思远、邱昌渭谈话。李宗仁听了李品仙报告后，就按白崇禧的意见立即给蒋介石打长途电话，说有要事相商，决定即将赴台相见。蒋马上回答说，他即将来广州，请李宗仁不必来台。

这时，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向李宗仁报告了以下情况：

（一）有 180 多位立法委员在陈氏兄弟策动下于广州联名请蒋介石速来主持局面。

（二）蒋内定李及兰继叶肇为广州警备司令。

（三）黄埔军校各期学生于广州成立非常委员会，宣言拥蒋反共，呼吁蒋介石重新走到前台来。

这无疑是对李宗仁的一大打击，使他深感这个傀儡代总统再也干不下去了。

蒋介石为飞抵广州，先叫蒋经国于 13 日到广州和程思远、邱昌渭相见，向他们声明他父亲将于 15 日到广州。蒋则已于 14 日 带大批随员到达广州，一到广州，就立即去见李宗仁。下午 7 时，李宗仁、阎锡山在广州绥署楼下欢迎蒋介石的到来。自 15 日至 20 日，蒋介石以总裁身份于梅花村陈济棠旧寓召开一连串会议。会议中，蒋提出建立东南亚反共联盟之构想，并宣读了“中菲联合宣言”。这个宣言是蒋于 7 月 10 日访菲时签署的（但以后菲总统季里诺又反悔了）。16 日最后通过建立超宪法机构“中央非常委员会”，由中常会选他作主席；选李宗仁为副主席；张群、阎锡山、吴铁城、吴忠信、陈立夫等任委员。洪兰友、程思远任正副秘书长。其中张群、阎、吴忠信、陈立夫绝对支持蒋介石。此次蒋再一次集军、政、财大权于一身，由后台走上前台，再行主持大计。

但李宗仁则认为蒋一上台，事情会搞得更糟，也会更加速桂系的灭亡。

李宗仁现在无事可做了，便于 7 月 26 日飞往衡阳，在白崇禧指挥部与白晤谈。此时程潜、陈明仁已在准备起义、参加解放军。

白也刚自长沙脱险，尚惊魂不定，又只有第七军可以调动，非常狼狈。同日中午李又飞往福州，去见福州“绥署”主任、省主席朱绍良。

朱绍良对李隆重欢迎，盛情招待。为此，李颇为朱深感不安，怕引起蒋的不高兴。朱对李却也不敢谈及国家大事。李于福州住了两天，又飞台北。陈诚也热情欢迎。李宗仁对这种欢迎场面最津津乐道，非常重视。当检阅仪仗队后，陈诚请李到休息室小憩。

李说不必了罢，陈诚立刻微笑着对李说：“蒋先生在里面等你！”李一时受宠若惊，即入休息室，握手寒喧已罢。蒋自回草山寓所，李 则由陈陪同，在夹道欢迎中赴台北第一宾馆。蒋介石似乎不大喜欢这种场面，总是秘密出行。

翌日下午，李宗仁去草山回访蒋介石，住草山第二宾馆。外间传说，李到台北是向蒋要钱和权的，其实李对蒋介石所谈的是要白崇禧任国防部长和加强广东防务问题。但前一项蒋借口宋希濂和胡宗南反对未予答应；后一项蒋以兵力不够为词，也予以推拖。李结果是空手而归。30 日，返回广州。

当李宗仁未到台北的时候。蒋于 7 月 23 日，在厦门召开军事会议。参加的有汤恩伯、朱绍良、第六兵团司令李延年、第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第九十六军军长于兆龙、第一〇六军军长王修身、独五十师师长李以匡、独三十七师师长吉星文、联勤部第一补给分区司令缨以贤和各军副军长、师长、绥署各处长、兵团司令部各处长，总共有 80 余人。

在这个会议上，蒋又给各军官打气，要他们守住福建，巩固台湾，只要支持到明春，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发生，并作出决议两项：

一项是部署各军的任务和向未参加会的人传达。一项是建立以台湾为中心的东南长官公署，以陈诚任长官，对部队进行整编。

次日（24 日）返台北。

26 日，蒋决定成立“革命实践研究院”，训练人才，以半年为期限。8 月 1 日，草山总裁办公室开始办公。蒋介石的不妙预感，终于被证实。8 月 5 日，美国国务院提前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并指责蒋政府无能，表示今后不再援助蒋介石。同时对中共表示了一个态度：如中共政权不倒向苏联，美国尊重同中国人民的友谊，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假使中共威胁到美国安全，美国将不能坐视。中共对此当然不予理会。

蒋闻知此白皮书消息后，心情极为沉重，但表面上仍泰然处之，甚至“谈笑风生”。第二天，蒋又得到了个大好消息，使蒋又欣喜异常，那就是南北朝鲜局势已经非常紧张。

6 日，蒋访问南朝鲜，李承晚夫妇亲自到机场迎接。当日，蒋在日记中对美国《白皮书》犹恨恨然曰：

“到韩国后，更觉定静光明，内心澄澈无比，是天父圣灵与我同在之象征也。对美国《白皮书》可痛可叹，对美国国务院此种措置，不仅为其痛惜，不能不认为其主持者缺乏远虑，自断其臂而已。”蒋自认为他是美国的左膀右臂，愿为美国霸权效力，可惜美国杜鲁门总统却要把他一脚踢开，不用他，他蒋氏怎能不痛心疾首。因而他要发奋图强，接着写道：“甚叹我国处境，一面受俄国之侵略，一面美国对我又如此轻率，若不求自强，何以为人？何以立国？而今实为中国最大之国耻，亦深信其为最后之国耻，既可由我受之，亦可由我湔雪也。”[①]

这次蒋访南朝鲜两大，和李承晚签署了一个联合声明。主要是联盟之事。此外是建立空中交通和海空合作。8 日蒋回台北。

10 日又写日记，指责马歇尔和艾奇逊此种对华政策是错误的。他说：“马歇尔、艾奇逊因欲掩饰其对华政策之错误与失败，不惜彻底毁灭中美两国传统友谊，以随其心，而亦不知其国家之信义与外交上应守之规范；其领导世界之美国总统杜鲁门竟准其发表此失信于世之中美关系《白皮书》，为美国历史上，留下莫大之污点。此不仅为美国悲，而更为世界前途悲矣。”[②]

蒋回到台北后，开始研究自立自强的理论。

他认为“自强自立之道，奠急于兴学，养廉；而兴学之要，在于穷理致知，实践笃行，养廉首务在节约勤俭，敦厚朴素，戒浪费，祛消耗，明礼义，重廉耻，”同日蒋又起草了“革命实践研究院”组织与教育的有关方针，主要包括制度、战略、政策原则研究和理论基础、哲学思想、行动纲领的建立等内容；并准备开始调查和收罗各种人才加以训练。

8 月 15 日，蒋介石终于决定在全台湾实行“三七五”减租政策。蒋经国说：“这是总理民生主义在台实行之起点工作。”所谓“三七五”减租，是首先于佃户农作物收获量中将 25%的肥料等实际费用归佃农所有，余下的 75%，由地主与佃户各半，即各分得 37.5%，这就叫“三七五”减租。这个办

[①] 蒋经国：《负重致远》，第 212 页。

[②] 同上，第 213 页。

法，大大减轻了佃户的负担，增加了佃户收入，无疑对扩大农业再生产，对发展台湾农业大有好处。

同一天，蒋正式成立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任陈诚为长官。

此间又撤销朱绍良福建省主席职务，而以汤恩伯继任。汤并转蒋介石之命，叫朱即时赴台北，形同绑架。对此，李宗仁代总统却一无所知。事后蒋派一秘书到广州，要阎锡山的行政院对汤恩伯出任福建省府主席兼福州“绥署”主任予以追任。

李宗仁对此极为愤慨，当即对阎说：“蒋先生今日在宪法面前是一个平民，以一个平民随便撤换封疆大吏，成何体统？况且蒋先生如要在幕后干预行政，尽可能向行政院建议。今政府事前既毫无所知，事后又要追任此既成事实，实在太不成话。政府不应自毁法统，承认汤做主席。”

阎看着激昂慷慨的李宗仁，不觉苦笑起来说：“总统，你和蒋先生共事多年，难道不知道蒋先生做事向来不顾法统？他如果着重法统，也不至有今天了。现在汤恩伯已做了福建省主席，我们反对也反对不了，说出去反而有损政府威信。你已经忍耐很多了，这件事我劝你还是忍耐算了。”[①]李宗仁只好再次忍气吞声。

后来阎锡山便遵命于政务会议通过，乖乖地将印信送给了汤恩伯，朱绍良原也是蒋的心腹人物，这次所以被撤，据李宗仁说，是上月朱绍良对他的福州之访，太过于热情了，因而引起蒋的猜忌。李说：“蒋先生是个多疑而睚眦必报的人。心腹股肱转眼之间就成仇人了。”

李宗仁出走

蒋介石自下台之日起，就决心看李宗仁、白崇禧的笑话，决心不支持李、白，并运走一切金、银和军火，对李、白进行釜底抽薪的报复。对此，李、白自当觉悟，但二人仍一步步被蒋拉着走，不图后路，实为令人难解之谜。其根本原因只能是不愿和中共和解，或仍不相信中共。

张发奎作为粤系人物的名将和汪精卫的原部下，对蒋介石一直存有戒心，也有深刻的认识，他早就看出蒋于白崇禧的华中两翼，将华中军队夹在当中，而不予方便，更不予支持。张于何应钦内阁后期曾担任陆军总司令，他认为，蒋介石决不允许李宗仁独立支撑两广局面，与他分庭抗礼；而欲保两广必去掉蒋介石从背后掣肘；欲避免蒋的掣肘，就必须于广州扣留蒋介石。这种办法对保卫两广，或者是一个有效措施，因为李宗仁是代总统，居于合法地位，而蒋正处于兵败如山倒之际，其旧部也未必还那么尽忠于他。但李宗仁却大有宋襄公之仁，坚决反对，并说这是鲁莽灭裂之举，他还认为他做了一点失败的光荣之事，而不知蒋早有杀他之意。

蒋介石当然对此一无所知，所以仍在台北至广州之间不断飞来飞去。

美国《白皮书》所以提前发表，主要是制止蒋介石一再掣肘李宗仁，欲以李宗仁作最后挣扎。8 月 13 日，吴铁城由台北飞抵东京·麦克阿瑟对他说：美国政府已决定不再援蒋，但对广州政府仍报有希望，并由国会通过 7500 万美元拨款援助广州。只要广州能坚守 6 个月，这笔拨款和军用物资就可以源源而来。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白吉尔上将，也与此同时到达广州，与白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 1005 页。

崇禧会晤，对白表示，如果白能到广东来，美国太平洋舰队负责供应补给品，交白使用。

但李宗仁未接受这个建议。反而于 8 月 23 日任余汉谋为华南军政长官。这是李对美国支持白表示不满。结果美国政府这一尝试，又化做泡影。最后因广州、川、滇相继解放，这笔美援又落人蒋手。美国民主党讨厌蒋介石，但又斗不过蒋介石，既抛不掉他，终究还得援助他，利用他反共反苏，为美国的西太平洋防线服务。

蒋介石这次又坐收渔人之利，于 23 日自台北抵广州，见李宗仁一面后，于次日又飞赴重庆。美国驻广州大使馆也于同日停止办公，使馆人员撤往香港，对广州已不报任何希望。李宗仁见此情况，又欲以白崇禧任国防部长，但阎锡山则说必经蒋同意方可。

李宗仁无可奈何，已经毫无办法了，这之前，福州已于 8 月 17 日解放。赣州 8 月 20 日解放。胡涟兵团却向闽南靠拢而去。此时粤北大门无重兵把守，广州解放在即。

蒋到重庆后，即以“非常委员会”主席名义工作。8 月 29 日，于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召开军事会议。会上决定以陇南、陕南为战场，确保四川，拒解放军于川境之外。他还说两广恐不易防守，要以四川为“复兴”根据地，公开主张放弃两广。

此时云南省主席卢汉早已对蒋存有戒心，蒋两次电召，均拒不应命。第三次由俞济时亲自到云南请他，并说明保证他的安全。

卢想了一想，再不去就不成了，便于 9 月 6 日飞重庆见蒋。蒋于林园行馆和卢汉谈了两个小时，说是云南由卢自主，但必须实行 8 项反共措施。

（一）声明反共。（二）改组省政府。（三）逮捕中共党人和进步人士。（四）解散省参议会。（五）禁止进步刊物发行。（六）云南驻中央军两个军。（七）实行征兵征粮制。（八）驱逐学校不稳分子。

这等于把卢汉用中央军监督起来，还谈什么自主。卢汉不禁暗暗叫苦。当日下午卢汉回滇，李弥、余程万两个军也随后入滇，把守云南。

蒋部署好云南后，又命毛人凤立即于香港刺杀杨杰。9 月 19 日，杨杰被刺。9 月 22 日蒋突然飞抵昆明。等飞机降落机场后，先一天抵滇的蒋经国（当时对卢说蒋不来了），才告知卢汉，可见蒋行动已特别小心，深恐卢汉扣押他。蒋于昆明接见各将领打气以后，于当日下午 4 时又自昆明飞广州。23 日找白崇禧单独会谈。他对白说：由于他和白精诚团结，所以完成了北伐和统一全国，此后，又两人合作，打败了日寇，收复了国土，建立了不朽之功勋。

接着他又继续给白戴高帽说：“今共党虽极猖狂，国势虽极危险，只要我两人能一德一心，彻底合作，事尚可为。”[1]经蒋如此这般一阵大捧，喜欢戴高帽的“小诸葛”，又飘飘然了。蒋又进而表示将由白出任国防部长，更使白甘心不率部人粤。

26 日，陶峙岳于新疆起义，率 8 万之众投向人民解放军，9 月 19 日董其武又于绥远宣布起义，蒋的破烂王朝，此时只余川、滇地区了。

两天以后，蒋才见李宗仁。这是拉白，孤立李宗仁，这也是李宗仁最后一次见蒋。李专门于某大约蒋谈话，蒋介石则约李到他的梅花村行馆见面。这次见面后，李宗仁便把胸中久久压抑的苦闷和愤怒，一股脑儿向蒋发泄出

---

[1] 李宗仁：《从南京出走到飞往美国》.见《广西文史资料》，第八期，第 51 页。

来。他坐下后便对蒋说：“今天我是以国家元首地位来对你谈话。”蒋介石便静听不语。李接着将蒋过去的所有过失一一数落。对他有过则委诸人，不反躬自省和“滥捕学生及爱国人士，引起舆论指责”的事实也一一历数！又说他“主政二十年，贪赃在法之风甚于北洋政府时代。”蒋均唯唯。

然后，再指责他明言引退，而暗中操纵军队和人事，目无政府。蒋介石心中有数，不但不急，反而笑着请他原谅任意撤换朱绍良的错误。“听训”之后，蒋依然我行我素。

蒋在广州对华南和西南进行了军事部署：以胡宗南部防守川北；以宋希濂部防卫川东：华中黄杰兵团调援贵州，策应宋部；张涂、徐启明、鲁道源三兵团分防黔、湘、粤边区；刘安琪兵团为保卫广州，调防粤北。但蒋并未让刘兵团到达粤北，才到广州外围，就又撤退了，粤北仍然空虚。而置重兵在川、黔、滇和东南沿海。

这次蒋在广州住了 10 天，深怕被人暗害，极其警惕，在李宗仁请蒋吃饭时，蒋经国竟率领众随员，在厨房内监厨，每一样菜和配料均要检查。每道菜又要先尝以后，才可上桌。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国宣布继续承认“中华民国政府”。次日，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此，蒋介石写下如下日记：“俄帝之承认匪伪政权，实乃既定事实，且为必有之事，而其所以如此急速，盖以我在联大控俄案通过，彼乃不能不出此一着，以作报复之行动耳。今后俄帝必与共匪建立空军、海军，则我为势更劣，处境更艰，此为最大之顾虑。”[①]蒋介石此时考虑的最主要问题，是怕中共迅速壮大，攻占台湾。3 日，蒋返台北。

此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展开两翼，以柳州为中心发动钳形攻势，迅猛前进。10 月 6 日，解放曲江。白崇禧见势不妙，于 10 月 7 日将华中全军自衡阳退广西。人民解放军则从曲江南下英德；刘安琪兵团不战而退。解放军经靖远到肇庆，截断西江。10 月 10 日，迫近新街地区，广州已难以顽抗，李宗仁不得不于 12 日宣布迁都重庆，在蒋介石的嫡系军队范围内当代总统，这就更要唯蒋命是听了，这个代总统也实在无法再当下去了。

此前，顾孟余曾劝李宗仁于柳州组织国民政府，不去重庆。但李宗仁却说，我不去重庆，白崇禧的 30 万军队就没饭吃。这倒是蒋的一个绝招，他有台北的大量金银为后盾，李宗仁则身无分文。

同时蒋派吴忠信到广州问李愿否引退？李则答以“不准备自行引退”。

10 月 13 日，李宗仁飞离广州，当晚于桂林一宿，次日抵达重庆。白崇禧在广州送别李宗仁时，曾对随员黄旭初说：“德公（李宗仁）到渝后，将设法让他出国治胃病。”意欲李宗仁让位与蒋介石。14 日晚，广州解放。

李宗仁到重庆后，蒋介石复职之声日益高涨。但李宗仁却抱定宗旨，决不“劝进”和引退，但也决不在重庆为蒋的西南破烂摊卖力气，也不再受制于蒋，当蒋的工具，而是抱着代总统的头衔，远出昆明，再走美国。以不退、不干、不在国内和蒋周旋，故意给蒋找麻烦，以此对蒋进行报复。

白崇禧退军广西的次日，即 10 月 8 日，“政府秘书长’”洪兰友即电告台北，说李宗仁有知难而退之意。顾祝同也请蒋赶快复职，长驻西南。蒋对此虽表面上均无什么表示，实系默认。这之后，蒋的亲信人物开始纷纷劝李

[①] 蒋经国：《负重致远》，第 225 页。

宗仁引退，请蒋复职。对此，李宗仁有一段生动的描写，特摘引如下：

“原先在广州时，黄埔系将领及蒋先生衣袋中的政客已有请蒋先生复职的企图。然而那时尚无人敢于公开说出，抵渝（重庆）之后，情势便遇然不同。他们认为广州既失，我堕人蒋的瓮中，可以任其摆布。

CC 系和政学系控制下的报纸此时已不再以‘总裁’称呼蒋氏，而径呼为‘总统’。我深知蒋先生已呼之欲出，不久便复职了。”[①]

于是，吴忠信、张群、朱家骅便先后来找李宗仁，劝李引退，对蒋“劝进”。李见此况，勃然大怒，对吴忠信说：“礼卿兄，当初蒋先生引退，要我出来，我誓死不愿，你一再劝我勉为其难；后来蒋先生在幕后掣时时，把局面弄垮了，你们又来劝我‘劝进’。

蒋先生如果要复辟，就自行复辟好了。我没有这个脸来‘劝进。”[①]

吴、张、朱等碰了一鼻子灰，不敢再提。张群于是又策动台北《中央日报》于 11 月 1 日登载一条新闻：《川康渝人民竭诚效忠，电迎总裁莅渝领导》。新闻中发表了 10 月 31 日川、康、渝电报，由 200 余人签名，请蒋到西南主持大计。以此为蒋复职大造舆论。

蒋介石此时正在台北、定海之间来往，研究防卫定海等岛屿计划。

10 月 10 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提出“反共抗俄国策”，宣称公理正义一定胜利。

16 日上午革命实践研究院开学。蒋于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提出军事教育三原则：

（一）军队战胜之基本条件为信仰、纪律、理论、学术、政工、党部、干部与党员。

（二）战争目的是：维护民众自由，国家独立，减租减息，平均地权。

（三）军队生活方式：官兵一体，生活一致，经理公开，一切从人民、国家利益着想。

这些元疑是吸收了中共方面进步的经验和若干原则，这是蒋介石从失败的痛苦中总结出来的新东西，问题在于他能否真正实行。至少在大陆的残留地，他是没有实行的。

李宗仁此时想到，蒋一旦到重庆，便会逼李于劝进书上签字。

为躲此种危险，李便以出巡为名，离开重庆。

离开之前，李宗仁于其曾家岩上清寺一〇二号临时官邸召集桂系人物开会研究如何对付蒋的复职问题。参加会议的有白崇禧、刘士毅、程思远、邱昌渭、黄雪村，还有粤系人物李汉魂。会上李宗仁特别讲明自己不主动引退，并非迷恋名位，而是恨蒋介石欺人太甚。他说，蒋要引退时，别人就得上台，而且把金银美钞和军械一股脑儿运走台北，又先后破坏江防计划和保卫广东计划；等到局面被他搞垮了，他又要出来了，别人就得对他劝进。李认为蒋完全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玩弄权术，目无法统。为此，李表示自己一定要为国之名器而坚持到底。

此处对蒋专断独行，为所欲为极尽权术之狂态，可谓说得淋漓尽至，活灵活现。蒋之治下，哪里有什么法统之事！

白崇禧则自有不同打算，想在蒋复职后当个行政院长，过过官瘾；因而

[①] 《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第 61 页。

[①] 《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第 61 页。

劝李宗仁到昆明去休息一段。李接受白的建议，于 11 月 3 日下午 4 时 40 分飞抵昆明。

李走后，白崇禧即主动为蒋复职，为个人出任行政院长而积极活动。他于李宗仁离重庆的当日晚上，便制定了由蒋复职的三项方案：（一）宣布蒋介石复职。（二）李宗仁仍担任副总统，但暂赴美治胃病。（三）白崇禧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

次日，白又征求刘士毅和李汉魂意见，刘、李均同意白的三项方案。下午，白返桂林，叫李汉魂将此方案交端木杰，请他面交吴忠信。7 日，吴忠信将此方案送到台北给蒋介石看。蒋认为李宗仁并不是真心求退，只是知难而退。吴则说：“不应研究李之有否诚意为出处之基准。”蒋认为此言甚是切中要害，表示同意。8 日，经端木杰转达，白得知蒋介石只同意自己复职，而不同意白崇禧出任行政院长的复职条件，蒋也不同意李宗仁出国。白又空忙了一阵，不胜失望。

11 月 11 日，李宗仁仍以代总统名义自昆明飞抵桂林，和白崇禧等相见，表示要赴美就医。同日，蒋对李回桂林的直接反应是鉴于“贵阳危机”，“川东陷落，重庆垂危之际，政府岂能无主”，便不问李宗仁心里怎么想，立即决定回重庆主持一切。他还说：

“余为革命历史及民族人格计，实不能不顺从众议，决心飞渝，竭尽人事。明知其不可为，而在我更不能不为也。……乃决心飞渝，尚期李能彻悟回头也。”14 日下午 3 时，蒋介石飞抵重庆。次日电请李宗仁返重庆，共商一切。蒋到重庆后，解放军继续向重庆合围。南路已临贵阳市郊；东路解放彭水后，继续西进。蒋急调胡宗南部增援四川，并派蒋经国到四川各前线视察。解放军继解放川南，进迫綦江。贵州亦于 25 日解放。李宗仁对蒋的电请不予理会，于 11 月 20 日上午 8 时，离南宁赴香港，入太和医院，并派李品仙前往重庆对蒋面谈一切。但白崇禧却自请前往见蒋，于 20 日下午：时飞抵重庆。蒋介石闻知，不胜骇异。

蒋仍坚持请李宗仁回重庆，并表明自己不能于现在“复行视事”。遂于 21 日派居正、朱家骅、洪兰友。郑彦芬 4 人为代表，带着他的亲笔信，飞香港劝李回渝。他还再一次表示保证给李宗仁以“充分权力”，请他务必返渝，且可以带医生同来。李宗仁这次铁了心，不再上当，坚决拒绝了蒋的劝回。

这天，对蒋也有一个“好消息”：美国参议院诺兰夫妇于 25 日到重庆见蒋。诺兰希望蒋在大陆支持 6 个月，美国可出兵支援。如果苏联出兵支援中共，美国也有决心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为蒋打气。蒋以后更以第三次世界大战为口头禅，决心死守成都，不准胡宗南马上撤往西昌，再转滇越边境。结果胡宗南 30 万大军完全被歼于成都平原。这是诺兰之行的直接后果。

同日，蒋又促重庆国大代表电请李宗仁回渝，但电文却对蒋称“蒋总统”了。李宗仁当然不会回渝。于 26 日，李决定以代总统身份赴美就医，且可省去入境签证手续。

27 日，驻美大使顾维钧电李宗仁，说美国国务院已同意，并盼电告随员名单。同日，中常会于重庆召开，拥蒋复职。

重庆于 28 日对李宗仁摊牌，派朱家骅、洪兰友赴香港，并带去本日国民党中央常会决议，阻李出国。决议云：

“以当前国家局势之严重，西南战况之艰危，中枢不可一日无人主持。仍望代总统宗仁同志迅返中枢，力疾视事。万一为病势所不许，再请总裁复

行总统职权。”

李宗仁接此决议书后，于 29 日对朱家驿等人严肃声明：本人具有“法统”地位，不受中央常会决议所限制。朱、洪无可奈何而归。在李宗仁离南宁飞赴香港的同一天，华南解放军（55 万）开始进攻广西桂北地区。

21 日击破黄杰兵团防线，渡过小溶江，次日解放桂林。另一路解放军自贵州南下人桂。白崇禧刚自重庆回来，仓促之间，飞往南宁。

25 日，柳州、梧州解放。12 月 3 日，张淦、鲁道源兵团被全歼。4 日，徐启明兵团亦全军覆灭。仅余黄杰兵团于 13 日逃往越南。白崇禧一转眼成了光杆司令。李宗仁也再无根基于大陆，遂于 12 月 5 日，以代总统身份偕夫人郭德洁，并带长子李幼邻、次子李志圣和随员李汉魂，私人医生孙晓山、秘书黄雪村、英文秘书黄颖娴，自香港启德机场飞赴美国。李临行致阎锡山一电。该电表明李宗仁离国后对职责问题的态度，这对蒋介石极为重要。电文云：

“仁以胃疾剧重，亟待割治，不得已赴美就医，以一个月为期，即当遗返。在仁出国暂短时期，请兄对中枢军政仍照常进行，至于重大决策，尽可随时与仁电商。来电所云，似未明了仁之本意，特再电达，希仍就兄职权范围内处理一切……。”

可知李氏赴美，决未放弃任何职责，这对蒋介石就有些麻烦，他就不能名正言顺地复职。

李宗仁出国前夕，解放军进军西南的战局进展很快。11 月 28 日解放綦江，罗广文只身逃到重庆。重庆外围已经难于防守。这时蒋介石力求稳守重庆，以保胡宗南部安全到达成都以西地区。29 日，重庆市郊发生激战，行政院逃成都办公。当日蒋介石开军事会议，西南大员和胡宗南等均参加。蒋又叫大家不成功则成仁，但部下已无心听他这一套。会议决定于 30 日晚撤守重庆。晚 10 时，蒋介石父子俩乘车离重庆林园，于汽车拥挤中到机场住宿。路上因拥挤太甚，蒋几次下车步行，并改乘吉普车前进，至午夜始到机场，于飞机中过夜，30 日凌晨，蒋自白市驿机场起飞。7 时在新津换乘飞机，转飞成都，驻中央军校。当日接见四川各将领和刘文辉、邓锡候等，对各将领大谈川西大会战是很有希望的。他指出主要依靠胡宗南的几个兵团，要四川各部大力协助。然后征询各将领意见。大家各说不一，有的主张不战而退康、滇；有的认为应于川康山地作战；也有人主张于川西平原决战，以迎合蒋的意见。刘文辉则表示悉听蒋的决策。

12 月 1 日重庆解放。

李宗仁赴美之后，蒋介石很尴尬，他不得不撒谎说：“此次入川，系应李宗仁之邀。余为国民一分子，并负领导国民革命之责任，惟有竭尽一切力量，不避任何艰险，协助政府与大陆军民共同奋斗。”[①]

李宗仁根本没有请他来。他如此扯谎，实是借此实际上复职视事，他也是有“苦”难言，只好自欺欺人。

进入 12 月，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在反复讨论中。参议员史密斯和诺兰飞东京见盟军统帅麦克阿瑟上将，要求他挽救台湾，联合参谋本部则只同意派军事顾问团赴台，不同意派遣三军。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们则不同意再管台湾的事，支持杜鲁门看蒋的笑话。

[①] 蒋经国：《负重致远》，第 247 页。

李宗仁走后，蒋便完全实际上复职，亲自指挥保卫成都地区的战役。

但这时，刘文辉、邓锡侯以至于卢汉均已暗中联络起义之事。

因为他们是杂牌军没有退路可走，也不能跟蒋到台湾去，唯一的出路就是起义。故 12 月 6 日晚，蒋召见他们时，两人均不应召。

同日。蒋与张群、阎锡山研究迁都问题，初欲暂迁西昌，但见解放军势如破竹，已无力抵挡，马上又改变决定，迁都台北。大本营仍暂设西昌。成都只设防卫总司令部。此时胡宗南部已到成都平原。次日，蒋从滇返渝的张群口中得知卢汉不稳，立即召见余程万、李弥、龙泽汇三军长，令其保卫云南，不要作西撤之想。10 日云南宣布起义。并电刘文辉，要刘会同四川各将领将蒋介石扣留，交给中共。当时蒋又见王缵绪，嘱其转告刘文辉、邓锡侯两事："（一）仍盼入城来见。（二）令彼等所部速离成都周围。"又和胡宗南面谈三次，要其死守成都。同日上午 2 时蒋飞离成都，6 时 30 分到达台北。

刘文辉、邓锡侯已于 12 月 9 日蒋返台之前宣布起义。

蒋介石离大陆来台后，屡获失败消息。21 日接胡宗南请示，批准放弃成都，突围退保西昌。23 日，胡宗南飞逃海南岛，被蒋逼令返回西昌，并要顾祝同严办，经顾缓解，让胡到西昌带罪立功。

1949 年 12 月 24 日，蒋知西南顽抗，已无希望，心绪自是极为低沉，这又是他的一个恶梦。在受到巨大的震动后，蒋为了清醒一下头脑，便带着全家，自台北往游日月潭，住涵碧楼。在游船上。

蒋竟钓到了一条数尺长的大鱼。以后日月潭将此大鱼的照片陈列展览。这时蒋不断他说："好！好！"冰冷的面孔也露出了些笑意。

这件小事竟使蒋氏父子高兴起来，认为新的一年必然顺利。

蒋遂率领全家在涵碧楼度过圣诞节。圣诞节这一天，蒋又写下日记表示自己对未来的打算。记云：

"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犹如今日生。过去一年间，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已彻底失败而绝望矣。

如余仍能持态养气，贯彻到底，则应彻悟新事业，新历史，皆从今日做起。

"近日独思党政军改革方针与着手之点甚切，此时若不能将现在的党彻底改造，决无法担负革命工作之效能也。其次为整军队，以求内部转纯，团结一致。"[①]

但 4 天之后，蒋又收到了杜鲁门决定抛弃他的噩耗。

美国总统杜鲁门于 29 日召开国家安全会议。会议分为两派：一派是鹰派，以参谋会议主席布莱德雷为代表，他坚决主张派军事顾问团赴台，帮助蒋介石防守台湾。他认为台湾是不沉的航空母舰，是美国西太平洋的屏障，如失去台湾，日本、菲律宾均会受到威胁。

国务院艾奇逊则持相反意见。他认为即使美国介入也无济于事，何况台湾对美国西太平洋防线实在是无足轻重的。

杜鲁门总统，一反罗斯福的态度，对蒋政府的腐败早已深恶痛绝，不愿再为他在花资财，加之他对蒋支持杜威竞选，也一直耿耿于怀，便支持艾奇逊意见，决定抛弃台湾。

[①] 蒋经国：《负重致远》，第 254 页。

同一天，蒋电命胡宗南两事：（一）固守西昌三个月，等待国际变化。（二）整编川西脱围部队“保卫”大西南。胡守了三个月后，国际变化更为不利于蒋，胡宗南遂于 1950 年 3 月 27 日放弃西昌，飞逃海南岛，再转台湾。胡的人马完全丢光了，只身一人到台。蒋此时正于日月潭小住，闻此消息后，沉默了一个小时，然后对经国说：“我们下山散步罢。”蒋一边散步，一边沉思，心情看得出是极其沉重的。4 月 6 日，海南岛解放。蒋更感痛苦莫名。

杜鲁门于 12 月 30 日（1949 年）举行记者招待会，当众宣布美国对台政策，他说：

“美国此时不想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它也不利用其武力干涉台湾现在的局势。美国并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战的途径。同样的，美国政府也不供给军援与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国军队。”[②]这等于告诉中共尽可以进攻台湾，美国决不干预。

这个声明，传遍世界每一个角落，它对于蒋介石无疑是雪上加霜，让他疼在心里，而不敢对台岛公布。台湾各报纸、杂志，对此均只字不提。

美国同时又宣布自台湾撤走美侨。这使蒋介石更深感不安，深怕台湾人民和士兵们知道美国态度。继之，美国政府的苏联问题专家们，再度推动赶快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浪潮。他们最有力的理由，是美国如不尽快承认北京，中共就会更靠近斯大林，或依靠苏联，这将危害美国人在远东的利益。[①]

当顾维钧按例到白宫祝贺新年时，美国新闻界则讽刺说：“这可能是最后一次。”

于此大陆解放，美国遗弃，希望破碎之时，宋美龄在美国长住一年之后，于 1950 年 1 月 13 日悄然离美归台。这时美国已无人再注意宋美龄的行动，但在台岛，却是一件大事，所以蒋经国自告奋勇，专程到马尼拉接驾。正是在举台注目中，宋美龄回台扶蒋，支撑小朝廷，这对蒋介石是莫大的安慰与鼓舞。

1949 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蒋在大陆的统治彻底结束。

蒋经国对这一年的景况作了如下的描写，能够看出蒋家王朝在这一年的危状和蒋氏父子的心境。

他说：“民国三十八年，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危急存亡之秋’。父亲所处的地位环境，乃是空前未有的恶劣和复杂。国运正如黑夜孤舟，在汪洋大海的狂风暴雨和惊涛骇浪中飘摇、震荡：存续沦亡，决于俄倾。我们身历其境，当时也懵懵惚惚，不知不觉，恍如浮光掠影，随波而逝。可是到了今天追忆起来，闭目沉思，始觉得当时国脉民命系于一发，真令人动魄惊心，不寒而栗了。”[②]

检讨大陆失败原因

1949 年 4 月 27 日蒋在公开声明中认为自己的失败是：“政治的缺点，

[②] 董显光：《蒋总统传》，第 574 页。

[①] 江南：《蒋经国传》，第 224 页。

[②] 蒋经国：《负重致远》.第 117 页。

经济的恐慌，内部组织的松懈。”[1]同年 12 月底，他在日记中写道：“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己彻底失败。”

到 1956 年，蒋写《苏俄在中国》时，则又在公开场合改变了他自己的看法，把失败归之于战略和技术两大方面：

（一）战略方面：抗战时期和苏联建交，使苏联帮助中共向社会各方面“渗透”；1937 年接受国共合作抗战，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保存了中共军队，使其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展壮大；抗战胜利后，接收东北，未使其由联合国处理，因而使精锐军队分散于东北，未能集中优势兵力于华北和华东地区；抗战胜利后，接受了和平谈判，未能抓紧时机全力进攻解放区。

（二）技术方面：使中共合法化；过于“相信”中共；未实行全面战争对待中共武力，即包括政治、经济、宣传各个方面的战争；由于中共的经济活动，使国民政府经济发生危机；中共的宣传和“渗透”使政府威信受到“损害”；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忽略了，等等。[2]

蒋未明言而自己反省者认为：政府官员因循苟且，循私舞弊，空而不实，不负责任，玩忽职守；军队政治工作差，土地问题未能解决。

蒋介石关于自己的错谬之处，却只字未提，只是空洞他说，这一切他有责任。实际上，他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以下几个大方面，有的地方，他在私下和公开也均已谈到过：

（一）蒋介石个人独裁和实行特务恐怖政治。

（二）政治腐败。这表现在政府官员循私舞弊，贪赃在法，玩忽职守，不负责任；地方长官是土皇帝。这使百政混乱，人民怨恨，因而失尽民心。

（三）蒋介石带头循私，抗拒打老虎运动，亦即抗拒制止走私、投机和抬高物价的凤潮。致使物价飞涨，走私猖獗，因而一切币制改革均归失败，金圆券成为一张废纸。这使蒋政府失去经济立足点，而人民也无法生活，怨声载道。军队士兵生活也受到严重影响，士气低落，屡战屡败。这就是蒋介石所说的经济恐慌。

（四）大量搜刮金银和美钞，使企业主和中产市民也深受其害，且难以生存，他们不再支持蒋家王朝。

（五）高压政治，反对民主。迫害进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迫害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以至于杀戮著名教授闻一多、李公朴、费巩等。因此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对蒋政权尤深恶痛绝。

（六）未解决土地问题。而中国共产党则在解放区实行耕者有其田，无偿地把土地分配给农民，把广大解放区的农民和中国共产党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因而未解放地区的广大农民也对解放区农民十分向往，当然其心中是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国民党军队中广大农民子弟士兵，自然士无斗志。蒋介石又失掉了广大农民的拥护。

（七）蒋介石军事指挥的错误，则加速了蒋家王朝的失败进程，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三大战役就是很典型的例证。

（八）逐级的军队私有制。蒋介石以其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私有其中央军。

---

[1] 《大公报》（上海）.1949 年 4 月 28 日，第一版。

[2]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二章。

而各将领也各自私有其军队，以其军队为个人资本，每临战阵，则以保存实力为宗旨，不肯多走一步，不肯增援助战。所以每临战阵，蒋的中央军和杂牌军便各奔前程，极容易造成被各个击破之势。此为蒋之军事失败的一个重大原因。

蒋对大陆经济的破坏

蒋介石对大陆经济的破坏，开始于 1929 年，而终止于 1949 年，其中除抗日战争外，他均是为一己之王朝而大打内战，所有经济开支和战人的损失，非常庞大，此责任当然在蒋氏及其集团身上。

1930 年中原混战，是蒋氏一手发动的，共用军费 35800 万余元，河南一省财产损失 48533 万余元；房屋损失 3815 万余元；派征款项 4041.5 万余元；征收粮草 4855.5 万余元；征收车辆牲畜费 4484.4 万余元。合计起来近 10 亿余元左右。如将这些款项用于建设，则元疑可以加快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但是民脂民膏。社会财富全被蒋发动的内战，抛之于战火之中。

10 年“剿共”，军费开支自然非常庞大。5 次“围剿”中，蒋共用军队 100 多万人。按 1929 年 50 万军队军费为 1.8 亿元，那么以 170 万人计，每年军费为 6 亿元左右。

10 年军费则 60 亿元，再加上围剿长征的红军一年军费为 1 亿元左右，共为 61 亿元。红军和红区的损失估计，亦不下于 60 亿元。

自 1929 年至 1936 年物价上涨总指数约 100%，则总损失估计为 240 亿元，等于 1936 年年收入的 7 倍，等于 1931 年年收入的 8 倍。总之年收入基本上全用之于内战。如何建设？加上官府搜刮，国民负担远不止此数。

又借内债、外债以补充之和兼及国内建设。

内债自 1927 年至 1933 年共发行确实担保公债 14 次，总值为 3.4 亿元；国库券 17 次，总值约 9.03 亿元（向美国借款共 3926.5 万美元、200 万法郎）。这些公债主要用于军火购置。

1933 年至 1937 年，共发行公债 19 次，总值为 11 亿余元（又 2000 万美元、150 万英镑）。

1936 年又发统一公债 14.6 亿元。

其 19 种公债中，用于金融建设者 7 种；用于交通建设者 5 种；用于生产建设者 3 种；用于水利建设者一种；用于纯周转者 3 种。

国内建设，主要依靠这 19 种公债，至 1949 年才考虑还，而实则不了了之。

因此，从 1928 年到 1937 年 10 年间，以内战为主要的和根本的经济开支，包括常年军费和购置军火费。而国内建设，则是兼顾，而以 1933 年以后 19 种公债担当之。因此，国内建设成就很小，经济发展微弱。

战前我国工业水平大体如下：

全国工厂 3450 家；外商 283 家。工人总数为 738029 人，其中外商雇佣工人 189537 人，工业经济微乎其微，这是因战争毒瘤吸尽了全国人民的血液和社会财富。

1935 年开始正式借外债，数目不详。

抗战时期，库国赤字的不断增加，发内债困难，于是蒋就以印票机大印钞票，致使物价飞涨，无法遏止。抗战 8 年共发行纸币 103190 亿元。而抗战

前才发行纸币 14.49 亿元。这种滥发纸币，就等于从人民手中用废纸换实物，大后方人民难以度日。而孔样熙夫人等却用法币大买外汇存入外国银行，以赚实利。

同时蒋广借外债。美国贷款总数为 6.17 亿美元，1600 余万英镑，苏联贷款为 2.5 亿美元（实支 1.7 亿多美元）。

抗战时期，蒋于西南进行了一些建设，主要是湘桂铁路、桂黔路、曲靖至昆明铁路、天水至宝鸡铁路。

其次是西南西北地区广开公路网。再者是恢复古代驿运制，以人力和畜力运输。所以抗战时期的建设，是微乎其微的。

解放战争时期，是蒋对大陆经济破坏的高峰。除岁人全用于战争外，更花大量金钱购买军火，又订中美商约，出卖全国利权。

结果物价继抗战时期进一步飞涨，蒋又开动印钞机，广掠民间金、银。

1949 年，竟将他所掠夺的大量黄金 286570710 两、白银 816616130 两，美钞 3 亿余元，运到台湾。[①]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 40 年代在美国存款为 16 亿美元，另外 12 高级家庭为 4 亿美元，共 20 亿美元。

蒋介石于抗战期间以中国农民银行理事长资格，兼任四联总部理事会主席，又兼任行政院长、国家总动员会议主席，把国家全部财权，尽掌握他的手中。

据统计，抗战期间蒋政府向美国政府借款共 15.6 余亿美元，法国借款 2900 万美元，苏联借款 3 亿美元，捷克、比利时借款 1.3 亿美元，共 20 亿美元左右。[②]这些借款“均由孔、宋家族出面谈判和办理，在“当时国库、家库分不清”的情况下，借款流入了私囊。

所以当时国民政府在美国存款据《远东经济评论》估计，1947 年，只有 4.27 亿美元（各大官僚资本存款 20 亿美元）。国库与家库的数字对比，表明了官富、国贫、民穷的腐败政治。

解放战争中，美国对蒋贷款和赠予，约为 60 多亿美元。另外有内债美金 9.27 亿元、金圆券 5.23 亿元，地土债券 3 亿元，粮食 1000 万石。这些全用于战争耗费。

[①] 见《汇编》，第四辑第十五函，第 27 册，第 9844—1～2 页。

[②] 蒋良任：《孔宋家族的财富》，见《亚洲人》周刊，1985 年，第 2 月号，第 15 页。《中央党史资料》（六），第 375 页。

第七章　惊魂初定

惊魂初定

蒋氏到台后，最首要的任务是如何防守台湾。美国国务院三人小组认为，国民党已无希望，为免台湾被中共解放，于 1949 年 11 月 11 日议决由联合国接管台湾，国民党军队则迁驻海南岛，但这个决议一直未予实行。

蒋首先对台岛的“匪谍”进行残酷镇压，重要的有 300 多起，牵扯人数在千人以上。蒋介石经常一车车地屠杀“匪谍”，其中也有因为“一言之失”而被判死刑或长期徒刑者；有敲诈不成而被判刑者。故以“匪谍”名义送人军人监狱、台东绿岛者，不知凡几。甚至有人未经法律手续，而被丢人大海喂鱼。也有人因为家有马克·吐温著的《汤姆历险记》一书，而被无故错押者，待查清误抓后，还要留一段时间，作“参考资料”。这位被押者事后谈及此事时，仍心有余悸，他说：“那里无需法律程序，随时可以枪毙人。”

在蒋初到台岛的愤怒报复心和发泄心理支配下，彭孟缉的保安司令部及其附属保安处游查组，更以抓人破案为升官手段，甚而宁可错杀三千，决不放过一个。彭竟以此镇压之“功”，直线上升为参谋总长。由于这种大规模镇压，台岛一时形成 50 年代大屠杀的恐怖局面。

对于这种局面，蒋派人士认为这种镇压是必不可少的；开明派省主席吴国侦等则大不以为然。他指责这是肆意践踏民权，违反民主和自由的旗帜。以后吴不得不辞职赴美，避居海外。

中共方面，也决不允蒋介石安居台湾进行大屠杀，曾决定于 1950 年适宜的时候，进攻台岛，欲一举而克之。本年 4 月海南岛解放后，这种进攻台湾的准备就更加积极。这时中共有 400 架飞机，30 个空军基地，同时又准备了大量登陆艇。到 5、6 月间，蒋氏最为担心，认为解放军进攻台岛不可避免。

蒋接受海南岛的教训，于 5 月中旬及早主动自舟山等沿海岛屿撤走 15 万军队。于此连连溃败之中，蒋介石深感被动。现实状况如此之糟，怎么办呢？于是发表了一篇《军人魂》讲话。他于讲话中除重弹“不成功便成仁”的老调外，更荒唐地提出“一年准备，二年进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空头支票来鼓动士气。

这时台湾防卫力量，大体情况如下：

19 个机动步兵师，两个坦克师、一个空降师、两个海陆炮兵师、两个火箭师、空军 82000 人、1300 架现代化飞机，其中 700 架 F86、100、104 型。海军 35000 人、现代化军舰 180 艘。总共约 60 余万人。

这时，台湾的“中央党部”举行“宣誓仪式”，宣布，“宣誓效死，确保台湾”。5 月 19 日，蒋经国又秉承蒋介石意旨，在《中央日报》以复函形式，公开答复明丰先生。为舟山撤退辩护和斥责“失败主义者”，他说：

“你还提到舟山的撤退，使得抱失败主义的人更加倾向于失败，动摇分子更加动摇。……最可耻的，就是这些拿不定主张，为了苟且偷安而出卖灵魂的人，他们将来的结局，恐怕将是最可惨的。”

他接着又教训人们，要坚持到底，争取最后胜利！他说：“总有一天，我们的战争将要胜利地结束，那时候一切自然都会水落石出的。总而言之，事在人为，今天的日子虽穷，生活虽苦，环境虽然险恶，人心虽然浮动，但是只要有志气有骨气的人，大家肯咬紧牙关，真正能够觉悟，并且体会到环

境的危险和困难，一心一意来从事于反共抗俄的大业，我相信，不远的将来，台湾会有新的胜利和乐观现象产生出来的。”

这是蒋氏父子给台湾的军，政人员打的一支精神强心针，以免台湾出现精神崩溃的局面。

50 年代第一个年头的初夏时节，台湾处于最惊恐的时期，有一夕数惊之状。蒋介石甚至为此于日本请来了一批军事将校，其中包括前侵华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根本博中将。

《中央日报》于 5 月 27 日发表社论指出，“台湾进入战时状态”。这时台湾在蒋氏父子导演下，处处充满悲壮气氛，由蒋经国主持的总政治部，发动各部纷纷举行“誓死效忠领袖”活动，并成立“反共敢死队”，以“成功成仁，誓为国死”为口号。《中央日报》于同日发表《发扬同舟共济的真精神》一文，号召台岛上的每一个人，忘掉个人私利，追求保卫台湾的共同目标，文章说：

“我们国家实在已到空前未有的危险时期，每个处在这个孤岛上的人已没有什么可以撤退和逃避的地方，每个人的利益和整个国家的利益，再也没有一个时候能比现在更加一致。”又说：“在这个目标下，我们首先要求每个人，把所有的私人利益完全克服下去。”

于是台湾进入“战时生活”时期。至 6 月初，又成立“战时生活运动促进会”，其宗旨是“向奢侈者挑战，向腐化者开刀……

人人生产，戒除浪费；个个动员，参加战斗”，随后又杀害吴石、陈仪，公布“检查匪谍条例”。条例中强制机关、部队、学校实行连坐法，迫令告密检举。此更加重了台岛的恐怖气氛。总之是以节俭、生产、总动员和大肃“匪谍”为“战时生活”。有的人说台湾只要 750 万人一致行动，就可以取胜；有的人仍然老调重弹，说是有三民主义和蒋“总统”就可以胜利。实在也没有新东西可以拿出来，蒋介石也仍然是提倡“成仁取义”的陈腐哲学。

这种备战，老实说是不成的，台湾如果真地于 6 月刮来战争台风，蒋介石是决无法抵挡的。

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本年（1950）6 月 25 日拂晓，战争风云突然降临到南北朝鲜之间。北朝鲜军队于南韩防御薄弱的情势下，突然攻击，迅速占领开城、春川等处，才遭遇到南方有力的抵抗。此时距南韩首都汉城仅 25 英里。

这个消息传到台北，蒋介石正在用早餐，不禁为之一振，但情况仍不清楚。直到深夜 10 时，才接到邵毓麟大使首次报告，这时，蒋盼望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终于有了希望，自是分外欣喜。但不能溢于言表。邵氏的分析大体是符合实际情况和蒋之心情的。他说：

“韩战对于台湾，更是只有百利而无一弊。”接着又说：“我们面临的中共军事威胁，以及友邦美国遗弃我，与承认匪伪的外交危机，已因韩战爆发而局势大变，露出一线转机。”对于“韩战”的前途，他也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今后韩战发展如有利于南韩，亦必有利于我国；如韩战演成世界大战，不仅南北韩必然统一，我们还可以由鸭绿江，由东北，重返中国大陆，如果韩战不幸而不利南韩，也势必因此而提高美国及自由国家加紧援台，决不致仟令国际共产党渡海进攻台湾了。”[①]

[①] 邵毓麟：《使韩回忆录》，第十六，见《传记文学》第 193 期（1977 年 6 月 1 日，台北）。

很显然，朝鲜战争的发生，是对蒋介石的援救，是使台湾转危为安的契机，朝鲜战争的爆发，或许是一个历史之谜。总之，它使美国对台政策发生了 180 度的大转变。

战争爆发后，美国鹰派主张以牙还牙，出兵朝鲜，杜鲁门也于 6 月 25 日急忙自密苏里家乡返回白宫，召集国家安全会议。27 日发表声明说，为了保卫太平洋地区安全和美国在该地区活动的部队，必须确保台湾，为此，他进一步说明：“本人已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防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并且本人已请求台湾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空活动。”[①]总之，确保台湾不受中共攻击。

两天以后，第七舰队已进抵台湾海峡。这个舰队共有 6 艘驱逐舰、两艘巡洋舰、一艘运输舰。舰队司令为史枢波。7 月底，贾德纳少将派驻台湾，继之麦克阿瑟访台。由于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自然必得推迟解放台湾的行动。从此之后，台湾的蒋介石，得以度过难关，起死回生，于是蒋介石有了一个安定的居地，甚至又产生了“收复失地”的幻想。毫无疑问，这一切均来自朝鲜战争。蒋介石也无疑是朝鲜成争的唯一受益者。

汉城被北朝鲜占领后，蒋介石曾向麦克阿瑟提出台湾出兵朝鲜 3 万余人的建议，被美国拒绝了，原因是英国等国坚决反对，美国也怕问题复杂化。

美国于 7 月 28 日派兰钦为驻台湾“公使”。麦克阿瑟又于 8 月 4 日派其副手福克斯少将率 20 余名军官到台，作为东京和台北间固定联络员。又有巴克准将也来台北，帮助改进台湾的交通系统。麦氏同时又派 6 架喷气式飞机，以加强台湾的空军。美国国会还通过拔款 7100 万美元援台。这又大大加强了台湾的“地位”。

8 月 29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又发表对台政策声明 4 项：（一）美国并未侵犯中国领土，也未对中国采取侵略行为；（二）美国对台湾的行动，系出于对海峡两岸紧张局势的考虑；（三）美国之行动是中立的立场，同等对台湾与大陆双方的军队；（四）美国对台湾的未来政治解决并无成见。该岛的实际地位，因系“得自日本的领土”，“此正与此类其他领土一般，其法律上的地位，在国际行动尚无决定之时，是不能确定的。如果安全理事会有意研究台湾问题，吾人当支持而协助此项研究。”

同一日，安理会接受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国在台湾驻有海空军的指控。这个动议是由印度代表劳氏所提出。美国为表示公允起见，也投票赞成此一动议。

安理会于 9 月 29 日又决议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于 11 月 15 日出席对台湾的讨论。当台湾代表蒋廷黻提出使用否决权时，美国也投了反对票，结果以 9：1 否决了蒋的提议，董显光在《蒋传》中说：“联合国此一行动使自由中国惊骇震动。对中共的被邀请，被视为接受‘中共代表’以取代自由中国在联合国所占席位的初步。”这当然对蒋介石是一个阴影，但一时还未能出现实质性的变化。

至 10 月 20 日，美国和联合国军侵占北朝鲜的首都平壤。又过一个星期，竟侵抵鸭绿江边。这时北朝鲜军队尚余 2.5 万人左右。对此，中国政府认为这对中国造成严重威胁。

在中苏共同协商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

[①] 《中央日报》（台北）1950 年 6 月 28 日。

国人民志愿军即于 10 月 19 日渡过鸭绿江，赴朝参战。

本年 11 月底，经数次激战，美军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得大败，将美军和联军驱逐出鸭绿江边，使其退到 50～100 英里处。11 月 24 日，志愿军又从西路由两个装甲师为前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溃美军一部，26 日收复平壤。这一仗，是美国自珍珠港事件以来最大的惨败。在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亦伤亡惨重，付出重大代价，北朝鲜人民自为铭记不忘。

中国代表伍修权于 11 月 29 日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严厉谴责了美国政府和“联合军”的侵朝行径，并强烈要求联合国制裁美国和“联合军”退出台湾和朝鲜。后由于美国的坚决反对，伍修权未获准在联大发表关于台湾问题的演说。

麦克阿瑟于 1951 年 4 月 5 日再一次提到关于台湾问题的信函，由众议院议员马丁在众议院宣读。其中有在中国大陆开辟第二战场的主张。他说：“如果进行全面战争，美国必须接受蒋介石元帅所提供的军队，并支持台湾在中国大陆开辟第二战场。”并且又强调提出：“如果我们在亚洲反共之战失败了，则欧洲沦陷是不可避免的。”从而批评欧洲第一主义者。麦氏显然把社会主义诸国的力量夸大得太离谱了，所以杜鲁门并不理会他。而且于 4 月 10 突然宣布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以李奇威继任，以避免把战火烧到中国大陆。杜鲁门所以绝对避免攻击中国大陆，是深恐苏联参战从而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杜鲁门必须同英国一道，以防卫欧洲为第一任务。因为他深知，如果苏联参战，英国不一定支持美国。

此后，美国 56 名（过半数）参议员签名，发誓反对美国承认中共。美国政府又拨给台湾一笔美援。同时助理国务卿鲁克斯又转而支持蒋介石，认为蒋代表多数中国人意见，台湾不管如何，已渡过了危险时期，转向风平浪静的太平洋了。

到台后的工作、生活情况

蒋到台湾后，以“不忘在莒”的田单“复国”精神，坚抱“反攻复国”之“志”，不断总结教训和培养干部，工作量非常大。

他兼任“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院长时，就亲自抽阅学员自传和作业，并对作业进行批改。学员 150 人，受训期间至少被召见两次。

这时，他虽已年过花甲，仍精力过人，对军政大事，事必亲躬，所有军事演习也必亲自参加。对于军事干部，陆军团长以上，空军大队长或联队长以上，海军大型舰长以上，他都一一接见过，平常客人也是络绎不绝。他在总统府见客时，由侍卫长和秘书陪同；在宫邪见客，则大多由秘书陪同，并在接见客人时，十分注重进退礼节，每次均以客人身份、年龄、国籍等分别对待，一丝不苟。

他在官邪设有新闻、言论秘书二人，协助他的日常工作，对他的新闻、言论秘书的工作要求有 5 项：（一）整理、搜集若干资料，供他写作时参考。或者笔录他的口述文件、讲稿，或交大纲与秘书，令其起稿。（二）陪见客人，笔录谈话要点。（三）处理一般新闻，划出每日新闻重点。（四）联系传播媒介，即报纸、广播电台、通讯社、电视台等。（五）旁听各项会议，了解全貌。

每年双十节、元旦、青年节，蒋都发布文告。他的文告一般是先由秘书

记录他的讲话要点和大纲，然后根据这些记录写成讲稿，呈送他校阅。通常的文告要修改三五次。而“国庆”、元旦、青年节文告，则要副秘书长亲自起草，并修改 10 次左右才成定稿。改稿时，蒋常常改得很多，有时纸上无一点空隙。为了怕出错，改后又念给塾书听，对于政策，美键性问题尤其注意反复交代说明，惟恐出错。

会见客人时，蒋自己也有时亲自记录一些要点，但主要由秘书记录大纲、建议事项、或蒋的交代事项，供蒋参考。蒋会见政府最高层负责人时，秘书就自动退避。

蒋的秘书长主要是把关和过滤两重任务。凡不重要的公文多由秘书长处理；重要公文要呈送蒋亲自处理。至于重要与否，则要由秘书长自己的方寸来作决定，如果掌握不准，就要受到责备。凡是有事要晋见蒋的官员，也必须由秘书长安排，连蒋经国晋见，也要统一安排。而副秘书长则一般是蒋的文胆，都是深知蒋氏文气和意旨的人。

蒋的秘书，大部分是湖南人，据其秘书楚崧秋说，可能是因为湖南人个性朴拙，或者是对湖南先贤曾国藩的钦仰，爱屋及乌，特对湖南子弟加以垂顾。

对于看报，外界传言甚多，都以为蒋氏因日理万机，看报必然很少。也有好奇的人，关心蒋氏每天都看哪些报纸？也有人认为他每天不过只看《中央日报》，哪还有时间看其他报纸！

其实蒋氏每天看报至少有 10 份以上。如到外埠，因当地报纸出得早，就先看当地报纸。平时看报，先看哪一份后看哪一份，都有一定次序。蒋早晨起床，秘书人员最迟要在 7 点一刻把整理好的报纸呈送到书桌上。整理报纸时，先用红蓝铅笔划出当天的要闻。当蒋早餐时，由口齿清楚的武官读报。早餐罢，他又自己亲自翻阅，整份报纸他都看，连地方版、社会版也都看。例如某地警服不整，警察态度不好，或是民间疾苦、冤屈，他看后，就交代侍卫长或武官调查处理。

下午如无重要公事时，蒋往往又把读报人找来，继续朗读，或重读重点新闻全文。每天下午 3 时许，他都要看香港报纸。对于中共或国际间反对他的消息，则从“中央通讯社”的《参考消息》上看到。蒋对这份参考报纸，吏是遂日阅读，不稍遗漏。

对于国际间的大事，则从外交部、新闻部、或情报部门获得。

另外的一个了解国际动态的捷径，是宋美龄将每天英文报纸的有关重要事项向他告知。

对于秘书人员，蒋总不给一个完整的星期天，通常是每星期天上午 11 时后，秘书自由活动，另有一个秘书可以回家听传。

除新闻、言论秘书外，蒋还设有英文秘书，如沈昌焕、沈锜、沈剑虹、钱复等都先后当过蒋的英文秘书。这些秘书，担任蒋介石直接和美国来访人士交谈的口译工作，深知蒋的意旨，因之以后都出任要职。如沈昌焕以后出任新闻局局长、中央四组主任、外交部长，1950 年后，任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中常委。后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总统府”秘书长。沈剑虹任外交部长。沈锜、钱复均曾出任大使。“外交三沈”都是蒋的英文秘书。

蒋的侍卫长是最辛苦的，其责任也特别不寻常。平时侍卫总统，如蒋用餐时，侍卫长就要侍立一旁，待蒋用毕，自己才能用餐。蒋出外时，待卫长要负责蒋的安全。有时蒋吃完饭就出门，待卫长就要放下饭碗，饿着肚子随

侍。到晚饭时，就只有吃饼干。因此，侍卫长多患胃病。如恃卫长皮宗敢，就患有严重胃病，当然也可以因侍卫长干的好而有好出路，例如侍卫长郝柏村，就已出任参谋总长要职。曾任侍卫长的邹坚，也升任驻韩国大使。

但是就全面看，侍卫长比秘书要苦得多，为升官所付代价很大，一般人均视为苦差。随蒋出巡，就更苦。侍卫长一般坐吉普车，甚至有时坐大卡车，有时，还得步行。住的地方，多是因陋就简，有时要睡地铺，并随传随到，而且为保密起见，说走就走，不能和家里人打招呼。一走几天，连打电话时，都不能将自己所在地告知家里人。有的人干不了，只好辞职。

到台后，蒋批阅公文更加精细，对于错字、漏字，必用红笔勾出，或在旁写出正确字。还对词句进行修饰，常常在修改处加一大段。有时干脆不用原稿，而由自己另写。

对于宴会安排席次，他也要亲自过问或审核，“丝毫不苟”。对于外交官任职的批示，也同样亲自过问，甚至批上“此人仪表如何？”

蒋向来很讲究办事方法，他早年就注重科学的办事方法。他的科学方法，是来自《大学》首章：“物有本末，享有始终，所知先后，则近道矣。”至于科学方法的要旨，则是由近而远，自低而高，先微后大，由易而难。其办事精神，则是“实事求是，精益求精，继续不断，贯彻始终。”他于 1953 年元旦，又提出“新速实简”四字办事要纲和三联制（计划、执行、考核）大纲相结合的工作要则。使“一切人事财物的管理，重要业务的推行，都各有一个组织，由各单位派员参加，……在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共同负责之下，切实办理，故在行政效率上，有显著成就。”

他在日理万机中，于每一时期又均有一专注的中心工作，进行重点处理，并为此而晨夕垂询和核查，“楔而不舍”。但一等这一中心工作完结，就马上到青山绿水之间，欣赏湖光山色，忘情尘世，以松弛精神保持身心平衡。这个习惯从大陆到台湾，均一直未变，这也是他高寿的原因之一。

蒋到台湾后，也开始比较注意民间疾苦。他出巡时，常常步行访问乡村，察看民间疾苦，询问人民生活、工作情况。有时还和他们合影留念。步行时，如果待卫人员阻挡面前行人，他就立刻予以制止。其作风与在大陆时，已大不相同了。

1955 年蒋游日月潭时，正逢久旱不雨，禾苗枯槁，蒋深为忧虑，每日傍晚散步时就令侍卫人员挖掘田土，察看干燥深度和状况，甚至为求雨而祷告。五六天后，忽降大雨，蒋为之喜形于色。

如遇台风，必嘱侍卫人员打听风向和有无灾情。

他在读书时，多以红蓝铅笔批注，并写心得，数十年如一日，到台湾后，也未改变。他读书有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对某一种书，不终卷则不中途改看他种书。除工作、出巡、读书外，他每天必记日记，这也是数十年中毫无间断。他说：

“几十年来，我每日必有日课，每日必有日记，虽在造穴颠沛之中，也没有一日间断。我在阅读某一种书籍时，没有终卷以前，绝不旁骛其他书籍。”[①]。

在待人接物中，他对文职人员一般最为优容，人必命坐，出必再会。凡所陈言，必令其畅所欲言，虽有时激昂慷慨，他也含笑对待。对党部和民意

---

①

机关中的乱说话，也不再生气，并“能集中不同之意见，团结众心为一心”。[②]可见蒋到台湾后，在性格、思想上，均有不小变化。

至于尊重师道，自是一直未变，而于老年后更加倡导。他到台后常说：“学生一定要尊敬师长，无论问业请益，要必诚必敬。”

他在台湾的每天安排时间，大致是这样的：每日 6 时起床，7 时许盥洗完毕，然后作早操。早操毕，即穿起蓝色长袍或普通军服进入书房，与宋美龄共同祈祷。祷告毕，用早餐，一般是稀饭和咸菜，多为腌竹笋。早餐时常用口齿清楚的武官为他读报纸。早饭后，自己再看整版的报纸。看完报纸后或批阅要电。重要公文，或接见高级官员和主持重要会议等。

下午 1 时半用午餐。在刚到台湾时，午餐是：一盘蔬菜，一盘瘦肉，一个汤，或者以鱼代肉。台湾经济发展后，午饭改为四菜一汤，外加点心、水果。蔬菜以青菜、豆腐为主，多为家乡风味。

他从不吸烟和饮酒。其孙蒋孝杰说他因此长寿。

午饭后，睡半个小时左右，睡罢再看重点新闻，然后又阅公文或接见重要官员。3 时许开始看香港报纸。至 4 时半，便带一个随从出去散步。有时高兴了，边走边唱；日军歌，或唱《满江红》，以及“反攻复国”歌。有时也在小池塘观鱼和投食喂鱼为乐。

散步约半小时左右，便回室喝乌龙茶。茶中加稍许糖。茶毕，再继续办公。至 7 时，结束一天的工作。继用晚饭。

晚饭后，就看电影。一般要有人在旁为他专门解说，他喜欢看台湾自己拍的电影。也爱听京戏、绍兴戏，话剧也爱看。在音乐方面，喜欢民族音乐，即“国乐”。有时也看美国电影。

晚 10 时，入另室祈祷和沉思。然后洗硫磺温泉水。洗毕写日记。日记写完后，息灯就寝。

初到台时，他每次静坐仍坚持大陆时默念孟子养气章和王阳明、曾国藩的名言。以后就不再念这些旧道。

他的总统府办公室陈设也很简朴。他在南京时，有人把室中旧椅垫换成黄绣花缎垫子，他见到后叫马上换成蓝色布垫，以示节俭，避免华丽。到台北后，其办公室在介寿馆三楼，只藤椅 14 张。有人建议更新，他却阻止说：“国难方殷，一切从简，不必更换，但需注意清洁。”

蒋到台后，生活穿着仍是比较简朴，在经济上也注意公私分明。凡非必须支出者，概不准支出。自 1958 年起，总统府的支出直到 70 年代，未曾增加预算。

他穿的衣服，多为细软旧衣。一件衣服，总要穿六七年以上。

他在重庆的一件；日黑披风，虽领口已破，也一直未制新的，照旧穿用。平时军服三套，内衣和毛衣各两套。多是补了再穿，不忍扔掉。

他的座车，是从大陆带去的 1946 年的旧车。

1950 年 11 月有人签请另购新车，蒋却指示“不必”。到 1956 年，宋美龄自美国带来旧车一辆，才替换他的旧车。1960 年，行政院始拨款购置新车一辆，一直使用到 70 年代他去世时。总统府的车辆蒋也不许过多，并不准随便增加。

此外，他对家内一切开支，每月也要过目账单，如发现支出过大，即令

[②] 《总统府内幕》，第 148～154 页。

撙节。他每次走出房门，都主动关上电灯，坚持人走灯灭。

台湾的“总统府”

“总统府”位于台北市介寿路，原是台北的最大建筑，于 1912 年 6 月：日开工建造。外贴红色砖面，结构坚实，材料均为当地最好的上品。1915 年 6 月完成主体工程，

1919 年 3 月正式完工。

是欧洲“文艺复兴”式的建筑，也是全台当时最宏伟的建筑。日寇侵华时期，为战火焚烧，三日不止，损坏严重。1946 年重建，完工后改称介寿馆，以纪念蒋介石 60 诞辰。建好后，先作东南军政长官公署。蒋介石于 1950 年 3 月 1 日“复职”视事后，便以此馆为“总统府”。沿用至今。

该建筑前面的两边，左右各有一个庭园。各占 150 坪。园中布置以绿地为主调，其花木有榕树、台杉、墨松、黄槐、杜鹃、山茶等。单杜鹃就有 12 种之多。园内有梅花型喷水池。1975 年以不好维持洁静又去掉喷水池，改种植花木。

“总统府”正门门媚上高挂“总统府”匾额。正大门两侧各设一电动玻璃大门，宽 3 米，高 4 米。进人大门后，是一中空敞厅，高 16.5 米。内以文艺复兴式高柱擎立，地板为花岗岩，光可映人。两侧有巨型棕榈。后厅有孙中山铜像。蒋介石逝世后其铜像置于前厅。敞厅之后是主楼。由敞厅登上三楼，蒋的“总统办公室”和大小会客室、礼堂均设于此，1971 年“总统府”才设冷气。

总统府全结构为井字形，办公室围绕大井四周而建，有 300 多间，可容 2000 人办公。总统府人员上、下班均走四边的边门。

总统办公室内挂有不少中国字画并陈设许多书籍。字画中有蒋经国画的“寒梅图”，图上有蒋介石的题字。

蒋接见客人在大会客室。室内挂有孙中山遗像，以红毯铺地，上置黄色沙发，围成椭圆形。室中还挂有孙中山手书赠蒋的一幅对联：“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研几于心意初动之时”。再就是宋美龄所画的一幅山水画，也有蒋氏的题字。大礼堂叫“介寿堂”，可容纳 400 人开会，“介寿堂”三字由吴稚晖于 88 岁高龄时所题。

每天早晨 5 时 50 分，有 40 人的乐队，自台北宾馆步伐整齐地走向总统府。6 时整，“国歌”奏起，“国旗”在晨成中冉冉上升。路上车辆、行人，均面向“总统府”静止肃立。

“总统府”设置整洁大方，不求华丽。每逢“双十节”、元旦时，“总统府”即张灯结彩，光芒四射。节过，复又简朴依旧。

“总统府”在大陆原设六局、二室、三处，以秘书长负责府中工作，另设参军长专理军务。蒋到台以后，于 1950 年又将机构简化为三局三室一处：政务第一局、军务第二局、综理总务第三局、机要室、侍卫室、人事室、会计处。另有参军 10 余人。至 1967 年，“总统府”内特设“国家安全会议”机构。蒋兼主席，为“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中心，很像清朝的军机处。另设秘书长一人和国家建设委员会、科学发展指导委员会，附属于“安全会议”。

第一局，重要任务之一是撰写文稿。其前身，是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二处，处长是陈布雷。抗战胜利后，二处改组为第一局。

1950 年迁台，又照旧复原，下辖文书组和政务组，黄伯度任局长，兼典垒官。副局长为曹圣芬，原任侍从秘书。以后有唐振楚、符涤泉、周应尤、刘至相继任局长。此外有关报告、请示，也由该局整理后，呈蒋阅审。

第二局，原是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六组的演变，主要负责情报、反间谍和审查所有总统约见的人员及准备送给当局的物品。总之要联络党、政、军各界情报单位。自 1954 年以来，因“国家安全局”的建立，第二局则偏重于军事情报的收集和承转。

第二局局长都是最为蒋所信任的人物，才能则居其次。迁台后第一任局长为俞济时，以后是张立夫、孟宪庭等。

第三局，是由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一处总务、参谋、警卫二组逐次沿革而成。在迁台之前，已经形成总务、军务、典礼三局。

迁台后，以上三局合并成“总统府”第三局。其主要工作是办理“国庆日”和其他纪念日典礼，接见外国使节，招待外宾的大典以及兼办“总统”官邸的内务和“总统府”的警卫等事项。

历任局长多为中将级军人，计有俞济时、刘牧群、乌铖、张麟德，彭传梁、朱季昌等人。

机要室是保存机要档案处。机要室主任更是蒋的亲信人物，这种机要档案除蒋和家人之外，很少有人可以触及。主任周宏涛就是蒋的乡亲、黄埔军校时期军需主任周骏彦之子。且周宏涛自大学毕业后，一直于蒋的官邸服务，深为蒋所信赖。

侍卫室辖勤务、警卫、总务三组，最为辛苦，但侍卫长的出路大抵均能出居军中高位。如顾祝同、钱大钧、周至柔、俞济时、楼秉国均当过蒋的侍卫长。蒋介石到台湾以后的侍卫长也都出任军事要职，或出任参谋总长，或出任副参谋总长。

参军长是“总统府”的军职人员的总管，下设参军 10 余名。

参军长无军事实权，只承“总统”之命办理军务。到台湾后，参军长权力更小，是个虚职，一般是当过总司令后，再当参军长，以待退休；但也因人有别，如黄杰任参军长以后，又出任过警备总司令、台省主席。

此外总统府设资政若干人，由勋高望重者遴选，备总统咨询。还有秘书 10 余人，承秘书长之命办理撰拟审核重要文件等事。另设参事 4 人至 6 人，办理撰拟审核重要方案等事。必要时置专门委员 3 人至 7 人，襄助秘书长办理必要之事。另设编审 14 人，承秘书长之命，办理上呈府内备案各项规章及机关工作报告之审核、编辑等事项。

以上就是蒋的个人办事机构，是一个庞大的秘书班子。

蒋在台湾有行馆 47 座。这是封建帝王的遗风。莲花县池南行馆于 1971 年修好后，就未进驻过，日月潭行馆，则为讨论军国大事时必往之地。1972 年“退出”联合国的决定，就是在这里做出的。

“复职”逼李

李宗仁带着沉重的心情，于 1949 年 12 月 7 日抵纽约，进住长老医院。19 日动手术。1950 年 1 月 20 日出院，租住医生家隔壁，继续调养。此前，李宗仁于 17 日答复白崇禧 15 日来电对蒋介石复职要求表示反对。他的理由是蒋的复职不合宪法有关规定。代总统引退，应由行政院长代理，三个月后，

代总统不能复职，则另行选举总统，不能由前任总统复职。

李宗仁对蒋的怨恨由来已久，任代总统后，这种积怨达到高峰，因此对蒋毫不妥协，对他的复职要求反对到底。

白宗禧接电报后不大以为然，又于 26 日复电李宗仁，给李指出两条方策：（一）不回国而辞职，由蒋复职；（二）返国不辞职，甘当监印代总统，如果不辞职又不返国则最为不利。

黄旭初和顾孟余、张发奎等在 1950 年 1 月 13 日交换意见后，也自香港电李宗仁，请李宗仁辞职组党。李宗仁又于 16 日电复黄旭初，表示既不辞职，也不组党，说组党尚非其时。

白崇禧、李品仙、雷殷、刘士毅等，也于同日电李宗仁，建议如不返台，就应辞职，以免“久旷国务”。李宗仁立即叫黄雪村电复 4 条，表示不同意见：（一）李宗仁身体尚未复原，不能返国。（二）关于引退一事，考虑到现在无法召开国民大会，由行政院长代理超过三个月固然违宪，而蒋介石复职也不合法。因此，不引退。以护党国之法。（三）李在美国，也可以行使职权。（四）美国对台不支援，实因对蒋介石有意见，对李宗仁则无意见。并要黄至香港代其面陈一切。

黄又于 1 月 18 日函告台北洪兰友、黄少谷：“美国当局秘密对人表示，如蒋离台，则美不特接洽军援，且可派海军援助。”蒋见此函，深受刺激，反应亦极为强烈，他愤怒地表示，决不离开台湾一步，声言在台反共到底。

自此以后，蒋、李关系更加紧张。

台北监院于 1 月 20 日电催李宗仁返国，并多有指责之词。李宗仁于 29 日回电答复：因身体欠佳，不能立即返台。力逼李宗仁返台的后台，当然是蒋介石。台北更于 2 月 4 日刮起了抨击李宗仁的台风，《中央日报》、《中华日报》、《扫荡报》同时发表社论，抨击李宗仁 29 日复电。《中央日报》干脆呼吁蒋介石复职。监院再于 2 月 14 日电催李宗仁返台，并质问李宗仁是返国，还是辞职？

如果李不能按时返国，则由蒋介石依据 1949 年 11 月 27 日临时中常会议决议，继续行使总统职权。

4 日以后，李宗仁只得回电说明，即使自己想要回台北，因身体尚未复原，也不能够，这是医生嘱咐。

形势发展很快，蒋介石在台复职，已为大势所趋，不久即可实现。但杜鲁门却不理会这一切，决定请李宗仁以国家元首身份到白宫赴宴。蒋介石闻知后，更加快了复职步伐，于 2 月 23 日召开国民党中央常会，议决蒋介石复职。第二天，立法院全体委员电请蒋氏复职视事。2 月 25 日，监察院弹劾李宗仁。3 月 1 日蒋介石发表文告，宣布复职。

蒋复职后，于“总理纪念周”上对 2000 名中下级干部讲了话，表示他接受大陆失败教训，彻底改造中国国民党的决心，并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争取“最后胜利”云云。

蒋复职的同一天下午，李宗仁在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指责蒋介石复职是违宪行为，杜鲁门则于第二天将李宗仁接进白宫，待以元首之礼，从旁助威，表示仍支持李宗仁，并和李宗仁个别讨论了中美关系和国际形势问题。谈后李宗仁回纽约定居，静观时局的演变。

此后，美国将于 1952 年举行总统竟选，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共和党欲以民主党援蒋不力，导致国民党失败，追究民主党责

任，从而击败民主党。1950 年 7 月，共和党领袖罗伯特·塔夫脱邀李宗仁夫妇至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海滨的一个小岛上游览，礼之以上宾。一天，塔夫脱在海滨别墅表示要与李长期合作。他对李说：“在 1952 年的总统选举中，对华政策的失败，将成为两党竞选中的主要问题。我们正在调查民主党政府未能对国民党政府采取有力支援的责任，阁下如能从旁证明这一点，那么彼此之间，就会出现合作的广阔前景。”[①]

李宗仁想了一下，坚定地说：“就我所知，国民党所以失败，实由蒋介石 20 年的独裁专制，政治腐败，人心离散；军事上指挥错误，士无斗志。这些是主要因素。”他表示不能与共和党合作。这给了塔夫脱当头一棒。

共和党人这次实在是找错了人。他们想为蒋介石开脱罪责，李宗仁怎么会作证呢？但他们仍不死心，便对李的外交顾问甘介侯说，李宗仁如果拒绝合作，将来参议院外委会就举行听证会，公开讨论李宗仁致民主党的密信。这就是李宗仁于 1949 年 5 月 5 日给杜鲁门写的信，其中谈到一个重要机密，就是蒋当政时对美援的使用问题。李当时是这样说的：

“可惜由于我们当时的政府未能对此项援助作正当的使用，未能采取政治经济与军事适当的政策，以致此项援助未能产生预期的效果。”

美国国务院收到这封信后，把它作为最后的对华政策根据。塔夫脱以此要挟李宗仁，要求参议院外委会举行重新检讨美国对华政策的听证会，并函请李宗仁到会作证。李的朋友克拉布劝李不去，因为参院外委会无权召一位外国的副总统出席听证会，李便派甘介侯和一律师前往，本人拒绝到会。此听证会自然也就无法举行。外委会主席汤姆·康纳利也坚决支持李仁宗。

几个月后，即到 11 月初，毛邦初自美返台述职（负责驻美空军购料处工作）。蒋要毛将 1000 万美元外汇款汇返台北。这些款项毛已奉命存入私人名下，现在又提出要汇往台北，毛很不情愿，就于返美后向李宗仁报告了这事。此款原为蒋引退后汇到美国的，李宗仁有权审查，即嘱毛邦初不得移交。毛又进一步向李宗仁汇报了蒋介石上年命驻美大使陈之迈和武官皮宗敢在美国向共和党人游说的机密。李暂不声张。美国俄勒冈州参议员摩尔斯于 1951 年 7 月，突然脱离共和党，投向民主党，向参院建议，由军委会和外委会联合调查台湾当局是否利用美国援台专款进行游说活动。参院旋作出决议，进行调查。这当然是民主党对共和党进行的反击，以争取大选胜利。

听证会上的资料，均为陈、皮向台北发电的影印本，这当然就是毛邦初提供的了，因为陈、皮的报告，均由毛邦初负责发电。

其内容共三个方面：（一）1949 年 11 月 28 日，陈之迈致电台北，说美参议员诺兰和众议员周以德，曾向大使馆说出许多国务院制订的远东政策机密情报。

（二）1950 年 4 月 7 日，陈电台北称，周以德将赴台北访问宋美龄，调查前太平洋学会主要负责人、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拉铁摩尔亲共材料。

（三）1950 年 7 月，陈曾向塔夫脱说，当世界局势巨变时，台湾将站在美国一边，但美国必须援台“反攻大陆”，以获取中国广大人力、物力资源。不久，这些听证材料又由美国《报导》杂志发表。蒋介石看后，自然对此极为恼火，于是决心罢免李宗仁副总统职。

蒋介石为作准备，于 1953 年 9 月 27 日以行政院建议，批准 1946 年 11

[①] 《李宗仁先生晚年》，第 154 页。

月选出的“国民大会代表”继续行使职权。立法院则于10月1日公布《国民大会代表递补条例》，由台湾补齐所有未到台湾的缺额。然后公告各代表前来报到，报到日期自10月14日至12月底止。蒋又于12月29日促立法院修正《国民大会组织法》第八条条文，将法定出席人数改为三分之一以上（原定为过半数）。

李宗仁见蒋介石任意修改宪法和国民大会组织法，便致函蒋介石，批评他在重蹈袁世凯和曹锟复辙，并指出他的这一切活动和他的“国民大会”、“立法委员”均不合宪法和有关法规。李宗仁信文内容如下：

（一）“中外人士，均认为此种选举违法乱纪，决不可行”。

（二）国民大会代表任期6年，不能延长。

（三）“动员戡乱临时条款”，只能为紧急时期之非常处理，不能用来延长国会代表任期。

（四）立法委员任期三年，现在立委已于1951年任满，不能行使权力。因此，无权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和通过《递补条例》。

但蒋介石并不理睬。立法院和监察院将弹劾李宗仁的案卷于1954年2月19日交“国民大会”秘书处。蒋并派洪兰友赴美促李返台答辩。李宗仁因为这一切均不合法，置之不理。3月10日，“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罢免”李宗仁副总统之职，蒋再次当选为“总统”。

为长子经国开道

蒋复职后，立即组织“新内阁”。由陈诚任“行政院长”接替阎锡山；周至柔任“参谋总长”兼“空军总司令”；孙立人任“陆军总司令”；桂永清任“海军总司令”。元老何应钦和重臣顾祝同，离开“中枢”。

1950年，其子经国被委以“国防部政治部中将主任”，后又改称“总政治部主任”，同时兼管“总统府资料室”，总管台湾各系统特务机构。政治部第四处负责保、防业务，取代保密局。同年任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

彭孟辑原任台湾保安司令部副司令，此次因于蒋复职前一日，协助破坏了三大地下组织案（苏联地下电台、中共地下组织和中共经济案），而被委为“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成为台岛特务机构的总揆。

关于总政治部工作，蒋介石规定了5项：（一）领导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和建立精神武装。（二）军事组织的筹划和官兵思想的考核，以及防止士兵逃亡和思想反动。（三）监督人事经费，核实人员、马匹。（四）鼓动官兵斗志。（五）推行保密防谍教育及其工作。其主要任务是教育监督和检举两大任务。

蒋又于1950年9月建立政工干部学校（台北近郊北投竞马场）。次年招收新生。其建校方针为：“以培养笃信三民主义，服从最高领袖，忠党爱国，坚决反共抗俄之健全政治工作干部，使能参与陆海空军各级部队，……共同完成国民革命第三任务之使命为教育宗旨。”[①]

实际上，这就是蒋经国的“黄埔军校”，用之掌握三军，把军队完全变成了蒋经国政治部控制下的新蒋家军。学校标榜信仰“伟大领袖”——蒋介石和“青年导师”蒋经国，其目的是为造成蒋经国新的个人独裁和新的封建

[①] 《民国政工史》，第1565页。

王朝。董显光说蒋经国并不想当“总政”主任，当然是违心之言。

1952 年 10 月 3 日，又成立“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直隶蒋介石和蒋经国。前者任团长，后者任主任。建立该团的宗旨，是为了反共和“复国”。蒋介石认为过去大陆青年被中共解除了精神武装，所以导致他蒋家军队的失败。但他不敢说大陆青年当时为何拥护中共。不少人说，蒋介石只检讨技术上的失败，而不检讨本质上的原因。他从来不公开承认他的政治腐败是其失败的根本原因，这个“反共救国团”即是大陆上的原“三青团”。蒋介石把蒋经国安排好以后，就开始把二陈挤走，为小蒋让位子。此时，陈果夫多病在身，无足轻重，陈立夫成为真正的 CC 头子，蒋于 1950 年就将陈立夫放逐到美国新泽西州去养鸡。当他走的时候，宋美龄送他一本圣经，让上帝给他以慰藉。但陈立夫却忧伤地指着蒋介石的肖像说：“夫人，那活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耶稣的信任吗？”陈立夫走了，中统解散。余下的障碍是陈诚，但陈已年老。还有孙立人虽年轻，但无根底，不是嫡系；加之蒋经国又任总政治部主任。总政抓军队，孙自然不是小蒋的对手。

彭孟辑任“台情会”要职，数年来权力炙手可热，众人侧目。

但其父，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对儿子的职务很不以为然，就劝他激流勇退，不可恋官。彭即于 1954 年力辞此职，果为蒋氏所准，即由蒋经国以“总统府”资料室主任兼管“台情会”。

彭辞职后，升任二级上将、参谋总长、陆军总司令等职。后又升一级上将，可谓“扶遥直上”。

蒋经国接管“台情会”机构后，对台湾特务机构进行整编。中统解散，把军统改成“国防部情报局”，主持对大陆的军事情报工作。

这时，蒋经国一手抓总政，一手抓台湾特务总部，成了名副其实的特务头子，权力膨胀可称神速。但每次开特务工作会议，那些戴笠的部下，总是张口“戴先生”，闭口“戴老板”，并表示要听小蒋的话，像狗一样效忠蒋介石，蒋经国觉得和戴笠“并驾齐驱”不甚光彩，便于同年又提议建立“国家安全局”，以取代“台情会”，并且自己退居第二线。但在幕后却牢牢控制特务机构，丝毫不放。同年（1954 年），蒋经国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

1964 年 3 月 12 日委小蒋为国防部二级上将副部长，实主部务。

1965 年 1 月 14 日任一级上将部长。

1969 年任“国家安会议总动员委员会”主委。1969 年 6 月 25 月任行政院副院长。

1972 年 5 月 26 日又升任行政院院长。

至此，蒋介石已为蒋经国出任总统完全准备好了条件。

蒋日关系

英美等国于 1951 年 9 月 4 日召开旧金山和平会议，决议对日媾和，蒋“政府”未能参加签字。

美国于 1951 年 7 月在远东委员会 13 国会议中，由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对日讲和。苏联对此坚决反对，坚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苏英四国外长会议，并需一致通过方可。双方坚持不让步，蒋之“政府”亦未能参加旧金山和平条约签字，特发一声明“中华民国”有与一切盟国的平等地位，日本必须尊重“中华民国”领土主权完整，视“中华民国”为主权国，代表整个中国；

中日和约可以和旧金山和约精神一致。

1950 年 2 月 1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主要是防美。美国则怕日本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便急于扶植日本，将日本拉入他们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

朝鲜战争 6 月 25 日爆发后，美国扶植日本的步伐更为加快。蒋之驻美“大使”顾维钧 10 月 20 日在纽约城外成功湖，与美国国务卿顾问杜勒斯（后任国务卿）会谈对日靖和问题。

杜勒斯对顾氏转达了 5 项提案：

（一）凡参加对日战争之任何国家，同意请和者，均得力缔约国。（二）考虑日本加入联合国。（三）日本承认韩国独立。（四）日本同意以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交联合国托管，并以美国为治理国。（五）关于台湾、澎湖列岛、南库页岛及千岛群岛之地位，将来由英、苏、中、美四国决定。

台湾和澎湖各岛归还中国，是在 1943 年 11 月的《开罗宣言》中肯定，并由 1945 年《波茨坦宣言》中再经认定的事，为此，顾维钧向杜勒斯提出质问。杜勒斯说，“冻结”对“中华民国”是有好处的，不然，台湾就有落人中共和苏联控制下的危险。他的理由如下：

“美国虽切望世界大战不再爆发，但并无把握，不愿台湾落人仇视美国者之手，尤不愿为苏联所利用。美国人力不足，对太平洋防卫，只能利用海军、空军树立强固防线。倘一旦有事，美国能控制亚洲大陆沿海，而台湾岛正在防线之内。是故冻结台湾地位，即是维持中华民国地位”。[①]

顾维钧复于同年（1950）12 月 19 日，第二次和杜勒斯会谈，再次表示：台湾等领土地位明确地由开罗、波茨但两宣言予以规定，“毋须日本各别追认拨归何国”。到 1951 年 1 月 22 日，顾又受命表示愿缔结对日和约意向，同意台湾冻结议题。美国遂于 3 月底将和约草案分送 53 个国家。蒋为自保又一次对外妥协，同意了台湾地位冻结的条件，因为这时他自己对能否守住台湾，也无把握。

一向对蒋介石没有好感的英国，于 4 月中旬提出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对日议和。5 月和 6 月间，苏联也两次主张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美、英三国共同举行四国外长会议，讨论对日和约。杜勒斯为说服英国政府跟美国走，于 6 月 15 日赴英见莫礼逊外相，结果是杜勒斯失败而归。他与英外相的协商结果是：由日本自主对海峡两岸任何一方签约。杜勒斯即将此结果于 6 月 17 日转告顾维钧，并要求顾维钧严守秘密为条件。同时又对顾说：“日本政府对贵国态度甚好，必愿与贵国签约，而反对与中共建立关系。”

对杜氏向英让步态度，蒋介石未能接受，他于杜氏谈话第二大（1951 年 6 月 18 日），就发表声明，坚决反对这种折衷方案。他说他是参加对日战争的盟友，绝不容许歧视。

杜勒斯于 7 月 6 日将最后和约草案在美国务院面交顾维钧。

但条约未列“中华民国”名字。9 月 4 日，旧金山歌剧院 51 国对日媾和会议召开。原参战国 55 国中，有印度、缅甸、南斯拉夫和蒋之“政府”未参加。会议中，苏联代表葛罗米柯仍然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参加会议的要求，但被会议否决。日本代表为首相吉田茂，于 7 日晚间发表接受和约讲话，并对蒋之“政府”未能参加表示遗憾。同时公开表明强烈的反共立场，叫嚣“共

[①] 《秘录》，十四，115～116 页。

产主义的压迫、专制相伴随的阴险势力，加深了远东的不安与混乱。……

面对此集体性的侵犯，日本为谋自由国家的集体防护，将与美国缔结安全保障条约。”[①]

晚上，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于是以美日联盟对付中苏同盟的局面开始形成。联军对日占领也随之而解除。日本开始以一个独立国家又回到国际社会，遂迅速发展和强大起来。日本国会于 1951 年 11 月 26 日最后通过“金山和约”。

对此，台湾当局声明三项原则：（一）中华民国必须维持与对日作战各盟国平等的地位。（二）中、日双边和约，应与金山和约内容大体相同。（三）日本必须承认中华民国对中国全部领土的主权，蒋氏终于按美国的导演扮演角色，单独对日媾和，并不断地要求与各盟国地位平等。

但日本政府对与蒋单独媾和，出于自身利益，又顾虑重重，犹豫不决。日本官房长官冈奇胜男，于 10 月 25 日对董显光讲明了日本政府对单独与蒋靖和的忧虑。他说：“我国深恐与贵国订立双边和约后，势将引起大陆中国国民对我之仇视。”又说：“俟我国独立自主后，自将充分研究于何时与中国政府签约。我国固极敬重贵国政府，所惜者目前领土仅台湾耳。”日首相吉田茂态度也不积极。他于 10 月 29 日在国会条约委员会上发言时，说：“如果中共要我国在上海设置驻外事务所，则为了通商，我们可以设置。”

次日（30 日）又于答复羽仁五郎质询时表示：“日本现有选择媾和对手之权。关于如何行使此权，应考虑客观环境，考虑中国情形，及其与日本将来之关系，不拟轻予决定。”吉田茂在美国金山会议上，大唱反共反华滥调，以博美国好感。但一回国，他就变了调子，要自主外交，表示不事事跟在美国屁股之后，对美开始表现出离心力。

31 日，蒋之外交部长叶公超约见美国驻华代办兰钦，对他提出警告谓：“吉田的言词已构成对自由世界的一项挑衅行为，美国使日本立于自由阵线，应竭力设法使中、日间早日媾和，但如任吉田长此以往，旧金山和约业已完全失败。”兰钦则答称马上报告美国政府，并将副本送东京。美国于 11 月 5 日答复，坚决“反对日本与中共拉拢关系之任何企图”，并反对日本政府与中共之间交换海外代表。又于 12 月 10 日派特使杜勒斯赴日，与吉田茂会谈。

12 月 24 日，吉田便完全改变态度，写信致杜勒斯，表示准备与“中华民国政府”缔结和约。美国终于迫日本就范。这是蒋介石的一个外交胜利。

英国再于 1952 年 1 月 5 日表示反对日本承认“中华民国”，但美国态度坚决不变，英国也就无话可说。1 月 30 日，日本政府即派河田烈为首席全权代表赴台。台湾当局任叶公超为“全权代表”。双方会谈于 2 月 20 日开始，到 4 月 28 日，在台北签约。日本第一任“大使”于 8 月 9 日派驻台北。7 天后董显光任“驻日大使”。双方“建交”。

但日本为自身利益计，决不会“忠于”蒋介石和美国，而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来往。自 1949 年底，日本即在盟军总部允许下，开始和中国大陆接触。

1952 年 4 月，日本正式恢复独立后便进一步积极开展活动。4 月 22 日，成立“日中贸易促进会”。继而有左派社会党人帆足计等三人乘出国开会之

[①] 《秘录》，十四，第 120～122 页。

便，自莫斯科秘密来北京，6 月 1 日在北京签订了 3000 万英镑的“第一次中日贸易协定”。

1953 年 10 月 29 日，中日又签订了“第二次中日贸易协定”，数目与第一次相等。1955 年 5 月，签订第三次中日贸易协定。

在蒋的牢骚影响下，反华人物岸信介于 1956 年 4 月开始加强对蒋的关系。同时，蒋也派其“立法院院长”张道藩访日。日众议院议长石井充次郎又于 8 月访台。议决成立“中日合作策进会”。

1957 年 6 月 2 日，岸信介首相访台，对蒋声明，决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决定亚洲政策方面，尊重中华民国意见”。但岸信介为其本国商界的利益，力图说服蒋氏同意民间对大陆的贸易关系。他在台北士林官邸对蒋委婉劝说如下（由张群任翻译）：

“日本人对中国之观念渊源甚深，中国有五千年之历史，中、日有两千年之关系，故日本人一谈到中国，即有十分亲切之感，初未计及思想问题。因之日本谈到对中国大陆贸易，尤其以大贩为中心之中小企业，只要大陆有生意可作，即群趋若鹜。故现在日本政治上决定不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亦不在联合国内对中共作何帮助，但对于日本人民断绝与大陆来往，不做贸易，在理论上固可如此说法，而事实上绝不可能。此点希望予以谅解。”

蒋见此状，也不再坚持以往要日本民间不与大陆通商的作法。他说：“顷谈日本对大陆贸易，也是现实的问题，我保留置评。”但是他又警告岸信介，说中共渗透力量的厉害，叫他紧防，不能让中共在日设立什么机构。他说：“如日本容许共党在日设立贸易代表机构，任其公开活动，则共党在日有此渗透活动之凭藉，阻碍日本反共政策之实行，其害甚大。故余以为贵国对于共党的此种要求，决不能予以许可。”[①]

继之，蒋对岸信介宣传他的“中日共存论”。说台湾与日本，谁也离不开谁，一旦分离就彼此都有危险。他说：“中华民国政府在大陆失败，搬迁到了台湾，地位较弱，固不容讳言；而在日本除了有远见、有抱负的大政治家仍能了解台湾今日之重要性外，一般的人或已不甚重视。现在而谈中日合作，若仅就此点而论，余甚慨然。

“不过，我们需得知道：现在苏俄对亚洲，有两个最紧要的目标，一为消灭台湾；一为赤化日本。此二目标如能达到，则其统治亚洲即无问题。所以中、日两国，断无一个灭亡另一个尚能存在的道理。故此两国家必须衷心合作，日本得到安定，中国又能反攻收复大陆，两国合作，方有真正的力量。

“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共同认定：

“第一，苏俄是日本与中国共同的敌人。

“第二，日本与中国一定要共同反共。

“因为中国大陆在苏俄控制之下，我国不反攻，不打倒共党，不收复大陆，单靠日本的力量对付苏俄是不够的；必须中国收复大陆，联合中国与日本的人力与物力，共同对俄，才能成功。”

岸信介虽明白地表示支持蒋“反攻大陆”，但却无在经济上表示一钱之助。

蒋于 1957 年 9 月 16 日派张群（总统府秘书长）为特使访日，19 日抵日，仍然宣传反对日本民间和中国大陆贸易的观点。

[①] 《秘录》，十四，第 141～142 页。

10 月 2 日，张群和岸信介发表共同声明。其中特别提出：“特使与首相并承认：日本经济之安定，系于对外贸易者甚大；然其扩大对外贸易之际，应有注意勿使其阻碍与自由国家协调之必要。”[1]这种声明，对于精明强干，惟以发财为念的日本政府来说，不过是安慰病危者的催眠曲，骗骗人而已。

日本钢铁代表团（稻山嘉宽为团长）于 1958 年 2 月 26 日来北京缔结二亿英镑的“钢铁五年贸易协定”。继之于 3 月 5 日，又签订“第四次日中民间贸易协定”。并在第四次协定《备忘录》中规定：（一）对通商代表团所属人员之出人境给予方便。（二）准予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蒋之政府立即提出抗议，并于 3 月 14 日中止正在台北举行的“中”、日贸易交涉。

17 日，又向日本政府提出备忘录：

“（一）日本政府声明：不承认中共，中共商务代表未有公务身份，不给予外交特权。

（二）不准悬挂中共旗帜。”[2]

日本政府在 4 月 9 日由内阁官房长官（秘书长）爱知揆一发表谈话，承诺台湾当局之要求：“（一）日本政府现元承认中共意向。（二）对于民间通商代表部无承认其有公务地位的特权。（三）尊重日本和中华民国的关系及其他国际关系。（四）不承认中共之所谓在民间通商代表部有悬挂其国旗的权利。”

于是，5 月 2 日发生了长崎一青年将中国五星红旗于邮票剪纸展览会场中扯下来的事件。中国政府立即停止了对日的民间贸易。1959 年中苏公开决裂。1960 年 6 月，岸信介内阁总辞职，池田勇仁继组内阁。池田表示对中国以“前进态度并保持弹性和双方打交道”。中国总理周恩来则提出“政府协定、民间契约、个别照顾”的“贸易三原则”，并由中国指定中意的日本企业为“友好商社”从事对华贸易。池田当然抱着经商获利的原则，乐于响应。

自民党领袖松村谦三于 1961 年 9 月和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确认了“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前者是：（一）不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二）不参加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三）不妨害中日关系正常化，到 1962 年 11 月 9 日，又由廖承志和日本高碕达之助签订了《觉书贸易》。12 月，南汉宸又与日本三个贸易团体签订《中日贸易协定书》。一年后，日本的友好商社增至 200 家。1963 年 10 月，中国成立中日友好协会，廖承志任会长。

池田对推进中日关系甚为积极，他于 1963 年 8 月 20 日批准了仓做公司对大陆输出分期付款维尼龙工厂成套设备，并决定由输出入银行给予 200 万美元的融资周转。输出入银行为日本国家金融机构，此机构出资资助，当然超越了民间范围。于是台湾当局又提出了抗议，要求池田停止进行此种资助。但池田不是岸信介，坚持不理。池田于 9 月 19 日在对美国赫斯特报系总编辑等人谈话时说：

“中共在三五年内不会有变化；台湾的反攻大陆政策，没有根据，近乎幻想。”[1]

这种不甚礼貌的话，激怒了蒋介石，他于同月 21 日接见访日美国人士，

---

[1] 《中央日报》1957 年 10 月 3 日。

[2] 《秘录》十四，第 146 页。

[1] 《朝日新闻》1963 年 9 月 20 日。

说了许多教训池田的重话。他说：

“九·一八事变之前，池田是在中国东北的一名低级官员。当时，日本军阀曾夸口说，他们只需要三师军队对付我们，在三星期内，就可使中国屈服，但是那三星期变成一个更长的期间，变成一场自 1931 年一直进行到 1945 年的战争。

“池田像一九三〇年代初期的一些日本人士一样，预言非其所长。池由对于我们在战争结束后对其战败的人民所表现的以德报怨，宽大为怀的态度，似乎未有所悟。

“自战争结束以来，日本由于美国的慷慨援助，已获得一种可观的经济成就。显然的，那种成就已使日本产生虚骄的自负心理。

“遗憾的是，诸位未曾向池田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可能是：‘当九·一八事变时，你在何处，与所作何事？’

“第二个问题是：‘你们军方夸称将在三周内击败中国一节，不是真实的吗？还在那次行动中领导中国人民不依然是同一蒋介石吗？’这是池田原可以从历史取得的教训，但他并未领悟。”

当天（9 月 21 日），蒋召回驻日大使张厉生。立法院则主张应与日本断交。

10 月 18 日，发生中国访日油压机械代表团团员周鸿庆叛逃事件，池田内阁将周引渡与我国政府，不理会台湾欲引渡周氏归台的要求。蒋对此也极为愤怒，说日本政府“亲共媚共”。台湾当局“外交部”于 1964 年 1 月 10 日向日本发出最后通牒。蒋并质问日本究竟是完全倾向于中共还是坚持反共立场？还说：“须知中日邦交的恶化，我们固然有若干不利的地方，而将来受害最大，尤其是将要自食其恶果的——都是日本。”[①]

池田首相于 2 月 23 日派吉田茂访台，以安慰蒋氏，吉田茂与蒋介石三次促膝谈话，达成了《中共对策要纲》5 项：

“（一）解放现在共产主义控制下之中国大陆民众，使其参加自由国家阵营。

“（二）日、华应具体提携，藉使大陆民众离弃共产主义，并诱导之将共产主义自大陆驱逐。

“（三）日本对反攻大陆予以精神上、道义上之支持。

“（四）日本反对所谓两个中国之构想。

“（五）日本与大陆之贸易，以民间贸易为限，避免给予政府援助。”[①]

该协议由吉田带回国去，经日政府斟酌，以《吉田书简》形式确认下来。吉田发书信，张群为受信人。其实这是日本耍的一个骗蒋花招，故不以政府间形式，给蒋以精神安慰而已。但此书简，不知为什么与在日本流行的内容完全不同。

曾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和驻美大使的魏道明于 6 月 11 日任驻日大使。7 月 3 日，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访台，蒋介石于 4 日上午 10 时 45 分在“总统府”与大平会见。大平传达天皇对蒋的问候，蒋也请大平代向天皇致意。然后大平对蒋给日本新泻地震的慰问表示谢意。蒋遂追忆当年在高田联队时周未常去新泻，并说：“昔日之长官及友人在该处者甚多。新泻为余之第二故乡，

[①] 蒋介石：《巩固台湾与反攻大陆的要务》（1964 年 1 月）。

[①] 《中央日报》1964 年 4 月 5 日。

敌对之特别关心。”

寒喧后，两人谈论了亚洲局势。蒋说：东亚之问题，实乃中共问题。中共问题不解决，东亚即无安定和平可言。日本经济虽然发达，但中共问题如不解决，则其社会与经济基础随时将发生动摇。池田首相及日本政治家应悉心研究中共问题。因中日两国不仅为近邻，而且利害与共。现韩国、越南、缅甸、印度均受中共“威胁”，对于此种局势，希望慎重注意。我们是亚洲国家，绝不能脱离亚洲，对亚洲友邦，必须扶助合作，生死与共。日本又为亚洲最富庶的大国，自应特别负起责任。目前，日本经济虽不依靠大陆，但中共问题解决之后，日本经济与我合作，不仅可获安定繁荣，前途也无可限量。

大平则接着表示：“承蒙阐示有关东亚安定繁荣等重要问题之卓越正确见解，至深铭感，并完全同感。……亚洲必须有自由之亚洲，绝不可沦为奴役之亚洲。……”蒋接着又说：日本必须与亚洲各国同时共进，不可先谋一国的安定；今日本对中国或对亚洲须有一个具远见的中心政策。亚洲之问题即中共问题。如中共不消灭，今后 5 年至 10 年内亚洲各国均有被赤化的危险。希转告日本池田首相及其政治家，日本今日既不能援助我国反攻大陆，消灭中共，但至少也不可助纣为虐，增加我大陆人民“痛苦”，“危害”我反共力量。

大平在回答中只是空洞地对蒋的论说赞扬了一番，便转而说明“日本在本质上是反共的”，并再次表示道义上支持蒋“反攻大陆”。但话又说回来，他希望谅解日本不得已之苦衷。

佐藤荣作于 1964 年 11 月 9 日组织新阁。佐藤又转向积极支持蒋介石。1965 年 4 月 26 日，日本和台湾当局签订了 1.5 亿美元契约。第二年 10 月，又于台湾高雄开设总领事馆。蒋于 1967 年 5 月派外长沈昌焕和副总统严家涂先后访日。日首相佐藤也于 9 月 7 日访台。

蒋对佐藤所谈当然仍是坚决反攻大陆，消灭中共势力的口头禅，但对佐藤则进一步要求其作亚洲支柱，应当有所行动。他说：

解决中共问题绝非难事，日本为亚洲支柱，为亚洲之安全计，日本应有所主张，中共存在，不仅“危害”中国，也“威胁”日本。

但佐藤的答复则是，“日本在世界上曾扮演丑恶角色，所作所为诸多错误，今后自不再如此”，所答非所问，语意不清，似不愿之意。

蒋又转而表明自己要独立行事，不需任何人的援助。但他此时很想乘中苏交恶之际反攻大陆。他说：“美国人总认为中共是一个整体，此是绝大错误。须知中共政权与中国 7 亿人民是截然两事。中国历史背景、传统文化如何能与中共相容。中国人民无一不是反共的，只要我们吊民伐罪，大陆人民都会揭竿而起。目前，中共与苏联关系破裂已达极点。苏俄内心愿见毛泽东早日灭亡；此时反攻，不必恐惧苏联驰援，至少我军收复中国南部，决不致引起苏联的介入。美国总以为中华民国如果实行反攻，必将牵涉美国，美国不愿卷人漩涡，于是有两个中国的想法，藉以苟安于一时。殊不知两个中国办法，因为我所绝对反对，而也不是中共所能接受，仅为一种幻想而已。至于我政府之反攻，不但不须美国援助，而且美国介人更授中共以口实，反与我不利。中国的事自可由中国人自己解决。”[①]

[①] 《秘录》，十四，第 162～163 页。

同日下午 8 时，蒋在台北阳明山中山楼举行晚宴招待佐藤。并对佐藤说明苏联对日本北方领土决不肯交还。此时佐藤对蒋说：日外相三木武夫访苏时，柯西金说中共已不可救药。蒋则说中共的领土野心比苏联还大，连朝鲜、缅甸等国均在其扩张范围之内，促日本积极支援他“反攻大陆”。佐藤仍未予明确表态。

蒋经国（国防部长）于同年（1967 年）11 月 17 日应佐藤之邀访日，对日本政界表明“中华民国光复大陆的决心不变”。

1970 年 4 月 15 日，中国政府对日本提出了“四条件”。主要是凡和“中华民国”有交易关系的工商企业，不许与中国大陆来往。台湾当局也于 7 月 23 日发表声明：凡接受四条件者，台湾拒绝与其贸易，这其实是为了面子发表的声明，既接受四条件，当然不会到台湾去贸易了。

中国“政府”声明对日本企业界是一极大冲击，许多企业家纷纷转向中国大陆，形成一种风潮，都有“不要搭错了巴士”的急切感。这对台湾经济，当然也是一个不小打击。

改造中国国民党

蒋到台湾后，以“田单复国”精神，发奋图强，虽未卧薪尝胆，却也是励精图治，欲有作为，幻想有朝一日，反攻大陆，重上宝座。

他发奋图强的最主要口号是“反攻复国”，并以此为各种工作的核心和动力。为此，他首先必须在经济上建设台湾。而要发展经济，又必须改革政治，改造他的腐败不堪的国民党。这是他在大陆失败中得到的渗痛教训。他虽在公开场合不好意思承认这个关键性的失败原因，但心中却对此十分清楚。

因此，他下决心改造中国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的改造，1949 年 7 月 18 日，由蒋介石于广州举行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提出，并获通过。蒋氏又于 9 月 20 日发表《为本党改造告全党同志书》，号召全党研讨改造方案，提出彻底肃清失败主义毒素；痛除派系倾轧；铲除官僚主义作风等问题。台北“革命实践研究院”于 10 月展开积极讨论。在 1950 年 7 月 22 日的国民党中常会上，蒋又发表《关于实施本党改造之说明》。通过了“党务改造案”。8 月 5 日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提出中国国民党改造纲要，称《本党改造纲要》。共 11 大项：

一、改造方针：

总则：中国国民党为民主政党并扩大其社会基础；对于其他反共抗俄的民主政党尊重并与他们合作，共同“为拯救国家维护民主政治而奋斗”。

国民党的构成：以广大民众为社会基础；以爱国的革命分子为构成。

国民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权制，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

国民党的组织整顿共 10 条。主要是“淘汰腐恶分子，加强革命阵容，实行彻底整肃”。其整肃对象为“叛国通敌”者、“跨党变节”者、“毁纪反党”者、“贪污读职”者、“生活腐化”者、“信仰动摇”者、“放弃职守”者。

国民党于 1952 年 10 月 10 日召开七全大会，至 20 日闭幕。

蒋介石在大会的开幕词中，总结了两年来国民党的改造运动，展望了未

来。其内容主要有 4 项：

检讨过去：反省过去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寻求“救国救民的努力方向”。

“认清敌我”：悉心研究中共和苏联的强弱优劣之处；“认清敌人、克制敌人”。

审察环境：审察国际反共形势的发展，认清自己在“反共阵营”中的地位和责任，从而改善国际环境和局势，“以消洱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浩劫”。

“策励未来”：制定“反攻大陆方案”和完成国民革命第三期任务的正确目标。

为此他说：“中兴不仅是从败亡中从头做起，而且还要从腐烂中刷新重生，从废墟中奠基再造。尤其要从自信的丧失之中，来重新建立自信。更是要从被击败的敌人手中，回转头来击败敌人。所以中兴实比任何创业更加艰巨，更加困难。”[①]

蒋在政治报告中，又谈了 6 个问题：

从三民主义思想、国际外交、政治、经济、教育、军事各个方面，对过去的失败作综合检讨。

国民党应负战争失败的责任，关键在于党员同志对三民主义信仰未固，未能实行三民主义。同时强调建立党内民主制度。

就国际局势和“韩战的发展”，探讨其对中共，对世界，“对救国复国的影响”。

今后努力方向，为澄清党内的思想，确认三民主义中绝对无共产主义成分在内（这和他 1925 年的论点完全相反）。并解释说，三民主义以人性的发扬为首要。

“革命建国”的艰险前途，勉励自力更生。

蒋在这个报告中，又一次重点检讨了大陆失败原因的 8 个方面：

（一）三民主义信仰不纯。蒋认为大陆失败的第一个原因，是国民党的大多数党员对三民主义认识不正确，因而就谈不到什么信仰问题。以至于很多人认为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样，就产生了信仰的混乱，认为反对共产主义不合孙中山的联俄容共和三民主义即共产主义的思想，于是瓦解了斗志，“一到他马克思共产主义的面前便迷惘了下来，拿他共产主义来解释三民主义，……

还有一些党员藉总理所讲‘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一句话，曲解了三民主义。”[①]最后，“致令本党思想失去主动，共产主义乘机渗透，党中同志对于三民主义没有信仰，对于国民革命没有认识，到了这个地步，那就无怪乎要失败了。……”[②]

（二）“国际外交上的失败”：“帝俄东侵”，造成日俄战争，从此东北问题已成国际问题。苏促使美国共产党和其同路人在美国舆论界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从美国政治上击败中国国民党，然后取得中国战场的胜利。雅尔塔密约以牺牲中国权利换取斯大林对日宣战。因而失去外蒙，加大了苏联对华的影响力；由于斯大林解散第三国际，放弃世界革命，使美国发生对苏联和中共的错觉：苏联可以和欧美各民主国家和平共存；中共不是共产党，

[①] 蒋介石：《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幕词》。

[①]

[②] 《思想言论总集》，第二十五卷，第 114～115 页。

乃是土地改革者；苏联不参战，日本“关东军”仍将继续顽抗等，帮助了苏联和中共，尤其有助于中共的发展和壮大。但蒋认为信任美国没错，只是由于“信任友人，而缺乏自力更生的决心，那就是我们铸成今日悲剧的一大错误”。

他还认为：无条件投降，迫使德国顽抗到底，导致东欧分裂，对苏联有利；日本由于他蒋氏努力，得保天皇帝制，免其分裂，对“自由世界”有利。

（三）“政治上的失败”：政党政治的失败，主要是1948年副总统的自由竞选，导致只争派系，不分敌我，“而招致整个的崩溃”。但又说：“这不能归咎于民主宪政”。“共产主义是在民主政治的弱点上生存和发展的”。由于实行民主，国际间谍可以渗透和操纵，这是弱点。既“尊重民主宪政体制”，又要“增强组织力量”。

（四）“经济上的失败”：抗战时期经济的破坏，1947年宋子文行政院长擅自动用中央银行币制改革基金，“打破了政府改革币制的基本政策……游资走向投机垄断，正当的企业不能生存，中产阶级流于没落，社会心理日趋浮动，……经济崩溃的狂澜，就无法挽救。这是大陆经济总崩溃的最重要的环节，亦是今后经济事业最重要的教训，不可不特别警惕。……而政治军事与社会，也就在这经济崩溃的危疑惶骇之中，为之瓦解了。”[①]

（五）“教育上的失败”：都市中的电影、广播、书刊，“不是国际主义的文字，便是赤色组织的宣传”。大专院校“充斥了共产主义的国际思想，否则就是自由主义的个人思想，而对于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几乎消失殆尽；对于三民主义和民生哲学，不但讽刺、讥笑，而且破坏反对，惟恐不至”。个人自由主义者要求学术自由，要国民党退出学校，结果中共“城工”部便以学校为大本营，“演出扰乱社会，破坏社会秩序的暴行”。“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演成了仇视民族文化的口实，‘民主’的口号更做了帝俄奸匪窃取我抗战成果，消灭我民族精神的手法。”

（六）“军事上的失败”：对此，蒋的检讨如以上一样，完全是不着边际和自欺欺人。他竟把军事失败完全归结于“三人小组”的调处，阻挠了他的进攻计划。最后他总结为“我们军事失败，可以说仍然是失败在外交上的”。

（七）“从战争本质上作综合的检讨”：中共是打的“总体战”。

即从“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和军事的一切手段，达成他们的目的。所以他们的武装叛乱，在本质上乃是一种总体战”。至于土改和民主口号，他认为是“军事动员的手段”和“瓦解反共阵线的武器”。[①]

国民党军队作战的失败：对此他认为，他未实行总体战，失败是必然的。但他今后要采取的总体战，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以民族精神融合阶级意识，以国家利益结合个别利益”的“民族革命运动”。

“唯物主义的流毒”：蒋氏对唯物主义下的定义是功利主义，是斯拉夫主义的伪装。“他攻人我们中国文化的根源……把中国历史上为国家存亡民族生死而‘成仁取义’的精神和气魄，扫地无余。”

从而发动阶级斗争。有的国民党人也出卖机密和投共。因此，总体战必以“民族文化为基础”。

（八）国民党本身的失败：“三民主义信仰的动摇”。这一条，他认为

[①] 《思想言论总集》，第二十五卷，第126页。

[①] 《思想言论总集》，第二十五卷，第129～132页。

是最主要的失败原因。中共“曲解”三民主义，提出“革命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等名词，以致有些国民党人也相信，说“中共不是共产党”。蒋在讲到他“本人下野的考虑和决定”时说，他当时不想下野，他下野后，美援更不会来，和谈更无希望，又说当时国内舆论主潮，是趋向中共一方的，“只要共党有一句话，便辗转传说，奉为真理，……对我个人，不仅不认为领袖，不认为同志，甚至更视为囚犯，肆意侮辱。我……不得不顺从其意，决心下野”。

在这个报告中，他对外蒙独立，特别表示了个人的责任，甚至认为这是他的罪行，并且表示以后国家自强以后，外蒙仍会回来的。

除以上检讨之外，蒋于此政治报告中，又提出五大方针、五种办法和三大要目改革方案：

五大方针：“（一）稳定经济。（二）整饬军纪。（三）安定社会。（四）团结内部。（五）建立民主制度。”

五种办法：“（一）保持币信充实。（二）贯彻命令，剔除腐败。（三）保密防奸，肃清匪谍。（四）打破派系，集中意志。

（五）养成守法精神，实行地方自治。”

对此，他说：“这就是我们在台湾救亡图存的基本工作。”

三大要目：“第一是建立制度。……使人人的工作顺着一定的正规轨道”。“第二是注重组织。……就是使每一个人都纳入组织，使其各尽所能，各本所长，各负其应有的责任”。“第三是改造风气。……就是法除失败主义、投降主义和依赖主义的心理，打破无法律、无国家、无政府的状态”。[①]

在这个会议上，还通过了蒋的著作《反共抗俄基本论》。该书是共分 8 章的小册子，1952 年 10 月 16 日发表。

第一章是前言，指出反共抗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二章，先批评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社会病理学”；“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张阶级斗争的社会病理学与俄国的残忍、狡诈、阴谋、暴行的综合产生的变态心理学的结晶。”

然后说中共即是“俄国大斯拉夫主义征服中国的工具”和“中国历史上的流寇”。

他把自孙中山以来的革命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民元前 20 年至 1911 年为政治革命时期；第二期 1911 年至 1945 年抗战胜利，为民族革命时期；第三期自抗战胜利开始。

第三期的特点，“为人民生活的社会斗争”时期，任何国民均不能自居其外。因而他认为这种斗争或“反共抗俄”的特点是军事、政治、社会、文化与人民生活各方面综合的战争，并要在社会斗争与社会改造之中，消灭中共。

同时，他又分析了中共的优点与弱点。他认为中共的优点是军事力量大于他蒋氏的台湾，主要表现在军队数量和总体战上。并且在组织、宣传、情报、谋略诸方面，均有突出优越性。

中共的弱点，他认为主要是：（一）政治上有派系之争，而且日益“安富尊荣”，逃不出“否定之否定”规律。（二）经济在发展生产上有困难。（三）军事上，无经济强大后盾，士兵又是“被迫入伍”，均“怀恨在心”，

[①] 《思想言论总集》，第二十五卷，第 137—138 页。

只要中共“败征一露，就会倒戈相向”。（四）苏联为控制中共，就不会叫中共有休养生息时间，“只有使他们力竭精疲，才能使他们始终俯首贴耳仰赖苏俄，听他牵着鼻子走”。

然后又分析台湾的“反共抗俄”有利条件。都是老一套，惟一与过去不同处，是他现在特别强调民族独立性和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本国的问题，“决不把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寄托在国际变化之上”。

第四章，是“国民革命的本质与方略”。他认为鸦片战争后中国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是“次殖民地社会”。至于封建制度，他认为两千年前已经破坏了。

关于“次殖民地”的特点，他认为是由于异族入侵，使中华民族“丧失了自信心”；生产力极其落后；“人民没有基本权利，丧失了一切自由”。这一条与前面说的中国人民过惯了自由生活，自由太多了，大相矛盾。

针对以上中国社会性质，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阶级斗争”与“阶级革命”，而是“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含有这三种共同性质的国民革命”。而“三民主义乃是这三种革命的指导原则。”[①]对三民主义，他认为是“必须确立民族主义为基础，藉民权主义的力量，达到民生主义的目的”。所以他认为：“国民革命，最初动因，和最后目的，都是在于民生”。[②]

因此，他认为国民党既是争取民族独立，“中国国民党也就不是单一阶级的党。他认为农民也不是一个阶级。至于中国国民党的社会基础，他认为是“以青年、知识分子及农、工、生产者等广大劳动民众为社会基础的，”[③]

关于国民革命的方略，他根据孙中山的学说和建国大纲总结为：（一）由破坏到建设，即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二）“两个战略的斗争”。他说他反对中共的阶级斗争战略，而主张破坏只在军事、政治范围内，对经济、社会问题，“则在革命建设阶段中来求整个的解决。”

第五章，是讲三民主义的哲学，即对三民主义的“新认识”。

他主要以人性论和宇宙、物质运行论，以及心物合一论来解释人生。社会和自然、精神诸多本质及其关系。他认为宇宙、物质都是一个运行活动，都是行，物质分析到最后，已成为“力的发放中心”，成为“非物质了”[④]。因此“宇宙的本体，总是心物合一的”。[⑤]这是王阳明的主观唯心论。

关于人性，他根据孙中山的人类互助学说，反对将达尔文的“物竞天择”学说施之于人类进化。他认为人性就是人既“受自然法则支配，又能利用自然法则改造自然，改变自然环境”。既反对唯物论，也反对唯心论。

然后他以人本位来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反对以阶级为本位来观察和解决问题。他说：“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全在于由知识而进于智慧，能互助而达到共存，尤其在于不断力行创造，求得永恒的进步”。而“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与历史的动力”。

这是以意志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又是唯意志论。

---

①

② 蒋介石：《反共抗俄基本论》，第 44～46 页。

③

④

⑤

第六章，是到台以后实行三民主义的提纲。民族主义方面，对“国内”民族平等：对“国外”寻求集体安全。民权主义的任务是实行“主权在民”的全民政治和地方自治；并以法治保障民权。因之其国民党，也要成为“革命民主政党”。对于个人，要尊重人格，使其在经济上有基本生活条件。总的目标是“人民有权，政府有能”，但反对“民权限制政府权力”。把“限制”改为“妨碍”就妥当了。如果不许民权限制治权，则民权无法真正实现。

民生主义：计划中之平衡发展；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与工业化。

第七章，是说他“反共抗俄”必胜，老调重谈。

第八章，规定反共抗俄的总目标是建立“大同世界”。

总地说，他的三民主义和反共思想，在《反共抗俄基本论》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大陆时期，他主要提倡礼义廉耻即三民主义的新生活运动，并在民生哲学或力行哲学上，用主观唯心论（自称心物一元论）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共的共产主义和新民主主义思想，的确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对手。到台湾后，蒋发表了这本小册子，在理论上全面地阐述了三民主义的原则和对三民主义的新认识，以及“反共抗俄”的思想。

他对三民主义的新认识和反共抗俄理论的主要内容是：首先改释中国国民党为“革命民主政党”，不再标榜“三民主义即礼义廉耻”，这是一大变化。

其次是国民党的吸收对象包括了工、农等劳动人员，扩大了社会基础。

再者，是对国民革命性质和方略的进一步说明：性质是民族、政治和经济革命；方略是在军、训、宪三政时期之外，加上了经济和社会问题在建设中解决，而不在破坏中解决。

此外：就中国社会性质和马列理论方面进一步“研究和批驳”，说明国民革命元阶级斗争之事；同时进一步阐述民生史观，指出民生是精神和物质的统一；并以人类求生存为社会历史之动力，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社会历史的动力。

他还认为，反共抗俄，必须进行军事、政治、文化思想、经济、社会诸方面的总体战，才能成功。

蒋到台湾后，其反共思想有了深入一步的发展，由以武装反共，转向以理论、思想方面为指导的总体反共为主，军事则居其次。

修改中国国民党党章

国民党党章于 1924 年 1 月 28 日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在广州）。先后曾作 4 次修改。七全大会进行第 5 次修改，该党章为 12 章 80 条，这次将“总章”二字改为“党章”，所增加的新内容有 10 点：

主要是：明确规定“中国国民党为革命民主政党”；以青年、知识分子及农、工等广大劳动民众为社会基础；党的领导原则是以政策领导政治，以工作考核党员；党政关系是以主义定政策，以政策定人事，以组织管理党员，党的决策要责成干部党员贯彻实行；党员应为民众服务；每年举行党籍总检查一次，以考核党员，加强党的组织性；小组为党的基本组织；各级委员会执行纪律；中央设评议委员；区、乡、镇设区党部。

国民党“七大”规定的政治任务是：反攻大陆，重建“中华民国”；厉行民主廉洁政治；保障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外交，促进太平洋地区反共友邦团结，与非共产国家合作贸易。军事上，厉行精兵政策；加强在大陆的军事游击；改善军人待遇和生活。经济上，自力更生，加速工业化，实施限田政策；稳定物价；改善合作事业；健全社会经济。

教育方面，以三民主义为中心，培养伦理、道德、民主精神；普及“国民教育”和实行军事训练；注重人格教育。

在社会上，辅导“国民就业”；举办社会保险；改善农民生活；保障劳工妇女权益；扶植“青年爱国组织”。

对华侨则确保侨胞权益；奖励侨民教育；扶植海外文化事业；鼓励侨胞回国服务和投资于生产事业。

10 月 18 日，大会通过《中国国民党反共抗俄时期工作纲领》，共三个部分：（一）巩固自己。（二）结合民众。（三）“摧毁敌人”。

中国国民党七全大会，使中国国民党开始走上了一个新的里程：加速建设台湾的时期。

《苏俄在中国》

1956 年 12 月 25 日，蒋介石发表他的最后一本专著《苏俄在中国》。蒋写此书的目的，是对苏联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论进行批驳，劝美国切勿上苏联的当。因而对苏联和中国的和平共处历史，进行了系统深入地分析，然后指出世界范围内的反苏反共策略：在美国领导下，对苏联和中共进行有准备的总体和重点主义的战争。

此书初稿，只有四五万字，后经蒋多次修改、不断补充，最后成书时，共 24 万余字。

本书共分 4 编，21 章。

第一编，关于“中俄和平共存的开始与发展及其结果”。

他首先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当时欧美民主革命的一股逆流”，“他的企图是破坏民主政治而建立专制制度”。[①]其次他说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也是“集权主义政权”。[②]同时谈到他 1923 年访苏的观感，在当时即认识了苏维埃“乃是专制与恐怖的组织”。

文中分析，当时被列强压迫下的中国，成为苏联传播共产主义种子的大好园地。于是形成孙中山与中共、苏联的“和平共存”关系。但为时不长。他追述了 1927 年至 1937 年间以后国共之间斗争的历史，他认为是斯大林在指导中共的行动。

1931 年“九·一八”后，蒋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1935 年 7～8 月间，在第三国际指挥下，中共提出统一战线和建立联合国防政府的问题。以后，又形成国共再次合作和互相间磨擦、谈判的历史。蒋表明拒绝联合政府的原因，是由于苏联灭亡东欧的公式欲运用于联合政府，以及 1924 年、1927 年的经验教训。

然后说中共于抗战末期，想夺取政权与破坏国家统一。“苏联破坏调停”，企图利用中共为其第五纵队，达到其独占中国的目的。

---

①

②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 15 页。

因此，与苏联、中共“和平共存”的结果，造成苏联独占中国的态势。

第二编，关于反共斗争的成败得失的检讨。

他认为抗战胜利后，人民的厌战情绪和反共意识的瓦解是“中国反共战争惨遭挫折的一个基本根源”。[③]

他分析了反共失败的组织和技术上的缺点以及政策和战略的错误。此与他 1952 年的检讨有些不同之处，主要是把对中共的和谈说成是战略错误，把与中共的和谈，归之于和平共处的错误。他对雅尔塔条约、中苏复交、东北未能交联合国解决“遂使我们遭受这军事上无可挽回的失败”。以至于他认为根本不应和中共合作抗战。他说：“而我政府对共党谈判和对共军收编，乃是政策和战略上的一个根本错误”。[①]

另外，在理论上不充实，宣传反共不主动，导致了“宣传的失败”。在杜会上，“反共即是法西斯”的思想占了主流，致使他必须受这种国际国内思想的牵制，不能自主行动。再者，其“反共意志不能集中，且手段不够彻底”，如对中共的外围组织和同路人就“过于轻忽”等等。

对经济崩溃问题，他推责于宋子文任行政院长时的政策失误和美国对华贷款（1946 年于抗战胜利后，因中共的反对）突然停止，致使国家金融紊乱，通货膨胀。

同时，对世界民主集团的反共策略问题也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民主集团不能直接对苏联为首的共产集团作战，应间接作战，并打破中立主义者的幻想，使军事战术与政治战术协调一致，使“铁幕外的民族运动与铁幕内的革命运动互相策应，……以确保永久和平”。[②]

第三编是讲苏共“和平共存”的第一目标及其最后构想。

他首先说明列宁于 1913 年即对中国革命表示关注。1920 年 8 月，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中，列宁又认为东方的民族革命可以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相结合，并且该观点成为第二国际的决议。

1923 年后，中国更成为苏联的“渗透对象”。

斯大林当政后，一改列宁的作法，使各国共产党的革命“支持苏俄的政权”，并说中共成为“斯大林个人权力之争的牺牲品”。

不但如此，斯大林还进一步企图以中共的武力“推翻国民政府”，采取“西守东进的政策”。以后斯大林的国防政策也有变化：

1928 年，斯大林于国际第六次大会上规定只有战争才是达到共产党世界革命和世界专政的道路。

1935 年国际七大时，斯大林又改变为“统一战线”政策，造成东欧、东亚的有利于苏联的局势。在东亚中共打败了国民党，使他蒋氏逃到台湾。

赫鲁晓夫当政后，提出了“和平共存”的政策，认为战争不是不可以避免的，企图破坏“反侵略阵线而实施其战略的攻击”，这是第一目标。

接着，蒋指出，苏共的战争思想来自马克思和列宁。而列宁的世界革命战争思想，则来自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基本原理。斯大林的战争思想则来自列宁。蒋还认为，苏共也吸收了法国的拿破仑和中国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

[③]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 181 页。

[①] 同上，第 200 页。

[②] 同上，第 187 页。

然后蒋对克劳塞维茨的军事学说进行解释；并特别指出列宁的“迂迴战略”，在地理上，从亚洲向欧洲，是“苏俄征服世界的路线”。

他分析苏共的总军事思想原则为 4 条：

（一）“绝对性即毁灭性的无限战争之最后决战”。

（二）“总体性的政治与军事综合作战之迂迴战略”。

（三）“阶级性‘革命民军’之全民武装战争”。

（四）“国际性的‘世界革命’之终极目标”。

蒋认为，依照这些原则，苏共和中共展开亚洲的“和平共存”五项原则的“政治攻势”。对中非则“以反殖民主义口号”展开中立运动，迫欧洲国家退出中非。对西欧则以各国共产党影响其政府转向中立化。

对美国，中共开始接触谈判（在第三国），同时由中共对中南美洲开展反美运动，迫使美国退出亚洲。蒋认为，这就是苏共和中共的迂迴战略。

蒋认为，苏联为达其控制全球的目的，主要设置了欧洲、中东、远东三个战场。在欧洲使西欧各国脱离美国。在中东，将西方势力驱逐出去。在远东，则要控制中国等亚洲国家。

在各战场上，蒋认为苏共有 4 种作战方式；（一）对自由国家，使其内战；（二）对自由地区制造国际战争；（三）以志愿军形式派红军进入一个自由国家作战；（四）直接派军出国作战。

根据以上分析，蒋认为远东反共战争胜利的唯一道路是：“以东亚局部战争代替世界全面战争，以普通传统战争代替核武器毁灭性的战争。”他认为这样便可以瓦解苏俄集团，成为“保障人类自由的唯一道路”。

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对策则是：（一）反共斗争的总目标是为“维护人类自由和解放被压迫民族与人民，重建世界和平与安全”。

（二）为达“此目的”，必须结合和协调三种力量：东方的民族独立运动、“西方民主集团的资本主义”、“共产铁幕中的反共革命运动”。（三）民主集团“要采取弹性的与多元的斗争方式”，包括军事、政治、社会各个方面。（四）“必须维持并加强军事实力”。[①]

月时他又特别为美国出谋划策：美国只可负起责任，决不可直接参加作战；可以作为世界反共战争的兵工厂，决不可作为主战场。因此，美国在全球反共战争中，他认为“应该采取间接作战的迂遇战略”和作战三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只要俄共对美国不首先奇袭，或不于其他地区参战，美国也不应随时随地参战。第二个原则是：反共战争必须选在铁幕之内或铁幕的边缘地区，不应在远离铁幕的地方。第三是对俄共必“采取重点主义”；即按预定地点，对“共产集团向任何国家的进攻作出反击”，而且不应限于“被侵略的当地”。在作战中，不应普遍设防或用到处参战方略，而应选择主战场，给“共产集团”“以致命打击”。

对于亚洲，他指出国际共产主义威胁世界的焦点在亚洲，而亚洲的共产主义威胁在中国大陆。[②]于是蒋强调对中国大陆的作战。他劝美国应综合东方各民族反共力量，支持他蒋氏的“反攻复国”战争，并且对此进行计划和指导。

他认为“民主集团”若实行这个“反共战争的基本原则”，就可以避免

[①]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 301 页。

[②]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 304 页。

第三次世界大战，而“重建世界和平”。

最后是补编。补编中，他主要对苏共在中国的各种政治斗争战术和运用辩证法的方式进行综述。总归起来，共有以下几点：

（一）退却、防御、攻击三步调。他指的是苏共和中共，以“和平共存”为掩护或手段，有时双方妥协退却，如 1935 年以来所提统一战线，就是以妥协要求“和平共存”。有时又立足于防御，如 1926 年“三·二〇”事件后，鲍罗廷接受《整理党务案》就是以“和平共存”为防御。有时又采取进攻策略，如抗战胜利后，中共要求和谈，就是“政治上积极的攻击”。

（二）“中立主义、统一战线与孤立战术”。他认为中立主义是使中立者由不反共转到反对他蒋氏政府的策略。关于统一战线，他认为是苏共和中共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吞并他的势力的作法。关于孤立战术，他认为对方是把孤立与反孤立同时并用的。他说苏共与中共均是孤立敌人，同时反对敌人孤立自己；又对自己采取关门或“闭关主义”，决不“让敌人渗透进来”。有时这三者同时并用以孤立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

（三）“攻心战术”：“时间攻心术”，长期进行；“空间攻心术”，在你的左右前后关系人中进行，最后说服你；环境攻心术，渗透自由国家，造成对政府的压力，或使用“恐怖和多方胁制”手段。最后一种攻心术，是制造一种社会政治气氛，促使其敌人不得不接受这种气氛下的政治要求。

（四）矛盾战术。给对方制造种种矛盾。

（五）发动群众运动。

（六）进行贸易战与基地战。“走私”、“投机”和利用国家主权观念反对敌人军事基地。

（七）伪装、奇袭和宣传战。

（八）和谈和停战协定。利用和谈延缓敌方攻击；扩张外围势力，争取同情，打击敌方士气。

（九）利用合法地位与议会政治。

（十）联合政府。他认为中共所主张的联合政府，是推翻其国民政府的三步法：第一步先参加政府；第二步发展反政府势力和组织；第三步则实行政变，推翻政府。

此书在深入、全面、系统的分析苏共和中共的政治、军事思想及其战略战术原则的基础上，提出“民主阵营”或“自由世界”“反共抗俄”的政治、军事对策和战略战术原则，最主要的原则，是在美国领导下，进行全世界范围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化等的总体而又采取重点主义的反共战争。这部专著，也是蒋的反苏反共理论之大成，为全世界，为美国政府的反共斗争，严密筹策，制定了一个系统的方案和战略战术原则。

突然的试探

中共中央于 1956 年春发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呼吁。并将此呼吁通过香港由章士铡传送到台湾。这时大陆正在倡导向科学进军，努力于国家的振兴大业。日本政府也日益和大陆扩大贸易额，这对蒋压力很大。蒋介石得此呼吁后考虑了一年时间，于 1957 年初，决定派人来北京一行。首先召见了香港主持国民党宣传工作的许孝炎，令其寻找人选。许选了三个人：童冠贤、陈克文、宋宜山。

童根本拒绝前往，陈、宋均表示愿意一行，最后选中了宋宜山。选宋的原因有三：（一）宋忠于蒋。（二）宋为立法委员，官方身份不重。（三）宋为宋希濂之胞兄，万一被人发现，可以当作探亲者（当时宋希濂在大陆狱中）。另外，宋为湖南人，中共统战部长李维汉亦为湖南人。还有湖南同乡唐生明也在北京。宋于 4 月经香港到达北京，住北京饭店。当天即见到唐生明。第三天，于东兴楼饭庄和周恩来总理见面。具体问题，则由李维汉出面商谈。中共提出台湾自治，中共不派人去，仍由蒋氏管辖台湾，国民党则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对全国的领导。但海峡外国兵力，则必须完全撤走。宋将此案自香港转达蒋氏后，因其报告书中赞扬了中共成绩，被取消回台资格。从此永住香港，安度晚年。[①]后因大陆反右斗争发生，蒋迄未答复。

这说明蒋介石在当时曾经考虑过和大陆的关系问题，甚至同意派人来大陆试探海峡两岸的统一问题。

以后蒋未对和谈方案答复的原因，因无资料而不明。可能与大陆反右斗争有关。

反右之后，接着就是反右倾，大炼钢铁、人民公社，更使蒋在反共方面振振有词；而三年灾害又接蹿而至，蒋则磨刀霍霍，准备“反攻大陆“了，后因肯尼迪坚决反对而未能付诸行动。

[①] 《百姓》半月刊（香港）1987 年 12 月 1 日：《国共三十年前就有试探性接触》。

第八章　建设台湾

中国国民党的继续改造

蒋介石改造国民党以来，历次大会都有一些新的改革内容，其中心目的，是服务于经济建设，把国民党改造得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1957 年 10 月 10 日，蒋于台北阳明山召开国民党第八次代表大会。1963 年 11 月 12 日召开“九大”，1969 年 3 月 29 日召开“十大”。

国民党“八大”，针对大陆反右斗争，提出“反攻大陆”任务。

同时强调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力求建设中的实效，并以此为方针修改了党章。

“九大”，针对大陆经济困难，提出加快“反攻大陆”步伐。并再次修改党章，规定了反攻大陆和治理大陆的政纲，主要内容就是把台湾的方案施行于大陆。

“十大”，针对大陆“文革”的动乱，认为“反攻大陆”机会终于到来，便具体开始“反攻大陆”的各方面准备工作。为此，决定广揽人士“参加党的决策”。与此相应的是进一步提出了全面改革的新任务。进一步强调党的“时代化”，即蒋理解的党的“民主化”，把国民党建成“革命民主的政党”，并说“革命乃为民主而革命”，“革命而不民主，乃是违反了人性与时代，丧失了革命的目的。”[①]同时他又强调，他的民主，不是西方的“人个中心”的民主，而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民主，亦即蒋氏专制下的民主。

吴、孙、雷三案件

1953 年 1 月艾森豪威尔上台后，立即解除了美国于海峡两岸的中立禁令，全力支持蒋介石。蒋又开始加强个人独裁，在此情况下，台省主席吴国帧决心辞职。

吴国桢，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留学美国，颇有民主思想。性急，做事讲求实效，外人送名曰：“K.C.WU”，中文绰号“开水壶”的外文谐音。

1953 年 5 月 24 日，吴离台赴美。其父吴经明，幼子吴修潢均不准离台，作为人质。

本年 11 月，王世杰秘书长免职案发生[②]。其中牵扯到吴国桢，美国报界也一再刊登此种消息。吴国桢不得不于 1954 年 1 月 15 日写成启事寄往台湾。20 日左右，台岛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张其昀收到这份启事后，不向报界发表，反而将启事交与吴父，吴父跑遍各报，均拒绝发表。以后启事转到蒋介石手里，研究研究又耽搁几天，于 2 月 7 日才见报纸。吴国桢见台湾不予刊登，忍无可忍，于同一天，在美国公开发表政见三条：（一）除非台湾在现行政治区内实行民主，才能得到台湾人民和海外侨胞的全力支持，否则，难以争取到自由国家和美国的支持与同情。（二）目前台湾的“政府”过于专权，实行一党统治。（三）台湾的政治部，像苏联的克格勃。

就在吴公开发表政见的当天，美国各报便纷纷刊载，台湾报纸则只字不

[①] 《思想言论总集》第 29 卷，第 337 页。

[②] 蒋于 11 月 17 日免王世杰职。

提。至 2 月 26 日，由吴的南开同学张道藩首先对吴发难。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列出吴的 13 条罪状。并指责吴氏“危害国家”，行同“反动”。各报予以全文发表。《自由中国》则发表了一篇批评张道藩的文章。该文特别指出张的文章是违反了基本民主政治原则的：

“我们细读这篇文字，又不得不为张院长惋惜。为什么呢？我想，凡是懂得‘民主不仅是指政治体制，同时也包括生活方式，更重要的还包括心理状态’的人，读到张院长这篇质询词，一定感觉到一股非民主的气氛，洋溢在字里行间。尤其是被张院长使用的‘危害国家’、‘反动’等字眼，实在有点刺目。就我们所习知的，在民主国家中，对政府的批评、指责，乃至于攻击，不仅是常有的事，而且是必有的事。但民主的政府从未以‘反动’的帽子，加在批评者、指责者或攻击者的头上。至于人民代表机关的主席，更不会骂他们为‘反动’，而且政府并不等于国家。批评政府的言论，——也止于言论，更说不上是‘危害国家’。……民主的政治技术，压根儿没有这一套。”

按照民主政治，吴国桢是政见问题，是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这在欧美当然是正常的政治生活，但在“中华民国”的台湾，却构成了“犯罪”，而且为世俗舆论所不容，也是自然之理。蒋介石最后于 1954 年 3 月 17 日给吴作了如下的结论：

“据行政院呈：‘本院政务委员吴国侦于去年五月借病请假赴美，托故不归。自本年 2 月竟以连续散播荒诞谣诼，多方诋毁政府，企图淆乱国际视听，破坏反共复国大计，拟请予以撤职处分。

另据各方报告，该员前在台湾省主席任内，多有违法与读职之处，自应一并依法查明究办，请监核，明令示遵’等情。查该吴国桢，历任政府高级官吏，负重要职责者达二十余年，乃出国甫及数日，即背叛国家诬蔑政府，妄图分化国军，离间人民与政府及侨胞与祖国之关系。居心叵测，罪迹显著，应即将所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一职予以撤免，以振纲纪。至所报该吴国帧前在台湾省主席任内违法与读职情事，并应依法彻查究办。此令。”[①]

可见，吴的主要罪状是“危害国家”，就是说蒋的政府是不许批评的，更不许攻击。足见蒋的政治原则，与其在大陆当权时，并元本质不同，仍是个人独裁制。吴的儿子在台湾也因父亲的遭遇而受到社会和学校同学的冷嘲热讽和咒骂，为社会所不容。

随后，吴又写《上总统书》。其中点名批评蒋经国“是台湾政治进步之一大障碍”，主张送人美国“大学或研究院读书……在大陆未恢复以前，不必重返台湾”。又批评蒋介石：

“自私之心较爱国之心为重，且又固步自封，不予任何人以批评建议之机会。”这是只有胡汉民、孙科、李宗仁才敢于批评的话，而吴氏则是第四位敢批评蒋氏的民主人士。

对这件事，胡适也反对蒋介石的作法。他在返美前夕说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吴的批评政府，对台湾当局是有好处的。他说：

“前台湾省主席吴国侦批评政府，或许对于国家还有点好处，假使吴所讲的话有一部分是真实不假，那末我们就不应该因系出自吴国桢之口，便拒绝加以考虑。……假使那封信讨论到几项根本问题，其所发生的结果，竟能

[①] 江南：《蒋经国传》（中文本），第 284 页。

使实行改革为必须，那岂不是说对于国家反倒有了益处吗？”[②]

此事件之后，台湾的“立法院”通过对吴国桢的“引渡法”，当然未能“引渡”成功。接着，蒋经国辞总政职务，转任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成为秘密警察的实际指挥者。

1955 年 1 月至 2 月，一江山和大陈岛相继被中共解放，再也无人相信反攻大陆的神话了。蒋接着就对内部进一步清洗，继续为蒋经国开道。这时只有孙立人桀骜不逊，又有才华、能力和资历，足以与蒋经国抗衡。于是蒋寻找缝隙和机会挤掉孙立人。不久就发生了孙立人“兵变事件”。

孙立人，安徽省舒城县人，1901 年生。清华毕业后，保送美国普度大学工程系，毕业后，又转入弗吉尼亚军校，和乔治·马歇尔元帅为先后期同学。毕业归国后，历任军训队长、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副总队长、特种税警团团长。曾参加 1937 年“八·一三”上海抗战，身负重伤。伤愈后重任团长。1940 年 11 月升任新三十八师师长，1942 年参加缅甸远征抗日战役。仁安恙之役解英军之围，由英国政府授皇家勋章。

1944 年升任新一军军长。1946 年于东北作战中因和杜聿明不和被解职，调任陆军副总司令。1949 年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台湾防卫司令。1950 年升任陆军总司令兼保卫总司令。

1951 年晋升陆军二级上将。

孙立人为人傲慢清高，看不起同行的腐败，因而人际关系很不好。他和“总长”周至柔、“海总”桂永清、“空总”王叔铭均合不来，在三军队形成 2∶1 的孤立态势。有时蒋介石也在召开会议时深感为难。结果总是海、空获胜，陆军失败，一切待遇也劣于海、空军很多。

孙也与蒋经国不和。他于 1950 年 12 月成立“良心会”，提倡讲良心，反对骗人，自成“小组织”，也反对军队“政工制度”。蒋介石当然不允许。蒋经国便成立“庆生会”来对抗。美国顾问团团长蔡斯支持孙立人，反对军中“政工制”。这更使蒋介石不能容忍，认为孙立人在假美国人以自重，专和蒋氏父子对抗。

1954 年 6 月，蒋即改调孙立人为“总统府参军长”，打入冷宫。

1955 年 8 月 20 日，蒋下令成立孙案调查委员会。最后的治罪理由，则为于“军中成立小组织”。结果交国防部“管教”，实行终身软禁。直到蒋经国死后，1988 年 3 月 20 日才获开释。孙这时已 90 余岁了。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觉又将进行总统换届选举。总统 6 年一选，这使蒋介石不得不考虑对策。现在蒋虽己 70 余岁了（1960 年），仍精力甚佳，自不干寂寞，陈诚未死，也必得为儿子再开道扫路。

为了连选连任，必得制造宪法根据，于是蒋又策划“国民大会”、中常会对宪法进行补充，加上“非常时期，总统可以连选连任”字样。[①]至 1960 年 3 月，蒋又当选为总统，这是他第三次连任。

雷震发行的《自由中国》，曾因批评时政受到过传讯，此次更书生气十足，竟对蒋介石连选连任违宪一事，大加反对，并邀集学者讨论和发表文章。如曹德宣写了《拥护蒋总统继续领导而不赞同连任》；傅正写了《护宪乎？

[②] 见香港《南北极》之《吴国桢、蒋经国、蒋介石》文。转引自江南：《蒋经国 传》（中文本），第 286 页。

[①] 1960 年 2 月 17 日，由中常会通过《修正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以巩固国家领 导中心案》。

毁宪乎？》；杨金虎写了《岂容御用大法官滥用解释权》；雷震本人写了《敬向国大代表同仁说几句话》；左舜生写了《我们对毁宪策动者的警告》。一时间，好像台湾上空刮起了民主政风，可以言论自由了。其实蒋介石是看在眼中，恨在心底，岂容民主之风刺激他的独裁之心。只是碍于政声，一时不便发作。

1959 年 2 月 2 日，台北法院曾向雷发出传票。要他到地方法院应讯。当然，法院不能以言论自由为理由传讯他，就说有人（陈怀琪）指控他身犯三罪：一为“伪造文书”；一为“诽谤名誉”；一为“触犯惩治叛乱条例第七条”。雷回来后，胡适特别在中央研究院为他举酒压惊。3 月 25 日。法院又第二次传讯雷震。

陈怀琪是一个下级军人，住在外地，他于 1959 年《自由中国》第二十卷第二期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军人也赞成反对党》，一篇是《革命军人为何要以狗自居？》。“雷的编辑部不加考虑，就给发表。结果陈怀琪本人否认他写了这样的文章，并写长函辩驳，要求全函照刊。《自由中国》只给刊出更正说明，未发全函。

陈即到地方法院控告，说雷犯了以上三罪。

第二次传讯后，台湾开明派的成舍我、胡秋原等，均不以当局如此作法为然。胡适更撰写《容忍与自由》一文，对蒋氏父子进行了劝说。蒋见此，暂时鸣金收兵，以为对雷的警告已起作用。

但雷仍不“觉悟”，于蒋当选后，仍然发表文章责问蒋介石“如何向历史交代”？

蒋介石终于又下了决心，于 1960 年 9 月 4 日上午 9 时，将雷震和主编傅正、会计刘子英逮捕人狱。罪状又变了内容，先让同狱犯洪国式诬陷雷为“匪谍”，但供不肯干，并同情雷，还提醒雷说话要当心。继而威胁利诱刘子英，叫刘自认为“匪谍”。刘六易其自白书，始完成任务。当局于 10 月 8 日便以《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第九条，明知为“匪谍”而不告密检举“罪”和“煽动叛乱罪”判雷徒刑 10 年，剥夺公权 7 年：判刘 12 年，剥夺公权 8 年；傅正以“攻讦政府”教育 3 年。

关于“煽动叛乱罪”是在以上“包庇匪谍”基础上，再罗列《自由中国》的有关文章构成。主要有：

（一）“马上要反攻大陆……颇为渺茫。一个国家的一切做法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渺茫的假想之上，这是太不稳健了。……”

（二）“假若美国今后改换一个方式，把这种经济援助重心，不专放在各国的政府上面，而放在各国的人民，或严格规定凡接受美援者，必须遵守国内言论自由，保障人权，一切案件公开审判，经济政策符合平民大众利益，及司法独立等为前提条件，那我们相信东南亚各国没有一国的人民反对这种干涉。”

（三）“军人生活困难，内心苦闷，实已相当严重。”

（四）“我们兹举几项最需要办的事如下：取消一党专政；取消党化军队；’取消浪费青年生命和制造个人势力的青年反共救国团；取消党化教育。”

（五）“司法成了政治乃至政党的工具”；司法者、警察、税吏是台湾的“三害”，“可是在若干台湾人的心目中，统治台湾的是大陆人”。“在中央各院部会中竟没有一个台湾人，这是否能够使台湾人相信我们自己已经恢复了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呢？”

（六）“自古及今，统治者太专横，太霸道，太自私，以至叫人忍无可忍的时候，大家就要冒着生命危险来反抗的。”“国民党如果执迷不悟，自私自利，那么只有等待再革命吧！再流血吧！”

引用这些文字，是想证明雷震一再煽动人民，掀起流血革命，企图颠覆政府。

蒋介石曾于 1956 年 70 大寿时，便有意地号召“国人”各抒己见，以“集纳众议”，并婉谢祝寿。他说：“婉谢祝寿，以六事咨询于国人，均盼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陈所见，俾政府洞察舆情，集纳众议。”

《自由中国》响应了这个号召，在歌颂蒋氏的开明之后，不免说出几句真言。胡适撰写的《述艾森豪威尔总统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奉劝蒋氏做一个无为而能乘众势的元首。其中有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语句，使蒋介石大为震怒。指示其长子经国出面，下达了盖着极机密印记的特种指示，对《自由中国》列出 9 条罪状和对策：

（一）《自由中国》图谋不轨，颠倒是非，有政治野心。（二）明确它是思想上的敌人。（三）《自由中国》的言论与吴国帧的“滥调”如出一辙，是中共的“统战阴谋”，（四）对于思想上的敌人，以大陆失败为教训，势不两立。（五）党内和军内刊物，针锋相对，进行批驳。（六）以口头、耳语、读者投书方式，进行心理上的反击。（七）暂时不点刊物名字，只攻击“毒素思想”。

依此宗旨，1957 年 1 月，蒋氏以《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 61 页的小册子在军中发行，对《自由中国》言论进行批驳和攻击。这小册子的主要内容是绝对服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领导，不许反对，否则就是共产党。

“国民革命是由中国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亦是中国国民党一手建立的。有中国国民党就有中华民国，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中华民国。现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没有中国国民党领导支持，大家能想像吗？所以国与党，党与国两者是不可分的。”

蒋认为：中华民国既是由国民党建立的，就必由国民党来领导，国民党和国家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因而国家必由国民党一手包办。但是其宪法却是仿效欧美民主国家宪法而定的，其中有“全国海陆空军须超出个人、地域及党派关系以外”的规定，对此，小册子进行了三民主义与国民党不可分割的关系的辩解：

“宪法如此规定是不错的。但他忘记了宪法的另一重要规定，即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宪法第一条是开宗明义，为全宪法纲领，亦就是中华民国的立国精神。中国国民党是信仰三民主义的，现在军中设立党部，以三民主义来教育全国陆海空军官兵与宪法规定中华民国立国精神是符合的。”

至于西方国家军中无党部，是自有其传统，而中国国民党的军队中，则是有 70%以上的官兵是国民党党员，怎么能取消军中的国民党党部呢？如果不设党部，军队就会瓦解。

对于胡适的祝寿文章，小册子更进行了严厉地斥责：批评领袖就是反革命。文云：“某刊物批评总裁个人，阴狠毒辣！因为国民革命历史证明，领袖与群众为决定革命事业成败的基本条件。广大革命群众如果一心一德，坚决服从大智、大仁、大勇的革命领袖的领导，则革命事业必获进展与成功；反之必然遭遇到重大挫折与失败。阴狠毒辣的反革命集团，对此深深了解，

所以他们破坏革命事业的一贯策略，就是攻击革命领袖，分化群众对领袖的信仰。”

对蒋氏的这种违反民主政治的专断，美国人是最看不惯的，圣路易城的《邮讯报》发表了专门评论，其中关于《自由中国》和“叛乱”的关系问题有如下明白的态度：

“叛乱的定义是‘意图叛乱，却因公开的行动而无法达之行为’。显然的，在中华民国反对蒋总统就是叛乱。雷先生的《自由中国》杂志，据说曾刊载过那些讨厌的看法。例如，蒋总统的政府太弱，无法光复大陆；党化蒋总统的军队；美国应该监督其对台湾美援的处置，以保障人权。这些意见听起来都不像叛乱。美国政治人物在总统竞选中要说比这些更坏得多的事物”。

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傅尔布莱德亦为之气愤，他说：“也许他（雷震）是一个恶棍，但看样子，却像是清算反对党。”

《纽约时报》也发表文章，指出雷震的“真正罪名，非常简单，他打算领导一个对抗国民党的真正反对党”。并说，“自由中国在哪里呢？它自然不在大陆，但也没有在台湾。”

由于国际舆论和美国的压力，蒋只好对国际人士谎说：“已有匪谍在幕后活动”。香港新闻界，更是对蒋介石的如此镇压手段，大力抨击和挖苦。《星岛日报》载文指责蒋氏的作法一如满清末期之倒行逆施。该文说：“天祸中国，六十年风水‘返转头’。庚子年来了，又像六十年前一样，……当年是清朝的末代，措施每多倒逆，戊戌政变，捕杀六君子等，都是末代王朝的衰象。现在正要号召‘中兴’。岂可重蹈六十年前的复辙？但是不祥的事接二连三地来，拘捕政治活动者；拘捕出版人；大兴文字狱。可怖之事孰过于此？……”。《工商日报》转载《德臣西报》社论云：“蒋氏统治台湾一天，……不幸的雷震，将会像……张学良一样，不能希望可以获得宽大待遇，……国民党如容许这些措置，应该抹去自己的愚拙饰词，不要把所据的中国小块土地冠以‘自由’两字了。”

蒋氏对于国际舆论和联合国人权保障委员会关于减免雷震刑期的请求，不予理睬，坚持将雷震执行 10 年，一天不少。

此外，《时与潮》也因涉及“政治问题”而停刊一年，殷海光亦受迫害；柏杨等亦判刑下狱。一时间，台湾岛上一片安静，只 有“蒋总统万岁”的声浪起伏了。

严家淦和蒋经国

蒋介石于 1960 年连任第三届“总统”后，蒋经国晋升为二级上将，具体任职是“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国家退除役官兵辅导会主委”、中央常委等。

这时，大陆经济正处于非常困难时期，同时又与苏联关系恶化。

1962 年后，中苏关系公开决裂。这使蒋极其振奋。

1962 年 5 月，他下令征收“国防临时特别捐”；同时在政工干校开设临时战地战务班，为“收复”大陆准备干部。国民党的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光复大陆指导纲领”，积极准备“反攻大陆”。蒋还不断接见外国记者，申明反攻计划，他说：“我可独立反攻，苏俄不会干预。……国军一旦开始反攻，三五年内底定全国。”但是在广东沿海有 172 人先后于惠阳等地登陆被获。

美国年轻的总统肯尼迪立即于同年 8 月对蒋提出警告，他指出“国军如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那等于自杀”，并指出蒋氏如反攻大陆是违反《中美协防条约》的。美国反对蒋反攻大陆，蒋就无法反攻，因汽油、弹药、零件的补给，台湾仅有两三个月的储存，只要美国不补给军火汽油，蒋便无法打仗。于是蒋又停止征收“特别捐”，反攻大陆的戏，便悄然收场了。

蒋氏为与美国进一步修好，于 1963 年又派其长子经国访美。

经国以政务委员身份于 9 月访美，公开声明的是会谈“中美双方”共同关切的问题。

蒋经国于 10 年以前曾经访美，但 1957 年蒋经国为对美国报复，导演了“五·二四”反美事件，和美国关系一直不融洽，这次访美，也有为接班而求美方谅解之意。美国方面，也有了解台湾未来当家人的必要。对小蒋访美活动一直未事声张，采取低姿态，既无公报，也无共同声明，但这次访问缓解了小蒋和美国的关系。

继之，蒋介石便开始为其长子接班而重新组织政府班底。他先于 11 月召开国民党九届全会，为改组内阁作准备，然后提名严家淦财长为行政院长。陈诚本来病魔缠身，便于九届一中全会后提出辞去院长职，由严继任。

据《联合报》介绍，严氏政绩卓著，颇有才干。但社会舆论，并不谓然。

严家淦，字静波，江苏省苏州人，1905 年生，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

1938 年出任福建省建设厅厅长。

1939 年，改任福建省财政厅厅长，创立“田赋征实制”。后推行全国，对抗战中的粮食供应作出了重大贡献。1945 年初，调任重庆战时生产局采办处长，具体办理美国租借法案和中英、中加两个借款案的物资事宜。

1945 年抗战胜利后，严奉命代表经济部和战时生产局，首批飞抵南京，在何应钦手下协助办理受降事宜。同年 12 月 24 日，又奉命赴台北，任长官公署交通处长，兼交通部特派员。

1946 年，任“公署财政处长”，兼台行董事长，筹建台省金融机构和体制。

1947 年，台湾省政府成立时，任“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主持台省币制改革，并于稳定物价中，获特殊成绩。

1950 年初，严任“中华民国”经济部长，兼“美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年 3 月，又改任财政部长，推行现代预算制度。1955 年，继俞鸿钧任“台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并兼任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国军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1963 年当选国民党中央常委。

严待人接物，以宽和忍让为座右铭。凡事，他认为应“退一步想，易地而处”就会消除争执，化干戈为玉帛。他对部属的要求是“公而忘私”或“先公后私”。他认为能“先公后私”，“易地而处”的人，一定生活得愉快，并对个人，对国家，一定有所贡献。

但蒋之所以选中他，是因他听话，不会大权旁落，又可以为经国开道。利用他作为过渡阶梯，将经国扶上要职，然后再叫他让出位子来。所以台省说严是个“好人”，但“不是好官；是好国民，不是好公仆”。

实际上，蒋早已安排就绪。严被提名任行政院长后，怕立法院不通过，便逐门作揖求助。

1963 年 12 月 3 日陈诚辞行政院长职，10 日，严任行政院长。

严上任后[1]，即提名蒋经国任国防部副部长（部长俞大维）。出任俞的副手，当然就是代俞主持国防部。经国又是政务委员，在内阁中和俞同位，更是取代俞职的有利条件。蒋经国又嫁女与俞的儿子，和俞成了儿女亲家，关系更密了一层。这使俞可以更自然地辞职和提名蒋经国继任其职。至 1965 年 1 月 13 日，蒋介石照准俞辞国防部长职，遂提升经国出任国防部长。

1964 年 3 月 5 日，副总统陈诚逝世，蒋经国的对手彻底清除了。从此以后，台湾政治生活便完全由蒋氏父子控制，没有任何人可以以元老资格来对抗蒋经国。

1965 年 9 月，蒋经国以国防部长身份第三次访美。这次访美，是应美国国防部长麦克那马拉的邀请。访问的本意，仍是向美国修好，为未来掌权台湾做准备。

这一年，大陆爆炸原子弹成功（1964 年第一次试爆）。

1966 年 3 月，台湾又要进行总统选举。当然蒋连任第四任总统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副总统。副总统的人选，当时只能是严家淦。3 月 6 日，蒋于九届三中全会上宣言，要提拔新进，并恳切期望总统候选人人选另择，让他专心做党务工作和军事工作。但是蒋仍又被提为总统候选人。

在投票前夕，蒋举行全体“国代”的便餐招待会，并在会上讲话：“我本来希望国民党同志不要提名我为候选人，因为才德兼备，对国家人民有贡献的老同志很多。但是，最后大家仍然推我，我感到很惶恐。我今年已经 80 岁，再连一任，还不能反攻，怎对得起国家？”又说：“此次国民大会乃是反攻前的最后一次会议”。

最后又对民、青两党客气了一番，他说：“此外，我本来希望民、青两党亦能提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可是他们很客气。一党提名未始不是一种缺憾。”他仍想以民主政治的面目出现，表示他不愿一党专政，希望其他党派也可以竞选总统。

然后，蒋又私下向张群表示，愿张做副总统候选人。张群最知蒋氏之心，赶快推说年事已高，建议以 70 岁以下的人任副总统最适宜。但蒋仍分发张群、孙科、何应钦、严家涂 4 张照片备用。

最后，蒋在三中全会提名严家淦为副总统候选人。并对与会者说：“严家涂同志的长处，正是我的短处；我的短处，也正是严家淦同志长处。”这两句话，很有意思，这正是蒋所要求的。投票开始后，严以 72 票被推为国民党候选人。

但国民大会对严家涂却不客气，不少代表要严答复福利条件，否则扬言选举将出现“难产”。投票结果，发票 1417 张，收回 1416 张，严得票 782 张。这说明国民大会和国民党内部中有反对蒋介石的反对派，只是不敢公开。但不管如何，严已当选副总统。蒋死严继后，天下就是蒋经国的了。这时，蒋已为蒋经国的接班准备就绪。

台湾的经济建设

蒋到台湾后，接受了在大陆失败的教训，一要改革政治；二要建设台湾，

---

[1] 1 月 23 日，严家淦对日本记者发表谈话，指出只有中华民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大陆政权不代表中国，坚决反对“两个中国”局面出现。

发展台湾经济，以便有立足之地。

1953 年以前，他把重点放到农业方面和市制改革方面。币制改革和农业的 ” 三七五 ” 减租以及农业技术改进同时并举。而币制的改革尤为一切经济建设的中心环节。因为通货膨胀不解除，一切建设都谈不上。

蒋在 1949 年 6 月 15 日颁布了台湾省的《币制改革方案》。

方案规定：新台市由台湾银行发行，总数 2 亿元，以美金为计算标准。对美金汇率为：新台币 5 元折合美金 1 元，旧台币则以 4 万元折合新台币 1 元。

新台币以黄金白银外汇和可换外汇之物资为准备金。同时设 “ 新台币准备监理委员会 ” ，监督执行和保管。新台币在省内可以通过黄金储蓄办法兑换黄金；在省外，可以通过进出口贸易，兑换外汇。

其具体实施办法中，重点是稳定物价，即 “ 为使币值稳定起见，必须增加生产，节省消费，促进进出口贸易，俾省内经济得以稳定，对外贸易收支得以平衡 ” 。

其次是充分配合企业，以促进企业发展。由 “ 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 ” 统一管理。对于外销物资，要促进其增产和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并对外销生产事业，予以充分贷款。

新台币面额分 1 元、5 元、10 元、100 元 4 种。辅币为 1 分、5 分、1 角、5 角 4 种。

旧台币于 1949 年 12 月 31 日以前无限制兑换。新台币于 1949 年 6 月 15 日正式使用。

同时，农业于 1949 年 4 月开始推行 “ 三七五 ” 减租政策。到 1953 年开始制订第一个四年计划。

蒋在台湾组织各行业的专家们，具体提出了台湾经济建设的总体设想，制定了一系列相应政策。

这些经济政策，主要体现在台省的各个四年计划中。而这些计划的总规划是：

以农业培养工业，再以工业资助和推动农业的发展。先发展容易积累资金和运转快的轻工业和进口替代品，再重点发展出口工业。待积累足量资金后，再适当发展重工业。

以低利率贷款给民营企业，对出口企业则更加优惠。在税收方面，采取税率增长低于生产增长，或不高于生产值的增长率政策，使企业有利可图。

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吸引外资和华侨资本，到台投资。吸引外资的同时，坚持不妨害或保护民族工商业的经济政策的贯彻。

采用沿海与内地均衡发展，互相配合促进的措施。

从 1953 年到 1972 年，台湾的经济发展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从 1953 年至 1960 年，为工、农平衡发展时期。按照蒋的 “ 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 ” 的方针进行。其具体目标是：增加农业生产，实现自给自足，保证岛内市场繁荣。同时增加农、工投资，达到国际收支平衡。工业方面的重点为生产进口替代品，故以纺织、食品、合板为主要工业品类。这个时期，台省物价趋于稳定。

自 1953 年到 1960 年，经过两个四年计划时期，台省工业基础已经建立；工业产品已能满足岛内需要。台省工业便在以上基础上，进一步开辟和拓展市场。

从 1961 年到 1972 年，为第二阶段。

这个阶段可称之为扩大出口和高速增长、高度稳定时期。其平均增长速度，自 1964 年以后，为 11%，属当时世界首位。当时世界最高增长率为 7.18%。

1960 年，台政府制定了《奖励投资条例》，1961 年开始实施，有效期为 10 年。到 1970 年，台政府认为有继续实施之必要，经修订，再实施 10 年。

在第二个时期中，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措施，有金融和出口两个方面。金融方面，主要是当局于 1960 年核准原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复业。1961 年 6 月，将美元汇率调整为 1 美元兑换新台币 40 元。1963 年又取消外汇结算证制度，简化手续。

1965 年，核准外商银行在台设立分行。其中有美国花旗银行、美国商业银行、美国运通银行、泰国盘谷银行等。

同年 9 月，将进口关税税率降低，并逐步放宽进口限制，以推动外销工业发展中对外国原料和设备的顺利进口。1966 年，又在高雄设立加工出口区，直接由外国运进原料，经加工后，又直接将成品自加工区输出外国市场，以减少通关手续。以后又于高雄的楠梓、台中的潭子，成立了加工出口区。

由于经济增长率大幅度提高，出口额迅速增加，而物价却又相当稳定，故第二阶段是台湾经济建设的黄金时期。

这个时期，蒋介石主持台湾当局的工作，对建设台湾，发展台湾生产力是有重大贡献的。台省人民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从而得到迅速提高。台湾当局也得到民众的拥护。

1949 年 4 月，蒋政府在台湾推行“三七五”减租政策。减租前平均租率为 48.63%；减租后租率一律为 37.5%，租农收入大大增加。由于租率的降低，使得租地契约激增，很多无地佃农能够租地耕种。同时，全岛地价下跌，水田平均下跌 19.4%，旱田平均下跌 42.3%。这样，佃农收入又增加了 11.13%。佃农收入的增加，促其购买土地。1949 年佃农购地户数为 1722 户；1953 年，购地户数增到 28960 户。

1951 年 1 月 31 日，蒋下令准备在全岛实行土改。1953 年实行土改，1972 年基本完成。至此，台湾自耕农已占农户总数 78%。

佃农占 14%。台湾农业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为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台湾的工业发展成就是非常显著的，也是巨大的。从 1961 年到 1972 年间，其主要成就统计如下：

1961 年农业总产值为 178.72 亿美元，占岛内生产净额新台币 568.89 亿元的 31.4%。工业总值为 142.4 亿美元，占 25%。服务业产值为 247.77 亿美元，占 43.6%。到 1972 年，以上比例发生了重大变化：农业为 14.1%；工业为 40.4%；服务业为 55.5%。

这种转变，是从 1963 年开始的。

工业中的资本结构，1969 年至 1972 年，制造业占工业资本的 85.8%。其次为公用事业，占 10.61%；营造业占 2.77%，矿业占 4.62%。

此 10 年间，工业平均增长率为每年 16.7%，居世界增长率之首位。农业部门增长率为 4.7%，工业中的制造业增长最快，平均年增长率为 18.5%，公用事业年增长 13%；矿业年增长为 4.3%。

制造业的特点是：先轻工业，后重工业。重点增加加工工业的出口。这

是台湾工业迅速发展的关键所在。

工业生产中的另一个重大特点是民营或私营企业为台省经济的主体。农业也是如此。

1961 年，制造业中民营生产占 54.7%；公营占 45.3%。到 1972 年，民营生产占 86%；公营占 14%。除水电、煤气主要为公营（99.8%）以外，矿业也以民营为主体，1972 年占 84.2%。

重工业比重日益上升。

1961 年轻工业占 56.43%；重工业占 43.57%。

1972 年轻工业占 42.44%；而重工业则占 57.55%。重工业已成为台湾工业的主体部分。

从此，台湾被视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成为少数新兴的工业地区。各国相继与台湾断交后，台湾贸易并未受到影响。

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台湾的教育事业也有较快的发展。文盲于 1961 年的比率为 25.9%，至 1972 年已下降为 13.3%。受高等教育的比率也有较多提高。专科以上者，1961 年人口比率为 1.9%，至 1972 年提高为 4.4%。1979 年大专院校学生增长为 32.9 万余人。高校 100 余所。自 1950 年到 1979 年，出国留学者为 5.7 万余人。

受中等教育者，人口比率由 36.28%上升为 76.11%。[①]

1967 年 10 月，实行学童义务教育 6 年。学费全免，教材由政府供应。因此，学童教育几乎完全普及全台，占学龄儿童的 98%。

此数很高，居亚洲第二位。[②]

初中学费全免。小学人初中不用考试。

教育经费，从 1950 年的 1.78%，上升到 1971 年占总支出的 17.6%。职业中等学校从 1950 年的 77 所，增长至 1975 年的 177 所。

由于台当局实行“均与富”的政策，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蒋介石本民生主义宗旨，在发展国民经济方面是以“均与富”为宗旨的。即在经济发展中既注意发展、致富，又注意分配平均化，不使社会上贫富悬殊。

1953 年，台省民众所得差距相当悬殊。据张果为教授在农复会赞助下所作的《台湾省家计收支调查》统计，台省有 75%的家庭所得低于平均所得，仅占总得的 35%左右。最高所得者的家庭所得数与最低收人家庭收入的比例是 16：1，可见贫富之差是很大的。

1960 年，张教授又主持一次家庭收支调查。这次数据有不小变化。最高收入的家庭和最低收入的家庭收入之比，已变为 9：1，差额大大缩小了。最高收人家庭的收入，也从原先占总收入的 45%下降为 35.83%。

1972 年，最高收人家庭和最低收入家庭之比已变成 4：1。这种贫富差别的缩小，是台湾社会基本安定的保证。

蒋介石逝世

1969 年 7 月，蒋介石在移驻阳明山官邸时，发生一次车祸，健康严重受

[①] 自 1950 年至 1979 年。

[②] 郭为藩：《中华民国七十年之教育》下，第 747 页。

损。1971 年 11 月，又发生了一次大出血事件，身体迅速衰弱。同年，更发生了一些重大国际事件，使蒋受到一次次的沉重打击。

4 月，美国乒乓球队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乒乓球队之邀，自东京到北京访问，双方展开乒乓外交。蒋为此深感不安。他对美国访台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谈话时，警告了美国舆论界，并要自由国家政府和人民不上中共的当。他说：

“中共最近数月所展开的笑脸宣传，依本人看，只是一种欺诈的战略，共产党的基本阴谋并未改变，而且永远不会改变。本人竭诚希望自由国家的政府与人民张开眼睛，窥见这些事实，切勿为中共的和平攻势所诱而坠入陷井。印度、印尼与加纳的惨痛经验，吾人记忆犹新，历历仍在眼前。”

5 月，日本商务大臣在国会中声明，日本政府将不再受“吉田信函”的约束，即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输出重型工业设施和产品。尼克松于 1969 年 1 月就任美国总统。当时他即表示“对中国大陆的政策，将为美国新的外交政策的主要部分”。他又指示国家安全会议重新研究对华政策，提出世界均势论。

到 1970 年 12 月 26 日，尼克松在对访美之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谈话时，第一次叫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与此同时，联合国第二十五次大会表决阿尔巴尼亚提案时，出现 51 票对 49 票之多数，同意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1971 年，尼克松于 6 月 21 日宣布解除历时 21 年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禁运。尼克松特别助理基辛格则突然于 7 月 9 日至 11 日间，从巴基斯坦秘密转赴北京访问，会见周恩来，进行了震惊世界的协商，议定尼克松 来华访问。16 日，尼克松又发表访华公告，等于公开表示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

蒋介石见大势已去，则于 6 月 15 日提前发表“庄敬自强”文告。[①]文告曰：“古人常言：‘天下之事，在乎人为，决不可以一时之波澜，遂自毁其壮志’……

“只要大家都能够庄敬自强，处变不惊，慎谋能断，坚持国家及国民独立不挠之精神，那就没有经不起的考验。……”[②]

联合国第二十六次大会开幕（1971 年 9 月 21 日）后，阿尔巴尼亚等国又提出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

美国则提出了排除“中华民国”议席应视为重要事项的议案，希望大会通过。日本参加了美国此一议案的提出。但 10 月 25 日大会中，美国的这一议案以 59 票反对，55 票赞成，15 票弃权，未得通过。这无疑提前排除了台湾当局代表中国的资格。台湾代表周书楷被迫于 25 日下午 1 时 9 分（台北时间 26 日上午 11 时 9 分）声明退出联合国，并当即率代表团退出会场。大会随即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76 票赞成，35 票反对，美、日均投了反对票）。

1971 年以来，美国舆论界又流行两个中国的理论。蒋介石对此自是坚决反对，并予大力驳斥；大陆也同样坚决反对。对此，国共两党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同是炎黄子孙，谁也不能出卖中华国土。同时台独分子也在美国公开活

---

①

② 蒋介石：《我们国家的立场和国民的精神》（1971 年 6 月）。

动，咄咄逼人。同年 9 月，美国又在联合国提出“双重代表权”问题。这一切均使蒋深感震惊和痛苦，沉重的精神负担，压得他开始郁郁寡欢。

10 月 10 日“国庆日”蒋又发表《告全国同胞书》。他痛苦他说：“今日世界处于一个惨痛的时代。在这时代中，正义与强权、善与恶、黑与白之分辨，日渐消失，贪婪、虚伪与混乱笼罩一切，我祷告上苍并满怀信心，这个世界能很快回到正义、自由与和平的境地。人类的大性不能长期受压迫……”

1971 年 10 月 27 日晨 2 时 30 分，蒋得美国大使安克志通知，得知联大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台湾代表退出联大一事。

7 时半后，蒋召开中评会，下令三军戒备。

10 时，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蒋在极度痛苦之中，又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表示了他的愤慨和继续奋斗，决不屈服的决心。同时理智地表示仍然遵守联合国宪章。他说：“我们已郑重声明，无论中华民国政府或中国人民，决不承认一个在严重违反联合国规定下所作非法决议的效力……。虽然我们已退出联合国，但我们在国际团体中仍将继续以联合国的宗旨与原则，作为我们行动的准绳，并继续鼓起勇气，为国际正义、世界和平与安全而努力。”

台湾的国际前景越来越暗淡了。毫无疑问，这个戎马一生的军人，已有些疲劳了。

1972 年蒋再次当选总统。本年 2 月，蒋在国民大会中说他困年事已高，不再参加总统竞选；但语句之中，仍透露出他愿继续效力，如果大家不嫌他老的话。他说：“本人虽极愿未来仍为国尽忠，但本人己多年膺任此职，深感歉疚，谨郑重恳请诸位代表另选贤能，继承本人担任总统职位。”[①]3 月 21 日，“代表”们仍然以 1316 总票中之 1308 票选蒋连任总统。蒋立即提出其长子经国出任行政院长。

当选之后，蒋又发表文告，重申其反共决心。他说：“惟有我们的政府与人民励精图治，亦即光复失去的领土与拯救大陆亿万同胞，我们才能共同在三民主义旗帜下，获享自由与权利的恩泽。”

“基于此种理由，本人才鼓起勇气与下定决心，并不顾高龄及面对艰巨之使命与重大之责任，而膺受此职，……致力于反抗叛国之毛共，矢志完成第二次誓师北伐，统一中华民国大业。……

本人誓言，……不负全民族厚望，克尽职责……”

“只要毛共及其叛国同党一日尚存，我们革命的任务不会终止，纵使我们必须遭受千百挫折与打击，亦在所不辞，决不气馁。”[①]

同年 3 月，蒋做了前列腺手术，后转为慢性前列腺炎。4 月，患重感冒，进住荣民医院疗养，又转成急性肺炎。实际上，这时台湾已在悄悄地进入蒋经国的时代。本年 5 月，蒋经国在出任行政院长后提出救亡图存的“十大革新”政纲。主要是廉能政治，革除贪贿，经济发展自由、平衡、平等、公开等原则。同时宣布十大工业建设计划。

9 月 29 日，中日建交，日本终止了对台的外交关系。10 月 10 日，蒋介石指责田中角荣背弃正义与法律以及理性。这又是对蒋一个沉重打击。

1973 年元旦，他照例发表致同胞文告。这次文告中，他再一次宣扬民主。

[①] 《自由中国周刊》，台北，1972 年 2 月 27 日，第 2 页。

[①] 《自由中国周刊》，5 月 21 日，第 1 页。

他说：“过去七十余年，我国民革命致力于民主与统一，视为革命的唯一目标，而无一日中断。”他在文告中提倡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说：“谁是真正的中国人？而那些出卖其祖先与国魂者，绝对不是中国人。因此，吾人将堂堂正正，奋斗到底。”[②]

7 月下旬，蒋又发表“世界奴役周大会”文告，宣传为人类自由而奋斗的主张。

10 月 10 日“国庆日”又发表文告，仍然表示其反共的坚决态度，决不改变。其中他说：“纵使我们的权利蒙上一层悲痛的面纱，我们的气氛暂时受到安抚逆流的毒化，我们不会气馁，我们不会迷失方向与道路。”

蒋住院期间，高度保密，不使外人知道。他本应辞职，以副总统代理其职，但他一直没有这样做；意为长子接班准备更充分时间。至 1973 年 7 月，报纸公开刊载蒋氏在其第四个孙子蒋孝勇结婚时与他们的合照，是病后第一次公开露面，向公众表明他的健康状况和并未暗中引退。

10 月 31 日蒋氏 86 岁寿辰时，美国总统尼克松给他写信祝贺生日，对他大加称颂了一番。他说：“我深知，阁下赐我们长期与丰富的经验，使大家获益良多。中华民国在阁下领导下所缔造的成就，足以为今日亚洲其他寻求现代化，同时亦尊重其文化遗产的国家所借镜。阁下不独为贵国历史，同样亦为整个亚洲所作的贡献，实可深深引以为荣。”[①]

到 1974 年夏天，蒋病势又有好转，每天已能在花园散步和家人讨论政治及国际局势。

10 月 10 日，又发表“国庆文告”，仍然妄谈“光复大陆”。

10 月 31 日的寿辰时，台湾也效仿大陆，作了“蒋总统万岁”的徽章，由公众佩戴。当天，又用巨型汽球向大陆投放一千万张蒋介石的照片。这一年共投蒋的照片一亿八千万张，意思是叫大陆人们莫忘蒋氏的存在。

1974 年 12 月，蒋又染流感，并转为肺炎，其身体衰弱之状，已到达相当严重程度。由于蒋长期服用抗生素，此次肺炎很难治愈，总不见效。第二年 1 月 9 日又于睡眠中发生心肌缺氧症，经急救转危为安，但一直烧热未退。

3 月 29 日，蒋已预感将不久于人世，便口授遗嘱，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秦孝仪笔录。后由宋美龄、严家淦、蒋经国、倪文亚、田锦、杨亮功、余俊贤等签字。

遗嘱全文如下：

“余自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坚苦奋斗。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展开政治作战。反共复国大业，方期日新月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从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元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

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光复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

[②] 《中国年鉴》，台北，1974 年版，第 654 页。

[①] 《自由中国周刊》，1973 年 11 月 4 日，第 1 页。

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蒋中正”

4 月 5 日，蒋病情恶化。这一天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清明节。家家户户都祭扫祖坟，因而这一天对病人是最不吉利的日子。

这天下午，蒋感腹部不舒服，尿量减少，医疗小组认为因心脏功能不佳，可能腹内积尿，便给蒋服用少量利尿剂，蒋不久排尿有 500cc。下午 4 时许，小睡片刻。下午 8 时 1 刻，病情进一步恶化，脉搏突然转慢，医生当即实行心脏按摩术和人工呼吸，并打针急救。约一二分钟后，心脏和呼吸又恢复正常。但四五分钟后，心脏又停止了跳动，便再行以上诸方法。然而这次效果不佳，心跳时有时无，而呼吸则未曾恢复，血压亦测不出来，于是使用电击，促使心跳。

11 时 50 分，蒋两瞳孔已经放大，但抢救仍继续进行。先注射数次心脏刺激剂，后又将电极直接刺入心肌，亦毫无作用。

蒋之享年 88 岁。

蒋告别人世时，台北市上空正好雷电交加，大雨倾盆，台湾民间传说这是天主在召蒋归天；蒋经国形容为“风云异色，天地同哀”。

蒋死后两小时，新闻局发布蒋的逝世消息。规定自 4 月 6 日开始“国丧”一个月，同时国民党中央常委召开临时会议，作出两项重大决议：（一）严家涂副总统根据宪法第四十九条，继任总统之职。（二）不准蒋经国辞行政院长职，决议要他“衔哀受命，墨绖从事”。这种议决，实是党权高于宪法的表现。严氏继任，应按宪法之规定；蒋经国在内阁去留，也应由总统上任后决定，皆不需由“中央”决议。

对此，阮大仁就曾提出质询，批评蒋经国应当向新总统辞职，而不应向死总统辞职，他所以不向新总统辞职，证明他根本不想辞职。

4 月 28 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修改党章，推举蒋经国任国民党中央主席。总裁名义保留起来不再使用，以示尊崇。

蒋逝世后，美国总统福特致电哀悼，称颂蒋氏，说“他为促进中国现代化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领导其国家所表现的爱国情操，将名垂千古，光耀史册。”[①]英国首相艾登也致电吊唁，他称颂蒋在抗日战争中，英国人民“对蒋委员长给联军所做的贡献，无不心怀感戴之忱。”日本前首相佐藤说：“日本最不能忘怀的，是蒋公的‘以德报怨’。”

4 月 9 日，蒋的灵柩移入国父纪念馆，供民众瞻仰遗容。数日内约有 250 万人排队等候。16 日 8 时 5 分，举行追悼和安厝仪式。

蒋身着长袍马褂，覆盖青天白日旗。随其遗体入殓者，有蒋得之三枚最高勋章：采玉勋章、青天白日勋章、国光勋章和 4 本他经常阅读的书：《三民主义》、《唐诗三百首》、《圣经》、《荒漠甘泉》。

仪式已罢，将其灵柩由国父纪念馆移至台北之南 60 公里的桃园县慈湖。

12 时 50 分安厝于行馆正厅。

慈湖，很像蒋的故乡溪口，蒋为纪念其母，便名之为慈湖，并于此设一行馆。

蒋遗体经防腐处理后，安放于黑色大理石石棺之内。所以安厝慈湖，是等待有朝一日“光复”大陆后，安葬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墓旁。

前来参加蒋介石葬礼的外国宾客有 300 余人。其中有美国副总统洛克菲

[①] 《自由中国周刊》，1975 年 4 月 13 日。

勒。日本来了 50 余人，有前首相佐藤、岸信介及其他各方面人士等。参加葬礼的南朝鲜代表团，由总理金钟泌率领。

蒋自 1972 年退出联合国后，进一步坚定了自力更生的思想。

他于 1972 年至 1975 年去世前，一直写着《病中随笔》。其中第七、八条中特别指出治国之策，决不能依赖外人与外力，而坚决依靠自身力量。他痛切地说：

“切勿存有依赖心理和失败主义，不顾本身之力量专靠看外人之颜色，以免重蹈大陆沦陷之复辙。

“昔在大陆以依赖外援而沦陷。今日在台以不需经援而图强，于是经济反得自立自足。今日基地自保自强之道，及乐观奋斗之心理，亦由是建立。”

其在第十一、二条中强调，无论国家前途安危成败如何，只要依照主义与公理，不屈不挠，独立自主去做，最后未有不成者也。

“国际间变化不测，万事未可逆料。但吾人已作最恶劣之打算与充分之准备，必能独立生存于世界。”[①]

这些经验之谈，对于政治家或后代，都是值得研究和深思的，对于炎黄子孙们，尤其有参考价值。

综观蒋氏一生，他的坚强、刚毅、固执，以至于劲气内敛和独断专行、自我中心的个性与毫不动摇的追求是不同于凡人的。他精力充沛，总是充满自信心地奋斗。但他奋斗中的悲壮气度远重于乐观的情绪。这当与其孤愤的身世有着密切的关系。

他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贡献，是统率国军进行抗日战争，直至胜利。这不仅对中国是救亡图存的壮举，而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战场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已为举世所公认。

另外，他对台湾的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但他毕竟是一个专制君主，他的一生是一幕历史悲剧，这一悲剧的导演是封建社会的愚昧、落后、贫穷和君权至上。为避免这一历史悲剧的重演，就必须公正、客观地评价社会、民众、个人，决不可把民众当做自己的奴仆，任意摆布。蒋在大陆惨败，原因很多，而最根本之原因，则是其人心失尽军心丢光，而民心之失，则是由于其反动的专制独裁政治和愚民政策。总之是反对民主与科学，以其个人与统治集团的利益为本位，视人民如奴仆，豪门权贵，则借此巧取豪夺，盗国库人私囊，致中华资金大量流入国外，而穷兵默武，更耗尽民脂，终致饿莩盈野，王朝倾倒，而转棲小岛以终。

历史无情，人民有智，凡残民以逞的霸道，无不以失败而告终。蒋终于尝到了这个失败的滋味。

由于他吸取了大陆失败的教训，实行清官政治，才有了台湾的发展和繁荣；如果实行民主政治，台湾之富强自当效果更加显著。蒋晚年对中华民族做出的另一贡献，是其坚定不移的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

历史是公正的，每个时代的历史人物都将在它的风浪中受到检验。蒋的一生功过如何？天下评说。

[①] 《思想言论总集》《文录》第三十五卷，第 279—290 页。

后　记

重新细读本拙著，又有深一层体会，特记之于下：（一）此书重在揭示蒋氏统治失败之过程与原因，原因尤重。蒋氏在位之时，以为手中有几百万装备精良之军队，完全元视人心民意，终于被大陆人民赶至台湾，及其悟之，已经迟矣。（二）历代王朝之君主，取得政权时，依靠人民，一旦上台，又把人民忘记，重蹈腐败覆辙，以致迅速衰败，而至灭亡，尤以李自成之失败，为最快。历史前鉴，不可不鉴之矣。（三）日本政府之侵华阴谋与行为，由来久远，时至今日，仍拒不认罪，反而更积极地复活军国主义，妄图再次发动侵略战争。对此，中国人民有权重议日本对华赔款问题。日本应当对华赔款，因为以德报怨之政策，已完全失败。“靖国神社”而供奉头号战犯，则视亚洲，以至于世界各国为臣服地区，有权声讨之。此“靖国神社”是对世界人民欲行奴役权的象征。其祸心可知矣。（四）中国当时并非无力抗战，实因蒋介石之不抵抗，使日寇迅速占领东北与华北。此后再言抗战，则事倍功半；即使如此，亦有台儿庄之大捷等役，重创日军。

王俯民

一九九六年八月十八日